古拉格群岛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著

群众出版社

古拉格群島

(下册)

1918—1956

(文艺性调查初探)

(俄)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著
钱 诚 田大畏 译
田大畏 校

(内部发行)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京）新登字 09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拉格群岛/（俄）索尔仁尼琴著；田大畏等译．－2 版．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12
ISBN 7-5014-1051-8

Ⅰ．古…　Ⅱ．①索…　②田…Ⅲ．①监狱制度－苏联②法制－概况－苏联　Ⅳ．D95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7926 号

古拉格群岛　　（俄）索尔仁尼琴　著

责任编辑：戴西维
封面设计：王　琴
技术设计：王焰华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印　　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　　页：26
字　　数：1579 千字
印　　张：65.125
版　　次：1996 年 12 月第 2 版　1996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1051－8/I・372
定　　价：（上、中、下三册）96.00 元

（内部发行）



流放，1955 年



1. 在文尼察市认领被枪决者尸体的人们



2. 搜身



3. 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滕诺



4. 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强管棚的房门

5. 苏罗大采娃在简陋的小屋旁



6. 临时民房



7— 涅多夫塑造的囚犯像

8. 在沃尔库塔的垃圾场上

9. 普利耶夫将军



内容提要

第五部 苦役刑

第一章 在劫难逃

“苦役刑”“苦役犯”名词给人的感觉。——斯大林实行苦役刑和绞刑的命令。——前方的胜利带来新犯人。——沃尔库塔第二号矿井苦役劳改点。——超级管理制度。——与契诃夫时代萨哈林岛的苦役相比。——其它这类劳改点。——读者对作者的愤怒。——三个女共青团员飞行员。——和占领军同居的妇女。——抓小孩坐牢。——沦陷区的小学教师。——苏德战争期间当局在爱国主义上的大转弯。——哪儿来的那么多叛徒？——是存在决定意识吗？——错误是谁犯的？——认为什么是错误。——为什么那么多人欢迎德国人来？——挖开文尼察的万人坑。——被我们践踏的人疼不疼？——你们的“学说”在哪里？——感到空气不足的人。——布罗涅维茨基夫妇。——少年对这种事的感受。——即使三十年代也不是所有人都赞赏。——在苏联报刊的谎言中难以区分真伪。——布罗涅维茨基当了伪市长，他看到了什么？——战前农村人心里明白。——战争开始时

人民的情绪，希望是怎样落空的。——居民随着战败的敌军出走。——因绝望而去当的弗拉索夫分子。——热血沸腾的弗拉索夫分子。——一九四一年这些人知道什么。——重复布尔什维克的作法，——一九四一年共产政权的瘫痪和瓦解。——包围圈，包围圈。——科诺诺夫少校和他的团。——“把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布良斯克州洛克奇地区的人民运动，它的纲领。——在顿河。——列宁格勒的大学生。——只盼着外国军队来推翻现政权。——西方需要的是自己的而不是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解放要求和德国的殖民主义的愚钝。——真正的底层的运动。——背叛了祖国的是共产党的上层人物。——先前和德国人结盟的是列宁。

一九四六—四七年因经济需要劳改营管理制度有所放松。——一九四八年建立特种营。——特种营名单。——转入特种营的犯人类别。——苏联人需要“苦役刑”的定义吗？

第二章　革命的微风

当你失去享福的兴趣时。——二十五年的刑期怎样改变了囚犯的心境。——朝鲜战争爆发。——和押送人员的激烈争论。——一个农妇的祝福。——一个不害怕的姑娘。——帕维尔·巴拉纽克以及他怎样狠揍刑事惯犯。——和“母狗”的冲突。——“我们又是革命者了！”——原来在监狱里也是可以这样生活的？——沃洛佳·格尔舒尼。——马棚牢房。——波罗的海沿岸人。——一九一七年后与乌克兰的关系。——谁想生活就让他生活吧！——民族的伟大在于它的行为的伟大。——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细节。

读报。——渴望暴风雨！——除了战争以外，他们还有什么可想的？一九五〇年特种营的气氛。——彼佳·帕-弗的故事。——古比雪夫递解站内的自由。——“杜鲁门会在你们头上

扔原子弹!”——鄂木斯克监狱。——“如背叛的行径，如暴君的乖戾……”——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帕斯基。——巴夫洛达监狱。——不知名的巴夫洛达姑娘。——乘卡车过草原。——父辈怎样生活，孩子怎样玩耍。——这是把我们送到哪里去？——夜间尘土中幻影。——到了。——号码。

第三章　镣链，还是镣链……

这里是从驯服开始。——作为刑具的手铐。——加严管理制度的一套措施。——怎样缝号码布。——用号码布的意图。——检讨书。——号码布未形成压力。——指望与世隔绝。——特种营里的苦役犯。——干式采铜法。——斯捷普拉洛的斯帕斯克分部。——残废人比健康人干得还猛。——残废妇女采石场。——给人吃的像饲料。——死亡率。——劳改营的首长们的结果很好。——日益削弱的与外界的联系。——囚犯的信件被丢进斯帕斯克检查科的炉子。——什么都不要有。——搜查制度。——号码只是技术性的障碍。——记得住《启示录》的女人们。——警卫队根据号码进行惩罚。——警卫队永远正确。——冲锋枪声中的耶稣受洗节之晨。——为什么初到特种营时这样奴性十足？——一年后的埃克巴斯图兹特种营。——禁闭室和格尔舒尼被押走。——押走特维尔多赫列布。——我们建造营内监狱。——一连串的逃跑。

第四章　怎么会忍受？

规律？——沙皇能这样压迫吗？——立宪民主党和社会党人对俄国历史的解释。——十二月党人士兵。——普希金的回答。——薇拉·扎苏利奇案。——空荡荡的政治犯监狱令我们惊讶。——不是镇压，而是刺激。——米留可夫受到过怎样的迫害。——吉梅尔的流放。——对马克西莫夫斯基的行刺。——对

洛普欣的审判。法典不完备。——监狱管理制度的薄弱。——乌里扬诺夫-列宁受到过怎样的迫害。——对社会革命党人是否真的严酷?——一九〇一年的大学生罢课。——布尔采夫谈彼得堡和欧洲的监狱。——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在狱中。——克拉辛，拉迪克，谢马什科，帕尔武斯。——文学百科全书里的“K”字头。——克雷连科受到过怎样的迫害。——革命省长。——反动时期的报刊。——雅尔塔市修像师的没有风险的勇敢行动。——流刑犯戈茨领导着颠覆性报纸。——什利亚普尼科夫被流放的情形。——祖拉博夫父子。——图哈切夫斯基在苏联的亲属。——托洛茨基和列宁在俄国的亲属。——列夫·托尔斯泰和政治自由。——当报刊公开报道死刑的时候。——八个月的斯托雷平“军事司法”及其实行的原因。——革命者没有时间拖延。——斯托雷平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物质的压缩度。——“不要发善心。”——社会舆论在做什么。——我国的知识界“什么也没有料到”。——囚犯们的抗议和外界的社会舆论。——捷尔任斯基撕碎衬衫。——卡里苦役地的轰动事件。——拿它和我们衡量一下。——狱吏们也长进了。——沙俄时代帮助囚犯逃亡毫无风险。——高尔基笔下的尼日戈罗德监狱。——拉塔耶夫谈流放和监狱。——首都密探力量薄弱，外省根本没有。——萨佐诺夫和卡里亚耶夫是怎样行刺的。——只有懒人才不从沙俄的流放地逃跑。——乌兰诺夫斯基的逃跑和回家。——帕尔武斯的逃跑。——我们的暴动和社会的无准备状态。——我们绝不是在忍受的。

第五章　铁板下的诗篇，岩石下的真理

多石的底层给了我立脚点。——我写长诗。——记忆的方法。——念珠和项链。——文稿的三次损失。——狂风中的纸团。——编写剧本就像一次逃亡。——一九五六年见到沙拉莫夫

的诗。——群岛上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阿纳托利·西林，神学诗人。——浸礼派教徒。

火花的互认。——阿富汗俘虏。——托尔斯泰主义者在我国可得小心！——尤里·文格尔斯基。——瑜伽派马萨梅德。——拉波波尔特追纸卷。——他的爱情论。——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死的准备。——诗人们。——在特种营读什么不危险？——围绕达里辞典而结交的朋友。——瓦西里·弗拉索夫讲的事情。——亚诺什·罗扎什。他怎样爱上了俄国。——他从匈牙利写来的信。——利维坦扼杀了多少人？

大辅祭弗拉基米尔·鲁德丘克。——格奥尔吉·滕诺在文教科。——彼得·基什金和他的逗乐。——叶尼亚·尼基申的歌曲。

第六章　坚定的逃跑者

谁是坚定的逃跑者。——对逃跑者的惩罚及为逃跑者的惩罚。——在泰加森林中的日日夜夜——这就是自由。

格奥尔吉·滕诺的生平。——逮捕与最初的希望。——从列佛尔托沃监狱逃跑的计划。——长期徒刑加强了逃跑者的决心。——监狱的监视和狱中的讯问。——未成功的布蒂尔卡监狱暴动。——在火车站、押解途中逃跑的机会。——对前逃跑者的讯问。——是逃跑的理论吗？——趁机逃跑和按计划逃跑。——伊万·沃罗比约夫的逃跑。——滕诺准备一次大逃亡。——准备好了死也就是准备好了逃跑。——逃跑前的最后几小时。

第七章　一只小白猫

格奥尔吉·滕诺讲他和科利亚·日丹诺克的逃跑。

第八章　靠意志逃跑与靠技术逃跑

从特种营不可能逃跑。——但这正是最光荣的。——格里戈里·库德拉的逃跑。——流放者的情绪。——斯捷潘的逃跑及其悲惨结局。——普罗科片科怎样被杀。——一次毫无准备的逃跑倒成功了。

车皮的双层车帮。——巴塔诺夫的第二次逃跑。——埃克巴斯图兹惩戒室的地道。——爬得太快的虱子。——结局。——当年革命者们有过这类事吗，请说！

第九章　拿冲锋枪的孩子们

担任警卫的孩子们。——我们和他们的联系就是死亡。——制度的力量就在于他们的无知。——政治指导员如何对他们进行仇恨教育。——不受惩罚地枪杀犯人。——他们这样干的理由。——用爆破子弹向囚犯队伍射击。——誓言。——把良心的责任交给别人？——弗拉季连·扎多尔内对犯人的保护。——他本人的历史。——制度！

第十章　营区的土地在燃烧

我们的起义是如何被隐瞒的。——奥施库里耶的雷丘宁起义。——五〇一工程工地的起义。——下阿图里亚赫的起义。——斯大林在特种营上的失算。——政治犯的自我觉醒。——怎样做到使他们从我们这里逃走？——头几次杀“眼线”。——锁链在这一环上斯了。——“良心不干净的人，死吧！”——屠宰。——没刮完脸的少校。——行动人员传唤，人们不去了。——首长们既聋又瞎了。——囚犯们按民族的联合。——作业班长不够了。——眼线们逃进强管棚。——营区的土地燃烧起来了！——首长们把这场运动说成“母狗战争”以掩

盖真相。——“母狗战争”是怎么回事。——苏联报刊是怎样瞎说的。——一九六一年关于对营中杀人罪判处枪决的法令。——对全营实行惩戒制度。——营区内部的分割。——首长们导演的一出准备释放的戏。——我们也不让他们抓走！——回头一看，明白了我们是谁。

第十一章　摸索前进，扯断镣链

和首长们的新关系——隔着壕沟。——但是我们该要求什么？——通过什么方式？——埃克巴斯图兹营区内的重新编组。——眼线们拷问我们的人。——攻打强管棚。——动用了火力与兵力的镇压。——苦役犯对命运的冷漠。——我们如何开始绝食罢工。——埃克巴斯图兹的三天。——尤里·文格尔斯基的骄傲。——我们胜利了吗？——作业班长会议。——惩罚。——我住院了。——与巴拉纽克的诀别。

在埃克巴斯图兹又一年。——沉闷状态的复归。——经济核算的竞赛。——这时我们的人正在遭受摧残。——曾充当证人的眼线们被解送了一趟。——不，空气变了！——特种营为收押新囚犯而扩大规模。

我们在肯吉尔的伙伴。——怎样解脱了手铐。——肯吉尔人的觉醒。——第一次屠宰眼线。——首长们的反击。——冷下来了。

斯大林末期特种营的危机。——斯大林的死起了推动作用。——伏罗希洛夫大赦。——由于贝利亚垮台，内务部人员心里没底。——一九五三年夏天列奇劳改营的罢工。——二十九号矿井的残杀。——又把暴乱分子分散押走。群岛变得狭窄了。

第十二章　肯吉尔营四十天

贝利亚的垮台：苦役犯心里乱了，内务部人员心里也乱

了。——要成为上面需要的人！——挑衅性的开枪。——肯吉尔。十六人被达姆弹重伤。——一个福音派教徒被杀害。——男劳改点的罢工。——这次也被"曝化"了。——调整力量：让惯犯们掺进来。

"五十八条"与刑事惯犯之间的新关系。——缔结同盟。——盗贼们的新表现：对"五十八条"客气，对首长们戏弄。——肯吉尔暴动准备势在必行。——惯犯们开始动手。——攻打总务大院，第一道壁垒。——劳改点连在一起了！——最初的要求。自我认识。——高层代表团对一切都同意。——出工，欺骗性的补墙。——手无寸铁的人们在机枪火力下冲锋。——占领了营区，打开了牢门。——八千人奔向自由。

为什么后来也没开枪？——暴动选择口号。——委员会及其各小组。——与秘密中心的关系。——加固营区防御工事。——技术部的秘密。——纠察队和镖枪。——暴动的清教徒气氛。——盗贼们一反常态。——供给。——将军们来到营区。谈判。——卡皮通·库兹涅佐夫的作用。——少年犯人们拒绝离开营区。——安全部，格列布·斯鲁钦科夫。——思想纯良分子反对暴动。——到其他监狱参观。——参观矿山。——没有被人看出来的当地的骚动。——广播喇叭里的宣传战。——气球，风筝。——那些日子里报纸上登的事件。——车臣人的同情。为投降者挖开的墙洞。——吃饱喝足的首长们拍摄不幸的囚犯们的防御体系照片。——但仍然没有人投降。——白热化的氛围。——囚犯们的希望。——新婚夫妇。——宗教信徒们。——群众大会上的鼓动。——难熬的梦幻般的时间。——六月二十四日的骗局。——二十五日黎明的镇压。照明弹，飞机，坦克，冲锋枪手。——"战争罪行法庭"和《真理报》。——肯吉尔死亡人数和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及勒拿河屠杀死亡人数的比较。——对幸存者的摧残。——又开始了往常的生活。——多尔戈鲁基纪念碑。

第六部　流放

第一章　自由初期的流放

自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以来的俄国流放史。——十九世纪末期流放措施的缓和。——西伯利亚流放地对政治犯固定的优惠待遇。——二十世纪初流放制度的衰微。——对著名人物和不著名人物的宽厚的流放。——甚至宽厚的流放对人也有精神压力。

镇压苏维埃早期人民起义时的强制迁移。——自一九二二年起变为常规的政治流放。苏维埃政权的意图：让你走圆圈。——沙俄时代流放地对政治犯的物质保障。——萨哈林（库页）岛刑事犯得到的保障。——付给政治犯的费用及其保证。——苏联流刑犯的无依无靠和软弱无力。——原有政党的消亡。——二十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流放地的社会党人，他们的软弱。——流刑犯相互的疏远以及他们和居民的疏远。——社会党人怎样禁止自己逃跑。——"减号"—"大牌阵"铁面无情。——把预定要逮捕的人们先关进流放地的羊圈。

第二章　农瘟

没受到注意的几百万人。——这个计划是怎样产生的。——一九一八年对农民的打击。灭绝措施开始于一九二九年。——一九三〇年一——二月的决议。——"富农""二富农"帽子满天飞。——"积极分子"。劣根锄不掉。——整镇整镇地扫地出门。——小富农舒尔卡·德米特里耶夫。——"小爱迪生"莫佳。——磨坊主拉克秋金。——铁匠特里丰·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应该有砖房。——赶进集体农庄。——伟大的转

折。——折断脊椎骨。

抢光家产和“剥夺富农”的情景。——瘟疫的臭气多年仍笼罩在农村上空。——季莫费·奥夫钦尼科夫，兽医和制造香肠的师傅。——香肠为联共（布）服务。——载着吃奶婴儿的冬天的大车队。——要让庄稼人绝种。——押解途中的情景。——押解队伍到了目的地。——阿尔汉格尔斯克教堂变成了被剥夺了的富农的递解站。——不许帮助快要死在街头的人！——流放到蛮荒之境。——专挑人没法活的地方。——移民村变成了劳改营。——人口死绝的移民村。——瓦修甘惨案。

特种移民村的生活。——把移民送进劳改营，和家庭断绝联系。——关于恢复被剥夺富农的公民权的决议。——建议他们上前线。——H·赫-夫的回答。——被首长们遗忘的移民村站住了。——再次剥夺富农。——从雅鲁耶沃迁到波德卡缅纳亚-通古斯卡的旧教徒。——以及其他旧教徒，叶尼塞河上的枪杀。——利用结婚生子把他们束缚起来。——永远固定在矿井里。——度过二十年“瘟疫”生活的人们仍是标准的苏联人。——对斯大林没有怨恨！——从国家角度说，他胜利了。

第三章　流放地日趋茂密

苏联流放地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发展。——流放地就是垃圾场，“释放”到流放地去。——行政当局对流放和强制迁移的区分。——流放—强制迁移的主要理由。——各条水流的小支流。——对科茹林家属的摧残。——对卫国战争残废军人的流放。——卡拉干达，一九五五。——叶尼塞斯克，一九四八和一九五二。——塔谢耶沃，一九四九。——从劳改营“释放”是什么意思？——“现在我是你的同志了。”——对新流刑犯的遗令。——不同地方的不同结婚方式。——流放地的“一般劳动”。——“劳改营里还有人管饭！”——流刑犯的屈辱的和毫无

权利的地位。——当流刑犯想比首长们更诚实地办事时。——但最苦的流放还是去集体农庄。——在国营农场里是不是好一点？——在遥远的放牧地，“图尔盖的奴隶”。——由于经常奉命迁移，流放生活也是不自由的。——警备队军官的权利。——对逃跑的惩罚日益升级。——由于不懂规矩而暂时离开也算逃跑。——博戈斯洛夫斯基的“逃跑”。——流放地的契卡行动处。——彼得·维克斯涅的经历。——流刑犯的第二次判刑。——被分割状态与沉默无声。——乌里扬诺夫那时候的快乐的小组在哪里？……

第四章　放逐各族人民

征服殖民地时代并不搞民族放逐。——斯大林的第一次试验。——“农民瘟疫”时期的首批“特种移民村”。——一九三七年把朝鲜族强制迁出远东。——把芬兰人和爱沙尼亚人迁到卡累利阿，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强制迁移伏尔加河沿岸的日耳曼族。——战争年代强制迁移各种民族。——驱逐整个民族时采用的技术。——整齐划一方式的胜利。——其中只有小小的裂缝。——把各民族流放到哪里去。——对波罗的海沿岸民族的“间苗”。——为什么从军官下手。——选择民族流放对象的原则。——一九四八——一九五一年对波罗的海沿岸人和西部乌克兰人的放逐。——斯大林的计划中还有什么？——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快定及被流放者的类别。——放逐技术怎样提高的。——押送途中的爱沙尼亚人。——在那些年他们祈祷战争。——西伯利亚人热情迎接。——共青团积极分子。——在楚雷姆怎样买下了十车皮流放者。——在哈卡斯矿场。“淘金者”。——与工厂农奴的比较。——特种移民在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加劳改营。——波罗的海沿岸人，拿铁锹干吧？——生活小景。——作为另一负担的“公民权”。——啊，多么单调！

在哈萨克斯坦流放地的日耳曼族人，希腊族人，朝鲜族人。——不屈服的车臣族人。——胡达耶夫一家的遭遇。——血族复仇。

第五章 刑满之后

狱中幻想流放。——我也轮上了。——五十年代。流放者比虚假的释放者的优越性。——狱中关于释放时的迷信。——往南方去！——又一次释放。——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瓦西里耶夫。——艾利克·安德逊的新线索。——关于这个人身份的推测。——指定流放地点时决定性的一瞬间。——最高的觉悟：不要耍小聪明。——跟苏联法律都不符合的永远流放。——但是国家安全部是永远的吗？——对瓦西里耶夫的捉弄人的工作安排。——我们最后一次被押解。——国家安全部接收流刑犯。——我要去当教员！——区教育局的接见。——国家安全机关院子里的月明之夜。生活开始了！——暴君死了。

第六章 流刑犯的幸福生活

我放心大胆地写剧本。——区消费合作社商品重新定价急如星火。——我的造反。——怎样让我当了教员。——流刑犯的孩子们学习的特点。——哈萨克孩子们学习的特点。——教师的受压迫地位。——米特罗维奇和行政领导的斗争。——流刑犯参加选举喜剧。——格里戈里·姆-泽的故事。——应该怎样评判？——宽恕的界限在哪里？

若干南方流放地的有利条件。——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胜过乌克兰的集体农庄。——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的“伏罗希洛夫”大赦。——它在科克切列克的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贝利亚之后流放地待遇的缓和。——我很幸运。——得到净化的观点。——一九五五年九月九日的“阿登纳”大赦。——我不想去

首都！——二十大和流放生活的结束。——又在卢宾卡。案子要平反。

第七章 出狱后的囚犯

古拉格天空下的“释放”。——被剥夺了流放地。——娜塔丽娅·斯托利亚罗娃如何请求在劳改营里过夜。——到处碰壁。——当你的照片被朋友们抹掉面孔的时候。——当你情愿快点死的时候。——聪明的囚犯留营就业。——他们怎样生活。——坐牢时间越长，拿退休金的希望越小。——“伊万·杰尼索维奇的第二天”。——朝一个方向发展。——皱皱眉头就行，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要套上一百头牛。——恢复名誉的代价。——证件……——后代从哪里能知道这些？

因获得自由而松弛了。——我的感受。——释放是死亡的另一种形式。——逃入孤独。——从一个营区到另一个营区，不想拥有任何东西。——同一帆风顺的人很难相处。——有人则相反，拼命弥补失掉的东西。——是以过去的事自豪，还是忘掉，忘掉？——好了疮疤忘了疼。——忘记，像盗贼“洗手不干”一样。——是个性的稳定吗？——人们怎样才能忘掉呢？——我在妇女劳改区讲课。——用一天时间重温劳改营的饥饿。——想探望我蹲过的监狱。——但是我们也能回想一些好事。——永不知愁的囚犯，强有力的种族。——衡量事和人的新标尺。

十年、二十年后夫妻变得互不习惯，再次离去。——当你在外面遇到你的侦查员，劳改营主人，出卖者的时候。——追究作伪证者及坏蛋的责任是徒劳的。——雷霆过去了，但没有下雨。——苏联刑法典对诽谤者的优惠。——安娜·切博塔尔-特卡奇的案子。——哪里有过这么多未受惩罚的罪行？

第七部　斯大林死后

第一章　事到如今，左右为难

我们期待我们死后人们能知道真相。——门扉短暂地开了一道小缝。——《伊万·杰尼索维奇》之后。报刊上的难以置信的爆炸。——信件的爆炸。——我们敌人的来信。——互不了解的鸿沟。我们不再是统一的人民了。

怎样为"光荣归于党"补漏洞的。——对群岛实行"偷换"的途径。——诅咒国际帝国主义！——正统派的秘密党员会议。——但是难道能容许搞反对首长的活动吗？——正统派用别人的命救自己。——"为什么舒霍夫不斗争？"——是共产党员还是普普通通的伊万？——共产党报纸上的童话。——苏联作家们笔下的童话。——今日劳改营有多好。——命令：根本不提劳改营！

赫鲁晓夫和特瓦尔多夫斯基都相信《伊万·杰尼索维奇》是写过去的事。——但是我也相信了！——任何分量的痛苦对于我们都不够。——今日囚犯们的来信。——群岛的轮廓又显现出来。——我国社会所有的力线都是引向暴政的。——囚犯们怎样阅读这本"党所肯定的"书。——在营旁世界里也同样。——雕塑家涅多夫的故事。

不能宽恕法西斯杀人犯！——可我们当时不知道呀，不明白呀……——不是侦查有错，而是犯人自己有错。——他们在短时间内发了一阵慌。——国家安全人员们怎样干到拿退休金。——清除档案。——"到了该恢复'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的时候了。"

第二章　统治者易人，群岛依然在

特种营是斯大林的得意之作。——它们在斯大林死掉和贝利亚垮台以后的衰落。——内务部人员请求不要称他们是贝利亚分子。——各项“社会活动”，但客观条件不同了。——营区外管制居住。——卸包袱委员会。——群岛和内务部人员面临灭亡。

对囚犯的真正释放本应是什么样子。——谁应求谁的宽恕？——以认罪为代价的获释。披着检察官长袍的自由时代。——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是群岛的性命攸关的年代。——不该那时候就把它解散吗？——赫鲁晓夫把他的权力用在什么上面？——“实际工作人员”的反攻。——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加强劳改营。

我们的历史接近结束。——赫鲁晓夫时代后的新的见证人。——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的弗拉基米尔中心监狱。——又是“劳改区”和劳改区管理总局。——四种管理制度。——表现好顶屁用！——一九六一年改革的目的。——重新使囚犯便于控制。——这点邮包就够我们呛的了。——囚犯们梦里都想面包。——劳改营主人们在邮包、转交物品、汇款、小卖部等方面的胡作非为。——六十年代的伙食标准。饥饿。——制度魔术师。——特种制度，条纹囚衣。——“实际工作人员”的工作好做多了。——劳改营里的“社会”（母狗们的）活动。——与众不同的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政治学习，听广播，学校。——男女分营。——监督委员会和加丽娜·菲利波娃的经验。——劳改营“教育员”的自说自话和囚犯们对他们的反映。——那你就相信报纸吧。

我为群岛的事上访有关单位。——我怎样被捆住手脚？——在最高苏维埃委员会里的谈话。——和内务部长的谈话。——在犯罪原因研究所。——坦率的答复。

第三章　今天的法律

从来没有过政治犯，现在更没有……——一九六二年六月一二日，新切尔卡斯克暴动。——一名军官的自杀。——用爆破子弹向群众开枪。——镇压的几个阶段。政治局要的手腕。——随之而来的惩治。——亚历山德罗夫和穆罗姆两市的风潮。——群众闹事不算政治事件。——用焊枪及拖拉机和教堂“对话”。——一九六四年，尼基托夫卡市对浸礼派教徒的审判。——教徒对迫害事件做的统计。——违法保留的二十五年徒刑。——斯大林的“教子”们还接着坐牢。——当西方的左派们恍然大悟时……

同样的镇压，不过是通过一般刑事条款而已。——斯梅洛夫案件。——米·波塔波夫案件。——法律的臃肿躯体永不会错。从来没有无罪判决，从不会复审。——梁赞州法院的一个场面。——对无辜者采用“挂车”的方法。——伊万·布雷克辛之死。——“寄生虫”法令。——已经不再许诺能够消灭犯罪现象了。——我国的法律具有回溯力。——开庭前发表的有关审判经过的报道（塔尔图，一九六一年）。——作伪证者逍遥自在。——杀人犯审判员和杀人犯检察长不受惩罚。——法律的摇摆。——幕后定案。——穿透胸膛的不公正。——没有法律。

目　录

第六部　流放

第七部　斯大林死后

第 五 部

苦 役 刑

“我们要把服苦役的、充满镣铐声的西伯利亚变成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西伯利亚。”

——斯大林

第一章

在劫难逃

革命常常表现得匆忙而又慷慨豁达。它往往不假思索地急于放弃许多东西，譬如，放弃"苦役刑"这个词。其实，这个字眼儿很好，沉甸甸的啊！它可不能和什么半吊子的"强制劳动所"或模棱两可的"劳动改造营"之类的词同日而语。从高高的法官席上掷给被判刑人的"苦役刑"这个词，有如刚刚往下落的斩首机，在审判庭上就已经足以打断他的脊梁骨，足以粉碎他的一切希望了。"政治苦役犯"这个词令人毛骨悚然，它甚至使其他囚犯，使那些不是政治苦役犯的人，一听到它就不禁暗自想：看，这些人才是真正杀人越货的家伙呢！（这里也表现了人类的一种怯懦的自我解脱的本性。人总是设想自己还不是最坏的人，还没有处于最坏的境况。政治苦役犯的衣服上是缝着号码的！那，当然，是些十恶不赦的罪犯喽！咱们身上就没给挂上号码嘛！……别忙，会给你挂上的！）

斯大林非常喜爱一些旧字眼。他记得：有些国家就是靠这些字眼维持了几百年。因此，他就在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需要的情况下，把过去在匆忙中砍掉的一些词——"军官"、"将军"、"经理"、"最高的"等等——都像接枝似地一一接活了。到了一九四

三年四月，当斯大林觉得他座下的马车已经把他拉上山顶的时候，他就在二月革命宣布废除苦役刑之后的第二十六个年头毅然恢复了苦役刑。斯大林格勒大战役的人民胜利给普通公民带来的第一批胜利果实，就是关于铁路军事化的命令（实际上就是让军事法庭审判孩子和妇女们），以及在一天之后（四月十七日）发布的关于实行苦役刑和绞刑的命令。(绞架也是古代留下来的一种很好的设置；手枪只是“砰”的一响，怎么能和绞架相提并论呢?！绞架可以拖长死亡的过程，可以同时向一大群人昭示死亡的一切细节呀！）从那时起，各次胜利都把一批批新的在劫难逃的人们赶去服苦役刑，或者送上绞架——起初是从库班河畔和顿河畔赶去，接着便是从德聂伯河东岸乌克兰地区，从库尔斯克、奥勒尔、斯摩棱斯克等地区。军事法庭紧跟着苏联军队来到。有些人在当地就被绞死，另一些人被送到新设立的苦役劳改点去。

这类苦役劳改点中最早的一个，显然是建立在沃尔库塔的第十七号矿井（很快便在诺里尔斯克、杰兹卡兹甘等地也都建立起来了），当局几乎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政治苦役犯弄死。这是公开的杀人场，等于希特勒德国的窒息汽车。不过，这里按照古拉格的传统把死亡时间拖长了，这是为了延长那些在劫难逃者的痛苦，而且要他们在死前多干些活儿。

苦役犯通常被安置在一些七米宽二十米长的北方常见的帐篷里。把帐篷用木板围起来，木板和帐篷中间填满锯末，这样，帐篷就成了某种简易工棚。原定每间帐篷里，如果睡“小车厢”的话，可以住八十人，睡通铺就住一百人。可是，政治苦役犯则是每间住二百人。

但这可不是硬挤！这叫做居住面积的“合理利用”。给政治苦役犯们规定的是两班制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没有休假。因此，不论什么时间总是有一百人在劳动，只一百人在工棚。

劳动时，囚犯们由携带军犬的警卫队包围着。如果看守人员

不懒，就随手打他们几下。要想使他们振作精神的话，就用冲锋枪托干。在往返营区的路上，押解队的大兵一高兴就可以用冲锋枪朝苦役犯队伍扫上一梭子弹，谁也不会为了被打死的人去追究士兵的责任。筋疲力尽的政治苦役犯的队伍，从老远处就可以看出与普通囚犯的队伍迥然不同——它显得那么忧伤、迷惘，步履是那么艰难、沉重。

说起劳动的十二个小时，真可说是度日如年（在诺里尔斯克那种北极地区的、凛冽的北风中，在纷飞的大雪中，他们用手敲打粗石。十二小时之间仅有十分钟可以取取暖）。规定的十二小时休息时间，也安排得尽可能地荒谬。在这十二小时里，他们被带到一个隔离区，又带到另一隔离区，要站队，要搜身。进人居住区后立即被塞进永远不通风的帐篷——没有窗户的工棚里。工棚立刻上锁。冬天，工棚里酸臭潮湿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浓，不习惯的人简直连两分钟都呆不下去。对政治苦役犯来说，这居住区比劳动区更加难以忍受。去厕所、食堂、卫生所？那是根本不允许的！这些都通过马桶或者送饭窗口来解决。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时期，斯大林设立的苦役刑就是这个样子：它把劳改营里最坏的东西同监狱里最坏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契诃夫的作品证明，沙皇时代的苦役刑还远远没有这么多发明创造。当年关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萨哈林）监狱的政治苦役犯们，不仅昼夜任何时候都可以到院子里和去厕所（那里甚至完全不用马桶！），而且整个白天可以随时去市里！所以，“苦役刑”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总该“物归其主”嘛！）还得算斯大林最了解。

在政治苦役犯的十二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他们要经过早晚两次点名。这可不像普通犯人点名那样单纯地数数人头，而是一丝不苟地一个一个地点名。每队一百名政治苦役犯，被点到的人必需一昼夜两次毫不含糊、毫不迟疑地大声回答出自己的号码、自己那令人厌恶的姓、本名和父名、出生年和出生地、所犯法律条

文、刑期、判决机关和满刑日期。其他的九十九人则不得不每昼夜两次忍着痛苦恭听这一切。在这十二个小时里还有两次分发食物：经过送饭窗口分发大碗饭，再经过送饭窗口把碗收回去。任何政治苦役犯都不得在伙房劳动，也没有资格抬饭桶。这类服务工作全由刑事惯犯担当，而刑事惯犯对政治犯的抢劫、盘剥越是残酷无情，他们自己就会过得越舒服，越能博得苦役营主人的欢心。在这里，在盘剥压迫触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这一点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利益总是同刑事犯罪分子的利益一致的。

政治苦役犯还要受到饥饿的折磨。但是，因为一切报表单据都不必留作历史的见证，所以，报单上还有照样写着：政治苦役犯可以领到"矿工菜"和"奖励菜"补助。这些东西本来就少得可怜，还要经过三层偷窃和盘剥。所有这些也都要经过送饭口和一整套繁琐程序才能得到：要逐个点名，要拿菜票换大碗，等等。等到终于可以躺在铺板上睡一觉的时候，送饭口又打开了，又叫名字：开始发第二天的菜票（普通犯人不必操心菜票的事，他们是由队长把菜票领来，一起交给伙房的）。

就这样，名义上十二个小时的在囚室的空闲时间，最多不过剩下四个小时能够安静下来睡一觉。

此外，当然，政治苦役犯是领不到任何现钱的。不论是寄给他们的邮包还是信件，他们也都无权接受。（在他们那被弄得昏昏沉沉、嗡嗡响的头脑里，不应该保留关于过去的狱外生活的半点记忆。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北极地区的黑夜中，除了劳动和这间工棚之外，大地上的一切都不应该在他们脑海里存在。）

由于这一切，政治苦役犯们大都很顺利地垮掉，很快地死去。

沃尔库塔劳改营的第一张字母表名单上共有二万八千人（犯人都按俄文字母表分字母编号。字母表上共有二十八个字母，每个字母从一号编到一千号），所有这二万八千名政治苦役犯在一年之内就全部"入土"了。

使人感到奇怪的，倒是为什么没有在一个月之内都死去。[1]

在诺里尔斯克，常有火车开到隔离区来为第二十五炼钴厂起运矿石。这时，政治苦役犯们就躺到火车轨道上以求快些结束这一切。大约有二十几个人绝望之余逃进了冻土地带，但他们还是被飞机发现并打死了。他们的尸体就堆垛在囚犯们早晨分班派工的地方。

沃尔库塔的第二矿井有个女苦役犯劳改点。女苦役犯们的号码是缝在后背和头巾上的。她们不仅要参加所有井下劳动，而且还……而且还超额完成计划！[2] ……

不过，我已经听到祖国同胞和同时代的人们向我发出愤怒的喊叫了：你住口吧！你讲的都是些什么人的事呀?！不错，正是为了让他们死绝才监禁他们的！而且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些叛徒、伪警察、伪市长！就应该这样对待他们！你大概是心疼他们吧？(如果是这样，你也清楚，那对你的批评可就会超出文学范围而必须由某些机关来处理了！)我还仿佛听到一些妇女的声音对我喊："那里关的妇女都是曾经给德国鬼子当褥子的！"(我没有夸大吧？不是确实有一些我国的妇女把另一些我国的妇女叫做褥子吗？)

我满可以像现在揭发个人迷信现象那样给予简单的回答，这对我来说是最省事的，就是，讲几个被判处苦役刑的特殊事例。例如，讲讲三个女共青团员志愿兵的事。她们曾驾驶轻型轰炸机去执行轰炸任务，但中途害怕了，没敢去轰炸敌军目标，而是把炸

---

① 在契诃夫时代，整个萨哈林岛（库页岛）上的苦役营里总共（你猜有多少?）有五千九百零五名政治苦役犯，那才勉强够编六个字母的号。我们住的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分部的规模也是这么大，而斯帕斯克营就大得多了。可见，从前令人闻名丧胆的萨哈林岛原来是徒有虚名，实际上只不过相当于如今的一个劳改营分部！今天仅仅在斯捷普拉格一地就有十二所像斯捷普特种劳改营这样包括十个分部的劳改营。请您算算，总共相当于多少个库页岛吧。

② 当年在萨哈林岛上根本不叫女犯人干苦役劳动（契诃夫）。

弹扔在荒野后就安全返航了。她们向上级报告说完成了任务。可是，后来，其中一个女孩子受到了共青团员的良心的谴责，把真情向本部队的共青团小组长（也是一个女孩子）汇报了。而小组长当然立即汇报了"特别处"，于是三个姑娘都被判二十年苦役刑。讲完这类事例之后，便义正词严地喊一声：看，斯大林的独斯专行处罚了一些多么忠诚的苏联公民呀！然后就再不需要为独斯专行本身而愤慨，只须慨叹那些使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们遭受无妄之灾的、现在幸而已经全都得到纠正的错误了。

但是，如果不把问题的深刻性全部揭示出来，我总觉得于心有愧。

就先谈妇女吧。我们知道，妇女现在是得到解放了。不错，还没有解除她们的双重劳动，但她们总算不再受宗教婚姻的束缚，摆脱了社会歧视的重压，不再受卡巴诺娃*那一套了吧。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我们还认为妇女们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和个人就是犯了反爱国主义罪行和刑事罪，这岂不等于我们又为她们准备了一套比卡巴诺娃更坏的东西吗？况且，整个世界文学（在斯大林之前）不是都在歌颂摆脱了民族界限、摆脱了将军们和外交家们的意图的爱情自由吗？而我们却在这个问题上也接受了斯大林的标准：没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女人不得与男人相逢相识，女人的身体首先是祖国的财产！

首先，让我们看看这些妇女是些什么人吧。看看她们不是在战场上同敌人相逢，而是在被窝里相逢的时候，她们才有多大年纪？大概总不过三十岁，甚至不过二十五岁吧。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从孩提时期就接受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教育的，是在苏维埃学校里接受苏维埃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那么，我们岂不是在为自

* 亚·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悲剧《大雷雨》中的角色。封建、守旧、愚昧、专横。——译者注

己亲手培育的果实而感到愤慨吗？这些女人中间，有些女孩子这样作是因为深深铭记住了我们曾在十五个年头中无休止地叫喊过的一句话：没有任何祖国！“祖国”只是一种反动思想的臆造！第二种女孩子可能是因为对于我们的小会、大会、游行示威、没有接吻镜头的电影、没有拥抱的舞蹈等清教徒式的乏味生活感到厌倦了吧。还有一些人可能只是被男人的殷勤、周到、外貌上的一些细节和他们追求女人的某些本领所征服了，而这些也恰恰是我们那些完成五年计划的小伙子们和伏龙芝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指挥员们所缺乏的。第四种人则可能仅仅是为了摆脱饥饿。是的，由于原始的、动物的饥饿，也就是说，因为她们没有东西填饱肚子。第五种人，也许，只是因为看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免于一死、拯救自己的亲人、免于同他们分离吧。

我曾经到过勃良斯克州的斯塔罗杜布市，那是在敌人刚刚撤走的时候。人们告诉我：曾经有一支马札尔人（匈牙利人）的卫戍部队在这里驻扎了很长时间，防备游击队攻城。后来，一声令下，这支部队要调防到别处去了。于是，就有几十个当地的妇女，不顾羞耻，跑到火车站去送别那些侵略者，而且她们竟是那么号啕大哭，据一个刻薄的鞋匠说，“连送她们自己丈夫上前线的时候都没有哭得那样伤心”！

几天之后，苏军军事法庭来到了斯塔罗杜布市。当然喽，它不会把告密者的话当耳旁风的。免不了有几个哭送过马札尔士兵的妇女被送到沃尔库塔的第二号矿井去。

可是，请问，同胞们和同时代的人们，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谁的罪过？是这些女人的罪过吗？还是我们的，我们全体同胞和当代人的罪过？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搞的呢？为什么使得我们的妇女们竟然离开我们而扑进了占领军的怀抱？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付出的无数代价中的一种吗？由于我们仓促地选定了那条道路，由于我们不回顾过去的损失，也不展望将来，而在杂沓纷乱中滑着

那条道路走了过来，我们不是正在付出，而且今后很长时期还要继续付出这一类代价吗？

或许，对这些妇女和姑娘应该给以道义上的谴责（但也总得听听她们的申诉吧！），或许应该尖刻地嘲笑她们一番。但是，为了这些事就应该判她们苦役刑吗？该把她们送到北极地区的杀人场去吗？

“可那是斯大林送去的！是贝利亚干的！”

很抱歉，不对！那些遣送她们的、羁押她们的、打死她们的人们目前还呆在退休人员委员会里，并且还在监视着我们社会的道德发展情况！而我们自己呢？我们听到“给德国鬼子当褥子”这样的话时，不也只是会心地点点头吗？我们至今仍然认为这些妇女有罪，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甚至是更加危险的，比她们当年坐牢本身还要危险。

“好，就算是这样吧。可是那些男人们总是罪有应得吧?！他们是祖国的叛徒，是社会的叛徒！”

这里也还是能够设法开脱的。可以提醒人们（而且这是事实）：那些主要罪犯们，当然不会留在当地坐等我们的军事法庭和绞刑架到来。他们千方百计逃往西方，而且许多人确实逃掉了。我们的惩罚性侦查机关是靠了一些羔羊才凑满它的任务数字的。邻居的告密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不知为什么他家里住过德国鬼子。为什么德国人偏喜欢他家呢?”“那个家伙用自己的雪橇给德国鬼子运过干草。直接通敌！”[①]

当然，可以大事化小，或者是把这一切都推到个人迷信上去：确实有过过火的地方，可现在全都改正了。现在一切正常！

好吧，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了。

---

① 我们应该公正，不能忘记：从 1946 年起对这一类人中的某些人进行了复查，把二十年苦役刑改判为十年劳改营了。

那么，教师们呢？当时教师们同他们的学校和学生一起统统被仓皇后退的我国军队所抛弃，有的抛弃一年，有的两年，有的竟达三年之久。由于领袖人物的昏庸，由于将军们的无能，弄到了如此地步，叫这些教师们怎么办呢？他们应该教育还是不该教育自己的学生呢？让孩子们怎么办呢？我指的不是那些已经达到十五周岁并可以靠自己劳动维持生活或能去参加游击队的孩子，我是问小孩子们该怎么办？他们应该学习还是该像公羊似地闲逛上两三个年头，从而为最高统帅的错误赎罪呢？既然老爷子没给我买棉帽子，我就应该让耳朵冻着，是这样吗？……

不知道为什么，不论在丹麦、挪威、比利时，还是在法国，这些事都没有成为问题。那里的人们并没有认为被各种情况所迫或被本国的不明智的统治者轻易地送到德国人政权统治下的人民，现在就根本不该活下去了。那里的学校在德军占领期间曾照常上课，铁路曾照常通车，还曾有过地方自治机构。

所以，总是有些人（当然是他们喽，绝不是我们！）的脑筋被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因为在我们这里，学校的教师们往往会收到游击队偷偷送来的条子："绝对不许你上课！否则将来跟你算帐！"而你如果在铁路上做工，这简直就是与敌人合作了。至于地方自治，那更是大逆不道的叛国行为。

谁都知道，小孩子一旦脱离了学习，很可能以后就无法再学习。那么，如果那位各时代、各民族的英明战略家失算了，在这种情况下，青草是该继续生长还是该枯萎掉？教师应该继续教孩子们念书，还是应该暂时不教呢？

当然，为了教孩子们念书，就得付出一些代价。就得从学校里把留着八字胡髭的人的像片拿掉，并且，也许还不得不挂上留着鼻下小胡子的人的像片*。枞树晚会不能按苏联的习惯在新年

* 前者指斯大林的像片，后者指希特勒的像片。——译者注

举行了，要改在圣诞节举行，而且在这种晚会上（还有在帝国的别的什么纪念日仪式上，反正不是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仪式上）校长还必须致辞颂扬新的美好生活，尽管实际生活十分糟糕。但是，要知道，在这之前校长不也是常常致辞颂扬美好生活吗？那时的实际生活也是很糟糕的呀！

也就是说，从前不得不昧着良心对孩子们撒谎的情况比这时还要厉害得多呢，因为那时有足够的时间让那些谎言固定下来，并且在教学法专家和教育视察员们的精心设计下使谎言渗透到教学大纲里去。那时候在每一节课上，不管是否合适，也不管是讲昆虫躯体结构还是讲从属连接词，都必须对上帝踢上一脚（哪怕你自己是信奉上帝的），都必须不放过机会来歌颂我们无限的自由（尽管你实际上由于担心夜里的叫门声而睡眠不足）。不管你是在朗诵屠格涅夫的诗篇，还是正用教鞭指出地图上的第聂伯河流，你都必须诅咒从前的贫苦并极力称颂今天的富裕生活，虽然你和孩子们都亲眼看到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曾有整村的人死光，而城市里的孩子们凭配给卡片每天才能领到三百克面包。

所有这一切都既没有被看作对真理的犯罪，也没有被看作对孩子心灵的，对**神圣精神**的犯罪。

如今呢，处在侵略者短暂而不稳固的制度下，需要撒谎的情况少得多了，况且这是对另一方面撒谎。对另一方面撒谎呀！谁知道，原来这也就是症结之所在！正因为如此，祖国的声音和地下区委的铅笔就来禁止你教学生们国语、地理、算术了。你如胆敢去教，就判你二十年苦役刑！

同胞们，你们点头吧！看，那不是正带着军犬把人们送进有马桶的工棚吗？你们快朝他们身上扔石头吧，因为他们竟敢给你们的孩子讲课呀！

但是，我的同胞们（特别是一些从优惠的领导机关退休的同胞们，那些在四十五岁就开始领养老金的聪明人们）却都向我围

拢过来了。他们挥着拳头对我说：当初我保卫的是什么人？我应该保卫那些给敌人当市长、村长、警察、翻译的坏蛋和渣滓吗?!

那么，好吧。让我们往下看吧，看下去。因为我们把人只看成小木棒，我们砍倒的森林太多了。不管怎样，有朝一日，未来一定会迫使我们反省，迫使我们思考其原因的。

音乐奏起来了，歌声在耳边回荡："让我们那神圣的愤怒，去把……"这怎么能不使人激动万分呢？我们那固有的、曾经受到禁止、嘲弄、打击和诅咒的爱国主义，今天忽然被允许了，又受到鼓励了，甚至被歌颂为崇高的了。这怎么能不使我们所有俄罗斯人精神振奋？怎能不把我们胸中激荡着的一颗颗圣洁的心联结在一起呢？况且我们俄罗斯人本性就是宽容大度的——随他去吧！——此时，在外来的刽子手逐渐逼近时，还能够不饶恕那些土生土长的刽子手吗?!可是，后来呢？后来却要压制住内心隐隐约约的怀疑和自己那匆忙的宽宏大度，反而要尽量异口同声地、激烈地去咒骂那些背叛祖国的人，咒骂那些显然比我们坏的、不忘旧怨的人吗？

俄罗斯耸立在大地上已有十一个世纪了，它有过许多敌人，进行过多次战争啊！但是，俄罗斯出现过许多叛徒吗？它产生过大群的叛徒吗？似乎并没有。即使在敌视劳动人民的旧社会制度下，连敌人也都没有指责过俄罗斯性格是背叛、反复无常、不可信任的呀！

如今，我们这里建立起了最公正的社会制度，爆发了最正义的战争，而我们的人民却忽然暴露出自己的队伍中有成万的、数十万的叛徒！

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这样？

也许是并未熄灭的当年的内战如今又重新迸发了吧？他们都是没有被消灭干净的白匪吧？不，完全不是这样！前面已经说过，许多逃亡国外的白俄（包括那个臭名昭著的邓尼金）都站到苏维

埃俄罗斯一边来了，他们也反对希特勒。这些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他们却做了这样的抉择。[1]

这几万人，几十万人（伪警察、惩罚队队员、村长和翻译）的叛徒都是从苏联公民中间产生的，其中有不少是年轻人，他们也是在十月革命后长大的。

那么，是什么迫使他们去干那些事的呢？……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这首先是那些其家庭和他们本人曾被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履带辗过的人，是在我们的下水道浊流中失去了双亲、家属和恋人的人们，或者是本人就曾经在劳改营和流放地的深渊中沉浮而再沉浮的人，是那些站在探监者送食物包裹的小窗口前排队把腿脚冻僵或落下病根的人们。也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则是在这残酷的几十年中丧失了获得大地上最宝贵的东西——土地本身——的一切希望。这里不得不顺便提一句，那土地曾是伟大的法令应允给予他们的呀，更何况他们在内战年代里为了获得这些土地曾经流过血！（然而，苏军军官们则可以继承别墅和莫斯科近郊那些用板墙围起来的大片房产，这是另一回事：这是给了我们的，那当然是可以允许的！）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偷割了麦穗”坐过监狱，有些人则是被剥夺了自由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或者是被剥夺了操持自己从事多年的心爱的手艺的权利（我们曾经以宗教的狂热摧毁了所有的手艺行业，可我们现在却把这事忘掉了）。

一提到那些人，我们这里的人们都会十分轻蔑地（宣传鼓动员们则是加倍轻蔑地，而那些十月革命的护宪派们更是倍上加倍地轻蔑地）撇着嘴说：这些人都是“受过苏维埃政权委屈的人”，

---

① 因为他们这些人并没有和我们一起尝到三十年代的滋味。他们从遥远的地方，从欧洲，比较容易叹赏“俄罗斯人民的伟大爱国功勋”，但却忽略了连续十二年在国内发生的种族绝灭罪行。

是“过去受过惩罚的人”，是“从前的富农子弟”，他们都是“对苏维埃政权怀恨在心的人”。

一个人这么说，另一个人点点头，似乎就什么都清楚了。似乎人民政权本来就有权利委屈自己的公民。好像最根本的毛病，主要的病症就出在这里，出在他们“受了委屈”……他们“怀恨在心”上面……

而且，竟没有一个人喊一声：你住口吧！见你的鬼去吧！你们到底是不是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决定不决定？或者你们想说：只有在对你们有利的时候存在才决定意识，面对你们不利的时候就不决定了，是吗？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人会微微蹙着额头这样说："是啊，是犯过某些错误。"而且永远使用这个恶作剧而又不受惩罚的无人称句子——犯过。可就不知道是谁犯过的。似乎就是那些干活的能手、搬运工和农庄庄员们犯过的了。谁也没有勇气说：是共产党犯的！是那些永不换班的、不负责任的领导人犯的！除了掌握着政权的人们之外，那些错误还会由谁“犯过”呢？都推到斯大林一人身上行吗？总该有点幽默感吧。是斯大林犯的，那么，请问，你们这些人，几百万领导者，当时干什么来着？

不仅如此，连这些错误本身也在我们眼里仿佛很快地就消散开了，变成了某种朦朦胧胧的、不清楚的、没有轮廓的斑点，它已经不再被看作迟钝、狂热、用心险恶所造成的后果了。而只有在一个问题上，即在共产党人把共产党人关进了监牢这个问题上，承认了所有的错误。至于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农民被弄得家破人亡、被送去消灭、被迁移到全国各地而且被剥夺了记住并且提起自己父母的权利——这些似乎就都不是什么错误了！我们在本书的开头提到的那些下水道的水流，看来也不算是错误了。对于同希特勒作战毫无准备，摆出一副骗人的架式在不断变换口号中可耻地后退，仅仅依靠俄国伊万的精神和为神圣的俄罗斯而战

的口号才在伏尔加河一带迫使德国人止步——对于这一切，不仅不算是斯大林的失策，反倒一变而几乎成为他的主要功勋了。

在仅仅两个月之内，我们就把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丢给了敌人，同时也抛弃了上述那些没有消灭干净的家庭和在警卫逃跑后才四散逃亡的千万个劳改营里的犯人，丢下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许多监狱，在那里直到敌人到来时还弥漫着枪杀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的硝烟。

当我们还有力量的时候，我们窒杀、毒害所有这些不幸的人们，不雇佣他们，不给他们机会做工，把他们赶出住宅，逼死他们。而一旦我们的无能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又立即要求他们忘掉强加给他们的一切灾祸，忘掉他们那被枪杀的亲人，忘掉他们那饿死在冻土地带的父母和孩子们，忘掉自己家庭的破产和我们对他们的忘恩负义，忘掉内务部的审讯和酷刑，忘掉饥饿的劳改营了。不仅要求他们忘掉这一切，还要求他们立即去参加游击队，转入地下，并且不惜生命地去保卫**祖国**。（但却绝口不提我们自己应该改变态度！何况我们谁也没有给予他们希望，没有使他们能够指望我们有朝一日回来之后会改变过去对待他们的态度，会与从前有所不同，不会再毒害他们、驱逐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牢，不再枪杀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对什么感到奇怪才合乎逻辑呢？是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欢迎德国人到来呢？还是应该奇怪这样的人太少了呢？（甚至德国人还有时不得不搞一点“司法审判”之类装装门面呢。例如，他们审判苏维埃政权时期的告密者们，在基辅市枪决临河街尼科尔斯克教堂执事等。而且这类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还有那些信仰宗教的人们呢？我们连续二十年迫害宗教、关闭教堂。德国人来了，他们开放了教堂（德国人撤走之后，我们没好意思立即再关闭它）。就以顿河罗斯托夫为例吧，那里开放教

堂的仪式受到了群众的欢呼，招来了大批群众。不，这些人应该为此去诅咒德国人，是吗？

就在这个罗斯托夫市，战争爆发后没有几天，工程师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姆-弗被捕了，他随即死在侦讯室里。其后好几个月，他的妻子一直在战战兢兢地等待自己被捕。只是在德国人来到之后她才“放心地”躺下睡觉了，心想：“今天至少可以足足睡一觉。”不，她应该衷心祝愿那些杀害她丈夫的刽子手们回来，是吗？

一九四三年五月，还是德国人占领的时候，在文尼察市的林边大街的公园里（这个公园在一九三九年初就被市苏维埃用很高的围墙围了起来，并宣布这里是“国防人民委员部用地，禁止入内”）偶然地开始挖掘几个已经很难辨认的、杂草丛生的坟墓。结果，在这个公园里总共发现了三十九个死人坑：每个都是深三米半，长三米，宽四米；每个坑里最上层是死者的外衣，下面便是一层层交叉垛起来的尸体。所有尸体的臂膀都用绳子绑着，所有人都是用小口径手枪从脑后打死的。显然，他们是在监狱里被枪毙后，夜间拖出来埋掉的。根据某些人保存的文件辨认，曾经识别出了一些人，他们是在一九三八年被判处“徒刑二十年，并剥夺通信权”的。这里的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1）就是文尼察市的居民们到现场来观看或者来辨认尸体的情况。越往后，发现的死人坑越多。到了六月，便在东正教教徒的墓地一带开始挖掘，在皮罗果夫医院旁边又发现了四十二个墓穴。然后是在“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在公园的“游艺室”下面、在“笑室”的底下，在小体育场和露天舞池的地下，又发现了十四个死人坑。在这总共九十五个坑墓里共埋有尸体九千四百三十九具。这还仅仅是在一个文尼察市，而且是偶然发现的。那么，别的城市里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呢？那些市民们看了这些尸体之后，应该拼命去参加游击队，是吗？

说到这里，如果我们是公正的，就该作这样的设想：既然人们践踏我们的身体和我们所喜爱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难受，那么，被我们践踏的人当然也会感到难受。不是吗？那些被我们消灭的人们有权憎恨我们——这个想法或许也是公正的吧？或者不对？他们没有这种权利？他们应该怀着对我们的无限感激而死去？

我们总是说那些伪警察和伪市长们都具有某种久已有之的、几乎是天生的仇恨。可是，要知道，这仇恨是我们自己播种在他们心里的呀，它是我们的“生产下脚料”。国家公诉人克雷连科是怎么说的？他说：“在我们看来，每一种犯罪都是该社会制度的产物。”[1] 同志们，这是你们的制度的产物！应该记住自己的**学说嘛**！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那些拿起利剑攻击我们和用言论反对我们的人们（我们的同胞们）中间，也有一些完全不是出于私人动机的人：他们的财产并没有被没收（他们本来一无所有），他们自己，甚至他们的家属，没有蹲过劳改营。可是连他们也早被折磨得透不过气来了。其原因在于我们的制度，在于这个制度本身对个人命运视同草芥，在于对信仰的迫害，在于那支令人啼笑皆非的歌子，说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

“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在于那些虔诚信徒们对领袖的膜拜，在于争先签名认购公债时对那支铅笔的争夺，在于那照例要转为热烈欢呼的雷鸣般的鼓掌声！我们能够设想这些人，这些正常的人，所需要的只是我们国家这种酸臭的空气吗？（侦讯人员在审讯费奥多尔·弗洛里亚神父时，曾指责他竟敢在罗马尼亚人面前谈论斯大林的一些丑事。神父回答说：“关于你们，我还能讲些什么别的话呢？我知道什么，就讲

① 见曾任苏联总检察长的克雷连科所著：《五年间》一书，第 337 页。

什么。发生过什么事，我就谈了什么事。如此而已。”而按照我们对他的要求，则应该是：你撒谎吧！你昧良心吧！并且你自己也完蛋吧！只要能对我们有利就行！但是，这看起来岂不是有点不象唯物主义了吗，啊？）

有过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间的事，发生在我去参军之前。当时我和妻子都是刚刚当教员，我们在莫罗佐夫斯克镇上租了一套房子（这个小镇第二年就被德国人占领了）和另外两个房客——没有子女的布罗涅维茨基夫妇——同住一个院子。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布罗涅维茨基是个工程师，年近六十，这个知识分子很像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十分平易近人，安详，聪慧。我现在想起他那长方形的脸膛，还总觉得他是戴着一副夹鼻眼镜似的，其实，也许他并不戴眼镜。他的妻子比他还要恬静，温顺。她的脸色显得有些暗淡，稀疏的亚麻色头发贴在头上。她比丈夫小二十五岁，可是，看她的动作却像是年纪不小了。我和妻子都很喜欢这两个人，他们对我们大概也颇有好感，特别是因为我们两家都不是那种贪婪地操持家业的家庭。

每到黄昏，我们四人就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一轮明月高照，微风吹来，暖洋洋的，夜晚十分宁静。当时，那宁静还没有被敌机的轰鸣和炮弹爆炸声所毁坏。不过，德国人的进逼已经使我们很不安，就像那看不见的、然而是沉重闷人的乌云顺着乳白色天空朝着这轮无可奈何的小月亮压过来一样。火车站上每天都有一列列开往斯大林格勒的火车停下来，逃难的人们使镇上的集市充满了各种流言，气氛很恐怖。这些人从口袋里掏出不计其数的百卢布钞票留在集市上，然后就往远处逃去了。他们能够说出我军又放弃了哪些城市，而情报局却在这之后很久还不提这些地方，不敢叫老百姓知道真实情况。（谈到这些城市时，布罗涅维茨基不用“放弃了”这个词，而是说“夺取了”。）

我们坐在台阶上聊天。我和妻子还很年轻，当时还满怀着对

生活的美好希望，因而也为生活感到十分不安。当我们要想表达这种内心的不安时，却又找不出什么比报纸上说的更聪明的话来。所以，我们和布罗涅维茨基夫妇在一起觉得很轻松：当时我们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并没有觉察到相互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可是他们两个人很可能是怀着诧异的心情望着我们这两个初生的牛犊儿的。我们虽是刚刚度过三十年代，但却好像没有在三十年代生活过一样。他们问我们：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记忆？什么记忆？学院里的图书馆、考试、愉快的体育行军、文娱活动，嗯，当然啦，还有爱情，那正是谈恋爱的年龄嘛。那时候我们学院的教授没有人被抓进监狱吗？啊，对呀，好像是有两三个人被抓进去了。副教授接替了他们的职位。那么学生呢？没有被捕的吗？我们想起来了：对，有。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被抓走了。可这又怎么样呢？没关系，我们还照常跳舞。在你们的亲友中间呢？……嗯，……谁也没有被触动吗？是啊，谁也没有……

因为这太可怕了，所以我想一定要把这些都回忆起来。但实际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那样。正因为我当时并不属于专搞体育活动和跳舞的一类年轻人，又不属于一头钻进自己的科学和公式里去的狂热者之类，所以这就显得更加可怕了。我自以为一直是对政治非常感兴趣的。刚刚十岁的时候，我这个黄口孺子就胆敢不相信维辛斯基了，我曾对当时的几次著名的法庭公审安排得那么妥帖表示过惊异。但是，并没有什么东西推动我继续思考下去，没有东西推动我把那几次小小的（当时曾显得声势浩大的）莫斯科公审同整个国土上滚动着的镇压的巨轮联系起来（牺牲在这个巨轮下的人数也好像并未引起我的注意）。我的童年是在排队中度过的：排面包队、牛奶队、粮食队（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有肉）。但是，我当时还不能把现象联系起来看，还认识不到缺乏粮食就意味着农村的破产，也不懂得这是为什么。当时我们有另外一种公式：这

叫做“暂时的困难”。在我们那个大城市里，每天夜里都逮捕人，逮捕，又是逮捕，可是，我夜里是从来不到外面去的。白天呢，那些被抓走的人们的家属自然不会挂出黑旗来，而我那些同学们也决不会提起他们被捕的父亲。

从报纸上看，一切都完美无缺，朝气蓬勃。

何况年轻人本来就是愿意接受“一切都好”这种想法的。

现在我才明白，当时布罗涅维茨基夫妇要想对我们谈点什么，该有多么危险。但是他，这个曾经遭受过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最残酷的打击的老工程师，还是对我们多少吐露了一点点：他在监狱里失掉了健康，他不止一次被投入监狱，不止在一个劳改营里呆过。但他只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对我们谈了其中最早的一个杰兹卡兹甘劳改营，谈到被污染的有毒的水，有毒的空气，谈到大批屠杀，谈到多次递交莫斯科的申诉书都如石沉大海。甚至“杰兹-卡兹-甘”这个词，也像它的无情历史一样，一听到它，就像是有人用大锉刀在你身上用力地锉似的。（可是，怎么样呢？这个杰兹卡兹甘是否多少改变了我和妻子对世界的看法呢?没有。当然没有。因为那不是发生在我们身旁的事，不是亲身经历呀。这是不能向任何人言传的。最省事的办法是不去想它。最轻松的是把它忘掉。）

当布罗涅维茨基已经解除监禁时，当时还很年轻的、他现在的妻子来到了杰兹卡兹甘。就在这里，在铁丝网的阴影下，他们结婚了。战争爆发前夕，他们奇迹般地获得了自由，来到了这个莫罗佐夫斯克市，当然，是带着有污点的公民证来的。布罗涅维茨基在某个小小的建筑事务所找了个工作，他妻子当了会计。

不久，我从莫罗佐夫斯克参了军，我的妻子也离开了那个小镇。接着，莫罗佐夫斯克镇落入德国人手中。后来它又被苏军收复了。记得我在前线时曾收到妻子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你会想到吗？听说在德国人占领莫罗佐夫斯克镇期间，布罗涅维茨基

还当了伪镇长呢！真卑鄙！”我那时也很吃惊，心里也认为：“真卑鄙！”

但是，经过许多年之后，当我躺在某处监狱里的乌黑的铺板上回忆往事的时候，我又记起了布罗涅维茨基。这时我就不再怀着从前那种孩子般轻率的心情谴责他了。他曾经被无理地剥夺了工作；后来给他的工作与他的能力极不相称；人们把他逮捕入狱，拷打他，折磨他，唾他的脸。他该怎么办呢？他还应该相信这一切都是进步的？相信他自己的生活——他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他的亲戚朋友的生活以及全国人民的令人痛心的生活全都无所谓，是吗？

透过向我们投掷过来的一小团称为“个人迷信”的云雾，通过我们本身在其间起了变化的时间层次（光线通过许多层次时是会发生折射和辐射的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三十年代和当时的自己，已经不是这些年代和我们自己原来的样子了。把斯大林神化、对一切东西都毫无保留地给予信任的，根本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党、共青团、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和那些知识分子代用品（即那些取代了被消灭和被遣散的知识分子的人们），再就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阶层（工人阶级），[1] 因为他们家里的有线转播喇叭是从早晨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克门楼上的钟声开始，直到深夜的《国际歌》为止一直不关闭的。对这些人来说，广播员列维坦的声音已经变成他们的良心之声了。（我这里说的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阶层，因为还有不少人对于工业生产方面颁布的有关“二十分钟迟到”的命令以及把工人固定在工厂的作法，是并不拥护的。）但是，当时在城市中也还有少数人（其实也并不很少，总有几百万吧），他们，只要有胆量，也曾厌恶地拔出广播喇叭的插头，他

① 工人阶级正是从三十年代开始成了我国的小市民阶层的主要部分，完全进入了这一阶层。不过大部分苏联知识分子也如此。

们在每一份报纸的每一页上都只看到满纸的谎言。他们把投票选举日当成痛苦和受屈辱的日子。在这少数人看来，我们现在实行的专政既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也不是人民的专政，更不是苏维埃式的专政(因为有人还记得"苏维埃"这个词最初的正确含义)，而只不过是共产党少数的掠夺性专政，而且带有极粗野的性质。

人类几乎不会不带情绪地、不带感情地认识问题。人一旦看出某个东西不好，他几乎不可能强迫自己同时看到它好的一面。我们过去的生活中并不尽是使人难堪的丑恶东西，报纸上的话也并非每个字都是谎言。但是，这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到处受到捕捉的、被告密者包围着的少数人，如今却把整个国家的生活看作十足的丑恶，把报纸上的各栏从头到尾都看成谎言了。还要提醒一下，当时西方电台还没有俄语广播（而且，当时收音机的数量也是微乎其微的)，居民们的唯一消息来源只有我们的报纸和官方广播。布罗涅维茨基夫妇和类似他们的人们正是把这些看成了难以摆脱的、无尽无休的谎言，或者是懦怯的隐瞒。当时我们的报纸关于国外所报道的一切，不论是关于一九三〇年西方世界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毁灭的报道，还是关于西方社会党人的背叛行径，关于整个西班牙一致奋起反抗佛朗哥政权的报道（一九四二年则报道说：尼赫鲁要求印度独立是他的背叛意图的表现，因为据说印度独立便会削弱我们当时的盟国大英帝国）——原来也都是谎言。按照"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敌人"这个公式进行的极端可憎的宣传，甚至从来都不想区别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的立场和尼古拉二世的立场，不想区分是列昂·布吕姆还是希特勒，是英国国会还是德国（一九三三年前的）国会。既然如此，那么，当报纸上宣传德国广场上焚书的火堆在燃烧，说古条顿族的某种兽行又已复活的时候（不要忘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的宣传就编造过许多关于条顿人兽行的故事了），为什么布罗涅维茨基就应该把这些幻想故事般的报道同其他报道区别开，并且

信以为真呢？为什么他应该在德国的纳粹主义身上看到那种兽性的东西呢?(现在咒骂德国纳粹主义的语言几乎就是从前咒骂彭加勒、毕苏斯基、英国保守党人等时所使用的同样一些极端语言呀!)而且这种兽性的表现不也就是布罗涅维茨基本人、整个古拉格群岛、俄罗斯的大城市和农村在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中所非常现实地体验过的那些折磨、毒害和蹂躏吧？还有，报纸上关于希特勒分子的报道也未免转变得太快了——忽而，报道说：苏德两国的亲善的哨兵在可恶的波兰人的领土上友好会师了。接着，报纸上便对这些“反对英法大银行家”的德国勇士们掀起一片颂扬的浪潮，还要在《真理报》上用整版篇幅一字不改地刊登希特勒的讲话全文；可是，忽而在某个早上（就是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早上），所有的报纸上一律是醒目大字标题：整个欧洲都在希特勒分子的铁蹄下呻吟！这些都只能证实报纸上的谎言是多么轻率，而绝不能使布罗涅维茨基之类的人相信世界上除了他亲自领教过的我国刽子手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些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刽子手。而且，即使这时为了说服他而每天把 B. B. C.（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讯稿一份份地送到他面前，那么，能够使他相信的最多也不过是：对俄国来说，希特勒不过是第二号危险，而绝对地，在斯大林在世时，不是第一号危险。何况 B. B. C. 并没有把电讯稿送给他呀，而对他发布消息的却只有苏联情报局，这个局的威信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和塔斯社同样的。至于被疏散的人们带来的各种传闻，那又不是第一手材料（既不是从德国来的，也不是从被占领区来的。当时从被占领区还没有回来过一个活证人）。因此，布罗涅维茨基所能掌握的，能够算是第一手材料的，只有他经历过的杰兹卡兹甘劳改营、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二年的饥饿、消灭富农运动，还有摧毁教堂。这样，布罗涅维茨基（以及多少万像他这样的孤立的个人）随着德国军队的追近就产生了一种感觉，觉得他们期待的时机到来了，而且这种时机是唯一的、不会再来的，是已经二十

年不曾对它抱过希望的，它是我们一生中，与缓慢的历史进程相比十分短暂的一生中，只可能遇到一次的机会；在这个时刻他(他们)能够宣布自己不赞同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赞同在他的国家里发生的、干下的、哄闹着强行贯彻并践踏过去的那一切东西；他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某种还模糊不清的道路为他那处在毁灭中的国家做一点什么事，为了复兴俄罗斯人的某种社会秩序做一点事情。不错，布罗涅维茨基把过去的事全都记住了。他什么也没有原谅。他绝不可能对那个政权，那个残酷毒打了整个俄罗斯的、给俄罗斯造成了集体农庄式的贫困、带来了道德堕落、而今又使它经受着空前的战争惨败的政权感到亲近。因此，在我们谈话时他只能强压住激动的呼吸，眼望着像我这样的，象我们这样的不懂事的初生犊儿，感到自己实在没有力量使我们改变看法。他在期待着某个人的出现，他期待着，不管是谁，只要能换掉斯大林的政权就行！(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对立面转化现象：别的什么都行，就是不要令人憎恶的、自己的这一套！难道还能设想出世界上有谁会比我们的人更坏吗？顺便提一下，这事发生在顿河州，而顿河州的老百姓中有一半人曾是和他同样等待着德国人到来的。)于是，这个当了一辈子非政治性人物的布罗涅维茨基，在他已经年过六旬的时候却决定迈出这政治性的一步：

他同意了主持莫罗佐夫斯克镇的镇参议会……

在这以后，我想，他必定很快就发现自己落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他发现：在新来的德国人眼里，俄国要比在跑掉的人们眼里更加一钱不值，更使人厌恶。吸血鬼所需要的原来只是俄国的血汁，他们可以任凭它的躯体烂掉。原来他们不是要他这个新镇长来领导俄国居民的社会各阶层，而是要他来领导德国警察的帮凶们的。但是，既然他已经被安装在滚轴上，那就由不得他了，好坏都得跟着转。他刚刚从一些刽子手脚下解脱出来，却去帮助另一些刽子手了。这时候，他看到：原以为与苏维埃思想对立的

爱国主义思想现在却跟苏维埃思想溶合在一起了。爱国主义思想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从一直保有着它的少数人那里，像透过筛子一样，转移到多数人那里去了：过去是怎样攻击和嘲骂它的，现已完全忘却，现在它又变成另一棵大树的主树干了。

他（他们）必定感到了恐怖和无路可走。峡谷两面的山都向他逼压过来，留下的只有两条路：一死了之或者被判苦役刑。

当然，他们中间并不都是布罗涅维茨基这样的人。还有一大群嗜血嗜权的乌鸦也麇集到这一短暂的灾祸中的筵席上来了。但是，这些东西是到处都飞的！这些东西对内务部同样十分合适。马穆洛夫就是这样的人，杜金卡劳改营中的安东诺夫也是，还有什么玻绥沙普卡之类。难道还有比这些人更残忍的刽子手吗？他们称王称霸了几十年，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我们看到一个叫特卡契的看守（第三部第二十章），这个人在德军和内务部两边的宴席上都是座上宾。

讲过城市的情况之后，我们还应该谈谈农村。今天的自由派喜欢责怪农村，说它保守，说它在政治上迟钝。但是，战前的我国农村——几乎是整个农村——却都是清醒的，远远比城市清醒。农村根本没有像城市那样把老爷子斯大林神化（对世界革命也是一样）。农村只是在用正常的理智思考问题。农民清楚地记得怎样向它许诺过给他们土地，然后又怎样把土地收回去了；他们记得在集体农庄化之前是怎样生活的，吃的穿的是什么，在集体农庄里又是怎样的；记得怎样从院子里牵走了他们的小牛和羊羔，甚至连母鸡也给捉去了；他们还记得人们是怎样玷污辱骂教会的。那时候广播喇叭还没有在每个农户家里哇啦哇啦叫，还不是每个村里都由一个识字人来读报纸，因此，什么张作霖们、麦克唐纳们、希特勒们等等，对于俄国农民来说都统统无所谓，几乎等于一堆没有用的碎木头。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梁赞省的一个小村子的庄稼汉们聚集

在铁匠坊前的广播喇叭下面收听斯大林的广播讲话。当斯大林这位迄今为止一直是铁面无情的、对俄罗斯农民的眼泪无动于衷的老爷子以仓皇失措的哭丧声调说出第一句甜蜜蜜的话:“兄弟们和姐妹们!……”的时候,一个庄稼汉冲着黑色广播喇叭大声回答说:

“啊,野×!……你想的可好!要这个不?”说着,他把手往另一只胳膊的肘窝一砍,摇晃着胳膊,朝着扩音喇叭做了个俄罗斯人惯做的、极粗俗的动作。

人群中顿时迸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假如我们去问问所有农村的每一个目击者,我们便会发现千万起这样的情况,也许还会更多。

战争开始时,俄罗斯农民的情绪,也就是说,那些在小火车站上喝下最后一碗酒,接着便与送行的亲人们在飞扬的尘土中跳舞的后备兵员的情绪,就是这样的。更何况不久就遭到了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惨败,以致新旧两个首都附近的和直到伏尔加河沿岸的大片农村地区沦入敌人手中,千百万农民转瞬间脱离了集体农庄政权。于是(不要再撒谎和伪造历史了吧!)真相大白了:原来各共和国所希望的只是独立!农民所希望的只是脱离集体农庄!工人所希望的只是摆脱那农奴制的命令!假如那些外来的德国人不曾是那么愚蠢透顶、傲慢无礼的话,假如他们没有为了大德意志帝国的方便而把集体农庄这一官定的机构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的话,假如他们没有产生那种把俄国变为殖民地的卑鄙妄想的话,那么,民族独立的意识也许就不会再回到那永远窒息它的地方来,我们也就未必会庆祝俄国共产主义的二十五周年了。(将来必定还会有人来讲讲那些游击队的情况,说明被占领区的农民完全不是自愿参加游击队的。会有人讲讲农民们最初是怎样武装起来反对游击队、不让游击队抢走粮食和牲口的。)

谁还记得一九四三年一月大批居民从北高加索的伟大出走

吗？谁能在世界历史中找到与此类似的先例？那是大批居民，特别是农村人口，成群结队地跟随着被击溃的敌人，跟随着外国人逃走啊！他们可就是不愿意留在胜利了的自己人这边。看吧，在北风呼啸的一月严寒中，望不到头的载重马车的行列，后面还是马车的行列！

为什么会有几十万人甚至在希特勒的丑恶制度下毅然穿上了敌人的军装？其社会根源就在于此。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再说明一下弗拉索夫分子了。

阅读本书的第一部时，读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全部事实。（何况我也并不掌握全部事实。将来肯定会有专题研究报告的。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附带的题目。）在那里，在本书的开头，当读者还没有跟我们一道走过劳改营的全部道路时，我只是向读者发出了一个注意信号，请他想一想。现在，当我们已经见过了那些囚犯宿泊点、递解站、伐木场和劳改营的泔水池之后，或许读者会变得更容易谈得拢了吧。在第一部中，我只谈到了那些由于绝望、俘虏营的饥饿、走投无路而拿起武器的弗拉索夫分子。（其实，在那里也可以深思一下：德国人本来是只想利用俄国俘虏替他们执行非战斗任务和后勤任务的，按理说，这对那些只想保住性命的人来说该是最好、最安全的出路吧。那么为什么还有人硬要拿起武器去面对面地打苏联红军呢？）

写到这里，我们无法再拖延了，只得也谈谈那些早在一九四一年之前就一心盼望有朝一日要拿起武器去痛打那些红色政委、契卡人员和集体化推行者的人们了。记得吗，列宁说过："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就只配被人当做奴隶使唤。"[1] 在这里，值得我们自豪的是，苏德战争确实显示出：我们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历史研究论文中所唾骂的那种奴隶；当我

---

[1] 《列宁全集》第五版，第30卷，153页。

们伸手操刀准备去砍掉老爷子斯大林的首级时，我们决不是奴隶！（而且，从这一角度来说，当年也不是作为奴隶挺起腰来穿上红军的军大衣的；可谁知道那军大衣仅仅象征着短暂的自由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在当时是不可能预见到的。）

这些亲身感受了二十四年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人们，早在一九四一年就懂得了当时在世界其他地方还谁也不懂得的东西，即：在整个地球上，在人类全部历史中，还从来没有比布尔什维克的自称为"苏维埃"的制度更残暴、更血腥、同时又更狡黠奸诈的制度。他们懂得了：不论是按其虐杀人数之多、延续年代之久、计谋策划之深思远虑来说，还是按其彻底统一化的极权性质来说，人世间的任何其他制度都不能和这个制度相提并论。甚至当时遮住了整个西欧的眼睛的希特勒制度，与此相比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现在，时机来了，武器落入了这些人手中。此时此地难道他们应该克制住自己，让布尔什维克度过这垂危时刻，让它重新坚定地站起来再压迫人吗？难道到那时再去同它进行斗争吗？（这种斗争直到今天还没有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开展起来呢！）不，当然是应该以布尔什维主义之道还治于布尔什维主义之身的：也就是象它自己当年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被削弱之机紧紧咬住俄国的躯体一样，应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样时刻狠狠地打击它。

是的，早在一九三九年苏芬战争时期我国人民的这种厌战情绪就已经暴露了。一度是斯大林的亲近助手、担任过联共（布）政治局书记兼组织部书记的Б·Г·巴扎诺夫就曾经企图利用人民的这种情绪：他把被俘的红军战士交给逃亡的白俄军官指挥，让他们去与苏军对峙，不是为了让他们去战斗，而是为了让他们去说服苏联军队。他的这一试验由于芬兰突然宣布投降而未能进行到底。

苏德战争爆发了。那是在进行过令人窒息的农业集体化十年之后，在乌克兰发生大瘟疫六年之后（**六百万人死于瘟疫**，这事

竟没有为比邻的欧洲所发现！），在内务部的恶魔肆行暴虐四年之后，在发布了有关生产的镣铐性法规一年之后的事。这时国内各集中营里总共关押着一千五百万人，全体老年居民对革命前的生活仍然记忆犹新。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民对于战争爆发的最合理、最自然的反应就是：可以喘一口气并且获得解放了。最自然的感情就是：对本国政权的厌恶。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什么"措手不及"或德国人的什么"空军和坦克部队数量上的优势"（顺便说一下，当时苏联工农红军的各兵种在数量上都占优势）就能够那么轻而易举地造成灾难性包围圈的。（在别洛斯托克和斯摩棱斯克两地各有三十万人，在勃良斯克和基辅各有六十五万名武装的男子汉被围歼了！）整条整条的战线垮掉了，逼得各野战军仓皇向纵深溃退。这是俄国历史上一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概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次战争中从未见过的溃败。而且那个一钱不值的政权也就转瞬间瘫痪了，它的臣民们像离开一具耷拉着脑袋的尸体一样急忙地躲开了它。（许多区委会、市委会在五分钟之内就全被吹散了，这使得斯大林气急败坏。）一九四一年的这次震荡，本来是可以结束这个政权的（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止，苏联一亿五千万人口中已经有六千万不在斯大林统治下了）。难怪我们在斯大林的命令（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0019号）中听到这样的叫嚷："在所有的（！）战线上，都有大量（！）的人员甚至朝着敌人的方向（！）跑去，有的部队刚一与敌人接触就扔掉了武器！"（一九四一年七月初，被包围在别洛斯托克的三十四万俘虏中就有二十万人投敌了！）斯大林认为情况十分危急，以致不得不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电请邱吉尔速派英军二十五个师团到三十个师团在苏联领土登陆。曾有哪一个共产党员比这更丧魂落魄过？

看看这个时期的士气吧：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第四三六步兵团团长科诺诺夫少校公开对全团人员说他要投到德国人一边去，加入**解放军**以推翻斯大林政权，他希望志愿者跟他一块走。

这时他不但没有遇到反抗，而且是全团都跟着他走了！三个星期之后，科诺诺夫在对方建立了哥萨克志愿兵团（他本人就是顿河流域的哥萨克）。后来，当他到莫吉廖夫市近郊的战俘营里去招募志愿兵时，全营五千名红军战俘中就有四千名立即表示愿意跟他去，但是他没法全要。——同年，关在提尔吉特市附近俘虏营里的苏联战俘的一半人（即一万二千人）签署了一份声明，宣称现在到了**把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忘记布良斯克州洛克奇地方的全民运动：他们在德国人到来之前就建立了不靠德国人的俄罗斯人自治机构，他们全州八个区一百多万人口一直过着繁荣的生活。洛克奇人的要求是很明确的：成立俄罗斯人的民族政府；全占领区的俄国人自治；宣布俄国独立，其国界应为一九三八年的国界；建立由俄国军官指挥的解放军。

顿河哥萨克村镇的居民捧着面包和盐迎接德国人的到来。他们可没忘记共产党是怎样把他们十六岁到六十五岁的男人一个不留地杀光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在卢加城下，列宁洛勒医学院学生马丁诺夫斯基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主要成员是苏联大学生。目标是摆脱共产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在波尔霍夫城下，不久前的列宁格勒研究生鲁特琴科中尉建立了一支由列宁格勒（瓦西里耶夫岛）大学生及陷入包围的士兵们组成的同样的反共部队。但是德国人把这支部队拉去当德军服务队用了。

一九四一年以前，苏联国民很自然地认为：外国军队的到来也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制度的覆亡，外国军队的到来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有别的意义。人们期待着一个能够把他们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政治纲领。

难道走过了苏维埃宣传的密林，穿过了层层叠叠的希特勒军队之后，我们还能够轻易地相信西方各盟国参加这次战争不是为

了普遍的自由，而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西欧一地的自由吗？难道会相信他们只是为了反对纳粹主义和更好地利用苏军的力量，将来如何就不闻不问了吗？相反，我们会相信我们的盟国将忠于自由原则本身，将不会再把我们抛回最坏的专制下面去，这不是更加自然吗？……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曾为这些盟国出生入死，而它们当年却置我军的溃亡于不顾而急于保全自己。是有过这种经验，但这个经验过于严酷，以至于叫人心里难以接受。

我们已经根据自身的体验学会了不再相信任何苏联的宣传了。因此，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不相信那些关于纳粹分子想把俄国变为殖民地、想把我国人民变为德国人的奴隶的童话了，因为实在难以设想二十世纪的人类头脑中还会有这般荒唐的想法。在没有亲身经历之前是不可能相信这些的。还有，一九四二年在奥辛托尔夫成立了一支俄罗斯人的新编部队，它募集到的志愿兵远远超过部队定额。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和白俄罗斯，农民为了保卫农村，并且为了对付莫斯科指挥下的游击队的袭击，自己组织起了"民警"队，人数达到十万人（后来德国人害怕了，禁止了他们的活动）。甚至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天，弗拉索夫到斯摩棱斯克和普斯科夫两地去进行宣传活动时，还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当时人们还在期待：什么时候才能有我们自己的独立的政府和独立的军队呢？我有证据可以证明，当时普斯科夫州波热列维茨区的农村居民是多么欢迎驻在当地的弗拉索夫部队，那个部队不抢劫，不打骂，穿的是旧式俄军制服，帮助农民收割庄稼。所以，这支部队曾被当做俄国人自己的非集体农庄的政权。不少普通居民志愿报名参加了这支队伍（就像在洛克奇报名参加沃斯克博伊尼科夫的队伍一样）。这难道还不值得想一想吗？他们有什么必要这样干呢？他们并不是呆在俘虏营里的呀！而且德国人是禁止弗拉索夫扩充队伍的呀（德国人说：叫他们去当警察吧！）。直到一九四三

年的三月，哈尔科夫市近郊的一个俘虏营里还有人在宣读关于（假的）弗拉索夫运动的传单，其结果竟有七百三十名**军官**签名要求参加俄国解放军！而且这是在他们经历了整整两年的战争之后，其中不少人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英雄呢，包括一些师长、旅长和团政委在内！还应该指出，当时这个俘虏营里的人是能吃得很饱的，因此，绝不是饥饿时的绝望迫使他们签名的。（但是，这七百三十个签名者中的七百二十二人竟然直到战争结束时也没有被释放出来并吸收他们参加活动，这足以证明德国人迟钝到了什么程度。）甚至到了一九四三年，还有许多万人从苏联地区成群结队地跟着退却的德军逃亡：人们就是不想留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

我敢断言：假如说我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即使是放过了一次哪怕从远处朝着斯大林政府晃几下枪杆子也好的机会，即使是放过了朝着生身慈父哪怕是挥挥拳头、骂一声娘的机会，那末，这个“人民”也可以说简直是一钱不值，是由不可救药的奴才所组成的人民。那么，在上层呢？德国人那里还曾经发生过军事将领们的政变阴谋，可是我们这里呢？我们的军界上层分子都是些（直到今天还是）微不足道的、被党的思想体系和利欲心所腐蚀了的人，他们已经不像别国军人那样保存着本国的民族精神了。那些对这个政权奋起反抗、战斗的完全是**下层人民**，是士兵、农民、哥萨克。这是纯粹的**下层**，这里几乎完全没有逃亡的旧贵族、富裕阶层的人士或知识分子参加。假如这一运动当时可以像战争开头几周那样自由发展的话，那它必定会发展成为某种新的普加乔夫起义：按参加这次运动的阶层的广泛性和深度、人民对它的支持、清算官僚们的胡作非为的精神、领导力量薄弱而群众自发性强等方面来说，都可以这么说。无论如何，自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止，在俄国开展的知识分子的“解放运动”，虽然也虚伪地宣布过为人民谋福利的目的，并且最终导致了“由二月到十月”的结果，但与这些自发的下层的运动相比，后者远

远比它更具有群众性，具有普遍人民性。但是，这些下层运动命中注定得不到发展，反而被打上一个可耻的烙印——“对我们神圣祖国的背叛！”——而归于覆灭了。

我们已经没有兴趣再对各种事件的社会意义作出说明了，因为在我国对此是可以随心所欲、信口雌黄的。同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签定的友好条约是怎么回事？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两人在战前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是怎么回事？接着就是使人震惊的昏庸无能、准备不足和指挥失策（再加上政府懦怯地偷偷逃出了莫斯科！），而且把几十万几十万的军队丢在包围圈里。所有**这一切难道都不是对祖国的背叛**吗？！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不是严重得多吗？为什么我们却让这些叛徒们至今仍然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豪华公寓里养尊处优呢？

啊！如果能使我国的所有刽子手和所有叛徒，从最……的到最……的都坐到被告席上去，那么，被告席该有多长、多长、多长啊！

对于有伤大雅的问题，我们这里向来是避不作答的。代替回答的是，反过来对着我高喊：

“那么，原则呢？！还要不要原则？！难道一个俄国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使是他认为正确的目的，就有权利依靠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助吗？！何况是正在同德国帝国主义进行无情战争的时候？！”

这倒的确是个关键性问题：为了达到你认为是崇高的目的，你可以去利用正在同俄国进行战争的德国帝国主义的支援吗？

今天，人们无疑会异口同声地高喊：不行！不行！不行！

那么，请问，当年从瑞士开往瑞典而且（现在我们才知道）还曾经绕道柏林的、封上铅印的德国车厢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时

---

* 据传当时列宁及某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这样从瑞士回到俄国。——译者注

候，从孟什维克人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和刊物都曾叫喊：不行！不行！但是布尔什维克们却解释说：这是可以的，指责这一点甚至是可笑的。况且，还不只是那一节车厢吧?！一九一八年夏天，布尔什维克从俄国开出去多少车厢啊！那些都是装满了各种食品和黄金的车厢，而且全都送进了德皇威廉的血盆大口！“要把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这个口号本来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嘛，是他早于弗拉索夫分子提出的。

“但是，目的呢？那是为了什么目的呀?！”

噢，你说说是为了什么目的？你们宣布的那些目的现在到哪儿去了呢？……

“可那是威廉呀！是普通的德皇凯撒，小凯撒呀！他可不能同希特勒相比！而且当时的俄国政府是什么政府？是临时政府……”

可是，不要忘记，我国的报刊在战争的狂暴中谈到凯撒时，不也是除了“残暴的”、“嗜血成性的”这类字眼外没有用过别的吗？而谈到凯撒的士兵时我们则是这样拼命喊叫的：“他们残暴成性，竟用石头敲碎孩子们的脑袋！”不过，就算是凯撒吧，情况也还是一样的。况且，临时政府也并没有成立过肃反委员会，没有向人们的后脑勺开枪，没有把人们关进劳改营，没有赶进集体农庄！临时政府也不同于斯大林政府。

即使如此，也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 * *

苦役营里字母表名单上的囚犯成批成批地死去，这并没有使某个人动心。只不过是战争结束了，不再需要这种恐怖手段了，也不会再出现伪警察了；需要劳动力，而苦役营里的劳动力却在白白地死去。所以，才从一九四五年开始不再把政治苦役犯住的工棚当作牢房了：白天允许打开门，马桶可以拿到厕所去，苦役犯

们可以自己去医务室看病，而去食堂的时候则要他们跑步去——可以振奋精神嘛！那些盘剥政治犯的刑事犯们被送走了，从政治苦役犯中间挑选出一些人来从事辅助性劳动。后来，又允许他们和亲友通信，每年两次。

到一九四六—四七年间，苦役营和劳改营的界线已经相当模糊了：有些劳改营的工程技术领导不懂得政治，他们为了完成生产计划而开始（至少是在沃尔库塔营里开始了）把一些有技术专长的政治苦役犯调拨到普通劳改点去劳动，在那里，这些苦役犯除了身上佩带着号码之外就没有别的不同之处了。同时又把普通劳改营里的一些人塞到苦役营来补充劳力之不足，当牲口使用。

这样，那些只会抓生产而不懂政治的劳改营头头们便险些把斯大林恢复苦役刑的伟大思想给葬送掉。可是，正在这时，一九四八年，斯大林及时地想出了办法——把刑事惯犯和普通犯这些社会亲近分子，与触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不可救药的社会异己分子分别关押。

这也是为了“巩固后方”而提出来的一个更加伟大的意图的一部分（由此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已经在准备即将到来的另一次战争了）。建立起了一批**特种劳改营**。[1] 为特种劳改营制定了一套特别条例，这条例比原先的苦役营稍微宽大些，但比一般劳改营却要严厉得多。

为了有所区别，这些劳改营的名称不用地名，而是给它们取了一些富于幻想的有诗意的名字。建立了诸如：诺里尔斯克的戈尔拉格（即山地营），科雷马河上的别尔拉格（即沿岸营），英塔河上的敏拉格（矿物营），伯朝拉河上的列奇拉格（即河流营），波奇马的杜布洛夫拉格（即柞木营），泰谢特的奥泽尔拉格（即湖泊营），哈萨克斯坦的斯捷普拉格（即草原营），彼斯强拉格（即沙

---

① 可与1921年的特种营相比较。

地营）和鲁格拉格（即草地营），克麦罗沃州的卡梅施拉格（即芦苇营）等等。

劳动改造营里传开谣言了，说是要把第五十八条囚犯送到特种劳改营去消灭掉（当然，不论是将要执行任务的人，还是将被消灭的人，谁都十分清楚：要这么干的话，根本不需要什么重新宣判之类的程序）。

顿时，登记分配处（乌勒契）和契卡行动处都忙碌起来了：他们得编制各种秘密名单，送到某处去审查、协商。不久就开来了一列列红色列车，调来几连佩带红色领章、配备着冲锋枪、警犬和小锤子的精壮士兵担任押解任务。随后便是按名单叫人了。那些被点名的人民敌人就无可挽回地断然被带出工棚，起解到遥远的地方去。

但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并没有全被叫出去。只是到了后来，人们对许多熟人的情况作了比较之后，才明白留在普通劳改营里和普通犯们呆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人：这些都是按第五十八条第10分条判刑的人，即犯有一般反苏宣传罪的人，也就是没有对任何他人讲过、没有共犯的，在犯罪时处于忘我状态的单个犯人（尽管无法设想会有这样的“煽动者”，但确实有几百万人正是根据这条罪状被判刑、被立案的。现在这些人留在古拉格群岛的老劳改营里）。只要煽动者是两个人或三个人在一起的，只要他们曾经有过哪怕一点点互相倾听、呼应或唱和的倾向，那么，对他们就有“添秤”，即可以对他们适用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1分条的“集团条款”，因而他们如今也就得作为反苏组织的发酵剂而被送往特种劳改营去了。至于那些背叛祖国的人们（适用第五十八条第1分条之甲、乙两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分立主义分子（适用第五十八条第2分条的），世界资产阶级代理人（第五十八条第4分条）、间谍（适用五十八条—6）、破坏分子（五十八—7）、恐怖分子（五十八—8）、暗害分子（五十八—9）以及经济方面的怠工

者（五十八—14）等，当然都被送走了。他们中间还很方便地夹杂进了一些德国人俘虏（敏营的）和日本人俘虏（奥泽尔营的），那是打算在一九四八年之后继续把这些人留下来的。

同时，知情不报者（适用第五十八条第12分条的）和敌人的帮凶（适用五十八—3）都留在普通劳改营里了。相反，被控通敌的政治苦役犯则全部同其他人一起押送到特种营去。

这种区分还具有比我们所描述的更深刻的含义。根据某些至今还不清楚的特征，把某些判刑二十五年的女叛国犯（例如在翁日营里）也留在了普通劳改营里。有些地方的劳改营关押的全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包括弗拉索夫分子和伪警察，但却又不叫做特种劳改营，那里的囚犯们也不佩带号码，但是管理制度却异常严峻（例如：伏尔加河的萨马尔河湾处的红色格林卡；哈卡斯自治州希林区的土依姆营；南库页岛营等）。这些营里的管理极其严厉，生活一点也不比特种劳改营里轻松。

这是一次对古拉格群岛进行的**伟大分割**。为了避免将来再把它混杂起来，还特别规定：从一九四九年起，每一个新炮制出来的“群岛”居民，除了法庭的判决书之外还必需拿到一张被关押的“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州分局和检察机关的联合决定），上面要注明该把这只小羊关在什么样的劳改营里。

这样，就像为了长出新芽而正在死去的种子一样，斯大林播下的苦役刑的种子就在特种劳改营里露出了新芽。

红色囚犯列车沿着祖国和“群岛”之间的斜线把一批批新人员带走了。

而在英塔河上，人们想出的办法却更简便：只要把这个畜群从一些大门赶进另一些大门就行了。

契河夫曾经抱怨过，说我们国家没有给“什么是苦役刑以及它为什么是必需的”这个问题下过定义。

可那是文明的十九世纪的事呀！在我们这穴居的二十世纪中叶，我们根本就不想去理解什么是苦役刑，也不需要什么定义。既然老爷子已经这样决定——这也就是全部“定义”了。

于是我们就都得心领神会地不住点头。

第 二 章

革命的微风

刚刚开始服刑的时候，那望不到尽头的漫长刑期压倒了我，同古拉格群岛世界的初步接触把我摧毁了。因而我绝对不曾相信有朝一日我的心灵还会逐渐地振作起来，会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不觉地，像登上夏威夷的洛阿火山一样，登上那看不见的“群岛”的高峰，并且会站在那山巅上镇定自若地纵目四顾整个“群岛”，甚至还会被这难以置信的海洋的万顷波涛的光辉所吸引。

刑期的中间一部分，我是在一个黄金般美好的小岛上度过的，那里给囚犯吃得饱，给水喝，囚室里也温暖、清洁。为了换取到这一切，要求于我们的并不多：只须在书桌旁边坐十二小时，满足首长的愿望。

可是，我却忽然失掉了享受这种清福的兴趣！……因为我已经摸索到了监狱生活的某种新的意义。回顾过去，如今我觉得莫斯科的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的“专用犯人”对我们的劝告——“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得争取不落到一般劳动里去！”——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简直无法与所得到的东西相比。

监狱启发了我的写作愿望。如今我把全部时间都投到这一爱

好中去，对于公家的工作厚着脸皮能拖就拖。我要直起腰来，这对我来说比黄金岛上的黄油和白糖显得更加珍贵了。

于是，我们几个人便被人家给"弄直了腰"——决定把我们押往特种劳改营。

押往特种劳改营的过程是漫长的，花了整整三个月（十九世纪骑马也比这快得多）。路上我们走得那么缓慢，甚至这段路就像是生活中的整整一个阶段，它长得似乎连我的性格和观点都在这期间改变了。

但旅途中一直是兴致勃勃的、愉快的，这旅行颇有意义。迎面吹来的微风清新而令人振奋，那是苦役刑的风，也是自由的风。四面八方凑近来的人和事都向我们表明：真理在我们这边！在我们这边！绝不在审判和监禁我们的人们那边。

到达熟悉的布蒂尔卡监狱，欢迎我们的是小窗户里迸发出的女人的尖叫声，那大概是些单身监禁的囚犯在叫："救人呀！打死人啦！打死人啦！"喊叫声随即就在看守的巴掌中被憋回去了。

在布蒂尔卡的"转运站"里，把我们和一些一九四九年判刑的新犯人混编在一起。他们这些人的刑期都很可笑，不是一般的"十元券"（即十年），而是"四分之一"（世纪）（即刑期二十五年）。每当他们在无数次的点名中报告自己的满刑日期时，听来简直像是在故意捉弄人："一九七四年十月！""一九七五年二月！"

坐这么长时间的牢！简直不可想象。必须搞到一把老虎钳，把铁丝网剪断才行。

这种二十五年的刑期本身就会给囚犯们造成一种新的品质，政权当局已经朝着我们使出了所能使出的一切招数。现在轮到我们，囚犯们，说话了。我们要说出自由的语言——说出那些不可能再受约束和威胁的话，说出我们一生中未曾说过的、而对于明确态度、团结战斗又是必不可少的话。

我们是在喀山火车站上，在"斯托雷平囚车"中，从车站的

广播喇叭里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的。战争的第一天上午北朝鲜人就穿过南朝鲜人的坚固防线前进了十公里，而后，北朝鲜人却硬要使世界相信是他们先受到攻击的。任何一个上过前线的甚至最傻的战士都可以判断出：首先发起进攻的正是在第一天就大步前进十公里的一方。

这个朝鲜战争使我们也感到了兴奋。我们这些不安分的人个个都盼望着暴风雨的来临！因为没有暴风雨，没有暴风雨，没有暴风雨的话，我们是注定要慢慢地被折磨死的！

过了梁赞，初升太阳的红色光芒从囚车上钉死的小窗孔直射进来。站在我们这个格子对面的年轻押解兵被照得眯起了眼睛。押解兵确实像个押解兵的样子：每个格子里塞进我们十五个人，只发给咸鲱鱼吃。不过，确实还给送点水来，早晚两次还放出去解手。因此，我们对他并没有什么不满的。但是，这个小伙子却忽然心不在焉地、甚至是毫无恶意地脱口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他说我们是人民的敌人。

这可不得了了！我们这个格子和隔壁格子的人一齐向他喊起来：

"我们是人民的敌人，那么为什么集体农庄里没有东西吃?!"

"一看就知道，你这小子也是农村来的，你大概还想留在部队超期服役吧，当个哈巴狗！大概你也不想再回去种地了吧?"

"如果我们是敌人，那你们干吗还把这乌鸦囚车涂上别的颜色呢？可以公开地押运嘛！"

"喂，孩子！我有两个像你这么大的儿子都死在前线了。可我呢，倒成了敌人，是吗?"

已经有许久许久没有从我们的口里飞出过这一类的话语了！我们喊出的都是些最普通的道理，都是些可以看得见的事，因而它也是难以驳倒的。

一个超期服役的军士走过来帮助这个不知所措的小伙子，但

是，他并没有把谁揪到禁闭室去，也没有记下谁的名字，他只是帮助他的弟兄招架而已。这个现象又被我们认作新时期到来的迹象了。(其实，一九五〇年会有什么"新"时期呢?!)不！这只是一种迹象，它表明新刑期和新建的政治犯劳改营在囚犯中间造成成了一种新关系。

我们同两名押解兵的争论后来发展为纯粹的论据竞赛了。年轻的士兵们瞅着我们，已经不敢再把我们这个格子和隔壁格子的任何人叫做人民敌人了，他们企图用报纸上和政治教材里的话来反驳我们，可是，尽管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但确已感觉到自己的话是多么虚伪、多么言不由衷了。

"你们看看，孩子们！你们往窗外看看！"我们对他们说，"看你们把俄罗斯搞成什么样子啦！"

窗外是一片撒满烂麦秸的、坎坷不平的、破烂贫困的国土(我们的火车走的是鲁札耶夫线，外国人向来不走这条线)。假如当年的拔都汗*看到的俄罗斯的土地是这种样子的话，他也许就不会来夺取它了。

在一个叫托尔别耶沃的寂静的小站上，我们看到一位老人从站台上走过去，脚上穿着树皮鞋。一个乡下老大娘站在我们的小窗前，透过车窗上的和里面的两层铁栏杆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这些紧紧挤在上层板铺上的人们。我们的老百姓观看"不幸的"人们时从来都是用这种眼光看的。几滴稀疏的泪珠顺着她那衰老的脸滚下来。她呆痴地站在那里看着，就像我们中间有她的亲生儿子似的。"不许看，老大娘！"押解兵的声音并不粗暴。老大娘甚至连头也没回一下。她身旁站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辫子上结着白色带子。小姑娘的眼神更加严峻，严峻得与她的年龄很不相

---

* 拔都(1209—1256)，成吉思汗之孙，曾于1235年侵入今俄罗斯一带，征服大片土地。——译者注

称，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眨也不眨一下。看那样子，我想，她一定是把我们的模样永远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了。火车轻轻地开动了。老太婆举起污黑的手指郑重其事、不慌不忙地朝着我们画了个十字。

在另一个车站上，一个穿花布连衣裙的姑娘毫不拘束、毫无惧色地走到我们窗子近前，急急忙忙地问我们：你们是根据哪一条判刑的？刑期多久？“躲开！”正在月台上来回巡逻的押解兵对她喊叫。但姑娘却说：“你要把我怎么样？我自己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喂，你把这包香烟交给小伙子们吧！”她随手从提包里掏出一包香烟。（我们原也猜想她可能也坐过牢。在这样一些到处流浪的人中间，多少人已经在“群岛”上受过教育了啊！）“躲开！要不，把你也关起来！”押解队副队长从车厢里跳出来对她喊叫。她朝着他那个超期服役的脑袋轻蔑地瞥了一眼，说：“去你妈的！……”接着又鼓励我们说：“……别理他们！小伙子们！”然后就傲然走开了。

我们一路上就是这样走的。所以，我们并不认为押解人员会感到他们是代表人民的。我们越往前走情绪越高，越感到正义在我们这边，整个俄国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快要结束了，这种行当快要结束了。

在古比雪夫的递解站里，我们歇脚“晒太阳”足足歇了一个多月。在这里也遇到了奇迹。忽然，旁边囚室里传来了刑事惯犯的歇斯底里的喊叫声（这些家伙连喊叫的声音都特别难听、刺耳）：“快来呀！救命呀！法西斯分子打人啦！法西斯分子！”

这可是新鲜事！我们这些“法西斯分子”竟敢打刑事惯犯？从前可总是挨他们打的呀。

但是，不大一会儿就重新分编了房间，我们这才知道：刚才的事并没有什么稀奇，它只不过是一个先声。有个叫帕维尔·巴拉纽克的人，生得膀宽腰圆，胳膊像小树一般粗，两只大手既随时准备握手，也随时准备给人以打击。他黑黑的脸膛，鹰鼻子，与

其说像个乌克兰人，不如说更像格鲁吉亚人。他是个刚从前线回来的军官，曾用高射机枪击落过三架敌机；本来提名要授予他英雄称号的，但是被部队里的**特别处**给否定了。从前他也进过惩戒营，但从那里戴着勋章出来了。现在他被判刑十年。按新刑期来说，十年算是“小孩子的刑期”了。

他是从诺沃格勒—沃伦斯克监狱里来的，一路上早就领教过刑事惯犯那一套了，而且已经同他们打过架。刚才，他正在隔壁房间的上铺安静地跟别人下棋。本来这屋里住的都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可是管理员却忽然要塞进来两个刑事惯犯。这两个家伙漫不经心地叼着白海牌香烟，一进来便到靠窗子的铺上去清理他们的“合法”位子。其中一个边开玩笑说：“哼，我就知道又把咱们塞到土匪窝里来啦!”这时，还不大了解刑事惯犯的天真的维利耶夫就想给他们打打气，便说：“我们不是土匪，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你呢?”“我吗？挪用公款。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们把靠窗睡的两个人赶开，把自己的背包放到“合法”位子上，接着就到各铺上去查看别人的背包，开始找碴儿。而那些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怎么样呢？不，他们当时还是老样子，丝毫没有反抗。六十个大男人俯首贴耳地等着那些人过来抢他们的东西。这些不容别人反抗的惯犯们的嚣张气焰有一种施定身法的效果(他们心里有数，监狱当局总是会给他们撑腰的)。巴拉纽克这时似乎仍在下棋，可是他那两只大眼睛早在扫着这两个人了，暗自盘算着该怎么动手。当其中一个刑事惯犯走到他铺前时，他就用耷拉在床边的一条腿狠狠地朝着那个家伙的脸踢了过去，随即跳下床来，抓起马桶上的木盖子朝第二个人的头上打去。就这样，他狠狠地用木头盖子轮流打他们两个。木盖子打裂了，他便抓起那四公分方木制的十字接头来继续打。两个刑事惯犯开始求饶了。不过还得承认，在他们的哀叫声中也有点幽默，他们并没有放弃逗人笑的企图，只听他们说：“哎，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能用十字架打人!?”“你

好像不疯嘛，怎么欺负别人呢?”但是，巴拉纽克是了解这些人的，他并不住手。这时其中一个便冲到窗前去喊叫："来人呀！法西斯分子打人啦！"

两个刑事惯犯一直记恨在心，后来他们曾几次吓唬巴拉纽克说："你身上可有股子死尸味！咱们走着瞧！"但是，以后没敢再逞凶。

我们房间里很快又同母狗（狗腿子）们发生了冲突。有一次，我们正在放风并趁机松动松动，女看守命令一个狗腿子去催促厕所里的人快出来。催就催吧，可是他那副傲慢的神气（对待"政治犯"嘛！）却惹恼了一个刚开始服刑的年轻人。神经质的沃洛佳·格尔舒尼正想制止他，可是那狗腿子一拳就把年轻人打翻在地了。要是从前，犯第五十八条的人也许就忍气吞声了，可是此刻一个叫马克西姆的阿塞拜疆人（他曾杀死了他们集体农庄的主席）向狗腿子身上扔了块石头，同时巴拉纽克过去朝他的下巴给了一拳。这时狗腿子抽出刀子照巴拉纽克划了一刀（他们这些给看守当帮手的人有时带着刀子，这对我们来说并不稀奇）。狗腿子拔腿向看守跑去，巴拉纽克在后面紧追。这时我们都被迅速赶进了囚室。监狱的军官们来了，他们查问是谁干的，并且威胁要对有这类"匪徒行径"的人延长刑期（内务部人员当然心疼那些母狗）。巴拉纽克流着血，挺身面出："是我打的。只要我活着，今后还要打这帮龟孙子！"监狱的"教父"马上警告我们："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没有什么可骄傲的，还是老老实实装哑巴更安全些！"这时候，沃洛佳·格尔舒尼又出来说话了，他是在大学一年级被抓来的，几乎还是个孩子，他和那个曾经指挥社会革命党人战斗团的格尔舒尼不仅是同姓，他还是那个人的亲侄子。"不许你叫我们反革命分子！"他像一只公鸡似的伸着脖子朝着监狱的"教父"喊道，"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们又是革命者！只不过是要革苏维埃政权的命！"

啊，多有意思！总算活到了这么一天！而那个“教父”却只是把脸一沉，蹙蹙眉头，也就把话咽下去了！没有把谁再关进禁闭室。看守们、军官们也都灰溜溜地走开了。

原来在监狱里也可以这样生活呀！?可以打架?可以顶撞他们?大声把你想说的话讲出来？我们白白地忍受了多少年啊！哭鼻子的人就是该挨打！我们曾经哭过鼻子，所以人们就打我们。

我们将要被送到一些新的、神话般的劳改营去，那里的人都像纳粹分子一样佩带着号码。但是，那里都是政治犯，总可以摆脱这些普通刑事犯的纠缠了。或许到了那里就可以开始那样生活了吧？沃洛佳·格尔舒尼是个圆脸尖下颏的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珠，苍白的面孔上总是闪耀着希望。他说：“等咱们到了特种劳改营，可得好好辨别一下，到底该‘跟着谁走’。”多么天真的孩子啊！他是真地认为，到了那里就会真地接触到各党派的各式各样的思想，听到他们的辩论，了解各种纲领，各种地下活动。“跟着谁走”？好像我们真有这种选择自由似的！好像那些填发共和国逮捕令的人们和编组押解犯名单的人们事先还没有替我们决定命运似的！

我们住的牢房是旧马棚改建的。棚子很长，原先放两排牲口槽的地方现在摆了两排双层板床，过道中间有一些歪歪扭扭的圆木柱子支撑着古老的屋顶勉强不会塌下来，两边墙上的窗口也是典型的马棚窗子，只是为了从外面往里扔干草时不落到牲口槽外面。现在这些窗口也都戴上“笼口”（安在窗外遮挡视线的罩斗）了。这间牢房里共住囚犯一百二十名，什么人都有，大半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大都是些没有文化的庄稼汉。这是因为那一带正在进行第二次清洗，凡是不想自愿参加集体农庄的，或被怀疑为不愿参加的人，全部被抓起来了。此外，还有不少西部乌克兰人，即所谓的“奥乌恩”分子[1]和那些胆敢收留奥乌恩分子在

[1] “奥乌恩”——“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简称。

家里过夜或给他们吃过一顿饭的人。再就是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抓来的人了，他们中间很少是初次被捕的，大部分是第二次被捕的所谓“二进狱者”。当然，还有几个外国人。

我们这些人全是被押往同一个特种劳改营的（从派工员口里听说，是押往斯捷普拉格）。我仔细地观察着这些人，是命运把我们牵到一起了。我努力去理解他们。

我觉得特别使我难过的是那些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虽然在这牢房里面我与他们处于同样地位，但我内心却感到在他们面前无地自容，仿佛是我自己把他们抓进来的。他们都是些纯朴、勤劳、信守诺言、安分守己的人。他们怎么会也落到这种绞肉机中来了呢？他们没有招惹任何人，平静地过着自己丰衣足食的生活，社会道德比我们这里还要高尚。可是，忽然，只因为他们住在我们近旁而且挡着我们去海洋的路，他们就有罪了。

“作一个俄国人真可耻！”——当年俄国扼杀波兰的时候，赫尔岑就曾经这样激动地说过。今天，面对着这些不喜争战而且毫无防御的人民，我感到作一个苏联人有双倍的耻辱。

我对拉脱维亚人的感情还要复杂得多。这里似乎有某种命运之手在捉弄着我们。这是他们自己播下的种子呀。

那么，乌克兰人呢？我们已经很久不使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这个提法了，我们只说“班杰拉分子”，而且这个词在我们这里已经变成一个十足的骂人的词了，以至谁也不再去思考一下它的实质。（还有，我们使用“匪徒”这个词也是这样的。按我们习惯的用法是：凡是为了我们而杀人的都是“游击队员”，而凡是杀我们人的都是“匪徒”，包括一九二一年的唐波夫省的农民在内。）

而问题的实质则是：尽管有过一个时期，在千年前的基辅罗斯时代，我们大家确实曾经组成过统一的民族，但是，从那以后这个民族就分裂了，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和他们的生活、习惯、语

言都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所谓的“重新统一”本来就是十分困难的。尽管或许曾有人抱有过这种重新组织从前那种兄弟大家庭的真诚愿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过去三个世纪的时间。俄国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位政治家，他能认真地想一想：怎样才能使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结成亲人，怎样才能消除双方之间的隔阂和创伤。（假如没有隔阂和创伤的话，一九一七年春天也就不会组织什么乌克兰委员会，也不会有以后的“拉达”了。不过二月革命时期他们只要求实行联邦制，谁也没想分离出去，这种残酷的分裂肇始于共产党当政的年代。）

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之前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并没有遇到困难。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过列宁的这样的话："我们把乌克兰和别的非大俄罗斯人地区看作被俄国沙皇和资本家们所兼并的地方。"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在乌克兰已经组织起中央权力机构——中央“拉达”了。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还通过了一个《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这该不是开玩笑的吧？当时这个宣言宣布俄国各族人民拥有直至分立的自由权和自决权，那该不是欺骗人的吧？半年之后，苏维埃政府曾请求德意志帝国协助苏维埃俄国同乌克兰签定“和约”并划定双方的准确国界，而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列宁同乌克兰黑特曼*——斯柯罗帕德斯基共同签署了这项和约。列宁的这一行动表明，他完全容忍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甚至容忍乌克兰在分离出去后成为君主国！

但是怪了。德国人刚被协约国打败（这总不该影响我们对待乌克兰的原则吧！），黑特曼也跟着他们垮台．布尔什维克的那点实力比彼得留拉的力量稍微大点了，——布尔什维克马上越过了他们承认的边界线，把自己的政权强加在同一血统的兄弟们身上。

---

* 乌克兰民族首领的称号。——译者注

不错，在那以后的十五到二十年中，我们曾不遗余力地、甚至是勉强地利用“莫瓦”——乌克兰的语言——大作文章，使那里的弟兄们相信他们自己是完全独立的，而且是随时可以从我们这里分离出去的。但是，当他们在战争结束时刚一表示想要这么作的时候，我们却宣布他们是“班杰拉分子”，并开始追捕、拷打并处决他们，或者把他们关进劳改营了。（其实“班杰拉分子”也和“彼得留拉分子”一样，都只不过是一些不愿意在异族政权统治下生活的普通乌克兰人而已。当他们了解到希特勒也并不给予他们曾经许诺的自由时，他们便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同希特勒作战。但是，我们对这一点却缄口不言，因为提这一点对我们不利，就像我们从来不提一九四四年的华沙起义一样。）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即我们的兄弟们希望能用自己的“莫瓦”讲话，用它教育孩子，写商店招牌，这为什么会使我们如此怒不可遏呢？甚至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他的小说《白卫军》中）在这个问题上也受到了不正确的感情的影响。既然两个民族过去没有完全融合到一起，既然我们之间有不同之处（只要他们，少数人，有这样的感觉就够了），这很令人痛苦！但事已至此，有什么办法！既然错过了时间，——那主要是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错过的，双方关系主要不是在沙皇时代而是在共产党当政时期尖锐化的！——他们要分离出去，我们为什么要生气呢？是舍不得敖德萨的海滨浴场？舍不得切尔卡塞的水果？

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是很痛心的，因为在我的血液里，在我的心理上和思想里，都有乌克兰和俄罗斯两者的结合。但是，在劳改营里同乌克兰人的长期友好交往使我深深理解了：他们为此痛苦了多么久啊！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要为老一代人的错误付出代价。

跺着脚喊叫：“这是我的！”那是很容易的。而要说一句：“谁想生活，就让他生活吧！”那就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在二十世纪末

期，我们不应该仍旧生活在使我们最后那位不太聪明的皇帝伤透脑筋的那个空想的世界里了。不管看来多么奇怪，但事实是："先进学说"关于民族主义正在衰落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在原子和控制论的时代，它——民族主义——不知为什么反而兴盛起来了。这样一个时刻正在到来：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必须履行我们关于自决权和独立的全部诺言。而且我们应该主动地使它兑现，不要等待别人在火堆上烧死我们，在河里淹死我们或者砍掉我们的脑袋。我们究竟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一点，我们不能靠疆土之广大，被保护民族之众多来证明，而只能靠行动之伟大来证明，还要靠我们放弃了那些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土地之后在自己土地上的精耕细作来证明。

对乌克兰的处理将是异常痛苦的。但是，现在就应该看到总的发展趋势。既然过去多少世纪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就是说，该是我们来表明自己明智的时候了。我们必须交给他们自己去决定。是交给联邦制派，还是交给分立派？那就要看他们之间谁能说服谁了。不让步，则是愚蠢，是残酷。我们现在越是温和、忍让和通情达理，那么将来重新恢复统一的希望也就越大。

让他们自己生活，自己去试试吧。他们很快就会感觉到：分离出去并不能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①]。

不知为什么，让我们在长长的马棚牢房里住了很长时间，没往斯捷普特种营押送。自然，我们并不着急，我们在这里很愉快，

① 在乌克兰各个州里，各种人（自称为俄罗斯人的、自称为乌克兰人的，以及认为自己既非俄罗斯人又非乌克兰人的）的比例各有不同，情况复杂。也许需要在每个州都进行一次公民投票，然后对那些希望迁移的人们给予关心和照顾，提供方便。处于目前苏联国界内的乌克兰并不全是真正的乌克兰。第聂伯河东岸的某些地区毫无疑问是倾向于俄国的。至于克里米亚，那是赫鲁晓夫一时犯傻才划给乌克兰的。还有喀尔巴阡俄罗斯呢？就拿这个地方做个检验吧：乌克兰人要求别人对自己公正，他们对喀尔巴阡地区的俄罗斯人能不能公正呢？

到了那里只会不如这里。

我们这里也不乏新闻消息，每天都有人拿来半张破报纸。常常是我念给全屋的人听，而我总是带着感情念，那里也确实有应该带着感情念的东西。

那些日子正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解放十周年纪念。我们牢房里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中间有些人懂俄语，他们把这些消息翻译给别人听（这时我就稍停一停）。当那些人听到在他们的国家里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起了怎样的“自由和繁荣”的生活时，他们竟失声痛哭起来了，上下铺的人一齐大哭。这些从波罗的海沿岸来的人（他们占整个递解站人数的近三分之一），每人都丢下了一个破碎的家庭。不，如果还有“家庭”，那就算是不错的了，有些人的“家庭”也正在跟着另一批押解犯人被同样地押往西伯利亚。

但是，最使我们这些递解中的囚犯心情激动的当然还是关于朝鲜的消息。斯大林的闪击战在那里失败了。联合国的志愿军已经召集起来。我们把朝鲜看作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班牙。（很可能斯大林就是把它当作第三次大战的彩排而开始的吧。）特别使我兴奋的是联合国的士兵们：看，他们那个旗子多有意思！这个旗帜什么人不联合呢？它简直是未来的人类总体的雏形！

使我们厌恶的是，我们不能有比厌恶更进一步的行动。“我们死掉也不要紧，只要那些在幸福生活中看着我们死亡而无动于衷的人们能够安然无恙就行！”——难道我们能够这样想吗？不能，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绝对不能！我们确实在渴望着暴风雨的来临！

人们也许会感到惊奇：“人怎么可能有这种无耻的、绝望的思想呢？你们难道没有想到在监狱外面的广大人民要遭受战争灾祸吗？！”“但是，狱外的人们可一点也没有想到过我们呀！”“那么说，你们怎么啦？竟然希望爆发世界大战？”“可是你在一九五〇年就给这些人判刑判到七十年代中期，那么他们除了希望发生世界大

战之外还能希望什么别的呢?”

现在，当我回忆起当时我们那些虚幻而有害的希望时，自己也感到荒唐。全面的核毁灭不管对谁来说都不是出路。何况，即使不用核武器，任何一种战争状态都只能成为国内暴政的借口，会加强国内暴政。但是，如果我不讲出真实情况，不说出我们在那个夏天的实际想法，那么，我写的历史就被歪曲了。

罗曼·罗兰那一代人年轻时曾因为担心战争爆发而苦恼，而我们这一代囚徒则相反，我们是因为没有战争而苦恼。这就是政治犯特种劳改营当时的真实精神状态。我们就是被逼到了这种地步。世界大战带给我们的只会是两种可能：或者是加速死亡的到来（从炮楼上扫射我们，像德国人干的那样在我们的食品里放毒和使用杆菌），或者，也许会是取得自由。不管是哪一种，都能更迅速地得到解脱，总比拖到一九七五年的刑满期好些。

彼佳·帕-弗就是这样打算的。彼佳·帕-弗是我们牢房里从欧洲回国的人中最后一个活下来的人。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有牢房里塞满了像他这样从欧洲回来的质朴的俄罗斯人。但是，那时候回国的人早都已进了劳改营或者入土了，没回来的人也都下决心不回来了。可是这个彼佳是怎么回事?他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正常人谁都不再回国的时候，自愿回到祖国来的。

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正在哈尔科夫市的职业学校学习，他是战时强迫动员到那里去学手艺的。不久，德国人来了，又把他们这帮半大孩子强迫送到了德国。他这个“东方奴隶”在那里一直呆到战争结束。他在那里养成了一种心理状态，认为人应该尽量使生活过得轻松些，不要像自己小时那样被人强迫去劳动。在西方，他利用了欧洲人的轻信态度和边境控制不甚严紧的状况，把法国的汽车开到意大利，再把意大利的车开到法国，减价出售，从中谋利。但是，他在法国到底还是被查出来，他被捕了。这时，他给苏联驻法大使馆写了封信，表示愿意回到他亲爱的祖国去。帕

-弗当时是这样盘算的：如果蹲法国监狱，他就不得不呆到刑期的最后一天，而他有可能被判十年徒刑。回到苏联呢，他由于叛国罪可能被判刑二十五年，但是，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滂沱大雨已经开始落雨点了。而苏联呢，据他说，开战后连三年也保不住。因此，还是去苏联监狱更有好处。大使馆的朋友们自然是很快就来接收他了，并且拥抱了彼佳·帕－弗。法国当局欣然同意把这个盗窃犯移交给苏方[1]。大使馆里集结了大约三十名像帕-弗这样的和有类似情况的人，使馆把他们用轮船舒舒服服地运到了苏联的摩尔曼斯克。靠岸之后，放他们到市内去游逛游逛，然后，就在一昼夜之内又把他们一个个全都逮捕起来了。

现在，在我们牢房里，被佳能够代替西方的报纸（他曾仔细阅读过西方报刊关于克拉夫琴科案件的报导），也能够代替剧院（他可以轻巧地用嘴吹奏西方音乐）和电影（他给我们讲述西方影片的内容，边讲还边表演）。

古比雪夫的递解站多自由啊！各牢房的人有时可以在大院子里相遇。还可以透过窗外的罩斗同院里的囚犯谈话。去厕所时可以走近家属工棚的敞开的、钉了铁栅栏、但没装罩斗的窗子去看看，那里住的是带着孩子的女犯人（她们也都是从波罗的海沿岸一带和西部乌克兰抓来的）。在两座马棚牢房之间的墙上有一个小孔，我们把它叫做“电话”，每天从早到晚小孔两边总是各有一名好事者半躺半卧着互相交换消息。

这种自由更加刺激了我们的好斗心，我们更感到自己脚下的土地十分牢固，而看守我们的人们脚下的土地却似乎就要燃烧起来了。于是，在院里散步的时候，我们也不免要昂起头来望望那

---

① 据说，法国统计资料表明：在第一次大战与第二次大战之间，法国社会各少数民族侨民中间犯罪率最小的似乎是俄罗斯人。而在第二次大战之后则相反，在各少数民族中犯罪率最高的是俄罗斯人，也就是流落到法国的苏联公民。

灰白的闷热的六月天空。假如这时在那天空中出现敌人的轰炸机编队，我们是既不会惊奇，也不会害怕的。我们的生活实在不像生活了。

从卡拉巴斯递解站来的、往相反方向去的人们带来了一些谣传，说那里出现了小传单，上面写着："受够了！"我们互相鼓气，情绪越来越激昂，以至在鄂木斯克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炎热的夜晚，大家都像从蒸笼里出来一样，热汗直流，这时候看守们却把我们塞进乌鸦车，挤得满满的。我们便从车厢里对看守们喊起来："等着瞧吧，兔崽子们！杜鲁门会来收拾你们的！把原子弹扔到你们头上！"可是看守们却一声没吭。他们也感觉到了我们这方面的力量在增长，而且我们深信自己是正义的。我们非常渴望真理的实现，甚至宁愿在同一颗炸弹之下和这些刽子手们同归于尽。我们所处的境地没有什么可丢失的。

不写下这个情况，就无法揭示五十年代古拉格群岛的全貌。

鄂木斯克的牢狱是关押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可不是匆匆忙忙用木板钉起来的古拉格系统下的递解站。这是沙皇叶卡捷琳娜时期建造的威严的监狱，特别是它的地下室。要是找拍电影的场景，没有比这地下牢房更合适的了。四方形的小窗口就是一条通向地面的斜坑道的下端。根据这条三米深的斜坑道便可以看出牢房的墙是用什么构成，有多么坚固了。牢房里没有所谓的屋顶，它是一个形成穹隆状的倾斜的大石洞。有一面墙湿淋淋的，不断地渗出水来，滴到地上。早晚这里漆黑一片，即使在晴朗的白天牢里也是昏暗的。看不见老鼠，但是总感觉到它的存在。本来石穹隆有些地方就低得只有一人多高，但监狱当局还是想方设法在这里修了两层睡铺，下铺刚刚高出地面一点点，只有脚踝骨那么高。

我们在使人放纵的古比雪夫递解站期间发展起来的那种模糊的反抗精神，看来，遇到这样的监狱之后总该被压服了吧。但是，并没有！每天晚上，在蜡烛般微弱的十五支光的电灯下，敖德萨

大教堂的长老，谢了顶的、瘦长脸膛的德罗兹多夫老头，还是照例要站到坑道窗口的底端去，用低低的声音，满怀着迎接生命的终结的无限感慨，唱起他那支古老的革命歌曲：

> 秋天的夜晚，一片漆黑，
> 它有如背叛的行径，恰似暴君的乖戾。
> 而这座监狱，在雾气中挺立的
> 这可怖的幽灵，却比秋夜还黑！

他只是唱给我们听。不过，在这里，即使大声喊叫，外面也听不见。他唱的时候，可以看见他尖突的喉结在那干瘪的、青铜色的脖子皮肤下面滚动。他边唱边抽泣，他在回忆，在脑海中一幕幕重温过去几十年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他的内心战栗感染着我们：

> 虽然这里一片沉寂，
> 但监狱绝不是坟地。
> 而你，看守人呀，
> 且莫疏忽大意！

在这样的监狱里，听这样的歌声！[①]* 一切都是合拍的，一切都是和我们这些囚犯们所等待的东西合拍的。

听完他的歌，我们就在黑暗中，在阴冷潮湿中收拾收拾睡觉了。是啊，此时此刻还有谁的话语能温暖我们的心呢？

---

① 可惜肖斯塔科维奇在他写《第十一交响乐》之前未能在这里听一听这支歌。否则，他或许根本不会去写它，或许会表现出它的现代的，而不是那已经死去的意义了。

*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乐》名为“1905年”，是他在1957年完成的。据作曲家在回忆录中说，它是要表现“历史的重演”，“它描写了人民，他们不再相信了，因为罪恶已经遍布。”——译者注

这时，仿佛是对这期待的响应一样传来了一个声音，这是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帕斯基说话了。他的声音好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所有主人公的混合声音。这声音时而高亢得无法攀援，时而又低沉得令人窒息，它既不单调，也不宁静，仿佛随时可能变成哭泣、变成痛苦的呐喊。即使是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基笔下的廉价小说《红色马顿那》之类，要是用这种声音，用这种充满信念、痛苦和憎恨的声音读出来，也会像是关于罗兰的史诗那样激动人心。所以，真实也罢，完全是臆造也罢，反正他所讲的故事已经作为一个史诗铭刻在我们记忆里了，他讲到维克托·沃罗宁曾徒步急行军一百五十公里奇袭托列多，给阿尔卡扎尔要塞解了围。

其实，要把这个斯帕斯基本人的一生写成小说的话，它在小说中也未必会是最糟糕的一部。斯帕斯基青年时就曾参加过“冰上进军”*，整个内战时期他一直南征北战。后来流亡到意大利。在国外修完了俄国芭蕾舞课程（好像是跟卡尔萨维娜学习的），又在俄国某伯爵夫人家里学会了一手做细木家具的漂亮手艺。（后来，在劳改营里，无人不夸他的好手艺：他自制了一套小巧的木匠工具，用它给劳改营的头头们做了一张小桌，线条优美，轻便漂亮，使他们大为惊讶。不错，这张小桌子他整整做了一个月。）后来，他曾随着芭蕾舞剧团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他替意大利拍摄过新闻记录影片。后来，他用了一个稍为有点变音的意大利人名字——若万尼·帕斯基——在意大利军队里当了少校。于是，一九四二年夏天他便随部队又来到他的故乡顿河一带。尽管当时总的形势是苏联军队仍在继续后退，但他指挥的那个营在这里很快就落入了苏军包围圈。斯帕斯基本人原想拼命冲出去，但是组成该营基本力量的那些意大利孩子们吓哭了：他们想活命！

* 指1921年镇压克琅施塔得水兵反苏维埃暴动的军事行动。——译者注

这时斯帕斯基少校动摇了，终于挂出了白旗。他自己是有机会用一颗子弹了此一生的，但那时他却产生了好奇心：想看看苏联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本来能够作为意大利军普通战俘在四年之后被送回意大利的，但是，他身上的那种俄罗斯人本性憋不住了，他同俘虏他的苏军军官们无话不谈，以至忘乎所以了。一失足成千古恨！既然你不幸是个俄国人，你本该像讳言自己的花柳病一般对此讳莫如深呀，否则，哪里会有你的便宜！先关了他一年，后来又在哈尔科夫的国际战俘营（也还有这样一个营呢，里面关押着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里关了三年。在他已经被关押四年之后——这四年除外——又判了他二十五年！哪里还要等二十五年呀，在这苦役营里，他已注定不久就要死去了。

我们进了鄂木斯克监狱，然后又被转押到巴夫洛达监狱。这两处监狱之所以同意接受我们这批犯人，是因为这两个市的当局有一个重大的疏忽：至今还没有建立专门的递解站。巴夫洛达市甚至更加可耻：连黑乌鸦囚车也没有，因而只好让我们这些囚犯排着队从车站走到监狱，经过好几个街区，也只好不怕居民看见了。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的头十年就是这样押解犯人的。我们通过的几个街区没有一条柏油马路，没有自来水管，只见一排排木造的平房沉在黄沙里。实际上只是从监狱的两层砖房开始才有点像个城市样子。

但是，用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这所监狱给人的感觉不是恐怖，而是宁静，不是可怕，而是可笑。宽敞寂静的小院，屋边墙角处长出一点可怜的小草，用木板隔开的放风场地也不显得可怕。二层楼上的牢房的窗子只钉着稀疏的铁栅栏，窗外没有装“笼口”，可以站到窗前去研究外面的地形。窗子下面，就在脚下，在狱墙和外面的院墙之间，铁链拴着一只大黄狗，时而像是发现了什么动静似地曳着铁链跑几步，汪汪两声。但它也不像监狱里的狗，样子不可怕，不像那些专门训练来咬人的狼狗。一身蓬松的

浅黄毛说明它是一只普通种的看家狗（哈萨克斯坦有这样一种狗），而且，它已经老得不行了。这狗倒像那些好心肠的老年看守，这些人都是从军队调来的，他们毫不隐讳自己已经为这狗一般的看守职务所苦恼了。

越过狱墙，可以看到街道、卖啤酒的小铺子、路上的行人和呆立着的人——他们是来给犯人送东西或是等着取回容器的。再往远看就是住宅区，平房组成的一片片街区，额尔齐斯河的河湾，甚至可以看见河对岸很远的地方。

岗楼上的哨兵刚刚把留下了“牢饭”的空篮子退还给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小女孩接过篮子，一抬头看到了我们正站在窗口向她挥手致意，但她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容不迫地、庄重地向啤酒小铺的房后走去了，她怕岗楼上的哨兵看到她。可是，一到房后，她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她放下篮子，举起双手使劲朝我们不住地挥动，边挥手边笑！然后，她用手指作出各种圈圈点点的动作，向我们表示：“写吧，写小纸条吧！”又在空中划了一条抛物线，表示：“扔下来，扔给我！”然后又向市区那边指了指，意思是：“我送去，替你们转交！”然后她又把两手张开，好像在说：“还有什么事？还能帮你们作点什么？朋友们？”

她做这一切时是那么诚恳、直爽，丝毫不像我们那些备受欺凌虐待的狱外的自由人们，不像那些被弄得昏头昏脑的公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时刻到了吗？或者只是在哈萨克斯坦如此？须知，这里的居民中几乎有一半人是流放来的呀！……

可爱的无畏的小女孩啊！难为你那么快就学会、就正确地掌握了监狱生活这门科学！世界上仍旧存在像你这样的人，这本身该是多么令人欣慰啊！（我这眼角里是不是夺眶欲出的喜悦的泪水？）……请你，无名的女孩子，接受我们的敬礼吧！啊，要是全国人民都像这样该有多好！那就谁也不敢来关押他们了！那些可诅咒的爪牙就会统统完蛋！

当然，在我们的棉背心里还藏着几节铅笔芯断头。也有几小块纸片。可以从墙上抠下一小块灰泥来，用细线把小条子缠上，扔到她的跟前去。但是，我们在这个巴夫洛达市确实没有任何事情要求她帮忙的。所以我们只是向她鞠躬道谢，挥手致意而已。

我们被带进了沙漠地带。甚至那质朴僻静的小市巴夫洛达后来想起来都像一个灯火辉煌的大都市。

现在，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押解队把我们接收了。(不过，幸而还不是杰兹卡兹甘的劳改营分部。我们一路上都在祷告命运之神，千万不要把我们弄到铜矿去。) 来了几辆大卡车接我们，车帮加高了很多，车身前部装着铁栅栏以保护那些冲锋枪手并把我们像野兽一样隔开来。我们被紧紧地塞到车里，蜷着腿坐下，脸朝车后。我们就这样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整整颠簸摇晃了八个小时。冲锋枪手坐在驾驶室的顶篷上，枪口一直对准我们的后背。

那些少尉们、上士们则坐在驾驶室里。我们这辆车的驾驶室里坐的是一个军官的妻子和她的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每当汽车停下来休息时，小女孩就跳下去，在草地上跑，采集野花，大声和妈妈说话。对于冲锋枪、军犬、从车里露出头来的丑陋的囚犯们，她都毫不在意。我们这个可怕的世界并没有使草地和野花在她心目中有所逊色，她甚至没有向我们这边投过来哪怕是好奇的一瞥……这时，我想起了札哥尔斯克特种监狱里的准尉的小儿子。那个小孩最喜欢的游戏是：叫两个邻居孩子把手背在身后(有时还把他们的手绑起来)在路上走，他自己则拿着棍子走在旁边押解他们。

有其父必有其子！父亲过什么生活，孩子们就玩什么游戏……

我们渡过了额尔齐斯河。汽车经过一大段浸了水的草地，然后行驶在平坦的沙漠上，黄昏时停下来休息。这时，飞驶的车轮带起的浅灰色旋风也随着平息下来，我们沉浸在额尔齐斯河的气息中，沉浸在沙漠之夜的清新空气和蒿草的芳香中。我们满身尘土，面向走过来的方向（绝对不许回头看前进的方向），沉默着

（绝不许讲话），心里想着那个未来的特种劳改营，它的名称不像是俄罗斯人起的。换乘"斯托雷平囚车"时，车顶上吊着我们的"卷宗"，我们看到过那上面有劳改营的名称——**埃克巴斯图兹**。但是谁也想不出它在地图上的位置，只有奥列格·伊万诺夫中校记得这是一个煤矿。我们还曾设想它的位置在距中国边界不远的地方（某些人甚至为此而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中国比我国还要坏得多）。原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是个新犯人，也是判刑二十五年的。他对谁都不屑一顾。本来嘛，他是共产党员，是被错抓的，周围这些人都是人民的敌人。但对我还算另眼看待，因为我曾经是苏军军官，而且没有当过德国俘虏。他帮我想起了在大学学过、但早已忘记的东西：在秋分的前一天在地上划一道正午线，在九月二十三日那天，从九十度中减去太阳处于中天时的高度，就能得出我们所在地的地理纬度数。尽管求不出经度来，但能知道纬度也多少算一种安慰了。

我们的汽车不停地往前开。天黑了。根据夜空中明亮的星辰，我们才明确地知道：我们正在被押往"南南西"的方向。

后面汽车车灯的光柱里，一缕缕灰尘在飞舞。其实，道路上空尘土飞扬，只不过在灯光下才看得见。我这时有一种奇特的幻觉：似乎整个世界都是漆黑的，整个世界都在摇晃，只有这些尘土的微粒在发光，在飞旋，在画出未来的不祥图景。

我们是被押往哪个天涯海角啊？去哪个洞穴啊？我们注定要在什么地方进行我们的革命呢？

蜷着的腿已经麻木，觉得已经不是自己的腿。半夜时我们来到了用高高的木板墙围起来的劳改营。在漆黑的沙漠中，在离开沉睡的黑魆魆的村庄不远的地方，这片营地被四周岗楼上的灯光照得通明。

又按各人的案情点了一次名（"一九七五年三月！"）。然后，把我们带进两道高大的门内去度过今后的四分之一世纪。

全营都在沉睡，但所有工棚的窗子都透出明亮的灯光，仿佛那里的生活正在沸腾。夜晚不熄灯，这就表明，这里实行的是监狱制度。工棚的门从外面用沉甸甸的挂锁反锁住，在一个个明亮的长方形窗孔里可以看到黑色的铁栅栏。

出来接人的生活助理员的身上缝着许多块号码布。

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里人们身上是带着号码的，这你在报纸上看到过吧？

第三章

锁链，还是锁链……

但是，我们的激昂情绪，我们的急切期待，很快就被打得粉碎了。变革的微风不过是吹进递解站的一阵过堂风而已，它并没有吹进这用高大围墙圈起来的特种劳改营。虽然这里关押的是清一色的政治犯，但并没有看到柱子上有什么表示反抗的小传单。

听说，特种劳改营“敏拉格”里的铁匠们曾经拒绝打制劳改营窗上用的铁格子。光荣应该归于这些至今不知道姓名的人们！这才是人呢！后来他们被送进了加强管制棚。敏拉格营用的铁格子是到科特拉斯去打制的。科特拉斯人并没有支援敏拉格的铁匠们。

特种劳改营的生活是从驯服开始的。这驯服是无声的，甚至是曲意逢迎的驯服，它是过去三十年间在劳动改造营中逐渐培养形成的。

从极北地区押解来的犯人们并没有为哈萨克斯坦明媚的阳光而高兴。到了新鲁德诺耶车站，他们从红色车厢里跳下来，跳到褐红色的土地上。这里与杰兹卡兹甘的铜矿一样。在这种矿区劳动，无论多么健康的人的肺部都坚持不到四个月。刚到这里，兴致勃勃的看守们就在头几个稍犯点小错误的人身上试用了自己的

新式武器——手铐。原先在普通劳改营时是不给戴手铐的。在苏联，直到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前夕才能够成批生产这种明晃晃的镀镍手铐。(是那些胡子花白的老工人们，即我们文学作品里称作典型无产阶级的代表们，在某个地方的工厂里制造这种手铐。当然，难道还要斯大林和贝利亚亲自制造手铐吗?!)这种手铐的优点是它可以根据需要铐得很紧：手铐上装有一个带齿的金属片，戴上之后，可以尽可能地把这个金属齿片压紧，使犯人感到更痛。这样一来，手铐便从原来的限制囚犯行动的保险性工具一变而成为刑具了。它会深深地咬进手腕，引起剧烈的疼痛，一戴就是多少小时，而且手是倒剪在背后的。此外，还研究出了一种只铐住四个手指头的铐法，使手指关节更是疼痛难忍。

别尔特种劳改营的看守们使用手铐可算是有独到之处：他们为了一点小事，例如，见到看守忘了摘帽子，就给囚犯戴手铐。倒剪着手把人铐起来，在岗楼前面罚站。两手先痛后麻，直至失去知觉，竟逼得成年男子汉哭着求饶："首长，我再也不敢了！摘掉这铐子吧！"(在别尔营里还有一种很好的制度：不仅去食堂时要按号令行动，而且站到饭桌旁时也要听号令，要按号令就座，按号令大家一起把汤匙放进汤盘。吃完饭后要按号令起立，按号令走出食堂。)

某人只须大笔一挥："要建立特种劳改营！在某日前将其管理制度草案呈报上来！"这确实不费吹灰之力。可是那些勤勤恳恳的监狱当局(还有那些深知人的心理并熟悉劳改营生活的人们)可就得绞尽脑汁了：他们要字斟句酌地研究哪些地方还可以再紧紧扣，再使犯人难受一点？再增加一点什么负担，使他们更苦些？怎样才能使这些囚徒们本已不舒适的生活变得更凄惨些？必须让这些从普通劳改营转到特种劳改营来的畜牲们立即感受到这里的严厉和痛苦才行。可是，为此就得有人事先把制度逐条逐条地定出来呀！

还有，警戒措施自然也要加强。所有特种劳改营的隔离区四周都采取了进一步的戒备措施，增加了铁丝网，在障碍地带的前沿补充敷设了布鲁诺蛇腹形铁丝网，在囚犯上下工时经过的所有重要路口和拐弯处都布置了机枪，机枪手时刻严阵以待。

每个劳改地点都建起了砖石结构的监狱——加强管制工棚。[1] 凡是被送进加强管制工棚的，一律要脱去棉上衣：用寒冷折磨人，这也是加强管制工棚的重要特点之一。其实，加强管制工棚就是监牢，因为它的窗子上全有铁格子，晚间把马桶拿进来，把门反锁上。此外，每个隔离区都设有一两个惩戒工棚，那里加强看管，是隔离区中的小隔离区。被送进惩戒工棚的囚犯傍晚下工回来就马上被锁进屋里，和从前的苦役营一样。（这实际上也就是加强管制工棚，可我们都叫它惩戒室。）

此外，还公开采用了希特勒分子使用号码的全套宝贵经验，也就是用号码代替犯人的姓名，代替犯人的“我”和他的人格。所以，在这里，并不是以每个人的全部特征来区别囚犯，而只是单调的数列上的一个个位数的增减而已。这一措施，如果执行得非常坚决而彻底的话，可以使人十分难堪。劳改营当局正是在尽量做到这一点。每一个新来的人，都必须先在特别科“弹钢琴”（也就是和在监狱里一样按下十个指头的指纹。普通劳改营里是不取指纹的），然后，就用绳子把一块牌子挂在他脖子上，牌子上有他的号码，例如“Щ”字第262号。（在奥泽尔特种营里如今连不易单独发音的“Ы”字母也编号了。俄文字母表太短了嘛！）然后，便由专业科的摄影师给他拍照。（现在这些照片还保存在某个地方哩！我们还会看到的！）

拍照之后，把牌子从犯人身上取下来（他总不是狗嘛！），发

---

① 我在下面也还要使用“加强管制工棚”这个说法，这是我们在普通劳改营里用惯了的。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它实质上是劳改营里的监狱。

给他四块（有的劳改营发三块）八公分宽、十五公分长的白布，上面印着他的号码。他应该把白布块缝在自己身上指定的地方。缝的地方各营规定不尽相同，但一般是：背上、胸前、帽子的正前方、还有裤腿或者袖子上。[①] 在发给的棉衣上，这几处的衣服面是事先就剪掉了一块的：劳改营缝纫厂有些裁缝的分工就是把新衣服弄坏——在应该缝号码布的地方把衣服面剪掉一个方块，露出棉花来。这是为了防止囚犯逃跑时把号码撕掉冒充自由工人。别的特种劳改营的作法更简单：用盐酸把号码直接蚀印在衣服面上。

看守们奉命只许叫囚犯的号码。不许他们知道囚犯的姓名，更不许记住它。如果他们真能作到这一点，那倒是很可怕的。但是，他们做不到（他们都是俄罗斯人，改不了老习惯，毕竟与德国人不同），没过一年，他们就已经记不清了，开始叫某些人的姓了，后来叫姓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为了看守们的方便，就在每个人的“小车厢”——木板床前面钉上一块三合板的小牌子，上面写着睡在这张床上的囚犯的号码。这样，看守想招呼某个睡着的人时就可以不必看他身上的号码了，而犯人不在屋里时也可以立即看出谁的床上收拾得不整齐。看守们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或者早晨起床前轻轻地打开锁进入工棚，把那些提前起床的人的号码记下来，或者在起床时间准时闯进来把那些起床动作慢的人记下来。只要抓到这样的人，就可以立即关进禁闭室。但在特种劳改营里多半是要求犯人写出书面检讨，可是这里又不许带钢笔和墨水，也从不供应纸。写这种冗长无聊、令人厌倦的书面检讨的一套作法，算得上是他们一项很不错的发明，反正劳改营里有的是拿着工资而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有的是时间分析。他们并不

---

① 这张照片（照片2）和本书最前面那张照片都是我在流放地拍的，但是，穿的棉衣和号码都是真正的劳改营里的东西。搜身的方式也完全是这样的。在埃克巴斯图兹营的整个期间我的号码是Щ—232，只是在离开之前的几个月才命令我把号码改为Щ—262。这些号码布是我从埃克巴斯图兹营偷偷带出来的，至今还保存着。

立即惩罚你，而是要求你检讨：为什么你的床铺得不整齐？挂在你床头的号码牌怎么会歪的？你棉衣上的号码布怎么会弄脏的？为什么没有及时洗干净？怎么在你的屋里还有纸烟？为什么见了看守不摘帽子？[①]对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要回答这些含义深刻的问题甚至比没有文化的人更痛苦。但是拒绝写检讨就会加重惩罚！检讨要写得干净、整齐，对劳改营当局的工作人员要表示尊敬，写好后把它交给本工棚的看守，然后再转交劳改营长官助理或长官本人审阅。审阅人就在这上面批示应给予什么惩罚。

在各班组的各种报表上也规定要把号码写在姓名前面。代替姓名吗？不，他们还不敢完全不要姓名！不管怎么说，姓名还是一条可靠的尾巴，人一辈子都受到自己姓名的限制，号码不过像是一口气，一吹就没有了。要是把号码烙在或刺写在人身上，那就不同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迈出这一步。其实是能够做到的，谈笑间就可以做到，已经离这一步不远了。

另外，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单独坐牢的。我们不只是听到看守们的声音。这就冲淡了号码带来的痛苦。囚犯们彼此之间也要说话，而彼此间不仅从来不叫对方的号码，甚至不注意彼此的号码。(乍一想，衣服上缝着好几块醒目的白布，怎么会注意不到呢？要知道，当我们很多人集在一起的时候，派班劳动和点名的时候，那许多号码看来就像对数表一般，使人眼花缭乱。只有新来的人会注意到它。）我们甚至不记得最亲近的朋友和同班人的号码，只记得自己的。（在狱卒的帮手们中间有些注意衣着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号码布非常认真地，把毛边折进去，用小针脚缝在衣服上，尽可能缝得俏皮、美观。真是奴性十足！我们这些人则相反，都把号码缝得尽量难看。）

---

① 沙俄激进派记者多罗舍维奇看到萨哈林岛上的犯人见了监狱长便脱帽，曾感到十分惊奇。而我们则是见到任何一个普通看守都必须脱帽。

特种劳改营制度的目的是使这里的人完全与世隔绝，它指望谁也不可能从这里向什么人去上诉，谁都永远不会被放出去，谁也跑不到别处去。(看来，不论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卡腾森林惨案，都没有对这里的主人起到教育作用。)在早期的特种劳改营里可以使用棍棒。那时，大部分情况下也不是看守自己带着棍棒(看守可以使用手铐嘛!)，而是让犯人中间那些受到信任的人——管理员和囚犯班长带着棍棒，他们打犯人是首长十分满意并完全赞许的。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里，分派劳动之前先要在工棚门前集合站队。派工员拿着棍子叫喊："除了最后一个，全出来!"(读者可能早已明白了为什么"除了最后一个"。因为即使有最后一个，那他也不会再出来了，就像他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1] 因此，譬如说，冬天从卡拉巴斯押往斯帕斯克的一队犯人(共二百名)在中途冻死了一些，活下来的人挤在病房和卫生所的过道里，他们的肢体在腐烂发臭，科列斯尼科夫医生[2] 截掉了几十只胳臂、腿和鼻子。即使这样，劳改营的首长也完全无动于衷。特种劳改营里的秘密隔绝状态十分可靠，所以斯帕斯克营的首长，著名的沃罗比约夫大尉，和他的部下才能够把押在本营的匈牙利芭蕾舞演员先关进禁闭室"惩戒"，然后给她戴上手铐，最后便轮奸戴着手铐的她。

这里的制度是不慌不忙地考虑得十分周到的，直到每个细节。例如，这里不仅不许犯人有自己的像片(想逃跑!?)，而且不许有任何人的，包括亲人的像片。如被发现，立即没收烧掉。斯帕斯克营的女囚工棚棚长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被捕前当教员。她偶

---

① 但是，在1949年，斯帕斯克营里像是出了点什么毛病。有一天，把所有班长都叫到"总部"去，命令他们把棍棒放下，并要求他们以后不要再用棍棒解决问题。

② 这位科列斯尼科夫医生就是不久前签署了卡腾事件调查团的虚假结论的"鉴定专家"之一(鉴定证明：不是我们在卡腾森林里杀害了大批波兰军官的)。正是因为他作了这件事，正义的上帝才把他关进了特种劳改营。那么当局为什么要关他呢？为了避免他走漏消息。狡兔死，走狗烹嘛!

尔把一张柴可夫斯基的小像片留在桌子上了。看守没收了像片，关了她三天禁闭。“这是柴可夫斯基的照片呀！”“我不知道是谁的，反正营里不许女犯有男人的照片！”肯吉尔劳改营里允许囚犯接受用邮包寄来的米（为什么不接受呢？！），但却决不许囚犯们煮饭吃。如果发现囚犯在什么地方偷偷用两块砖头支起小饭盒来烧饭，看守会立即把饭盒踢翻，并迫使犯人用手把火弄灭。（不错，后来盖了一个烧饭用的小棚子，但两个月后又把炉子拆掉了，棚子里养上了军官们的猪和行动人员别里亚耶夫的马。）

但是，特种劳改营的主人们在翻新管理制度花样的同时，并未忘记普通劳改营的好经验。奥泽尔拉格特种营的米申大尉只是一个劳改点的头头，他就曾把不服从派工命令的囚犯绑在雪橇上拖到工地去。

总的来说，建立起的管理制度是令人满意的，所以可以让原来的苦役犯在特种劳改营里和大家享受同样待遇，只是号码布上的字母还有所不同而已。（不过，有时也让他们住在草棚和马厩里，那仅仅是由于工棚不够用，例如，在斯帕斯克营。）

就这样，特种劳改营虽然不正式称为苦役营，但它继承了苦役营的一切，成了它的合法继承者，同它溶合在一起了。

为了使囚犯们很好地掌握已经建立的制度，还必须用正确的劳动组织和正确的伙食安排来巩固它。

为特种劳改营选定的劳动是这一带最艰苦的劳动。契诃夫说得对：“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学作品里，已经形成一种成见：好像只有在采矿场才有最艰苦、最耻辱难堪的真正苦役。如果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中主人公是……去替监狱捕鱼或者去伐木材的话，许多读者是不会感到满意的。”（不过，安东·巴甫洛维奇*，您为什么这么瞧不起伐木劳动呢？伐木这个活儿不错，

* 即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译者注

也是合适的。）斯捷普拉格刚刚建立时，最初几个分部的囚犯都是开采铜矿的（它的第一分部设在鲁德尼克，第三分部设在肯吉尔，第四分部在杰兹卡兹甘）。干式采掘，矿石粉末飞扬，人们很快就染上硅肺和肺结核病。[①] 得病的犯人便被送到卡拉干达附近的著名的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去——那是属于特种劳改营的“全苏残废人的收容所”。

斯帕斯克是值得特别提几句的。

送到斯帕斯克来的都是其他劳改营拒绝继续使用的完全残废了的犯人。可是，说来奇怪，这些残废只要一踏上斯帕斯克劳改营那起死回生的土地，就一下子都变成真正的干活能手了。对于整个斯捷普拉格劳改营的长官切切夫上校来说，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要算是他最喜欢的一处了。这个身材粗壮而远非善良的家伙，有时从卡拉干达乘飞机来到这里，在值班室擦擦皮鞋，稍事休息之后就去营区视察，并留心还有谁不在替他干活。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在我这整个斯帕斯克劳改营里只有一个残废，他的两条腿都没有了。可是，就连他也在干轻活儿，他在当通信员！”一条腿的人全坐着劳动：他们把大石块砸成碎石子，有的就分选碎木块。架着双拐也好，缺一只胳膊也好，这些在斯帕斯克都不能成为劳动的障碍。让四名一只胳膊的人（两个有左胳膊和两个有右胳膊的）编成一个小组抬担架，这是切切夫想出来的主意。在没有电的时候让人们用手转动机械加工厂的机器，这也是切切夫手下的人想出来的。切切夫还喜欢营里有“自己的教授”，因此他便批准了生物物理学家奇热夫斯基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搞一个实验室（只有几张空桌子）。但是，一旦奇热夫斯基利用最劣质的材料替杰兹卡兹甘的劳动者们试制成了简单的预防硅肺的面具，切切

① 1886年颁布的沙俄法律规定，凡是对健康有害的劳动，即使是囚犯本人自愿选择的，也不许让他们去干。

夫却不许他投入生产：不戴面具也照样干活嘛，何必多此一举！再说，人员也得不断更新嘛！

一九四八年底斯帕斯克劳改营分部总共关押男女囚犯一万五千人。营区很大，铁丝网的柱子在山腰和峡谷间起伏绵延，伸向远方，四角的监视塔互不相望。后来慢慢地修建起内部隔离工程：囚犯们自己在营区内筑起围墙，把妇女区、工人区、完全残废区互相隔开了（这样可以使囚犯之间的联系更加困难，对劳改营主人更加方便）。六千人每天步行到十二公里外去修建水坝。因为他们毕竟是残废，所以往返都要两个多小时，还要加上十一小时的劳动（在这种条件下很少有人能支持两个月）。另一项艰苦的劳动是采石子。采石场就在隔离区之内（古拉格的岛上还有矿藏呢！），男女营区内都有。男区的采石场在山上，打炮眼，用炸药把岩石炸开。白天，残废的囚犯们用小锤子把炸下的石块敲成碎石子。女营区不用炸药，女犯得用十字镐刨开土层，露出岩石后，用大锤把石头打碎。当然，她们的锤把常常会震断（新锤把也会折断）。要换新锤把，就得到另一隔离区去。而且，妇女们有工作定额，每人每天必须采石 0.9 立方米。因为完不成定额，她们在很长时间里只能领到惩罚口粮——每天四百克粮食。后来男囚犯教给她们一个办法——验收之前偷偷从旧石堆上扒一些石子到新堆上来——这才不受“惩罚”了。还要提醒读者，所有这些劳动不仅是残废人在没有任何器械的条件下干的，而且是在草原地带的严寒中干的（零下三十—三十五度，还刮风），人们身上穿的是单衣，因为按规定，不劳动的人们（即残废的囚犯们）冬天不发给棉衣。一位化名波-尔的妇女曾向我回忆过她在严寒中，身上几乎没穿什么衣服，用大锤敲打石头的情况。她说：“至于这种劳动对祖国的好处，只要讲一件事就很清楚了：后来发现女区采石场采下的石头不知为什么不适于建筑用，于是，某一天，某个首长就下了一道命令，叫妇女们把一年中采的石子‘全部扔回矿坑去，用土盖

上！这里要开辟成一片林园！’当然，林园并没有修成。”男区采的石块好一些。那些石块是这样运往建筑工地的：每天点名之后把全部（到这一天还活着的）囚犯（总共约有八千人）统统赶上山去，回来时都要背着石子。休息日残废囚犯们也要这样“散步”两次：早上和傍晚。

后来的劳动便是在隔离区内修建界墙，替劳改营的工作人员和警戒部队盖房（盖住宅、俱乐部、澡堂、学校），在农田和菜地里干活。

所种的菜全都拿给自由居民吃，囚犯们只能得到一些菜茎菜叶之类。这些茎叶大堆大堆地用汽车运来，扔在厨房旁边，任其沤湿腐烂。做饭时伙夫们就用叉子从堆里直接叉到锅里（有点像煮家畜饲料吗？……），用这些茎叶煮出来的是真正的烂菜汤。每天只往这种烂菜汤里加一勺稀饭，如此而已。请看看发生在斯帕斯克菜地上的这样一个场面吧：一天，大约一百五十名囚犯商量好了，一下子都扑到一块菜地里去，进去后立即趴在地上咬食地里长着的蔬菜。卫兵们跑来了，用棒子打他们，可是他们只管趴在地上继续啃食生菜！

不参加劳动的残废人每天发给面包五百五十克，劳动的发六百五十克。

斯帕斯克营的人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药（这么多人，到哪里去弄药？何况他们反正要死掉嘛！），也不知道什么叫铺盖。在某些工棚里是把床并在一起的，两张床并起来就不只是睡两个人，而是让四个人挤在一起睡。

对，另外还有一项工作！每天要派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人去挖坟坑。每天派两辆美国造的“史蒂倍克”牌卡车专拉尸体。尸体是装在木格箱子里运走的，死人的手脚从宽大的格子缝里伸出来。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比较顺利的几个月里，每天要死六十到七十人，到了冬天每天死亡上百人（一个在停尸房干活儿的爱沙尼

亚人查过人数)。

(其他地方的特种劳改营里的死亡率没有这么高，吃的也稍好些。当然，劳动也重些，因为不是残废嘛！这一点，读者自己会了解的。)

这一切都发生在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也就是说，这是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年之后的事，是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结束之后三年的事。经过纽伦堡法庭审判之后，为法西斯集中营的野蛮残酷暴行所震惊的全人类刚刚松了一口气，还满以为："这一切都不会重演了!" 呢。[①]

有了这些制度还嫌不够。自从转到特种劳改营之后，我们同外界和家庭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了，对于等待着你和你的来信的妻儿老小来说，你就变成了神话中的人物。(每年只许写两封信。可是，就连你倾注了几个月来的全部心声和最主要、最美好的感情写出的这两封信也未必发出去。谁敢去向检查信件的国家安全部的人员查问？他们是常常自动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的：把一部分信件放进炉子，就不必花时间检查了。至于说收信人没收到你的信，那你就去责怪邮局吧。在斯帕斯克营，有一次命令几个囚犯去修理信件检查科的炉子。囚犯们在炉膛里发现了几百封信件：是检查人员扔进去之后忘记点火了。特种劳改营的情况就是这样——去修炉子的人还不敢声张此事！否则安全人员会立即收拾他们……难道这些为了自己安逸而烧掉囚犯心声的国家安全部的信

---

① 我预料读者看到这里会激动，所以我必须赶紧告诉读者：所有这些切切夫、米申、沃罗比约夫，以及诺沃格勒德的看守们，现在都生活得很好。其中，切切夫现住卡拉干达市，是一位退休的将军。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没有受到审判，将来也不会受到审判。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呢?！他们只不过是执行了命令嘛！可不能拿他们同那些只不过执行了命令的德国纳粹分子相比。如果说他们在命令之外又多干了一些什么的话，那也是出于他们思想意识的纯洁，是诚心诚意想把工作干好的呀，只因为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贝利亚这个"伟大的斯大林的忠实战友"原来也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件检查员们，他们比收集被害者的头发和人皮的希特勒党卫军分子更人道一些吗?）至于同亲属们会面，这在特种劳改营里连提都不必提，因为特种劳改营的地址是使用密码代号的，任何人都不能到这里来。

还得补充一点：在特种劳改营里几乎不存在海明威所说的“有的和没有的”这个问题*。这里从建立那天起就按照“没有的”的原则解决了一切问题。不许囚犯有钱，也不发给工资。（普通劳改营的囚犯还可以挣到少得可怜的几个工资，这里是分文不给。）不许有换穿的鞋或换洗的衣服，凡是可以穿在里面取暖或者防潮的衣物都不许有。营里发的衬衣（那算什么衬衣呀！恐怕海明威小说里的穷人都不会穿它）是每月换两次，外衣和鞋是一年换两次。这是十足的阿拉克车耶夫式的严明。特种营建立的初期还没有保管室，后来便建立了永久性保管室，即一直保管到“释放”那一天。建立保管室以后，如果自己再有什么衣物不交去，就是一个严重错误了：这是准备逃跑！（关禁闭室！审讯！）床头小柜里不许有任何食物。（早晨要在食物保管处前排队把它交上去，晚上再排队领回来。这样还可以成功地把你早晚剩余的一点点思考时间占去。）不许拥有任何写字用的东西，不许有墨水和彩色铅笔和变色铅笔，不许有超过一本小学生练习本的白纸。最后，不许有任何书。（在斯帕斯克营，接收犯人时便没收他的全部书籍。我们这里最初允许有一两本书。但是，有一天突然下了一道英明的命令：把个人的书全拿到文化教育科去登记。在那里往书的扉页上盖一个“斯捷普拉格，第××劳改点”的图章。此后，凡是没有盖章的书一律作为非法书籍予以没收，而盖了章的书就全算劳改营“图书馆”的书了，不再属于个人。）

---

* 现代美国作家厄纳斯特·海明威有一部长篇小说名为：《有的和没有的》(1933)。——译者注

还要提醒读者：特种劳改营里的搜查要比普通劳改营更加经常，更加彻底。每天出入营时要仔细搜查（照片 2）。对工棚则进行定期搜查：掀开地板，拆掉炉条，拆开门廊的板子；还有像监狱里一样地逐个搜身，要脱衣服，摸索，撕开衣服里子，扯掉鞋掌等。有时就把营区地面的草全部烧光（“不能让他们把武器藏在草里！”）。囚犯们休息日要打扫营区。

想想这一切，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囚犯们并不把佩带号码看作最难堪、最侮辱人格的事了吧。所以，当伊万·杰尼索维奇*说“它们，衣服上的那些号码，并不沉”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像那些自己没有佩带过号码、也没有挨过饿的、高傲的批评家们所指责的那样“失去了作人的自尊心”，而只是发出了清醒的、理智的声音而已。号码给我们带来的苦恼既不是精神上的，也不是（像古拉格群岛的主人们所指望的那样）心理上的，反倒是非常实际的麻烦——我们必须占用空闲时间把撕开的边角仔细缝好，或者去找画家把上面的字再描清楚些；如果劳动时把号码布撕坏了，就得再设法找块新布把它完全换成新的，否则就会蹲禁闭。

什么人真正把带号码看作是这里的花样翻新中的最毒辣的一手呢？那是某些教派的虔诚的女信徒们。例如，卡梅施特种劳改营在苏斯洛沃车站附近设有一个女劳改营分部，那里的女囚犯就是这样。该营的女犯中由于信教被判刑的约占三分之一。而《圣经》《新约》的《启示录》上早有明明白白的预言：

第 13 章，第 16 节里写着：“……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所以，这些妇女们坚决拒绝佩带号码，因为它是魔鬼的印记！她们去领公家发的制服时也不同意签字。（这是“向魔鬼签字！”）劳改营行政当局（营管理处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将军和独立劳改点

---

* 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主人公。 译者注

的长官博古什少校）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足够的坚定性：他们命令扒掉这些女人的衣服，只剩一件衬衣，再脱掉她们的鞋（那些女共青团员看守们自然都照办了）。行政当局想：让冬天迫使这些没有理性的宗教狂们接受公家的制服并缝上号码吧！但是，妇女们竟宁肯在严寒中穿着衬衣光着脚走，也不同意把灵魂交给魔鬼！

于是，在这种精神（当然是反动精神喽！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不会那样去反对带号码！）面前，劳改营当局终于屈服了：把信徒们的衣服还给了她们。她们穿上了不带号码的衣服！（叶莲娜·伊万诺夫娜·乌索娃就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在劳改营度过了整整十年，她的内外衣全穿烂了，勉强挂在肩上，遮住身体，但是劳改营的总务处却无法发给她公家的衣服，因为她不在领物单上签字！）

号码还有另一个使我们伤脑筋的地方：号码写得很大，卫兵从老远就能看清。卫兵们总是在一定的、能够拉开冲锋枪射击的距离看着我们，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姓名；所以如果没有号码，他们就分不清穿着同样衣服的囚犯。有了号码，他们就能从远处看到几号在队伍里说话，几号排队没排好，或者没有把手背在后面，或者从地上捡起过什么东西。只要他们回去向警卫队长一报告，那个人就得蹲禁闭。

警卫队也是扼杀我们微弱生命的一支力量。这些“戴红肩章的人”，正规军的士兵们，这些手持冲锋枪的孩子们，是一支不会分辨是非、不了解我们、而且不接受任何解释的愚昧力量。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从我们这里传给他们，而从他们那里传过来的只有喊叫声、军犬的狂吠、拉冲锋枪枪闩的响声和飞来的子弹。而且永远是他们有理，我们无理。

有一次，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囚犯们在修筑铁路路基。那里不是隔离区，没有界限，四周只有卫兵押着。有一个囚犯在被允许的圈子内离开大家几步，想去拿自己扔在地上的上衣，取出

包在里面的一块面包。不料一个卫兵举枪就把他打死了。当然，卫兵有理。他只会受到表扬，而且，当然，他直到今天也不会后悔的。囚犯们谁也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不满。更没有向任何地方写什么申诉。（即使写了，我们的申诉也出不了劳改营。）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我们五百人到一个汽车修配厂附近去劳动。工地的一边是营区，所以这边没有卫兵警戒。眼看我们就要进入工地的大门了。这时一个叫马洛伊（这个姓有“小个子”的意思，其实他是个彪形大汉）的人忽然不知为什么离开了队伍，若有所思地朝着警卫队长的方向走去了。给人的印象是：他精神恍惚，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他没有举手，没有作出任何一点威胁性的动作，只是沉思着向前走去。这却把那个警卫队长，一个爱打扮的有点流气的军官，吓坏了。只见他转身就跑，一边尖声喊叫着，可怎么也掏不出腰里的手枪来。这时，一个拿冲锋枪的中士迅速跑到马洛伊前面，在相隔几步的地方向他的胸部和腹部打了一梭子弹，边打边慢慢向后退。马洛伊倒下之前还慢慢地继续向前走了两步。他的棉袄的后背上露出了被那看不见的子弹打出的棉花。虽然马洛伊倒下了，可是我们，整个队伍，谁都没动一动。警卫队长惊魂未定，接着就向卫兵们喊了一声，发出了命令。于是，自动步枪便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子弹擦头飞过；事先就在四周摆好的机枪也响了，同时有许多声音，一声比一声更疯狂地向我们叫喊：“趴下！趴下！趴下！！”子弹越飞越低，有的打在障碍地带的铁丝网上。我们五百人并没有朝射手们冲过去，没有去制服他们，而是全都伏在地上，把脸埋在雪里了。就这样，在那个耶稣受洗节*的严寒的早晨，我们在这种耻辱的、任人宰割的状态下，绵羊似地在雪里趴了一刻多钟。他们一高兴就可以把我们全都枪杀掉，而且不必负任何责任：可以说是企图暴动嘛！

---

* 基督教的节日，也叫主显节，在一月六日，是最冷的时期。——译者注

在特种劳改营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我们就是这样一些完全被压垮了的可怜的奴隶！关于这个时期，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已经讲得不少了。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为什么几千人会这样？这些牲口都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呀，也就是说，他们还叫做“政治犯”呢！真见鬼！你们现在不是跟其他普通刑事犯分开了吗？不是集合到一起了吗？你们现在该搞政治了！为什么那么一钱不值，那么驯顺呢？

其实，这些特种劳改营里的生活本来就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开始。这里的被压迫者和压迫者都是从普通劳改营来的，他们身上都各自带着十年以上受别人压迫的、或者压迫别人的传统。原先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随着活人一起转到这里来了，它们温暖并支持着每个人，因为这些人都是几百人几百人地从同一个劳改营分部转来的。他们到新地方来时普遍地怀着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在劳改营这个世界中，人对人来说只能是老鼠、是吃人的生番，而不会是别的。他们带到这里来的只是对自己个人命运的关心和对共同命运的完全漠然的态度。他们都准备在这里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夺取个作业班长的位子，或者能在伙房、面包房、保管室、会计室或文化教育处找到个辅助人员的优厚位子。

但是，单个囚犯到新地方来的时候，如果他想在这里安身立命，那就只有靠他的运气和厚颜无耻。而那些老有经验的辅助人员（帮手）们由于长期在同一个囚犯队里互相磕头碰脑，所以对于作业班长的拳头，对于谁个善于给长官溜须拍马、背地里咬人一口，谁善于搞些“小动作”、逃避劳动等等，都已经彼此有所了解了。在长途押解的路上他们几个星期挤在一个车厢里，在同一些递解站里一起洗澡，他们已经互相领教过了，自然不再抱有过多的自由幻想，只想和和气气地把奴隶的接力棒传过去。因此，他们会互相商量好：到了新劳改营之后怎样攫取关键岗位，怎样把

其他劳改营来的帮手们排挤掉。至于那些已经完全屈服于厄运的、只知道劳动的愚昧无知的人，他们则是商量好到了新地方能组成一个好劳力班子，只盼着能遇上一位让人过得去的作业班长就行了。

所有这些人，不仅彻底忘却了他们每个都是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赋予的灵性和良知，都还有可能争取到极好的境遇，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脊梁骨是可以直起来的，人有权利得到通常的自由，就像谁都有权呼吸空气一样。他们也忘记了，现在他们所有的人，所谓政治犯，已经和自己人在一起了。

不错，他们中间还混有少数刑事犯。

当局对于制止他们的宠儿们的不断逃跑丧失信心了，决定对他们的逃跑适用第五十八条第十四分条，即按照“经济怠工”论处。(因为《刑法典》第八十二条规定，对逃跑者只能加判两年以下的徒刑，可是这些刑事犯们的刑期早已一再加码，有的已经达到几十、几百年了，他们为什么不跑呢?)

总而言之，被送到特种劳改营来的这类刑事犯为数极少，每批犯人中间只有几个人。但是，凭他们那套作风，只有几个人也就足够了，他们就能够在政治犯中间趾高气扬，横行霸道，带着棍子同管理员走在一起（就像在斯帕斯克营里后来被砍死的两个阿塞拜疆人一样），并且帮助看守辅助人员们在“群岛”新开辟的岛屿上确立地位，树起那面卑鄙、肮脏的劳动消灭营的黑旗。

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是在我们到来的前一年，一九四九年建立的。这里一切都是按照囚犯和首长们在原先的地方形成的思想和习惯安排起来的。设有管理员、助理管理员和工棚棚长，他们有的用拳头，有的用小汇报折磨手下的囚犯们。看守的帮手们另住一间工棚，他们可以在那里坐在床上，品着好茶，不慌不忙地决定某些人和某些班的命运。另外，每一个大工棚里（仿效芬兰人工棚的结构）还分出一些小房间来，有些小房间是按照身份

让那些受优待的囚犯一人单住或两人合住的。派工员用拳头打，作业班长打嘴巴，看守用鞭子抽。炊事员都是些蛮不讲理的摩尔达维亚人。各营的保管室都被那些“不拘小节”的高加索人掌握了。所有工地上的职务都被一群自封的工程师骗子们抢去了。坐探们按照规矩，肆无忌惮地把小汇报送到行动处去。一年前建立这个营时只有一些帐篷，现在已经有了石砌的监狱。不过这监狱还没有完全盖好，所以住得非常拥挤，以致被宣布要受禁闭处分的人往往要排队等待一两个月，禁闭室才能空出来！（违章行为太多！）新鲜吧？蹲禁闭也要排队！（我也被宣布要关禁闭，但我终于没有等到！）

的确，这一年刑事犯们（说得确切些是所谓“母狗”们，因为他们是甘心担任那些“合法”工作的）已经不那么嚣张了。可以感觉到他们有些施展不开了：这里没有年轻的刑事犯，没有他们的补充人员，没有人前前后后围着他们转。他们好像也互相配合得不好。在劳改营首长把管理员马格兰介绍给列队欢迎的全营人员时，马格兰还曾勉强装出一副神气样子，可是已经感到信心不足，很快他就不再走运了。

对我们这一批人，也和对其他各批囚犯一样，在接收的当天，从进洗澡房起，就给了个下马威。那天，澡堂的服务员、理发员和派工员都如临大敌。他们联合起来注意看每个对于衣服太破烂、洗澡水太凉、消毒时过分拥挤等等稍稍表示不满的人。他们就是等待着这种不满的表现，好借机大施其淫威呢！因此，一旦有所发现，便几个人一起像群野狗似的故意尖声高叫：“这里可不是古比雪夫递解站！”说着就抡起那养肥了的拳头，没鼻子没脸地打过来。（这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也是正确的。赤身裸体的人似乎远远不如穿着衣服的人有自卫能力。如果能在第一次洗澡时就把这批新犯人制服，那他们以后在营里也就老实了。）

曾经幻想到新劳改营后好好辨别一下，再决定“跟着谁走”的

那个中学生沃洛佳·格尔舒尼，到营的第一天就被派去加固隔离区：派他去挖一个坑，要立一根柱子安装照明电灯。他体力不佳，没有完成劳动定额。因此，狗腿子，生活助理员巴图林（他已经比以前泄气多了，但还没有完全老实）骂了格尔舒尼一声海贼并朝他脸上打了一拳。格尔舒尼便扔下镐头走开不挖了。他跑到管理员那里，对他说："把我关起来吧，只要你们的海贼们打人，我就不再干活儿！"（他还不习惯。只被人骂了声"海贼"就受不了啦。）管理员并没有拒绝把他关起来。他接连蹲了两期禁闭，十八天。（他们是这么干的：先按规矩罚你五天或十天禁闭，但是，到期却不放你，等着你表示抗议或开始骂街，这时他们就"合法地"再罚你第二次禁闭。）蹲过禁闭之后，格尔舒尼还"不老实"，又罚他蹲了两个月的加强管制工棚，也就是说，还是蹲在那个监狱里，不过现在不像在禁闭室了，可以吃到热饭，而且可以按照完成的劳动量领取口粮；他每天必须到石灰厂去干活。格尔舒尼感到自己越陷越深，就想通过卫生所找条出路，因为他还不了解卫生所所长杜宾斯卡娅的脾气。他以为只要给卫生所看一看自己的平足，医生就会不让他跑老远的路去石灰厂劳动了。但是，根本没批准他去卫生所，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加强管制工棚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医疗措施。格尔舒尼想：无论如何也得去卫生所。他从前听说过一些表示抗议的办法，于是他就决定派工时不出来站队，只穿一条裤衩躺在铺上。可是，一个外号叫"闪开"的看守（是个疯疯癫癫的人，从前当过水手）和另一个看守科年佐夫却把只穿着一条裤衩的格尔舒尼从床上拖下来，一直拖到派工地点。看守们拖他，他两手抱住门旁边一块砌墙用的石头，想赖着不走。其实这时格尔舒尼已经同意去石灰厂劳动了，他只是喊："得让我穿上裤子呀！"但是两个看守只管往前拖。在岗楼前面，四千名囚犯等待着派工。这个瘦弱的孩子不住地叫喊："你们是盖世太保！法西斯分子！"同时拼命挣扎着不让给他戴上手铐。但是，"闪开"和

科年佐夫终于把他的头按到地上，把他铐起来了，然后就推着他往前走。他们和营首长马切霍夫斯基中尉一点都没觉得难为情，倒是格尔舒尼自己很难为情：怎么能穿着裤衩在大庭广众之中走呢！他站住不走！旁边恰好站着一个牵着军犬的翘鼻子哨兵。沃洛佳记得，那个哨兵轻轻地对他说："喂，你闹个什么劲儿！快站到队里去吧。这个样子能干活吗，在柴火堆旁坐一会儿不就行了吗！"哨兵紧紧拉住自己的军犬，那军犬则拼命想扑向沃洛佳的脖子，因为它看到这男孩子正在反抗戴蓝肩章的人。没有让沃洛佳站队，把他带回去又关进了加强管制工棚。两手铐在背后，越来越痛。一个哥萨克人看守却掐住他的脖子，用膝盖撞他的胸脯。后来，把他推倒在地，有一个人待理不理地随便嘟囔了一句："给我打！打他个半死！"接着就有人拳打脚踢，有时踢到太阳穴上，直到格尔舒尼昏死过去。过了一天，他被叫到行动特派员跟前：开始追究他企图采取恐怖行动的"案件"了——因为拖他出来的时候他曾抱住石头。"那是想干什么？"

在另一派工地点有个叫特维尔多赫列布的人也曾经拒绝出工，他甚至宣布了绝食，他说，不能替魔鬼干活！可是有谁把他的罢工和绝食放在眼里呢？！人们把他强拖出去。（不过这次是从普通工棚拖出去的。）被拖走时，特维尔多赫列布的手只要够得着窗子，他便把窗玻璃都打碎。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响彻了我们整个队伍，像是在给看守和派工员数人数的声音作不祥的伴奏。

也是在给我们这每日、每周、每月、每年的单调而沉重的生活基调作伴奏。

生活就是这种样子。前途看不到一线光明。是的，内务部建立这些劳改营的时候本来就没有在计划里安排上一线光明嘛！

我们二十五个新来的犯人（大部分是西部乌克兰人）组成了一个作业班，派工员同意从我们中间推举一个班长。我们仍旧推举了帕维尔·巴拉纽克。我们班是老老实实的，能干活。（这些西

乌克兰人刚刚离开尚未集体化的土地，干起活来是用不着督促的，有时甚至还得要求他们留着点劲儿！）起初我们是被当作壮工使用的，但我们中间很快就出现了几个砌石头的能手，其他人也开始向他们学习，不久，我们班就成了一个砌石班。我们砌得很好，领导注意到了，便把我们调离住房建筑工地，留在营部，不派我们去给自由工人们盖住房了。后来，有一天，劳改营领导指着加强管制工棚旁边的一堆石头（就是格尔舒尼抱过的那一堆石头）对我们班长说："这种石头还会源源不断从采石场运来。这里现有的加强管制工棚只是原设计的一半，还要修建另一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班吧。"

这样，我们便可耻地开始为自己建造监狱了。

那年的秋天很长，很干燥，整个九月和十月上半月一点儿雨也没下。早晨往往很平静，然后就起风，到中午风力最大，傍晚就停了。有时候微风吹来，反倒吹得人伤心，特别使人感到这草原太广阔了，从加强管制工棚旁的树林开始，一直伸向远方；那个只有几间新建厂房的小小居民点，警戒部队驻扎的军营和我们这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劳改营隔离区，都似乎完全湮没在这一望无垠的、平坦的、毫无起伏变化、毫无希望的草原里了。唯有那第一排略加修整的原木做的电话线杆朝着东北方向、朝着巴夫洛达市的方向伸去。风有时会突然变得很猛，只须一小时就把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吹来，迫使我们穿上棉衣。大风卷起草原上的大粒砂石不住地往脸上打……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在砌造加强管制工棚的那些日子里写下的一首诗，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吧，也许能说明点什么。

砌石工

看，我这个砌石的，
在认真地砌造监狱，

仔细挑选着荒山的石块，
犹如诗人在斟词酌句。
这里并非城镇要地，
是圈起来的隔离区；
苍鹰在碧空翱翔，
仿佛也正凝神警惕。
草原上唯有北风掠过，
望不见行人踪迹，
甚至无人来问我一声：
在为谁砌造监狱？
岂不见圈起的铁丝网，撒开的军犬，
还有那机枪手已进入阵地？
不，还不够可靠！
监狱里面还要造监狱！

挥动着手中的瓦刀，
我有节奏地转身、弯腰，
像是这劳动本身把我拖着
不停地往前奔跑。
少校来视察过了，
他说："嗯，砌得蛮好！"
他还随口许诺：
让我们第一批住进这新牢！

难道如此而已？
瞧他说得多么轻松、惬意！
准是又有人告了密，
把那个害人的符号

记进了我的狱中档案里，
把我用方括弧
同别人牵在了一起。

敲打砍削声响成一片，
瓦刀、锄头上下飞翻。
墙里又砌上一道墙，
一间囚室还要隔成几间。
休息，我们在灰槽旁吸它几口烟，
有人逗趣，有的在谈天。
我们等待着晚饭，盼着赏下来的
那碗"补助"汤，还加面包一片。
然而，在那边小林的后面，石墙中间，
在那牢房的黑暗洞穴里，
须知有多少无处倾诉的痛苦
深深地永远锁在里边。

唯有一条汽车路通到这里，
它是与外界的唯一维系。
路旁的电线杆在嗡鸣，
不久前才把它立起。
上帝啊，我们多么懦弱、
无能、没有骨气！
上帝啊，我们是一群
多么驯顺的奴隶！

真是奴隶！这不仅表现在我们慑于马克西缅科少校的威胁而尽量把石墙砌得整齐，把洋灰抹得尽量平整，好让将来的囚犯们

不容易把这墙破坏掉，而且还表现在尽管我们连定额都没有完成，但还是给我们砌石班发了补助粮，我们也确实吃掉了，没有把它往少校的脸上摔。而我们的同志，沃洛佳·洛尔舒尼，就被关押在加强管制工棚的已经建成的一间小屋里。没有犯任何错误的伊万·斯帕斯基由于档案里的一个什么记号也被关进了惩戒班。我们中间将来还会有许多人要住进这个叫做“加强管制工棚”的监狱，可我们现在却正认真地、牢固地砌造它。就在我们用石块和灰浆忙碌建造监狱的时候，草原里传来一阵枪声。不一会儿，一辆乌鸦车开到离我们不远的岗楼。(这是警卫部队本部用的一辆真正的黑乌鸦囚车，车身上并没有漆着哄骗傻瓜的大字“请喝苏联香槟酒!”）从囚车里推出了四个人，都已被打得满身是血；两个人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另一个被士兵在地上拖着。只有伊万·沃罗比约夫恨恨地傲然走在最前面。

四个企图逃跑的囚犯就这样穿过了我们的脚手架，从我们脚下被带过去，带进了左边那个已建成的加强管制工棚。

我们呢？我们仍在继续砌石，建造监狱……

逃跑！绝望的挣扎！身上没有平民穿的衣服，不带食物，两手空空就想穿过枪弹纷飞的营区，跑进那没有水草、没有树木的无边草原去！这甚至不能说是一种谋划，它简直是挑战，是一种骄傲的自杀。我们中间那些最坚强最勇敢的人是敢于进行这样的反抗的！

但是，我们呢？我们的继续砌石，建造监狱。

我们纷纷议论起来了。这是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二次逃跑事件。第一次也没有成功，不过那次确实太笨了。外号叫“大肚皮”的瓦西里·布留欣、工程师穆吉亚诺夫和一个原波兰军官，三个人都在机械制造厂劳动。他们节约下一点食物，偷偷在厂房的一间屋里挖好了个一立方米大的坑，藏到里面去了。他们把坑顶盖起来，天真地指望警戒人员会在傍晚收工后像往常一样撤走，那时

他们就可以逃跑。但是，收工时发现人数不够，但四周的铁丝网完好无损。警戒部队没有撤走，继续日夜守卫着工厂。这期间搜索的人带着军犬在隐藏者的头顶上走来走去，他们三人就把浸了煤油的棉花塞到坑顶盖子的缝里，破坏军犬的嗅觉。总共只有一立方米的地方，三个人只能把四肢交叉着挤在一起，不动，也不说话。他们这样蹲了三天三夜，最后实在受不住了，只好自己钻出来了。

别的作业班回到营区后，我们才听说沃罗比约夫等人逃跑的情况：他们原打算驾驶一辆卡车冲出隔离区去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还在砌石头。现在加强管制工棚旁边的这些小房已经有个轮廓了：这里是舒适的禁闭室，这是单人囚室，这是门斗。我们已经在这块不大的地方堆砌了不少石头，采石场供应的石头源源不断。本来嘛，石头是不花钱的，采石场和这里的人力也都不花钱，国家只拨给点水泥就行，为什么不建筑呢。

又过了一星期。对埃克巴斯图兹的四千名囚犯来说，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认清一个现实了：逃跑是发疯，它不会有任何好结果。可是，就在这时，同样是一个晴朗的天，草原上又响起了枪声：又是逃跑!!! 是啊，逃跑简直像瘟疫一样蔓延着。又是一辆黑囚车驶过去：抓回了两个人（另一个当场被打死了）。这两个人（巴塔诺夫和一个矮小的年轻人）也被打得血肉模糊了。又是把他们从我们身旁，从脚手架下面拖了过去，关进了已盖好的监狱，在那里还要继续打他们，然后扒掉衣服扔在石头地上，既不给吃，也不给喝。当你看到这些被摧残得不成样子的骄傲的人时，你这个奴隶作何感想呢？难道会卑鄙地庆幸被抓到、被毒打、注定要遭殃的不是你自己吗？

“快点干！快点把这左厢房盖起来！”大肚皮马克西缅科少校对我们喊叫。

我们继续砌墙。收工后我们还会领到一碗粥的补助粮呢！

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继续在运送灰浆。凡是正在建设的东西总是对祖国有利的吧。

晚上回到生活区，我们才听说巴塔诺夫也是想乘汽车冲出去的，汽车轮胎被枪打坏了。

现在你们这些奴隶总该明白了吧：逃跑等于自杀！谁也不可能跑出一公里。你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劳动，还是自杀?!

没过五天。谁也没有听到射击声，可是，一个新消息就像用巨大铁锤敲打整个铁铸的天空似的震惊了全劳改营：逃跑了!!又有人逃跑了!!!这回逃跑成功了！

这次逃跑发生在九月十七日，星期天，他们跑得干净、利落，甚至连晚间的点名也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掌管钥匙并负责锁门的看守查对人数时也没有发现。只是到了十八日早晨才觉得有点不对头。于是，停止派班劳动，全员清点！先是排队全体清点了几次，然后又按工棚点名，按班组数人数，然后又按每个人的履历卡片查对。这帮本来只会在会计科数工资的鹰犬们数了几次，每次人数都不一样！到这时还没弄清到底跑了几个人？谁？什么时候？从哪儿？怎么跑的？

已经是星期一的傍晚了，还不给我们吃中饭。(把炊事员也从伙房里赶出来排队，点数！)可是，我们却一点也不生气。我们多高兴啊！不管是谁，只要他成功地跑掉，就是全体囚犯的最大喜事！不管在此之后警卫人员会变得多么凶狠，制度变得多么严酷，我们都毫不怨恨。我们高兴啊！每一次成功的逃跑都是对你们这帮走狗的打击！我们的人不是跑掉了吗!?(我们盯着劳改营领导人的眼睛，心里暗暗在祝愿：可别让这些家伙捉住啊！可别给他们捉住！)

这一整天没叫我们出工，星期一就像第二个休息日一样地过去了。(很好，那些人没有在星期六跑。他们想必是考虑到了不要

破坏我们的星期天休息吧！）

但是，他们是谁呢？是谁？

直到星期一晚上才传开来：跑掉的是格奥尔吉·滕诺和科利亚·日丹诺克。

我们砌的狱墙越来越高了。我们已经装好门上的横板。一个个小窗口也都砌好了。我们已经在墙上留出了上人字梁的位置。

逃跑发生后三天过去了。七天。十天。十五天了！

没有任何消息。

逃掉了！！

第四章

怎么会忍受？

我的读者中间有一位博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坐在自家的软椅上翻阅到我们建筑加强管制工棚这个地方时，摘下眼镜，用一个直尺之类的扁平东西啪啪地敲着书页，频频点头说：

“嗯，这个嘛，我倒相信。至于什么‘革命的微风徐徐吹’，那纯粹是扯淡！狗屁！你们这种人是任何革命也搞不起来的。革命必须符合历史的规律性才能成功。可是，现在把你们这几千名所谓的‘政治犯’单独挑出来了，结果怎么样呢？你们丧失了人的外观，丧失了人的尊严，被剥夺了家庭、自由、衣着和食物，可你们怎么样呢？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我们在挣自己的一份口粮吃。看，我们在建筑监狱呀！”

“这，很好。你们本来就该从事建设。建设嘛，总是对人民有利的。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出路。既然如此，老兄们，你们就别再自称是什么革命者了吧！要革命，必须同唯一先进的阶级相结合……”

“可我们现在不已经都是工人了吗？”

“说这些，没有用！这叫做强词夺理！什么叫做规律，你们

懂吗?”

规律吗？倒像是懂得。真的，我懂得。我懂得：既然这不计其数的、关押着千百万人的劳改营已经存在了四十年，那么，这本身也就该看做是某种历史的规律性。劳改营存在的年头过久，里面关押的以百万计的人数过多，以至于这一切都无法仅仅用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和贝利亚的狡黠奸诈来解释了。而且用那始终在先进学说光辉照耀下的执政党的轻信和天真也是解释不通的。不过，我并不打算用这一条规律性来开导我的论敌，因为他准会和颜悦色地、笑眯眯地对我说：“我们现在谈的不是这个，你离题了。”

可他呢，他以为我真是不大懂得规律性的。他有点性急，于是反面开始给我讲解起来：

“革命者曾经一举扫荡了沙皇制度。非常简单！可是沙皇尼古拉他能够这么做吗？他敢像对你们这样压迫当时的革命者吗?!让他试试给当时的革命者缝上号码布看！让他试试……”

“不错，沙皇并没有作过这种尝试。正因为他没有这样做，所以才使那些能够在他之后这样做的人保存了性命。”

“依我说沙皇也做不到这一点，做不到!”

看来，这倒也对。沙皇不是不想做这些，而是他做不到。

按照立宪民主党人（更不必说社会党人）的通常说法，整个一部俄国史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历史。鞑靼人的暴政，莫斯科大公的暴政，嗣后五百年本国的东方型的专政和根深蒂固百分之百的奴隶制。（没有过什么全俄缙绅会议或者农村公社，也没有过什么自由哥萨克或者北方的农民阶层!）不论是“可怖的伊凡”还是“最安分的阿列克谢”，是“严厉的彼得”还是“温和的叶卡捷琳娜”，甚至包括亚历山大二世，直到“伟大的二月革命”前的所有沙皇，都只懂得一件事：镇压。镇压本国臣民，把他们像小甲虫或毛毛虫似地踩死。臣民们被这个制度压得直不起腰，一切暴乱和起义总是被压得粉碎。

不过且慢！镇压确是镇压了。但也得打个折扣：它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高科技意义上的“粉碎”。例如，在十二月党人暴乱的方阵中站立过的全体士兵，四天之后都被宽恕了。（请比较一下：一九五三年在柏林，一九五六年在布达佩斯，一九六二年在新切尔卡斯克，我国士兵们遭到处决并非因为参加暴乱，而是因为不肯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参加暴乱的十二月党人军官被处死的只有五人。——这在苏维埃时代是可以想象的吗？这事要发生在我们今天，有一个能活的吗？

无论对普希金还是莱蒙托夫，都没有因为他们写了大胆的著作而判刑，也没有为托尔斯泰公开颠覆国家而动过他一根手指头。尼古拉一世向普希金问道：“如果十二月十四日那天你在彼得堡，那你会在什么地方？”普希金则直率地回答说：“在枢密院广场。”而为此，他被……放回家去了。然而，我们这些亲身备尝了我国司法机器之苦的人们，还有我们的检察官朋友们，却非常清楚地了解，要是在今天，普希金为了这样的回答应该付出什么代价——适用刑法第五十八条第二分条，以参加武装暴动论处！最从轻的判处也要适用第十九条（图谋暴动）。因此，即使不是枪毙，至少也要判十年徒刑。而且，确实有一些普希金式的人物去服刑了，被送进劳改营了，最后葬身在那里了。（像高峰派诗人古米廖夫那样的人，还没有到达劳改营就在地下室里报销了。）

克里米亚战争对俄国来说是所有战争中最幸运的一次，它带来的不仅是农民的解放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与此同时，它使俄国诞生了一种最伟大的力量——**社会舆论**。

表面上，西伯利亚的苦役地还在继续溃烂，还在继续扩大，似乎还建立了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还继续在把一批批囚犯送去，法院还在不停地判刑。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审判来，审判去，那个开枪重伤首都警察总监(1)的薇拉·扎苏利奇不是被……宣告无罪了吗？？……

(开释扎苏利奇的轻而易举，蜕变成后来在她的作案地点建造列宁格勒监狱大楼的轻而易举。)薇拉·扎苏利奇刺杀特列波夫用的手枪不是自己买的，是别人给她买的，后来还换成了一支大口径的。而法庭连问都没问：是谁买的？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按照俄国的法律，不认为这样的同谋者是罪犯。(要按苏联的法律，会立刻给这个人一个"顶头的"刑罚。)

我们知道，曾经发生过七次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谋杀未遂的案件(卡拉科佐夫[①]；索洛维约夫；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附近；在库尔斯克城郊；哈尔图林的炸弹；捷捷尔卡的地雷；格里涅维茨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彼得堡城里行走时(顺便提一下，他并不带保镖)，眼睛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像是一只被追猎的野兽"。(这有列夫·托尔斯泰提出的证明，他曾在一家私宅的楼梯处遇到过沙皇。)[②] 可是，怎么样呢？亚历山大二世干出了像基洛夫被刺杀后摧毁并流放半个彼得堡市那样的事吗？哪里的话？他连想都没有那么想！他采取了预防性的大规模恐怖手段吗？像一九一八年那种全面的恐怖？他抓了人质吗？他根本没有过这种概念。他把嫌疑分子统统关押起来了吗？没有，那怎么行呢?！……他处死了几千人吗？他只处死了五个人。这个时期被审讯判刑的总共不过三百人。(想想看，假如对斯大林哪怕只有一次这样的行刺的话，我们为此要付出几百万人的生命呢?)

一位叫奥利明斯基的布尔什维克写道，一八九一年他在整个克列斯特监狱里是唯一的一名政治犯。被转押到莫斯科后，他在

① 这里顺便提一下，卡拉科佐夫还有一个兄弟。他是曾向沙皇开枪的犯人的兄弟呀！用我们现在的尺度衡量一下看！可是在那个时代他受到的惩罚是："责令他今后把姓氏改成弗拉基米罗夫！"此外他无论在财产方面，还是在居住方面都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② 《同时代人回忆列夫·托尔斯泰》，国家文艺出版社，1955年，第1卷第180页。

塔甘卡监狱里也是唯一的政治犯。只是到了布蒂尔卡监狱后，在押往流放地之前才集中了他们几个人！……（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二月革命时，在敖德萨城堡监狱里发现了七名政治犯，在莫吉廖夫市发现了……三名。）

随着启蒙运动和自由文学的逐年发展，一种无形的、但却使沙皇们胆战心惊的社会舆论力量不断增长，沙皇们已经控制不住这匹骏马的缰绳，无法抓住它的马鬃了，而尼古拉二世更是落到了只能抱住马屁股和抓住马尾巴的地步。

他没有了采取行动的勇气。他和所有他的权臣们已经失去了为捍卫自己政权而战的决心。他们已经不是在镇压，而是轻轻一按就放手。他们总是左顾右盼，仔细听着舆论会怎么说。

尼古拉二世禁止在部队内部建立情报机构，认为这是对军队的侮辱。（因此当局谁也不知道在军队里正搞着些什么样的宣传。）所以只能在革命分子当中安插些瘪三似的情报员，依靠他们提供的那点单薄的情报。政府认为自己受着法律的约束，不能（像苏维埃时期那样）把所有可疑分子通通抓起来而不管具体的罪状。

请看大名鼎鼎的米留可夫这位立宪民主党的领袖，苏维埃政权已经搞了三十年，他还一直以他曾发出过“革命的风暴信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而自豪呢——这“是愚蠢还是背叛”？他在一九〇〇年出了一件不大的事：身为教授，他在大学生集会（教授参加学生集会！）上的演说中发挥了一种思想（听众里有大学生萨温科夫），即：如果当局不让步的话，革命运动的力学势必导致恐怖行动，但这还算不上怂恿，对吧？也不是“导向……的意图”吧？这无非是激进的自由派对恐怖行动（当它还不是针对他们的时候）的一种通常的癖好而已。这样，米留可夫被关进了施帕列尔大街的政治犯拘留所。（在他的住宅还抄出了一份新宪法草案。）他一迈进监狱大门，马上收到了同情者们送来的许多鲜花，糖果，食品。他当然还可以从公共图书馆借阅任何书籍。侦查用

的时间很短。——在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大学生刺杀了教育总长(在那次集会后两个月)，但是这丝毫没有加重米留可夫的案情。他在狱外等候宣判，只是不能住在彼得堡。那么是在哪儿呢？不过是在乌捷利火车站的另一头，这里已经不算是彼得堡了。他差不多每天都来彼得堡，或在文学基金会，或在《俄国财富》编辑部。在等候宣判期间他获准去了一趟……英国。终于宣判了：在克列斯特监狱关六个月。(在这里也少不了水仙花和从公共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但是他只蹲了三个月：根据克柳切夫斯基的请求（“科学需要他”），沙皇释放了他。(米留可夫后来称为“老专制君主”并且给他捏造了一个“背叛俄国”的罪状的，正是这个沙皇。)不久以后又放他去了欧洲和美国，在那里制造反对俄国政府的舆论。

二月革命的阴暗的精灵之一吉梅尔-苏哈诺夫一九一四年春天被“驱逐”出彼得堡，但仍让他用本来的姓名在农业部继续任职（他晚上常常住在自己家里，这就自不待言了)。

监狱总局局长马克西莫夫斯基一九〇七年是怎么遇刺身亡的？该局设在一座居民楼里，几乎没有警卫。傍晚下班以后马克西莫夫斯基毫无戒备地接见了一个要求见他的女人——就这样被她杀了。

警察厅长洛普欣把阿泽夫的秘密透露给了革命党，——在刑法典中竟然找不出如何审判他的条款，政府对于泄露国家机密竟然没有防卫的办法。(总算是依据某个类似条款给他判了刑，后来的律师们长期振振有辞地骂这场审判是“沙皇制度的可耻行径”。按自由派的意见，这件事根本没有什么可审的。)

当局这种怯懦的动摇不定的作法只能起到刺激自己的对手，调起他们的胃口的作用。

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认为监狱制度不会有什么来真格儿的事，对它已经轻视到这种地步，以至眼也不眨地刺杀了俄罗斯的智慧和光荣斯托雷平的博格罗夫被戴上手铐的时候竟然大声喊起来：

"你们把我弄疼了!"

监狱制度松懈到了什么程度，凭着一九〇七年基辅无政府主义者尤斯京·茹克的越狱计划就能判断出来（由于显然是博格罗夫的告密，越狱没有实行）：在法院（政治案!）的休庭时间，茹克（恐怖分子）到院子里上厕所，看押他的士兵当然是(!)不会跟他进去的（也不会在附近守着）。那里事先放着一包老百姓的衣服和一件拆卸镣铐的工具。(这竟然是可以在法院的院子里做的!)

当局对革命者的迫害，仅仅能使他们在狱中相识，给他们以锻炼，给他们头上罩上光环而已。我们现在可是有了一把比例尺，可以大胆地说，沙皇政府不是在迫害革命者，而是在珍惜地宠惯着革命者，从而导致自己的灭亡。凡是亲身体验过绝对万无一失的司法体系的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到沙皇政府的优柔寡断，软弱无力。

让我们在这里翻阅一下大家熟悉的列宁传记吧。一八八七年春天，列宁的亲哥哥亚历山大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死。[①]也就是说，列宁（也和卡拉科佐夫的兄弟一样）是谋刺沙皇的罪犯的兄弟。而他怎么样了呢？同年秋天，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却考进了喀山皇家大学，而且读的是法律系！这个事实难道不奇怪吗？

不错，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在同一年就被大学开除了。但那是因为他组织了反政府的学生抗议大会才被开除的。也就是说，

---

① 顺便提一下，当时在此案的侦讯过程中查明，列宁的姐姐安娜·乌里扬诺娃曾收到从维尔诺市拍来的一封暗语电报，内称“妹病危”，其含义是：“武器已启运”。尽管安娜在维尔诺市根本没有什么妹妹，但她收到这份电报后并未感到一点惊奇，反而不知为什么把电报转交给亚历山大了。很明显，安娜是同谋者。要是在今天，她无疑要被判刑至少十年。但是，当时却根本没有追究安娜的法律责任！在同一案件的侦查中还曾确认另一个叫安娜的人（姓谢尔久科娃，是耶卡捷里诺达尔市的一位教员）曾直接了解关于准备刺杀沙皇的事，但她却没有报告。要是在今天，她会怎么样？无疑是枪毙！可是，当时她实际上被判了什么刑呢？两年徒刑。……

一个谋刺沙皇的罪犯的弟弟又在煽动学生反对政府！如果在我国，在今天，他会怎么样？毫无疑问是枪毙！（其他人也得判二十五年或十年！）可是，只不过把他从大学开除了。啊，多么残酷！开除之后还要流放他！……到萨哈林岛吗？[1] 不，流放到他家住的村子科库什基诺村去了，而他每年夏天反正是要去那里的。他在流放中想工作，就给他工作的机会……叫他到原始森林去伐木吗？不，是叫他在萨马拉市实习律师业务。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几个地下小组的活动（以及进行反对1891年社会赈济饥民的活动）。在这之后他又以校外考生的资格通过了彼得堡大学的毕业考试。（真想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履历表怎么填的？特别处审查时在干什么？）

几年之后，这位最年轻的革命者再度被捕，因为他竟在首都建立了"解放斗争协会"。岂止如此！他还屡次向工人发表"唆使暴动"的讲演，起草传单。那末，逮捕后严刑拷打他了吗？折磨他了吗？根本没有。给他创造了从事脑力劳动的条件。侦讯期间他在彼得堡监狱里呆了一年多，人们给他送去几十本必要的书籍，他在这里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大部分。此外，他还（合法地，通过检察官！）从狱里把《经济问题探讨》一文寄给马克思主义的杂志《新语》。在狱中，他可以自己付钱按自己的饮食规定购买午饭，有牛乳，有从药房买来的矿泉水，家里还可以每周送三次菜来。（同样地，托洛茨基在彼得保罗监狱里也能够把他的不断革命论的初稿写了下来。）

可是，后来根据三人小组的判决把他枪毙了吗？没有。甚至没有判他监禁，而是判了流放。是流放到雅库特？是终身流放吗？？不，是到富饶的米努辛斯克州，而且只流放他三年。是给他戴上手铐，装在囚犯车里押解去的吧？噢，不！他完全和自由人一样

[1] 这里顺便提一下，当时在萨哈林岛上确实有流放的政治犯。但是，多少有点名气的布尔什维克（还有孟什维克）怎么会一个也没有被流放到萨哈林岛去过呢？

去的，临去之前，他自由自在地在彼得堡呆了三天，然后又在莫斯科游逛了几天：他还需要留下秘密指示、建立联络点、召集留下来的革命者们开会嘛！甚至还批准他“自费”去流放地，也就是说，他可以和自由的旅客一样乘车去。在去西伯利亚的路上(当然更不必说回来的路上了)，列宁一次都没有和犯人一起走过，也没有住过什么递解监狱。后来，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列宁又需要在图书馆工作两个月以完成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而且这本由流刑犯写的书竟然出版了，没有受到书刊检查机关的任何刁难！(用我们今天的尺度衡量一下看！）那么，列宁在那边远的乡村靠什么生活呢？他会找不到工作呀？他请求政府维持他的生活。结果，批准发给他的钱超过他的实际需要。尽管他的母亲经济上也是很宽裕的，他要的东西都能给他寄去。不可能有比列宁在其唯一一次流放中的生活条件更好的了。当时的物价极其低廉，发给他的钱足够买到有益健康的各种食物，有充足的肉食(每周一只羊)、牛乳和蔬菜，可以尽情地去狩猎。(列宁不满意自己的猎犬，人们就认真地考虑从彼得堡给他另送一只猎犬去。打猎时有蚊子咬，他就可以定制一副细软羊皮手套。)列宁在这里医治好了他的胃病和青年时期落下的其它疾病，很快就发胖了。他没有任何必须尽的义务，不承担工作和劳役。甚至他的妻子和丈母娘都不必劳累，因为每月付出两个半卢布就雇到了一个十五岁的农村姑娘把他家的全部粗活包下来了。列宁不需要靠任何稿酬生活，所以彼得堡方面几次邀请他担任一项有偿的文字工作，他都拒绝了。他写的文章和发表的作品都只限于那些能够树立他的著作家声望的东西。

他服满了流放刑期（他本可以毫无困难地“逃跑”，但为慎重起见他没有逃跑)。是不是自动地延长了他的刑期？改判他终身流放了吗？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违法的。期满后他被批准住在普斯可夫，只是不许他去首都彼得堡。但他可以去里加，去斯摩棱

斯克，并没有派人监视他。于是他便同他的朋友（马尔托夫）一起，带着一篮子秘密印刷品到首都去了，而且他们干脆取道检查特别严格的沙皇村（这是他和马尔托夫过于自作聪明了），结果，他又在彼得堡被逮捕。不错，这时他身边已经没有那只篮子了，但他还带着一封用隐影墨水写的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信里谈到筹办《火星报》的整个计划。但是宪兵们似乎不想自找麻烦：被捕人在牢房里呆了三个星期，信一直在宪兵们手里，可却没有把它显影出来。

那么他擅自离开普斯可夫这件事怎样了结的呢？像我们现在这样判了他二十年苦役刑？不，只有这三个星期的拘留就完事了！之后就彻底释放了他，他随即乘火车到俄国各地去，筹备推广《火星报》的地点。然后又到国外去筹备《火星报》本身的出版工作。（警察局发给他出国护照时也“没有看到有什么障碍！”）

而且，不止这些！他从国外的侨居地点也照样把关于马克思的文章寄交俄国百科全书（格拉纳特兄弟编的）编辑部，而且这篇文章居然被刊用了。[①] 还不只是这一篇呢！

最后，他在离俄国边境不远的奥地利的一个小地方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活动，而沙皇当局也没有秘密派遣一些“好汉”去把他偷偷活捉回来。其实，这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办到的。

沙皇对任何一个重要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迫害也都表现了类似的软弱无能和不坚定性（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不过，这里又有其它疑点了）。例如，一九〇四年在莫斯科搜查加米涅夫时没收了他的一些“诋毁性信件”。审讯时加米涅夫拒绝说明这些信的情况。也就完事了。于是，作为惩罚，把他遣送到……他父母居住的地方去了。

---

① 请读者设想一下，苏联大百科全书上假如收进一条由逃往国外的人撰写的关于别尔佳耶夫的条目，该会怎么样！

的确，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迫害要严酷得多。但到底严酷到什么程度呢？难道格尔舒尼（一九〇三年被捕）和萨温科夫（一九〇六年被捕）的罪行还轻吗？他们组织领导了对俄罗斯帝国最显要人物的谋杀。但是，并没有处死他们。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打死的仅仅是一名五品文官（而且整个欧洲还掀起了一场保卫她的浪潮），那更是如此了——不敢处死她，只好把她流放了。[①]假如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又是唐波夫！）农民起义的镇压者被一个十七岁的女中学生打死了，那么在“回击”的红色恐怖浪潮中不经审判而就地处决的中学生和知识分子会有几千呢？

俄国海军基地（斯维亚堡）的暴乱造成了几百名无辜士兵的死亡，为这件事枪毙了三十八人，另有八百人被判刑。（其中几个人二月革命时在传说得神乎其神的泽林图伊苦役地获释——这次革命时在那里总共才发现了二十二名政治苦役犯。）

那么对一九〇一年在彼得堡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大学生们是怎样惩罚的呢？据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回忆说，当时彼得堡的监狱里简直就像大学生们在举行郊游野餐一样，学生们笑语喧腾，一起唱歌，随便在牢房之间串来串去。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竟然要求监狱长准许他去看一场艺术剧院的巡回演出：他说，不然，票就白白浪费了啊！后来判他“流放”，流放到什么地方？根据他自己的选择到辛菲罗波尔去，这样他就可以背着背包在克里米亚到处游逛了。

阿里阿德娜·特尔科娃在回忆这同一个时期时写道：“对我们

① 二月革命把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从苦役中解放出来。可是一九一八年以后却又几次被契卡逮捕。她辗转于多年的社会党人“大牌阵”中，先后被流放到撒马尔罕、塔什干、乌发等地。后来在某个政治隔离所里消失了——她在某地被枪决（传说是在奥廖尔）。西方出版了一本关于斯皮里多诺娃的书，里面有一些照片：他们那些慷慨激昂的革命者都在撒马尔罕流放地过着苏维埃式的穷愁潦倒的生活——怎么样，他们现在不逃跑了吧？……

这些受侦查的人，管制并不严格。”宪兵军官们向受侦查人提供从最好的“多顿饭店”买来的午餐。另一位喜欢深入钻研的民意党人评论家布尔采夫证实：“彼得堡的监狱比欧洲的监狱要人道得多。”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曾起草号召书，号召莫斯科的工人们举行武装（!）起义以推翻（!）专制制度。为此他被……关在牢房里整整十五天！（他本人也觉得太少了，所以他自己加了刑：三星期。）我们来看看他当时的一段日记吧。①

“单身牢房！不过，没什么，也并不十分糟糕。我铺好了床，把小板凳挪过来，摆好灯，放好香烟、梨……边读书，边吃梨，完全和在家里一样……满有意思。确实有意思。”“先生！喂，先生！”狱卒这样招呼他吃饭。他手头有许多书，还有从邻室传来的条子。

总之，安德烈耶夫承认，从居住条件和饮食方面来说，牢房的生活并不比他当年的大学生活更差。

这个时期，高尔基在特鲁别茨要塞监狱里写完了他的剧本《太阳的孩子》。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退潮以后，许多活动分子，如季亚奇科夫-塔拉索夫和安娜·拉克之流，并未坐等逮捕，纷纷出了国，——二月革命以后他们一个个英雄似地回来，主宰国内的新生活了。这样的人有好几百。

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部门以“格拉纳特”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的形式出版了一套相当厚颜无耻的自我吹嘘，题为“苏联及十月革命的活动家们——自传和传记”。随便把其中哪一篇拿来一读，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你都会感到惊奇：他们既然进行革命工作，怎么竟然会逍遥法外？特别奇怪的是他们在狱中的监禁条件怎么会那么好?！例如，关于克拉辛的条目里写道：“他回忆起在塔甘

---

① 引自В·Л·安德烈耶夫著《童年》一书。

卡监狱里的情景总是感到满意。经过最初几次审讯之后，宪兵们就不再麻烦他了。(可这是为什么呢？——作者注）于是他把这不自由的闲暇时间全部用来顽强地做一件事：他学会了德语，读完了席勒和歌德的几乎全部原版著作，读了叔本华和康德的书，认真研究了穆勒的逻辑学、冯特的心理学……”等等。克拉辛自选的流放地是伊尔库茨克，即西伯利亚的首府，西伯利亚文化最发达的城市。

拉迪克在一九〇六年被投入华沙监狱，“他被关了半年，日子过得非常好。他学习俄语，阅读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的著作。在狱里写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而当他（在狱中）收到一期刊有自己文章的考茨基主办的杂志时，感到十分自豪。”

或者，举个相反的例子吧。关于谢马什科的一条里有这样的话：“监禁（在莫斯科，一八九五年）是非常令人痛苦的”；蹲了三个月监狱之后，他被判流放三年，流放到……自己的故乡叶列茨去！

是那些在监狱里骨头变软了的人们，诸如帕尔武斯之流的政客，为了向沙皇专制报复，才会以那种充满感伤主义美丽辞藻的夸张的回忆录描写沙俄的监狱，在西方制造了所谓“恐怖的俄国巴士的狱”的美名。

从数以千计的小人物的单独传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例如，我手头就有一部百科全书，不过，它不很合适：是一部《文学百科全书》，比较陈旧（一九三二年版），里面还“包含着错误。”现在，趁着这些“错误”还没有被清除掉的时候，我姑且取一个“K”字母为例，举几个以“K”字母起头的人名看一看吧。

卡尔片科·卡雷。他是伊丽莎白格勒市的市警察局（!）的秘书，可他却向革命者提供护照！（把这句话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护照科的工作人员替非法组织弄护照。）为此他……被处绞刑了

吗？没有。他被判流放……五（!）年，流放到……他自己的田庄去了！也就是说等于到别墅去了。后来他成了作家。

基里洛夫·B·T。他参加过黑海舰队水兵的革命运动。枪毙了吗？判了他终身苦役吗？没有。他被判流放到乌斯特-塞索尔斯克三年。他后来也成了作家。

卡萨特金·И·M。他在监狱里服刑，同时在写短篇小说，而且报纸上居然发表这些小说！（我们这里连刑满释放者写的东西也一概不予发表。）

卡尔波夫·叶夫季希曾经被流放两次（!）。后来却还是委以重任，让他领导亚历山大皇家剧院和苏沃林剧院。（如果在我们这里，第一，不允许他在首都落户；第二，恐怕特别处连个在剧院提示台词的角色也不会让他当吧。）

克日扎诺夫斯基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最高潮中，从流放地回来（他仍然是秘密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立即毫无阻碍地展开了他作为工程师的业务活动。（在我国，如果他能在农机站当个钳工就算走运了！）

虽然《文学百科全书》没有把克雷连科作为一个条目收进去，但既然说到用“K”字母起头的名字，提一提克雷连科总是公正的吧。他曾经热情地从事革命活动，曾先后三次“幸运地逃脱了逮捕”，[①] 而其余的六次逮捕总共坐了十四个月的牢。一九〇七年（又是一个反动年头！）他被控在军队中从事煽动并参加军事组织，结果被军区（!）法庭……宣告无罪释放了！一九一五年克雷连科被控“逃避服军役”（当时正在进行战争，而且他是军官呀），可是他这个未来的军事统帅（和想“谋杀”另一位军事统帅的凶手）受到的惩处是……把他派往前线部队（可绝非惩戒营！）去了！

---

① 此处和下面均据克雷连科的自传，见《格拉纳特百科全书》（俄文版）第41卷第1册，第237－245页。

(沙皇政府指望这样既可以战胜德国人，又可以扑灭革命……）就这样，在他那未被剪断的检察官羽翼的保护下，在多次审判中许多应该被判脑后吃一颗子弹的人竟然能够苟活了十五年之久。

在同一个“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库塔伊斯的省长B·A·斯塔罗谢利斯基曾经直接向革命者提供护照和武器，把警察局和政府军队的计划泄露给革命者。可是他为此只被监禁两星期就完事了。[①]

谁有足够的想象力，就请把这个情况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语言吧！

就在这“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思想》却可以合法地照常出版。而“反动的”《路标》论文集里也可以公然登载这样的话：“病入膏肓的独裁制度”，“专制和奴隶制的罪恶”。没有什么，这类话我们今天能说！

那可是个确实令人无法忍受的严厉的时代呀！雅尔塔市一家照像馆的修像师B·K·亚诺夫斯基画了一幅反映枪决奥恰柯夫起义水兵的画，并把它挂在照像馆的橱窗里了。（比如说，就像现在把描绘新切尔卡斯克镇压行动的图画展览在莫斯科铁匠桥大街一样。）对于这件事，雅尔塔市市长怎么办了呢？因为沙皇的庄园——里瓦基亚近在咫尺，所以他对此事的处理也特别残酷：首先，他冲着亚诺夫斯基大发雷霆，喊叫了一通；其次，他烧毁了……烧毁了亚诺夫斯基的照像馆吗？不是的，也没有烧毁那张描绘枪决事件的原画，而是烧毁了那张画的复制品。（人们会说：亚诺夫斯基真机灵！可我们还应该指出：市长也并没有命令当场砸碎照像馆的橱窗呀！）最后，亚诺夫斯基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虽然允许他继续住在雅尔塔，但在皇族成员路经此地时禁止他到大街上来。

---

① 见《新世界》杂志，1966年第二期所载《省长同志》一文。

民粹派评论家布尔采夫侨居国外时，甚至曾在一家侨民办的杂志上诋毁过沙皇的私生活。可是当他回到祖国俄罗斯（一九一四年，那正是爱国主义高潮时期）以后，他被沙皇枪毙了吗？没有。只不过蹲了不到一年的监狱，而且狱中还对他优待：他可以得到书看并从事写作。

阿布拉姆·戈茨在那次战争期间则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并且在那里领导着一份齐美尔瓦尔德派即反战派的报纸。

既然让斧头任意砍，斧头就会砍到自己人身上。

"工人反对派"领袖，世代的金属工业工人什利亚普尼科夫一九二九年第一次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时，可就"没有与工人来往的权利"了，甚至没权利担任他想干的工人的职务。

大闹第二届国家杜马（辱骂俄国军队）的孟什维克祖拉博夫都没被赶出会场。然而他的儿子从一九二七年以后就没有走出过苏联的劳改营。这就是两个时代的比较。

当图哈切夫斯基将军像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镇压"的时候，当局不仅摧毁了他自己的家庭，把他全家人都关进监狱（更不必说他女儿被大学开除了），而且还逮捕了他的两个兄弟和弟媳，逮捕了他的四个姐妹和姐夫、妹夫，还把他的甥男侄女统统赶到保育院去，强迫他们改了姓，有的改姓托马舍维奇，有的改姓罗斯托夫，等等。图哈切夫斯基的妻子在哈萨克斯坦集中营里被枪杀，他的老母亲在阿斯特拉罕沿街乞讨，倒毙街头。[1] 另外几百名被处死的知名人士的亲属也都遭到相同的命运。这才叫做迫害呢！

沙皇时代的迫害（其实是"非迫害"）的主要特点，大概就是

---

① 我引用这个例子，只是为了图哈切夫斯基的亲戚，为了那些无辜的亲戚。至于现在已经成为人们新的崇拜对象的图哈切夫斯基本人，我无意支持他。他的下场正是他在镇压喀琅施塔得和唐波夫省的农民起义时所播下的种子结出的果实，他自食其果。

革命者的亲属丝毫没有受到牵连。娜塔利娅·谢多娃（托洛茨基的妻子）一九〇七年还能够自由地回到俄国来，当时托洛茨基已是被判刑的罪犯了。乌里扬诺夫（列宁）一家的任何一个成员（他们在不同时期几乎全都被捕过）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出国护照。当列宁因号召武装起义而被"通缉"时，列宁的姐姐安娜还能够合法地按期给列宁往巴黎汇款，汇到"里昂信贷银行"他的户头下。列宁的母亲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两人的丈夫都曾是沙皇政府的三等以上的文官或军官，所以她们两人都曾终身领取沙皇政府的高额抚恤金。对她们进行迫害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列夫·托尔斯泰才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似乎不需要政治上的自由，需要的只是道德上的完善。

当然，对于那些已经享有自由的人来说，自由是不再需要的。这一点，我们也同意，因为归根结底并不是为了政治自由嘛！人类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某种空洞的自由。甚至不在于某种成功的社会政治制度。对吗？问题当然在于社会的道德基础。但是，这到最后才是如此。那么，开始阶段呢？第一步呢？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那雅-波良纳在当时成了公开的思想俱乐部。可是要把这个地方也像列宁格勒的阿赫马托娃的住宅那样用军警包围起来，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件；或者让那些人们也受镇压，像我们在斯大林时期所遭受的那样，使得三个人不敢集在一间屋子里谈话的话，那么，大概托尔斯泰也会起来要求政治自由的。

在"斯托雷平恐怖政策"是猖獗的时候，自由派报纸《罗斯》还能够毫无阻碍地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五名处死！……在赫尔松二十人被处死刑！"看到这些消息后，托尔斯泰号啕大哭，声称：活不下去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①]

① 《同时代人回忆列夫·托尔斯泰》，1955年俄文版，第2卷第232页。

还有前面提到的《往事》杂志上的统计表：六个月中处死刑者九百五十名。[1]

就以这一期杂志为例吧。我们注意到，它的出版日期（一九〇七年二月）正是在为期八个月（自一九〇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一九〇七年四月十九日）的斯托雷平“军事司法”统治最猖獗的时期中，而它的统计所依据的资料则是俄国电讯社的铅印资料。想想看，假如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报纸登出了被枪决者的名单并发行一个资料汇编的话，内务人民委员部那双从不杀生的素食者的眼睛大概就得眨巴眨巴了吧。

其次，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持续了八个月的这个“军事司法”时期之所以未能继续实行下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那所谓“没有实权的”、“唯命是从的”国家杜马没有批准这种司法制度的缘故。（斯托雷平甚至没敢提交国家杜马审议。）

第三，当时提出实行这一“军事司法”制的理由，是因为前半年中发生过“无数起由于政治原因杀害警察官员的事件”，许多官员遭到袭击，[2]直到在阿普切卡尔岛上发生爆炸事件，自由斗士们在那里一次就炸死和重伤了60人。因此“如果国家不对这些恐怖行动及时予以还击，那就不成其为国家了。”斯托雷平政府忍无可忍了。它又不满于实行陪审制的法院那种从容不迫的迂阔之论和律师力量的无限强大（当时的法院和律师们可不像我们现在的州法院或军区法庭那样接到某人一个电话指示就会俯首听命），因此，政府就急于要通过语言不多、直截了当的战地法庭来制止那些革命者。（简直就是土匪——他们竟向客运列车的窗口开枪，为了三五个卢布杀死普通居民。）（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些节制：只有在处于战时状态或实行非常保卫措施的地区才能成立战地法

① 《往事》杂志，第2/14期，1907年2月出版。

② 《往事》杂志上的同一篇文章（第45页）也并不否认这些事实。

庭，而且只有在罪行刚刚发生后不久，即在不超过一昼夜的时间内，在犯罪行为有确凿见证的情况下才能开庭。）

既然这种作法使当时的人们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那就是说这种作法对当时的俄国来说已经是很不寻常的了！

在一九〇六——九〇七年的情势下，很清楚，对于出现那段“斯托雷平恐怖时期”的责任应该由内阁和实行恐怖主义的革命者们共同担负。

今天，在俄国的革命恐怖诞生了一百年之后，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采取恐怖手段的念头和这类行动都是革命者犯下的极严重的错误，是俄国的灾难，它除了混乱、痛苦和超过必要限度的牺牲之外，没有给俄国带来任何东西。

让我们把同一期杂志再翻几页看看吧。① 这里刊载着一八六二年最早期的一张政治传单，一切就是由此开始的。传单上写着：

“我们要求什么？要求俄国的福利和幸福。要获得新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拖延，我们需要快速的，急剧的变革！”

这是一条多么错误的路线啊！当时那些热心者没有时间拖延，因而他们就想用牺牲（可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别人的牺牲）来加速普遍福利的到来！他们没有时间拖延，因此我们，他们的曾孙辈们，今天，在经过一百零五年之后，却不仅不是在（解放农奴的）原地踏步不前，反而是大踏步倒退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恐怖主义者是斯托雷平战地法庭的超前的伙伴。

在我们看来，斯托雷平时期和斯大林时期两者不能比拟之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残杀是单方面的——仅仅因为某人长叹一口气，甚至连叹气都算不上的一点小事，就可以砍掉

---

① 《往事》杂志，第2/14期，第82页。

他的脑袋[①]。

托尔斯泰不是惊叹"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吗？其实，比这更可怕的事是一点也不难想象的。有比这更可怕的事，那就是：不是时而在某个众所周知的城市中处死一些人，而是每天到处都在处死人；不是一次处死二十人，而是二百人成批地处死；关于这些事，报纸上非但不用大字标题登，也不用小字标题登，报纸反而在报道"生活比以前更美好了，生活比以前快乐了"！

这是打烂了别人的嘴脸，还要硬说：他原来就是个烂嘴脸。

不，原来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的。尽管当年公认俄国在欧洲算是最压迫人的国家。

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学发展，使人类对于进行压缩的可能性有了进一步认识。我们的祖先曾经认为地球表层，我们脚下的大地本身，已经是被极度压缩的了。可是，现代物理学家却把地表解释为几乎好像是一个多孔的筛状物。放在一百公尺见方的空旷处的一小粒霰弹——这就是原子的模型。人们又发现了奇异的所谓"核填装"：就是把这些霰弹的核从一切空旷的一百公尺见方的地方驱赶到一起去。这样填装起来的顶针那么小的东西就会有火车头那么重。但是，即使这样的填装也还是很像一根绒毛那么松的，因为由于阳质子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把核完全压实。而如果能单纯地把中子压缩在一起的话，那么像一枚邮票大小的这种"中子填装"就会有五百万吨重！

不，当局甚至根本无须借助什么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就对我们进行了压缩。

他们通过斯大林的口，向全国发出了一个永不更改的号召：不

① 我敢说，即使按所出动的武装讨伐队而言（它们是从不开庭审判的），我们这个时代也在规模和技术上远远超过了沙皇时代。（请看 1918—1919 年对农民的镇压，1921 年在唐波夫省的镇压，1930 年在库班和哈萨克斯坦的镇压。）

要发善心！可是，“善心”（благодушие）这个词在达里的俄语详解辞典里的解释却是：“心地的良善、心灵的友爱本性、仁慈、对共同福利的关注。”看吧！这就是斯大林号召我们必须丢掉的东西，我们确实也就匆匆忙忙地把善心丢掉了：丢掉了对共同福利的关注！我们变得只满足于守着自己的饲料槽。

本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舆论曾经构成一支惊人的力量，构成了自由的空气。沙皇专制制度的被粉碎，不是在彼得格勒发出二月怒吼的时候，而是比这早得多！俄国文学中早已形成了一种定见，认为：勾画一个宪兵或警士的形象时多少带一点点同情，就等于是黑帮分子的阿谀奉承。早在这种定见形成的时候，沙皇制度实质上已被无可挽回地推翻了。当人们认为不仅同宪兵和警察握手、和他们相识、在街上向他们点头致意是自己的耻辱，而且连走在人行道上衣袖被他们擦一下都是耻辱的那个时候，沙皇制度实质上就已被推翻了！

如今，在我国，那些失业的刽子手们竟被特别委派来领导……文学和文化工作了！他们下令歌颂他们自己，把他们歌颂成传奇式的英雄。不知为什么这一切在我们这里竟称为……爱国主义！

社会舆论！我不知道社会学家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什么，但我清楚地知道，它只能是由能够自由地表达、完全不受政府或党的意见左右的、能够互相影响的个人意见所组成。

只要我国国内一天没有独立的社会舆论，就不会有任何保障能使无缘无故消灭几百万人的暴行不再重演，就不会有任何保障使这类事情不在某一天夜里，不在任何一个夜里，不在今天白昼过后的第一个夜里重新开始。

我们已经看到，**“先进学说”**并没有能够保护我们免遭这种瘟疫。

不过，我已经看见我的论敌在朝着我撇嘴、使眼色、并连连

摇头了：第一，当心你的话会被敌人听见！第二，何必如此夸大其辞呢?！要知道，问题的范围本来是窄得多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把你们抓进了监牢？也不在于为什么外界人士竟会容忍这种违法行为。人所共知，他们原来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他们不过是相信党的话啊（这是二十大以后的惯用语）；他们不过是听话而已。既然说要把整个民族在二十四小时内迁到边远地区，那这些民族的人一定是个个有罪喽！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当你们这些人已经身处劳改营内的时候，你们总该想到这些了吧?！那么，你们为什么还在那里忍饥挨饿，弯腰折背，忍气吞声，而不进行斗争呢?！他们，那些没有被武装士兵押解的、手脚可以自由活动的人们，没有进行斗争是情有可原的，他们总不能把家庭、社会地位、薪金、稿费等统统牺牲掉嘛！！是的，正因为这样，他们今天才有可能发表批评性文章，指责我们，怪我们当时处在没有什么可丧失的情况下为什么竟会抱住自己那份口粮不放，而不进行斗争。

恰好，我也正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在劳改营里忍受，就是因为外界没有舆论。

一个囚犯要想反抗强加于他的制度，他通常能想得出哪些可用的办法呢？不外下面几种吧：

1）抗议；

2）绝食；

3）逃跑；

4）暴动。

可是，正像那个死人常说的那样，“谁都晓得”（如果不晓得，那也能够想法使你晓得）前两种办法只是有了社会舆论的支持才有力量（监狱官才怕它）！如果没有社会舆论支持，人们对于囚犯的抗议和绝食只会报以嘲笑！

像捷尔任斯基那样在监狱长面前撕碎自己身上的衬衣，从而

争取达到自己的要求，当然是很有戏剧性效果的。但那也只是在社会舆论支持的情况下才行。没有舆论支持，人们就会用个什么东西把你的嘴一堵，然后还得叫你赔偿公家的衬衣！

这里不妨回忆一下十九世纪末期在卡里苦役地发生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当局向政治犯们宣布：从今以后对政治犯可以施行体罚，而政治犯娜杰日达·谢格达要第一个受到笞刑（因为她打了警卫队长一记耳光，想以此来……逼他退休）。于是娜杰日达·谢格达立即服毒自杀了，她宁死也不愿受到狱吏的树条抽打！继她之后，另外三名妇女也服毒自杀！男监里十四名男囚犯也要自杀，有些人自杀未遂。[①] 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完全、永远地废除了对犯人的体罚。当时政治犯们的想法是：恐吓监狱当局。因为他们相信关于卡里苦役营里的悲剧终究会传遍俄国，真象会大白于全世界的。

但是，假如让我们这些囚犯来衡量一下这个事件，我们只会洒下几滴轻蔑的眼泪。打自由人警卫队长一记耳光？何况还不是他侮辱了你本人？就算是他朝你的屁股踢了两脚，那又有什么了不起？你总可以活下去嘛！为什么几位女伴也要跟着她服毒呢？为什么还有十四个男人也跟着干？生命不是只给予我们一次吗？重要的不是结果吗？我们有吃的、有喝的，为什么要和生命诀别？也许会赶上大赦呢！说不定会被提前释放呢！

看！我们已经从政治囚犯的高度滑到了什么地方！跌落到了什么地步！

同时，我们那些狱吏们却上升到了什么高度啊！不，他们可

---

① 这里顺便交代几个重要的细节。根据 E·П·科瓦利斯卡雅著《女苦役营》（革命历史图书馆，国家出版社，1920 年版第 8－9 页）和 Г·Ф·奥斯莫洛夫斯基著《卡里苦役营的悲剧》（莫斯科，1920 年版），谢格达当时打了一个看管监狱的军官并且唾了他的脸。她这样作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由于苦役犯们的“精神病态”造成的。在这之后，宪兵军官（马休科夫）请求政治苦役犯（奥斯莫洛夫斯基）对他进行审判。苦役营长官（博布罗夫斯基）悔恨而死。（啊！要是给我们也派这么几个有良心的看守人员该多好！）

不比卡里苦役营的那些笨蛋！即使我们现在挺起腰杆来，想要升天（四个妇女再加上十四个男人），他们也会在我们弄到毒药之前把我们全部枪毙掉。（何况，在苏维埃的监狱里上哪儿去弄毒药呢？）如果有谁真的服毒自杀死了，那也不过只是减轻监狱当局的负担而已，同时，其他犯人则会因为没有告发而受到鞭刑。而且，当然，关于这事的消息甚至传不到狱墙外面。

问题就在这里。这帮人的力量也就在这里。就因为消息传不出去！即或传了出去，也传不远，它会是一个微弱、暗哑的声音，得不到报纸的证实，眼线们会到处追根；因此，等于什么也没有。绝不会出现什么社会舆论的愤慨！既然如此，怕什么？有什么必要去听取囚犯的抗议？谁想服毒吗，那你就服毒好啦！

关于我们的每次绝食都遭到失败的情况，我在第一部里已经谈过了。

那么，逃跑呢？历史为我们记载了沙皇时代的几次越狱逃跑的严重事件。我们看到，每次逃跑都是在外面的人，即其他革命者或逃跑者同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在许多细节上还得到了广大同情者的帮助。不论逃出监狱本身，还是逃出后隐藏或偷渡的过程，都得有许多人从旁协助。（“噢，对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可算找出我的破绽了。“那是因为老百姓支持革命者！支持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嘛！”“可是，”恕我反驳一句：“是不是也还因为那样做只是一种不会承担罪责的有趣游戏呢？从窗口向逃跑者挥动几下手帕，让他在你的卧室里过夜，替他化装，这算什么？那个时代并不会为此受到审判呀！彼得·拉夫罗夫从流放地逃跑了，而沃洛格达的省长（霍明斯基）还给拉夫罗夫的自由同居的妻子发了证件，允许她去追赶自己心爱的人……那个时代，甚至伪造护照的人也不过被‘流放’回自己的家乡去。当时人们并不害怕什么。您凭亲身经验应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顺便问一句：

“您怎么会没蹲过监狱呢?”“噢，这个嘛，也算运气吧……”[1]

不过，也有另一方面的证明。我们大家在中学时都不得不读高尔基的《母亲》。可能有人还记得那里所描写的尼日戈罗德监狱的生活吧：看守们的手枪都生锈了，他们用手枪当锤子往墙上钉钉子。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梯子倚在墙上，安安稳稳地到狱外去。再看看一个叫拉塔耶夫的高级警察官员是怎么写的吧：“流放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监狱根本就不存在。在当时的监狱制度下，落到狱中的革命者可以毫无阻碍地继续他原先的活动……基辅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被关在基辅监狱里，可他们照样在领导着基辅市的罢工斗争，并且还从狱里发出呼吁书。”[2]

目前，我没有可能搜集有关沙皇时代主要苦役营地警卫情况的资料，不过，我倒也没有听说那时曾发生过像我们这里那样的只有十万分之一成功希望的绝望的逃跑。显然，当时的政治苦役犯并未感到有必要去冒险：他们没有受到由于繁重劳动体力衰竭以致过早死亡的威胁，也没有无缘无故延长刑期的威胁，服过一半刑期后，他们还可以到流放地去服后一半刑期，他们打算逃跑的话，推迟到那个时候再跑也不迟。

---

① 伊·爱伦堡的解释。

② 见《往事》杂志，在2/24期，1917年，Л·A·拉塔耶夫写给Н·П·祖耶夫的信。信中接着谈到整个俄国的情况，监狱外界的情况：“任何地方都没有（首都除外——作者注）密探和雇佣的暗探。必须进行监视时，由宪兵换上便服去执行。但是，这些宪兵换便衣时往往忘记取下皮靴上的马刺……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只须转移到首都以外的地方去活动，就足以使警察局对他们的行动一无所知了。这样，就建立起了一些真正的革命据点和培育宣传鼓动员的苗圃……”

我们的读者会清楚地看到，这与苏维埃时代多么不同。社会革命党人叶戈尔·萨佐诺夫扮成一个拉散座的马车夫，把炸弹藏在马车的挡板下面。他在（内政部）警务司的大门口（!!）呆了一整天，想伺机刺杀部长普列夫。可是竟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谁也没有去盘问他！另一个社会党人卡里亚耶夫当时还没有经验，他紧张，在方坦卡的普列夫私宅旁边守了一天。他心想，自己准会被抓起来。但也没有人碰他一下！啊，那可真是克雷洛夫童话般的时代！照那样干革命是并不困难的。

看来，只有那些懒得逃跑的人才没有从沙皇的流放地逃跑。显然，警察局也并不要求经常去汇报，监视并不严格，路途上没有设行动人员哨所，劳动地点也并非每天都有警察。囚犯们手里有钱（或者可以寄来钱），流放地一般距大河和大路不太远。还有，在那时帮助逃犯的人并不冒任何危险，而逃亡者本人即使被抓回去也不会像我们这里似的被枪决、被毒打；也没有再加判二十年苦役的危险。那时候逃跑被抓回的人一般都送回原地，刑期照旧。如此而已。这是一场只会赢、不会输的赌博。法斯坚科逃往国外（见第一部第五章），就是这类情况中有代表性的事例。比他更加典型的，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者 A·H·乌兰诺夫斯基从图鲁汉斯克边区逃跑的事例。他逃到基辅，随便走进大学生的阅览室，声称要索取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什么是进步？》一书，于是大学生们立即招呼他吃饭、留他住宿，还给了他路费。他逃出国外的情况是这样的：随便登上一艘外国轮船的舷梯就上船了，（要知道，那里并没有内务部的哨兵在守卫嘛！）上船后他就在锅炉房里一蹲。不过，更妙的是：他在一九一四年战争期间又自愿回到俄国，回到了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把他当作外国派回来的间谍了吧？枪毙？“快坦白吧，败类！他被什么人收买啦？”都没有。调解法官对他的判决是：由于逃跑到国外三年，判罚款三卢布或拘留一天！当时，对乌兰诺夫斯基来说三个卢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所以他选择了一天拘留。

格尔丰德-帕尔武斯，毁灭性的《财政宣言》（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作者，一九〇五年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实际指导者……被五马分尸了吗？没有，他被判处流放图鲁汉斯克边区三年，半道上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就曾有机会跑掉（放犯人们进城购买食品，列夫·杰伊奇一去不回，帕尔武斯慢了一步）。他到了叶尼塞斯克，在那里才把唯一的一个押送士兵灌醉，自己溜走了。他不得不换上庄稼人的衣裳，沿叶尼塞河多走一段回头路，庄稼汉的

环境，肮脏，跳蚤，使他受了一些罪。以后他仍住在彼得堡，以后到了国外。

而我们的逃跑——从乘破旧的小船渡海或躲在原木货舱里逃出索洛维茨群岛开始，到豁出性命、丧失理智、毫无希望地冲出斯大林晚期劳改营（本书有几章专讲这些事）为止，——我们的逃跑是巨人们的行动，但这是必遭灭亡的巨人们的行动。革命前的逃跑从来没有表现过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想象力，这样的意志，但很容易成功，而我们的逃跑则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

“那是因为你们的逃跑按其阶级本质来说就是反动的！……”

一个不愿再当奴隶、不愿再当牲畜的人振臂奋起，企图逃跑，难道他的这种激情竟会是反动的吗？

逃跑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逃跑过程的后几个阶段的成败取决于普通居民对此所抱的态度。而今天我国的居民是不敢帮助逃亡者的，甚至（出于自私动机或者由于思想认识的原因）还要出卖逃亡者。

这就是我们社会的舆论！……

至于囚犯的暴动，像劳改营里那样有三千人、五千人、八千人参加的暴动，在我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还从来没有先例。

而我们却有过。

可是，还是由于同样的邪恶力量的作用，我们所作的最大努力、最大牺牲所带来的只是最微不足道的成果。

那是因为整个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条件。因为如果没有社会舆论的支持，即使在最大的劳改营里的暴动也不会有任何进展。

因此，对于我们“怎么会忍受的？”这个问题，现在可以作出回答了：就连我们也并没有忍受！读者下面就会看到：我们绝对不是

一直在忍受的。

我们确实在特种劳改营里举起了政治犯的大旗，并且确实成了当之无愧的政治犯！

第　五　章

铁板下的诗篇，岩石下的真理

刚踏上劳改营的道路时，我总想躲避一般劳动，但苦于无计可施。关押的第六个年头我来到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这时却恰恰相反，我决定完全从脑子里清除一切有关劳改营的念头，不再注意这里的关系和形势，也不去考虑对策了，因为这些想法妨碍我的头脑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这样，我就不再像一个壮工那样苟且偷安地生活了。许多有教养的人们在迫不得已时正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好好干活，指望被挑选出去当个看守的杂役。不过，我倒是愿意在这苦役营里学会一种手艺。在巴拉纽克的作业班里，我和奥列格·伊万诺夫有了学手艺的机会：我学当砌石工。其实，由于命运的安排，我还当过翻砂工呢。

起初，我曾有过一些担心和动摇：这样做对吗?我能受得了吗?像我们这样过去从事脑力劳动、缺乏适应能力的人，即使干同样的活儿也要比别人困难得多吧？但是，恰恰是从我自觉地降到底层、并感觉到自己两脚站到这个布满石块的牢固的共同底层上的那一天，才开始了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代，这些年代最后形成了我的性格特点。如今，不论我的生活还会发生什么向上或向下的变化，

我都会对自己在埃克巴斯图兹形成的习惯和观点信守不渝。

我之所以需要一个清除了杂乱琐事的头脑，是因为我开始写叙事诗已经有两年了。作诗给我以极高的奖赏，它使我不大留心人们怎样对待我的躯体了。有时候，走在垂头丧气的囚犯行列中，在冲锋枪手的吆喝声下，我会感觉到新的诗句和形象涌上脑海，我仿佛在行列的上空飞翔；我盼望着：快点，快点到达施工地点吧，我好找个角落把这几句诗记下来。每逢这种时刻，我感到既自由，又幸福。[①]

但是，在特种劳改营里怎么能写诗呢？柯罗连科讲过他自己在监狱里也曾从事写作。但他那时的监狱里是怎样看管的呀！他是用铅笔写的，（为什么没有摸遍衣服的第一处折边，搜走他的铅笔呢？）铅笔是他藏在卷曲的头发里带进来的，（为什么没把他的头发剃光？）他是在嘈杂声中从事写作的。（快道声谢谢吧，因为你还有地方坐下来，把腿伸开写字呢！）何况此外还有优待：他可以保存自己的手稿，然后把它送出狱外。（这点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无法理解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劳改营里，即使是在生活区的工棚里也不能这样写东西！（甚至你想为未来的小说拟几个人物名字也异常危险：是黑组织名单吧？因此，我只能把姓名的字根用名词形式记下来，或者把它变成形容词。）在这种情况下，记忆便成了唯一能够窝藏东西的地方，把写好的东西藏在记忆里，就可以带着它躲过搜查，通过解送队。起初，我不大相信记忆会有那么大的能耐，因而我

---

① 这就要看用什么尺度衡量了！人们在描写俄国革命诗人瓦西里·库罗奇金的时候，曾说：《火星》杂志被迫停刊后的九年，对他来说是“真正濒死苦闷的年头，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刊物了！”可是，我们这些人连想都没敢想有自己的刊物。所以我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库罗奇金有自己的书房、有安静的时间、写字台、墨水、纸张，没有人搜查他，谁也不会把他写的东西没收掉，那么，说实在的，还有什么值得他“濒死苦闷”的呢？

决定用诗的形式写。当然，实际上是强加于这种体裁的。后来，我发现散文也可以把深藏在脑海中的奥秘压缩进去。一个摆脱了繁琐而不必要的知识的囚犯，他的记忆的存储量大得惊人，而且还会不断扩大。我们对自己的记忆所给予的信赖还远远不够！

但是，在记住某种东西之前，总想把它写在纸上，先把它润色好。劳改营里允许有铅笔和无字的纸，但是，却不能持有已经写好的东西（除非是关于斯大林的颂诗）。[①] 如果你不是在卫生所当杂役，又不是在文化教育科当食客的话，那你每天就得早晚两次在岗楼前受搜查。我决定把诗写在小纸片上，每小片纸上写十二——二十行，润色之后便背下来，然后把纸片烧掉。我自己定了一条规定：绝不使用整张的纸。

在监狱，构思和对诗句的推敲都必须在脑子里暗自进行。后来，我把火柴杆折成许多小段，把这些小断头放在烟盒上摆成两排，一排断头表示个位数，另一排表示十位数。我心里背诵着诗句，每背一行诗就把个位数的小断头往旁边挪一个，每挪完十个，就把十位数的挪一个。（这项工作也得小心翼翼地做。假如在移动火柴杆时嘴唇作出像是说话的动作或脸上现出异样的表情，就肯定会引起眼线们的怀疑。所以，我在移动火柴杆时尽量装成完全心不在焉的样子。）每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的时候，我便特别把它记住，作为进行检查的标记。每月我都要把已经写好的全部诗从头背诵一遍，假如这时背到第五十行或第一百行时发现它跟我特别记住的那一行不一致，那就要一遍一遍地从头开始检查，直到"追回"那几行从记忆中滑脱的诗句为止。

---

① 作家季亚科夫曾经描写过这类"创作"的一个事例：囚犯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和切特维里科夫两人向劳改营的长官讲了他们构思中的小说的情节，得到了长官的赞许。于是，行动人员奉命不派他们去干一般劳动！后来又把他们秘密地带出了生活区（"怕班杰拉分子把他们砸烂"），让他们在另一个地方继续写作。这也算是铁板下的诗篇吧。可是，他们写的小说在哪儿呢？

在古比雪夫递解站时，我曾经看到天主教徒（立陶宛人）们自己制作一种狱里用的念珠。他们把面包用水泡开揉烂，染上颜色（用烧焦的胶皮染黑色，用牙粉染白色，用红药水染红色），做成珠子，趁它不干的时候用细绳穿起来，那细绳是用线捻成后抹上了肥皂的。然后把它放在窗台上晾干。我后来也加人了他们一伙，我说自己也想数着念珠祈祷。不过，按我信的宗教教规，一串念珠得有一百颗（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只要二十颗就够了，甚至更方便。我又用软木塞自己做了一串），每逢第十颗不能是圆的，应该是方的，而且第五十颗和第一百颗也要有所区别，能摸得出来才行。立陶宛人虽然对于我这种信仰感到奇怪（最虔诚的信徒的念珠，一串也只有四十颗），但还是深表同情地帮我做了一串，把第一百颗珠子做成一个深红色的心形。我后来一直把他们这一绝妙礼物带在身边。冬天，我把它放在宽大的连指手套里，在派工地点，在从一处被赶到另一处的路上，在一切等待的时刻，我不知数了它多少遍。这是站着就能作到的，天气多冷都不碍事。它就藏在这大棉手套里通过了各次搜查。有几次倒是被看守发现了，但他一看是祈祷用的，也就还给我了。直到我的刑期结束（这时我写下的诗句已有一万二千行了），以及后来在流放地点，都多亏了这串念珠帮助我写作，帮助我记忆。

不过，也并不那么简单。积累的诗句越多，每月复习所占的天数也就越多。特别是这种复习还有一个害处，就是所写的诗句背得烂熟了，就再也发现不了其中的优劣，无法提高了。为了尽快把纸片烧掉，本来就是匆忙中决定的初步方案，后来往往成为唯一的方案了。把写好的东西放起来，忘掉它，几年之后再取出来用新的批判眼光重新看一看——这种奢望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因此，不可能写出真正的好诗。

不能把没有烧掉的小纸片久留在身边。有三次它曾给我带来很大危险。只因为我从来不把最危险的字眼写在纸上，而是用略

字或横线代替，才使我免遭灾祸。有一次，我为了安静，离开大伙儿独自趴在离营区障碍地带较近的草地上，把小纸片夹在一本书里伪装起来写诗。不料这时一个看守头头，鞑靼人，从我身后轻轻地走来了。他看见我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写什么。

“喂，拿来!”他命令我把小纸片交给他。我站起来，捏着一把冷汗把纸片递过去。那上面写的是：

定要补偿我们的一切，
要还我们，还要答谢。
我记得那步行的五昼夜，
从布罗德尼察和奥斯切罗杰，
是 K〔哈萨克人〕与 T〔鞑靼人〕
驱赶着我们，〔担任警戒〕

假如这上而的“鞑靼人”和“担任警戒”几个字全写了出来，看守定会把我立即揪去见行动人员，他们就能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是，略字和横线像哑巴一样，什么也说明不了，他看到的是：

是 K—— 与 T——…
驱赶着我们，——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路。我在为自已的诗担心，可是他却以为我在画障碍地带的略图，准备逃跑。不过，他也没有放过这张小纸块，他蹙着眉头反复读了好几遍。“驱赶着我们”几个字已经使他想到一些什么了，特别使他动脑筋的是“五昼夜”。我甚至没去考虑这几个字会引起他的什么联想！“五昼夜”——这是劳改营里关囚犯禁闭时说的标准用语。

“关了谁五昼夜？你说的是谁?”鞑靼人看守皱着眉头追问。

我好容易才借助“布罗德尼察”和“奥斯切罗杰”两个名词使他相信：我是在回忆别人写的一首关于前线的诗，可怎么也想不起全诗来了。

“你干什么要回忆？不许回忆！”他拉长了脸警告我，“看你再敢躺在这儿！有你受的！……”

今天来谈这件事，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当时对于我，对于一个一钱不值的奴隶来说，这却是了不起的大事：我从此便不能再离开嘈杂的人声躲到一旁去写诗了。假如再叫这个鞑靼人抓住，看到另外的诗句，就完全可能对我立案审查，加强监视。

而我现在已经不能丢掉写作了！……

还有一次，我违背了自己的习惯，在工地上一气写下一个剧本[①]中的六十行诗，而且收工回营时没有把这一张纸藏好。当然，那上面许多重要的词也是用略字或横线代替的。看守是个宽鼻梁的小伙子，挺朴实的。他看着这猎获物有点奇怪。

“是写信吗？”他问道。

（把写好的信带到劳动工地，被查出来只不过蹲几天禁闭。但是，这封“信”要是落到行动人员手里，就会引起他的疑心了！）

“这是我准备演文艺节目的时候用的，”我只好厚着脸皮说，“我正在回忆一个剧本。演出的时候，您来看吧。”

小伙子的眼光在那张纸片和我的身上来回扫了几遍，然后说：

“身体倒挺结实，可是个混蛋！”

说着，他把我的纸片撕成两半，又撕成四块、八块……。我生怕他扔在地上，因为那碎片还是够大的，在这岗楼附近它很可能落到警惕性更高的长官手里，劳改营的长官马切霍夫斯基正站在不远的地方监视着搜查呢。但是，看来他们是规定不许到处乱扔东西的，弄脏了还得自己打扫。所以，看守就把撕碎的纸片像

---

① 就是《胜利者的欢宴》。

塞进字纸篓一样又塞在我的手里。我一进工棚门就急忙把它扔进了火炉。

还有一次，我手里还有一大段诗没有烧掉，可是，在建造加强管制工棚的时候，抑制不住诗兴，我又写下了《砌石工》。那个时期我们是在隔离区内劳动，无须到区外去，因而对我们勿需每天搜身。我把《砌石工》带在身上已经两天了。第三天，晚点名之前，我想趁天色昏黑的当儿到屋外去复习一次，然后把它烧掉。我想找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安静处，却不知不觉走近了障碍地带。没想到这恰好是不久前滕诺钻铁丝网逃跑的地方。一个似乎原来就埋伏在那里的看守立即揪住了我的衣领，在黑暗中把我带进了加强管制工棚。我利用在暗处走的工夫悄悄把《砌石工》揉成一团，扔在身后了。这时正刮风，看守没有听见我揉纸和扔纸的声音。

我一点也没想到身上还带着另一段诗。到加强管制工棚一搜查，把它搜出来了。幸而那完全不是什么犯罪的东西，是写前线生活的一段（《普鲁士之夜》中的一段)。

这位上士班长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他读了一遍。

“这是什么?”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瓦西里·焦尔金》。”我坚定地回答。

（我和特瓦尔多夫斯基两人的生活道路在这里是第一次相交。)

“特瓦尔多——夫斯基!”上士含着几分敬意说，“你写它作什么?”

“这里没有书看。我就这样凭记忆写下来，有时候读上两句。”

我的武器——半片破刮脸刀片——被没收了，把那小段诗还给了我。他本来可以放掉我。那我就会赶紧去寻找我的《砌石工》。但是，这时已经过了点名时间，囚犯们已不能在营区随便走动了。所以看守亲自把我送回工棚，锁上了门。

我一夜没有睡好。外面的风刮得很猛，我的《砌石工》会被

刮到哪里去呢？尽管那上面有不少略字和横线，但诗的大意还是清楚的。而且根据内容就可以断定作者是建造加强管制工棚的砌石班的人，而在砌石班那些西部乌克兰人中间是不难找到我的。

因此，现在在营区某处或草原上无可奈何地被大风吹着到处滚动的不只是那个小纸团，而是我多年来的写作，是已经写出的，更重要的是计划要写出的全部东西。我呢，只有祷告上帝保佑。每当处境不佳的时候，我们向来是不以信奉上帝为耻辱的。只是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才耻于信上帝。

早晨，五点钟，刚一听到起床命令我就冒着使人窒息的寒风跑到昨天扔纸的地方去找。狂风卷起砂石扑打着我的脸。哪里去找呢？风从这里吹向营部方向，再远就是惩戒室（那里也有很多看守来来往往，还有几道交叉的铁丝网），再往前就是障碍地带，是小村镇的街道了。在天大亮前我弯着腰来回找了整整一小时，毫无结果。我已经绝望了。谁知天刚亮，我看见就在离我扔纸团的地方三四步远处有一个白东西——风把小纸团吹到旁边，恰巧夹在地上的两块木板中间了。

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我就是这样写作的。冬天，在工间休息取暖的时候写。春天和夏天在林子里，坐在石头上写。趁着两次抬灰浆的间隙，我把纸片放在砖上用铅笔头（还得不让旁边的人看见）偷偷写下上一次抬灰浆时想好的一两行诗。我像是生活在梦中。坐在食堂里吃那神圣的烂菜汤时，我常常确实“食而不知其味”；我听不见周围人的谈话，我总是在沿着自己诗句的山峰向上攀登，就像把一块块砖砌成墙一样砌造我的诗篇。人们搜查我，点名，报数，跟着队伍一起走向工地——而我却只看到我写的戏剧的场面、幕布的颜色、布景中的家具摆设、一排顶灯照在台上的光圈、演员的每一个动作。

别的小伙子乘汽车冲出去，把铁丝网偷偷剪断，在大风雪里从一个雪堆爬向另一个雪堆。对我来说，这些铁丝网似乎并不存

在，我仿佛始终处于自己的长久的、遥远的逃跑之中，但是，看守们发现不了这一点，他们只知道数数人头。

我知道，我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我知道，我已经接触到了一个伟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岛分散的一个个小岛上，在同我一样的孤独的胸腔中，这个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晓中成长起来，为的是在未来的年代，也许是在我们死后，显露出它的威容，汇成整个狂涛怒吼般的俄罗斯文学。

一九五六年，当时已经出现“私下出版物”（萨姆依兹达特）了，我在那里读到了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第一本诗集，它使我感到由衷的激动，就像会见了多年不见的亲兄弟一样。那里写道：

> 我自己知道：这不是游戏，
> 这意味着死亡——枪毙。
> 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样，
> 即使为了获得生命，
> 我也绝不放下这支笔！
> 这张已经展开的纸，
> 我绝不把它æ弃！

他这诗也是在劳改营写的！这也是背着所有的人向黑暗发出的孤独而没有回声的呼喊：

> 那长长的一排坟墓
> 是我所记忆的全部。
> 我本应也赤身露体躺进泥土，
> 但我曾发誓：要把我的歌儿唱完，
> 要走完自己的路，
> 不吐出最后一个字，

绝不停止哭诉；

仿佛在我这死人的生活里

也还有过什么最初……

当时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呀？我想，其数字要远比在这交替的年代泅出来的人多得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幸能活到今天的。有些人只好把写出的诗篇装到瓶子里埋在地下，但却没有把埋藏地点告诉任何人。有的人交给别人保存起来了，但是交到了一些漫不经心的人手里，或者，相反地，交到了一些过于谨慎的人手里。有些人则根本没有来得及写下来。

即使在埃克巴斯图兹这个小岛上，难道我们会那么容易彼此相识，互相鼓励几句，互相表示支持吗？我们在劳改营里是像狼一般躲避着所有人的，我们彼此也互相躲避。不过，即使这样，我还是在埃克巴斯图兹营里认出了其中几个。

我完全意外地（通过洗礼教派信徒们）认识了一位宗教诗人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西林。当时他已经四十多岁。相貌平庸，毫无特色。棕黄色头发已经被剪掉、剃光，眉毛也是棕黄色的。他对谁都谦让、温和，但也是矜持而审慎的。我和他已经谈过很多话，每逢不劳动的星期天，我们有时就在营区内长时间地散步。只是在这种时候，他才把自己写的宗教性叙事诗读给我听（他也和我一样，在劳改营里作诗）。这时我便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惊奇：人的相貌真是多么不足为凭啊！一个平庸的外貌下面可能隐藏着多么不平庸的灵魂啊！

西林自幼流浪，在保育院里长大，是个无神论者。他被德国人俘虏后接触过一些宗教书籍，被这些书迷住了。从那时起，他不仅成了一个虔诚的宗教徒，而且成了哲学家和神学家！正因为“从那时起”他就一直生活在监狱和劳改营里，他作为神学家的道路也是自己独自走过来的：别人在他之前早已发现的东西，他要

重新去发现，或者重新走入迷途，因为“从那时起”他就既未看到过宗教书籍，也未遇到过可以谈心的人。目前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里，他当的是壮工和掘土工。他努力完成那不可能完成的定额，每天归来时累得腿都直不起来，两手颤抖着。但是，不管白天黑夜，他的脑海里充满了诗篇的抑扬格，四韵的自由诗。全部诗篇都是在脑子里默默写成的。我相信，到我们相识的时候他头脑里大概总装有二万行诗句了。他也把写诗看作自己的一种神圣职责，他有自己的记忆方法和向别人传递的方法。

他体验到一个“大自然宫殿”，这使他对世界的认识变得美丽而温暖。每逢他看到在我们这不毛之地“非法地”生长出来的一棵小草，他便会俯身对着那小草高声感叹：

“看，大地上的青草有多美！创世主甚至把它也送来给人当铺垫了。那就是说，我们，人，更应该多么美好啊！”

“怎么能说‘你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呢？”（这是教派的信徒们常说的一句话。）

接着，他便抱歉地笑笑。他善于用这种微笑同别人和解。

“是啊，甚至在尘世间肉体的爱里也表现出我们向往统一的伟大愿望啊！”

按照他的“神正论”，也就是他为神的正义所作的辩护，对于世界上为什么应该存在罪恶这一问题的解释，是用下列诗句表达的：

尽善尽美的创世主
允许有非尽善尽美的——
灵魂的痛苦，是因为没有它
人们就不会了解幸福。
…………
…………
法律确是严酷，

但只有靠了它
那些微末的俗子凡夫
才能踏上伟大的永久和平之路。

西林对于耶稣在肉体上遭受的苦难也作了自己的大胆解释：他认为这不仅是出于替人间赎罪的需要，而且也是出于上帝自己想重新体验一下人间痛苦的愿望。西林勇敢地断言：

“上帝一直是了解这些痛苦的，但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它！”

同样，关于将在所谓世界末日前出现的耶稣的敌人，即那个

歪曲了人的自由灵魂
对伟大光明的追求，
而把它局限于对今生光明的追求

的人，西林的描写也使用了清新的、富有人情味的语言：

这伟大的天使抛弃了
赋予他的幸福，
因为他没有受过人间痛苦。
甚至他的爱也不会完美，
假如其中没有哀愁苦楚。

西林自己的思想十分自由，他的广阔胸怀中可以容纳下基督教的所有教派，他说：

……它们的实质是：
即便在基督的教义中

每个天使的形象也互不相同。

唯物主义者会怒气冲冲地提出疑问：精神怎么会产生物质？对此，西林置之一笑，他说：

“这些人并没有想认真地思考一下：粗糙的物质怎么会产生精神？如果是粗糙的物质产生了精神，那岂不是奇迹吗？那应该是更大的奇迹才对！”

我的脑海已经被我自己的诗句占满了，所以在我听到的西林的长诗中只保留了这么一些片断。我真担心他自己或许什么也保留不下来。在另一篇叙事诗中，他使自己最喜欢的主人公（他给这个主人公取了个古希腊人的名字，我把它忘记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假想演说——宣读了一篇为全人类制定的精神纲领。这位诗人的胸膛中，这个身上挂着四块号码布、疲惫不堪、只有死路一条的奴隶的胸膛中，拥有许许多多话需要向活着的人们诉说。他的话比在杂志社、出版社和广播电台里牢固地占据着自己的职位的、除了对自己之外对谁也不需要的整群人所讲的话还要多。

战争开始前夕，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西林毕业于师范学院文学系。现在，他和我一样，大约再过三年就可以被“释放”到流放地去。他唯一的专长是在中学教文学。可是，像我们这些坐过牢的人，再去教书的可能是极少的。但是，万一呢？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

“我总不能再向孩子们灌输谎言吧！我要对孩子们讲关于上帝、关于精神的真话。”

“那么，刚上完第一堂课就会把你解雇掉！”我对他说。

西林低垂着头，轻声回答说：

“让他解雇好啦！”

很清楚，他到那时候也是不会心慌的。他绝不会为了抓住教师的教学日志，为了不去挥动十字镐，就昧着良心讲课。

我久久地望着这个满头棕黄发、其貌不扬的人。他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谁是他的导师，他的整个生活道路是那么艰难，就像用铁锹来刨这埃克巴斯图兹的多石的地层一样。我望着他，心里又是可怜，又是赞叹。

西林和浸礼派教徒们吃一个锅里的饭，一起分面包和菜汤。当然，他需要有感激他的听众，他必须跟什么人一同阅读和解释福音书，并且收藏这本小书。但是，他倒并不去找那些东正教教徒们（大概是担心人们会把他看作旁门左道而拒绝接近吧）。也许只是没有发现他们，因为在我们营里除了西部乌克兰人之外很少有东正教徒。要么就是因为这些人事事循规蹈矩，很不突出。浸礼派教徒们似乎很尊重西林，认真地听他讲话，甚至把他算成自己教会的人。不过，他们也不满意西林的一些异端说法，他们指望慢慢把他变成自己人。只要有这些浸礼教派教徒在场，西林同我的谈话就平淡无奇了。只有他们不在的时候，他才能同我敞开谈。他很难使自己适合他们的要求，尽管他们的信仰十分坚定、纯洁、热烈，而且这信仰帮助他们度过苦役营，毫无动摇，精神上没有垮下来。这些信徒都很诚实，不喜欢动怒，爱劳动，热情而乐于助人，完全献身于耶稣。

正因为这样，当局才那么坚决地要除掉他们。一九四八——一九五〇年间，**仅仅因为**参加浸礼派团体就有成百成百的人被判二十五年监禁并被送进特种劳改营。（因为参加**教会**当然是参加一种**组织**啰！）[①]

* * *

劳改营里不同于外界。在外界，每个人都毫无顾忌地尽量强

① 在赫鲁晓夫时代对浸礼派教徒的迫害只是在刑期上有所减轻，实质未变。（参看本书第七部。）

调自己，并且从外表上表现自己。很容易看出，谁在追求什么。在监狱里则相反，大家都失去了个性：头发理得一样，都不刮脸，戴同样的帽子，穿同样的衣服。甚至面部的表情也被大风、骄阳、泥土和艰苦劳动弄得不成样子了。要想透过那没有个性的、卑微的外表而区别出每个人的内心光辉，那是需要有些经验的。

但是，心灵的火花毕竟会不由自主地闪烁发光，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会自然地发生一种无意识的互相结识和同类型人的相聚。

如果能了解到某人生平的哪怕很小一个片断，就能较快和较深刻地了解这个人。比如，那边有许多人在挖土。下起大雪来了。于是，可能因为休息时间快到了吧，全班都躲进了窝棚。可是有一个人仍旧站在雪地里。他站在土沟的一边，用铁锹支着身子，一动也不动，仿佛他觉得雕像似地站在那里很合适。大雪盖住了他的头、肩、胳膊，就像盖住一座雕像。他对此无所谓吗？甚或还感到舒服？他透过纷飞的大雪凝视着障碍地带，凝视着白色草原。他长得很粗壮，宽肩膀，方脸膛，粗硬的浅棕色络腮胡子。他总是那么稳稳当当，慢慢吞吞，沉着冷静。他一个人留下来，站在那里观看着这个世界。他在思考。他并没有在这里。

我不认识他，但是他的朋友雷季金对我谈过他的事。他是个拥护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的人，是在一种落后观念中长大的，这种观念禁止杀生（即使为了那个"先进学说"杀生也不行）。禁止杀生，当然也就不许拿起武器。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队伍开到靠近阿富汗的库什卡驻扎。他就扔掉武器，在库什卡附近偷越国界跑到阿富汗去了。当时库什卡并没有德国人，也根本没有德国人朝这个方向进军的消息。因此，他本来是可以太太平平地服役到战争结束，一次也不向活人开枪的。但是，他觉得肩上背着这个铁家伙本身就违反他的信仰。他受不了。他指望阿富汗人会尊重他"不杀生"的信仰，会放他到尊重宗教的印度去。但

是，阿富汗政府也和所有政府一样只顾私利。它怕触怒强大的邻国，就把这个逃亡者枷起来，关进监牢。这样，他带着不能走动的沉重足枷在狱里呆了三年，等待着战争结局。苏联战胜了，于是阿富汗政府阿谀地把这个逃兵送还了本国。他的刑期就是从那时候算起的。

看，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雪里，像是这自然界的一部分。难道把他送到人间来的是国家吗？为什么国家有权利决定这个人应该怎样生活呢？

我们大家都不反对拥有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祖国同胞。他是一块牌子。还可以发行纪念邮票嘛！也可以把外国人带到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那雅-波良纳去参观。而且我们十分乐于研究托尔斯泰是怎样反对沙皇专制的，是怎样被开除教籍的（讲解员每次讲到这里时声音总会颤抖的）。但是，假如有谁，咱们的某一位同胞，想要认真地看待托尔斯泰，假如咱们国内真地出现了一位认真拥护托尔斯泰的活人，那么，喂，你就小心点吧！当心落到我们的履带下面去！！就是这么回事。

……在工地上，有时候你要跑去向一个犯人小组长借卷尺用一下：想量一量砌了多高。这个卷尺对他来说很珍贵，可他又不认识你（有这么多班组一起干活嘛！），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竟会毫无戒心地把自己的宝贝递给你。（在劳改营里这样作简直被认为是愚蠢！）而当你把卷尺还给他的时候，他反而向你表示感谢。像这样的怪人怎么能在劳改营当组长呢？他说话带点外地口音。噢，他原来是个波兰人，大家都叫他尤里·文格尔斯基。读者还会看到他的。

……有时候，我跟着队伍向前走，想数数袖口里的念珠或者想想下一段诗句。但是，和你并排走的五个人中有个新面孔实在引起你的注意。我们工地里又派来了新班组。他是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派头像个知识分子，和蔼可亲，嘴角上露出某种聪明的

嘲笑人的神色。他姓马萨梅德，是个大学毕业生，哪个大学？哪个？是布加勒斯特大学。专业是生物心理学。顺便说一下，他还有另外的专长——相面和看笔相。此外，他还是个瑜伽信徒，相信苦修可以得到“超自然”的力量。因此，要说开始静坐修行的话，他明天就可以跟你一起开始。（是啊，可惜我们呆在这所大学里的期限太短了！我简直应接不暇！没有时间把一切都吸收进来！）

后来，我又留心观察他在劳动工地上和生活区里的情况。同胞们让他在办公室找个工作干，他没去；他认为必须让大家看看：犹太人也能和大伙儿一起劳动！他虽已五十岁，却还能毫无畏缩地抡起十字镐。不过，他确实是个名符其实的瑜伽，他能掌握自己的身体：在摄氏零下十度的天气他可以脱掉衣服让同志们用消防龙头往他身上浇水。他吃起饭来不像我们那样急急忙忙把饭塞进嘴里，而是一个人转过脸去，全神贯注地、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用一个特别小的羹匙往嘴里送。[1]

……有时候，在路上也会结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不过，一般地说，在队伍里是不能多讲话的：押送人员的叫喊，身旁人的嘘声（“你们讲话，我们会跟着遭殃！……”），再说，上工去的路上大家都无精打采，而回来时又都急急忙忙，加上常常有风沙。可是，突然，有了一个机会。（当然，正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这不是典型情况。）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机会。

在队伍的最靠边的一行里有个长着满脸黑胡子的小个子。（他最后一次被逮捕时就是留着这把胡子的，照片上也带胡子，所以到劳改营后便没有给他刮掉。）他走起路来很精神，严肃庄重，腋下夹着一卷捆着的图画纸。这是他的合理化建议或者发明，是一件他颇为自豪的什么新东西。他在劳动工地上把它画了出来，曾经拿给营部的什么人看过，现在又把它带到工地去。忽然，一阵

---

① 不过，这个人很快就像普通凡人一样由于普通的心力衰竭死去了。

恶风把他的纸卷从腋下吹掉，吹到队伍外面去了。这位阿尔诺德·利沃维奇·拉波波尔特（读者已经知道这个人了）很自然地就跟走着被刮的纸卷向前追去，一步、两步、三步……可是他没有抓住它，纸卷继续向前滚，已经滚到两个押解兵中间，已经超过押解兵的警戒线了！这时，拉波波尔特本应该停下来，因为“未经允许，往左跑一步或往右一步是会……不予警告立即开枪的！”可是纸卷就在跟前啊，那不是吗！拉波波尔特跟着纸卷向前跑去，弯着腰，两手伸向前方——厄运正在把他的技术创新抢走呀！阿尔诺德伸着手，像耙子似地张开五指，似乎在说：强盗！不许拿走我的图纸！全队看到这个场面犹疑不前了，自动地站住了。冲锋枪举起来，一阵拉枪栓的声音！……到此为止都是有典型性的，可是，这时却发生了非典型性的情况：没有一个混蛋，没有一个人开枪！野人们也看出了：这不是逃跑！甚至他们那被搅混了的头脑也终于明白了这个场面：作者在追赶他的创作！拉波波尔特又继续往警戒线外跑了十五六步，终于抓住了那卷纸。他直起腰来，满意地回到队伍里。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

虽然拉波波尔特在劳改营里呆的年数超过了平均数，经过幼儿园（指五年以下——译者注）的刑期，又经过十年，而后是流放，现在又判了他十年，可是他仍旧生气勃勃，动作敏捷，眼睛炯炯有神。他那双经常闪着愉快光芒的眼睛却像天生为了表达痛苦而造的，那是一双非常富有表情的眼睛。他觉得这些年的监狱生活没有使他变老，没有摧垮他的身体，这是值得自豪的。当然，他倒是具备提起精神的条件，因为他作为一个工程师，这些年来一直给看守们在建筑工程方面当帮手。他干起活来很带劲，而且除了劳动之外，还有一些精神财富上的创作。

他是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这种人总想把什么都弄懂，什么都想试试。有过一个时期，他打算写一本像我这本书一样的关于劳改营的书。不过，没有成功。对于他的另外一种创作，我们，他

的朋友们，则报之以嘲笑：这几年来他一直在认真而耐心地编写一本包罗万象的“技术参考书”，他想使这本书能够解答有关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一切问题（从各种电子管技术到大象的平均重量），而且它还得是个……袖珍本。大家的嘲笑使他长了经验，拉波波尔特后来就不轻易把自己的创造计划告诉别人了。所以，他只是极为秘密地把他的另一本心爱的著作拿给我看。那是写在一本黑色胶布面笔记本上的《关于爱情》的论文。这篇论文颇有些新意，因为他认为斯汤达的论述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的论文还没有完全写好，眼下还只是一些没有串联到一起的论点札记。但是，可以看出，对于一个在劳改营度过了半生的人来说，它凝结着多少纯真和智慧啊！我在这里姑且引用其中的几段吧：[1]

“占有一个不爱的女人，乃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极为卑微的人的一种不幸遭遇。可是有些男人却夸耀这是‘胜利’。”“占有，如果它不是经过情感在机体上的发展所培养起来的，那它所带来的便绝不会是快慰，而只能是羞耻，是厌恶。”

“我们这个时代的男人把全部精力都化在挣钱、职务、权力上，他们已经丧失了最高的爱情的基因。

与此相反，对于正确无误的女人本能来说，占有则是真正亲密关系的第一阶段。只有在这之后女人才承认男人是亲人并用‘你’称呼他。甚至偶然委身的女子也会感到某种恩爱的柔情涌上心头。”

“嫉妒乃是被侮辱了的自尊心。真正的爱情在它失去了对方的爱时是不会嫉妒的，而只会死亡，只会僵化。”

“同科学、艺术、宗教一样，爱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

---

①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许多年，拉波波尔特已经放弃了完成这篇论文的想法。我在这里引用的是得到本人同意的。

阿尔诺德·利沃维奇自己既然有这样广泛的兴趣，这就使他能够了解各种各样的人。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个人。如果没有他的介绍，我是不会去注意此人的。乍一看，这是个营养不良症患者，是个被宣判了慢性死刑的人。两根锁骨支着劳改营发的短上衣，简直是一具骷髅。再加上这人个子很高，他的消瘦就更加引人注目。他的皮肤本来就是黝黑的，那剃光的头被哈萨克斯坦的强烈阳光一晒，就显得更黑了。真难为他还能在隔离区内走动，还能抬着担架而不倒下去。他是希腊人，也是个诗人。（又一位诗人！）他的诗集曾在雅典用新希腊语出版过。但因为他不是雅典的囚犯而是苏联的囚犯（他是苏联国籍），所以我们的报纸自然不会为他喊冤叫屈。

他还正当壮年，可是已经站在死亡的边缘了。我怀着同情拙笨地企图驱散他那些关于死的念头。但他却惨然一笑，以哲人的语气，用他那并不很流利的俄语对我解释说：在死亡这个问题上，可怕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精神上准备死亡的过程。而他已经经历过恐惧、痛苦、遗憾等等，已经哭过了，他已经全部“经历”了那不可避免的死亡，完全准备好了。所以，现在只剩下让他的肉体死去了。

人们中间有多少诗人啊！简直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有时简直使我不知所措。）这个希腊人在等待死亡。可是另外两个年轻诗人却在等待满刑，向往着将来在文学上成名呢。他们也是诗人，而且是公开的诗人，并不躲躲藏藏。这后两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显得那么晶莹而纯洁。两人都是没毕业的大学生。其中，科利亚·博罗维科夫是Д·И·皮萨烈夫的崇拜者（也就是说，是普希金的敌人），现在在卫生所当医士。另一个在特维尔市出生的尤罗奇卡·基列耶夫是A·A·勃洛克的崇拜者，自己也仿效勃洛克的诗写作，他每天要到营区外的机械制造厂办公室去上班。他的朋友们（算什么朋友呢?！比他大二十多岁，都是做了父亲的人）嘲

笑他，说先前在北方普通劳改营时有个轻浮的罗马尼亚女人主动找他，可他没懂她的意思，却为她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现在，一看他那天真无邪的模样，就会相信确有其事。如今他却不得不将这少年的纯真消磨在劳改营里。真该诅咒！

……你在观察某些人，另一些人也在观察你。我们的大工棚里住四百人；躺着的，坐着的，走动的，乱乱哄哄。晚饭后，在沉闷的晚点名前，我有时候就翻开达里辞典的第二卷看看。这是我带到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唯一一本"书"，到这里之后也盖上了"斯捷普拉格文教科"的图章。我看这本"书"时从来不看页数，因为晚上剩下的一点时间最多能读半页，所以我通常是坐在那里或者拿着书慢慢地踱着，眼睛盯着书的一个地方。新来的人总要问：这么厚，是什么书？而且表示惊奇：为什么要看这种东西。我已经习惯了，往往用一句玩笑话回答："看这种书最保险，不会再触犯别的条文。"

其实，在特种劳改营里读什么书能没有危险呢？关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的一个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斯托季克晚上有时阅读改写过的英语作品《牛虻》。尽管是偷偷地看，还是被人告密了。来了一群军官搜查他，劳改营分部的首长亲自参加。"你是盼望美国人来吧？"接着命令他当众用英语朗读一段。然后，问他："你的刑期还剩多久？""两年。""再关二十年！"搜查时还发现了他写的几首诗。首长说："你还对爱情有兴趣？……那么好吧，你们给他创造些条件，让他的脑子里不仅再也没有英文，连俄语也没有了！"（而那些奴性十足的杂役们还在低声埋怨斯托季克呢："把我们也连累啦！还要把我们也赶走呢！"）

但是，这本书也帮助我交结了不少很有意思的人。有一次，一个叫弗拉索夫的小个子走到我跟前。他的样子活像只好斗的公鸡，高大的鼻子，嘲笑人的锐利目光，说起话来像在演唱，"噢"音很重：

"请问，您这是本什么书？"

我们开始交谈了。后来，我们也常常在星期天攀谈，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慢慢地在这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微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紧紧地压缩着半世纪以来我国的全部历史。这位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弗拉索夫就是卡德案件中的那个弗拉索夫，他被判二十年，现已服刑十四年了。他本人认为自己是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没有想到他还是个语言大师，不过是口头语言大师。不论关于什么事，是乡下人割草还是商人的小铺子（他曾在一家小铺子里当过学徒），是关于红军部队还是旧庄园里的生活，是谈省督战队的刽子手还是谈贪得无厌的城郊女人，他都能讲得活灵活现，好像一切就发生在眼前，而且能使人像亲身经历过似的一下子牢牢记住。我真想当时就把这些全记录下来！可怎么记得过来呢！在十年之后的今天，真想把当时的原话都一句句回想起来，可哪能回想得起呢！……

我发现，一个瘦瘦的、高鼻梁大个子年轻人常常向我和我的书瞟上几眼，但却好像总下不了和我搭话的决心；他很腼腆，不像个久住劳改营的人。我和他也认识了。他说话声音很低，羞答答的，边说边吃力地寻找着需要的俄语词，有时会犯一些很可笑的语法错误，但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用微笑来补救。原来他是个匈牙利人，叫亚诺什·罗扎什。我把达里辞典拿给这个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看，他频频点头说："对，对，是该把注意力转到别的东西上去，不能总想着吃的。"他只有二十五岁，但脸上却毫无青春的气息：被风吹干瘪了的纤细皮肤像是直接贴在细长的头骨上。他患关节痛，是在北方伐木场时落下的关节炎。

这个劳改营里除他之外还有两三个匈牙利人，那几个人整天想的就是一个问题：怎样能吃饱，活下去？而亚诺什则老老实实吃班长分给他的那一份，虽然总是半饱，但他从来不去寻找别的东西吃。他留心观察一切，谛听一切，希望能够理解。他想理解什么呢？……他想理解我们——俄罗斯人！他说：

“我在这里了解了别人以后，我觉得自己的遭遇就很平凡〔平常〕了。我觉得很奇特〔奇怪〕。这些人原本是很爱本国人民的，可他们却因此而被判苦役刑！不过，我看这是军事〔战争时期的〕混乱造成的，你说是不？”

（他的这个问题是一九五一年提出的！如果当时仍是战争时期的话，那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还没有结束呢？……）

一九四四年，当我们的军队在匈牙利抓住他的时候，他才十八岁（而且他并不是军人）。他微笑着告诉我：

“那时候我还既没来得及为人民作好事，也没来得及为人民作坏事呢。人们还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好处，也没有受到我的损害。”对亚诺什的侦查过程是这样的：侦查人员一句匈牙利语也不懂，而亚诺什一句俄语也不懂。有时候也来几个古楚尔人（即住在喀尔巴特山区的乌克兰人）给他当翻译，可是他们的翻译水平极低。亚诺什在一份长达十六页的起诉书上签了字，可是，始终不知道起诉书上面写了些什么。同样，当一个不认识的军官向他宣读一张纸上写的话时，他很长时间没弄清楚，那原来就是特别庭的判决书。[①]然后就把他押解到北方的伐木场去服苦役。在那里，他累垮了，后来他被送进了医院。

进医院之前，俄国只向他显示了一个方面：让他坐牢。可是，这时，在医院里，俄国却向他显示了另一方面：在索利卡姆斯克附近的西姆独立劳改点里有个小医院，那里有个叫杜霞的护士，四十五岁左右，原来在防疫站工作，是个普通刑事犯，刑期五年。她没有把自己目前的工作只看成能够捞一把并混过刑期的手段。（其

---

① 斯大林死后，给亚诺什恢复了名誉。据说，这时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曾想要求看一看他的判决书的匈牙利文副本，好知道自己到底因为什么被关了九年？但是，他没敢提出这个要求。他想：“万一人们产生怀疑呢：我要知道这个干什么？况且，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也确实不那么需要了……”他总算懂得了我国人民的精神状态。本来嘛，他现在要了解这些干什么？！……

实，这种想法在劳改营里很普遍。不过，亚诺什透过他那玫瑰色眼镜看不到这一点。）杜霞认为自己有责任照顾医院里那些垂死的、谁也不需要的人，使他们活下来。但是，要想用劳改营发的那一点点食物救活病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这位杜霞护士就把自己每天的一份早饭——三百克面包拿到居民村里去换成半公斤牛奶，用这牛奶喂活了亚诺什（而在亚诺什之前，还喂活了别的什么人）。① 亚诺什就是由于这位杜霞大娘才爱上了我们国家和我们这些人的。所以他后来才在劳改营里开始认真地学习看守们和押解他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伟大而有力的俄罗斯语言。他在我国的劳改营呆了九年，他只在监狱的床铺上，通过一些小画片和劳改营，看到了俄国。但是他却爱上了俄国。

亚诺什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的童年时期除了读书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爱好。这样的人我们这个时代培养得越来越少了。亚诺什成年之后也保留了这种爱好，甚至在劳改营也是这样。不论在北方的劳改营，还是来到这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之后，亚诺什从不放过得到并阅读新书的机会。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已经知道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果戈理等人，并且很喜爱他们的作品。我给他讲了格里鲍耶陀夫，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莱蒙托夫，几乎像喜欢裴多菲和阿兰尼一样。莱蒙托夫的作品他是**被俘虏之后**，就在不久前才看到的。（我不止一次听外国人说过，他们在俄国诗人中最喜欢莱蒙托夫。）亚诺什特别对《童僧》中的主人公的命运感到共鸣，因为那也是个被囚禁的年轻人，也是注定要死在这里的。亚诺什背会了其中的许多段落；他常年走在异国人行列中，站在异国土地上，倒剪着手，用异国的语言喃喃背诵：

---

① 请解释一下：杜霞的这种行为应该怎样理解？它属于什么思想体系？（请读者把她的行为同季亚科夫的共产主义的卫生所比较一下看吧，那里说的是："什么？牙痛？瞧你那副班杰拉匪帮分子的嘴脸！"）

“那时我已模糊地意识到，
在故国土地上，在那里
已永不再会有我的足迹。”

温顺纯朴，和蔼可亲，一双灰蓝色眼睛显出他是毫无自卫能力的——这就是我们这冷酷无情的劳改营里的亚诺什·罗扎什的形象。他有时坐到我的床边上（轻轻地、紧贴床沿儿坐下，仿佛我那塞满锯末的垫袋还会被他弄得更脏或压坏似的），悄悄地对我说着知心话：

“我这些内心的幻想还能去对谁说呢？……”他这个人无论对什么事都从来不抱怨。①

走在劳改营的犯人中间，就像走在布雷区里似的，为了不以身试雷，大家都不得不用直觉的光线给每个人都拍个照片，好不被它炸死。但是，即使在这种普遍全面警戒的状态下，我还是能

① 斯大林死后，把所有匈牙利人都释放回家了。因而亚诺什也逃脱了“重慘”的命运，其实他早已准备接受那种命运了。

从那以后又过了十二个年头，其中包括1956年。亚诺什现在是在一个小城镇那吉卡尼札当会计。那里谁也不懂俄语，没有人读俄文书。可是亚诺什在写给我的信里怎么说的呢？他说：

“我经历过这一切事件之后，十分诚恳地肯定说：我不会丢掉我的过去。我通过严峻的体验认识到了别人无法认识的东西……释放我的时候，我曾向同志们保证永不忘记俄罗斯人民，并不是由于我所遭受的痛苦，而是由于他们那善良的心……我为什么要怀着同情心注视着报纸上有关曾一度是我的‘故乡’的俄国的消息呢？……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在我的藏书中占整整一书架，有四十一本是俄语原版书。乌克兰语的书有四本（谢甫琴科）。别人读俄文书像读英文书、德文书一样，可是，我读俄文书的感情却不同。对我来说，托尔斯泰和莱蒙托夫远比托马斯·曼和歌德要亲近得多。

“你简直想象不到我是多么暗自怀念着许多东西。人们有时候问我：‘你这人怎么这样怪？为什么那么想念俄国人？你在他们那里见过什么好东西？’我怎么解释呢？我的整个青春是在那里度过的呀，而人生也就是不断地与逝去的岁月告别。怎么能像个受委屈的孩子似的扭过头去？我的一生中有九年是和你们一起生活的呀。为什么我在广播中一听到俄罗斯民歌就感到心情激动呢？这怎么解释？我有时自己暗自在唱：‘三套马车在飞驰……’，可是每次都是一阵心酸使我唱不下去。孩子们老是请求我教他们俄语。孩子们，别着急，我收集这些俄文书还会是为了谁呢？……”

够在那剃得光光的头颅下面，在黑色囚服下面发现多少个富于诗意的人啊！

可是，还有多少个戒备周密面没有被我发现的呢？

还有多少个？还有几百几千个我根本没有遇到的呢？

而在这几十年间，还有多少人被你，被你这个可诅咒的利维坦* 扼杀了呢?!?

*　　　*　　　*

埃克巴斯图兹营也有一个官方的（虽然是极其危险的）文化交往中心——文化教育科，也就是那个给所有囚犯的书上都盖上黑图章并且替我们刷新身上的号码的地方。

我们的文化教育科有个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他是艺术家弗拉基米尔·鲁德丘克，过去是大辅祭，几乎就是总主教的私人秘书了。关于劳改营的法律中，不知什么地方还保留了一条规定，还没有来得及取消它。规定是：不给有宗教职称的人剃头发。自然，这条规定并没有明文写出，因此，对那些不知道此项规定的人，还是要剃头发的。但是，鲁德丘克了解自己的权利，所以他那棕色的卷发就保留下来了，比一般男发稍微长些。他很爱护自己的头发，就像注意自己的仪表一样。他很招人喜欢：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身材，悦耳的男低音。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大教堂主持盛大仪式的样子。同我一起来的克季托尔·德罗兹多夫一下子就认出这位大辅祭了："他在敖德萨大教堂作过弥撒！"

但是，这个人无论在外表上和生活态度上都不像我们囚犯世界的人。他是在东正教刚刚摆脱失宠状态后很快就自己掺杂进或者被人掺杂进东正教派里的可疑人物，这种人总是想方设法损毁

---

* 利维坦（leviathan），《圣经》故事中指鳄鱼，有时指鬼怪，近代政治著作中指极权国家。——译者注。

教会的名誉。而且，这个鲁德丘克落到监狱的经过也带有些神秘色彩，谁也不了解为什么。也不知为什么他有时还给别人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怎么会没有被没收呢?），那是他跟一位外国总主教阿纳斯塔西一起在纽约的大街上照的。在劳改营里，他自己住一个单间。他每天在派工地点嫌恶地替囚犯们描写帽子上、棉袄上和裤子上的号码，之后，便回到自己房间懒散地度过一天，有时就找一些俗气的绘画来临摹。他那里居然有一本特列嘉柯夫绘画陈列馆的复制品大画册没有被劳改营当局没收去；我就是为了这本画册才到他那里去的：想翻翻看，也许一生中再也看不到这些作品了。他在劳改营里也还照常按期收到《莫斯科教区通报》，有时还一本正经地谈论一番伟大的殉教者，或讲一些作弥撒的细节。不过，显然是装模作样，完全言不由衷。他屋里还有一把吉他，只是在他弹奏时才使人感到他是真诚的，有时他自弹自唱，声音十分悦耳：

“流浪者渡过了贝加尔湖……”

他边唱边摇晃着身子，似乎他的头上也笼罩着政治苦役犯的悲哀的光环。

一个人在劳改营里生活得越好，他的痛苦也就越细腻……

我当时对什么事都十二分地谨慎。我不再去鲁德丘克那里了。我对他没有讲过关于自己的任何事。这样，我总算象一只无害的小虫子似地逃脱了鲁德丘克锐利的眼睛。而鲁德丘克的眼睛是一双进行着观察的眼睛。

一般地说，老囚犯谁都知道文化教育科有许多眼线，是最不适于会面和交往的地方。在普通劳改营的时候，人们常常愿意到文化教育科去坐坐，因为男人在那里可以见到女人。但在这特种劳改营里去文教科干什么呢?

其实，充满“眼线”的文教科也可以为了自由而加以利用！这是格奥尔吉·滕诺、彼得·基什金、叶尼亚·尼基申三个人教给我的。

我和滕诺就是在文教科认识的。这次短暂的唯一的一次相会使我永不能忘，从此我便记住了滕诺这个人。他身材很高，体格像运动员那么匀称。不知为什么，当时他身上的海军制服和制裤还没有被扒掉（其实那已是我们这里允许穿自己衣服的最后一个月了）。虽然肩上的海军中校的肩章没有了，身上挂着几块 CX－520 号码布，但是，如果立刻让他登上军舰，他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军军官。走动时露出两只长着棕黄色绒毛的手腕，两腕上都刺着花纹：一只上面刺着一个铁锚图案，它的周围有几个字母：**“Liberty”**，另一只上刺着 **“Do or die!”**。[①] 除此之外，滕诺也还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眼睛遮住或者改变样子，使它不再露出骄傲和机敏的目光。他也不能隐瞒那嘴角上的微笑。（我当时还不懂得，这微笑原来意味着：逃跑计划已经拟好！）

这里是劳改营！是布雷区！可是我与滕诺两人是既在这里，又都不在这里：我正走在东普鲁士的路上，滕诺则处在自己的下一次逃跑中。我们各自心里都有秘密计划的潜在能量，但这些都不能通过握手时的双手或简短寒暄时的眼睛流露出任何一点点火花！就这样，我们只交谈了两句完全没有意义的话，我就一头扎到报纸里，他就去同图马连科商量文艺演出的问题了。这个图马连科也是个苦役犯，刑期十五年，可是还让他负责文化教育科的工作。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多层次”人物。人们怀疑他是个“眼线”，但也许猜错了。对于他的行为可以作出更加微妙的心理学上的解释。

说来可笑，苦役营的文教科下面居然还要有，说得确切点是

① “自由”，“成功或者死亡！”

居然要建立一个"文娱活动小组"！而对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却又毫无优待和照顾。所以，除了那些不可救药的文艺迷之外，谁也不参加这类小组活动。可是，滕诺却就是这样一个"文艺迷"，尽管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没有这么坏。何况这个滕诺从到达埃克巴斯图兹的第一天起就是蹲惩戒室的。他在惩戒室请求去文化教育科！劳改营领导认为这是开始悔改的表现，就立即批准他去了……

彼得·基什金根本不是文教科的活动分子，但他在劳改营里最有名。整个埃克巴斯图兹营都知道他。和他一起劳动的囚犯都以他为自豪，因为有了他就不寂寞。基什金像是有点傻头傻脑。但他并不傻，而只是装出那副样子，人们都说："基什金可比谁都精！"他的傻，就像童话中的傻兄弟伊万努什卡一样。基什金这种人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现象，古老的俄罗斯现象：他能够对强有力的恶人大声说出真话，能向人民指明他们的真正处境；而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某种傻呵呵的、安全的形式表现的。

他最喜欢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穿上一件可笑的绿色背心之类的衣服，到饭桌上去收拾吃剩的盘碗。这本身就是一种示威：劳改营里最受欢迎的人为了不饿死不得不在食堂里打扫盘子。他这样做还另有目的：当他迈着轻盈的舞步、作着鬼脸、在食堂串来串去收集残羹剩饭的时候，人们都注视着他，他就在那些干活能手们面前散布一些不安分的思想。

例如，有时候他会在干活能手们正喝着菜汤的时候，突然把人家还没吃的粥碗端过来。当然，那人会大吃一惊，急忙抓住饭碗。这时基什金却满脸赔笑地说（他是圆脸膛，但表情有些生硬）：

"只要别人不触动您的饭碗，您大概也想不到要去抓住什么吧！"

说完就托着一大堆空碗，迈着轻盈的舞步溜走了。

现在，基什金说的每一次笑话已经不仅是在本队的囚犯中间互相传诵了。

有一次，他站在饭桌旁，人们的眼睛离开饭碗，望着他。而他却像玩具小猫那样滴溜溜地转着眼珠，装出一副傻瓜的面孔问道："小伙子们！你们说说，假如父亲是个傻子，母亲是个'破鞋'的话，孩子们会吃得饱还是会挨饿？"

他不等人们回答这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就指着桌上的鱼刺接着说：

"每年七八十亿普特，你们把这个数字用两亿除一下看看！"

说着就走开了。其实，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想法啊！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想到除它一下呢？报纸上早就说，全国一年收八十亿普特粮食，那就是说，一个小孩每天也能分到二公斤面包。可是，我们这些壮汉们每天耕地、种地，可粮食都哪里去了呢？

基什金不断地变换方式。同一个思想，他有时便从另一个角度讲——从讲解烤成面包后"面粉的增重问题"讲起，通常他是利用大家在营门前或岗楼前排除等候的时候讲，因为这时允许说话。他经常提的口号是："发展你们的脸吧！"他经常说："小伙子们！我在营区里走着，一看，你们所有人的脸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都像是只惦记着地里的大麦垛，脑子里别的什么都没有想！"

有时他会突然没头没脑地、毫无联系地当着一群囚犯喊道："达达尼尔！野蛮！"听来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喊一次、两次……慢慢地大家似乎就完全明白这个"达达尼尔"是谁了，反而觉得这个名字既好玩，又贴切，简直连斯大林的两撇胡子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对，是达达尼尔！

劳改营的长官们有时也想嘲笑一下基什金，他们在岗楼前大声问他："基什金，你怎么搞的？头秃得那么光?！大概是吓得老摸它吧?"基什金毫不犹豫地立即当众回答："照您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列宁——译者注)也是因为吓得老摸它喽，对吗?"

有一次，基什金在食堂里一边走一边宣布：今天收过饭碗之后要教给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跳美国查尔斯顿踢踏舞！

突然，劳改营里运来了稀罕东西：一部电影片！晚上，还是在食堂里，不挂幕布，就直接往白墙上放映。人挤得满满的，桌上，长凳上，长凳之间坐满了人，甚至有人坐在别人的大腿上。但是，刚开映便停下来了。只有一束白光柱照到墙上。我们看到几个看守进来了，他们正在给自己物色合适的位子。他们选中了中间一条长凳，命令坐在那里的囚犯把凳子让出来。那些人决心不站起来：好多年没看过电影了，真想看。看守们的声音变得严厉了，其中一个说："那，好吧，把他们的号码记下来！"于是，当然，只好让了。这时，忽然听到一个含着讥讽的声音，像猫叫似地响彻了黑暗的食堂，这是大家熟悉的基什金的声音：

"本来嘛！小伙子们，看守大人们再没有地方看电影了嘛！叫咱们让，咱们就让吧！"

一片笑声。啊，笑声！啊，这就是力量！看守们掌握着一切权利，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号码记下来，而是可耻地退出去了。

"基什金在哪儿？"他们在喊。

可是，基什金不再作声了。这里没有基什金。

看守们走了，电影继续放映。

第二天，基什金被劳改营长官叫去。人们想，这回总得关他五天禁闭！不，基什金微笑着回来了。他写的"检讨"是这样的："看电影时，看守们与在押犯人之间为了座位发生争吵，我曾要求犯人们按规定让出座并走开。"为什么要关他禁闭呢？

囚犯们很想看点节目。虽然影片和戏剧里都像是有意捉弄这些人似地把一切都描绘得很好，但他们还是要看，因为可以在这种时候暂时忘掉自己、自己的痛苦和委屈。对于他们这种看演出的无聊热情，基什金也加以嘲笑。每逢有这类演出或电影时，总有许多人争先恐后地去看。可是，大门还关着，迟迟不开；要等负责的看守来，由他按名单先放那些干活比较好的班组进去看。奴隶般的囚犯们人挨人紧紧挤在门口等着，已经半个小时了。这时，

基什金在人群后面把鞋脱掉，扶着旁边的人跳到最后排的人们的肩膀上去，光着脚，踩着人们的肩膀，从一个肩膀跳到另一个肩膀上，敏捷地往前面跑，一直跑到那令人羡慕的大门口！他蠕动着短小的身躯，做着怪样，使劲敲打大门，极力表现他无论如何也想进去看节目的心情！然后，他又同样敏捷地踩着人们的肩膀跑回来，跳下去走了。人群中起初发出了笑声，但这人群很快就感到一阵羞耻：真的，我们像一群羊似的挤在这里干什么！有什么好东西可看！没见过吗?!

人们开始散去。当看守拿着名单来到门口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可往里放了，谁也不再往里挤。现在，去拿棍子赶他们来看吧。

还有一次，宽敞的食堂里终于要举行一个“文娱晚会”了。人们已经坐好。对于晚会，基什金并不抵制。他穿着自己那件绿背心，在场里跑来跑去，帮助搬搬椅子，拉拉幕布。他每露面一次都引起一阵掌声和欢笑。忽然，他急急忙忙从台口跑过去，仿佛后面有人追他。他边跑边挥动一只胳臂，像发出警告似地叫喊着：“达达尼尔！野蛮！”场里一阵大笑。这时，好像没有配合好似的，幕布拉开了，可台上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基什金却又在这时跑了出来。人们又报以哄笑。可是笑声马上就沉寂下去了：基什金的样子不仅不可笑，而且简直像是发了狂，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叫人看着都害怕。他开始朗诵，浑身颤抖，用昏沉沉的眼睛环视着听众（夹杂着乌克兰语）朗诵道：

我举目环视四周，
这景象使我满怀哀愁，
宪兵肆虐，鲜血横流，
无数的尸体堆成人垛，
被打死的儿子身旁，

斜卧着父亲的尸首！

他这是针对几乎占观众半数的乌克兰人囚犯朗诵的！这些乌克兰人都是刚从沸腾着的各州押送来的。这朗诵等于往他们的新伤口里撒上一把盐！他们哭了，甚至失声痛哭！已经有个看守朝着舞台，朝着基什金这边冲过来了。可是，基什金悲壮的表情一瞬间便溶化在小丑的微笑中了，他已经在用俄语高声喊道。

“这几句纪念一月九日*的诗，还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背会的呢！”

说着便滑稽地扭动着身子跑下台去了。

另一个人，叶尼亚·尼基申，也是个淳朴的小伙子，挺合群，人缘好，方脸膛上有许多雀斑。（在农村被摧毁之前，那里有许多这样的小伙子。如今在农村更多地看到的则是不怀好意的表情。）叶尼亚的声音音量不大，音域也不宽，但他很喜欢唱，唱给同房间的朋友们听，也愿意上台演唱。

有一次报幕员宣布：

“下一支歌《我的妻、我的爱妻》，莫克罗乌索夫作曲，伊萨科夫斯基作词，吉他伴奏，由叶尼亚·尼基申演唱。”

吉他奏起了朴素哀怨的曲调。叶尼亚面向大食堂里挤得满满的听众甜蜜地唱起来，表现出我们内心中那尚未完全变得粗野的、尚未完全变冷的一点点温情：

妻啊，我的爱妻！
只有一个人，只有你，
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的心坎里！

---

* 指1905年1月（俄历）9日沙俄政府镇压彼得堡请愿工人，造成死伤三千余人的事件。——译者注

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舞台正面挂的号召完成生产任务的横幅标语就显得暗淡无光了。劳改营里的年月，已经呆过的年月和剩下的年月，在这灰蓝色的昏暗会场上就像是全都消失了。只有你一个人！此刻我心坎里想的，不是在政权面前承认的莫须有的罪名，不是要跟它算帐的念头，也不是我们饿狼般对食物的关怀……而是只有你一个人！……

我温柔可爱的妻！
不论我走到哪里，
只有你，比谁都珍贵，
比谁都亲密！

这是一支倾诉离愁的歌，歌唱望不到尽头的别离，吉凶未卜的、杳无音讯的别离！这支歌对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有多么合适！它一点也没讲到监狱。还可以把它解释成是有关长期战乱的描述。

我这个地下诗人的嗅觉居然失灵了：我竟没有发现台上朗诵的乃是又一位地下诗人的诗，（这类诗人有多少啊！）而且这位诗人比我更机敏，更能适应公开发表的需要。

对尼基申能怎么样呢？在劳改营里能要求他把歌谱拿来，检查一下是不是伊萨科夫斯基作词和莫克罗乌索夫作曲的吗？既然他那么说，大概是他记得吧。

我看见：图马连科站在舞台后面 带着含蓄胜利的表情微笑着。

大约两千人坐在这灰蒙蒙的会场里。他们一动不动，鸦雀无声，像是他们根本不存在。他们都僵化了，变得严酷了，像石头一样。他们的心被歌声抓住，脸上挂着泪珠儿。原来，他们的眼泪也还知道该从哪里、怎样流出来。

妻啊，我的爱妻！
只有一个人，只有你，
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的心坎里！……

第六章

坚定的逃跑者

如今，当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滕诺谈到他过去的多次逃跑，谈到他听说过的其他难友的逃跑时，他十分称赞那些倔强而毫不妥协的人，如伊万·沃罗比约夫，米哈伊尔·海达罗夫，格里戈里·库德拉，哈菲兹·哈菲佐夫等人。他说："这些人才是坚定不移的逃跑者呢！"

坚定不移的逃跑者！这是指那些坚信人不能住在笼子里的人，而且对这个信念一分钟也未曾动摇过的人。这种人，不管让他去当个有吃有喝的监狱杂役，把他放在会计科或文教科，还是安排在面包房干活，他都始终想着逃跑。这是那些从被关起来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梦寐以求逃跑的人。这是铁了心决不妥协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服从于逃跑计划的人。这样的人在集中营里没有一天是随随便便度过的，不管哪一天，他要么是在准备逃跑，要么正在逃跑，或者就是被抓住了，被打得半死躺在劳改营监狱里。

坚定的逃跑者！他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他看到过陈列在派工地点"以儆效尤"的、被打死的逃跑者尸体，看到

过那些被活捉回来的人——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口吐鲜血，还要拖着他们在各工棚之间走，强迫他们高喊："囚犯们，看吧！看看我这样子！对你们也会这样！"他也知道，追捕逃犯的人们往往嫌逃跑者的尸体太沉，不愿带回营来，于是就只把他的脑袋（或者，正确地按照规定执行的话）加上他的一只右手装在口袋里带回来。（把肘部以下的右臂截下带回，是为了让特别科验证指纹，以便注销。）

确实有这样的坚定的逃跑者！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才迫使当局给窗户装上又粗又密的铁格子，用几十道铁丝网把营区围起来，修建了碉堡、围墙、板墙，布置了潜伏哨、伏击兵，用带血的生肉喂养着军犬。

坚定的逃跑者！他们是不顾别人是否责备他们的，因为有些宁愿在劳改营苟且偷生的人总是要责备他们：你们逃跑，会使我们的处境更糟——管制会更加严格！每天要点十次名！烂菜汤变得更稀！坚定的逃跑者还要摆脱那些耳语声：有的囚犯会诚恳地好言相劝，劝他老实些（"不要铤而走险吧，在劳改营也能活下去，何况还有家属给你寄邮包来！"）；甚至要拒绝关于提出抗议和实行绝食的劝告，因为他们认为抗议和绝食不是战斗，而是欺骗自己。坚定的逃跑者在所有斗争手段中只承认一种，只相信一种，只为这一种作准备——那就是逃跑！

这种人简直就不能不这样做！他们似乎生来就这样。就像候鸟不能不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迁徙一样，一个坚定的逃跑者不能不逃跑。

在两次失败的间歇期间，有些安于劳改营生活的人曾经问过格奥尔吉·滕诺："你怎么老呆不住呢？你跑什么？你在外界，尤其是在今天的外界，能找到什么好东西？"每听到这类话，滕诺就会惊奇地反问："什么叫'能找到什么好东西'？能找到自由！只要不戴脚镣，能在密林里蹲上一天也好嘛！这就是自由！"

像滕诺和沃罗比约夫这样的逃跑者，在古拉格及其机关存在的中期，在胆小的家兔时期，是没有看到过的。这样的囚犯只在古拉格群岛的初建时期有过，后来，到了战后，又出现了。

滕诺就是这样的人。每到一处新劳改营（他是常常被转押的），起初他都很压抑、苦闷，因为他还没有考虑好新的逃跑计划。一旦心目中有了这种计划，滕诺就一扫过去的愁容，变得愉快了，嘴角上常挂着胜利的微笑。

他回忆说，开始全面复查过去的案件并给人们平反时，他反而感到了沮丧，因为他觉得对平反所抱的希望会消磨他逃跑的意志。

*　　　　*　　　　*

滕诺的一生极其复杂，不是本书所能包括得了的。应该说，他的逃跑本领是天生的。孩提时，他就从勃良斯克市的寄宿学校里逃到"美洲"去过，也就是说，坐了小船在杰斯纳河上漂流过；在皮亚季戈尔斯克的孤儿院时，他冬天只穿一件内衣就爬越大铁门跑到姥姥家去过。他的生活道路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航海生活和杂技团的生活这两条线始终互相交织着。从航海学校毕业后，他当过破冰船的水手、扫雷舰的水手长和商船队的领航员。后来又读完了军事外语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北方舰队服役，曾作为苏联的联络军官乘英国护航舰去过冰岛和英国（照片 3)。同时，他自幼就练习杂技；新经济政策时期他还在杂技团表演过。后来，在两次航行之间的空闲时期他曾多次参加演出；他还是杠铃运动的教练，作过"记忆术"的表演，表演快速"记住"许多数字和单词，表演从远距离"猜测"别人的想法等。杂技团的生活和在港口上的生活使他同"流浪者"有了一些接触，因而也就多少沾染了那些人们的作风——冒险性和不顾一切，学会了他们的一些语言。后来，他多次蹲惩戒室，和刑事犯们关在一起，又不

断从他们身上吸收了许多东西。对于一个坚定不移的逃跑者来说，这一切都是有用的。

做人的全部经验积聚在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个人就是这样形成的。

一九四八年，滕诺突然接到命令：立即从海军复员！其实，这件事本身已经是一种不祥之兆了。（他懂得几国语言，在英国舰只上航行过，是爱尼沙亚人，虽然出生地是彼得堡。）但是，人往往都是往好处想的。他也一样。同年圣诞节前夕，他在里加市被捕了。（里加市每年过圣诞节时仍旧使人感到有节日气氛。）他被关进阿玛图大街音乐学院旁边的一间地下室里。当他走进自己生平第一间牢房时，他忍不住了，他不知为什么对那个冷漠无情、一声不吭的看守解释说："今天我和我妻子有两张《基度山恩仇记》的票，电影正好在这个时间开演。基度山伯爵曾为自由而斗争，我也不会妥协的。"

但是，要斗争还早呢！因为我们总是被一种"这是搞错了"之类的设想支配着。心想：我蹲监狱？为什么？这不可能！他们一定会弄清楚的！在把滕诺押往莫斯科之前，还特意派人来安慰他（这是为了押解途中的安全！）：部队反间谍处处长莫尔希宁上校特地到火车站来给他送行，还同他握了手，并且告诉他："您放心去吧！"三个特别护送人员（少校、大尉和一名军士）加上滕诺总共四个人，他们乘软席包厢去莫斯科。在火车上，少校和大尉商量着怎样在莫斯科过一个愉快的新年。（是不是为了捞到一次去莫斯科出差的机会才故意组成了这个特别护送小组呢？）他们商量妥之后就各自躺到上铺去，似乎已经睡着了。军士则躺在对面的下铺上，每当被捕的人一睁开眼睛，这军士必然要动一动。包厢里只有上面的一盏蓝色小灯亮着。滕诺的枕头底下放着妻子最初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送来的东西：她的一绺头发和一大块巧克力。滕诺躺在下铺，陷人沉思。车轮发出有节奏的轻快响声。我们的想

象是可以随意使这种声音充满任何一种意义和预言的。滕诺这时使这种声音充满了“希望”。因此，他根本没有认真考虑逃跑。只是随便想了想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后来他不止一次回想起这个夜晚，但那时却只有悔恨和叹息了。今后就永远不会有这么容易逃跑的机会，自由永远不会离他这么近了！)

夜里，滕诺曾两次去厕所。车厢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军士跟在他后面。军士的手枪系在一条长长的武装带上（海军军人都是这样戴枪的），他也跟着被捕的人一起挤进了厕所。滕诺会拳击和柔道，要想在这里制服军士，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缴下他的枪，命令他不出声，然后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在一个小站下车跑掉。

第二次去厕所时，那个军士不敢再挤进来了，他留在门外。但门是关上了的，在里面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可以打碎玻璃，跳出去：夜车，一九四八年，车开得不快，而且时常停车。不错，是冬天，滕诺没穿大衣，而且手头只有五卢布现钱，但是，他的手表还没有被没收掉。

由特别护送组押送的光荣到了莫斯科火车站就结束了。在乘客们全部下车之后，一个戴蓝肩章的准尉从一辆黑色乌鸦车上下来，走进车厢问道：“他在哪儿？”

交接，失眠，单人囚室，单人囚室。催促尽快审讯的天真要求。看守们的不耐烦的回答：“有你受审的时候，你还会嫌多哩！”

侦查员终于来了。“喂，谈谈你的罪行吧！”“我什么罪行也没有！”“只有罗马教皇才什么罪也没有！”

牢房里住两个人，另一个是装成犯人的眼线。就这样，慢慢地把篱笆加高了。其实是怎么回事呢？经过几次审讯后滕诺就完全明白了：他们根本不是想弄清问题，也不想释放他。那就是说：得逃跑！

滕诺并没有把这世界闻名的列佛尔托沃监狱看成了不起的困难。也许像刚上前线的新兵似的，由于还没有什么经历，所以也

就什么都不怕吧?逃跑计划是由侦查员阿纳托利·列夫申提示的——侦查员用自己的表现（他越来越对滕诺粗暴、凶恶和憎恨）向滕诺提示了这一点。

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尺度。在这座建筑物里曾有几百万人忍受过毒打,有人甚至没有把毒打看作刑罚。但是，对于滕诺来说，单单是想到别人可以任意殴打他而不会受到报复，他就绝对不能忍受了。这是粗暴的侮辱，与其忍受，不如死去。因此，当列夫申在语言威胁之后第一次走近滕诺，要挥动拳头的时候，滕诺霍地站了起来，狂怒地颤动着身子对他喊道："你敢！我反正活不成！可也要挖出你一只眼睛，或是两只！这个我能作到！"

侦查员后退了。他大概认为用自己一只好好的眼睛去换犯人这注定要完蛋的生命是不合算的。于是他就用禁闭室折磨滕诺,好使滕诺的体力衰弱下去。然后他又把在隔壁房间里被刑讯折磨得惨声喊叫的女人说成是滕诺的妻子，并说如果滕诺不招认，他妻子还会受更大的折磨。

侦查员这次又看错人了！滕诺不能忍受别人的拳头，同样，他也绝对忍受不了对妻子的审讯。被捕者心里越来越明确：必须把这个侦查员干掉。这可以同逃跑计划结合起来！侦查员列夫申少校也穿海军制服，也是高个子，浅黄头发。滕诺完全可以冒充列夫申，瞒过侦讯大楼看守长的眼睛。不错，列夫申的脸肥胖而有光泽，滕诺这些日子消瘦了。（囚犯轻易没有机会照照镜子。甚至在审讯中要求去厕所，厕所洗手处的镜子也是用黑布蒙着的。只是碰巧掀动了一下：终于看到自己的模样了。啊，多么瘦！多么苍白！真心痛自己！）

这期间已经从牢房里把那个不中用的眼线撤走了。滕诺便开始研究那个人睡过的床。床上的一根横铁棍儿和床腿连接的地方生了锈，锈得比别处细一些，焊接的地方也不很结实。铁棍的长

度约七十公分。可是，怎么把它拆下来呢？

首先要……训练自己能准确地计算秒数。然后，把每个看守透过门上的窥视孔往牢房里面看的间隔时间都记下来。(当然，还得先弄清是哪个看守值班，应该装作像在床间随便走走的样子。)间隔时间弄清了：四十五秒至六十五秒。

在这一段间隔里，用力一扳，就能把生锈的那一头折断。另一头是完好的，弄断它要费些力气。要站到上面去用两脚往下踩，但踩断后它会碰到水泥地上，发出响声。那就是说，要在一次间隔时间内完成下列几项动作：把枕头放到水泥地上，站到床上，踩断铁棍儿，再把枕头放回去，而铁棍呢，哪怕暂时塞到床垫下也行。而且每个动作都要按秒把时间计算好。

好，拆断了。作到了！

但是，这还不行：人们一进来就会发现，那你就只好死在禁闭室里了。关你二十天禁闭，你不仅会失去逃跑的力气，甚至连侦查员也对付不了了。啊，有了：用指甲把床垫子划破，扯出一点点棉花来。用棉花把铁棍儿的两头包住，再安到原来的地方去，算算几秒钟？好，可以作到！

但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每十天要洗一次澡，而犯人洗澡时间要搜查牢房，损坏的地方立即会被发现。那就是说，应该尽快行动。可是，怎么把铁棍带进侦讯室呢？……从牢房里提犯人去审讯时并不搜身，只在审讯后回来时摸摸身体两边和前边有口袋的地方，目的是搜查刀子之类，怕犯人自杀。

滕诺身上还穿着海军制服，里面是传统的蓝白条纹水兵内衣，这内衣温暖着滕诺的身体，也温暖着他的心灵。"然后我就出海去——痛苦会少些！"他向看守借了针和线(在规定的时间可以借给针线)，装作缝扣子的样子(他自己用面包作的假扣子)。他解开上衣，解开裤子，抽出内衣的底边，把底边从里面折起一小段缝起来，缝成一个小口袋的样子(这是为了把铁条的下端插进

去）。在这之前他已经从裤衩带子上扯断了一小段。现在，他又装作缝上衣扣子的样子把这一小段带子缝在内衣前胸的里子上。做成一个小环，好管住铁条的上端。

然后，他再把内衣前后反穿上。从现在起就开始日夜加紧练习。铁条放在背后内衣里边，穿过小环，下端插进小口袋里。铁条的上端恰好到脖子的高度，低于上衣衣领。要练习的动作是：要在看守往牢房里窥视一眼之后到他窥视第二眼之前这段时间内，完成下列动作：把手举到脑后，抓住铁条的上端，把身子向后挺直，再向前方略微倾斜，像弓弦那样，同时，抽出铁条，猛地一抡，打向侦查员的头部。然后全都恢复原样！看守又看了一眼：被捕者正在翻着书本看书呢！

动作练得越来越快了。抡起的铁条已经在空中发出响声。假如这一击打不死他，至少会把他打昏。既然这些家伙已经把我妻子抓来，那为什么我要可怜这些家伙呢！

还要准备好两个棉花球（棉花还是从垫子里掏）。把棉花球放到嘴里的牙齿外侧，可以使脸显得胖一些。

当然，在这天之前还要刮好脸。可是，监狱里每星期才用钝刀子给犯人刮一次脸。所以，行动的日子不是可以随便选择的。

那么，怎样才能使苍白的脸变得红润些呢？可以往脸上稍微擦上一点血，就用他的血！

逃跑者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像普通人那样“随随便便地”听或看，他必须抱着逃跑者的特殊目的听和看。他应该对任何细节都作出解释，而不应轻易放过去。不管是提他去审讯，还是去放风或去厕所，他的腿都在计算着步数，在记住台阶的数目（这些并不是全都用得上的，但是他还是要记）；他的身体也在记住拐弯的地方；犯人走路时按命令必须低着头，但他的两眼却在记住地面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完好；两个眼珠在可以扫视到的视野内观察着所通过的各个门，记住它们是一扇的还是两扇的，门上是什么

把手，什么锁，门往里开还是往外开；而同时头脑还应该判断出每扇门的用途；耳朵也不能休息，它在倾听着并在进行着比较：对，我在牢房里听到过这种响声，噢，原来是这么回事。

有名的列佛尔托沃监狱大楼是个"K"字型建筑，楼梯护栏之间的空处直通上下各层，金属护栏；指挥哨兵在挥动小旗。拐进侦讯楼了。每次审讯都在不同的侦讯室进行。这样更好！可以了解到侦讯楼的所有走廊和门的位置。侦查人员怎样从外面进到这里来呢？就是从这个小方窗户旁边的门进来的。当然，主要检查他们证件的地方不是这里，是外面的岗楼，但是，他们在这里似乎还要打声招呼或者要出示件什么东西。刚巧有一个人往楼下走，他边下楼边朝着上面的人喊道："那我这就到部里去啦！"很好，这句话可能对逃跑者有用。

侦查人员从这里出去之后怎样走到外面的岗楼？这就要凭想象来判断了，而且必须毫不犹豫地、正确地走去才行。好在是冬天，雪地里当然会有人们走出的小路，或者那里的柏油路面会显得更黑、更脏些。可是他们怎样通过岗哨呢？出示自己的证件吗？还是进来时已经把证件留在门口，出去时只须说出自己的姓名，取回证件就行？或者是哨兵认识每个人的面孔？那么，主动报自己的姓名反而会犯错误。或许只伸手去拿就行？

许多问题都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只要你不被侦查员提的那些无聊的问题缠住，而能够留心观察他就行。为了削铅笔，列夫申从胸前的衣袋里掏出一个什么证件，取出夹在那里面的一片刮脸刀来。从这里马上就可以看出问题了："他掏出的不是出人证。那么，出人证在哪儿呢？留在岗楼了吗？"

"他掏出的那个小本本很像汽车驾驶执照。那么他是乘自己的汽车来上班吗？那就是说，他身上还应该带着汽车钥匙。他把车停在监狱大门前吗？必须在这里，在离开侦讯室之前，看看他小本上的汽车牌号，出去之后可不能搞错！"

“看来监狱里没有衣帽间，因为他每次都把大衣和帽子挂在侦讯室的墙上。这样更好。”

不能忘记和漏掉任何一件重要的事，而且要把所有的事都在四、五分钟之内做好。当列夫申被他打倒在地的时候，必须立即按下列顺序行动：

1）脱掉自己的上衣，穿上他较新的带肩章的上衣；

2）解下他的鞋带，把它穿在自己没有鞋带因而不跟脚的鞋上（这一项就要占不少时间！）；

3）取出他的刀片，塞进事先在自己鞋后跟上准备好的地方（如果被抓住，被关进牢房后可以用它立即割断自己的血管）；

4）查看他的全部证件，带走其中必要的；

5）记住他的汽车牌号，找到汽车钥匙；

6）把有关自己的侦讯材料塞进他的厚厚的公事包，带走；

7）摘掉他的手表；

8）用血把自己的脸微微抹红；

9）把他的尸体拖到桌子后面或厚窗帘后面；如果有人进来，便会以为侦查员已经走了。免得有人追来；

10）把棉花揉成团，放到腮下；

11）穿上他的大衣，戴上他的帽子；

12）把开关上的电线扯断。如果有人很快就进来，屋里漆黑，他去开一下开关，灯不亮，他会想：大概灯泡烧坏了，所以侦查员改在别的房间侦讯了。即使换上灯泡，也不会立即弄清是怎么回事。

这样，总共要作十二件事。然后就是逃跑本身了……所有这些事都要在夜间审讯的时候干。如果那个小本本不是驾驶执照，可就糟了；那就是说，他来回都是乘侦查员班车、（会用班车接送他们的，因为是深夜嘛！）那末，别的侦查员就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列夫申今天没审讯到早晨四五点钟，就在半夜里步行回去了呢？

对，还有：走过那个小窗户时要把手帕掏出来捂住鼻子，装作擤鼻涕的样子；同时还要往手表上看一眼。另外，为了不使哨兵生疑，还要朝楼上喊一句："佩罗夫！（这是列夫申的朋友）我这就到部里去！咱们明天再谈吧！"

当然，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目前只能说有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五的机会。几乎没有希望，因为对外层的岗楼情况完全不清楚。但是，那也不能像奴隶一样死在这里！不能等到衰弱得人们敢用脚踢你的地步！最后鞋后跟里还有一个刀片可以用嘛！

于是，在刮脸之后的一次夜间审讯时滕诺就把铁条藏在背后带出来了。侦查员在讯问、辱骂、威胁，可是滕诺望着他，心里暗自奇怪：他怎么会感觉不到自己没有几分钟可活了呢？

已经夜里十一点了。滕诺打算在这里拖到两点左右，因为那时候有的侦查员就该走了，好去过一个"短暂的夜晚"。

那时候，就可以找个机会了：或者就像往常一样让侦查员把记录递过来签字。伸手接记录纸时就突然装作不舒服的样子使记录纸掉在地上。他必定会低头往下看，这时就……或者，根本不需要利用什么记录，简直就站起身，摇晃着身子对他说："很不舒服，请给口水喝！"这时他会把搪瓷缸递过来（茶杯是他自己用的）。把水喝下，使搪瓷缸子掉在地上，同时举右手往脑后抬，这样看来会很自然，像是头晕。侦查员一定会俯身去看掉在地上的缸子，这时就……

心脏在猛烈地跳动。这是节日的前夕，或者就是死刑的前夕。

但是，实际情况完全出乎意外。将近十二点钟的时候，另一个侦查员急急忙忙走进来，凑到列夫申耳旁小声嘀咕了几句。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列夫申有点着慌了，立即按了按电钮：叫看守来把犯人带回去。

一切全完了！……滕诺又回到牢房，把铁条放回原处。

另一次提审时，滕诺的胡子很长。（这个模样把铁条带去就没

有意义了。)

再一次是白天审讯。而且审讯经过不同往常：侦查员没有发火，没有咆哮，却用一句预言似的话动摇了滕诺的决心，他说：最多判你五年到七年，没什么可伤心的。这样也就不再想割掉他的脑袋了。滕诺的恼恨没有保持多久。

感情的高峰过去了。看来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不能这么干。

逃跑者的情绪也许比演员更加变幻莫测。

这样，长时期所作的全部准备都等于白费……

但是，逃跑者对这种情况也应该经受得住才行。他已经上百次地在空中抡起过铁条，他已经“打死”过上百个侦查员，已经多少次经历过自己逃跑的一切细节了：在审讯室里，通过那个小方窗户，走到岗楼，通过了岗楼……他已被这次逃跑累得疲惫不堪……可是，原来他还根本没有开始呢！

不久就换了另一个侦查员，滕诺被转押到卢宾卡监狱。在这里，滕诺没有作逃跑的准备(审讯进程使他产生了较大的希望，下不了逃跑的决心)，但他还是时刻观察着，也在制定逃跑练习计划。

从卢宾卡监狱逃跑？这可能吗？……可是，要是认真想一想，这也许比从列佛尔托沃监狱逃跑更容易。每次提审时都要穿过很长很长的走廊。他很快就摸清这走廊了。走廊里某些地方有箭头标着“通向二号大门”，“通向三号大门”等字样。(真遗憾，自由的时候怎么竟没有留心观察一下卢宾卡周围呢？怎么没注意它什么地方还有大门呢！)说这里容易跑，是因为这个地方不全是监狱，还有安全部的办公楼。这里有许多侦查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所以警卫不可能全都认识。进出门全凭出入证，证件就在侦查员的衣袋里。既然站岗的人不认识面孔，也就不一定要长得像某个人了，大体上差不多就行。新侦查员不穿海军制服，他穿国防绿军装。那就得换上他的衣服。铁条没有了，但是只要有决心就行。审讯室

里总有各种东西吧，比如，石制的吸墨器之类。其实，并不一定要打死他，只要使他失去知觉十分钟，就可以走掉了！

但是，他总还是抱着一种模糊的幻想，指望着宽恕和理智，这就使他的决心变得不那么坚定了。只是在被关进布蒂尔卡囚犯营之后，他才摆脱了这种幻想的重担：根据特别庭的一纸公文，他被判：二十五年劳改。他在判决书上签字时反而感到松了一口气，不由得微笑了一下。进入判刑二十五年的犯人牢房时，他觉得自己的脚步反而变得轻快了。这一宣判使他摆脱了卑微感，也不再想违背良心进行妥协了；他一扫过去那种俯首听命和巴结逢迎的态度，不再像乞丐一样等待那答应过他的五年到七年刑期了。判你妈的二十五年??? 那还指望你们什么呢?! 当然，要逃跑!!

或者，就是死！但是，死亡难道比四分之一世纪的奴役更坏吗？不，单单是把他的头剃光（剃成普普通通的光头，别人有谁会因此苦恼呢?!）滕诺就已经感到莫大的侮辱了，就像往他脸上唾了一口似的。

现在该寻找盟友了。还要研究过去其他人逃跑的历史。在这方面滕诺还是个新手呢。但以前总会有人跑过吧！

看守带我们去审讯时，经常走过那些用铁栅栏分成一段一段的布蒂尔卡的走廊啊！但是，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留心过滕诺一眼就注意到的问题呢？看，每道门都有两层隔栅，而看守只开一道锁隔栅就全打开了。那就是说：第二道隔栅暂时是不起作用的。第二道隔栅是由三根粗铁条组成的，铁条从墙里伸出来，穿进铁门。

在牢房里，囚犯们各找各的事作。滕诺则在寻找过去逃跑过的犯人和有关逃跑的谈话。他发现了一个叫马努埃里·加尔西阿的人，此人曾经由于这走廊里的三根铁条组成的第二道隔栅遭到过意外的麻烦。这事发生在几个月前。一天，一间牢房的犯人出去理发时一哄而起把看守抓了起来。（因为许多年没出过事，看守们都已经习惯于囚犯们的驯顺了。这个看守那天违反条例而单独

行动，以致被抓。）犯人们扒下看守的制服，把他捆起来塞进厕所，一个犯人换上看守制服，拿他的钥匙打开了走廊里所有的牢门（这里也有死囚牢，这就助长了形势的发展）。人们叫喊、欢呼，闹着要去开其他走廊的牢门，占领整个监狱，失去了警惕和谨慎。本应该由穿制服的人先把走廊里的门全打开，其他人暂时先各自在牢房里准备着。可他们这时却成群地呼叫着涌入了走廊。呼喊声惊动了隔壁走廊的看守，他们从窥视孔望了望（牢房两面都有窥视孔），按动了紧急警报的电钮。中央控制台根据信号立即按动开关，所有走廊的第二道隔栅一下子全都锁上了。一般看守的钥匙是打不开第二道隔栅的。骚乱的走廊被切成许多小段，互不相通。卫兵赶到了。他们列队站成夹道，一个一个地往回——往牢房里放犯人，犯人们边通过边挨打。终于把带头闹事的人找出来，带走了。可这些囚犯都是已经判二十五年的。是把他们的刑期从头算起了呢？还是全部枪毙了？

后来便是编队押往劳改营。囚犯们熟悉的喀山火车站上的"警卫棚"（当然，那是设在避人耳目的地方的）。用黑乌鸦车把囚犯运到这里，再装进专门的"囚犯车厢"，然后把这些车厢接到列车上。警戒部队排成两行在火车的两边紧张地严密守卫着。军犬不住地扑向囚犯的脖子。口令声："警卫队，准备战斗！"接着是要命的子弹上膛声。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就这样，带着军犬，把滕诺押送走了。逃跑？军犬立刻会追上你！

但是，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逃跑者。因为屡次企图逃跑，他不断地从一个劳改营被转押到另一劳改营，从一所监狱转押到另一监狱。等着吧，他还要见识许多这样警卫森严的火车站和押解部队呢。有时候押解队不带军犬。那么，就装成腿瘸，有病，勉强拖着脚走，吃力地拖着自己的干粮口袋和厚棉衣，这样可以使卫兵比较放心。如果车站上停着很多列火车，那不是就可以在列车中间绕圈子吗？于是，扔掉东西，弯下腰去，往火车下面钻！但

是，刚弯下腰，你忽然发现列车那面有两只士兵的脚：那边还有预备的警戒队……他们全都想到了。那你就只好马上装作身体支持不住要跌倒的样子，所以才把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上的。要是很幸运，旁边线路上恰好有一列火车很快地开过来，那就可以在火车即将通过的时候猛地跳过线路去，这时，没有一个押解兵会追你！你是为了自由才冒生命危险。他呢？犯不上。可是等火车开过去之后，他们已经找不到你了！不过，为此需要双倍的幸运：既要过站的列车及时到来，又要你能及时把自己的脚从火车轮前面抽走。

从古比雪夫递解站决定用敞篷卡车把囚犯们送往火车站，在车站上要编组一列庞大的红色（囚犯）列车。在递解站时，滕诺从关押在一起的一个"向来尊重逃亡者"的本地小偷那里得到了两个地址，他说是可以在那里得到最初的帮助。滕诺把这些地址也告诉了另外两个想逃跑的人，并且商量好：上卡车时三个人都尽量往后排坐，等车开到拐弯处时必定会减速（滕诺的两个同伙坐乌鸦车往递解站来的时候没有闲呆着，他们已经注意到有这样一个拐弯处，虽然不大容易看出来），那时三个人一起——向左、向右、向后——往下跳！简直从警卫的身旁穿过去，甚至可以顺势撞倒他！即便警卫开枪，总不可能三个都打中的。甚至不一定开枪，因为街上行人很多。卫兵们会追？不，他们不能扔下卡车上别的犯人不管，也就是说，他们将只会喊叫，会向空中鸣枪示警。谁会阻拦呢？老百姓，本国的苏联人民，行人会阻拦。那很简单，吓一吓他们就行了，说是手里有刀（其实没有刀）！

上车前搜身和点名的时候，三个人故意磨磨蹭蹭，尽量在天黑以前不上车，等着上最后一辆车。终于，最后一辆车开来了，可是……这车却不同于前面那些载重三吨的矮车帮卡车，而是一辆高车帮"史蒂倍克"牌美国卡车。甚至滕诺那样的高个子坐下去头也比车帮低。"史蒂倍克"车开得很快。拐弯处！滕诺瞟了两个

战友一眼：他们都面带恐惧。不，他们不会跳的。不，他们不是坚定的逃跑者！（不过，你自己是否很坚定呢？……）

黑暗中，在手电筒的光束中，在各种呼叫声、狂吠声、骂声和金属撞击声中，他们被塞进运牛车厢。这时候滕诺却违背了自己的习惯：他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车厢的外形。（坚定不移的逃跑者是应当及时注意到一切细节的，什么也不能漏掉！）

每到一个车站，就有人用小锤惶惶不安地敲打车厢的木板。他们把每一块板都敲敲。这就是说，他们不放心……不放心什么呢？怕把木板锯断？这也就是说，应该锯！

在一个小偷身上找到了一小段磨过的刀锯。几个人决定锯开下铺下面的一块板。等到火车减速的时候，从这个窟窿钻下去，落到枕木上，伏身等待火车通过。但是，了解情况的人说：凡是挂着"运牛车厢"的列车后面都装有所谓的"采捕器"，这是一种类似铁耙子的东西，它的齿伸得很低，离枕木很近，这些齿会把逃跑者的身体挂住，带着他在枕木上擦过去，人也就会这样被擦死。

整个夜晚，他们几个人轮班钻到下铺底下去，用一块布缠住几公分长的一小段刀锯，锯车帮上的一块木板。真不容易啊！但还是锯好了第一道锯口。木板有些活动了。把板子推开了一个缝。但他们清早却看到车厢外面还装着一层粗糙的白木板。为什么板子是白色的？这是在他们车厢外面又装置了一条不宽的警卫平台。正好在他们锯出的切口上方的平台上就站着一个卫兵。锯木板显然行不通。

囚犯的逃亡，也同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有它的历史，有它的理论。在自己开始行动之前，你不妨先把这些了解一下。

囚犯逃亡的历史，就是已经发生过的逃跑事件。关于逃跑的技术问题，契卡行动部门是不会出版什么普及小册子的，它们只是自己积累经验。这方面的历史，你可以向那些被捉回的逃跑者

去了解。他们的经验非常珍贵：那是用血，用痛苦，几乎是用生命换来的。但是如果你一步一步地去问第一个、第三个、第五个人的详细逃跑经过，那可不是开玩笑，那非常危险。这同公然打听通过谁可以加入地下组织一样危险。你们的长时间谈话可能被眼线听去，给你汇报。主要的是那些讲故事的人本身在逃跑失败后，经过痛苦的折磨和生与死之间的选择，说不定会变得胆小了，也会被雇佣，或许现在已经不是志同道合的人，而是变成了诱饵。而狱中的“教父”——即看守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事先看出谁同情逃跑者，谁对这些事感兴趣。然后他们便抢在那些潜在逃跑者前面，在他的登记卡上做上一个记号，这人就会被转押到加强管制工棚去，逃跑就更困难了。

但是，从一座监狱到另一监狱，从一个劳改营到另一劳改营，滕诺一直在热心地打听逃跑者。他一次又一次地逃跑，一次又一次地被抓住。可是在劳改营监狱里他恰巧和一些逃跑者关在一起，所以也就不断地向他们打听。（他也看错过人，犯过错误。例如，曾经英勇地逃跑过的斯捷潘有一次就把滕诺出卖给肯吉尔劳改营的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了。于是别利亚耶夫向滕诺重述了他打听过的所有问题。）

至于逃跑的理论，那很简单：各显其能。跑成功了，那就是说，你已弄懂这个理论；被抓住了，那就是说，你还没有学握好。但它也有一些起码的原则：可以从建设工地跑，也可以从生活区跑。从工地上逃跑比较容易，因为那里的警戒总不像生活区里那么森严，而且逃跑者手里还可以带上工具。可以一个人逃跑，这有很多困难，但这样就无须担心被人出卖。也可以几个人一起跑，这要容易些，但全看所选择的同伙是否合适了。这个理论中还有一条规则：要熟悉地理，对地图要了如指掌才行。可是，在劳改营里你根本看不到地图。（顺便说一句，普通刑事犯们是不懂地理的，他们认为上次呆过的那个递解站比较冷，所以必定是在北方。）

还有一条：必须了解你将逃到那里去的群众情况。还有这样一条方法论上的原则：你应该经常按计划作逃跑的各项准备，但你也要每分钟都准备好用另外的方式——伺机逃跑。

例如，有过这样一件伺机逃跑的事。它发生在肯吉尔营。有一次，把惩戒室的所有犯人都带出来做土坯。突然，刮起了哈萨克斯坦特有的黄沙风暴：霎时间天昏地暗，看不见太阳了，飞砂走石直向人们脸上打来，谁也不敢睁开眼睛。谁也没有准备好这样突然地逃跑，可是尼古拉·克雷洛夫却跑向隔离区的边界，把棉衣扔到铁丝网上，爬过去了。全身都划破了，但他还是逃了出去，藏起来了。风暴过后，人们看到铁丝网上的棉衣才知道有人跑了。便派人骑马带着军犬追捕。但是风暴把一切痕迹都扫掉了。克雷洛夫钻到垃圾堆里躲过了追捕的人。可是，到了第二天总该往前走吧！这时他被派往草原各地的汽车追上了。

滕诺住的第一个劳改营是杰兹卡兹甘附近的新鲁德诺耶营。这就是注定使你死亡的地方。你也正是该从这个地方逃跑！周围是无边的沙漠：大片盐碱地和沙丘，有的地方是草根土，有的地方长着些骆驼刺。偶尔可以看到哈萨克牧民的羊群，大部地区荒无人烟。没有河流。想找到一口井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好的逃跑时间是四五月，这时有些地方还可能有融化的雪水形成的小水塘。但是，这个情况警卫人员也很清楚，所以四五月间看管非常严格，上工时搜查得很细：一点点吃的东西，一块多余的布也不许带出营外。

那年（一九四九年）秋天，三个逃跑者（斯洛博佳纽克、巴季钦科、科任）冒险往南方逃跑了：他们指望沿萨里苏河奔向克齐尔奥尔达。但是，这条河完全干涸了。他们在快要渴死的时候被追捕队抓住。

滕诺根据他们的经验断定：秋天是跑不成的。所以他经常规规矩矩到文化教育科去——本来嘛，他可不是想逃跑的人，也不

想捣乱，他属于那些有清醒理智的囚犯，这种人都盼望能在二十五年刑满后重新作人呢！他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文教科工作，他答应演个节目，表演杂技和"记忆术"。但是，眼前，他要先了解一下文教科里的资料，翻翻书看。他翻遍了文教科的书，终于找到一张未被"教父"们撕掉的哈萨克斯坦的旧地图。噢。原来确实有一条商队走的路，通往朱萨雷，全长三百五十公里。这条路上肯定会有井。往北去距伊希姆四百公里，这条路上还可能有牧场。距巴尔喀什湖五百公里，中间是别特巴克达拉沙漠。不过，追捕队不大可能朝这个方向追。

距离就是这样。选择也就这样定了……

任何东西都可能被爱钻研的逃跑者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时候会有一辆清除污秽的汽车开到这里，车上装着个大储存罐和一条管道，管道的口径相当粗。滕诺完全可以钻进去。在储存罐里可以稍稍弯着身子站立起来。钻进去之后，任凭司机往罐里吸污水好了，只要不装满就行。自己会全身站在脏水里，路上脏水还可能溅到嘴上，也可能倒在污水里，喘不过气来。但是，这一切对滕诺来说都比作为奴隶服满刑期好得多。他反问自己：有决心这么干吗？有！可是，汽车司机肯不肯？他可是个有驾驶执照的刑期不长的普通刑事犯呀。滕诺同他一起吸烟，留心观察着。不，他不是我所需要的人，他不会为了帮助别人而拿自己的驾驶执照冒险。按他的心理状态，完全是个甘心接受劳改的人，他认为帮助别人的是傻瓜。

这一冬天滕诺制定了计划并且选好了四个同志。但是，正当他按照逃跑理论的要求耐心地按计划进行准备工作时，突然，他被调到一个新开辟的建设工地上去了。这是一个采石场，位于丘陵地带，从劳改营看不见它。眼下这里还没有修起碉堡和障碍地带，只是埋上了几排木桩，拉起了铁丝网。铁丝网有一处缺口，算是"大门"。铁丝网外面站着六名持枪卫兵，他们站在平地上，并

不比地面高。

卫兵们背后，那就是芳草如茵、郁金花红（鲜红色的郁金花呀!）的四月草原了!！逃跑者的心可是经受不住这郁金花和四月空气的引诱啊！也许，这就是机会到了吧？……你目前还没有受到怀疑，还没有住到惩戒室去，那么，这不正是逃跑的好时机吗！

在这段时间里滕诺已经认识了营里许多人。他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四人小组：米沙·海达罗夫（曾是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北朝鲜驻扎过，为了逃脱军法审判跑到三八线南边去了；但是，美国人不希望损害他们在朝鲜同苏联的牢固的良好关系，所以又把他送回来；他拿到了一张“二十五元券”——刑期四分之一世纪），亚兹季克（他是个波兰人，曾在安德斯的军队里当过汽车司机；他指着自己脚上那两只不成双的靴子形象地、南腔北调地用俄语叙述自己的经历：“这两个〔只〕靴子，一个〔只〕是希德〔特〕勒给的，一个〔只〕是斯达〔大〕林给的。”），还有一个人原是古比雪夫市的居民，铁路员工，叫谢尔盖。

一天，刚好开来一辆大卡车，载着粗大的水泥柱子和一团团的蒺藜铁丝：马上就要在工地周围修建障碍地带了。这时刚好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滕诺这个四人小组因为“热爱”这苦役劳动，又特别“喜欢”加固障碍地带，所以就自告奋勇，要求在休息时间马上卸车。他们立即跳上车去，干起来了。但由于这毕竟是午休时间，所以干起活来也还是慢吞吞的。他们边干边考虑对策。汽车司机到一旁休息去了。其他囚犯也都各自躺在地上休息，晒太阳。

咱们跑还是不跑？身上可是什么也没带——刀子、行装、食物、计划，什么都没有呀。不过，如果乘汽车的话，滕诺根据地图知道，可以开往杰兹德，从那里再开往乌卢塔乌。几个人心里燃起了希望：机会，这可是个机会！

从这里到“大门”前的哨兵处这一段恰巧是个斜坡。出去不

远，路就拐到山岗后面去了。如果开得快些，也许他们还来不及开枪。哨兵也不会扔下自己的岗位去追！

车上的东西卸完了。休息时间还没有完。汽车可以由亚兹季克驾驶。他跳下车去，在车旁磨蹭了一会儿。这时车上的三个人全都疲倦地躺倒在车厢里，让车帮挡住了。也许并不是所有卫兵都看到这几个人到哪里去了。这时，亚兹季克把司机叫来：我们没有耽误你，卸完了车，总该赏支烟抽吧。抽了一支烟。喂，把车发动起来吧！司机坐进了驾驶室。可是，不知为什么老是发动不起来。(车厢里的三个人不了解亚兹季克的计划，暗自捏一把汗：完啦！)这时亚兹季克走过去拿起摇把来用力摇。还是发动不起来。亚兹季克已经摇累了，建议司机和他换换。现在亚兹季克进入驾驶室了。发动机隆隆地响起来，车发动了！可是此刻汽车却朝着大门口的哨兵直冲过去。(后来亚兹季克说：他事先给司机把油门关掉了，他上车前又及时把它打开了。)汽车开动了，但司机并没有急着跳上车去，他以为亚兹季克会把车刹住。一瞬间，汽车已经高速通过了“大门”。

卫兵们喊了两声“站住！”，但汽车继续往前开。哨兵们的一排枪声。起初是朝天放的，因为很像是出了什么差错。也许是朝汽车打的，车厢里的人躺着，当然不知道。转弯。已经转到山岗后面，逃出射程了！车厢里的三个人还没有抬起头来。车开得很快，猛烈的颠簸。突然，车刹住了，亚兹季克绝望地叫起来：他走错了路，开到了矿山的大门口！这还是本劳改营的营区，看，本营的碉堡！

一阵枪声。警卫人员奔跑。几个逃跑者急忙跳下车来，趴到地上，用两手捂着自己的头。警卫人员用脚乱踢，专往脸、耳朵、太阳穴踢，往肋骨上踢。

人类普遍实行的一条宽大原则——“不打躺倒的人”——在斯大林的苦役营里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这里专打已经倒下的人！对

站着的人就是开枪。

但是，审讯结果判明：根本不是什么逃跑！本来嘛！几个人一口咬定他们正在车厢里打盹，忽然车开了，接着就是枪声，怎么敢往下跳呢？会被枪打死的！那么，亚兹季克呢！他是没有经验呀，控制不了这辆车。但他总是没有往草原上开，而是开到邻近的矿山上来了嘛！

就这样，总算是以一顿毒打完事了。

米沙·海达罗夫以后还有多次逃跑。甚至到了比较温和的赫鲁晓夫时期，当许多原先想逃跑的人都开始动摇、期待着合法释放的时候，海达罗夫还同那些没有希望（获得赦免）的朋友们企图从全苏军人惩戒监狱"安焦巴—307"逃跑过。商量好了，当逃跑者用斧头砍障碍地带的铁丝网时，他们的同伙就朝碉堡扔几个自制手榴弹，以转移卫兵的往意力。可是，自动步枪的火力网还是把他们拦住了。

至于他们的计划中的逃跑，还在继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准备。做好了一个方向盘：在一个小塑料盒上刻出罗经方向点，把一小段磁化了的缝衣针装在一小块木头漂子上，往盒里灌上水，就成为一个罗盘了。饮用水最好装在一条汽车内胎里，逃跑时就可以像军大衣似的卷成背卷背着。这些东西（食品和衣物）要一点一点带到木材加工厂去，藏在那里的电锯房旁边的坑里。按计划就是要从木材加工厂逃出去。他们从一个自由人司机那里买到了一条旧汽车内胎，已经装上水放在坑里了。这里有时候晚上也有列车到达，为此就得在工地留下一些囚犯卸货。这就是逃跑的机会。有个自由人接受了一条从营区偷出来的床单（这就是我国的价值体系！），便同意事先替我们把电锯房对面的铁丝网的最下面两道剪断了。运原木的列车已经开来，眼看晚上就要卸车了！但是，这时有一个囚犯，哈萨克人，发现了他们藏东西的地方，告密了。

逮捕、拷打、审讯。对滕诺来说，这种好像是逃跑中的"偶

然事件”太多了。当局决定把他们几个人转押到肯吉尔营的监狱去，滕诺奉命面向墙站着，两手倒剪在背后。这时文教科的大尉处长走过滕诺身旁，停下来，对着他感叹地说：

“唉，你这小子！可真是的！你白搞文娱活动了！”

使大尉感到奇怪的是：这个曾热心于普及劳改营文化的滕诺怎么会想逃跑呢？开晚会那天演出后不是还多给了他一份饭吗?！可他却还想跑！他还需要什么呢？……

一九五〇年五月九日，战胜德国胜利五周年纪念日，曾在前线英勇作战的海军军官滕诺走进了有名的肯吉尔监狱的牢房。牢房里很黑，只在墙的最高处留了个很小的窗口。透不过气来。有很多臭虫，墙上满是臭虫血。这年夏天特别热，达到四十至五十度。大家都光着身子躺着。床下面凉快些，但是夜里却有两个人从床底下跳起来了，原来是两只避日虫爬到他们身上去了。

肯吉尔监狱里关押的都是从各劳改营挑选出来的囚犯。各牢房里都有几个经验丰富的逃跑者。简直是一批精选的雄鹰！滕诺终于找到那些坚定不移的逃跑者了！

曾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伊万·沃罗比约夫大尉也关在这里。战争期间他在普斯科夫州打过游击，这是一个性格刚强、决不能忍受压迫的人。他已经逃跑过几次，今后还要逃跑。遗憾的是，他不会采取一点劳改营里的伪装——有点呆气反而对逃跑有好处。他继续保持着前线士兵的直爽。他有一位“参谋长”，两人公开坐在床上划地形图，商量办法。要他改用劳改营里不得不采用的隐蔽和狡猾的办法，他是作不到的，所以他每次都被眼线们出卖。

他们俩在盘算着一个计划：要是分发晚饭时只有一个看守，就把他抓起来，用他的钥匙打开所有牢房。冲向监狱门口，占领门口的哨所，打开监狱的大门，冲向劳改营的岗楼，一举擒拿住门岗，天黑前冲出营区……

把他们抽调去建设住宅区了。于是他们就盘算怎样通过阴沟

跑掉……

但是，这些计划都未能付诸实行。同年夏天，不知为什么给所有这些挑选出来的人都戴上手铐，把他们押送到斯帕斯克营去了。在斯帕斯克营，这些人被关在四周隔离的、加强警戒的工棚里。到达后第四天，坚定不移的逃跑者们把窗上的铁栅栏抽掉，从窗户跳到院子里，悄悄打死那里的军犬，打算从房顶跳到大营区去。但是，不料屋顶上装的是铁皮，被人一踩发出了雷鸣般的轰鸣。看守们拉起了警报。可是，当士兵们跑到逃跑者的工棚时，大家都在安静地睡觉，铁栅栏安得好好的。刚才的轰鸣不过是看守的"错觉"罢了。

命中注定，命中注定这些人不能长期呆在一个地方！不安定的命运正在把这些坚定的逃跑者像不安定的荷兰人一样往更远的地方驱赶。如果他们自己不逃跑，就把他们押送去。现在又给这伙无孔不入的人铐上手铐，把他们送往埃克巴斯图兹监狱了。到了埃克巴斯图兹，本营的两名失败的逃跑者——布留欣和穆吉亚诺夫——也加入了他们一伙。

对于这些再次犯了"罪"的人是要加重惩罚的，所以他们被派到石灰场去劳动——在风里装卸运石灰的汽车。生石灰粉飞进他们的眼里、口里、嗓子里，也就在那里"煮熟"了。他们光着上身装卸熟石灰，身上粘满一层石灰粉。用来改造他们思想的这种日复一日的毒害性劳动，只能迫使他们想方设法尽快地逃跑。

逃跑计划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石灰是用汽车运来的，那就利用汽车逃跑吧！这里的营区目前只有铁丝网，可以冲出去，必须找一辆加足了油的车才行。几个逃跑者中间有一位高明的司机，叫科利亚·日丹诺克，商定由他开车，由那个从电锯房逃跑未遂的滕诺配合。已经商量定了，但是伊万·沃罗比约夫过于任性，过于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别人的能力。因此，当汽车已经到手的时候，伊万·沃罗比约夫却代替日丹诺克掌握了方向盘。(逃跑者拿出匕

首从左右两门同时进入驾驶室，司机吓得脸煞白，只好乖乖地坐在中间跟着一起参加逃跑了。）

这是分秒必争的时候！大家应该一齐跳进车厢，开车往外冲。滕诺恳求道："伊万！让开吧！"但是伊万·沃罗比约夫不让！滕诺和日丹诺克不相信他的驾驶技术，他两人留下来了。现在只剩三个人逃跑了：沃罗比约夫、萨洛帕耶夫和马尔季罗索夫。突然，列季金不知从什么地方跑了出来。他是个数学家、知识分子，怪里怪气的，根本不是个能逃跑的人。他是为了别的事被关进惩戒室的。但是，他现在离得很近，看见了，明白了，他手里不知为什么拿了一块肥皂，而不是面包。他跳进了车厢，一边说："争取自由？算我一个！"

（就像是急急忙忙跳上公共汽车一样，边上边问："是上逍遥园去的吗？"）

汽车转了个小弯，先用慢速前进，头几排铁丝网就被汽车的前保险杠逐步冲断，后面几排就要靠速度和驾驶室的冲力解决了。在障碍地带的内缘，汽车还可以在柱子中间穿行，但一进入障碍地带就势必要把柱子撞倒，因为那里的柱子是互相交错的。于是，汽车用最高速度去撞倒柱子！

岗楼上的警卫着慌了。几天前另一处工地上发生过一件事，是喝醉酒的司机撞坏了障碍区的柱子。这个司机是不是也喝醉了？……警卫们大约有十五秒钟犹疑不定。说时迟，那时快，汽车已经把柱子撞倒，继续高速前进，而且轮胎也没有爆炸，压过铁丝网冲了出去。现在，该开枪了！可是，不知道朝哪儿开枪：因为为了保护卫兵们不受哈萨克斯坦的大风袭击，岗楼外侧围了一道板墙，所以，从岗楼上只能朝隔离区内部或者顺着障碍地带开枪。可这时汽车已经冲出区外，看不见了，只看到朝草原去的方向扬起了尘土。所以只有无可奈何地从碉堡上对空射击。

路上空空荡荡，草原平平坦坦，再过五分钟，沃罗比约夫的

汽车就可以开上地平线了！但是，这时完全偶然地开来了一辆警卫部队的乌鸦车，它是去汽车修理厂检修回来的。警卫人员迅速跳上车，朝沃罗比约夫的车追去。这样，逃跑就……在二十分钟之后结束了。被打得血淋淋的几个逃跑者和数学家列季金总算用自己那流着鲜血的嘴尝到了这温暖的、稍微有点咸味的“自由汁液”的味道，同时东倒西歪地朝劳改营监狱走去。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沃罗比约夫又从劳动工地乘自卸汽车逃跑过一次。他们总共六个人。几天之后他们就被抓到了。听说沃罗比约夫也是一九五三年诺里尔斯克起义的为首闹事者之一。后来他被监禁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央监狱。我想，这个优秀人物的一生，包括战争以前的他的青年时期和后来打游击的年代在内，足以向我们说明这个时代的很多问题。

但是，全劳改营都传开了：逃跑干得很漂亮！被抓住完全是偶然的！十天后，原空军学院的学员巴塔诺夫和他的两个朋友又重复了一次同样的行动。他们在另一工地上开车冲出了铁丝网地带，但是他们走错了路，仓皇中向石灰场的方向开去，遭到石灰场岗楼的射击，轮胎打穿了，车停下来。冲锋枪手包围了汽车："出来！"要出去吗？还是要等待被别人抓着脖领拉出去？三人中间的一个，帕谢奇尼克，服从了命令，从车厢里出来了，狂怒的士兵立即用几梭子弹把他的身体打成了蜂窝。

一个月之中埃克巴斯图兹已经发生三起逃跑事件。可是滕诺却没有跑！他感到极端苦闷。恨不得也立刻去仿效别人。旁观者对一切错误往往看得十分清楚，总觉得自己会作得更好些。滕诺认为，比如，要是不叫沃罗比约夫驾驶，由日丹诺克开车的话，本来是能够甩掉那辆乌鸦车的。那里沃罗比约夫的汽车刚刚被追上，这里滕诺和日丹诺克已经坐下来商讨他们自己该怎样逃跑了。

日丹诺克是个白俄罗斯人，二十六岁，黝黑的皮肤，个子不高，有点流氓气，十分机伶，很懂世故。战争期间他从白俄罗斯

被带到德国去，在那里替德国人当过司机。他的刑期也是一张“二十五元券”。只要他一来情绪，他可以把全副精力放在工作上，也可以全力以赴地争论、打架、逃跑。不过，他缺少沉着和毅力。但滕诺是沉着而有毅力的。

一切都告诉他们：就是该从石灰场逃跑。如果弄不到汽车，就等逃出营区后劫一辆车。但是，在警卫人员或行动人员干涉他们这个计划之前，惩戒室的犯人班长廖什卡·茨冈（纳夫鲁佐夫）却来找麻烦了。他是只“母狗”，人很瘦弱，但所有的人都怕他。他在劳改营已经害死几十个人了，他能够因为人们不愿把寄来的食物分给他吃、甚至因为一包香烟而轻易地置人于死地。现在他把滕诺叫到跟前，警告说：

“我自己也是逃跑过的人，我也爱逃跑者。看，我身上还有几个子弹打穿的洞呢，这是在泰加森林逃跑时留下的。我知道，你原来也是要跟沃罗比约夫一起跑的。不过，告诉你，不许你从我的工地上跑，因为工地上由我这个作业班长负责。你跑了，我得被关起来。”

这就是说，他爱逃跑者，但是更爱他自己。这个廖什卡·茨冈已经满足于自己目前这种被蹂躏的生活了，他不愿让它受到别人的破坏。这就是一般刑事犯“对于自由的爱”。

不过，也许埃克巴斯图兹的逃跑真的过于千篇一律了吧？大家都从工地上逃走，没有一个从生活区跑的。敢试试吗？目前，生活区也是只围了铁丝网，还没有来得及修围墙呢。

有一次，石灰场的灰浆搅拌机的电路坏了。叫了一个自由人电工来修理。滕诺帮他修。日丹诺克乘机从他口袋里偷走了老虎钳。电工忽然发现：钳子没了！向警卫人员报告吗？不行，自己会因为疏忽大意被判罪的。他只好哀求那些刑事犯：把钳子给我吧！刑事犯们都说没拿。

逃跑者们还在石灰厂里做了两把刀子：用凿子从铁锹上砸下

两块铁，在锻工车间磨光、淬火。把锡倒在土模子里铸造刀柄。滕诺用的一把还是“土耳其式”的，它不仅能用，而且那弯曲的明晃晃的样子也挺吓人的，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想用它杀人，只想用它恐吓人的。

老虎钳和刀子都是藏在裤子里面踝子骨旁边带进生活区去的，塞到工棚的房基底下。

逃跑的关键还是文化教育科。在进行准备并运进武器期间，滕诺按计划向文教科提出申请，表示他和日丹诺克两人愿意参加文娱晚会的演出。（埃克巴斯图兹还从来没有组织过文艺演出，这是第一次。所以劳改营长官也急于组织成功：一方面，向上级汇报本营采取的教育改造囚犯措施时报表上可以多一两个项目，同时他们自己也想看看每天经过十一小时的苦役劳动之后囚犯们还会怎样在舞台上装腔作势。）滕诺和日丹诺克的请求被批准了，允许他们每天在管制工棚关门之后到工棚外的文教科来，因为在普通隔离区内还有两个小时可以自由走动。于是他俩便利用这种方便条件走遍了埃克巴斯图兹的几个还不熟悉的地区，注意观察并记住：岗楼上什么时候换岗？怎样换法？从什么地方最容易接近障碍地带？在文教科内，滕诺则细心阅读巴夫洛达州的报纸，尽量记住报上出现的所有地名、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名称，农庄主席、书记和各种先进人物的名字。下一步，他们声称要演出一个短小喜剧，为此，他们需要从储藏室把自己的便服领出来用一下，还需要…… 一个公事包。（逃跑时带上公事包，可就不简单了！那就会像个首长了！）这个请求也被批准了。滕诺身上还穿着海军衬衣，现在他又领回了自己在冰岛做的西装。（它使他回忆起在海军护航队服役的年月！）日丹诺克从朋友的皮箱里选了一件灰色比利时西装，十分标致，甚至在劳改营里他穿这衣服都显得极不寻常。一个拉脱维亚人囚犯保存的东西里有个公事包。公事包也借来了。还有两顶真正的便帽，可以替换下劳改营发的军帽似的便帽。

但是，这个短小喜剧需要排练很多次，甚至每天营区停止活动前的两小时还排练不完。因此，有一个晚上，还有另外一次晚上，滕诺和日丹诺克根本没有回到管制工棚去，就睡在文教科工棚里了。(这是为了使管制工棚里的看守习惯于这一点。逃跑时，哪怕能赢得一夜的时间也是好的！)

什么时候最适于逃跑？晚上点名的时间。这时工棚前排着长队，看守们忙于往工棚里放人，因犯们眼巴巴盯着房门，恨不得早一分钟进去躺下休息。谁也不会留心营区的其他地方。秋天，天渐渐短了，要等到日落后点名的时候。要在日落后的黄昏时刻跑，但又要在放出军犬之前。必须抓住这唯一的十来分钟的时间，因为一放出军犬来，就逃不成了。

他们选定了九月十七日，星期天。这样方便些，那是个"大星期天"，不干活，可以养养精神，不慌不忙地为晚上的行动作好最后一些准备工作。

逃跑前的最后一个夜晚！你还能睡得着吗？千头万绪，思潮澎湃……是啊，一昼夜之后我还能够活在人间吗？……也许就不在了。可是，留在劳改营里呢？慢慢地干瘦下去，在泔水池旁边慢慢死去吗？……不，不能让自己习惯于当奴隶！

问题就是这样摆着：对于死，你有没有准备？有。那就是说，可以逃跑了。

星期日。天高气爽。看守为了让他们排练节目，把两个人放出了管制工棚整整一天。突然，滕诺在文教科收到了母亲的来信。是啊，正是在这一天。囚犯的生活里有多少这一类的巧合啊?!……信的内容令人忧伤，但是，也许使你受到锻炼。信中说：妻子还关在监狱里，到现在连劳改营都没进去。弟媳已经表示要同哥哥这个祖国叛徒断绝一切关系。

逃跑者在食物问题上是非常困难的。管制工棚里吃饭时要吃得干干净净，存在肚子里，因为自己储存粮食会引起当局怀疑。所

以，他们起初的计划是逃出后快速前进，到村庄里去弄一辆汽车。可是，就在这一天妈妈寄来了一个邮包——这简直是母亲给予逃跑者的祝福！邮包里有葡萄糖片、通心粉、燕麦片。这些都要装进公事包带走！要把香烟换成马合烟，还要给卫生所的医士送一包去。日丹诺克已经拿到一天的假条了。这也是安排好的。滕诺先到文教科去报告说：和我一起排练的日丹诺克病了，今天晚上不能排练，我们不到文教科来了。然后他又去向管制工棚的看守和班长廖什卡·茨冈报告说：今天晚上我们要排练，不回工棚来睡了。这样，两处都不会等他们。

还必须弄到一个"喀秋莎"，也就是打火石和装在小管子里的火线。在逃跑中它比火柴方便得多。还应该去最后看望一次哈菲兹。这位鞑靼人是个有经验的逃跑者，他本来打算同滕诺一起跑的，但后来改变了主意：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在这样的逃跑中会成为伙伴们的累赘。现在他是全营唯一知道他们逃跑计划的人。他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上，小声喃喃地说："愿上帝赐福你们！我将为你们祈祷！"然后他用鞑靼语说了些什么，还用手往滕诺脸上划了划。

滕诺在埃克巴斯图兹还有一个朋友，是他在卢宾卡监狱时的同牢房的难友伊万·科维尔琴科。他不知道逃跑的事，但他是一个好同志。他现在给看守们当杂役，所以单独住一间小屋。两个逃跑者为表演短小喜剧所用的东西就是寄存在他屋里的。今天可以很自然地同他一道煮点麦片粥吃了，告诉他，这是老妈妈寄来的一点东西。再煮点"契希尔"*。他们就这样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宴会"：两个客人，滕诺和日丹诺克，陶醉在未来的想象中，主人则只是为了这个美好的星期天而高兴。忽然，他们从窗子里看到人们正从瞭望塔处把一具粗糙的棺材抬往停尸房。

---

* "契希尔"是一种用红茶煮的浓饮料，囚犯们以此代替酒类。——译者注

这是前两天被枪杀的帕谢奇尼克的尸体。

“是啊，”科维尔琴科叹了一口气说：“逃跑没有用……”

（是不是他已经知道他们？……）

科维尔琴科像有什么灵感似的忽地站起身来，把两人的塞得满满的公事包拿在手里，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式在屋里来回踱起来，边走边严厉地说：

“侦查当局早已清楚！你们在准备逃跑！”

他是在开玩笑。只是想扮演一下侦查员的样子……

这个玩笑可非同小可！

（也许他这是在婉转地暗示他们：我猜到了，朋友们。但是，我不赞成你们这样作！?）

科维尔琴科出去之后，两个逃跑者就换上了西装，外面又罩上劳改营的衣服。并且把衣服上的几块号码布全撕开，只让它连着一点点，以便到时候可以一下子全撕掉。不带号码的便帽塞进了公事包。

星期日就要结束了。金色的太阳沉入了地平线。动作缓慢的大个子滕诺和矮小机敏的日丹诺克各自又往肩上披了一件棉袄，拿起手提包（劳改营里的人们都已习惯于他们这种奇怪的样子了），走向自己的出发地点——那是两座工棚之间的一块草地，离障碍地带不远，正对着一个岗楼。在这里，他们被两座工棚挡住，从另外两个岗楼上看不见他们，只有眼前这个可以看见。两人把棉袄铺在地上，趴在上面，下起棋来，为的是让哨兵们习惯于他们这种样子。

天色昏暗下来。晚点名的铃声响了。囚犯们纷纷向工棚走去。已经是黄昏时刻了，岗楼上的卫兵已经看不清楚草地上还躺着两个人了。换岗的时间快到了，哨兵的注意力已经不那么专注了。总是在旧哨兵换岗之前最容易跑掉。

两人决定不跑到别处去剪铁丝网，而就在这个岗楼下面，就

在靠近它的地方剪断。一般地说，哨兵是比较注意障碍地带的远处，反而不大注意自己脚下。

两人的头紧贴着地面，加上天色已经昏暗，所以他们看不见自己将要爬出去的那条小道。但是，这是早就目测好了的：障碍区外面，紧靠铁丝网有一个挖好的坑，是准备埋柱子的。可以在坑里面藏一分钟。再往前，有几个炉渣堆，过了炉渣堆就是从警戒部队的营房通向居民村的大路了。

他们的计划是：进村之后立刻设法弄到一辆汽车。先把汽车拦住，对司机说："想搞点外快吗？我们要从埃克巴斯图兹旧城弄两箱伏特加酒到这里来。"哪有司机不喜欢喝酒的？！这时就要讲讲价钱了："给你半公斤行吗？一公斤？好吧，开车！不过，可不许你对任何人说！"而开车后，既然同他一起坐在驾驶室里，就可以制服他了。把他绑起来扔在草原上就行了。自己则加快速度，一夜之间可以到达额尔齐斯河畔。那时就可以扔掉汽车，坐小船渡过额尔齐斯河。再往前可以直奔鄂木斯克。

天色越来越黑。岗楼上的探照灯亮起来了。光柱顺着障碍地带扫射，两个逃跑者这时正处在阴影里。正是时候！很快就要换岗，就要布置警犬了！

可以看见工棚里已经点起灯来，说明有的囚犯已经点过名回到工棚睡觉去了。工棚里好吗？温暖、舒适……可是，现在用自动步枪给你来一梭子子弹，躺着、俯着身子被人打死，那才委屈呢！

爬到岗楼底下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咳嗽；一声也不能哼出来！

好吧，机敏的警犬们，提防着吧！你们是要看住不放；而我们就是要逃跑。

以后的事还是请滕诺自己来谈吧。

第 七 章

一只小白猫

(格奥尔吉·滕诺口述)

"我比科利亚·日丹诺克大，我应该走在前头。刀子在刀鞘里，插在腰间；手里紧握着老虎钳。我告诉他：'等我剪断了第一道铁丝网，你就跟上来！'"

我匍匐前进。恨不得把身子压进土里。要不要看看哨兵？看，就是看到威胁或者可能用自己的目光把对方的目光吸引过来。真想看！不，不能！

离岗楼越来越近。离死亡也越来越近了。等待着一梭子子弹打到自己身上。冲锋枪马上就要响起来……也许哨兵早已清楚地看到了我，故意站在那里耍弄我吧？让我再爬一会儿？……

已经爬到前排铁丝网了。横过身子来顺着它，切断了第一根铁丝。拉得很紧的铁丝网突然松了下来，哗地抖动了一下。冲锋枪马上就要响起来？……没有。也许只我一个人听到了这哗地一声。这响声可够大的呀！又切断了一根铁丝网。再切断第三根。把一条腿移过去，再移过另一条腿。裤子被已切断的铁丝上的铁蒺藜挂住了，急忙把它摘开。

爬过几米耕松了的土地。后面传来沙沙的声音：是科利亚跟

上来了，可他为什么弄得这样响!？啊，这是他拿的公事包在地上擦出的声音。

已经爬上主要障碍地带的斜坡了。这里的铁丝网是十字交叉的。又剪断几根。前面就是布鲁诺蛇形螺旋纹铁丝网。剪了两次，清理出一条小路。接着又切断了主要地段的几根铁丝。我们一定是连呼吸都停止了。没有枪声。是不是哨兵在想家？还是他今天晚上要去参加舞会！

身体已经移到障碍地带的外缘了。这里也有螺旋纹铁丝网。又被它挂住了。剪开。不要忘记，也不要缠到里面去——前面还应该有一排外缘的斜向铁丝两。对，这就是。把它也剪断。

现在该朝土坑爬去了。没有弄错，土坑就在这里。我滚到坑里。科利亚也跟着滚下来。我们喘了喘气。快些往前走！马上就要换岗，马上就要布置军犬了！

我们爬出土坑，爬向炉渣堆成的小岗子。这时仍旧不敢回头望一眼。科利亚着急了，他想快爬，他抬起身来四肢着地爬行。我把他按下去。

我们完全匍匐前进，爬过了第一道炉渣土岗。我把老虎钳放在一块石头下面。

前面就是大路。一直爬到路旁边我们才站起来。

没有开枪。

我们大摇大摆地往前走，不慌不忙地走：现在该装成不受看管的自由人的样子，自由工人们的工棚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把胸前和裤腿上的号码布撕掉了。突然，黑暗中有两个人迎面走来。像是从警备部队营房往村里去的。是两个士兵。可是我们后背的号码布还没有来得及撕掉呢!!! 于是，我大声说：

“瓦尼亚！咱们去喝它半升怎么样？”

我们慢慢地走着。还没有上路，但已经离路很近了。我们故意慢慢走，好让他们两人先过去，但是，我们并不躲闪，不扭转

自己的脸，径直向两个士兵走去。为了不把背转向他们，我们两人慢得几乎停下不动了。他们两人边走边谈自己的事，在离我们大约两米的地方走过去了。这时我们两人才彼此把背上的号码撕下来！

没有被发觉！？……我们自由了！？下一步是要到村里去弄辆汽车，

但是，怎么回事？？劳改营上空升起了一颗照明弹！接着，第二颗！第三颗……

我们被发现了！马上就会追上来！跑！

我们不敢再多看，没有工夫再思考、判断。似乎是我们的全部伟大计划已被粉碎。我们朝着草原拼命奔跑，只要离开劳改营远些！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坑坑洼洼的地上跌倒，爬起来……可是，那边的照明弹却还在一颗颗地升起来！根据过去逃跑的经验，我们设想：现在马上就会派人骑马来追捕，并且带着一群军犬；他们会分头向草原的各个方向去追。于是我们只好把全部珍贵的马合烟不断地撒在自己走过的地方，同时不断地向前跳跃。

这就是偶然性！就像迎面飞来了一只乌鸦，一种完全无法预见的偶然性！生活道路上几乎每一步都有一些万幸或不幸的偶然性在守候着我们。但只有在逃亡中，只有在最危险的、最紧要的关头我们才会充分感受到偶然性的全部分量。在滕诺和日丹诺克爬出铁丝两三、五分钟之后，完全偶然地劳改营营区的电灯全部熄灭了。正因为这样，岗楼上才开始打出照明弹（那一年埃克巴斯图兹还储存着很多这种照明弹）。假如两个逃跑者晚爬出五分钟，那么，警觉起来的卫兵就可能发现他们并开枪射击。但假如逃跑者当时能够在照亮的天空下面控制住自己，冷静地看看营区，他们就会发现路灯和探照灯全灭了，他们就会放心大胆地去搞到一辆汽车，那么，他们的整个逃跑就会完全是另一种结果了。但

是，他们的处境是：刚刚爬出来，营区上空立刻亮起照明弹，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肯定是追我们的，冲我们来的！是营区电力网的短暂的停电把他们的逃跑计划全部打乱了。

既然如此，就必须在草原里绕个大圈子，躲过眼前的村镇。这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力气。科利亚有些怀疑我领的路线是否正确。真遗憾。

但是，终于走到了通往巴夫洛达市的铁路线。我们高兴极了。站在铁路路基上回顾埃克巴斯图兹，为其一片灯火辉煌的景象所震惊：从来没有觉得埃克巴斯图兹竟占有这么大一片土地！

我们各找了一根棍子当拐杖，每人踩着一条铁轨往前走。这样，只要有一列火车通过，军犬就再也无法追踪我们了。

我们这样走了大约三百米，然后跳跃着又进入草原。

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感到呼吸轻松，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真想放声歌唱，叫喊！我们互相拥抱。我们是真的获得自由了！我们充满自尊感，因为我们下决心逃跑，实现了逃跑计划，把那一群猎犬们哄骗过去了！

虽然还是刚刚感受到真正的自由，但我们却觉得主要事情已经完成了。

天空晴朗，深邃，满天星斗。在劳改营里，由于灯光的照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天空。以北极星为准，我们按“北北东”的方向前进。然后，往右一偏就可以到达额尔齐斯河畔。逃出劳改营的第一夜必须尽量跑得远些。走得越远，就可以使追捕队的搜索范围的半径加倍地扩大。我们一边哼着各种语言的轻快豪爽的歌曲，一面加紧脚步，以每小时八公里的速度快速前进。但是，由于我们许多月来一直呆在狱里，我们的腿已经不大会走路了，走起来很累。（这一点我们倒是预见到了，所以原来是打算乘汽车逃的呀！）我们开始不时地躺倒在地，两人仰身把腿互相支成“人”字形，这样歇一会儿，起来再走。然后再躺下。再走。

奇怪的是，背后的埃克巴斯图兹上空的灯光久久不消失。我们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仍旧看得见那空中的灯光。

但是，夜就要过去，东方已经发白。白天，我们不仅不能在这平坦开阔的草原上走，甚至在这里躲藏都很困难。这里没有灌木丛，连比较高的草都没有。可是，我们知道追捕队是一定会利用飞机的。

于是我们就用小刀子挖坑（地很硬，有石头，挖起来很困难）。我们挖了个约有二尺宽、一尺深的土坑，两人并排躺进去，把一些干黄刺人的锦鸡儿草盖在身上。现在能睡一觉就好了，恢复一下体力！可是，根本睡不着。这白天的不得已的躺卧超过了十二小时，它比夜间的急行军还累人。脑海里翻腾着各式各样的想法、各种回忆……九月的炽热的阳光直射在身上，没有水喝，也不会找到水喝的。是我们违反了哈萨克斯坦地区的逃跑规矩：应该在春天跑，不能在九月跑。但是，我们原计划是要搞到一辆汽车的呀！……我们从早上五点忍受着极端的痛苦一直躺到晚上八点钟！全身都麻木了，但是我们不能改变姿势；稍一坐起，动一动盖在身上的锦鸡儿草，就可能被远处的骑兵发现。我们每人身上都穿着两套衣服，简直要热死了。忍耐吧！

只有等到夜幕降下之后，时间才是属于逃跑者的！

我们从坑里起来，但站立不住，两腿酸痛。我们慢慢往前走，想逐渐把肌肉活动开。浑身无力，因为整天吃的是干通心粉，吞咽葡萄糖片。渴得厉害。

甚至在夜晚，今天已不比昨天了，还得提防埋伏，因为毫无疑问已经用无线电通知各地了，一定往各个方向都派出了汽车，特别是鄂木斯克方向。有趣的是，他们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现我们铺在地上的两件棉衣和象棋的呢？根据衣服上的号码，甚至不必按名单点名，立刻就会知道是我们两个人跑了。

事实经过是这样的：第二天清早，几个出工棚较早的爱干活

的人发现了地上的两件冻得冰冷的棉衣。很清楚，这是在地上放了一夜的。于是他们就撕掉号码，把棉衣披在自己身上了：棉衣，这可是好东西呀！所以，看守根本没有拾到棉衣。被剪断的铁丝网只是到星期一傍晚才发现。而且是按照名册对了一天才弄清楚逃跑的人是谁。早知如此，逃跑者第二天早晨还可以公开地走路或坐车！就因为没有冷静地分析照明弹问题，白受了多少苦啊！

当劳改营里渐渐摸清星期天夜晚逃跑的真相时，人们想起那天灭灯的事来，赞叹不已："嘿，真精！干得漂亮！他们怎么把电源切断的呢？"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是熄灯帮助了逃跑者。

我们第二天夜间的前进速度一小时不超过四公里。两腿痛得厉害，不断地要躺倒休息。渴！想喝水！一夜之间走了不过二十公里。又得找个白天躲藏的地方了，又得躺倒受一天罪！

仿佛前方有个建筑物。我们小心地向它爬去。原来是几块大漂石。草原上竟会有这种东西是很奇怪的。说不定石头的凹坑里而会存着一点水呢？没有……有一块大漂石下面有一道沟。也许是胡狼打的洞。钻进去可不容易。万一它倒下来呢？那我们将被压扁，而且还不会马上死去。已经有些冷了。直到早晨也没有睡着。白天又没有睡。于是拿出刀子来在石头上磨：昨晚用它挖坑时弄钝了。

白天，我们听到很近的地方有车轮声。糟了，我们就在大路旁边呀。一个哈萨克人赶着大车紧贴着我们这块大石头过去了，嘴里还嘟囔着什么。跳出去，追上他？也许他带着水？但是，不了解周围的情况怎么能抓住他呢！倒是我们会被人们看见！

追捕队看来并没有走这条路。我们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从下面朝四下看了看。相距大约一百米的地方有间破房。我们爬过去了。一个人也没有。并?！不，已经扔满垃圾了。角落上有一堆干稻草屑。在这里躺一会儿吗？躺下了。还是睡不着。噢，跳蚤

咬得厉害！多么大的跳蚤呀！真多！科利亚身上的比利时西装是浅灰色的，那上面可以看到黑压压的一片。赶紧抖掉，拍打掉。我们又爬回胡狼窝去。时间在流逝，力气在消失，可是却不能前进。

黄昏时我们起来了。一点力气也没有。渴得难受。我们决定把前进方向再偏右些，早些赶到额尔齐斯河。晴朗的夜空星光闪闪。飞马星座和英仙星座在我看来好像共同组成一个像我们一样低着头毅然往前走的老牛的轮廓。我们也在往前走。

忽然，前面飞起了一颗照明弹！难道他们已经赶到前面去了？！我们惊呆了。我们看到铁路路基。眼前就是铁路。没有打第二颗。但一束探照灯灯光顺着路轨照射过来，光束不断地向铁路两旁摆动。一辆轨道车开过来了，这是在查看草原。马上会发现我们，那就完了……躺在光束下面等着被人家发现！真窝囊！

轨道车开过去了。没有发现什么。我们高兴得跳起来。虽然跑不动了，但还是盼望着尽快地离开铁路，走得远些。这时乌云密聚，天黑起来。我们两人忽左忽右地走着，迷失了正确方向，完全凭猜想往前走。速度也越来越慢，也许还走了些不必要的弯路！

毫无收获的一个夜晚！……又快天亮了。又得采集锦鸡儿草。又要挖坑。可是我的土耳其式弯刀不见了。大概是在躺着或者在铁路路基上跳跃的时候丢掉了。糟糕！逃跑者怎么能没有刀？我们用科利亚的刀挖了一个坑。

只有一点可以自慰：早就有人预言，说我要在三十八岁上死去。当海员的很少有人不迷信。但是，到了这一天早晨，就是九月二十日，我就满三十九岁了。三十八岁要死的预言已经与我无关。那就是说，我还会活下去！

我们又躺在坑里。不能活动，没有水喝……哪怕能睡着也好啊！但是，睡不着。能下一场雨也好！时间拖得太长了。不妙。逃出来已经三昼夜，而我们却连一口水也没有喝到。我们每天只吃五片葡萄糖片。而且我们离开营地并不远，也许才走了去额尔齐

斯河的三分之一的路程。劳改营的朋友们可能正在为我们高兴，以为我们终于从乳臭未干的检察官那里获得了自由……

黄昏。星辰。方位东北。我们艰难地走着。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叫喊："哇……哇！"这是什么？记得有经验的逃跑者库德拉说过，哈萨克人就是这样喊着赶开羊群附近的狼的。

弄一只绵羊！有一只羊我们就得救了！在自由的环境中谁也不会想到要喝血。可是，此时此地，求之不得！

我们偷偷向前爬去。看到房屋了。但看不到井。进房子是危险的。遇到人就等于留下痕迹。我们悄悄走近土坯搭的羊圈。原来是个哈萨克妇女在喊叫着赶狼。我们找了一处圈墙比较低的地方跳了进去。刀叼在嘴里。我们匍匐着去抓羊。可以听到羊就在我身旁喘气。但是，它们纷纷从身旁窜开，逃跑了！我们又从不同的方向朝羊群爬去。怎样才能抓住羊腿呢？羊又跑掉了。(后来，聊天的时候，人们指出了我们的错误所在：我们是爬过去的，所以羊把我们当作野兽了。我们应当直起身来，像主人似的走过去，羊就会乖乖地听话了。)

哈萨克女人感觉到有点不对头，走过来，朝着暗处窥视。她没有带着灯火，但是她拾起几个土块向这边扔过来，有一块打中了科利亚。她朝我这边走来，马上就要扑过来了！不知是她看见了我，还是她感觉到了什么，她突然怪声怪气地喊起来："有鬼！魔鬼！"猛地向后退去。我们也赶紧向后退，跳过矮墙，躺倒在地。传来一个哈萨克男人的声音，很镇静。大概是说：老娘儿们，看花眼啦！

失败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蹒跚着继续前进。

马的轮廓！太美啦！太需要啦！我们走到马跟前。马站立不动。我拍了它的脖子两下，把皮带搭上。我把日丹诺克扶上马，可自己却怎么也上不去，太疲劳了。用两手抓，用肚皮靠，腿怎么也不跨上马背。马不住地转圈。一下子，它挣脱了，驮着日丹诺

克跑去，把他摔了下来。还好，日丹诺克手里抓住了皮带，没有丢下什么痕迹。让他们去猜是魔鬼干的吧。

我们让这匹马弄得更加没有力气了，走路更困难。偏偏前面又是一片耕过的地，要在犁沟里走。我们陷入绝境。拖着两腿勉强前进。不过，这也是好迹象：有耕地，也就有人家，有人家，也就有水。

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走啊，走。前面又出现了一些什么轮廓。我们卧倒，往前爬。是干草垛！好极了，牧场！额尔齐斯河就在附近？(其实，还远着呢！……）我们使出最后的气力爬上草垛，身子埋在草里。

这才算睡了一整天觉！连逃跑前的不眠之夜，我们总共已经五夜没睡觉了。

傍晚时我们醒来，听到有拖拉机的声音。悄悄地扒开干草，把头稍微抬起。我们看到：两台拖拉机正往这边开来。不远处有一户人家。天色黑下来了。

有了！拖拉机里一定有冷却用水！等拖拉机手去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喝机器的水。

天黑了。逃跑后已经过了整整四昼夜。我们向拖拉机爬去。

幸好，这里没有狗。我们摸到水槽，喝了一口。不行。水里有煤油。只得吐出来、喝不得。

这里的住户家里什么都有——有水，也有食物。要不要去叫开门？请人们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帮忙：“弟兄们！好人们！帮帮忙吧！我们是从监狱逃出来的！”这样行吗？十九世纪的时候，人们会把盛满饭的瓦罐、衣服和钱给你送到泰加森林的小路上来，像诗里讲的那样：

> 农妇们给我拿来了面包，
> 小伙子们送给我马合烟。

现在我们能这样干吗？别异想天开了！！时代不同了。人们会出卖你！或者是真心诚意地去出卖你，或者只是由于怕受连累。因为为了同情囚犯也会判他们二十五年苦役的。上一世纪的统治者们还没有想到对那些给别人面包和水的人按政治罪论处呢。

只好拖着身子往前走。整夜地走。我们盼望到达额尔齐斯河。我们在寻找河的迹象。但是，一点也没有。我们强迫自己走，毫不怜惜自己。天亮之前，又遇到一个草垛。这次要爬上去就比昨天面难多了。睡着了。也算不错。

快天黑的时候我们醒来。人能有多大忍受力啊？我们逃跑已经五昼夜了。我们看到不远处有个蒙古包，它的旁边有个敞棚。我们悄悄走过去。里面堆着一些做饲料的粟子。我们装了满满一公事包，想吃几口，嚼碎，但是咽不下去。口里已经完全干了。忽然，我们看见蒙古包旁边有一个大茶汤壶，足能装两桶水。我们爬过去。打开龙头，——空的！真倒霉！我们把它歪过来，每人只喝了两口。

我们又向前走去。不断地摔倒在地。躺着的时候，觉得呼吸就容易些。我们已经不能从仰卧的姿势坐起来了。要起来，必须先转身趴下，然后两腿跪起来，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就这样也还累得直喘气。我们瘦得似乎肚皮要贴到脊梁骨了。快到早晨的时候，我们走不到二百米就得躺下休息一次。

这天早晨连草垛也没看见。小土岗上有个洞穴，像是野兽的窝。我们在里面躺了一天，但是没有睡着。天气有些凉了，躺在地上很冷。也许是我们的血已经不热了吧？我们试着嚼一点通心粉。

突然，我看见有一小队士兵走过！是戴红肩章的！是要包围我们！日丹诺克扯了我一把："你看花眼了！那是马群！"

是啊，是我的错觉。我们又躺下。这一天像是没有尽头似的。

忽然，一只胡狼跑来：要回它自己的窝。我们把通心粉推到前面，自己往后退了退，想把它诱过来，刺伤它，然后把它吃掉。但是，它没有吃通心粉，跑了。我们这个小土岗的另一边是个斜坡，斜坡下面是一片干涸了的湖底碱地，湖对岸有个蒙古包，有炊烟升起来。

已经过了六昼夜。我们已到达极限了：刚才我发生了幻觉，看到戴红肩章的士兵，舌头已经转动不灵了。我们很少小便，而且便中带血。这样不行！今晚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弄到水和食物！我们要到那边去，进蒙古包去！如果他们拒绝，就用暴力夺取。我记得一个老逃跑者格里戈里·库德拉曾告诉过我一句命令语："玛赫玛杰拉！"（意思是：劝告结束，拿！）于是我与科利亚商量好，到时候由我下命令："玛赫玛杰拉！"

我们在昏暗中悄悄走近蒙古包。旁边有井！但是没有水桶。不远处有一个拴马桩，拴着一匹备好了鞍的马。从门缝里可以看到蒙古包里有两个哈萨克人，一男一女，坐在油灯旁，还有几个孩子。我们敲敲门，进去了。我寒暄了一句："萨拉姆！"可是，自己眼前直冒金星，真担心会倒下去。蒙古包里有一张矮圆餐桌（比我们现在时兴的桌子还矮）。四周摆着长木凳，上面铺着大块毛毡。还有一只大铁皮箱子。

哈萨克男人嘟囔了一句什么，皱着眉头瞅了我们一眼，看样子很不高兴。我坐下来以示庄重（而且总得省点力气呀），把公事包放在桌子上。

"我是地质勘察队队长，他是我的司机。我们的汽车停在草原上，离这里五六公里远，那儿还有几个人。汽车的散热器漏水，水漏光了。我们自己也三天没吃饭了，很饿。老大爷，给我们点儿吃的和喝的吧！另外，您看怎么办好？得请您帮我们出点主意呀。"

但是，哈萨克人只管眯着眼，并不把吃喝的东西拿出来。他问道：

“队长贵形（姓）？”

我本来是全部准备好了的，可是现在脑袋嗡嗡响，全忘了。我回答：

“伊万诺夫（当然，太蠢了！）。那么，老大爷，卖给我们点儿东西也行啊！”

“没有。去找别的邻居吧！”

“远吗？”

“两公里。”

我正在庄重地谈话的时候，科利亚已经忍不住了，他从桌上的盘子里抓了一块饼，嚼起来，不过，看样子咽不下去。这时，哈萨克人突然抄起鞭子（那是一种皮条很长的短把鞭子），朝着日丹诺克举起来。我站起来，一边说着：“唉，你们这些人呀！这就是你们的好客态度吗？！”而哈萨克人却用鞭杆在戳日丹诺克的后背，赶他出去。这时候我发出了命令：“玛赫玛杰拉！”随手抽出刀来，对哈萨克人说：

“到墙角去！躺下！”

哈萨克人藏到帐子后面去了。我紧跟上去：怕他那里有猎枪，万一他开枪呢！但他扑通一声倒在木床上，一面在喊叫：

“全拿走吧！我什么也不说！”

啊！你这狗养的！我干嘛要“全”拿走？为什么起初我要一点点东西你都不肯给？

我命令科利亚：“搜！”自己则拿着刀站在门口。哈萨克女人在尖声叫唤，孩子们吓哭了。

“告诉你女人，不许叫！我们不杀人。我们要吃的东西。肉，巴尔（有吗）？”

“伊奥克（没有）！”哈萨克人把两手一摊。

这时科利亚在蒙古包里搜寻，已经从角落里寻出了一大块腌腊羊肉。

“你怎么撒谎?!”

科利亚又找出了一个大盆，盆里是“巴乌尔萨吉”——一种用油炸的酥面块。这时我明白了：桌上碗里装的是马奶酒！我和科利亚把它喝了。每喝下一口，就觉得生命在慢慢复活！多好的饮料啊！头有些晕，但是醉意倒使我们感到轻松，像是有了力气。科利亚高兴得不得了。他把钱递给我。总共二十八卢布。他身上还不止这些。我们把羊肉装进口袋，把“巴乌尔萨吉”和面饼、糖果、一种带馅的方形点心统统装进另一个口袋。科利亚又找到了一大碗羊肉干。有刀！这东西我们也很需要。我们尽量不要忘掉什么，两把小木勺，还有盐。我拿出一只口袋来。又回去取了一桶水。拿了一条毛毯，一副备用的马笼头和鞭子。(哈萨克人嘟囔着，看样子很不满意：他还要骑马追我们嘛!）我对哈萨克人说：

“告诉你，记住！今后要学会对客人客气点儿！起初你要给我们一碗水和十来片巴乌尔萨吉，我们也会叩头谢恩的。我们从不欺负好人！最后，还要告诉你：躺着，不许动！我们可不止两个人!”

我让科利亚在门口守着，自己把其余的猎获物都运到马桩旁边。按理应该急忙走开，但我冷静地盘算着。我把马牵到井旁，饮了饮。马也要干活的呀：它得驮着很重的东西走一夜呢！我自己和科利亚都在井旁喝足了水。这时，一群鹅跑过来。科利亚对家禽是有偏爱的。他说：“咱们抓两只吧！把脖子拧断!”“声音太大。别再耽误时间了。”我放下马镫，紧一紧马肚带。日丹诺克在马鞍后面搭上一条毛毯，踩着木井架上了马，手里提一桶水。我把两只口袋系在一起，搭在马背上，自己骑在马鞍上。我们看着天上的星辰向东方走，这样可以迷惑追捕的人。

马是很不满意的：骑上两个人，又不是主人。所以它总想掉头往家走。但是，我把它制服了。马轻快地走起来。看到一边有灯火。我们绕过去。科利亚在我的耳边唱起歌来：

纵马在草原飞驰，
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多好啊！我这牛仔，
只要有匹好马骑！

“我还看见了他的公民证呢！”科利亚说。

“那为什么没拿？公民证什么时候都有用。只要从远处把封皮亮一下就行了。”

一路上，我们人不离鞍、马不停蹄地往前赶路。隔一会儿就喝水，隔一会儿又吃东西。情绪完全不同了！这一晚上能走远些就好了！

忽然，我们听见鸟的叫声。眼前出现了一片大湖。绕过去吗？太远了，时间太可惜。科利亚下去牵着马沿着一条泥泞的横堤往前走。过来了。但是，走得太急，毛毯不见了。滑掉了……我们留下了踪迹……

这非常不好。从哈萨克人那里往各个方向有很多道路。但是，如果毛毯被发现，把这个点同蒙古包连起来。就会判断出我们去的方向。回头去找？没有时间。何况，反正总会知道我们要往北逃的。

我们下马休息了一次。我拉住马缰绳。我们又吃，又喝。不断地吃，喝。桶里只剩下桶底一点水了，我们自己都为之惊奇。

方向正北。马已经跑不起来，但是快步走一小时也可以走八至十公里。我们过去六天夜里走了大约一百五十公里，今天这一夜就走了七十公里。如果没有走许多弯路的话，按理应该到额尔齐斯河了。

天快亮了。可是找不到掩蔽处。我们继续往前走。这时走路已经有危险了。我们看到一处深陷下去的地方，像个大坑。我们

牵马下去；又吃喝了一顿。突然，听到附近有摩托车的哒哒声。不好！那就是说，这附近有大路。应该藏到更可靠的地方。我们爬出去，瞭望了一下。不远处有一个荒废的、无人居住的小村子——“阿乌尔”[①]。我们走进村里，在一间只有三面墙的破房里，把东西从马上卸下来。把马的前腿绊住，让它自己去吃草。

但是，这一天我们却睡不着：哈萨克人和毛毯使我们留下踪迹了。

天黑了。这已是七昼夜了。马在远处吃草。我们去牵马，马跳着挣脱了，不让牵。科利亚抓住了马鬃，马拖着他往前跑，很快就把他甩掉了。马挣脱了前腿的绊绳，现在再也无法抓住它。我们追捕了足有三个小时，筋疲力尽；把它赶进废墟，用皮带套它，到底也没有套住。我们咬牙切齿，可是，没有办法，只好放弃它。我们只剩下了笼头和鞭子。

吃点东西，喝完剩下的一点水，我们背起干粮口袋，拿起空水桶，往前走去。今天有力气。

第二天早晨我们只好藏在离大路不远的灌木丛里。这个地方不很好，可能被发现。一辆马车辘辘地过去了。这一天又没能睡觉。

第八个夜晚，我们又上路了。行走间突然感到脚下的土地像是松软些了：这是耕过的土地。我们继续往前走。大路上有汽车灯光。当心！

新月在云中穿行。我们又走进一个死绝的“阿乌尔”村子。可以看到前方的村里有灯光。微风从那里把歌声送到我们耳边：

---

① 自从1930—1935年这段时期过后，哈萨克斯坦一带出现了不少这种没有人住的山村。那时期先是布琼尼带着他的骑兵部队打荡过去，接着便是饥馑（到目前为止整个哈萨克斯坦没有一处集体农庄以布琼尼的名字命名，看不到他的一张照片）。

"小伙子们，卸下你们的骏马吧！……"

我们把口袋藏在废墟，拿着水桶和公事包向村里走去。刀藏在衣袋里。走近村边第一所房子。一只小猪在哼哼地叫。要是在草原遇到它，嘿！……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迎面过来了。

"我说，这位大哥，我们的汽车在那边儿，运粮食的。请问，到哪儿能弄点水呀？汽车散热器得加点水。"

水伙子下了车，领我们过去，指给我们。村边有口大缸，大概是饮牲口的水。我们灌了一桶，提着走开，没有喝。等小伙子走远了，我们这才坐下喝，喝呀，一下子喝掉半桶。（今天特别渴，因为吃饱了。）

已经有些凉意。脚下是真正的青草！附近一定有河！应当找到河。我们往前走去。草越来越高，出现了灌木丛。柳树！柳树一般是长在水边的。芦苇！终于看到了！！这大概是额尔齐斯河的一个河汊。啊，现在可以到河里玩玩水，洗一洗身子了。两米高的芦苇！野鸭从脚下惊起。多宽旷的地方啊！在这里我们是万无一失的！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胃肠八天来才第一次表明它们是在正常工作着。这是在它们经过八天的无所作为之后！真是痛苦极了！大概妇女临产时就是这个样子吧……

然后，我们又回到废弃的阿乌尔。在残垣断壁间点起火堆，把腊羊肉拿出来煮了吃。按理应该把时间花在走路上，但是，真想吃。老是想吃，总觉得吃不饱。我们吃得行动都不很方便了。这才怀着无比满足的心情去寻找额尔齐斯河。这时候，在叉路口上，八天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发生了：我和科利亚争吵起来——我说应该往右，他认为应当往左。我确切地感到应该往右，可是他怎么也不听。意见分歧，这对于逃跑者是危险的。在逃跑中一定得有人拥有最后决定权，否则，必定遭殃。我断然向右走去，表示

我坚持自己的意见。我走了大约一百米，听不到后面的脚步声。心里难过极了。我们不能分离啊！我在草垛旁坐下来，往回看……科利亚走来了！我拥抱了他。我们又并肩向前走，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灌木丛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清凉。我们走到一个断崖前面。下面传来波浪的拍击声，淙淙的流水声，那是额尔齐斯河在向我们发出它那怡然自得的喘息声……我们的喜悦心情无可言状。

我们在河边找到一个干草垛，爬了上去。喂，鹰犬们，你们现在在哪儿找我们呀？啊？我们这回可真要好好睡一觉了！

我们……被枪声惊醒了！旁边就有狗叫声！……

怎么？这就完了吗？我们的自由就到此结束吗？……

我们紧抱在一起，屏住气息。一个人从草垛旁走过去。带着猎犬。是个猎人！……我们又睡着了，睡得很甜……整整睡了一天。我们就这样度过了逃跑后的第九个昼夜。

天一黑下来，我们便顺着河岸走去。我们是三昼夜前留下踪迹的。现在那群狗准是正在额尔齐斯河一带寻找。他们懂得我们定会朝着河流逃。因此，顺着河岸走很可能碰上埋伏。而且这样走起来也不方便，得绕过河曲、河弯、芦苇塘等等。必须弄到一只船！

灯光。岸上有人家。船桨的声音。静下来了。我们等了很久灯光才熄灭。我们轻轻走下去。船！一双桨好好地摆着。太好了！(船主人完全可能取下桨拿回家去的呀！)“再往前就出海了，苦恼就少了！”我亲爱的大自然啊！起初我轻轻地划，一点儿拍打水的声音也不敢出。划到河中流后就全力以赴了。

我们顺流而下。对面，从河曲处转出一艘轮船来，船上灯光通明。有多少灯啊！所有的窗户都亮着，整个轮船浸沉在跳舞的音乐声中。还可以看到幸福的自由乘客们在甲板上散步，在餐厅里进餐。他们并不意识到自己的幸福，甚至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自由。他们在船舱里该有多么舒适啊！……

我们这样往下游划了大约二十多公里。食物快吃完了。现在还是夜晚，应该乘机补充一些。有鸡叫声。我们把船靠了岸，悄悄朝鸡叫的方向走去。有一所小房。没有狗。一间牛棚。一条母牛和一只小牛犊。有鸡。日丹诺克很喜欢家禽。可是我说：咱们牵走牛犊吧。我们把牛犊的绳子解下来。日丹诺克牵着它朝岸边走去，我在后面认真地把足迹都弄掉，否则那群狗就会知道我们是沿河面下了。

小牛犊很听话地一直走到岸上，但是，它不想上船，身子向后坐，不往船上走。我们两人好容易才把它弄到船上，按倒了。日丹诺克坐在牛犊身上压着它，由我划船。我们本想离开河岸之后再杀它。但是，我们错了，不该载着活的走！小牛犊挣扎着要起来，它把日丹诺克翻倒在船上，两只前腿已经进水了！

全舰紧急集合！日丹诺克拉住了小牛的后腿，我拉住了日丹诺克。我们全都偏向船的一边儿，水从船帮涌进来。可别淹死在额尔齐斯河里！好容易才把小牛拉回来。但是船里进了不少水，吃水很深。得把水淘出去。但在这之前应该先把牛宰掉。我拿起刀来，想把它后颈上的脖筋割断，我记得有那么一个地方是可以割断的。但是，我割的不对，或者因为刀子不快，没有割断。小牛浑身抖动，往外挣脱，它被彻底激怒了。可我也很生气。我又想割断它的喉管，又没有割成。小牛哞哞叫着，不住地踢跳，眼看就要跳出船去，或者要把我们淹死了！它要活！可是我们也要活呀！！

我不停地用刀捅它，可总是杀不死。小牛摇晃着，左右冲撞，这个没有理性的混蛋眼看要把船弄翻，把我们淹死了！因为它这么愚笨而顽固，我对它就像对一个最大的敌人那样真地产生了不共戴天似的仇恨。我开始怀着无比仇恨用刀子胡乱地往它身上扎、割、捅[①]。它身上的血往外冒，溅到我们的身上。它大声哞叫，绝

---

① 压迫我们的人们害死我们时，不也就是这样仇恨我们的吗？

望地挣扎。日丹诺克压住它的头，船猛烈地摇晃，我不住手地用刀捅。可我从前是个连只小老鼠，连个小甲虫都不肯杀死的人呀！这时已顾不得怜悯了：现在是它死我活的问题！

小牛终于不动了。我们赶紧淘出船里的水：用舀子，用罐子，两人一起忙。然后才往前划去。

水流把我们的船冲进一条河岔。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岛。我们该藏起来，因为天快亮了。我们把小船牢牢地隐藏在芦苇深处，把小牛和我们的全部财产都拖到岸上，用芦苇把船盖上。拖着牛腿把它拉上岸边的陡壁可真不是件容易事。岛上是齐腰高的青草和树林。神话般的境地！我们已经在沙漠、草原呆了好几年，简直忘记树林、青草、河流是个什么样子了……

天亮了。小牛的脸像是非常委屈。但是，多亏了它这个小兄弟我们如今可以在岛上生活了。我们用“卡秋莎”上的一段废锉把刀子磨了磨。我从来没给牲畜开过膛，现在也得学会。我把小牛的肚皮割开，扒开，取出内脏。在树林深处点起一堆火，煮起牛肉和燕麦片来。煮了满满一水桶。

宴席！主要的是心里坦然：我们在岛上，小岛把我们和恶人们隔开。人们中间也有善良的，但是逃跑者似乎很少遇见善人，全都十分凶恶。

天气晴朗，很热。今天不需要蜷缩在胡狼窝里了。草很密，绿油油的。那些每天践踏青草的人是不了解青草的价值的。他们不能理解，一下子扑到草地上把脸紧紧地贴在草上时的愉快心情。

我们在岛上慢步走了一会儿。这里有很多野蔷薇花丛。野浆果也熟了。我们不停地吃。然后又去喝肉汤。又煮牛肉。把牛腰子放在粥里煮。

心情很轻松。回顾我们走过的艰难路程，可以发现不少好笑的事。他们还在等着我们演出短小喜剧呢。不难想象他们会怎样破口大骂我们，怎样向上司汇报。一想到他们那种样子，就不由

得要放声大笑！……

我们找了一棵大树，把树干的皮扒掉一大片，用烧红的铁丝往树上烫字："一九五〇年十月，无辜被判终身苦役的人们在奔向自由的途中曾于此稍憩。"就留下这踪迹吧！在这密林深处它不会对搜捕人员有所帮助，可是，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这些字的。

我们决定不急于离开这里。我们为之而逃跑的一切——自由！——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即使我们到了鄂木斯克或莫斯科，自由大约不会比这更充分。）除了自由，这里还有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翠绿的芳草和逍遥的闲暇。这里有足够的肉食。只是没有面包，就是缺少面包啊！

这样，我们在小岛上住了将近一星期：从逃出后的第十昼夜到第十六昼夜的开头。我们在树林深处搭起了一个干草窝棚。不错，夜里窝棚里有些冷，但我们可以在白天补足睡眠。这些天一直是晴天。我们喝了很多水，努力像骆驼那样在体内储存一些水。我们无忧无虑地坐在草地上，透过树枝的空隙观赏着那边的，河岸上的生活：汽车奔驰，人们在割草。这已是在割第二茬草了。谁也不往我们这边望一眼。

忽然，白天，我们正在草丛里晒太阳打盹的时候，听到岛上有斧头砍树的声音。一抬头，看到一个人正在用斧头砍树枝，边砍边向我们这面移动。

半个月来，我的胡须已经很长了，没有东西可以用来刮脸。我的样子一定很可怕，像个典型的逃犯。可是日丹诺克却不长胡子，脸上光光的像个大孩子。因此，我就装作睡觉的样子，叫日丹诺克迎上前去，不等他说话，就向他借支烟抽，并且对他说：我们是从鄂木斯克来的旅游者，问问他是哪里的。如果发现不对头，我这里是准备好了的。

科利亚走过去同那个人谈起来。两人吸起烟来了。原来是个哈萨克人，左近农庄的。后来，我们看到他顺着岸边走去，上了

船，连砍下的树枝也没拿，就划船走了。

这是什么意思？是急着去报告看见我们了吗？（也许，相反，他自己害怕了？怕我们去报告？因为随便砍伐森林也要判刑的呀！实际生活就是这样：大家互相害怕。）我问科利亚："你对他说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咱们是登山者呀！"真叫人哭笑不得！日丹诺克总是把事情弄乱。"我不是说过，我们是旅游者吗！在这空旷的草原地带哪里会有什么登山者？！"

不行，不能留在岛上了！享福享到头了。我们立即把东西全搬到船上，启航了。虽然是白天，也得尽快离开这里。科利亚躺倒在船底，外面看不见他，远处看去船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尽力划，使船走在额尔齐斯河的中流。

一个问题是要买到面包。另一个问题是快到人多的地方了，我一定得刮刮脸。我们打算到达鄂木斯克市之后卖掉一套西装，过去几站再乘火车走。

傍晚前，我们看到一所浮标工住的小房。我们上岸了。屋里只有一个女人。她很害怕，有点不知所措："我这就去叫我男人来！"她说着就慌慌张张出去了。我跟在后面，盯着她。忽然，日丹诺克从小房那边不安地喊道："格奥尔吉！"（见你的鬼！你那舌头是怎么长的！不是商量好叫我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吗！）我只好回到小房旁。这里已有两个人，其中一人端着猎枪。

"干什么的？"

"旅游的。从鄂木斯克来。想买点吃的。"我为了驱散他们的怀疑，接着说："咱们进屋去谈吧，为什么这么不热情呢？"

这么一说，他们果然有些缓和了：

"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或许农庄里会有吧。往下游去，两公里远。"

我们回到船上，又往下游走了二十公里。月色清明。我们爬上陡岸，看见一所小房。屋里没有灯光。我们敲敲门。一个哈萨

克人开门出来。这是第一个同意卖给我们半个圆面包和四分之一口袋土豆的人。我们买了他一根针和一点线（这大概是我们不够谨慎之处）。我们向他要了刮脸刀，但是刀片不快，刮不掉，这个哈萨克人没有胡子。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好人。我们尝到了一点甜头，便又问：能不能卖一点鱼给我们。哈萨克人的妻子走出去，拿了两条鱼来，她把鱼递给我们时，我听到她说："勿需钱！"这可是喜出望外了，不需给钱，白送给我们！这两个人可真是好人！我就接过鱼往口袋里装。可是哈萨克人却把鱼往回拉。"她说的'五许钱'，就是五个卢布的意思！"男主人解释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不，我们不要，太贵。

夜里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继续往前航行。次日，第十七天，我们把船藏在树丛里，自己找个草垛睡觉。第十八、十九两天也是这么度过的。尽量避开人。我们什么都有：水、火、肉、土豆、盐、水桶。陡峭的右岸上是一片针叶林，左岸是草地，有很多干草垛。白天，我们藏在树丛里点起火来，煮马铃薯肉汤吃、睡觉。

但是，快到鄂木斯克了，总得出去见人啊，也就是说，需要一把刮脸刀。简直是束手无策了：没有刮脸刀和剪子怎么能去掉这把胡子呢？一点办法也没有！难道一根一根地拔？

月光下，我们看到岸上有个小土岗。我想：这是不是古代的边防哨所？也许是叶尔马克*时代留下的吧？我们上岸去想看个究竟。面前这座由土坯房组成的神秘死城在月光下显得十分阴森可怕。大概它也是三十年代初期造成的吧……烧光了能烧的一切，推倒了土坯墙，人们被绑在马尾巴上拖走了……反正外国旅游者是不会到这里来的……

两个星期以来一场雨也没有下过。但是，夜里已经相当冷了。为了赶路，大部时间由我划船。日丹诺克坐在船尾闲着，更觉得

---

* 十六世纪的哥萨克名将，曾为沙俄开发西伯利亚。——译者注

冷。到了第二十天的晚上，日丹诺克便开始要求点个火堆，喝点开水暖暖身子。我让他来划船，但是他冷得直打战，一个劲儿地要求点火堆。

作为一起逃跑的同志，我无法拒绝他的这个要求，但科利亚自己应该懂得这有多么危险，应该放弃这一要求。但是，日丹诺克有个弱点，他不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就像那次从桌上抓起一块饼吃或者受到家禽的诱惑时那样。

他一直在打战，不住口地要求点个火堆。要知道，额尔齐斯河流域一带到处都在警惕地等待着我们的出现呢！其实，我们直到今天还一次也没有遇到过搜捕小队，他们居然没有在月夜的额尔齐斯河中流发现我们，没有拦住我们，这倒是很奇怪的。

这时，我们看见高高的河岸上有一处灯光。这回科利亚不要求点火了，而是要求到人家里去暖和暖和。这更加危险。不应该同意。我们忍受了那么多痛苦，走过了那么艰难的道路，为什么呀？但是，我怎么能拒绝他呢，他是不是病了？他又克制不住自己，不放弃这一要求。

小屋里一盏油灯，一对哈萨克人老夫妇睡在地板上。他们吃了一惊，立即跳起来。我解释说：

"我们这位同志病了，想借您个地方暖和暖和。我们是出差的，出来采办粮食，坐船从对岸过来的。"

哈萨克老人说："那就躺下休息吧！"科利亚一头躺到一块大毛毡上。我也装作躺在一边的样子。这是我们逃跑以来住进的第一间屋子，但是我却好像躺在火盆里似的；不但睡不着，而且躺不住。现在像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出卖了，自己心甘情愿地走进了陷阱。

哈萨克老人出去了，他只穿了一件内衣（如果不是这样，我一定会跟出去的）。可是，好半天不见他回来。我侧耳一听，门外有人用哈萨克语在小声说话。是两个年轻人。"你们是作什么的？

管理浮标的吗?”我从屋里首先向他们发问了。

“不是。我们是共和国第一个国营牧场——阿拜国营牧场的。”

我们找的这个地方可真是最糟糕的了!凡是国营农场所在地，都有苏维埃政权机关，有民警。这是共和国第一个国营牧场，那就是说，是个培养重点，更是积极……

我握了握科利亚的手，小声说:“我上船去，你随后赶来，拿着公事包。”然后又大声对他说:“咱们不该把吃的东西都留在岸上。”我走到外间，一推门，门反锁着。这就清楚了。我返回屋里，急急地扯了科利亚一把，又回到外间门前。门做得不很地道，有一块板子底下短一点，我从这里伸出手去，用力往前伸着摸……原来外面是用一根木棍子把门顶住的。我把它推倒了。

我出来急忙奔向河岸。船还在原处。我站在明亮的月光下等待科利亚。可是，不见科利亚跟上来。唉呀，真是害人!那就是说，他没有毅力立即站起来，想多暖和一分钟。也许是把他抓住了。应该去救他出来。

我又爬上陡岸。迎面走来四个人，其中有日丹诺克。四个人靠得很近。(或者是人们在抓着他?)日丹诺克喊道:“格奥尔吉!(看，他又喊“格奥尔吉”!)快过来吧!他们要看咱们的证件!”我本来叫他把公事包拿着的，可是他空着手。

我走到近前。新来的哈萨克人用蹩脚俄语问道:

“你们的证件呢?”

“您是什么人?”我尽量镇定自若地反问他。

“我是管理员。”

“噢，好啊，”我用称赞的口吻说，“咱们一起回去吧。证件是随时都可以检查的。在那儿，在屋里。屋里不也亮些吗?”我们一起回到屋里。

我从地板上慢慢拿起公事包来，走近油灯，心里盘算着怎样打倒他们，怎样跑出去，同时嘴里自言自语地说:“证件嘛，随时

都准备着，请检查吧。检查证件嘛，该检查谁就检查谁。提高点警惕总是好的嘛。我们粮食采办处里就发生过一桩事……”我已经在拉公事包的拉锁，就要打开它了。他们凑在我的身旁。我用肩膀猛地朝管理员一靠，他撞在老头子身上，两个人都倒了。我反手就给另一个年轻人一拳。叫声！喊声！我说一声“玛赫玛杰拉！”，拿起皮包就冲出了内屋、冲到外屋门口。这时我听到科利亚从门过道喊道：“格奥尔吉！抓住我啦！”回头一看，只见他把住门框不放，哈萨克人正在往里拖他。我拉了他的手一把，没拉出来。于是我蹬住门框，猛地用力一扯，把科利亚的身子一下子拉到我的身后去，可我自己却因用力太猛倒下了，立即有两个人扑到我身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从他俩的身体下面跳起来的。我们宝贵的手提包只好留在那里了。我直奔岸边石崖，连跑带跳！后面的人用俄语叫喊：“用斧头砍他！用斧头！”看样子是在吓唬人，不然他们就说哈萨克语了。我感到他们的手就要抓到我了。我跌跌撞撞地往前跑，跳下石崖！科利亚已经跑到船旁了。我对他喊道：“把船推进河！你快上去！”幸亏他们没有枪。我跳进水里，水没了膝盖，我追上船，跳上去。哈萨克人不敢下水，他们在岸边跑，一面喊着：“追呀，追！”我对他们喊：“怎么？你们这些混蛋，抓到了吗？”

幸亏他们没有枪。我顺流划去。他们大声喊叫着在岸上跑，但不远就有一个小河弯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我脱下两条裤子（一条海军裤和一条西装裤），把水拧干。冻得我浑身打战。

“哼！科利亚！你这回暖和过来了吧？”科利亚一声不吭……

很明显，必须离开额尔齐斯河。应该在黎明前上岸，尽快搭顺路汽车赶到鄂木斯克。好在已经不远了。

“卡秋莎”和盐都在手提包里。到哪里去弄刮脸刀呢，更不用说要把衣服晒干了？眼前岸边有一只小船，一间小房。看样子像是浮标工住的。我们上了岸，叫门。里面并不点灯。一个粗声粗

气的男人声音："谁呀?"

"让我们进去暖和暖和吧！船翻啦，差一点淹死！"里面的人磨蹭了好久，终于把门打开了。在昏暗的门过道一个粗壮的老头子倚在门旁，是个俄罗斯人，双手举着斧头照准我们。谁敢进去，他会一斧头劈下来的！我急忙对他解释：

"您别害怕，我们是从鄂木斯克来的。是出差回来的。刚到阿拜国营牧场去过。我们本想坐小船到下游去一趟，可从您这里往上游去不远有个浅滩，还有人下了鱼网，我们没弄好，把船搞翻了。"

老头于还是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们，并不放下斧头。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在什么画上？他像是个壮士歌里的老汉，白发苍苍。他终于答话了：

"那么说，你们是往日列坚卡去?"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是啊，去日列坚卡。可主要的是把皮包掉在水里了，里面有一百五十卢布。我们在国营牧场买了肉。现在也顾不得那些肉了，您想不想把我们的肉买下来?"

日丹诺克去取肉。老头子把我放进里屋。屋里有一盏煤油灯，墙上挂着猎枪。

"现在该看看你们的证件了。"

我尽量装出高高兴兴的样于说：

"证件嘛，总是要随身携带的。幸面放在上衣口袋，没弄湿。我叫斯托里亚罗夫·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本州畜牧业管理局的特派员。"现在应该尽快地掌握主动权。于是我问他：

"您呢?"

"看管浮标的。"

"请问您的名字和父名?"

这时候科利亚回来了。老头子也就再没有提证件的事，只说，

他买不起肉，但是招待一杯茶喝还是能够办到的。

我们在他这里大约坐了一小时，他用细劈柴点着火，给我们热了一点茶，拿出一块面包，甚至还切了一块炼过的脂油。我们谈论着额尔齐斯河的河道，得用多少钱买只船，在哪里可以卖掉它。大部时间是他一个人在说。他用一双老人的慧眼颇表同情地望着我们。我觉得他好像全都明白，是个真正的人。我甚至想对他吐露真情了。但是，这对我们不会有好处。看样子他不会有刮脸刀，他那满脸的胡须就像林中野草一样。而对他来说，还是不知道真情比较安全，否则，他就有“知情不报”之罪。

我们把小牛肉留给他一些，他送给我们一些火柴，领我们到岸边，还告诉我们船走到什么地方要靠哪一边走。我们离岸后急忙划开，想在这最后一夜尽可能走得远些。抓我们的事发生在右岸，所以现在我们尽量靠近左岸走。月亮挂在低空，天气晴朗，我们可以看见右岸的高坡上有一片树林，离岸不远有一只船也正向下游行驶，但是不如我们的小船走得快。

那是不是行动人员小组的船?……我们的船和那只船平行了。我决定不顾一切，采取主动。我用力摇桨，把船向那只船靠过去。

“老乡，您这是往哪儿去呀?”

“去鄂木斯克。”

“从哪儿来的?”

“巴夫洛达。”

“干什么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搬到那儿去住。”

听他那“噢”音很重的口音，不像是行动人员。回答问题很痛快，看来是愿意搭个伴儿的。他的妻子睡在舱里，他趁着夜晚打桨赶路。我仔细一看，这原本不是一只船，是一辆大车改装的。里面装满家具什物，大包小包。

我迅速地盘算着。这是我们在河上的最后一夜，最后几个小

时了，却有这样的巧遇！既然他是搬家的，他船上必定是食物、钱、公民证、衣服、甚至刮脸刀，什么都有。而且哪儿也没有人抓他们。我们是两个人，他是一个人（他妻子根本不在话下）。我可以用他的公民证，科利亚打扮一下可以装成女人，他个子瘦小，脸上没有胡子；至于体型，可以伪装一下。当然，他们也会有皮箱。这对我们装扮成旅行者有用处，这样，任何一个汽车司机都会同意把我们带到鄂木斯克去，今天早晨就能到。

俄国的河上哪个时代没有打劫的呀？既然是险恶的命运之神这样安排的，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自从我们在河上留下踪迹之后，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当然，不忍心夺走他用血汗挣来的财富，他是有些可怜，但是，谁可怜过我们呢？或者将来有谁会可怜我们呢？

这就是我和日丹诺克一瞬间所想到的。我只轻轻地问了一声："嗯？"日丹诺克小声回答说："玛赫玛杰拉。"

我使船慢慢靠过去。已经开始把他们的船逼近河岸了，岸上是一片黑压压的树林。我加紧靠过去，尽量不使船走进前面的河曲处，说不定那里就是树林的尽头了。我忽然改用首长的语气命令说：

"你听着！我们是内务部的行动小组。你把船靠岸吧，检查一下你的证件！"

划船的人把桨扔下了：不知他是害怕还是因为遇到的不是强盗而是内务部行动小组而高兴。

"请吧，就在船上检查也行啊！"

"告诉你靠岸，你就靠岸！快点！"

我们都靠岸了，两只船紧挨着。我们跳上岸，他却好不容易才爬过那些包袱。原来他是跛脚。他妻子醒了，睡意惺忪地问道："还远吗？"小伙子把公民证递给我。

"你的服役证呢？"

"我是残废。因伤致残，免役了。这是证明……"

我看到他的船首有金属的闪光，那是一把斧头。示意科利亚把它拿掉。科利亚猛地扑过去，一把抓起斧头。那个女人尖叫了一声，她感到不对头了。我厉声说：

"你喊什么?！别叫！我们是在搜查逃犯。斧头也是凶器嘛！"女人安静下来。我命令科利亚：

"中尉，你到哨所去看看，沃罗比约夫大尉应该在那儿。"

(姓名、职称都是随口说出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朋友沃罗比约夫大尉也是个逃跑过的人，他现在还蹲在埃克巴斯图兹的加强管制棚里。)

科利亚明白了：到上面看看有没有人，可不可以行动。他跑上山坡去。我继续讯问、查看。我仔细看他的公民证和证明，被检查人讨好地不住地划着火柴给我照亮。年龄很合适，这个残废人还不到四十岁。他当过浮标工，现在卖掉自己的房子和奶牛(所有的钱当然都带在身边)，想到外地去寻求幸福生活。他觉得只是白天走太慢了，所以晚上也在赶路。

这是一个绝好的、难得的机会，因为并没有人追捕他们。但是，我们想干什么？要他们的命？不，我从未杀过人，也不想杀人。侦查员和行动人员折磨和侮辱我的时候，我想过杀人，但对普通的劳苦人民，我下不了手。拿走他们的钱吗？只要拿一点点。嗯，多少算"一点点"？只够买两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加上吃饭的钱就行了。另外还要一点破旧东西。这不会使他们破产。不拿走他们的证件和船，同他们商量好，不许他们去报告，行吗？很难相信他们。况且，我们自己没有证件怎么行？

可是，如果拿走他们的证件，那他们就别无办法，只有去报告。为了不让他去报告，就得委屈他们，把他们绑在这里。要绑得能使我们有两三天的充裕时间才行。

这么说来，不是很简单吗？……

这时科利亚察看回来了，暗示我上面一切正常。他等着我发出“玛赫玛杰拉！”的命令。怎么办？

奴役的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图景又浮现在我眼前。我原意回到那里去吗？……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

这时，突然，有一个什么东西非常轻柔地抚摩了我的腿一下。我看见一个小小的白东西。我俯身一看：原来是一只小白猫，从船舱里跳出来的。它把尾巴像旗杆一样竖着，鼻子里发出轻轻的呼噜声，用身体蹭我的腿。

它并不了解我此刻的想法。

由于这小白猫的轻轻触动，我仿佛感到自己的意志有些动摇了。从钻出铁丝网下的小洞以来二十昼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一根弦，似乎一下子断了。我感觉到，现在无论科利亚说什么，我都不仅不会夺取这两人的生命，而且不会夺取他们的一点血汗钱。

我保持着严肃的声调说：

“好，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们马上就会查清楚的！”

我和科利亚登上山坡，我手里拿着他们的证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科利亚。

科利亚不作声。他不同意，但是不吭声。

世界就是这样安排的：那些家伙能够随意剥夺任何人的自由，他们并不存在良心问题。而如果我们想把天赋予自己的自由取回来，他们就要求我们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要求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付出生命。

那些家伙什么都能作得出，我们则不能。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强于我们的原因。我和科利亚没有商量出一致意见就走下山坡了。跛脚男人站在靠岸的船旁。

“你妻子呢？”

“她害怕，跑到树林里去了。”

“这是你们的证件，拿去吧！你们可以赶路了。”

男人道了谢，冲着树林喊道：

“玛——丽娅！回来吧！都是好人！咱们走吧！”

两只船划开了。我也尽快地往前划。跛脚男人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从我们身后喊道：

“首长同志！我们昨天可看见两个人，简直像土匪一样。我们要知道的话，非把他们抓住不可，两个坏蛋！”

“听，怎么样？你可怜他们吗？”科利亚问我。

我没有吭声。

* * *

就从那天晚上起，从我们进屋取暖的时候或者从看到那只小白猫的时候起，我们的整个逃跑计划就被打乱了。我们似乎失掉了某种东西——是信心？果断？分析判断能力？两人和谐的决定？在这里，在即将到达鄂木斯克时，我们开始犯错误，两人开始不往一处想了。而这样的逃跑者就注定逃不远。

没等天亮我们就弃舟上岸了。白天睡在草垛上，但很不放心。天黑了，肚子饿，应该煮点肉吃。可是跑的时候把水桶丢了。我决定用火烤。找到了一个拖拉机上用的破座子。就把它支起来烤吧。土豆可以扔到灰里烧。

旁边有一个草窝棚，是割草人搭起来休息用的。我这天不知怎么那样糊涂，竟决定在窝棚里点火烤肉，我以为这样别处就看不见火。科利亚根本不想吃晚饭，他说：“咱们赶路吧！”老是意见分歧，合不来。

我在窝棚里点起火来。但是，草放多了，火一下子就上了窝棚顶，我好容易才爬出来。火顺着风势，把旁边的草垛（就是我们白天睡觉的那个草垛）也烧着了。我倒忽然心痛起这些干草来：多好的草啊，白天我们还在上面睡觉呢！我急忙把着了火的干草扔开，在地上滚动，企图把火扑灭，不让它蔓延。科利亚坐在一

旁，气得鼓鼓的，一点也不想帮忙。

我们又留下了一个多么明显的痕迹呀！看，这照得满天通红的火光！几公里之外都能看到。这还要算敌人的破坏行为哩！对逃跑犯还会判原来的刑期二十五年，再加上放火烧农庄草垛的“破坏行为”，高兴的话，可以判你“极刑”（死刑）了！

主要的是，每犯一个错误，它又会引起新的错误，因此也就更失去信心，失去对环境的判断能力。

窝棚烧掉了。土豆倒也烧熟了。拿草灰当盐，我们把它吃了。

夜里继续走。绕过一个大村子。拾到一把铁锹，我们便拿着它，心想：会有用处的。我们沿着额尔齐斯河走，不久就遇到一个河湾。要绕过去吗？太费劲了。我们在附近找了找，发现一只没有桨的船。没关系，铁锹也可以当桨使。我们渡过河湾。我在这里用皮带把铁锹绑住，背在身后，锹把向上，从远看像是背着一支猎枪。在黑暗中人们会把我们当成猎人的。

没走多远，从旁边过来一个人，问了一声：“彼得罗？”“认错人了，不是彼得罗！”

我们走了一夜，白天又是睡在草垛里。轮船的汽笛声惊醒了我们，钻出来一看：不远处就是码头。几辆汽车正往码头上运西瓜。鄂木斯克市就在眼前。鄂木斯克就在眼前！该是刮刮胡子，弄一点钱的时候了。

科利亚不断折磨我：“这回我们该完蛋了。既然可怜他们，咱们为什么还要逃跑呢？正在决定命运的关头，你却发起慈悲心来！这回我们该完蛋了。”

他说得有理。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没有意义啊。现在我们没有刮脸刀，没有钱：本来是两者都已经到手了的，可我们却没有拿。我们为了逃跑，想啊，盼啊，多少年。耍了多少花招，作了多少戏。钻铁丝网，随时等待着子弹穿过后背，六天六夜滴水不进口，在草原上挣扎两个星期——而到最后，却没有拿那已经到

手的东西！像这样满脸胡子怎么进鄂木斯克？到哪里去弄钱从鄂木斯克坐车到远处去？……

白天我们还是躺在干草里。当然，睡不着。下午五点左右日丹诺克说：

"现在趁着天还亮的时候出去看看情况吧！"

"那可不行！"我说。

"跑出来快一个月了。你可真是个保险主义者！我去，我一个人去。"

"你敢！我捅你一刀！"当然，我是不会捅他的。

日丹诺克不说话了。躺着。突然，他爬起来，钻出去，走了。怎么办？就这样分手？我也只好出去，追上他。我们在大白天顺着额尔齐斯河边的大路走。走到一个草垛旁坐下来商量：如果再遇到一个人，就不能放走他了。天黑之前绝不能让他去报告。科利亚不小心跑出去(想看看路上有没有人)，被一个小伙子看见了。只好把小伙子叫过来：

"朋友，请过来！来一支烟解解闷儿吧！"

"你有什么可发愁的啊？"

"这不是嘛！我跟大舅子找个星期天出来划船玩玩。我是鄂木斯克人，他是巴夫洛达造船厂的，是个钳工。你看，夜里船脱了碇，漂走了，我们就这样留在岸上。你是干什么的？"

"看管浮标的。"

"你看没看见我们的船？说不定漂到芦苇丛里去了？"

"没看见。"

"你的岗位在哪儿？"

"那就是！"小伙子指指附近一间小屋。

"那就到你那儿去吧。我们带着肉，咱们煮点吃。我们也刮刮脸。"

我们三个人走去。原来这间小屋是另一个浮标工住的，我们

这个小伙子住的那间离这里还有三百米。又不是一个人！我们刚进屋，邻居就骑自行车来了，还背着一支猎枪。他用眼睛瞟着我的满脸胡子，问起鄂木斯克的生活来。向我这个政治苦役犯打听鄂木斯克自由人的生活！我只好连猜带编，反正少不了什么住的地方太挤，食品供应不好，工业品质量差之类。我想，这大概不会错吧。谁知这个人不以为然，他撇着嘴反驳我，原来他是个党员。科利亚这时正在煮肉汤，我们应该多吃点准备着，也许到达鄂木斯克之前再吃不到东西了。

到天黑这一段时间真难熬。这两人一个也不能放走。可是，如果再来第三个呢？天色黑下来，两人都要去点浮标灯。我们也要求跟去帮忙。那个党员拒绝说：

"我只要点两个浮标就行了，点完还得进村给家里送柴火去。我还要回来的。"

我暗示科利亚盯住这个党员，情况不妙就拉进草丛。并暗示他会面的地方。我自己跟另一个人去点浮标。我从船上留心观察附近岸上的地形，一边向他打听去附近城镇的路程。我看到那个党员和我们同时往回走，有些放心了：他还没有来得及去告密。不一会儿，他果然拉来一车柴火。但他却把车放在屋旁，不往家里送，坐下来喝科利亚煮的肉汤。他不走，有什么办法呢？那就对付他们两个？把一个弄进地窖，另一个塞到床下？……他两人都有证件，其中一人还有猎枪和自行车。是吗？啊！逃犯的生活啊！人家只是接待了你，你还嫌不够，还要强夺他们的……

突然，我听到吱吜一声，是桨架的声音。往窗外一看，三个人坐小船来了。这样就是五比二了。小屋的主人出去了一下，立即返回来取小铁桶，一边说：

"是班长来送煤油，奇怪，怎么他亲自送来，今天是星期天啊？"

星期天！我们都忘记星期几了。对我们来说星期几都一样。我们是星期日晚上逃出来的。那就是说已经过了三个星期。劳改营

里怎么样？……猎犬们大概绝望了。认为再也抓不到我们。如果当初坐汽车跑，有这三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大概早在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或者白俄罗斯共和国安顿下来了，已经有了居民证，找到工作了。顺利的话，也许还能往西走得远些……现在，经过三个星期之后，要是再投降可太遗憾了！

“喂，科利亚！差不多了吧，该打起精神整理行装了吧？”我们两人出去，蹲在草丛里观察着：小屋的主人从船上取了煤油，他的邻居，那个党员，也凑过去，小声在说什么，我们听不见。

送煤油的人走了。为了不给他们单独谈论我们的机会，我叫科利亚赶快回小屋去。我自己悄悄摸到主人的船旁，为了不弄响铁链子，我使了很大力气才把木桩子拔了出来。我估计了一下时间：如果浮标班长去报告，到村里约有七公里的路程，大约需要四十分钟，如果村里有武装人员，他们集合起来乘汽车赶到这里，也还得十五分钟。

我回到屋里。邻居还没有去送柴火，两人还在聊天。奇怪。那就不得不对付两个人了。我对日丹诺克说：

“喂，科利亚，睡觉前咱们到河里去洗洗罢？”（我们俩总得商量一下呀。）

我们刚刚出屋，就听到黑暗中传来皮靴的声音。我们弯下腰，借着灰暗的天空反光（月亮还没有升起）看到几个人影鱼贯地从树丛旁跑过去，把小屋围起来。

我对科利亚小声说：“上船去！”说着就向岸边跑。我从陡岸上滚滑下去，正好落到船旁边。生命攸关，分秒必争。可是不见科利亚跟上来。唉呀！他到那儿去啦？可我又不能扔下他。

终于，看见黑暗中一个人影顺河岸朝这边跑来了。

“科利亚，是你？”

火光！嗖的一声，子弹迎面打来！我翻身两手向前扑到船上。陡岸上冲锋枪接连打了几梭子子弹。人们喊道：“打死了一个！”有

人俯身问："受伤啦？"我呻吟着。人们把我拉出去，拖着走。我一跛一跛地走（如果受了枪伤，他们会殴打得轻些）。黑暗中我偷偷把两把刀子扔在草里。

岸上的红肩章士兵问姓什么。我回答："斯托里亚罗夫。"（还指望着万一能想法混过去。不想说出自己的真姓，因为那就意味着自由的结束呀！）

人们狠狠地往脸上打："报你的姓名！""斯托里亚罗夫。"他们把我拖进小屋，扒光上身的衣服，用铁丝把两手捆在背后，铁丝直吃到肉里。几把刺刀对着我的肚子。其中一把从刀尖上往下滴着血。抓到我的那个民警中尉萨博塔什尼科夫用那干式手枪往我脸上直捆，我看到手枪的扳机是扳起了的。"报你的姓名！"唉，抵抗已经没有用了。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另一个在哪儿？"

眼前的手枪晃动着，对着我的刺刀又往里扎了一下。

"另一个在哪儿？"

我为科利亚没被抓到而庆幸。我重复说：

"刚才还在一起，大概被打死了。"

来了一个戴蓝箍帽的行动人员，哈萨克人。我的两手倒剪着，被他一把推倒在床上，半躺半卧，他就左右开弓打起嘴巴来，两只胳膊像游泳一样轮流摆动，每一巴掌都打得我的头往墙上撞一下。

"武器在哪儿？"

"什么武器？"

"你是背着武器的！夜间有人看见了！"

噢，路上遇见的那个猎人也去报告了……

"那是一把铁锹，不是武器。"

但他不信，继续打。突然，我觉得轻快了——这是开始失去知觉了。等醒过来的时候，我听到：

"好，你等着！要是我们的人受了伤，就地打死你！"

(他们像是有预感，科利亚确实弄到了一支枪！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我告诉科利亚“上船去！”可是科利亚却向相反的方向跑去，他钻进了草丛。他后来解释说是没听懂我的话……其实，不是的，他那天一直想要同我分开，这时他就跑开了。他记住了放自行车的地方。听到枪声后他拼命地朝河岸的相反方向跑，后来朝着我们来的那个方向爬了一段路，藏在草里。等天完全黑下来，一群人围着我的时候，他才直起身来又跑。边跑边哭，他以为我被打死了。他一口气跑到原先那间小屋外，踢破窗户，进去就找墙上那支猎枪。他摸到了猎枪，还有子弹袋。把枪上了膛。他说：“我当时想：去报仇？朝他们打一梭子，替格奥尔吉报仇？但是，又想了想，不行！”他找到了自行车，找到了斧头。他从里面破开门，往口袋里装了些盐，(是觉得盐最重要呢？还是没有时间考虑？)然后就骑上自行车顺大路直奔村子，又穿过树林，就从士兵们的旁边骑过去。(士兵们根本没有想到。)

我被绑着装上大车，两个士兵坐在我身上，把我送到两公里外的国营牧场。牧场里有电话，方才同送煤油的浮标工班长一起坐在船里的护林员就是用它通知了红肩章士兵，所以他们来得那么快。我却没有估计到会有电话。

同这个护林员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谈这个插曲虽然不愉快，但它对于被捕获的逃犯来说却有典型性。我想解小手，因为我的手被捆在背后，需要别人用手给我一种十分阴私的帮助。拿冲锋枪的士兵当然不屑于做这种事，于是就叫那个护林员陪我出去。我们离开士兵们。当他在黑暗中帮我解手的时候，小声请求我原谅他的出卖行为：

“我的职责所在嘛！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没有回答。这里的是非曲直由谁来评判呢？出卖我们的人有的由于职责，有的没有职责也出卖。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出卖我们，只有那个白发老汉例外。

在大路旁的一间小屋里，我光着上身被捆绑着。口里干渴得很，但是不给我水喝。红肩章士兵们像一群野兽似地看着我，谁高兴就用枪托给我一下。但是，到了这里就不会那么轻易被打死了：在他们人少的时候，没有证人的时候，他们会打死人。（他们的这种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多少天来一直排着队在河岸上，在芦苇丛里寻找我们，得不到休息，吃不到热饭，只能吃罐头。）

这间小屋里住着一家人。小孩子们用好奇的眼光盯着我，但不敢走过来，有的吓得打战。民警中尉坐在椅子上，同主人一起喝着伏特加酒，他为这次成功和将会得到的奖赏而高兴。他向主人夸口说：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还是个上校呢，有名的美国特务，大土匪！他想往美国大使馆里逃。他们在路上杀了人，吃人肉。"

说不定他自己是真的相信这些话呢。内务部一直在散布关于政治犯的这类谣言，这样可以容易抓到人，大家都会去报告。他们只靠政权、武器、机动迅速这些优越条件还不够，还需要借助于造谣中伤！

（就在这个时候，科利亚骑着自行车，背着枪，若无其事地从我们的小屋旁驶过。他看到了照得很亮的小屋，几个坐在门口边抽烟边说笑的士兵和面对着窗户光着身子被绑住的我。他蹬车朝鄂木斯克猛跑。在抓住我的地方，还有士兵们一整夜守在草丛里，等待天亮进行搜索。这时还无人知道邻近的浮标工的枪和自行车都不见了，那个年轻的党员浮标工大概也是喝酒、吹牛去了。）

民警中尉充分享受了这猎获物的快乐之后，（对于地方民警来说这可是个不寻常的猎获物啊！）命令把我带进村里。我又被扔进大车。进村后，关进了临时羁押室，（这种地方在苏联到处都有，每个村苏维埃都附设一个临时羁押室！）两个冲锋枪手在走廊警戒，两个守住窗口！美国特务上校嘛！把我的手解开了，但命令我躺在屋中间的地上，不许靠近任何一面墙。就这样，我光着身

子躺在地上度过了十月的一个夜晚。

第二天早晨，来了一个大尉，他的两眼狠狠地盯着我，把我的一件制服上衣扔给我（别的东西他们都卖掉喝酒了）。他不住地用眼睛瞟着门口，小声地向我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怎么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那你怎么知道沃罗比约夫大尉领导搜捕工作？你这个坏蛋！你知道你把我置于何地了吗?!”

他也姓沃罗比约夫！他也是大尉！那天夜里，当我们装成行动人员小组的时候，我确实提到过一个沃罗比约夫大尉。是我发了善心放掉的那个劳动者去如实报告了。现在这个大尉却遇到了麻烦！如果领导追捕的人和逃跑者有联系，那么，三个星期没抓到人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又来了几个军官，他们大声对我嚷嚷，同时也询问关于沃罗比约夫的事。我告诉他们：这是偶然的巧合。

又把我的手用铁丝捆起来，把鞋带抽掉，白天带我到村里的街上去示众。大约有二十名冲锋枪手押着我。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女人们不住地摇头，孩子们跟着跑，喊叫着：

“他是土匪！是带去枪毙的！”

两手被铁丝紧紧勒住，每走一步鞋就要掉。但是，我昂起头来，用骄傲的眼光望着群众，我想让大家都看看：我是个好人！

带我出来示众，是为了让这些妇女和孩子们记住。（关于我的神话很可能还要在这里流传二十年！）一直走到村口才把我推进一辆卡车的破旧木板车厢里。五名冲锋枪手靠在驾驶室旁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就这样，我们逃出劳改营后曾经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走过来的全部路程，如今我又得一步一步地往回走了。而这段路程，要顺着弯弯曲曲的汽车路走的话，足有五百公里。给我戴上了手铐，

铐得非常紧。两手倒剪着，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脸。我不是像一个人，而是像一口被捆住的猪似的卧在车厢里。他们就是这样惩罚我们的。

道路坎坷不平，雨下个不停，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摇晃。随着车身的摇动，我的头和脸就在车厢底板上来回磨蹭。头和脸被木刺划伤，木刺扎进肉里。手不但护不了脸，而且也随着车子的摇动被手铐咬得剧烈痛疼，像是被锯掉似的。我试图跪起来爬到车帮旁边，靠着车帮坐下。但是，白费力！因为没有东西支着，车一摇晃就又把我摔倒了，我只有在车厢底板上滚来滚去，有时候弹起来又撞到板子上，疼得好像五脏六腑全要震出来似的。仰面朝天，不行，压得背后的手吃不消。侧着身子，不行。趴下，也不行。我想弯着脖子，把头抬起一点来，免得老撞脸，不行，脖子支持不了一会儿，头便倒下去又撞在底板上……

五个押解兵看着我的痛苦，丝毫无动于衷。

这押解的旅程对他们也将是一次思想教育呀。

坐在驾驶室里的中尉亚克夫列夫每当车停下来的时候就往车厢里看一看，咧着嘴说："嗯！没跑掉吧！"我请求他给我摘掉手铐，他笑笑："我可不是那个让你钻铁丝网的小伙子。痛？你痛死才好哩！"

头一天晚上我还曾高兴过，心想：这次殴打还算轻，倒还不算"按罪受罚"。现在，我才明白：既然有卡车的破车厢会惩罚我，他们何必让自己的拳头受累呢？我身上没有一处不被擦伤撞肿的。两手剧痛，脑袋像是要裂开。满脸撞伤，扎了许多木刺，皮擦破了[①]。

车走了一整天和大半夜。

---

① 何况滕诺是个血友病患者。尽管他为了逃跑可以冒许多危险，但是，一个小小的擦伤就有可能要他的命。

当我已经不再同车厢作斗争而只是麻木地听任脑袋往车帮上撞来撞去的时候，一个押解兵实在看不下去了，把一个口袋垫在我的头下，并且偷偷替我松了松手铐，弯腰的时候悄声说："没关系，快到了，再忍一会儿吧。"（这小伙子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他是什么人教育出来的？大概可以肯定地说不是马克西姆·高尔基教育的，也不是他们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教育出来的。）

埃克巴斯图兹。士兵们把车围起来。"出来！"我站不起来。（即使能站起来，他们也会让我在兴高采烈的士兵们的拳打脚踢下通过的。）打开了车帮，我被拖到地上。看守们集拢来，大家都想看看，嘲弄一番。不知谁喊了一声："哈！你这个侵略者！"

把我拖过岗楼，拖进监狱。没有把我塞进单间，而是立即关进一般牢房，为的是让那些喜欢"争取自由"的人看看我的模样。

在牢房里，囚犯们把我小心地抱起来，放到上层铺上。只不过要到明天吃早饭时他们才能给我点吃的东西。

那天晚上科利亚骑车走在去鄂木斯克的路上。一看见远处的汽车灯光，他就急忙拐进草原，放倒车，躺下。后来，他看到地里有一家孤零零的农户，宅旁有个鸡窝，又燃起了希望，于是他摸进去，扭断了三只鸡的脖子，装进口袋。别的鸡叫起来，他这才赶紧跑了。

自从我们犯了几个大错误之后他就感到缺乏信心，而现在我已被抓回，科利亚心里更没有底了。他不坚定，神经过敏。只凭某种拼命的心情往前跑，已经不能很好地考虑对策了。他已经不能判断一个极简单的道理：自行车和枪支的丢失现在肯定已被发觉，因此这两件东西已经不能再帮他伪装了，他应该天一亮就尽早把这两件过分明显的标志丢掉；同时，他不应该从这面的大路进鄂木斯克，应当远远地绕个大圈，到另一面，从小路进城。枪支和自行车应该尽快卖掉，这样还可以弄到点钱。这些他都没有

想到。他在额尔齐斯河边的草丛里藏了大半天，但又没有忍到晚上，就在天不黑时顺着河边小路走去了。十分可能这时已经通过电台把他的特征广播了，在西伯利亚并不像在苏联欧洲部分那样回避公开广播此类事情。

他骑车走近一所小房，进去了。家里只有老太婆和她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儿。家里有收音机。巧得出奇的是收音机播送的欧曲正是：

流浪人逃出了库页岛，
沿着野兽走过的小道……

科利亚一下子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妇女们问他：

“什么事使你这么伤心啊？”

听到她们这句同情的问话，科利亚忍不住放声哭起来。两个妇女都尽力安慰他。他解释说：

“我现在是孤零零一个人，全把我抛弃了。”

“那你就娶个妻子吧，”老太婆不知是开玩笑，还是认真地说：“我这闺女也是一个人过。”

科利亚更是被感动了。不由得朝这个待嫁的姑娘望上几眼。姑娘却一本正经地转过脸来说：

“有钱买伏特加酒吗？”

科利亚把最后的几个卢布搜了出来，看样子不够。

“嗯，我一会儿再添上点。”姑娘说着就出门去了。

“对呀！”科利亚想起来了，“我这里还打了几只沙鸡呢。丈母娘，您去把它炖炖，不是一顿节日晚餐吗！”

“你这都是母鸡呀！”老太婆抓起鸡来一看，不对头。

“那就是我夜里打的时候没看清楚。”

“那怎么鸡脖子都拧断啦？……”

科利亚想讨支烟抽。老太婆却为了马合烟向新姑爷要钱。这时科利亚把便帽摘了下来。老太婆一看，更是慌了神：

“看你这头剃得光光的，该不是个逃犯吧？别找麻烦，赶快给我走开！等我闺女回来，我们给你报告去！”

科利亚总是在想：为什么我们在额尔齐斯河上可怜了自由的人们，而自由的人们却一点也不可怜我们呢？他把墙上挂的一件莫斯科式短上衣取下来（天已经凉了，可他身上只有一件衣服），穿上一试，正合身。老太婆在喊：“把你交给民警去！”这时科利亚已经从窗户看见老太婆的闺女回来了，还有一个男人骑自行车跟在后面。她已经去报告了！

那就是说——“玛赫玛杰拉！”日丹诺克抓起枪，对老太婆说：

“到墙角去！躺下！”他自己侧身靠在墙上。两个人刚一进门，他就厉声命令说：

“都躺下！”又对那个男人说：“你把靴子脱下来送给我作结婚礼物吧！一只一只地脱！”

男人在对准他的枪口威胁下脱了皮靴。科利亚把靴子穿上，把劳改营的破鞋扔掉。然后警告他们：谁敢出去追，就开枪。

日丹诺克骑上自行车跑了。但是男人骑自己的车紧追上来。科利亚跳下车来，举枪瞄准：

“站住！放倒自行车！往后退！”

科利亚把男人赶开，走过去踩坏车辐条，用刀子割开车带，自己这才骑车走了。

他很快就上了大路。眼前就是鄂木斯克，他径直向鄂木斯克骑去！来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旁边菜园里有几个妇女正在刨马铃薯。一辆三轮摩托车从后面跟上来了，上面坐着三个穿棉袄的工人模样的人。走着走着，三轮摩托突然一转，用车斗向科利亚撞过来，把他撞倒了。三个人跳下摩托车，一齐扑向科利亚，掏出手枪，用枪把打他的头。

菜园里的妇女们叫起来："你们干吗打人？他惹你们了吗?!"

的确！他惹他们了吗？……

但是，谁对谁干了什么并且将要干什么，这是老百姓所不能理解的。三个人的棉袄下面都穿着军装（行动人员小组不分昼夜地守候在进入鄂木斯克的路口）。妇女们听到的回答是："他是杀人犯!"这样说最简单。于是，相信法律的妇女们就又继续去刨马铃薯了。

行动小组首先就问这个乞丐般的逃跑者有没有钱？科利亚诚实地回答说：没有。他们搜他，在他刚刚抢来的新装"莫斯科式上衣"口袋里找到了五十卢布。他们拿了钱，到一家饭馆足吃足喝了一顿。不过，也还给科利亚吃了一顿饱饭。

我们就这样被拴在监狱里很长时间，直到第二年的七月才审判。经过九个月的劳改营监狱，我们都患浮肿。这期间时常被揪去审问。负责审讯的是劳改营头目马切霍夫斯基和行动特派员魏因施泰因。他们追问：犯人中间谁帮助我们逃跑的？自由工人中间谁同我们"商量好了"在我们逃跑时把电灯熄灭？（我并没有对他们讲明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电灯熄灭反而妨碍了我们。）鄂木斯克的接头地点在哪里？想从哪里越过国境逃出去？（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人们想留在故土的心情，而是认定人们想往国外跑。）我们回答说：

"我们是往莫斯科跑，往党中央跑，去申诉对我们的非法逮捕，没有别的想法。"但是他们不信。

审讯没有搞到什么"有趣的"材料，最后也只好给我们每人拼凑一个由下列"花朵"组成的逃跑者的"花束"：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4分条（反革命怠工）；第五十八条第3分条（强盗行为）；"六四"指令第1—2条（结伙偷盗）；同一指令第2—2条（暴力抢劫，危及人身安全）；第一百八十二条（制造并携带凶器）。

但是，这一整串吓人的条文也并没有给我们加上比已经戴上的镣铐更沉重的镣铐。早已超越一切合理界限的法律惩罚所能给予我们的也不过就是二十五年苦役吧，而这却是一个浸礼教徒为了一次祈祷就可能受到的刑罚，也是我们在逃跑前已经被判处的刑罚。因此，只不过是今后点名时回答自己的“刑满日期”时不再说“一九七三年”了，要说“一九七五年”，如此而已。难道当时，在一九五一年，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九七三与一九七五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审讯中只有一点使我们受到威胁：他们说要把我们按经济破坏犯论处。这个看来很普通的名词却比那些司空见惯的“怠工、强盗、抢劫、偷窃”等等危险得多。因为根据这一罪状可以判处死刑，这是一年前才宣布实行的。

说我们搞“经济破坏”，是因为我们“破坏了人民国家的经济”。审讯员对我们解释说：为了追捕你们，国家共花费十万零二千卢布；造成其他工地都停工几天（没有放囚犯们出工棚，因为担任警戒的士兵大部调去执行搜捕任务）；有二十三辆汽车载着士兵昼夜奔驰在草原上搜寻，三星期就用掉了全年汽油消耗定额；向附近所有的城市和村庄派去了行动人员小组；发出了全苏通缉令，同时向全国分发了我和科利亚的照片各四百张。

我们怀着骄傲的心情听完了这一长串数字……

结果，我们又各自被判二十五年。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的刑期还没有满呢……”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时，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滕诺，这个竞技运动家，甚至是竞技运动的理论家，已经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死于突然发现的癌症了。他是在病床上勉强看完这些章节的，并且用那已经开始麻木的手亲自作了一些修改。他绝没有

想到会这样死去，他对朋友们所作的誓言也不是要这样死去的！每次盘算逃跑计划时，他都一次又一次地燃起要死于战斗的愿望。他常说："我死的时候一定要同时带着十来个杀人犯到阴间去，其中第一个就是维亚奇克·卡尔祖贝（即莫洛托夫），另外还一定得有赫瓦特（即负责瓦维洛夫案件的侦查员）。我不是要杀人，我是要处死他们。既然国家法律保护杀人犯，我就得这样做！"滕诺曾说："在你已经打出头几枪之后，你自己生命的本钱就算已经捞回了，那时你会高高兴兴地超额完成任务。"但是，病魔突然袭来，没有允许他找到武器，转瞬间夺走了他的力气。当滕诺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时，他还曾亲自把我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分别投到莫斯科的许多邮箱里去。他希望把他葬在爱沙尼亚。给他作临终祈祷的牧师也是个老囚犯，是蹲过希特勒和斯大林双方的集中营的。

可是，莫洛托夫却安全地活下来了，他正在翻阅旧报纸并撰写他的刽子手回忆录。而赫瓦特呢，他正在高尔基大街第四十一号住宅里安闲地花着他的养老金。

在滕诺逃跑事件发生以后，（由于他那不幸的短小喜剧）劳改营文化教育科的文娱小组被解散了一年之久。

这是因为：文化固然很好，但是文化应该为压迫服务，而不应该为自由服务。

第　八　章

靠意志逃跑与靠技术逃跑

对于普通劳改营里发生的逃跑事件，假如逃跑者不是逃往什么维也纳或越过白令海峡的话，古拉格群岛的主宰者以及关于古拉格的各项法令倒也还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他们把这种逃跑看作自然现象，看成一份非常庞大的产业中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个别经营管理不善的现象，就像大畜群里丢掉一头牲口，伐木场被水冲走一根原木，砖瓦厂摔碎几块砖瓦一样。

但是，对待特种劳改营的逃跑事件就不同了。为了贯彻执行各族人民的慈父的特殊意志，他们把特种劳改营的警戒加强了许多倍，配备上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摩托部队（即在普遍裁军中不应裁掉的那些部队）。关押在特种劳改营的没有社会亲近分子（社会亲近分子逃跑倒不会造成多大损失）。这里也不能再借口冲锋枪手不够或装备不良了。因此，刚建立特种劳改营时就在有关指令中规定：从这些劳改营里应该完全不可能逃跑。从这里逃跑任何一个囚犯，就等于一个大间谍偷越国境，这将是整个劳改营当局的耻辱，是警戒部队指挥机关的政治污点。

但是，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根据第五十八条判刑的囚犯的刑

期已经不再是十年，而是刑法典的判刑极限——四分之一世纪了。其实，这种毫无意义的一律残酷对待的作法也有其弱点：就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束缚杀人犯不再杀人一样。（因为再杀一个也不过是十年刑期从头算起而已。）现在刑法典再也起不了约束政治犯逃跑的作用了。

况且，被赶到这些劳改营来的人，他们并不按照那种为劳改营当局胡作非为进行辩护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思考问题，他们曾在整个战争中奋战疆场，至今那握过手榴弹的手指还没有完全伸直，他们是坚强的健康人。格奥尔吉·滕诺、伊万·沃罗比约夫、瓦西里·布留欣以及他们的同志们和其他劳改营里许多类似的人，即使没有武器也能顶得上正规军队摩托化步兵的新警卫队。

特种劳改营里的逃跑尽管数量上比普通劳改营少（特种劳改营建立的时间也较短），但是这些逃跑更加强劲有力，更加坚忍卓绝，更加不可逆转和绝望，因而也更加光荣。

谈一谈这些逃跑事件，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这些年来我国人民到底是不是那么忍气吞声，那么俯首贴耳的。

请看下面几个例子。

在滕诺逃跑的一年前发生过一次逃跑事件，它成了滕诺的借鉴。一九四九年九月，斯捷普特种营（矿山，杰兹卡兹甘）第一分部跑了两个政治苦役犯——格里戈里·库德拉和伊万·杜舍奇金。库德拉是乌克兰人，身体壮实，老成持重，头脑清醒，但是一旦发起火来就像查波洛什的哥萨克一样，连刑事犯都怕他。杜舍奇金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安详的白俄罗斯人。他们两人在矿山劳动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废探井。探井上口用铁篦子盖着。他们利用上夜班的时间偷偷把铁篦子一点一点地摇晃松了。与此同时，他们把面包干、刀子和从卫生所偷来的热水袋悄悄带进探井，藏起来。逃跑那天晚上，他们下井劳动时分别向班长请假，说身体很不舒服，不能劳动，想在下面躺一下。原来夜里井下没有看守人

员，班长拥有全权，不过晚上干活时班长也不敢逼得太紧，因为有时候会发现班长的脑袋被敲碎，扔在井下。两个逃跑者把热水袋装满水，带着自己的储备品钻进探井，然后爬到顶上，拆掉铁篦子爬出去了。这个出口离岗楼虽不远，但已经在隔离区之外了。他们悄悄地跑掉了，没有被发现。

他们从杰兹卡兹甘通过草原朝西北方向走。白天躺在地上，夜间赶路。哪里也没有找到水。一个星期之后杜舍奇金躺在地上不想再起来了。库德拉用希望鼓舞他，告诉他前面有几个小山丘，那里可能有水。他们总算挣扎到那里了，可是山丘上的坑里只有稀泥，没有水。这时，杜舍奇金对库德拉说："我反正不能走了。你把我扎死，喝我的血吧！"

道德家们！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决定才是正确的呢？库德拉自己也是两眼直冒金星。杜舍奇金反正活不成了。那为什么让库德拉也渴死呢？……可是，假如他很快就能找到水的话，他今后的一生中想到杜舍奇金时将会怎样呢？……库德拉对杜舍奇金说出了自己的决定：我一个人再往前走走看，假如天亮之前找不到水，再回来使你摆脱这痛苦，总比两个人都死好。库德拉又朝前面的小岗爬去。他看到一道小沟，在这里，就像一些十分不可信的小说里所讲的那样，他发现了水！库德拉滚下去，趴在水边喝呀，喝呀！（只是天亮后他才看见那水里有许多蝌蚪和水草。）他用热水袋装了满满一袋水，又爬回杜舍奇金躺的地方："我给你拿水来了！水！"杜舍奇金不相信。他喝着水，但不相信（因为许多小时以来他一直梦见自己在喝水……）。然后，俩人又一起爬到小沟边，又在那里喝了许久。

喝水之后，感到肚子饿了。但是第二天夜里他们爬过一个山岗，前面就是天国般的山谷地带：有河流、有青草、树丛、马群、生气盎然。天黑之后，库德拉悄悄走近马群，刺死一匹马。两人从马的伤口处直接吸吮马血。（保卫和平的卫士们！你们那一年正

在维也纳或斯德哥尔摩召开喧嚣的保卫和平大会，正用麦秆吸着鸡尾酒！你们中间有善于作诗的吉洪诺夫，还有擅长新闻特写的爱伦堡，可是，你们当时可曾想到，吉洪诺夫和爱伦堡的祖国同胞正在吸吮死马的尸体？他们是否曾向你们解释；按照苏维埃的方式，和平是应该这样来理解的吗？）

库德拉和杜舍奇金点起火来烧马肉吃。这样，走了很久。步行绕过了图尔盖台地的阿曼戈尔德山；但走上大路后，遇到了卡车，上面的哈萨克人曾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并威胁说要把他们送交警察局。

再往前走，他们时常遇到小河和小湖。这时库德拉又抓到一只羊，宰吃了。他们逃出来已经一个月了！十月即将过去，天气渐渐冷起来。他们经过第一片大树林时看到一间没人住的土坯屋，就在这里住下了：他们不想再离开这个富足的地方。因为家乡并不吸引他们，并没有给予他们安静生活的希望，所以他们的逃跑没有最终目的地。这种情况下的逃跑是注定要失败的。

晚上，他们常常摸到附近村庄里，有时偷一口锅，有时撬开人家仓库的锁拿走一些面粉和盐，偷走一把斧头和几个盘碗之类（逃跑者就像游击队员，在一般和平生活中必然很快地成为窃贼……）。有一次他们从村里偷走一条牛，拉到树林里宰了。可是，这时下了一场雪，他们本应躲在屋里不出来，以免被人发现脚印。但是库德拉想出去弄点干柴。他刚出屋就被护林员发现了，立即开枪打他。“是你们呀，小偷？是你们偷走了牛？”在土屋旁边发现了血迹。他们被带到村子里，锁在屋里。人们叫喊着：马上打死他们！留他们干什么？！但是区里来的检察官带来了全国通缉犯的照片，对村里人宣布说：“你们是好样儿的！你们抓住的不是小偷，是两个大政治土匪！”

于是，情景骤然改观了：周围的人谁也不再喊叫。牛的失主是个车臣人，是由高加索迁移来的。他反而给被抓住的人送来了

面包、羊肉，甚至还有车臣人大家凑的钱。他说：

“唉，真是的！你要是早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车臣人就是这样。）库德拉被感动得哭起来。经过这许多年残酷无情的生活之后，心灵已经受不住这种同情了。

两个人被押到库斯塔奈镇，在这里，在铁路局的临时羁押室里，士兵们不仅把车臣人送给犯人的东西全部拿走（留下来自己用！），而且没有给他们吃饭。（考涅楚克大概也没有在世界和平大会上谈这些事吧？）在上火车之前，把库德拉和杜舍奇金的手反铐在背后，让他们跪在库斯塔奈火车站的月台上，供旅客观看。

如果这发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任何一个别的令人满意的城市车站的月台上，旅客们也许会匆匆走过去，谁也不会注意这个像从列宾的画里走出来的、被捆绑着跪在那里的白发老汉。不管是文学书刊出版社的编辑们、进步电影的导演们，还是人道主义的宣讲士们和军队的军官们，都一样，更不必说那些工会工作人员和党务工作人员了——大家都会头也不转地走过去。至于那些普通人，那些丝毫不突出而又不担任什么负责职务的老百姓，也会尽量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走过去：他们担心警卫人员会盘问，会把他们的姓名记下来。（他们的户口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商店齐全，供应多好啊！可不能拿这个冒险……）（要说在一九四九年，这种现象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难道到了一九六五年不也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和文明的人们会停下脚步在警卫人员面前维护这个戴着手铐跪在地上的白发老人吗？）

但是，这不是莫斯科。库斯塔奈镇的人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他们都是受到憎恨的人，或者是被流放到这里来的。他们朝这两个被捕的人围拢上来，把马合烟、香烟、面包扔给跪着的人。库德拉的两手被铐在背后，只好弯下腰用嘴去啃面包。但是，警卫人员却一脚把面包从他嘴上踢掉了。库德拉倒下去，又跪趴着向前，

想去咬那块面包，卫兵又把它踢得更远！（喂，你们那些进步的电影导演们，是不是能记住这个老人的镜头呀？）这时，周围的老百姓不答应了，他们开始喧闹："放开他们！给他们松开！"开来了一队警察。这一队人当然比群众厉害。群众被驱散了。

火车开来了。两个逃跑者被押回肯吉尔劳改营监狱。

哈萨克斯坦一带发生的逃跑事件，像这里的草原一样千篇一律。但是，或许就在这千篇一律之中更容易理解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吧？

一九五一年。又是在杰兹卡兹甘，又是从矿山，有三个人在夜间通过一条废探井爬出来了。他们跑了三个夜晚。渴得受不住。不远处看到几个哈萨克人的蒙古包。两人建议去哈萨克人那里要点水喝，第三个人，斯捷潘，决定不去，他留在土岗子上观察动静。他看到他的两个同志刚进去不久，就被哈萨克人追出来，当场就被抓住。个子不高、身体瘦小的斯捷潘独自顺着小山沟继续逃跑，除了一把刀子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企图往西北方向走。为了躲避人，常常不得不偏离方向。躲避人比躲避野兽还要紧。他用刀削了一根棍子，用它来打黄鼠和跳鼠吃：他先从远处扔石头打它们，等它们跑回洞口抬起前腿叫的时候，就可以用棍子打死它了。他尽量把血都吸出来，然后用干锦鸡儿草点火把肉烤熟吃。

正是这烤肉的火堆把他出卖了。有一次，斯捷潘看见一个戴着哈萨克大皮帽子的人骑马朝他这边跑来，他急忙踩灭篝火，用干草把他的"烤肉串"盖住：不能让哈萨克人看见他吃什么。哈萨克人来到近前问道：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斯捷潘告诉他：原在杰兹达的锰矿上做工（那里确实有自由工人），现在是去找在国营农场工作的妻子，离这里大约有一百五十公里。哈萨克人问国营农场的名称。斯捷潘说出了一个可能性最大的名称：斯大林国营农场。

草原的儿子啊！你骑马走你自己的路多好呢！？这个穷小子什么地方妨碍了你？但哈萨克骑手却严厉地用蹩脚的俄语对他说："你撒谎！你是坐监牢的！跟我走！"斯捷潘骂了一声，不再理他，起身走自己的路。可是哈萨克人骑着马同他并排走，重复着刚才的命令——跟我走！然后，他骑马跑到旁边去，想看看有没有自己人。但是草原上一个人也没有。草原的儿子啊！你就放了他吧，你不是看见他只拿着一根木棍想在草原上走几百里路吗？他没有吃的，反正是会死于饥渴的。也许你是需要那一公斤茶叶的奖赏吗？

这一个星期以来斯捷潘在草原上和野兽们过着同样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于倾听草原上微小的沙沙声和呼啸声了。忽然，他感到空中有一种新的呼啸声。他不是根据判断，而是本能地感到某种危险的来临，不由得猛地往旁边一跳。这一跳把他救了！原来是哈萨克骑手扔过一条套马索来，想套住他。斯捷潘及时地跳出了圈套。

狩猎两条腿的动物！！要人还是要一公斤茶！？哈萨克人骂了一句，拉回套索。斯捷潘继续往前走，边走边盘算，尽量盯住哈萨克人。那人又催马到近前来了，又准备好了套马索，又掷了出来。就在这一刹那，斯捷潘突然朝他冲去，一棍子把他打下马来。（斯捷潘本来是没有什么力气的，可这是生死关头！）"叫你领赏去，败类！"——斯捷潘的棍子带着无穷的仇恨狠狠地继续打向哈萨克人，就像一只野兽在用牙齿撕裂另一只野兽。直到流出血来，他这才住手。斯捷潘拿了哈萨克人的套马索、鞭子，骑着马走了。马鞍上还拴着一个背包，里面装着食物。

他又继续逃了很久，走了两个星期。但他给自己定下一条严格的规定：到处都要坚决地避开主要的敌人——人，他的同胞们。他已经把马放弃了，渡过了一条河（他不会游泳！他是乘着自己用芦苇做的小筏子渡过的。当然，他原先也不会做筏子）。他猎获

野物吃。有一次夜晚遇到一只类似熊的大兽，好容易才躲开。有一次他腹饥口渴，疲劳不堪，实在想吃点热东西。他看到一个孤零零的蒙古包，决定进去讨点东西吃。蒙古包前有个土坯墙围起的小院。院外门前拴着两匹备好鞍的马。当他看到一个穿军装、马裤、胸戴勋章的年轻哈萨克人正从门里迎面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躲开了。太晚了。那人已走近围墙。斯捷潘心想：完啦！哈萨克人是出来解手的，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一看到斯捷潘，他很高兴，好像根本没注意斯捷潘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快请进去吧！进去吧！你就来作客人吧！"蒙古包中间坐着一位老父亲，还有另一个戴勋章的年轻哈萨克人。这是两兄弟，上过前线，现在在阿拉木图也算得上两个人物了；这次是来看望父亲的（向农庄要了两匹马，骑马来到这蒙古包）。他俩都经历过战争，因此还是人。而且今天喝得大醉。酒醉后的宽厚心情完全占有了他们（伟大的斯大林一直努力铲除的就是这种宽厚态度，但他终究未能完全根除掉）。使他们高兴的是，酒宴上又多了一位客人，尽管是矿山上的普通工人。这个工人说是往奥尔斯克去的，他妻子在那里很快就要临产了。他们并没有要求客人出示证件，而是给他喝酒、吃菜，让他躺下休息。看，竟有这样的事……（对人来说，酗酒什么时候都是件坏事吗？当酗酒能把人身上的某种优秀品质揭示出来的时候，它也不好吗？）

斯捷潘比主人们醒得早；他总担心这里有陷阱。醒后他悄悄溜出来。不，没有陷阱：两匹马仍旧好好地拴在大门口。其实，他满可以骑上其中的一匹逃走，但他也不愿意做这种对不起两个好人的事，还是步行离去了。

他又走了好几天，路上有时可以看到汽车。每当汽车过来的时候，他总是及时地躲到一旁去。他走近铁路线，顺着铁路线走，晚上来到奥尔斯克车站。那就坐火车吧！他胜利了！他创造了奇迹：只带着一把自制小刀和一根木棍就独自一人穿过了辽阔的草

原地带，前面就是目的地！

但是，在车站的灯光下他看到荷枪的士兵在铁路沿线守卫。于是他又沿铁路旁的小道走。第二天早晨他便不再躲躲藏藏了：他已经到了俄罗斯共和国，到了故乡啊！一辆汽车扬着尘土驶来，斯捷潘第一次不再躲避汽车了。从这第一辆没有躲避的故乡的汽车里跳下来一位故乡的民警："你是干什么的？拿出证件来看看！"斯捷潘解释说他是个拖拉机手，正在找工作。正好这时走过来一位农庄主席，对民警说："你别找他的麻烦！我们农庄正缺拖拉机手呢！在乡下谁会带什么证件！"

斯捷潘同农庄主席坐车走了一天，谈妥了工作条件，一起喝酒、吃菜。但是到了傍晚斯捷潘忍不住了，又想跑到二百米以外的树林里去。但是，民警是很利落的：一枪！两枪！只好停下来。他被绑住了。

看来，像是找不到他的踪迹了，人们认为他已经死在草原上。这里的士兵们守候的是另一个人，不是他。民警最初看见他时觉得不像，才同意放他跟农庄主席走的。抓住他之后，把他送到内务部区分局羁押室，起初对他十分客气：给他茶水和夹火腿的面包吃，给他好烟，由分局长亲自审讯而且用"您"称呼他（天知道，这些大间谍明天要被带到莫斯科去，说不定他会告状的）。"您的发报机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小队把您送到这儿来的？"

"小队把我送来？"斯捷潘摸不着头脑，"我没有在地质勘察队干过活。我大部分是在矿山上干活的。"

但是，斯捷潘逃跑的结果并不是吃什么夹肉面包，它甚至比吸尸体的血还要糟糕：他被押回劳改营后，遭到长期的残酷殴打，后来，这个受尽折磨和损害的斯捷潘竟然堕落了，从他原来的状态一落千丈：他向肯吉尔营的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签名保证帮助当局发现企图逃跑的人。他成了一只"诱猎鸟"。他常常把这次逃跑的全部过程详细地讲给同牢房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听，观察并等

待着对方的反映。如果有反映，表现了逃跑的念头，斯捷潘就去向监狱的行动人员汇报。

从特种劳改营的逃跑是惨绝人寰的。这个特点在每一次艰难的逃跑中都有所表现。但它突出而集中地表现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发生的一次没有理智的、血淋淋的逃跑事件上。此事也是发生在杰兹卡兹甘。

六名逃跑者从矿井里开始逃跑的时候，首先把另一个他们认为是眼线的囚犯杀死了。然后六个人从一口废井里爬出去，进入草原。这是六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囚犯。因此，刚逃出来就不想一起跑了。当然，如果他们有一个聪明的计划，分散逃跑也未必不正确。

但是，他们没有计划。其中一人立即跑到离劳改营不远的自由工人村里去找他的女相好。他叫开门，但并不是想在她家里暂时躲一躲，藏在地板下面或天花板上面呆些时候避避风（如果这样，那倒是很聪明的），而是想同她作短暂的欢聚（这就使我们一下子看清了他这个刑事犯的面孔）。他在她家鬼混了一夜和一整天。第二天晚上他竟然穿起她从前的丈夫的衣服，同她一起到俱乐部看电影去了！劳改营看守有的也来看电影，认出了他，当场就把他绑走了。

另外两个格鲁吉亚人轻率而自信地向火车站走去，想乘火车去卡拉干达。但是，从杰兹卡兹甘通往外界的路，除了牧人和逃犯走的小径之外，只有一条去卡拉干达的铁路，铁路沿线有许多劳改营，每个车站上都有行动人员哨所。因此，他们还没到卡拉干达就被抓住了。

其余三人朝西南方向逃走，选了一条最艰苦的路。这里没有人，但也没有水。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乌克兰人，上过前线的普罗科片科，有一张地图，他劝另外二人选择这条路，并且说他能

领他们找到水。两个同伴一个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江湖骗子，另一个原先是小偷，瘦小干瘪。三个人走了四天四夜，没吃没喝。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鞑靼人和小偷对普罗科片科说："我们得和你告别啦！""怎么啦，哥儿们？你们想分开走？"普罗科片科没有立即听懂他们的话。

"不，我们想把你结果掉！反正咱们不能都逃出去。"

普罗科片科苦苦哀求他们，他把帽子撕开，从布夹层里取出他妻子和孩子们的一张照片给他们看，想以此感动他们："哥儿们，哥儿们！咱们可是一起逃出来寻求自由的呀！我一定能把你们领出去。前面不远就应该有一口井！一定会有水！再忍耐一下吧！饶了我吧！可怜可怜我吧！"

但是两个人还是把他捅死了，指望着能喝他的血。他们割断了他的血管，但是血不往外流，立即就凝固了！……

这又是可以拍进纪念影片的一个镜头：两个人在草原上杀死另一个人，血不往外流……

两人彼此像狼一样互相注视着，因为下一回该是他们两人之中的一个要遭殃了。他们互相警惕着向前走去，朝着刚才普罗科片科老头指的方向走去……竟在两个小时之后看到了一口井！……

但是，第二天，搜索队从飞机上发现了他们，抓回去了。

审讯中他们招认出这件事。后来此事在劳改营里传开了，人们决定捅死他们替普罗科片科报仇。但是，劳改营当局把他们关在单独的牢房里，后来又转押到别处去审判。

只好相信命运了。相信你逃跑的成败取决于跑出来时冲了吉星还是凶星。不管你有多么周密而长远的计划，但在关键时刻营区的电灯突然全灭了，因而你就没有弄到汽车以至全部计划落空。而另外的一次逃跑却完全是由于一时冲动开始的，可是偏偏各种

情况都像早已有了巧安排似的。

一九四八年夏天，也是在杰兹卡兹甘的第一分部（当时这里还没有建立特种劳改营），有一天早晨派出一辆自卸卡车到很远的采沙场去拉沙子，把沙子运到灰浆搅拌场去。采沙场不是固定工地，也就是说那里没有专门的警卫人员。只好让三个装车的囚犯也坐车去，随车回来。这三人都是判了长期刑的，有的十年，有的二十五年。押车的三名士兵中有一名上等兵。司机是个解除看管留营劳动的刑事犯。机会！但是，对于机会必须像它突然到来那样迅速而及时地抓住它。他们要下定决心，要互相商量，而且这一切都不得不在押车士兵的眼前和耳边进行。往车上装沙子的时候士兵们就持枪站在旁边。三个囚犯的经历相同，和当时千百万人的经历一样：先是上前线，然后是德国俘虏营，从德国俘虏营里逃跑，又被敌人抓回去，关进惩戒集中营，战争结束了，他们被从集中营里放出来，接着，为了对这一切表示感谢，苏联当局把他们关进了“自己人的”监狱！既然当年在德国都敢逃跑，为什么今天在自己国家里不敢逃跑呢？一车沙子装好了。上等兵坐到驾驶室的司机旁边的坐位上。两名冲锋枪手坐在车箱前部，背靠驾驶室，面向车后，持枪对准坐在车箱后部沙子上的囚犯。汽车刚开离采沙场，三名囚犯一个暗号同时向两名押解兵的眼里扔沙子，随即扑倒在他们身上，夺下冲锋枪，从驾驶室的后窗口用枪托一下子就把上等兵打昏了。汽车停住了。司机吓得要死。囚犯们对司机说：“别怕！我们不会动你！你不是他们的狗腿子吧！？快卸车！”马达开动了，转眼间一车沙子，比黄金还宝贵的、给三个人带来自由的沙子，卸在地上。

就在这个时候，也像几乎所有逃跑中的情况一样（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一点吧！），奴隶们表现得远比押解人员宽宏大量：他们没有枪毙三个士兵，没有殴打他们，只命令他们把衣服和靴子脱下来，就放他们光着脚、穿着内衣走掉了。“你呢，司机？你跟谁

走?”“当然跟你们走，那还用说!”司机也立即下了决心。

为了迷惑三个光脚押解兵，囚犯们（他们将为这宽宏大量付出代价!）先把车往西开（平坦的草原，随便往哪里开都行!）。路上，一个人穿上等兵的制服，另两人换上普通士兵制服，然后驱车向北方驶去。三人都有武器，司机有驾驶证，有什么可怀疑的!尽管如此，路过电话线的时候还是要把电话线弄断，以便切断他们的联系（把车开到近前，用绳子拴一块小石头扔过去，搭在电线上，拉绳子，把钩子带上去，拉断电线）。这当然要花费时间，但是值得。汽车全速开了一整天，直到跑完三百公里，汽油耗尽才停下来。于是他们注意从对面来的车。一辆“胜利牌”小卧车开过来了。他们把车叫住。“对不起，同志，职务在身嘛，我们得检查一下您的证件。”原来是两位要人!区党委的领导!去农庄检查工作或是去给农庄鼓舞士气的，也许只是想去好好吃上一顿。“喂，出来吧!把衣服脱了!”要人们苦苦哀求，生怕打死他们。把这两个只穿内衣的人带进了草原，绑起来，拿了他们的证件、钱和衣服，乘上“胜利牌”轿车，开走了。（上午被扒掉制服的士兵一直到傍晚才走到就近的矿场。矿场的岗楼上对他们喊:“不许靠近!”“我们是自己人!”“只穿一件内衣，什么自己人!”）

“胜利牌”汽车的油箱不满，连备用油罐也用上总共走了二百公里就完了。天已经黑下来。他们看到放牧的马群，虽然没有笼头，却也成功地抓住几匹，抓住马鬃，骑上去，继续逃跑。但是，司机却从马背上掉下来摔伤了腿。三人建议他坐到后面，两人骑一匹马，带他走。但是，他拒绝了。他说:“朋友们，你们不必怕。我绝不会去报告!”他们给了他一些钱和“胜利牌”汽车的驾驶证，骑马走了。这位司机就是看到这几个逃犯的最后一个人，从那以后谁也再没有见过他们!而且一直也没有被送回劳改营。他们几个人就这样把自己的“二十五元券”和“十元券”统统留在特别处的保险柜里，没有找零钱，就头也不回地跑掉了。乳臭未干的

检察官们向来就喜欢勇敢的人！

那个司机确实没有去报告。他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的农庄里找到了工作，安静地度过了四年。但是，艺术爱好把他毁了。他会拉俄式手风琴，拉得很好，常在自己农庄的俱乐部里演出，后来他参加了全区文娱会演，后来又去参加全州会演。他自己也几乎忘掉过去的生活了。但是，观众里有一个杰兹卡兹甘的看守，认出了他，当场在后台就把他抓走了。按第五十八条又判了他二十五年，把他押回了杰兹卡兹甘。

*　　　*　　　*

也还有另外一类逃跑者。这类人不是凭一时冲动和绝望的拚死心情而逃，而是凭技术，凭一双灵巧的手逃跑。

肯吉尔营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利用火车车辆的逃跑。有一个工地上经常开来运水泥和石棉矿石的货车。把货物卸在隔离区，开走空车。于是，有五个囚犯便开始准备一次靠技术的逃跑。他们要在普尔门式货车车辆的车帮里面再装上一层木板车帮，人可以藏在中间。这层车帮要用合叶作成折叠式的，像屏风一样，把它拿上火车时看去像是一块为了卸车用的搭板。一切都计划得十分周密：卸货的时候，担任卸货劳动的囚犯就是车辆的主人了，那时可以把准备好的东西拿进车箱，把它拉开，用卡子固定在硬车帮上，五个人背靠车帮站好，用绳子把假车帮拉起来，固定住。车箱里满是石棉粉，假车帮上也是石棉粉。至于这节普尔门车辆在纵深上会稍微短一点，这从远处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在时间计算上比较复杂：车辆必须在火车开走之前卸空，这时候囚犯们要仍旧留在工地上，不能提前上车，等到确信马上要开车时才能上去。他们就在这最后一刻拿着刀子和食物跑过去了，可是，这时其中一个人的脚给铁路道岔卡住骨折了。这耽误了大家的时间，他们未能在押解人员集合点名之前把假车帮安装好。他们被发现了。

后来对这一逃跑事件进行了公审。①

曾在空军学院学习过的巴塔诺夫也试验过类似的方法，不过他是一个人单独干的。埃克巴斯图兹的木材加工厂制作房门，这些预制的房门从工厂用卡车运到工地去安装。木材加工厂的工作是昼夜不停的，因此，岗楼上始终有警卫。但是工地上只是白天有警卫，晚上就撤掉。巴塔诺夫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被装在一捆门框里，两面用门板钉起来，装上汽车，卸在工地上。在木材加工厂里，趁着交接班时的混乱混过了查点人数这一关。所以当天晚上没有发现有人逃跑。在工地上，他夜间从门框里爬出来，逃跑了。但他在去巴夫洛达的路上又被捉回来。（这次逃跑是在他上次逃跑一年之后，他上次坐汽车逃跑时轮胎被打穿了。）

逃跑而被捉回的人和逃跑前被察觉的人；参与过那些使整个劳改营的土地燃烧起来的事件的人；由于行动人员的深思熟虑而受到特别监视的人；拒绝服从命令的人；还有其他各种不驯服的人——所有这些人使得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里的加强管制棚不断地扩大、再扩大。新建的两厢砖房已经容纳不下了，惩戒室（距营部不远的第二号工棚）也容纳不下了。又新开辟了一个惩戒室（第八号工棚），它是特别为“班杰拉分子”建立的。

每发生一次逃跑、每发生一次骚乱事件，三个惩戒棚的制度都要变得更加严厉一些。（为了忠实地反映刑事惯犯们的历史，这里应该指出：埃克巴斯图兹加强管制棚里的“母狗”们对此是十分不满的，他们经常嘀咕：“坏蛋们！别再逃跑吧！因为你们逃跑，我们都快要被这严厉的制度给卡死啦！……在一般劳改营里，这种事只打几个嘴巴就了事了。”这些话也正是监狱当局希望他们说

① 我在塔什干肿瘤防治所时，同病房的一位乌兹别克人病友担任过押解队员。他对我谈起过这次逃跑，他说是逃成功了，他甚至还表示称赞。

的。)

一九五一年夏天,整个第八号工棚惩戒室在计划集体逃跑。这个工棚距营区障碍地带只有三十米远,所以他们决定挖地道。但是,他们干得太明显,几个小伙子在自己人中间公开议论、商量。他们以为,既然大家都是“班杰拉分子”,就不会有眼线。实际上却早已有人当了眼线。他们那不像样子的地道刚挖了几米,就被出卖了。

第二号工棚惩戒室的领袖人物对于八号工棚的吵吵嚷嚷的逃跑计划十分不满。倒不是怕暴露之后加强管制,而是因为自己也离障碍地带三十米,也正在挖一个高质量的地道,而且在八号工棚开挖前就开始了。他们担心:既然两个惩戒室都想到了挖地道,那么猎犬们也会想到这一点并且会开始检查。但埃克巴斯图兹营的主人们最怕的还是抢汽车逃跑,所以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这方面的防范上,决心把所有的工地和生活区全用一米深的地沟围起来,使任何汽车都通不过,就像中世纪嫌城墙不够,还要挖护城河一样。这些日子囚犯们已经在工地和隔离区周围挖出了一条条整齐的地沟。

第二号惩戒工棚是在整个埃克巴斯图兹隔离区内部又用铁丝网圈起来的一个小区。铁丝网围墙上的小门经常锁着。除了在石灰场劳动的时间之外,这里的囚犯每天只有二十分钟可以在小区内活动,其余时间全被关在工棚里,只有去上工和回来时才通过大营区;他们不能到大食堂去吃饭,饭由炊事员用木桶给他们送来。

惩戒室的囚犯把去石灰场只看作晒太阳和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谁也不去用力铲那有害健康的石灰。一九五一年八月底发生过一起打死人的事件。(刑事惯犯阿斯帕诺夫用铁棒打死了阿尼金。阿尼金曾经在暴风雪中利用大风旋起的大雪堆爬过铁丝网逃跑过,但一昼夜后又被捉回来,关进了惩戒室。关于他的事已见

第三部第十四章。）从那以后，这里的囚犯更是拒绝当这种“工人”了，因此，整个九月间惩戒室没有人去劳动，实际上等于蹲在监狱里。

这些人中间有不少“坚定不移的逃跑者”，从夏天开始，他们逐渐集结到一起，终于组成了一个“十二人逃跑小组”（哈吉耶夫·穆罕默德，他是埃克巴斯图兹地区伊斯兰教徒的领袖；瓦西里·库斯塔尔尼科夫；瓦西里·布留欣；瓦连京·雷日科夫；穆吉亚诺夫；一个喜欢挖地道的波兰军官及其他几个人）。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其中库班的哥萨克人斯捷潘·科诺瓦洛夫还是居于主要地位。他们订了盟约：谁要是泄露哪怕一个字，谁就别想活，或者自己自杀，或者别人把他捅死。

这时候，整个埃克巴斯图兹营区已经被四米高的围墙围得严严实实。顺着围墙还有一条四米宽的耕翻过的前沿地带，墙外还有一条十五米宽的隔离禁区，最后是一条一米深的沟。逃跑者们决定使地道通过这整个障碍地带，而且要把地道挖得十分可靠，让谁也不能提前发现它。

初步调查表明：房子的基础较低，整个工棚的地板下面的空间很小，挖出的土没有地方放。看来，这个困难很难克服。那么，就不逃跑？……于是有人提议：天花板上面有很大的空间，把土弄到天花板上去！通过无法隐蔽的、经常受到检查的工棚的居住空间偷偷把几十立方米的土运到天花板上的顶楼去？每日每时都要这样往上运，还不能掉下来一点点，不能留下痕迹？这似乎不可想象！

但是，一旦想出了解决办法，人们欢呼起来了。只有这时才算把逃跑计划最后确定下来。解决办法是在分小组选择住房的同时找到的。这座按芬兰式建筑的工棚原本是为自由工人们建造的宿舍，把它合并到劳改营营区内是个错误，整个营区再没有第二栋这样房子了：工棚里分成一个个小房间，而这种房间又不像其

他房间那样可以塞进七个“小车厢”，而只能摆三个，也就是说只能住十二个人。十二名逃跑者中有几个人是住在同一房间里的，于是逃跑者也就选中这一间作为基地。他们通过各种手段——通过自愿换床位或者用玩笑或嘲笑来排挤那些碍事的人（“你睡觉打鼾太厉害了……”“你……”理由多得很呢！），慢慢地把“小组”外的人统统挤到别的房间去了，十二个“自己人”终于集中到这间屋里。

惩戒室与一般营区隔绝得越是严格，惩戒室里的人受到的惩罚和压迫越是厉害，这些人在整个营区中的精神作用力也就越大。对全营的囚犯来说，惩戒室的人要求定制一件什么东西，那就像是传下一道圣旨。现在，凡是技术上需要的东西都可以订货，这些东西会在某个工地上制作出来，会冒险通过营门口的搜查带进隔离区，然后再冒着第二次危险（放在烂菜汤里，面包里，或者放在药品箱里）带进惩戒室里。

他们首先定制和得到的是刀子和磨刀石。然后又要来了钉子、小螺丝、油石灰、水泥、白粉子、电线、小滑轮。他们用小刀整齐地锯断了三块地板木条上的阴榫，取下了一块压住这几条地板的护墙板，拔掉这几条木板两端（靠墙的一端和搭在房间中部地板横梁上的一端）的钉子，就把这三块板掀了起来。然后，在它们朝下的一面用小木条把三块板拼起来钉成一个整块托板。在其靠墙的一端，钉小木条的钉子中有一颗大钉子是从上向下钉的，但没有把它钉到底，稍稍留一点钉子帽，把这个钉子帽用地板颜色的灰腻子填腻上，再弄上一点尘土。把这整块托板放回原处，它就仍然非常严密地和整个地板合在一起，没有一点缝和损伤，也没有可以把它拿起来的地方，因为从来没有在板缝处使用过刀斧之类。然后再把护墙板放回原处，压住这块板。取下这块托板的方法是：先把那块活动的护墙板拿掉，用一个铁丝圈套住大钉子帽，把托板拉起来。这就是地道入口。进入地下挖土的人每次换

班都要把护墙板取下来再装回去。他们每天要"擦地板"（为的是使地板保持湿润膨胀，不出现干裂缝）。这个进入地下的任务是主要任务之一。总的说来，他们这个房间一直收拾得非常干净整齐，从来没有人穿着鞋躺在床上，也没有人吸烟，个人的东西从不乱放，床头小柜里也没有碎屑残渣之类。因此，每次来检查内务的看守都是在这个房间停留的时间最短。"搞得好，有文化！"看守们一边这样说着，就去检查下一间了。

第二个任务是土的提升工作：要把挖出的土提到天花板上面去。这个房间里，也和其他房间一样，有一个砖砌的俄式大火炉，它和墙之间有一条空隙，可以挤进一个人去。想出的办法是：把这个空间封死，把它从居住空间变为坑道的一部分。他们在一间空房里干净彻底地拆卸了一个"小车厢"床，用拆下的木板把这个空间的开口封死，立即钉上灰板条，抹上灰泥，刷成和炉子一样的白色。看守们难道会记住工棚里二十个小房间中哪一间的炉子和墙连在一起，哪一间的炉子稍微离开墙一点吗？空房里的"小车厢"少了一张也没有被发现，因为人们拆得干净利落，毫不露马脚。只是在头一两天中，看守有可能发现墙上的灰泥是湿的。但是，要发现这一点，他就得绕过炉子弯腰到床后去看。这间屋子是清洁整齐的模范呀，何必呢！即使被他看出来，这还不等于全部坑道计划的暴露，可以推说：这是为了使房间整洁美观，那个没有用的空隙经常落灰，又很不好看！

灰泥都干了之后，这才用刀子把已经封死的这个空间的地板和天花板剜掉。在这里，又用拆床的木料装了一个梯子。这样，狭小的地板下面的空间就同天花板上宽敞的空间连在一起了，像是一口看守们看不到的竖井。它也是多年来第一口能够使那些刚强的男子汉们心甘情愿地在里面拼命劳动的竖井！

劳改营中也会有同梦想结合在一起的工作吗？会有把你的整个身心都吸引住的、使你废寝忘食地去干的工作吗？有。这样的

工作只有一件，那就是为了逃跑而进行的准备工作!!

下一个任务就是挖土。用刀子挖，磨刀子，这是勿须多说的。但还有不少别的问题。这里还需要进行矿山测量学的计算（这由工程师穆吉亚诺夫担任），既要到达安全深度，但又不要超过需要的深度；要使坑道的走向符合最短距离；要确定坑道的最合理的截面；要随时知道自己处在什么地方；要正确地规划好坑道出口。还有换班的组织工作：每天挖土的时间越多越好，又不能换班太勤；还要毫无破绽地全员按时接受早晚两次点名。这里还有个劳动服装问题，洗手洗脸问题。（总不能带着一身泥土到上面来接受点名吧!）也有照明问题：一条六十米长的坑道怎么能在完全黑暗中挖成呢？他们把电线拉入地下坑道。（还得在不被发觉的情况下接通才行!）也还需要安装信号装置：如果有人突然向工棚这边走来的话，怎样才能及时地从长长的、不透气的坑道里把挖土的人叫上来呢？或者，坑道里的人怎样才能安全而及时地通知上面他们必须立即上来呢？

惩戒室的制度很严格，但严格也有它的弱点：看守们不可能悄悄地突然进入工棚，他们必须通过铁丝网之间的唯一道路走近工棚外的栅栏门，打开门上的锁，然后走到工棚的门，再打开锁。拉开门上的铁栓时也要有响声。这一切都可以从小窗户里观察到，不过不是从自己屋里的窗户，而是从门口附近的一间空“单间”的小窗里可以看到；在那里设一个“观察哨”就行了。坑道里使用灯光信号：闪两下——注意，准备退出坑道；连续闪光——紧急警报！火速出来！

进入坑道时把衣服全脱光，脱下的衣服放到枕头和床垫下面。进入地板下的地道口之后，要通过一条狭窄的裂缝似的小道，谁也不会想到前面就有一间宽敞的“小屋”，这里的灯经常亮着，备有工作服和裤子。另外四个光着身子沾满泥土的人（换班下来的）爬上来，仔细地在这里洗掉身上的泥土（泥土在汗毛上结成

小泥球，需要把它泡软，或者就连汗毛一起扯下来)。

第八号惩戒棚挖地道的事被发觉时，第二号惩戒棚的上述工作已经进行一些时候了。所以，不难理解这些创造家们当时多么担心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那可太遗憾了，甚至是屈辱。幸而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了。

九月初，滕诺和日丹诺克在监狱里蹲了将近一年之后又被送到(实际上是回到)这二号惩戒室来。在这里刚刚喘了一口气，滕诺就又开始不安分了：他需要准备新的逃跑！他指责人们说，目前这个最好的逃跑时期很快就会过去，不能总是无所作为地呆着！但是，那些坚定不移、不顾一切的逃跑者们对于他的话却毫无反映(挖地道的人正好十二个，分成三班，不需要第十三个人)。这时滕诺便直接向他们提出了挖地道的建议！但是，人们回答说：考虑过了，但基础太低。(盯着这个久经考验的逃跑者的探索的眼睛硬是摇头说"不"，这自然是冷酷的。简直就像不允许一只受过训练的伶俐的猎犬去搜索猎物一样。)但是，滕诺太了解这些人了，他不能相信他们这种普遍的冷漠态度，他认为这些人不可能全都一样地堕落了！

于是滕诺和日丹诺克便开始对他们进行热心而内行的观察，这种内行的观察是看守们办不到的。滕诺发现：他们几个人经常到门口的同一间小屋里去吸烟，而且总是一个出来，另一个再进去，从没有结伴去过；白天他们的房门总是从里面插上的，别人叫门时从不立即开门；屋里总有几个人在熟睡，好像夜晚还睡不够似的；有一次，他看见瓦西里·布留欣从放马桶的地方转出来，全身是湿的。"你怎么啦?""噢，我刚才洗了洗身子。"

他们是在挖掘，很明显，一定在挖掘！但是，在哪儿？为什么不说？……滕诺找这个人谈，找那个人谈，试探他们："你们太不谨慎啦，朋友们！你们这个挖法可不够谨慎！还好，是我看出来了，要是叫眼线发现了呢?!"

终于，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接受滕诺带领的四人小组参加进来。首先，他们建议滕诺对房间进行检查，发现痕迹。滕诺检查了每一块地板和墙，竟什么也没有发现！大家都十分满意。于是滕诺就高高兴兴地又开始为自己劳动了。

地下的劳动是这样组织的：一个人躺着凿掉工作面上的土；另一人在他后面弯着腰把凿下的土扒进特制的帆布小口袋；第三个人把绳子套在两肩上拉着小口袋往回爬行，通过坑道和地板下面拉到"竖井"下口，在这里把小口袋一个一个地挂在从天花板上系下来的钩子上，第四个人在天花板上把空口袋放下去，把装上的口袋拉上来，轻轻地在天花板上把土撒成薄薄的一层。每次换班之前都要用炉渣把新土盖上，天花板上的顶间里有的是炉渣。每班内部的分工也变动，但不常变，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迅速而高效率地完成最累最重的挖土和运土工作。

运土时，起初是一次拉两个口袋，后来从炊事员那里"抄"来一只木托盘，把土口袋放在托盘上，这样就可以一次拉四个口袋了。绳子从颈后绕到胸前经过两腋下拉着身后的托盘。后颈的皮磨破了，两肩两膝酸痛，拉一趟就满身是汗，作完一班下来，简直累死人。

挖土时的姿势非常不方便。只有一把短柄铁锹，每天都要磨。先要用它挖出一道一尺左右深的竖沟，然后半躺半卧地背靠着挖出的土，铲下土块来扔到身后。地下有时是石头，有时是粘土。遇到非常大的石头就只好绕过去，使地道拐弯。每八至十小时换一次班，每班挖不到两米，有时连一米也挖不到。

最困难的是坑道里空气不够：人们头晕、恶心，甚至失去知觉。必须解决通风问题。通风孔只能通向地面，打在障碍地带附近，也就是打在最危险的、经常处于观察下的地带。但是，没有通风孔不行，简直无法呼吸。他们定做了一块"螺旋桨"式的钢片，装上横把，做成像手摇钻似的东西，就用它从下面向上挖出

了一个通到地面的垂直孔道。可以通风了，呼吸轻快多了。（地道通过障碍地带之后，他们又在外面挖了第二个通风孔。）

哪一项工作怎样作才更好？他们不断总结经验。随时计算着地道的进度。

地道，或曰隧道，穿过带状地基之后渐渐向外直伸出去。只是遇到大石头或工作面不准确时稍微出现些弯曲。地道宽半米，高九十公分，顶是拱券形的。根据计划，顶面距地面为一米三、四十公分。地道两旁用木板加固。随着工程的进展，在地道里拉的电线也越来越长，接上的新灯泡已不只一个了。

顺着地道看去，它像一条地下铁道。这是劳改营内的“地铁”！……

地道已经挖成几十米了，已经挖到了障碍地带以外。头顶上有时可以清楚地听到换岗哨兵的脚步声，军犬的叫声。

可是，突然……突然一天早点名之后，他们看到监狱首长、短小精悍的马切霍夫斯基中尉亲自带领一群看守朝惩戒室这边走来了。这时白班的四个人还没有进入地道，屋里倒是没有可指摘的地方。（这是逃跑者严格规定的。）逃跑者们的心一下子就凉了：被发现了吗？被谁出卖了吗？或者只是临时抽查？

一声命令：

“各自带着自己的东西，全到工棚外边来！一个也不许留！”

命令执行了。所有囚犯都被赶出来，集合在放风的小院里，坐在各自的布口袋上。只听见工棚里面一片响声——看守们在扔下“小车箱”上的木板。又听见马切霍夫斯基喊道：

“拿工具来！”

看守们把铁棍、斧头等拿进去。听见用力拆卸木板的声音。

逃跑者的命运就是这样的！用了多少智慧，花了多少劳动，寄托了多少希望和经历了多少兴奋的日夜啊！——一下子，不但全成泡影，还得蹲禁闭，遭毒打、审讯，再判新刑期……

但是，不！不论是马切霍夫斯基，还是看守们，谁也没有幸灾乐祸地挥着手高兴地跑出来。他们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掸落着身上的尘土，灰溜溜、气呼呼地从工棚里出来了：搜查毫无结果。“给我一个一个走过来！”——又下达了一个气急败坏的命令。开始一个人一个人地检查个人的物品了。囚犯们经过搜查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是一场大破坏！好几个地方（凡是钉得不牢或者有个小缝的地方）的地板都被撬起来了。各个小房间里的东西扔得乱七八糟，有些床被恶狠狠地翻过来。只是逃跑者这间有文化的房间没有遭到破坏！

不了解逃跑情况的人们气愤地说：

“这些兔崽子们怎么就坐不住呢?！他们搜什么?”

逃跑者们则庆幸自己没有把挖出的土撒在地板下面该是多么正确，否则这次肯定会被发现。看守们并没有到天花板上的顶楼去搜查（只有鸟儿才能够从顶楼上飞走！），何况顶楼上的新土也全都用炉渣盖得好好的。

猎犬们没有嗅到！没有嗅到！啊，多么高兴！只要顽强地劳动，严格地谨慎小心，就不可能没有成果。这回一定可以挖成功了！距离障碍地带外围的防护壕只有六米到八米了（最后这几米必须挖得十分准确，必须使洞口不高不低正对准壕沟的底部）。

然后怎么办？这个问题科诺瓦洛夫、穆吉亚诺夫、哈吉耶夫和滕诺四个人这时已经计划好了，并且已由十六人全体通过。决定晚上十点来钟，在全营晚点名结束之后逃跑。那时看守们都各自回家或回到自己的工棚里去了，岗楼上的哨兵已经换岗，下岗的哨兵也已经离去了。

到那时全员一个一个地进入地道。最后一人要在“小窗口”对营区进行监视。然而他要同倒数第二人把抽掉的那块护墙板对好，钉在那块活动地板上，好使人们进入坑道后盖上地板时护墙板正好安在原来的地方。那个还露出一点的大钉帽要拉下来，面定住，

还要在那块地板下面装一个木闩，盖上后从下面关死，好使人们不能再从上面把它拉起来。

还有：逃跑前要把走廊里的一个小窗上的铁格子取下来。这样，早上点名时发现缺少十六个人，看守们就不会立即断定是挖地道逃跑的了，必然会到隔离区的其他部分去找，也会以为是蹲惩戒室的人们去找某个眼线算帐去了。也会到特种营的其他分部去找，认为是跳墙跑到其他分部去了。干净利落！地道不会被发现，窗子下面又没有足迹，十六个人像是让天使带到天上去了！

从地道进入环营壕沟之后，要一个人一个人地沿着沟底爬到离岗楼较远的地方（地道出口离它很近），再一个一个从沟里爬出来上路。每上去四个人就停一会儿，以免引起怀疑，并且可以借这个时间观察一下。（最后一个人还要采取预防措施：他要把事先准备好的抹了泥的木盖子从外面堵在地道出口上，用身体把它靠进洞口，再从外面扔上一些土！这样，第二天早晨从壕沟里也不会发现地道出口的痕迹。）

经过村子的时候，要一组一组地走，还要大声谈笑。如果遇有阻拦，大家合力抵抗，直到动刀子。

总集合地点是铁路道口附近，那里常有许多汽车通过。铁路道口比旁边的马路高，大家趴在附近地上，不会被发现。这个道口修得不很好（逃跑者们平时上工经过这里，看见过），只是随便铺了一些厚木板。所以运煤的汽车和空火车车皮经过这里时都开得很慢。等汽车一过路口，便有两个人举起手来要求汽车停下，从两旁走过去，请求司机捎一段路。晚间汽车上大都只有一个司机。这时立即抽刀抓住司机，强迫他坐到驾驶室中间去。瓦连京·雷日科夫立即掌握方向盘，其他人迅速跳进车厢，向巴夫洛达全速前进！一百三、四十公里的路程，有几个小时就可以达到。快到渡船渡口时，沿河岸往上游开，那里有灌木丛（押送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留意到了），把司机绑起来，放在灌木丛里，扔掉汽车，

坐小船渡过额尔齐斯河，以后就分成小组，各奔前程了。现在正是征购粮食的季节，到处路上都有许多汽车通过。

挖掘工作计划在十月六日完成。在这之前两天，十月四日，两名参加者，滕诺和一个小偷瓦洛佳·克里沃舍因，突然被编到另一批犯人中间去，准备押到其他地方。他们原想要个花招，想法生病，争取留下来。但是行动人员威胁说不服从就给他们戴上手铐，哪怕半死也得押走。他俩担心过分坚持可能引起怀疑，所以也就只好服从了，为了朋友们作出了牺牲。

起初，滕诺执意要加入这个挖地道小组，现在他的愿望完全落空了，他没能成为第十三个人。倒是被他拉进来的、他所庇护的、过于散漫和缺乏自制力的日丹诺克成了第十三名。当初是斯捷潘·科诺瓦洛夫和他的朋友们最后向滕诺让了步，才把秘密告诉他的。

挖掘完成了。出口恰好；穆吉亚诺夫没有计算错。这时下了一场雪。所以他们把行动时间推迟了两天：等地面干一干。

十月九日晚上，一切都按原来的设想准备妥当。第一批四个人是科诺瓦洛夫、雷日科夫、穆吉亚诺夫和他那个经常的技术助手波兰人。

接着就是倒霉的小个子科利亚·日丹诺克爬出坑道进入壕沟了。这时，当然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他听到沟上面不远处有脚步声。他本该沉住气，趴下不动，等人们走过去再往前爬。而他却过分机伶了：他探出头去想看看是什么人在走路？

俗话说得好：跑得快的虱子总是先被篦子梳掉。但他这个“跑得快的虱子”却毁掉了一组逃跑者，毁掉了一组难能可贵地配合得这么好而又计划得这么周密的逃跑者！毁掉了在这次逃跑中交织在一起的十四条漫长而复杂的生活道路！这次逃跑对其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特殊的、使过去和将来都具有意义的重要作用，他们中间每人都有另外一些人——妇女们，子女们以及尚未出世

的孩子们——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们呢！这个"虱子"一抬头，这些人的一切就全都陷入了十八层地狱！

原来，上面走的正是警卫队副队长。他看见了这个"虱子"，喊了一声，开了一枪。于是，他的那些卫兵们，那些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个逃跑计划，因而根本不配同它作斗争的卫兵们，竟然成了抓获这些逃跑者的"大英雄"。而我的读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还在用平尺敲着书页傲然地、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是啊！……可你们为什么不逃跑呢？……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这时，所有逃跑者都已经钻进地道，取下了窗上的铁格子，把护墙板钉好在那块活地板上了。现在他们一个个只好向后爬去，向后！向后！

谁能真正完全理解这绝望的懊恼？理解这对于自己辛勤努力的蔑视？

他们爬回去了，熄灭了地道里的灯，又把走廊窗上的铁格子装上去。不一会儿，整个惩戒工棚里挤满了劳改营的军官，警卫营的军官，卫兵和看守们。开始按档案卡片点名了，然后把所有的囚犯全都赶进了石砌的监狱。

小屋里的坑道入口始终没被找到！（如果一切都能按原来的设想实现，看守们还不知道要寻找多久呢！）不过，他们在日丹诺克"露馅儿"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半堵塞的窟窿。但是，即使顺着地道来到工棚下面，也还弄不清人们究竟是从哪里进入地道的？把挖地道的土藏到哪里去了？

他们只是发现了那个有文化的房间里少了四个人。现在只好狠狠地殴打剩下来的八个人了——殴打便是蠢人探求真实情况的最简单的办法。

现在为什么还要隐瞒它呢？……

后来，当局组织了全体警备人员和看守人员到这个地道里来

参观。埃克巴斯图兹营的负责人马克西缅柯少校还曾在总局的会议上向其他劳改营的负责人夸耀说：

“是啊，我们营里有过地道。是的，那简直是一条地铁！但是，我们呢……我们有高度的警惕性……”

其实，只不过是由于一个“虱子”……

立即响起了警报。已经逃出的四个人自然不能再逃往铁路道口。计划全打乱了！他们跳过大路对面的围墙，进入无人的工区，穿过工区，又跳墙出去，向草原跑去。他们不敢留在村庄里拦汽车，因为村庄里已经布满哨兵了。

就像一年前的滕诺一样，他们立即失去了前进的速度和逃脱的信心。

他们朝东南方向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前进。他们既没有路上吃的食物，也没有力气，因为最后几天为了早些挖通地道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

逃跑的第五天，他们进入一个蒙古包想向哈萨克人要点食物。不出所料，哈萨克人拒绝给东西吃，并且用猎枪向要饭的人开枪。(这难道是草原上放牧人民的传统吗？如果这不是他们的旧传统，那么这个传统是从哪儿来的？……)

斯捷潘·科诺瓦洛夫用刀子对付了猎枪，刺伤哈萨克人，夺了猎枪和食物。他们继续前进。但是，哈萨克人骑马追寻他们，在他们快到额尔齐斯河岸的时候追上了。哈萨克人叫来了行动人员小组。

后来，逃跑者被包围起来，打得血肉模糊。再往后……再往后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现在谁能对我们说，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者们的逃跑也曾遇到过这么多困难，曾是这么缺乏外部支持，曾

处在这样敌意的环境中，被捉住之后曾受到过这样非人的惩罚，那么，就请他给我们举出实例来吧！

给我们举出这样的实例之后，再指责我们没有进行斗争也不迟！

第九章

拿冲锋枪的孩子们

穿黑袖口长大衣的士兵守卫过我们。红军战士守卫过我们。自卫队员守卫过我们。预备队的老兵也守卫过我们。最后，是身强力壮的、出生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没有见过战争的孩子们拿起新式冲锋枪来守卫我们了。

我们与这些孩子们之间只有一条沉默的、死神的纽带联系着：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打死我们中间的任何人。每天早晚两次，各一小时，我们和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一起走路：每天早晨，我们都无精打采地走向我们和他们都不需要去的地方，我们走在路中央，他们走在路两旁；每天傍晚，我们打起精神往回赶路，我们奔向自己的畜圈，他们也奔向自己的畜圈。双方都没有自己的真正的家，所以，这些畜圈也就等于大家的家了。

走路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看他们的短大衣，也不看他们的冲锋枪，那些东西对我们有什么用？可是，他们却始终盯着我们这黑色行列。按照规定，他们是应该总盯住我们的，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命令，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有责任用射击阻止我们的任何未经允许的举动和多跨出的一步。

我们身穿黑色厚棉衣，头戴用“斯大林毛皮”制的灰色棉帽，脚上是歪扭的、不像样子的、已经穿过三期、换过四次底的破毡靴，衣服上缝着一块块号码布。我们这种样子在他们眼里像什么呢？他们怎么能像对待真正的人那样对待我们呢？

我们的样子使人望而生厌。这奇怪吗？不。当局就是有意使我们的样子叫人讨厌的。我们的队伍被武装士兵押解着走在宽阔的街道中央，村庄里的自由居民们，尤其是中小学校的女教师和学生们，从人行道上斜视着我们，目光里充满恐惧。据说他们生怕我们这些可憎的法西斯余孽会突然四散开来，冲垮押解队伍，跑到村里去抢劫、强奸、杀人、放火。像这样一些野兽般的家伙除了干这些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念头。警卫部队正是保护村里人不受我们的侵害的。警卫部队多么高尚啊！在我们建造起来的村庄俱乐部里，警卫部队的中士邀请女教师跳舞的时候完全可以以英雄自居。

这些孩子们从警戒线上，从瞭望塔上，总是在盯着我们。但是，人们却不允许他们对我们有丝毫的了解。只给他们一项权利：不须事先警告即可直接用冲锋枪向我们射击！

唉！假如他们能在傍晚到我们工棚里来看看，坐在床边听听我们的谈话，听听这个老头儿是为什么被关进来的，那位叔叔又是为什么，那么，那些瞭望塔上，那些岗楼上，就不会再有人了。冲锋枪也就不会再射击了。

但是，这个制度的全部力量和狡猾性就在于：这些人与我们之间的死神联系是建立在不了解的基础上的。如果他们对我们表示同情，就会作为背叛祖国的行为而受到惩罚，他们想同我们谈话的愿望本身就等于对神圣誓言的违背。本来嘛，何必同我们谈话呢?！政治指导员不是会在规定的时间同他们进行谈话吗?！政治指导员会把他们所守卫的这些人民敌人的政治情况和精神面貌告诉他们。他会详细地、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这些丑八怪们多么危险，多么有害，给国家造成多大负担（这样就更能诱使他们

拿这些活靶子试试枪法了)。政治指导员有时也会在腋下夹来一大包卷宗，说这是囚犯档案，是特别处只借给他看一晚上的。他会从中抽出一张打字文件来，读读那上面列举的罪行。就凭这些罪行，把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所有炼人炉都用上也不解恨。然后，他会说，这些罪行就是那个修理过电线杆上的电灯的电工干的，或者是那个替某些不谨慎的朋友们做过一个小柜的木匠干的。

政治指导员不会自相矛盾，他也不会失言。他绝不会告诉孩子们这些人被关起来只是因为他们信神，或是因为他们追求真理，主张正义，还有一些人甚至是什么也不因为。

这个制度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在这里，哪个人都不能和另一个人随便交谈，而必须通过军官和政治指导员。

这些孩子们的全部力量则在于他们的无知。

而劳改营的全部力量就在于这些孩子，在于这些戴红肩章的士兵，在于瞭望塔上的杀人凶手和追捕逃跑者的人们。

下面是当时内罗勃拉格的一个警卫人员关于政治指导员的一次训话的回忆："萨穆京中尉是个窄肩膀、身体瘦长的人，脑袋扁平，活像一条蛇。他长得很白，几乎看不出他有眉毛。我们知道他从前经常随便开枪打死人。现在是他给我们上政治课。他用毫无变化的语调说：'你们所看守的这些人民敌人就是法西斯分子，是坏蛋！我们体现祖国的力量和手握惩罚之剑。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应该有任何温情，不应该有任何怜悯！'"

那些一定要朝着倒在地上的逃跑者的头上踢几脚的孩子们，那些从戴着手铐的白发老人口里踢掉面包的孩子们，那些眼看着一个被铐住的逃跑者在满是木刺的车厢里滚来滚去、脸上出血、头被撞破，而丝毫无动于衷的孩子们，就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是啊，他们是祖国的惩罚之剑。

斯大林死后，我这个被永久流放的人曾有些日子躺在塔什干的"自由人"的医院里。忽然，我听到一个乌兹别克族年轻人在

向病友们讲他在军队里服役的情况。他说，他们的部队“是负责看守刽子手和野兽的”。这个乌兹别克人承认，看守人员也吃不饱，因此，他们看到在矿上干活的囚犯领的口粮（当然是指那些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工作的人）只比他们这些执行神圣警卫职务的人的口粮少一点，心里很不舒服。尤其使他生气的是，他们，警卫人员们，还不得不站在瞭望塔上受冻（不错，倒是穿着一直拖到脚后跟的长棉大衣），而人民的敌人们到了工地之后似乎就整天在烤火堆旁呆着（他们即便从岗楼上也能看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或者就在那里整天睡觉（看样子他是当真认为国家对这些敌人太宽厚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机会，使我能用警卫人员的眼光看看劳改营！我问这个乌兹别克年轻人：你看守的是些什么样的坏蛋？你自己同他们谈过话吗？于是，他告诉我，他的这些话全是听政治指导员说的，政治指导员还在政治课堂上给他们读过囚犯的“档案”呢！由此可见，他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以及关于囚犯们成天睡大觉的童话当然也是经过军官点头承认之后才在他头脑中确定下来的。

啊，欺骗这些孩子的人们啊！……你们还不如不生到这个世界上好！……

那个乌兹别克青年还说，内务部的一个普通士兵每月工资是二百三十卢布，（即相当于陆军普通士兵工资的十二倍！国家对他们为什么这样慷慨？是因为这些人担任的职务困难十二倍吗？）而在极北地区的内务部士兵则拿四百卢布，这还是现役军人，即衣食住行全由国家供给的人。

这位青年还讲了一些别的故事。例如，他的一位战友在押解一批囚犯去某处的途中，忽然觉得有一个囚犯像是要逃跑。于是他一拉扳机，一梭子弹飞出，当场打死五名囚犯。因为后来所有警卫人员都证明当时囚犯们排队走得很老实，所以他的这个战友

受到了严厉"惩罚"：为了这五条人命罚他十五天禁闭（当然是在温暖的禁闭室里）！

这一类的事，"群岛"的居民们谁不知道许多，谁不能举出若干件呢？我们在普通劳改营时就发生过多少起啊！有些工地上还没有设置障碍地带，只有警卫人员在四周警戒，形成一条看不见的警戒线。忽然，一声枪响，一名囚犯被打死：据说他是"越过了界线"。其实，也许根本没有越过，因为界线是看不见的。可是，不会有第二个人到近前去检查一下死者的脚究竟越过了没有。大概总是越过了吧，因为这是警卫人员说的，只有他们才注视着界线，囚犯只顾在干活呀！正是那些诚实地一心一意干活而没有注意界线的人才会吃这一颗子弹！在奥泽尔拉格时，有一次囚犯们在诺沃琼卡火车站附近割草。一个囚犯看到两三步外的地方还剩一点草，勤俭的农民的主人翁心情不允许他扔掉这把草：走两步把它也收到草堆里吧——一颗子弹飞来！而开枪的士兵反而因此得到了一个月的奖励休假！

还有过这样的事：某个警卫恨上了某个囚犯（因为囚犯没替他办某件事），他就会找机会报复一枪。有时则纯粹是恶作剧：警卫命令囚犯去拿界线之外的某件东西，囚犯信以为真，但他刚刚走过界线就被一枪打死。或者扔出一支香烟去，"喂，拣起来拿去抽吧！"囚犯是会去拣这支烟的，他就是这种下贱东西。

为什么开枪？常常莫名其妙。例如，在戒备森严的肯吉尔营，有一天，白天，根本没有任何逃跑的迹象。一个叫丽达的西乌克兰姑娘利用劳动空隙洗了一双袜子，拿去晾到障碍地带前沿的斜坡上。这时，瞭望塔上的卫兵立即举枪上肩，一枪就把她打死了。（后来听说那个卫兵仿佛也曾想自杀。）

为什么？带枪的人嘛！一个人拥有打死或不打死另一个人的无限的权力嘛！

而且这里是有利可图的！首长永远会袒护你。从来不会因为

你打死了囚犯而惩罚你。相反，还要鼓励你、奖励你！你开枪开得越早，囚犯刚刚迈出半步你就把他放倒了，这就更能说明你警惕性高嘛！因而奖赏也就越高。补发一个月的工资！给一个月的假期！（是啊，替警戒部队的领导设身处地想想看，如果他这个营里没有这种表明高度警惕性的记录，这算个什么营？！他这个首长还算个什么首长？！要么就是这里的犯人都十分老实？那不就可以削减警卫人员了吗？！一旦建立起来的这种警卫制度本身就要求不断地有人死亡！）

甚至在警卫部队的射手们中间还会形成某种互相竞赛的心理：你打死了一个，得了奖，买了黄油。那我不是也可以打死一个，也领奖去买黄油吗？想回家乡去看望一下自己心爱的姑娘吗？那就朝着这灰色动物中的某个开一枪吧，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月的假期回去一趟。

我们在普通劳改营时早就了解这种情况。但没想到特种劳改营里却有了一些创新：像这位乌兹别克人的朋友那样直接朝队伍开枪，像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奥泽尔营岗楼上发生的事件那样，或者从瞭望塔上直接朝营区开枪。

是啊，他们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这是政治指导员们的工作成果。

一九五三年五月，肯吉尔营的拿冲锋枪的孩子们突然无缘无故地朝着已经回到营门正等待入门前搜查的囚犯队伍打了一梭子弹。当场十六人受伤，但是，假如单是受伤还好！孩子们使用的是早已被所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公约所禁止的爆炸子弹（“炸子儿”）：子弹从身上出去的时候造成一个漏斗状的窟窿，内脏被炸开，下颚骨和肢骨被炸碎。

为什么定要给特种劳改营的警戒部队配备爆炸子弹？这是经谁批准的？这些我们是永远不会知道的……

可是，警卫部队的人们看到在我的小说里囚犯们给他们和看

守起的外号是"鹦鹉"，而且现在这个名词已经被社会所接受，他们简直气得不亦乐乎。不！囚犯们应该爱那些警卫和看守，应该把他们叫做护身天使才对！

这些孩子们当中也有一位没有生气。(不错，他是其中的优秀分子。)他决心维护真理。他叫弗拉季连·扎多尔内，一九三三年生，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曾在内务部军事警戒部队服役，一直在内罗勃拉格担任警卫。他给我写来好几封信，他说：

> "这些年轻人并不是自己要到警卫部队去服役的，他们是被兵役局召去服兵役的，兵役局把他们派到内务部。他们受到射击和警戒放哨的训练。他们受冻，在夜里偷偷哭泣：让内罗勃拉格和它的一切统统见鬼去吧！他们才不需要这些东西呢！因此，不要责怪那些年轻人吧！他们是士兵，是在为祖国而服役；尽管在他们那荒唐而可怕的服役工作中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理解（请问，难道也有一些能够理解的吗？要么就全可理解，要么就全不可理解！——作者注），但是他们是宣过誓的，他们的职务也并不轻松啊。"

他的话诚挚而有理。发人深思。他仿佛竖起了一些木桩子把那些孩子们保护起来了。这些木桩子就是：誓言、为祖国而服役、他们是士兵！

但是，那也应该说：在他们身上做人的一般基础也未免过于薄弱了吧，甚至可以说丝毫没有这种基础，因为它连抵制誓言和政治课的力量都没有。并不是从任何一代人中，也不是从任何一个民族中都能培育出这种孩子们来的。

应该不应该在执行命令的时候相信别人胜于相信自己的良心呢？这难道不是二十世纪的主要问题吗？一个人可以不可以没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观念，而仅仅以铅印命令中或首长口头指示中的

善恶是非为标准？誓言！誓言是以颤抖的声音庄重地宣读过的咒语，它的意义在于保卫人民免遭恶人残害；但是，它却又是多么容易被利用来为恶人服务而反对人民啊！

让我们回忆一下瓦西里·费拉索夫早在一九三七年就打算对他的刽子手说出的话吧：只你一个人有罪！人们在杀人，这只怪你一个人！我的死也全由你一个人负责，你一辈子就记住这句话生活下去吧！世界上如果没有你们这些行刑的刽子手，也就不会有死刑！

如果没有警卫部队，也就不会有劳改营了！

当然，不论当代人还是历史，都不会不看到罪责是有等级的。当然，谁都明白，士兵们的长官应负较大罪责；他们上面的行动特派员的罪责还要大些，发出指令和命令的人罪责更大，而指示别人去发出命令的那些人罪责最大。[1]

但是，射击的、警卫的、端着冲锋枪对准我们的毕竟不是他们，而是这些孩子们！用皮靴向着倒在地上的囚犯头部乱踢的毕竟也是这些孩子们！……

弗拉季连在信中还说：

> "人们向我们的头脑里灌输，强迫我们背诵带'CC'字样的一九四三年条例[2]，即一九四三年制定的绝密的警卫部

---

① 这并不意味着要审判他们。重要的倒是检查一下他们对目前所领的养老金和所住的别墅是否满意。

② 顺便说一下，从前我们对于生活中常见的"cc"（音：埃斯埃斯）这两个发出嘶嘶声的不祥的字母不是太不注意了吗？它从кпсс（苏共）以及苏共党人开始，有时代表这两个字的缩写，有时又代表另外两个字。现在我才知道，却原来还有个"cc"条例。（"cc"在这里表示"完全秘密"，即绝密——译者注）这个条例也像其他一切不可告人的东西一样是"绝密"的。噢，那就是说，制定这个条例的人们原本就明白他们制定的东西多么卑鄙，他们明白这一点，但还是制定了！而且是什么时候制定的呀？是刚刚把斯大林格勒的德国人打退之后的1943年！这条例就是人民获得的又一个胜利果实！

队条例，这个条例的规定十分严酷而可怕。何况我们又是宣了誓的。还有行动人员和政治协理员的监视，还有小汇报和告密。每一个射手也都是建立了个人档案的……被围墙和铁丝网隔开的穿黑棉衣的人们和穿军大衣的人们同样都是被囚禁的人，不过前者是囚禁二十五年，后者是三年而已。”

他这几句话讲得似乎很有力量，他说那些警卫部队的射手们仿佛也是被囚禁在那里的，只不过并非由军事法庭，而是由兵役局囚禁起来的。但是，不对，并不都是“同样”的，因为穿军大衣的人可以用冲锋枪“很出色地”朝着穿黑棉衣的人，甚至朝着他们的人群，扫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

这个弗拉季连还解释说：

“年轻人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当然，也有狭隘、无知、盲目憎恨囚犯的、死认真的人。顺便提一下，在这方面特别卖力气的是那些从少数民族中召集来的新兵——巴什基尔人、布里亚特人、亚库特人。但大多数士兵则是些漠不关心的人。他们只是默默地服从，执行自己的任务，他们最喜欢的是撕月份牌，最盼望的是邮递员送邮件来的时刻。最后，也有一些好小伙子，他们同情囚犯，认为他们是遭到不幸的人。而且，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我们的职务在人民群众中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回家度假时一般都不穿制服。”

弗拉季连还用自己的经历来说明了他的这些想法。这是他做得最成功的地方，尽管像他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其实，弗拉季连之所以被分配到警卫部队，是由于懒惰的特别处的疏忽。他的继父沃伊尼诺原是个老干部，从事工会工作多年，一九三七年被捕。他母亲因此被开除了党籍。他的生父当时

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属下的一个旅长，一九一七年入党的党员，这时他便急忙宣布和前妻以及儿子完全断绝关系（这样他总算勉强保住了党票，但还是丢掉了内务部部队的将军军衔）。[1] 弗拉季连的母亲为了洗刷自己的污点，在战争期间自愿成为供血站的供血者。（没关系，她的血不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可以输用！）弗拉季连本人"从儿童时期就憎恨戴蓝滚边帽子的内务部军人，可是现在这蓝滚边帽子却戴到自己头上了……在我的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印下了那个可怕的夜晚的情景——一些穿着和父亲一样制服的人们粗暴地在我的小床上乱翻乱扔的情景。"他在信中还说：

"我不是个好警卫战士：我同囚犯们讲话，也替他们办事。我有时就把枪放在他们的烤火堆旁，替他们到小卖部去买东西或替他们把信投入邮筒。我想，在独立劳改点里，在普罗梅朱托契娜娅、梅萨柯尔特、帕尔玛等处，人们一定还会记得我弗拉季连这个卫兵的。囚犯作业班班长有一次对我说：'请你留心观察人们，倾听一下他们的苦衷吧，那你就会明白……'而我本来就是把这些政治犯当作自己的爷爷、叔叔和阿姨看待的……我实在厌恶那些军官们。我发牢骚，生气，我对射手们说：'他们才是人民的真正敌人呢！'因为这些事，因为我不服从命令（"怠工"），因为我同囚犯们讲话，他们就开始审查我了……那个细高个子中尉萨穆京……打我嘴巴，因为我不肯签署关于囚犯信件问题的供词，他就用石制吸墨器砸我的手指。我可是个二级拳击手呀，我能玩三十公斤的哑铃！假如这个瘦猴在拳击场上遇到我的话，哼！……

[1] 虽然我们对很多事情早已习惯，但有时还难免感到惊奇：他和妻子早已离婚。妻子再嫁后，她的第二个丈夫被捕了。可是他却要因此急急忙忙同自己的四岁的儿子断绝关系。为什么？他还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属下的一个旅长呢！

但是，当时有两名看守按住了我的胳臂……不过，这个时候审查我的人已经顾不得我了：那正是一九五三年内务部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时候。最后，没有给我判刑，但却给我发了一张无法找到工作的'黑籍证'——上面写明我是根据第四十七条丁项被革职的：'由于极端的无纪律性以及粗暴地破坏内务部条例，被内务部机关革职。'这样，我在警戒营的禁闭室里挨冻和遭受毒打之后，被抛上回家的路……一路上多亏一位获释的作业队长阿尔森照料了我。"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警卫队里的一个军官要想对囚犯们表示一点点宽容的话，他会怎么样？他只能当着士兵的面或者通过士兵才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他要在别人都怀有仇根的情况下这样做。这自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何况，即使他这样做了，也会有人马上去告密。

制度就是这样的！

第十章

营区的土地在燃烧

不，令人惊奇的不是劳改营里没有发生过骚乱和暴动，而是骚乱和暴动毕竟还是发生过。

这些骚乱和暴动，也像我们历史上一切不合人心意的东西那样，也就是说，像占全部历史真实事件的四分之三的事件那样，已经被人们仔细而巧妙地阉割、缝合、修饰、加工过了；骚乱的参加者早已被消灭，聪明的见证人们都吓破了胆，而镇压者写给上级的报告也已被焚毁或隐藏在二十层的保险柜里了。因此，发生在十年或十五年前的这些暴动如今已经变成了神话。(人们说：根本没有存在过什么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这种说法难道还令人奇怪吗？那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了嘛！……)

等到这些事件已经不再会使任何一个活人激动的时候，就有可能允许历史学家们去研究那剩下来的一点点文件了；于是，考古学家们在某个地方用铁锹挖两下，在化验室里烧一点什么东西，到那时，这些暴动的日期、地点、经过概况及其领导人的姓名就会渐渐地清楚了。

那里而也会包括最早爆发的事件，例如，一九四二年一月在

乌斯特乌萨附近的奥施库里耶施工场地发生的雷丘宁事件。据说，雷丘宁原是个自由雇佣人员，还是这个施工场地的主要负责人。他向犯第五十八条的因犯和犯第七条35款的社会异已分子们发出号召，召集起二百名左右志愿者，解除了由自卫队员组成的警卫队的武装，夺取了一些马匹，逃进森林去打游击。后来他们逐渐被消灭。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当局还在借口与“雷丘宁事件”有牵连而逮捕一些毫不相干的人。

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不，那时已经不是我们了！）会了解一九四八年在五〇一工程（修建西瓦亚玛斯卡—萨列哈尔德铁路的工程）工地上发生的神话般的暴动。那次暴动之所以像神话，是因为各个劳改营的人暗地里都谈论它，可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还因为它不是发生在有这种群众基础和情绪的特种劳改营，而是发生在普通劳改营，那里的人是被眼线们所离间、被刑事犯们压倒了的，连他们作为政治犯的权利都受到唾弃，他们甚至不相信囚犯还可能暴动。

据传说，整个事件都是原来的（不久前的）军人发动的。按理，也只能是这样。如果没有这批人，全部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就等于一群没有血肉、没有信念的乌合之众。而这批年轻人（几乎全不到三十岁）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曾是苏军野战部队的军官和士兵；被敌人俘虏过的军官和士兵；以及在弗拉索夫部队、克拉斯诺夫部队或其他民族部队里干过的原被俘人员；当年这些人曾在战壕的两边对峙，互相作战，而今，在这劳改营里，他们被共同遭受的压迫联结在一起。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转战于各条战线的青年人能够很好地运用现代步兵战术，懂得怎样掩蔽和消灭巡逻队，他们到劳改营后还没有被分散开，而且在一九四八年当时他们仍然处在战争的全部惯性支配下，并且保持着自信心。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像他们这样一些年轻人应该整营整营地驯顺地死去？甚至逃跑在他们眼里也是一种不彻底的妥协

办法，有点像单个人的开小差。他们认为应该共同斗争。

一切都考虑好了。由某一个囚犯作业队首先开始了行动。据说为首的叫沃罗宁，他从前是个上校，只有一只眼睛（也有人说他叫沃罗诺夫）。人们还提到一个叫萨库连科的坦克兵上尉。他们打死了警卫人员（当时的警卫人员和现在的恰恰相反，他们不是正规部队士兵，而是后备队，预备兵）。接着便去解放其他几个囚犯作业队。他们攻占了警卫部队驻扎的小村庄，从外部向本劳改营营区发起攻击，解除了瞭望塔卫兵的武装，打开了整个隔离区的大门。（这时立即发生了必然的分裂：隔离区的大门全打开了，但大部囚犯并不向门外跑。囚犯中有些人刑期不长，他们根本没有打算暴动；也有根据所谓"八七"法令和"六四"法令被判十年至十五年的，但他们也不想受到适用第五十八条的判处。囚犯中也有犯第五十八条的，但有些人宁愿忠心耿耿地跪着死去，也不想站起来做人。而那些冲出大门的人也不全是想帮助起义者的；还有一些刑事惯犯，他们立即高高兴兴地跑到自由工人村庄抢劫财物去了。）

起义者们用警卫人员的武器武装了自己（被消灭的警卫人员后来全埋葬在科契马斯基地），他们又攻占了邻近的一个劳改点。然后决定联合起来去攻打相距只有六十公里的沃尔库塔市。但是，谈何容易！空降伞兵部队切断了去沃尔库塔的道路，超低空飞行的强击机向起义者猛烈扫射，他们只有四散溃逃。

然后便是审判、枪毙、判刑二十五年或十年。（顺便也给许多没有参加行动而留在劳改营的人"刷新了"刑期。）

十分明显，从军事上看，他们的起义是毫无希望的。但是，谁能说慢慢地消瘦，慢慢地死去更有希望呢？

其后不久就建立了特种劳改营。大部分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被挑选出来了。但是，这又怎么样呢？

一九四九年在别尔拉格特种劳改营的下阿图里亚赫分部发生

过一次大致相同的事件：解除警卫人员的武装，缴到七八支冲锋枪，从外部向劳改营展开进攻，击溃警卫队，切断电话线，打开劳改营大门。这一次，劳改营里可全是身上佩带号码的、带有烙印的、注定要毁灭而毫无希望的政治犯了。

可是，结果呢？

囚犯们也没有冲向大门……

带头暴动的人固然已经无可丢失，他们变起义为逃跑，分批向梅尔加方向逃去。他们在埃里根—托斯勘附近受到部队和小型坦克的堵截（指挥战役的是谢苗诺夫将军）。

暴动者全被打死①。

记得有个谜语：世界上什么最快？谜底是：思想！

这是对的，但又不对。思想，它有时也很慢，啊！简直慢得很呢！人，人们，社会，对于自己所遭遇的事情，对于自己的真正处境，往往要经过艰难的道路，而且往往是很晚，才能有所认识。

斯大林把犯第五十八条的人赶往特种劳改营的时候，他几乎是在得意地显示自己的权力。本来这些人已经被他十分牢靠地看管起来了，但他却还要施展诡计，想控制得更好。他指望特种劳改营会使这些人更害怕。结果适得其反。

斯大林在世时制定的整个镇压制度的基础，是将心怀不满的人们隔离开；不让这些人彼此见面；不让人们知道总共有多少这样的人；使全体人民（包括心怀不满的人本身）都相信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心怀不满的人，有的只是极个别的心灵空虚、怀恨在心、注定要灭亡的孤独的个人而已。

---

① 我并不坚持认为我关于这些叛乱的叙述完全准确。任何人如能纠正我的错误，我都表示感谢。

但是，在特种劳改营里这些心怀不满的人却成千上万地集在一起了。他们数了数，而且他们明白了：我们这些人的心灵远远不是空虚的，而是具有对生活的崇高认识；这些人对生活的认识远比那些看管和出卖他们的人高尚得多，远比那些极力证明这些人为什么应该烂死在劳改营里的“理论家”们高尚得多。

特种劳改营的这个新情况起初几乎并未引起任何人注意。表面上似乎一切都是普通劳改营的继续。不错，一向构成劳改营体制和管理当局的支柱的刑事犯渐渐不那么神气了。但是，看守们的加倍凶恶和强管棚面积的不断扩大却似乎又补足了这方面的削弱。

可是，有一件事值得注目：随着刑事犯之有所收敛，失盗现象消失了。如今人们已不再用怀疑的目光，而是用亲切的目光看着身旁的人了。我说，朋友们，我们也许确实够得上是……政治犯吧？……

如果是政治犯，那么，躺在床上或坐在小队的火炉旁时，我们之间的谈话不是可以更随便些吗。当然，得瞧瞧周围，看看旁边站的是谁。其实，管他呢；让他听着好啦，反正已经判了二十五年，还能怎么样？

从前，整个劳改营的心理状态是：今天你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反正找不到正义和公理；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而现在，这种心理状态开始消失了。为什么找不到？为什么将来还会如此？……

囚犯作业队里的窃窃私语的内容开始改变了：人们不再谈每人的口粮多少，不再议论烂菜汤，而是谈论一些在外界无法听到的事情，而且这些议论越来越随便，越自由，越大胆了！这时，队长们也突然意识到他的拳头已不再具有左右一切的力量：有些队长的拳头根本就抡不起来了，另外一些队长抡拳头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不那么有力了。有时候队长也会放下架子，坐到旁边来听

一听，跟着说上几句。这样，队里的人便开始把队长也看作自己的伙伴了：他也是自己人！

队长们经常要为各种小问题去生产计划处或会计室：商量给谁减不减口粮，把谁派到什么地方干活等等。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这种新空气、某种朦胧的严肃性、责任感和某种新的意义传染给了在那里工作的杂役们。

那些杂役们（尽管还远远不是全部）也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当年他们到特种劳改营来的时候，曾强烈地希望在这里抢到一个杂役的职位，现在终于抢到手了。那怎么反而不像在普通劳改营那样过得舒服了呢?现在他们不是可以关在小屋里做油焖土豆吃、和其他杂役住在一起、离开那些干活的人吗？不！现在他们认识到：这些并不是主要的。为什么？那么什么是主要的？……他们已经不好意思像在普通劳改营那样夸耀自己怎样吸别人的血，怎样靠别人过活了。杂役——这些看守的帮手们也开始在干活的人们中间交几个朋友，有时竟会把自己的干净新棉衣和别人的脏衣服铺在一起，愉快地同干活的人们躺在一起聊天，度过星期日。

从前，普通劳改营的囚犯可以粗略地分为几大类：杂役和干活的人；普通刑事犯和犯第五十八条的人。现在却不同，分类更复杂、更有趣了：同乡，信仰同一宗教的人，饱经世事的人，有学问的人等等。

劳改营当局是不可能很快发现并理解这种情况的。可是派工员们已经不再带着那一米长的打人木棍，甚至不像从前那样吼叫了。他们现在是和和气气地同队长们讲话，例如：喂，科莫夫，该叫人们上工了吧！（并不是派工员的心灵上起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空气中似乎出现了某种令人不安的新东西。）

但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缓慢的进程。一点点变化要经过多少岁月，多少岁月啊！它比季节的更替还要缓慢。而且这些变化并未波及所有队长和杂役，它只影响了心灵深处多少还保留着一点羞

满了灰土的良心和友爱的那一部分人。而甘心当坏蛋的人仍旧可以顺利地当他的坏蛋。认识上的真正进步，思想上的震动，英勇的向前迈进，还都没有发生。劳改营依然是劳改营，我们照旧受压迫而无可奈何。我们的出路仍旧只有钻过层层铁丝网朝草原逃跑，而他们则是用冲锋枪扫射我们，放出军犬咬我们。

勇敢的思想，不顾一切的思想，逐步前进的思想，这就是要考虑：怎样才能做到不是我们从他们那里逃跑，而是让他们从我们这里逃跑呢？

这个问题一旦被提了出来，一旦有多少人想到了这个问题并把它提了出来，有多少人听到了它，劳改营的逃跑时代也就从此结束，一个骚乱的时代便宣告开始了。

但是，怎样来开始这个时代？从哪里开始？我们已被束缚住，被许多触须缠住，没有行动自由呀！到底该从哪里入手呢？

看来像最简单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很不简单的。早在普通劳改营的时候似乎就已经有人想到过应该把眼线们干掉。那时候也曾有人安排过：从木材垛上滚下一根原木把眼线砸到涨了水的河里去。这类事在这里也不难想到呀！那么，该首先剁掉哪些触须呢？好像大家都知道，但却谁也不真正知道。

突然，有人自杀了。在“第二号”惩戒工棚发现一个人上吊了。（我是根据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情形叙述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的。在其他特种劳改营里，经过情形也大致一样。）劳改营当局并没有感到什么麻烦，把死人从圈套里卸下来，拉出去扔掉完事。

队里的人们却互相传说着：那人是个眼线，不是自己上吊的，是把他吊死的。

警告！

劳改营里有很多卑鄙的家伙，其中吃得最饱、最粗暴、最无耻的要算食堂管理员季莫费·斯某。（我不是要隐瞒他的姓氏，实

在是忘记了。)他甚至有自己的卫队——一伙吃得肥头大耳的炊事员，还豢养了一批家奴，打手，是那些经常在食堂打零工的人。他和这批打手对囚犯们拳打脚踢已是家常便饭了。有一次，他毫无道理地打了一个矮小黝黑的“小鬼”。平常，他打的是谁，他向来是不放在心上的。可是，在特种劳改营里长大的、受到近年来新气氛熏陶的这个“小鬼”可不是普通的孩子，他是个穆斯林。劳改营里有很多穆斯林。这些人可不比普通刑事犯。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在日落前在营区西部把额头贴在地上或高举双手作祈祷（普通劳改营还有人嘲笑他们，这里却没有人笑)。这些伊斯兰教徒有自己的领袖，而且在近来的新气氛中仿佛也组成了自己的代表会议。于是，教徒们作出了决议：报复！

星期日大清早，当那些家伙还赖在热被窝里的时候，被打的“小鬼”和另一个北高加索的印古什族人悄悄潜入了杂役们住的工棚，找到斯某住的房间，两刀子就迅速结果了这个体重足有九十多公斤的家伙。

但是，当时人们还多么不成熟啊！这两个人竟没有企图遮盖一下自己的脸，也根本没想逃跑，而是离开尸体，拿着带血的刀子，怀着已经尽到义务的满意心情，坦然走去向看守自首了。他们将要受到审判。

这都是摸索前进中的探索。这一切在普通劳改营或许也还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堂堂正正的公民却在继续向前探索：这是不是那需要抓住的主要一环啊？是不是就应该通过这一环打断整个锁链？

“打死眼线！”对，就是它，就是这一环！把刀子捅进眼线的心窝！制作刀子，杀死眼线——对，就是它！

现在，当我写到这一章的时候，墙上书橱里的一排排人道主义书籍正在威严地注视着我，它们那灰暗无光的陈旧书脊，像透过薄云闪烁的星光一样，不住地向我投来责难的闪光，似乎在说：

世界上一切东西都不应该用暴力获取！一旦我们拿起剑、刀、枪，我们便会很快地同那些杀害我们的刽子手和暴虐者同流合污了。那就会没有止境……

会没有止境……现在，在这里，在温暖而洁净的屋里，我坐在自己的写字台旁，我也完全同意这一点。

但是，应该自己试试无辜地被判上二十五年刑，身上缝上四块号码布，两手经常要背在身后，早晚两次受到搜身，在劳动中累得筋疲力尽，由于别人的小汇报而被拖进强管制工棚，永远地被踩进泥坑里，……试过这一切之后，从那里，从那个泥坑里，你才会感觉到所有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全部说教统统是那些脑满肠肥的大闲人们的废话！

会没有止境!?……那么会不会有开端？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产生一线希望呢？

被压迫人民得出的结论是：仁慈是无法根绝凶恶的。

眼线们也是人??……劳改营看守们向每个工棚宣读了必须传达到整个彼斯强拉格所有囚犯的恐吓命令：关押女囚犯的某劳改点有两个姑娘（其出生年月表明她们都很年轻）进行了反苏谈话，因此，经过由……组成的法庭判处……

这两个姑娘都是已经判了十年刑的，她们曾躺在床上小声谈心。是哪个死畜生去给她们告密的呢？这个告密的畜生不也是被判了刑的吗？眼线们还算得上什么人?!

没有怀疑了。可是，要开始最初几次打击毕竟不那么容易。

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怎样开始的。（所有特种劳改营里都开始杀人了，甚至关押残废的斯帕斯克营分部也开始了。）我们这里是从杜波夫卡押来一批犯人之后开始的。这批囚犯基本上是西乌克兰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分子”。他们在各地对整个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他们推动了这辆大车。是这批杜波夫卡来的囚犯给我们带来了骚乱的杆菌。

从游击队员的小路上直接被抓到劳改营的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关在杜波夫卡的时候就已经认清了环境。在押囚犯们的冬眠状态和奴隶般驯顺的态度使他们感到惊奇，他们决心自己拿起刀来。

在杜波夫卡，他们的觉醒带来了骚乱、火灾和劳改营的解散。但是，过于自信的、瞎了眼的劳改营主人们（这也难怪，他们已有三十年未曾遇到过任何反抗，已经习惯于无人反抗他们了。）甚至没有想到该把转押到这里来的骚乱者同我们隔离开。他们反而把这批人分编进全营的各个队了。这是普通劳改营采用的办法：把人分散开就可以使抗议的声音湮没掉。但是，在我们这个已经开始自我净化的环境中这种办法却只能有助于火舌尽快地吞噬整个劳改营。

新来的人们跟着各个作业班一起出工，但是他们根本不干活或者只是做做样子，他们躺在有阳光的地方（正是夏天！）小声谈天。这时候，从旁看去，他们很像那些合法地这样做的刑事犯：他们也同样年轻、养得很好、身体健壮。

但是有一条法规越来越清楚了，不过这是一条新的、令人吃惊的法规："谁泯灭了天良，谁今夜去见阎王！"

如今，杀人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比逃跑最多时期的逃跑还要频繁。这些谋杀事件的作案者都很有把握，而且做得神不知鬼不晓：谁也不拿着带血的刀子去自首。人们保存着自己的生命和刀子还要去做别的事呢！他们最喜欢的时刻是清晨五点钟，每天这时候看守们便来打开工棚的大门，打开之后走去开下一个工棚，这时囚犯们几乎还全在睡觉。于是戴着面具的复仇者便悄悄溜进早已看准的房间，走近那张早已看好的床，准确而万无一失地杀死那个已经醒来并尖声嚎叫的或者尚在睡梦中的告密者。在确信他已经死去之后，复仇者们才庄重大方地离去。

他们是戴着面具的。看不见他们衣服上的号码，号码布撕掉

或者盖起来了。但是，即使被杀者旁边床上的人根据体形或面部轮廓认出了是谁，他们非但不会急于主动去报告，而且在审讯时，甚至在监狱“教父”的威胁之下，也不会投降，他们会坚持说：“不，不，我不知道，我没看见！”而且这已经不单纯是根据那条为一切被压迫人民所掌握的古老真理——“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在行事了，这也是在保全自己！因为谁要是说出来，谁也就会在下一个早晨五点钟去见阎王；行动特派员对他表示的好感丝毫也帮不了他的忙。

这样，杀人（虽然才发生了不到十起）便成了一种常规，成了一种通常现象。囚犯们早晨去洗脸和领早饭时往往互相打听：今天又干掉了谁？在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体育项目中，囚犯的耳朵听到了在地下擂起的正义的战鼓声。

这事是完全秘密进行的。只要某个人（一个公认的权威人士）在某处向某人提出一个名字：干掉这个家伙！至于由谁去干，哪一天干，从哪里弄到刀子，这些他就不必管了。至于管这些事的战斗队员们，他们也只知道自己必须执行法官的判决，但不知道法官是谁。

必须承认，在眼线们并无正式文件任命的情况下，这个没有建制的、不合法的、无形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却远比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法庭、三人小组、军事审判庭和特别庭所作的判决要准确得多，错误少得多。

囚犯们把这种杀人叫作“屠宰”。这种屠宰准确无误，后来甚至发展到白天干，几乎是当众进行了。从前在罗斯托夫市担任过相当高级的内务部职务的一个大坏蛋，一个身材不高、满脸雀斑的家伙，现在是囚犯工棚的“棚长”，他就是星期天白天在“马桶间”被杀死的。人们已经变野了，大家都挤到马桶间去观看那血淋淋的尸体。

后来，人们开始寻找那个出卖了第八号惩戒棚挖地道计划的

告密者。(劳改营当局察觉此事后，急忙把从杜波夫卡押来的主要人物统统关进了八号工棚惩戒室。但是，没有这些人，屠宰照常进行。)复仇者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刀在营区内追赶那个告密的眼线，眼线朝着管理处的工棚猛跑，复仇者在后面紧追，眼线一头钻进劳改营分部主任、大胖子马克西缅科少校的办公室，复仇者也紧跟进去了。这时少校正坐在圈椅里，劳改营的理发员在给他刮脸。根据劳改营的规章，少校在营区内是不得带武器的。猛然看到闯进来几个持刀的人，少校吓得魂不附体，推开剃刀从圈椅上跑下来，连呼饶命。他以为人们是要宰他。看到人们当面杀死了那个眼线，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没有一个人企图杀害少校。刚刚开始的这个运动有一条规定：只杀眼线，不触动看守和劳改营头头们)。但是，少校还是趁机从窗户跳了出去。脸刮了一半，还系着白围裙，他就径直朝岗楼跑去，拼命地叫喊："瞭望塔！开枪！瞭望塔，开枪啊！"但是瞭望塔上并没有开枪……

还有一次，眼线没有被当场杀死，他挣脱掉，带着刀伤跑进医院。医院里给他作了缝合包扎。但是既然少校都吓得求饶，医院能救得了他吗？两三天之后眼线被杀死在医院的病床上……

五千人的大劳改营里只杀死十几个人。可是，刀子每砍下一次，缠在我们身上的触须就脱落一批。感觉到像是吹来了一股爽人肺腑的清新空气！表面上，我们似乎仍旧是囚犯，还关在劳改营里，但实际上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因为我们自从有记忆以来现在才平生第一次能够公开地大声说出自己所想的一切了！没有经历过这一转变的人是想象不出这种自由的！

如今眼线们"有眼无线"了！……

在这之前，行动处的人向来就可以随意把某个囚犯白天留在营区，几小时几小时地同他谈话。谁知道谈什么呢?！是要他汇报？给他新的指示？从他那里摸清那些还没有作什么、但可能作些什么的与众不同的囚犯？了解那些将来可能成为反抗中心的人物？

过去，每到晚间，全队的人下工回来后自然会向这个人提出问题："今天为什么把你留下了？"而被留的人总是回答说："就是给我一些照片看，叫我认认人……"不知他说的是实话，还是拿这种谎话作掩护。

战后这些年，确实常常把一些人的照片拿给囚犯看，让囚犯辨认出战争时期遇到过的人。但是，总不可能给所有的人都是看照片吧，也没有这种必要啊。可是谁回来都这么说，自己人和告密者都这么回答。于是囚犯之间便产生了相互猜疑，这猜疑也就迫使每个人不敢再同别人讲话和来往了。

如今，猜疑消除，空气净化了！如今，契卡行动人员如果命令谁不出工，想把他留下来，这个人竟会不留下来。这不可能！从肃反委员会成立，到政治保卫局，到内务部，几十年来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他们召唤去的人竟不是怀着一颗激烈跳动的心急忙凑到跟前去，竟不是摆出一副谄媚的面孔迈着碎步紧跟在他们后面走去，而是傲慢地（因为本队的人们都在看着他呀！）拒绝去！这不可能！如今，仿佛在派工地点上空有一台看不见的天平在摆动：天平一头的小盘里放满了各种熟悉的怪影：侦讯室、拳头、棍棒、整夜罚站、站笼隔离室、阴冷潮湿的禁闭室、老鼠、臭虫、军事法庭、加判第二次刑期、第三次刑期。但所有这些都不是一瞬间的事，这只是一盘慢慢磨碎骨头的大磨，它不会在一瞬间把你全部吞噬掉，经过这一切之后，人还有可能活下来，这里所有的人不是都经历过这些吗？

而放在天平另一端的小盘里的东西很简单，只是一把刀。但这把刀就是为你这个退让的人准备的！这把刀就准备插入你的胸膛，不是将来某个时候，而是明天一清早，而且任凭它什么"契卡格勃"都没有力量救你这一命！这把刀并不长，但恰好可以插入你的肋下；它甚至连个正经的刀把也没有，只是用绝缘胶布把没有刃的一头缠了起来，但这样才有摩擦力，正好拿住，不容易

从手里滑出去！

归根结底，还是这后一个充满活力的威胁更有分量！它给予一切软弱者们以力量，帮他们摆脱蚂蟥的纠缠，使他们跟着班集体走。（它也给予这些人以辩护的口实：我是想留下来的呀，首长！可我怕挨一刀……您当然没有受到这种威胁，所以您不能想象……）

还不止这些。如今不仅行动特派员和劳改营其他主人召唤人的时候人们不敢去了，而且人们也不再敢随随便便往营区邮筒或上级设的申诉意见箱里投个信封或一张写了字的纸了。每当需要投一封信或投寄什么申诉书时，人们总要先拿给别的人看看："喂，你可看看，检查一下，这可不是告密信。来，跟我一起投进去吧！"

现在，劳改营当局变得既聋又瞎了！表面上，大肚皮少校和他的副手普罗科菲耶夫大尉（也是个大肚皮）以及所有看守仍旧自由地在营区走来走去，毫未受到威胁，照旧在我们中间走，盯着我们。但他们却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如果这里没有告密者，穿制服的人是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的：在他走近之前人们就不说话了，转过身去，藏起来或者走开了……也可能旁边就有渴望着出卖同伴的忠实情报员在那里着急，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人敢于发出任何一个暗号。

几十年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机关赖以建立其威信和荣誉的那个情报机器现在失灵了。

表面上，还是那些作业班组，囚犯们还是到原先的工地去劳动。（我们这时已经商量好要对抗押送的卫兵。我们不允许他们调整我们五人一排的队伍，不让他们在中途点数。我们达到了目的。一旦我们中间没有了眼线，连冲锋枪手也显得无力了。）我们也劳动，做到一般地完成任务。回生活区的时候像从前一样让看守搜身（可是，刀子却从来未被发现过！）。实际上，现在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已经不是劳改营当局硬性拼凑的劳动班组，而是别的人

类联合体，首先是民族。产生了眼线们无可奈何的民族中心：乌克兰人的、穆斯林的、爱沙尼亚人的、立陶宛人的。而且这些中心得到了巩固。这些中心没有人选举，但是它们按照年龄、智慧、受迫害的程度等等十分合理地自然形成了，所以它在本民族的人们中间享有不容置疑的威信。显然，也成立了各个中心的联合机构，类似所谓“民族协商会议”之类的东西。

这里应该及时说明：并非一切都像勾画主流时所看到的那样纯净而顺利。也有过一些所谓“温和派”和“极端派”之类互相竞争的集团。自然，这里也有个人之间的好恶和感情成分在起作用，个别想当“领袖”的人的自尊心在作祟。有些年轻的“牛犊子战斗员”还很缺乏必要的政治素养，其中某些人只想到自己既然干这份“差事”，就应该吃得好些，他们为此就直接去威胁卫生所的炊事员，要求给他们开额外的病号饭，如果炊事员拒绝，他们就把炊事员杀死，不顾什么道义标准——已经干惯了，而且有刀子和面具在手嘛！总之，在这个健全的核心中也慢慢开始滋生蛀虫了——它几乎是古今中外一切革命运动中司空见惯的、不足为奇的、必然会有的附属品！

也发生过一次单纯的差错：一个诡计多端的眼线不知怎么嗅到了气氛。因此，他睡觉时再三恳求一个爱劳动的老实人和他换换床位。老实人同意了。第二天早晨那个老实人被杀死在床上。

尽管有这一类偏差，但大方向始终十分明确而清楚，并且也取得了预期的社会效果。

劳动的作业班组还维持原样，数目还是那么多，可是，奇怪，劳改营里感到缺少班长了！这对古拉格群岛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起初，这种“人员流失”现象是自然的：有人住进了医院，有的人刑期快满、被调进总务大院了。但过去派工员周围总是有一群贪婪地想捞到这个职位的人在等待着：为取得班长职位还要送一块黄油，送一件绒线衫呢！现在，不但没有人再贪图班长职

位，反而是有些班长每天跑到政工处去磨，请求尽快撤掉他。

如今，队长们从前用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压制、强迫——已经失灵了，可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很快地想出一套新方法来的。班长的人选越来越成问题，以至于派工员不得不亲自到工棚同大家一起抽支烟，聊聊天，顺便向大家请求："小伙子们，作业班总不能没有个头头吧。这可不像话呀！嗯？你们随便选一个吧，选出来，我们马上批准！"

后来，这种情况更严重了，因为一些班长开始往加强管制棚里逃跑，好在石砌的监狱里找个藏身之处！不只是班长，还有象阿达斯金之类的施工员吸血鬼，还有一些眼线，他们在暴露之前或者在感到事情不妙、名单就该轮到自己的时候，也会大吃一惊，急忙逃跑到加强管制工棚里去！这些人直到昨天还在人群中装好人，还在言语和行动上表示自己赞成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囚犯中间谁敢不这么说！），昨天晚上他们还同大家一起睡在公共工棚里（其实，昨晚睡着了吗？是不是在那里紧张地思考对策，随时准备着闪开刺过来的刀子，并在暗中发誓这是最后一晚住在这里了呢！?），可是今天却突然不见了，于是，值日的囚犯得到命令：把某人的东西收拾一下，送到加强管制工棚去！

这是特种劳改营生活中的一个新时期，它既可怕，又有趣。现在不是我们逃跑，而是他们从我们这里跑掉，从而使我们这里净化！这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空前的、不可想象的时期：那些昧了良心的人夜里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了。报应已经不再等到来世，不等待历史作出判决，而是一把刀子明天早晨就会使你得到报应，这报应是可以感觉到的，活生生的。光明正大者感到脚下的营区土地柔软而温暖，叛徒则感到脚下的土地像针毡，像在燃烧！这种情况只有在童话里可以想象得出，而对于营区以外的空间，对于我们的外界自由社会来说，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是过去从未看到过，或许将来也不可能看到的。

阴森森的石砌加强管制工棚早已经扩建完了。小小的窗孔外面装着罩斗。它阴冷、潮湿、黑暗，周围是大厚木板筑接起的竖面围墙。劳改营主人为了关押那些不听话的、逃跑的、顽固不化的、牢骚满腹的勇士们面精心建造了这加强管制工棚，不料如今它竟忽然不得不接受眼线、吸血鬼和凶恶的打手来休息养老了！

应该说，第一个想到去找契卡人员的人，想到凭着自己长期忠实的效劳而请求他允许自己躲进石头房子，从而逃避人民那愤怒惩罚的人，还是相当聪明的。人们自己要求住进更严格的监狱，不是逃出监狱，而是逃进监狱，自愿地同意不再呼吸新鲜空气、不再见到阳光，——这种情况似乎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呢！

劳改营首长和行动人员对于最初逃进来的几个人表示了同情，倍加爱护地把他们收留起来：毕竟是自己人嘛！给他们在加强管制工棚里挑选了最好的房间（一些说话刻薄的人把这种地方叫作“储藏室”），给他们发了床垫子，命令把他们屋里的炉子烧暖和点，允许他们每天出来散步一小时。

但是，继第一批聪明人之后，不那么聪明但却同样渴望活下去的人们也跟上来了。（某些人逃跑时还设法替他保留面子：谁知道呢，说不定将来还得回来同囚犯们住在一起？大辅祭鲁德丘克逃进加强管制棚之前就有过一场表演：晚上熄灯号之后，几个看守突然来到他的房间表演了一场严格搜查的戏，甚至连床垫子都撕开了，然后就“逮捕”了鲁德丘克并把他带走了。不过，囚犯们很快就确切地得知，这位喜爱绘画和吉他琴的骄傲的大辅祭也住在拥挤的“储藏室”里）眼看这种人已经有十名，十五名，二十多名了！（我们用劳改营长官的姓给他们命名为“马切霍夫斯基班”。）于是，不得不压缩有效面积而开辟第二个“储藏室”。

不过，眼线只有当他们混在群众中间而没有被发现的时候才是需要和有用的。眼线一旦被发现就一钱不值了，他们再也不能在这个劳改营里起作用。因此，现在只好让他们在加强管制工棚

白吃饭，他们又不去参加劳动，毫无益处。不行，就算内务部对他们慈善吧，也总有个限度吧！

于是，当局就制止了这股求救的水流。来迟了的，对不起，你就留在工棚披着羊皮等待那一刀吧。

告密者也像是摆渡的船夫：这时需要你，事后不相识。

劳改营当局关心的是对应措施，是怎样才能制止囚犯们这可怕的运动，并且挫败它。他们习惯于做的，也是他们实际上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草命令。

这些掌握着我们的身心的人们最不愿意承认我们的运动是政治运动。因此，在那些气势汹汹的命令中他们把已经开始的这个运动统统称之为匪徒活动（这些命令由看守们到每个工棚里来宣读），大概他们觉得这样称呼比较简单、容易理解，也更亲切吧。不久前，他们把真正的匪徒冒充“政治犯”送到我们中间来当“眼线”，现在呢，相反，政治犯——第一次成为政治犯的人——却又被叫作“匪徒”了。命令里只是笼统地宣布：这些匪徒必定会被发现（眼下还一个也没有发现！），而且（更没有把握地说）这些人将会被处决！命令里甚至号召囚犯们起来谴责匪徒们并同他们进行斗争！……

囚犯听完传达之后，各自暗笑着散去。劳改营军官们不敢把政治性的东西称为政治性的（虽然三十年来一向是不管侦查什么案件都任意扣上“政治”帽子的），这使我们感到了他们的虚弱。

这确实是虚弱！把运动称为匪徒行为，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诡计：这样一说，劳改营当局就没有责任了。否则，它怎么竟然使得劳改营里发生了政治运动呢！？这样说的好处和必要性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因而上面也开始使用这种提法了：从州内务局和劳改营管理局到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内务部本身都是这么说。一个非常害怕公开报道消息的制度必然会喜欢同样地欺骗自己。如果被杀死的是看守或军官，那他们就无法回避适用第五十八条第8

分条（恐怖行动），不过，那他们也就可以很容易地判处枪决了。现在，他们看到另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可以把特种劳改营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描绘成“狗咬狗的战争”（“母狗战争”），这是震撼过整个普通劳改营的，也是由古拉格群岛的领导当局自己发动起来的战争。

“狗咬狗的战争”值得在本书中单独写一章，但为此还需要收集许多材料。我只好请读者去阅读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研究报告《罪恶世界随笔》，虽然那里面写得也不够全面。

简单地谈谈吧。“狗咬狗的战争”（“母狗战争”）大约爆发于一九四九年（经常发生的小偷与“母狗”〔狗腿子〕之间个别人的互相残杀又当别论）。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间曾大打特打。那时，盗贼世界分化为各色人物的小集团：除了纯粹的小偷和“狗腿子”之外，还有：不择手段派（“不择手段的窃贼”）、所谓“马赫诺分子”、大捞派、酿酒派、“小红帽”、魔手派、带棍派以及其他种种。

到了五十年代那个时期，劳改营的领导部门已经不大相信那绝对正确的理论所教导的改造刑事犯的办法了。因此，它似乎下决心要摆脱这一负担，于是它便开始玩弄“分而治之”的手段：忽而支持这一派，忽而支持另一派，利用受支持的派别的刀子去干掉另外一些人。这种屠杀曾公开地、大规模地进行。

后来刑事惯犯中的凶手们也学会了对付办法：他们或者借他人之手杀人，或者亲自出马，事后强迫别人承担罪责。一些年轻的普通犯人和当过兵或者当过军官的人，在可能被杀的威胁下，不得不把别人的杀人罪承担下来，从而按第五十九条第3分条“匪徒行凶罪”被判二十五年徒刑。而那些盗贼团伙的头头们却在一九五三年依据“伏罗希洛夫”大赦令像没事人一样释放了。（不过我们也不必遗憾：后来他们又一次次地进了监狱。）

当我们的报刊上又掀起一阵风，并且刊登一些奢谈改造的多

情故事时，字里行间偶尔也会透露一些关于劳改营残杀事件的消息（当然是十分模糊不清而且不真实的）。这些消息中往往故意地（为了对历史进行隐瞒）把“狗战”和特种劳改营里的“屠宰”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不明的杀人混为一谈。劳改营题材是大家所感兴趣的，人们都贪婪地阅读这类文章，但是从这些文章里却什么也弄不懂（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写这些文章的）。例如，一九五九年七月《消息报》上就发表过一篇疑点百出的所谓记实性中篇小说，出自记者加利奇之手。里面说，主人翁科西赫从劳改营里写了一封长达八十页打字纸的申诉信，感动了最高苏维埃。（第一，请问，科西赫哪里来的打字机？是从行动人员那里借来的吗？第二，谁会去读这长达八十页的东西？还没有看完第一页就该打呵欠了。）并且说这个科西赫曾被判刑二十五年，是由于在劳改营里的案件被第二次加刑的。那么究竟是由于劳改营里的什么案件？为了什么增加刑期的？说到这里时作者加利奇表现了我国新闻记者的一般特点：含糊其辞，叫人摸不着头脑。读者不明白：科西赫究竟是在狗咬狗的斗争中杀了人，还是犯了杀死眼线的政治性杀人？但是，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了：如今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人们把一切杀人都混为一谈，统统称之为匪徒行为。请看这家中央报刊是如何科学地解释这一点的吧：“贝利亚的走狗们（是啊，一切都往“大灰狼”身上推吧，总不会错，大灰狼什么都能承担下来！）当时在劳改营里掌握着权力。（当时？那么在这**之前**呢？**现在**呢？）那些本来应该认真执法的人却用自己的肆意妄为代替了严明的法律。（怎么回事？违背唯一的指令？谁敢这样做？）**他们千方百计地在囚犯之间挑拨离间，制造仇恨**（着重点是我加的，这句话倒是实话。——作者注）（利用眼线的办法当然也包括在这个提法之内了）。那是一种野蛮的、无情的、人为地煽动起来的仇恨。”

想用判刑二十五年的办法来制止劳改营里的杀人事件，自然是办不到的，因为杀人者本来就已经被判二十五年了。于是，一

九六一年又颁布了新命令：在劳改营里杀人者处死刑，当然也包括杀死眼线的人在内。赫鲁晓夫发布的这条命令倒是斯大林时期的特种劳改营所需要的。

他们就是这样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但是因此也就失去了枪毙劳改营内的凶手的权利，也就是说，不可能采取有效的对应措施了。他们无法制止这场越演越烈的运动。

发布的命令没有奏效。囚犯们并没有代替自己的主人去进行谴责和斗争。因而劳改营当局便采取了第二项措施：对整个劳改营实行惩戒管理制度！这意味着，所有日常的自由时间，即除开劳动之外的全部时间，包括星期天，我们都必须像在监狱里一样被锁在屋里，必要时使用马桶，饭也在工棚里吃。人们用大桶把粥和烂菜汤送到工棚里来，食堂里空无一人。

这个办法使人很难忍受，不过，它没有继续多久。我们在工地上完全变得懒懒散散了。不久，煤炭托拉斯叫了起来。更主要的是这给看守们增加了一项额外负担：他们现在不得不经常在劳改营里拿着钥匙从这头跑到那一头，一会儿要给倒马桶的卫生值日开门关门，一会儿要开饭，一会儿又要把病人押送到卫生所去，再从卫生所押回来……

劳改营当局原来指望我们受不住这种严格的制度，因而会恨那些杀人者，把他们招供出来。但是我们大家都有精神准备，认为忍受一下还是值得的。当局的另一目的是：现在每个工棚总是关着，这样就可以防止囚犯跑到别的工棚去杀人，而本工棚里的人总是容易找到的。可是，又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又是一个凶手也没有找到，大家还是都“没看见”，“不知道”。接着又在工地上把一个人的脑袋打了个窟窿。这就更是关闭工棚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了。

惩戒制度废除了。又想出另一个办法：修建一道“万里长城”——一道大墙。这道墙的厚度是两块土坯长，高四米，就修

在劳改营区中部，用它把营区分割为两部分，但暂时先留下一个豁口。(这个计划适用于全部特种劳改营。其他许多营已经把整个营区都分割成若干小区了。) 这道墙对于外部的村庄毫无防护意义，因而托拉斯不会支付这笔建筑费用，所以整个建筑的担子全落在我们这些囚犯身上：制作土坯，翻晒土坯，搬运、砌墙等全部工作都要我们在星期天和下工回来之后的时间(夏天天长)完成。我们十分讨厌这道墙，明知当局又在准备某种卑鄙勾当，可是不能不干。我们得到解放的程度还很小啊，只是头脑和嘴巴解放了，从肩膀直到脚跟整个身子仍旧和从前一样陷在奴隶的泥潭中。

发布恐吓命令、实行惩戒室制度、修墙——这都是一些粗暴措施，完全符合监狱里的思维方式。可是，突然，怎么啦？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开始把一个又一个作业班叫到摄影室去，给每个人拍照片，态度客气，而且不是让你戴着那个狗脖套一般的号码拍照，不要求你一定把头摆成固定的角度，而是请你随便坐下，随便摆个什么姿势，愿意怎么照就怎么照。那些爱劳动的人们还听到了文化教育科长“不小心”漏出来的一句话：照像是“为了办理证件”。

办理什么证件？囚犯需要什么证件？……一种兴奋的心情在囚犯们中间传开了：会不会是为了解除看管在准备出入证？会不会是……？也许……？

有一个回家度假的看守回营了。他（当着囚犯们的面）大声对别的看守说，旅途中他看见过好几列火车，满载着释放回家的人，被释放的人们用标语和绿树枝把列车装饰起来，高高兴兴回去了。

天啊！心脏在激烈地跳动！是啊，早该如此嘛！战争结束后本来应该先从这件事做起的！莫非终于开始做了吗？

还听说有人收到了家信，说他的邻居已被释放，现已回到家里！

忽然，有一个已经拍过照片的班被某个委员会传去谈话。要求一个人一个人地进去谈。斯大林的照片下面摆着铺了红布的桌子，桌旁坐着几位劳改营军官，但不仅是他们，另外还有两个在劳改营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一个哈萨克人，一个俄罗斯人。这些人庄重地坐在桌旁，面带微笑，在填写着什么表格：姓、名、父名、出生年月、出生地，接下去不是囚犯已经习惯回答的触犯刑法多少条、判刑多少年和刑满日期，而是详细的家庭状况：妻子、父母、有无子女、子女的年龄、现住何处、住在一起还是分居。所有这些全都记下来了！……（委员会的成员还时而提醒记录人员：把这点记下来！把这个情况也写下来！）

讯问的问题很奇怪，触及人的痛处，但又令人愉快！听到这些问题，连那些已变成铁石心肠的人也恨不得大哭一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听到的一直是那不连贯的嚎叫声：犯哪一条？刑期？判决机关！？突然，这么一些和颜悦色、严肃认真、通情达理的军官坐在你面前，慢条斯理地、以同情的口吻（是的，正是以同情的口吻！）询问你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连自己都不敢去触动它，有时躺在床上和邻床的人说上一两句，或者一两句也不敢说……这些军官（对呀，去年十月革命节前夕不就是这个军官把你的全家照片没收掉，给你撕得粉碎吗！你忘了？现在原谅他了？），这些军官现在听到你说妻子已经改嫁，父亲已经衰老，已不指望今生能看到儿子时，对你深表同情地咂着嘴，他们互相交换一下眼色，摇摇头。

是啊，这些军官不是坏人，他们也是人，只是因为他们担负的这种狗差事才……各个项目都已填完，最后对每个人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嗯，那么你自己希望住在什么地方呢？是你父母住的地方，还是你从前住的地方？……"

"什么？我……就住在第七号工棚呀……"囚犯睁大眼睛回答

说。

"这我们当然知道!"军官们笑了。"我们是问：你希望住在什么地方？比方说吧，假如把你释放了，那么给你的证件上该填你要在哪儿落户呢？"

囚犯感到天旋地转，眼前是阳光、彩霞……他的头脑懂得，这是梦，是童话，这不可能，他的刑期是十年或二十五年，什么也没有改变，他满身泥土，明天还要被赶到工地去劳动。但是几个军官，包括两名少校，却明明坐在面前不慌不忙地、深表同情地继续在问：

"你到底想上哪儿去，上哪儿？你倒说一个地方呀。"

囚犯的心脏跳得更快了，一种感激的暖流流遍周身。于是他就像个羞红了脸的男孩要说出自己心爱姑娘的名字似的，说出了内心中的秘密，说出了如果他不再是身带四块号码的、可诅咒的囚犯的话，他希望在什么地方度过自己的余年。

军官们把这个地点也记下来了！命令叫下一个人进来。而头一个人便疯人似地跑到走廊里，急不可待地把刚才的事情讲给同伴们听。

队里的人一个接一个被叫进屋里，回答友善的军官们提出的问题。五十个人中间只有一两个人苦笑了一下，回答说：

"呆在这个西伯利亚一切都很好，只是气候热些。能不能把我送到北极圈内去？"

或者说：

"请您这样写上：我生在劳改营，也要死在劳改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

军官们就这样同两三个班谈了话（全劳改营共有二百个作业班）。劳改营的囚犯兴奋了好几天：他们有的还争论呢！尽管一半人从未相信这一套。这种时候过去了！委员会后来再也没有找人谈话。其实，给囚犯"照像"并不花费什么钱，只是用没装胶卷

的照像机咔嚓一下就行了。但是，要一组军官坐在那里亲切地向这些面貌可憎的囚犯问话，他们实在受不了。既然受不了，那么这一无耻的欺骗手段当然也就未能奏效。

（不过，还得承认，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一九四九年建立这类严格管制的劳改营时，当然有过永久性计划。但是，曾几何时，一九五一年，它的主人们就不得不煞有介事地表演这类亲切的把戏了。还需要有什么样的成功呢？为什么在普通劳改营时代他们没有被迫作这类表演呢？）

于是，刀子又开始闪光了。

于是，主人们决定：抓人。没有眼线，他们摸不准应该抓谁，但是，大概总有些怀疑对象和想法吧（说不定还是有人秘密地给他们通消息）。

一天，收工之后两个看守来到工棚，像是例行公事一般对某个囚犯说：

“喂，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跟我们走！”

这个囚犯看了看周围的同伴，回答说：

“我不去。”

可不是嘛！对于这种极为平常的抓人，或者叫逮捕，我们是从来没有反抗过的，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原来，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啊：我不去！我们这已经得到解放的头脑现在终于懂得这一点了！

“为什么不去？”两个看守走到跟前来了。

“就是不去！我在这里呆着满好。”囚犯坚定地回答。

“他应该去哪儿？……为什么必须去？……我们不放他走！……不放他走！……你们走开！”工棚里四面八方都说话了。

看守们踌躇了一会儿，走开了。

他们又在其他工棚里试了试同样的办法。结果一样。

豺狼们明白了：我们已经不是从前的绵羊。现在他们抓人必

须借助于欺骗手段，或者在岗楼里干，或者为了一个人而抓全班。想从群众中把一个人抓走，那是办不到的。

我们清除了污秽，我们摆脱了监视和偷听，我们翻身放眼一看，明白了：我们的人成千上万！我们是政治犯！我们能够抵抗！

我们选定了眼线、告密者、叛徒这个环节开刀，抓住这个环节拉断整个锁链，这选择该是多么正确啊！过去就是我们中间的人在妨碍我们生活。就像古代的祭坛上一样，他们的血流出来了，我们消弭了沉重的诅咒。

革命在高涨。原来似乎一度停息了的革命的微风，如今像飓风一般吹进了我们的胸膛！

第 十 一 章

摸索前进，扯断锁链

把我们与我们的警卫者隔开的那条地沟，如今已经塌陷成一条深谷了。我们双方站在这深谷两边的斜坡上彼此打量着，都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说我们“站在”斜坡上，当然是形象的说法。实际上我们仍旧每天由我们的新班长带领着走去出工。（新班长或者是秘密选举出来、事先约定他要为大家服务的；或者还是原来的人，但现已变得十分通情达理、友善和关心群众了。）我们出工时并不迟到，大家尽量不给别人制造困难，也不再有人拒绝劳动。每天完成工作定额。看来，劳改营主人完全可以对我们感到满意。我们也似乎可以对他们感到满意，因为他们近来根本不再大声训斥和威胁了，也不再借口一些琐事就关人禁闭；好像也没有注意到我们见了他们不再脱帽了。如今，马克西缅科少校往往一直睡到早晨派工之后才起床，傍晚收工时则常常等在岗楼附近，趁我们等待搜查的工夫同囚犯们开一两句玩笑。他吃得饱饱的，乐呵呵地望着我们，就像塔夫利亚地方的牧主望着草原上放牧归来的无数羊群一样。星期天偶尔也给我们放映电影。不过，修筑“长城”的劳

动仍然十分繁重。

尽管如此，我们双方还是都在紧张地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不可能长久维持现状：不论我们还是他们，都感到有所不足。总要有一方发起进攻。

但是，我们还想争取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把憋在心里的话全部毫无顾忌地公开说出来。（尽管仅仅是在劳改营隔离区的范围内，尽管一生中这么迟才享受到真正的言论自由，但这种享受毕竟还是甜蜜的！）难道我们能够指望把这样的自由扩展到隔离区之外，或者带着它到外界去吗？不能，当然不能。我们还能提出什么别的政治要求吗？想也想不出来！且不说这是没有希望或不起作用的吧，简直就是想不出！身处劳改营中，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国家发生全面变化，也不能要求它取消劳改营，否则，人们会从飞机上朝我们扔炸弹的。

我们能够提出的自然而合情合理的要求只是：重新审理我们的案件，撤消毫无道理地强加给我们的刑期。但是，好像这也是毫无希望的。当前恐怖的臭气弥漫全国，越来越浓，在这种气氛中，法官们会觉得对我们大部分人的判决是合理的，面他们似乎也成功地使我们相信了这一点！再说，对案件进行复查似乎也提得很不具体，使群众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利用“复查”欺骗我们是最容易的：许诺，拖延，再派人来重新“调查”，这就可以拖上几年。即使是突然宣布要释放某人并且从工棚把他领走了，我们怎么知道不是把他带去枪毙，不是押往别的监狱，不是又给他判了新的刑期呢？

前个时期的所谓“委员会”表演的那场戏，不是已经充分说明这一切都是可以扮演的吗？当时甚至装成了未经“复查”就打算放我们回家的样子……

大家一致同意并且毫无疑问的只有一件事：要求取消最伤人自尊心的一些作法——工棚夜间不要上锁，拿掉马桶；去掉身上

的号码；我们的劳动不应完全不给报酬；要允许一年写十二封信（其实，这一切在普通劳改营里已经都做到了，那里甚至一年可以写二十四封信，但是难道那里可以生活吗？）

我们要不要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看，我们已经这么习惯于不自由了，甚至不想去追求自由……

我们也认真考虑了方式方法：怎样提出这些要求？要作什么？很明显，两手空空的我们是对付不了现代化军队的，因此，我们的道路不可能是武装起义，只能是罢工。在罢工过程中，比方说，可以自动把身上的号码布撕下来。

但是，我们血管里仍然流着奴性血液。大家都从自己身上撕下那狗牌子似的号码布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就像架起机关枪走上街头一样是一件十分勇敢而大胆的、孤注一掷的行动；“罢工”这个词在我们听来是那么可怕，以至于不得不借助于绝食来支持：我们觉得，如果在罢工的同时开始绝食，仿佛就能增强我们罢工的道义权利。对于绝食，似乎我们还拥有某种权利，但是，罢工？……我们一代又一代从来都是这样认为的：“罢工”这个词极端危险，而且，当然，是反革命的，它与“协约国、邓尼金、富农怠工、希特勒”等词汇属于同一类。

这样，我们自己就完全不必要地决定开始绝食，等于事先自愿地消耗掉自己在斗争中需要的体力（幸而在我们之后没有一个劳改营重犯我们埃克巴斯图兹营的这种错误）。

我们考虑了绝食罢工的各个细节。不久前我们全劳改营才开始实行“惩戒”制度，我们明白，他们对绝食罢工的回答一定是把我们统统关在工棚里，不许出去。那么我们互相间怎么联络呢？怎么商量下一步并沟通各工棚之间的意见呢？应该想出一些信号来并协商好在各工棚之间用它进行联络，还得确定从哪个窗口向哪个窗口怎样传达，等等。

所有细节都在各种场所和各作业班之间商量好了。大家都认为罢工势在必行，也都希望它发生，但同时，由于不习惯，又觉得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很难想象有那么一天我们大家都集在一起，商量妥当，作出决定，就……

而警卫着我们的人们可是正式以军事组织的形式一层层组织起来的，他们更加习惯于行动。他们不担心采取行动会比无所作为丧失更多的东西。于是，我们的警卫者先进攻了。

这样，一切也就自然发展下去了……

我们在久已习惯的各自的"小车厢"内，在久已习惯的作业班里、工棚角落里安静而舒适地迎来了一九五二年的新年。一月六日，星期天，东正教的圣诞节前夜，西部乌克兰人正准备好好庆祝一下节日：煮一点传统的蜜饭，在星星出来之前持斋，然后一起唱圣诞节祝歌。可是，这天清早点名之后就把我们全锁在工棚里不让出来了。

谁也没想到这一招儿！是当局秘密准备好的，真狡猾！我们透过窗户看到：邻近的工棚里大约百来名囚犯拿着各自的东西由卫兵押着向岗楼走去。

又要押走一批人吗？……

这时，看守人员和几个军官向我们工棚走来了。手里拿着卡片。他们按卡片点名叫人。"拿着你的全部东西出来！……连各自用的床垫子也一起带着！"

噢，原来是重新编组作业班和工棚！在"长城"的豁口处设了警卫，明天这个豁口就要被堵死。我们几百人被赶到岗楼外面，各自拿着口袋和床垫子，像家里失了火的人似的，绕过营区外面，又穿过另一个岗楼，进入另一个隔离区。那个区的一批人则被赶到我们区来。

大家都在绞尽脑汁判断：到底抽走的是些什么人？留下的是什么人？这种改编意味着什么？主人的意图很快就清楚了：隔离

区的一边（第二分部）只留下清一色乌克兰人，大约两千名。我们所有其他民族的囚犯都被赶到另一边（第一分部）去，这里总共约有三千人，包括俄罗斯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鞑靼人、高加索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波兰人、摩尔达维亚人、日耳曼人以及少数在欧洲和亚洲战场上偶然抓到的其他民族的人。总之，这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大家庭。（真有意思：内务部的思想本来应该是用非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来阐明的，然而今天它却在沿着“划分民族”这条古老的小路发展。）

旧作业班被打乱了。新组成的班要到新工地去劳动，住在新工棚里。全面更迭！这更迭不是一个星期天完成的，它继续了整整一周。人员被打乱，许多关系被切断，原来似乎准备就绪的罢工也被破坏了……干得好利落！

现在，医院、食堂、俱乐部都在乌克兰人的那个分部里，我们这个分部只有加强管制工棚。把乌克兰人、班杰拉分子这些最危险的闹事者同加强管制工棚分开了。这是为什么？

我们很快弄清了原因。劳改营里传开了一个可靠的消息（是往强管棚里送菜汤的“苦力”们传出来的），眼线们在“储藏室”又在干坏事：营方把他们怀疑的人（从每个队里抓两三个）交到他们手里，眼线们就在自己屋里拷打这些人，掐脖子，殴打，逼他们招供，说出“人都是谁杀的??”。营方的意图这时全明白了：是在进行刑讯！不由警犬们亲自动手（大约不经上级批准会招来麻烦），而是委托眼线们去干：谁杀了你们，自己去找出来！他们自然用不着别人鼓劲。这些寄生虫要表明他们不是白吃饭的。把班杰拉分子与强管棚隔开，是怕他们闯进去。对我们则比较放心：我们驯服，是多民族的群体，谈不到一起。爱闹事的都在那边。劳改点之间隔着四米高的墙呢。

古今有多少渊博的历史学家，有多少部深奥的书籍，但却都

未能预见到人们的心灵还会燃烧起这样神秘的火焰，社会还可能迸发出这样神秘的力量。他们不仅未能预见，甚至事后也未能作出解释。

有时候把点燃的麻絮塞到劈柴下面，塞呀，塞半天也点不着火。可是，烟筒冒出来的一个小火星往空中一飞，却可能使整个村庄化为灰烬。

我们这三千人什么事也没有打算做，什么准备也没有。可是，有一天收工回来之后，加强管制棚旁边的工棚里的人们忽然拆下各自床上的长方木梁和十字接头来，趁着黄昏（靠近加强管制工棚的那一面没有阳光，已经很暗了）跑过去用手中的木器猛烈地撞击这座劳改营监狱的结实的木板围墙。人们既没有斧头，也没有铁棍，这类东西是不准带进生活区的。

木器敲打的声音响成一片，像是哪个木工班在认真地干活。围墙上几块板子被砸开了，人们就去拆开它，木板上钉的十二公分长的大钉子发出吱吱的响声，全营区都能听得见。虽然现在不是木工应该干活的时候，可是，听来完全像一片劳动的声音，所以瞭望塔上的哨兵、看守和其他工棚的人谁都没注意它。劳改营傍晚的生活一切照常：有的作业班去吃晚饭，有的正从食堂往回走，这个人去医务室，那个人去保管处，有人去取邮包……

但是，看守们终于发现有些不对头了，有人就顺着响声跑到加强管制工棚房后的阴暗处去察看。不看则已，一看不得了，转身就向营部工棚飞跑。有的囚犯看见了看守，就拿着木棍追赶。这时，便全面开花了：有人用石块或木棍砸营部工棚的窗子。窗玻璃哗哗啦啦地破碎，那声音清脆、轻快，也令人感到威胁！

其实，人们最初的意图并不是暴动，甚至无意夺取强管棚，因为这并不容易（照片 4 是拆卸下来的埃克巴斯图兹营强管棚的房门，照片是多年后补拍的）。他们原来只打算砸开眼线房间的窗子，从窗子往屋里浇上汽油，然后把火扔进去，意思是：尝尝我们的

厉害，我们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强管棚的围墙上已经打开一个大洞，十几个人闯进去了。人们跑来跑去，寻找眼线们住的房间（可不能弄错！），还要把窗外的“笼口”打掉，踩着肩膀爬上去，把汽油桶传过来才行。这时瞭望塔上的机枪朝营区开火了。终于没有来得及点火。

是刚才跑掉的看守和劳改营长官马切霍夫斯基向警卫营报告了（马切霍夫斯基也被人拿刀追得抱头鼠窜。他从总务处库房旁跑到围墙角的瞭望塔下，边跑边喊：“瞭望塔，别打枪，是我！”好容易才穿过了前沿地带）①。警卫营营部（我们现在上哪里去打听当时的指挥官姓名？！）立即电话通知各瞭望塔用机枪扫射——朝着全营区三千名手无寸铁的、对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的人们开火！（例如，我们这个班当时正在食堂，听到突如其来的机枪声十分奇怪。）

是命运在嘲笑人吗？这个事件正好发生在新历一月二十二日，即旧历的一月九日，直到前一年的日历上还把这个日子作为**血腥的星期日***沉痛地用黑框框起来呢。我们这次是血腥的星期二。而就场地来说，这次可比彼得堡的场地宽敞多了：不是广场，而是大草原。而且这里没有见证人，既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外国人。

哨兵们在昏暗中朝着营区胡乱开枪。不错，射击的时间不长，而且大部分子弹也许是朝高处打的，但是朝低处打的也不少；对每个人来说难道需要很多子弹吗？子弹穿过工棚的薄墙伤害的不是那些冲击劳改营监狱的人，倒是一些完全无关的人，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而受伤的人却不敢去医务室包扎，只得瞒

---

① 后来马切霍夫斯基到底被杀掉了。不过不是我们这些人，而是1954年，在埃克巴斯图兹营替换了政治犯的刑事犯把他杀了。马切霍夫斯基很严酷。但是应该承认他很勇敢。

* 1905年1月22日（俄历9日），沙俄军警向工人请愿队伍开枪，史称“流血的星期日”。——译者注

住身上的伤口，让它像狗身上的伤痕一样自己长好，因为他怕主人根据枪伤把他定为暴动参加者。当局总得从这些外表上一样的人们中间揪出一些来治罪呀！九号工棚有一个老头儿被打死在自己床上，他的十年刑期眼看就满了，过一个月就要被释放。他有两个儿子就同那些从瞭望塔上朝我们射击的士兵们在同一种部队里服役。

冲进去的人迅速逃出了监狱院子，四散逃回各自的工棚（还得急忙把木梁和十字接头重新安装到床上，不能被人发现痕迹）。有些人听到枪声后认为应该坐在工棚里不动，有些人则相反，急忙跑到外面去，盲目地在营区打转，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全营区看不到一个看守的影子，军官们也全不见了。营部的房间空空的，打碎的玻璃窗张着大口，有些恐怖。瞭望塔上的机枪不响了。个别好奇的人在营区内无目的地游荡，企图弄清真实情况。

我们劳改点的大门霍地打开了，一排警卫部队的士兵端着冲锋枪冲进来，任意打了几梭子弹。冲锋枪手进入大门后立即扇形散开。他们后面紧跟着一批怒容满面的看守，手持铁管、木棒之类随手抓到的武器。

他们在搜索整个营区，波浪式地向各个工棚迫近。冲锋枪沉默了，士兵们站住了。这时看守们便跑向前面，抓到一些受伤的或躲藏在角落里的人劈头盖脸狠狠地殴打。

这一切我都是后来才了解到的。当时只听到营区内响起密密麻麻的枪声，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弄不明白。

我们工棚门口挤了很多人，囚犯们争先恐后地尽快往工棚里挤，反而谁也进不来（倒不是人们认为工棚的木板墙可以防止枪弹，而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已经不再是造反者了）。我这时正站在门前台阶上。我十分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感到一种对于命运的厌恶的漠然态度，一瞬间对于得救或死亡似乎完全无所

谓了。你们这些该诅咒的家伙为什么老是纠缠着我们不放？我们生在这个不幸的国土上，一辈子蹲你们的大狱，就活该在你们面前有罪到死吗？丑恶的苦役生活使我把一切都看得淡了，厌倦了。甚至我平日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心中的、尚未记录下来的诗篇和剧本此时也都无所谓了。因此，当死神藏在士兵的军大衣下面从营门向我逼近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想往门里挤。这也就是当局迫使我们养成的那种苦役营囚犯的基本心理状态。

门口空出来了，我们几个人最后走进去。这时，忽然听到身后响起一排枪声，面为我们已进入屋里，枪声显得特别大。三颗子弹擦过我们的身子并排打在门框上。第四颗子弹飘起来打在玻璃上，穿了一个周围带许多细小裂纹的小洞。

迫害者们并没有跟着我们进工棚，面是把门反锁上了。他们在营区继续搜捕并殴打那些来不及跑回工棚的人，大约二十多人受枪伤和被打伤。有些人隐瞒了自己的伤，有些则被送到医务室去，这些人下一步的命运就是：监狱、追查参加暴动的经过。

但是，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天夜里工棚一直锁着，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早晨，也没有允许各工棚的人在食堂见面：担心我们互相串联、摸清情况。有几个工棚里无人受伤，他们也不了解打死人的事，所以这天早晨便又去上工了，包括我们这个工棚在内。

我们出工了，但在我们之后没有一个作业班出来。工厂的生产线上空空的。派工员也没有来派工，我们受骗了！

这一天我们在机械制造厂里根本没有心思干活。伙伴们在机床之间串来串去，或者坐在一起猜测昨天发生的事。同时也在讨论：我们这样当牛作马、忍气吞声到底何时是尽头。可是，已经被永远地压弯了腰的老囚犯们却反问道：不忍受又能怎么办？难道从前没有人被摧毁压垮过吗？（这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那些人们的人生哲学。）

傍晚我们下工回来时营区里也是空荡荡的，没有人走动，探子们很快就从其它工棚的窗下探回了消息：第九号工棚有二人被打死，三人被打伤，他们和旁边的工棚今天从早晨就没有出工。主人们把我们出工的事告诉了他们，指望他们明天能出工。但是，现在很明显：明天我们也不会出工了。

给墙那边的乌克兰人也扔过去几个纸条，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支持这一行动。

一次没有准备的、甚至在思想上也还没有考虑成熟的绝食罢工，就这样在没有指挥中心、没有商定联络信号、发育不全的状态下开始了。

后来，其它劳改营的做法是先掌握食品仓库，然后拒绝出工，那当然比我们的做法聪明多了。我们的做法虽说不甚明智，但却显得更有气魄：三千人同时拒绝了面包，也拒绝了工作。

早晨，没有一个作业班派人到面包房去取面包，没有人去食堂吃现成的粥和菜汤。看守们完全莫名其妙，他们三番五次地跑来催促我们去吃饭，一会儿威胁着赶我们去，一会儿又好言相劝：暂时只要求先去吃饭，只字不提出工劳动问题。

但是，谁也没去。大家全都穿着衣服和鞋躺在各自的床上，沉默不语。只有我们几个当班长的（在这火热斗争的一年我当了班长）不得不回答两句，因为看守的话全是冲班长说的。我们也躺在床上，只是从床头无可奈何地回答他们：

“长官，你看，不行啊！……”

这种不声不响的一致抗命，抗拒一个从未原谅过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政权的命令，这种长时间的顽强的不服从，看来要比在枪弹纷飞之下奔走呼号更加可怕。

最后，看守们停止了劝告，锁上了工棚的门。

后几天进出工棚的只有值日人员，他们出去倒马桶，拿饮水和煤来。公众讨论决定，只允许那些躺在医务室的人不绝食，只

允许担任医务工作和卫生员工作的囚犯不停止工作。伙房做好了饭，没人吃，倒掉了；又做好，又倒掉了；于是伙房也就不再做饭。各处的杂役、帮手们似乎第一天去找过劳改营头头，说明他们没有办法再干活，然后就走开了。

这样，主人们就再也无法看到我们并了解我们的真实想法了。监工们和奴隶们之间出现了一道真正的鸿沟。

一生中的这三昼夜是我们每个绝食参加者所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并没有看见其它工棚的同志，也没有看见陈在那里等待掩埋的尸体。但是，却像有一条钢铁链条穿过空荡荡的隔离区把我们各个工棚的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

宣布绝食的不是有皮下脂肪储存的饱食终日的人。这全是些瘦骨嶙峋、体力衰竭、长年忍饥挨饿、勉强维持着某种体内平衡的人，是失掉一百克食物立即会感到身体不适的人。而且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也跟大家一起绝食了，尽管明明知道三天的饥饿就足以无可挽回地把他们推向死亡。我们拒绝接受的食物，我们过去认为是叫化子饭的食物，如今在我们惊扰不安的饥饿的梦中却变成了丰美的佳肴。

宣布绝食的这些人几十年来所受到的是一条无情的、强者生存的法则的教育，一直认为“今天你死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乃是天经地义。可是，现在他们完全变了，他们爬出了那个腥臭的个人泥塘，结成同心，相信：今日大家一起死去也胜似明天这样的苟活。

各工棚、各房间里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某种庄重而友爱的关系。不管谁保留下来的一点点剩余食物，特别是那些常收到邮包的人，现在全都交公了，全放在一块铺开的破布上，根据小组的决定，有些东西今天分吃，有些要留到明天。（个别常收到邮包的人可能还在私人食物储藏室里存有一些食品，但是，一则去储藏室要通过营区，现在无法过去；再则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把全部积蓄拿出

来：有人还指望绝食结束后好好“补养”一下呢。所以，和任何监狱一样，绝食也并非对每个人都是同等的考验，那些没有任何储存、没有日后补养希望的人们这时才是表现了真正的英勇精神。）如果有大麦，就拿来煮成粥，用羹匙分着吃。为了把炉火升得更旺，就从床上拆木板烧。既然自身的生命都不一定能延续到明天，难道还舍不得公家的床板？

主人们将会采取什么对策，谁也无法预料，说不定还会从瞭望塔向工棚开枪呢。他们让步的希望很小。我们一生中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们作出过任何让步。我们的绝食罢工使人感到某种绝望的痛苦。

但是在这绝望中也有某种令人宽慰的东西。我们迈出的这一步的确是无益的、冒险的，它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样倒也好。我们的肚子饿，胸部疼痛，但是却有另外的、某种更高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在这饥饿的、漫长的三个白天和三个夜晚，三千人都在暗自思忖全体三千人的刑期、三千人的家庭和某些人的家破人亡，思忖着过去发生的事和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尽管在这许许多多的胸腔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感情，也可能有后悔和失望，但压倒一切的感情是觉得：就该这样！就得跟他们干！没有好结果就没有好结果吧！没有好结果才好呢！

这又是一条没有研究透彻的规律——群众的情感违反通常理智而普遍升腾起来的规律。我自己就十分明确地体验了这种感情上的升腾。我的刑期只剩一年了。似乎我应该为自己被卷入这次事件而愁苦悔恨才对，因为参与这种事件之后是不会不重新判刑的。可是，实际上我却没有感到丝毫的遗憾：狗养的！随体给我再判一次刑吧！……

第二天，我们从窗户里看到几个军官从一个工棚走到另一个工棚。值班看守打开工棚门，从走廊这头走到另一头，把身子探进每个房间招呼人（态度变得十分和蔼，不像从前吆喝牲口那样

了)："班长们！出来！"

我们开始讨论了。决定问题的不是班长，而是全班的人。人们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去互相商量。当时我们还处于不稳定状态：虽然确实清除了几名眼线，但还有几个可疑的人，甚至可以肯定还有眼线，大胆而狡猾的汽车修理班班长米哈伊尔·格涅拉洛夫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今天为自由而绝食的罢工者，明天就有可能为了过安静的奴隶生活而分化、分裂。因此，那些领导罢工的人们（当然有这样的人）并不公开露面。他们没有脱离秘密状态，也并不公开掌权。班长们这时也拒绝负责任了。所以，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没有人领导的自发罢工，而且是听其自然发展的。

最后，不知不觉中在某个地方作出了决定，于是，我们六七个当班长的便走到工棚入口的过道处去见耐心地等在那里的劳改营长官们。（这里就是前些时候挖地道的二号工棚惩戒室的入口处，他们的地道是从离这里几米远的地方挖起的。）我们几个人挤在墙角，眼睛望着地板，像石头人似的一声不吭。我们往下看，是因为谁也不愿意再用以前那种阿谀的眼光看主人们，而如果在这时换成一副造反者的目光，则是不明智的。我们站立的样子就像被叫到学校教导处的淘气学生一样：有气无力地歪扭着身子，两手插在裤袋里，歪着头，面向一旁：无法教育，蒸不熟煮不烂，拿他毫无办法。

可是，入口两旁的走廊里这时已经挤满了人，被前面人遮住的、站在后面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大声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我们的回答和各种要求。

戴蓝边肩章的军官们（有几个熟面孔，也有几个新人）假装作只看见几个班长，只同他们说话的样子。他们讲话矜持而又克制，已不再威胁恐吓了，但也还没有完全变成同等相待的语调。他们说，复工和停止绝食似乎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如果复工，他

们不仅把今天的口粮发给我们，而且可以补发昨天的口粮。这可是古拉格群岛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事！（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饥饿的人是容易收买的！）他们根本未提惩罚二字，但也没有回答我们所提的要求，就像我们并未提出什么要求似的。

看守们站在军官两旁，都把右手插在衣袋里。

走廊里有人大声喊道：

“依法惩办开枪的罪魁祸首！”

“工棚的门不要上锁！”

“拿掉身上的号码布！”

其它工棚有人提出了对特别庭判决的案件重新进行公开审判的要求。

而我们这些班长们则像站在校长面前的顽皮学生一样，心想：他要啰嗦到什么时候呀。

主人们走开了。工棚又上了锁。

尽管饥饿严重折磨着许多人，他们的头脑已不能思维，终日昏昏沉沉，但是工棚里没有一个人说要让步，没有一个人流露出后悔的情绪。

我们在猜测，关于我们闹事的消息会传到多高的一级？内务部当然已经知道了，或者至迟今天应该知道。但是那个小胡子呢？要知道，这个屠夫可会毫不犹豫地下令把我们五千人统统枪毙呀。

傍晚，我们听到不远处传来飞机的轰鸣声，虽然这一天云层很厚，不适于飞行。大家猜想，一定是飞来一位更高级的人物。

古拉格的儿子、有经验的老囚犯尼古拉·赫列布诺夫已在劳改营呆了十九年，他一直和我们几个班相处得很好。现在他是伙房里的一名杂役。这天，他竟穿过营区大胆地从窗户给我们塞进一小口袋黍米来，足有十来公斤。我们七个班把它平分了，为了不让看守撞见，只好等到夜里才煮成粥吃。

赫列布诺夫还给我们带来一个沉重的消息：“长城”那边的第

二分部的乌克兰人没有声援我们，他们昨天和今天都若无其事地照常出工。毫无疑问，他们收到了我们隔墙扔过去的纸条，他们也会听到两天来我们这边鸦雀无声，从工地的塔式吊车上可以看到自从那天夜间枪声之后我们营区内已经两天无人走动，他们已经两天没有在野外遇到我们上下工的队伍了。知道是知道，但却没有声援！那就是说，我们不是五千人，而是只有三千人……（后来我们得知：乌克兰人的领袖们是一些年轻人，还不懂得真正的政治，他们当时认为乌克兰有自己的命运，它与所谓的“莫斯卡理”——即俄罗斯人——的命运不同。当初他们是那么热心共同事业，现在却离开我们退去了。这么说来，我们不是五千人，而只有三千人。）

第二天夜晚、第三天早晨和白天，饥饿的魔爪一直在撕裂我的肠胃。

但是，当第三天早晨人数更多的契卡工作人员来到工棚，又把班长们叫到门口去，而我们这些满心愤怨的、不可理解的、对一切都感到厌倦的人们又挤到两边走廊里的时候，我们的一致决定仍然是：不让步！我们的斗争已经产生了惯性。

主人们今天却只是给我们增添了力量，新来的一位长官是这样对我们说的：

“彼斯强特种劳改营管理局请求犯人们用饭。管理局接受你们的一切申诉。它会查清这次行政部门和犯人之间的冲突的原因并将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原因。”

是不是我们的耳朵不中用了？请求我们用饭！只字不提劳动！我们冲击了监狱、打碎了玻璃和路灯、拿着刀子追赶看守，这一切原来都不是暴动，而是平等的两方，两个平等的方面，行政部门和犯人之间的冲突！

看来，只须我们两天两夜团结一致，就足以使那些主宰我们一切的人们改变腔调！我们一生中，不仅是身入囹圄之后，甚至

身为自由人、身为工会会员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听见过主人嘴里说出这样的甜言蜜语啊！

但是，我们的人却慢慢地、不声不响地散去了。因为谁也不能在这里做出决定，甚至不能应允要做出决定。班长们也低着头走开了，虽然特别劳改点的首长叫着每个人的名字想留住我们，但我们还是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工棚又锁上了。

主人们从外面看，这些工棚仍然是沉默而绝不退让的。但在其内部，各作业班之间，正在展开一场十分激烈的讨论。诱惑力太大了！主人们和善的语气远胜于威胁，深深感动了这些质朴而从不苛求的人们。有些声音主张让步。的确也是，还能争取到什么更好的结果呢?！……

我们疲倦了！我们想吃饭！把我们的情感联结起来并使它上升到高处去的那一神秘法则现在仿佛颤抖起来，开始往下沉了。

但是，有一些几十年来紧闭着的口、生来就一直沉默或许本来要沉默到死的口，这时却张开并开始说话了。人们倾听着他们的话，当然，那些尚未被杀死的眼线也在听。这个刚刚开始发音的喉咙（在我们屋里是德米特里·帕宁），这条喉咙发声了，只说了几分钟，可是日后它却不得不为这几分钟的讲话付出重大代价：要加判刑期，要在那为自由而颤动过的喉咙上套上绞索。但是，不管怎样，这条喉咙里的声带总算第一次尽了它的天职。

现在让步？这等于凭口头保证而投降。谁的口头保证？是监狱看守的，劳改营鹰犬们的口头保证。有多少座监狱，有多少座劳改营啊！难道这里面的人曾经履行过哪怕一次诺言吗?！

多年沉积在心底的痛苦、委屈、受人戏弄的往事的沉渣一齐翻腾上来了。是啊，我们刚刚第一次走上正确的道路，难道这就退让？我们才初次感到自己是人，难道马上就要投降？仿佛一阵

爽人的、凶恶的旋风使我们打了一个寒战：必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他们还会说得更好听呢！他们还会让步！（可是，到底该在什么时候相信他们的哪一句话呢？这一点仍然不明确。被压迫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最终不可避免地要相信、要让步……）

苍鹰，我们全室二百人的情感凝集成的这只苍鹰，似乎又击翅高飞了！它又翱翔在晴空！

我们又全都躺下了。为了节省自己的力气，我们尽量减少动作，不说闲话。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要思考。

工棚里剩下的一点食物早已吃完。谁也不再煮东西吃了。屋内一片宁静，谁也不动，只有几个俯身在窗口担任观察任务的年轻人时而说一两句话：向大家报告营区内的动静。这几个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激情满怀，战胜饥饿，宁愿在刚踏进生活之门时死去，也不肯屈服。他们这种决心引起我们的爱戴和钦佩，我们羡慕他们，深感自己的头脑理解真理太迟，自己的脊梁骨已经僵化于弯曲状态了。

我想，现在可以举出其中几个年轻人的名字了：亚涅克·巴拉诺夫斯基、沃洛佳·特罗菲莫夫，还有钳工博格丹。

突然，第三天傍晚，当夕阳快要沉入地平线的时候，观察员们用遗憾的激动的声音向大家报告：

"九号工棚！九号工棚投降了！……九号的人正朝食堂走去！"

大家立即从床上跳起来。对面一排房间的人也挤到这面来。我们趴在上下层床铺上，隔着前面人的肩膀、透过窗上的铁栅栏往外看，一声不吭地看着这支队伍的可悲的行进。

二百五十个本来已经是黑暗的、在夕阳反照下显得更加黑暗的人影，排成一支可怜、驯顺、屈辱的长队，斜穿过营区朝食堂鱼贯走去。他们的身影一个个在夕阳的余辉中闪过，像是一根连结得不牢固的没有尽头的链条，像是后面的人抱怨前面的人走去，因而才无可奈何、满心不快地跟着走去似的。有一些严重衰弱的

人由别人扶着或拉着走。他们那蹒跚的身影，就像许多引路人牵着许多盲人走去一样。不少人手里拿着小锅或茶缸。拿着这可怜的劳改营餐具，是指望今天的晚餐对于已经收缩的肠胃来说将过于丰盛，吃不下去，所以要把剩下的带回来。因此，像乞丐讨饭盆一样伸到面前的小锅和茶缸使人看了尤其感到奴隶般屈辱，尤其令人痛心。

我感到眼泪夺眶而出。我擦掉它，往旁边瞟了一眼，同伴们的脸上也挂着泪水。

第九号工棚的意见是决定性的。他们那里被打死的人从星期二晚上开始已经在工棚里停尸四昼夜了。

他们向食堂走去，这就是说，为了一份口粮，为了一碗粥，我们决定宽恕那些杀人犯了。

九号工棚是个饥饿的工棚。那里的作业班都是干各种杂务劳动的，他们很少有人收到邮包。那里有许多干瘦得快死的人。也许是因为怕工棚里增加新的尸体才投降的吧？……

我们默默地离开窗户。

这时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波兰人的骄傲，懂得了他们历史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起义是怎么回事。前文提到的那个波兰人工程师尤里·文格尔斯基现在在我们班里。他的十年刑期已经到最后一年了。他平常总是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甚至在他当施工员时也从未听到他对谁高声说过话。

可是现在，他的脸突然变色了。一看见这个走去请求施舍的队伍，他愤怒地、轻蔑地、痛苦地扭过头去，挺起胸膛满腔愤恨地高声喊道：

“班长！不要叫醒我去吃晚饭，我不去！”

说着，他爬上“小车厢”躺下，转脸朝墙……再也没有起来。我们晚上也去食堂吃饭了，可他没有起来！他从来没有收到过邮包，他孤独一人，经常吃不饱，可是，他没有起来！对他来说，热

气腾腾的稀粥的影象遮不住无形的自由的高大形象！

假如我们所有的人都这么骄傲而坚强的话，世界上哪个暴君还能够维持住他的宝座呢？

*　　　*　　　*

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天。可是并没有赶我们去劳动以弥补耽误了的工作(劳改营头头们肯定在担心完不成计划)，只是给我们吃饭，发给前两天的粮食，让我们散步。大家在工棚间串来串去，互相谈着这几天是怎样度过的，总的情绪是欢乐的，似乎我们赢了，而不是输了。何况已变得温和些的主人还答应满足我们的一切合法要求呢！(但是，什么是合法的？这由谁来判断？……)

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但它预兆不祥：有一个叫瓦洛吉卡·波诺马廖夫的"母狗"逃跑到岗楼里去了。这些日子这个家伙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他听到了许多人的谈话，看到过许多人的眼神。那就是说，他是去出卖我们的，而且想留在生活区外躲过我们的刀子。

波诺马廖夫的逃跑使我彻底认清了刑事犯的本质。他们那虚假的义气，实质上不过是他们帮派内部彼此应尽的义务。而当他们被卷进革命旋涡时，他们肯定要干出卑鄙勾当。他们只能理解力量，而不可能理解任何原则。

可以预料，正在准备逮捕肇事者。但是宣布的却恰恰相反，当局宣布：已从卡拉干达、阿拉木图、莫斯科派来专人组成的委员会，要对这次事件调查处理。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营区中部摆起一排桌子，几个穿白色短大衣和毡靴的军官端坐桌旁，听取囚犯们的申诉。许多人去了。申诉了。记录下来了。

星期二早点名之后，又把班长们全召集去"提意见"。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卑鄙的新花招，是另一种方式的侦讯：他们知道犯人们憋了一肚子话，所以先让人们把话说出来，然后便可以更准

确地进行逮捕。

这是我当班长的最后一天。我身上的肿瘤近来生长很快，我一直拖下来没去动手术，总想等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一月间，特别是绝食的那些不幸的日子，肿瘤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增大。这样，它本身就替我作出了决定：现在是最合适的时刻。所以，绝食刚结束，各工棚一打开，我马上去看病，医生决定立即给我动手术。现在我就是作为班长去参加这最后一次“提意见”会的。

会场设在浴室的脱衣间，这里比较宽敞。一排理发椅子前面摆了一张长桌作为主席台，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内务部的一名上校，几名中校，还有几名下级军官，我们劳改营的长官坐在他们背后的第二排，根本不显眼。第二排还有记录人员，整个会议期间他们都在紧张地写，第一排有个人专门向记录员重复发言者的姓名。

主席台上比较突出的是特别处或是机关里来的一名中校，此人聪明伶俐、思想敏捷、善于抓住问题，是个奸诈的、干练的坏蛋。他那高高的额头、狭长的面孔和敏捷的思路，说明他远远不属于这群昏庸无能的官僚之列。

作业班长们都不愿意讲话，他们几乎是从密密麻麻的会场里被硬拉起来讲话的。每当他们开始讲到自己的“案情”，主席台上就打断他们，请他们解释：为什么这里的囚犯们要杀人？罢工的目的是什么？……假如某个倒霉的班长试图认真回答这些问题，说明杀人的原因和囚犯们有些什么要求，那么，主席台上的几个人就会一起扑向他：你怎么知道的？那就是说你也和匪徒们有联系喽？请你说说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这样“正大光明地，以完全平等的态度”来判定我们所提的要求是否“合法”的……

最经常打断囚犯班长们发言的就是那个高额头的坏蛋中校。他能言善辩，而且他与我们不同，他是处于不受惩罚的优越地位

的。他善于用一些尖刻的话打断人们的发言。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势：似乎他们在指责我们，而我们则在为自己辩护。

我禁不住怒火冲上心头，下决心要挫败他。我请求发言，报了自己的姓名（有人立即像回声一样把我的姓名向记录人员重复一遍）。我从长凳上站起来。我清楚地知道在座的囚犯中间不见得谁会比我能够更快地说出一个语法正确的完整句子。但是，我能够对主席台上这些人说些什么呢?这一点我却一点也没有想好。把我在这本书里写下的一切，把我们多年的苦役刑期中体验的和绝食中所思考过的一切全都讲给他们听吗？那与讲给大猩猩听没有什么区别。这些人仍然算是俄罗斯人，也还能听懂几个简单的俄语句子，诸如："请允许我进去!"，"请允许向您报告!"之类。但是，当他们像目前这样坐在长桌子后面，排成一排，把他们那一张张同样都没有灵魂、没有思想、喂养得白白胖胖的嘴脸陈列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就十分明显：他们早已完全蜕变成另外一种独特的生物，因而，我们和他们之间原来仅存的那一点点语言联系也就无可挽回地断绝了。剩下来的唯一联系便是子弹的联系了。

只有那个长脸高额头的家伙还没有完全变成猩猩，他能听清并听懂我的话。我刚说了几句，他就企图打断我。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之间展开了一场闪击对话比赛。

"你在哪儿劳动?"

（请问，在哪儿劳动有什么相干？还不都是一样吗?）

"在机械制造厂!"我扭头掷给他一句，立即更快地继续讲我原来要讲的话。

"就是制造刀子的那个地方吧?"他正面直接向我打来。

"不！不是。是修理步行式掘土机的地方!"我也毫不客气地旁敲侧击（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有这么清晰明快的思路）。

我迅速地、不停顿地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也是想让他们学会首先老老实实地听听别人讲话。

那个中校藏到桌后不作声了。可是，突然又从桌下跳出来咬了一口：

“是匪徒们叫你来当代表的吧？”

“不！是你们叫我来参加会的！”我也单刀直入，回敬一句，马上庆祝胜利似地继续讲自己的话。

后来这个家伙又跳出来两次，被我一一顶回之后才算完全沉默了。我胜利了。

胜利了，可是，为了什么呢？一年！我的刑期还剩一年。可这一年却压制着我，使我的舌头无法对他们说出他们应该听到的话。我本来可以在这时发表一篇不朽的演说，但是那样的话，明天我就会被枪毙。如果我的演说能够向全世界播送出来，即使明天枪毙我，我也还是会发表它的。但是，不，这里的听众太少了。

因此，我并没有向他们指出这里的劳改营是法西斯式的，它是政权蜕化变质的标志。我只限于在他们伸长的鼻子前面撒一些煤油以破坏他们的嗅觉。我认出在座的有警卫部队长官，于是我就诉说警卫人员们往苏联军人脸上抹黑的不体面行为：他们帮助偷窃建筑材料，并且态度蛮横粗暴，以至堕落成了杀人犯。我接着就描绘了劳改营的看守人员，他们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常常强迫囚犯替他们偷窃建筑材料（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不过带头人就是坐在这里主席台上的军官们）。这些人的行为对于希望得到改造的囚犯们起着多大的破坏改造的作用啊！

我自己也不喜欢我的发言。要说收获，我只是在速度上占先，赢得了一些时间。

在我争得的一片寂静中，一位姓梯的作业班长站起来了。他由于过分激动，或者是生性如此，说话慢吞吞的，有些口齿不清。他说：

“从前我同意别人的说法……说我们的生活……像狗一样……”

主席台上那个中校立即竖起了耳朵。发言者的光头很难看，他那变得残酷可怕的脸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字眼儿形容的。只听他接着说：

“可是，如今我发现，这种说法不对。”

那个机灵鬼立即又眉开眼笑了。

“我们的生活……远远不如狗！”姓梯的班长大声而有力地说，语调突然一变。在座的班长们全紧张起来了。只听他迅速地说：

“狗只是在颈套上带一个号码，我们身上有四块号码布。人们用肉喂狗，可我们吃的是鱼骨头。人们不叫狗去蹲禁闭，瞭望塔上不向狗开枪，也并不给狗判二十五年苦役！……”

现在即使再打断他也不要紧了，他已经把主要的话全说出来了。

接着，切尔诺戈罗夫站起来。他首先说明自己曾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然后发了言。还有另一个班长也要求发言。他们的发言都很勇敢而热情。主席台上的人不断重复他们的姓名。

也许他们所作的这一切将给我们带来灭亡……也许这堵可诅咒的墙只是由于他们头颅的撞击才会被摧垮。

会议以双方平局结束。

随后的几天很平静。再没有看见委员会的影子。劳改营的日子按部就班地流逝，好像什么也未曾发生过。

警卫把我送进乌克兰人分部的医院。绝食斗争之后我是第一个到这边来的囚犯，是第一个信使。预定给我作手术的外科医生扬琴科把我叫去给我检查，但是，他问的和我回答的都不是关于肿瘤的问题。他对于我的肿瘤并不在意，而我也因为遇到这样一位可靠的医生而高兴。他详细地盘问绝食斗争的情况，他的脸色由于我们共同的痛苦而显得阴沉了。

啊！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我们对同样东西的感受有多么不同啊！就拿我这肿瘤来说吧，看样子它像是瘤瘤。要是在狱外的话，

它会是个多大的打击，会带来多少痛苦和亲人们的眼泪啊！可是在这里，在这很容易身首分离、一命呜呼的地方，同样的肿瘤却仅仅成了一个可以使我暂时躺下休息几天的理由，我甚至很少想到它。

我躺在医院，同那个血腥的夜晚受伤和被打成残废的人们躺在一起。有些人被看守们打得遍体鳞伤，身上连一块可以躺下的好地方都没有。有个高个子看守打人特别狠，用铁管子打。（看，我的记忆力有多坏！怎么也想不起这个看守的姓名来。）有人已经因伤重死去了。

可是新闻却接踵而来："俄罗斯人"分部里开始镇压了。已经抓走四十人。当局担心引起新的骚乱，这次改变了作法。他们直到最后一天还是和往常一样态度和善，仿佛正在检查自己人中间究竟是谁犯了错误。只是到了计划好的那天，当各个作业班已经走出生活区大门的时候，囚犯们发现等待押送他们的卫兵比往常多两三倍。主人们设计的抓牺牲品的办法是，既使囚犯彼此不能相顾，也使他们无法利用工棚的墙和建设工地。把各班带出营区后，在经过草原尚未到达劳动工地时，警卫队长突然下令："立定！举枪！准备战斗！子弹上膛！囚犯全体坐下！我数三个数，不坐下就开枪！坐下，全坐下！"

又像去年耶稣受洗节那样，受骗的囚犯们无可奈何地被钉在大地上。这时，带队军官取出一张纸，按名单叫人名和号码，被叫的人必须马上起立，离开这无力的人群，走到警卫线外去。然后这几个骚乱者便由另一队卫兵押回去，或者是开来一辆囚车把他们运走。已清除掉发酵酶的、剩下来的人又站起来被赶去劳动了。

教育我们的人们就是这样向我们说明了：到底能不能在某个时候某件事情上相信他们。

空下来的营区里也同样往监狱里揪人。虽然前些时候的罢工被那四米高墙阻挡住，未能进入乌克兰人分部，但是"逮捕"这

只秃鹫却张开翅膀飞越高墙来到了这里，把乌克兰人一个个啄去。正是在预定给我作手术的前一天，外科医生扬琴科被逮捕入狱。

是逮捕入狱还是转押到别处去，这时已经不大容易区别了，现在主人们不像开始时那么谨慎了。有几批犯人（每批二、三十人）被押到别处去了。突然，二月十七日，开始集结一批七百人左右的解送队，而且对这批人管制特别严厉：递解犯出营门后全戴上手铐。命运的报复！乌克兰人，就是那些为了保全自己而拒绝支援俄罗斯人绝食罢工的乌克兰人，在这支队伍里比俄罗斯人还要多。命运的惩罚！

不错，在临行前不久他们也为我们失败的罢工鸣过礼炮：新建的木材加工联合企业里好几处同时发生原因不明的火灾（我确切地知道有人放火），二小时内使三百万卢布的财产化为灰烬。（哈萨克斯坦一向缺少木材，盛产石头，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联合企业却完全是用木材建筑起来的。）对那些被拉去枪毙的人们来说，这就好像是为海上强人们举行的葬礼，即按照斯堪的纳维亚的古代风俗，在焚化英雄尸体时把他的大船同时烧掉。

我躺在手术后的休养病房里。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近期来劳改营里一直乱哄哄，所以没有让任何人住院，医院里十分宁静。我住在医院工棚尽头的一间。再往前走就是停尸房，被打死的科恩菲尔德大夫的尸体已经在那里放了多日，谁也没有时间去埋他。（每日早晚两次看守来点名。他走到我的房门前就不再往前去了：为了省事，他朝着停尸房和我的房间把两手一摊，说："这里还有两个。"就把人数写在牌上。）

帕维尔·巴拉纽克这次也被编入七百人的解送队，他竟能通过各条警戒线来到我的病房同我拥抱告别。我们觉得不仅我们劳改营一处，而是普天下全在震动，到处都在受到暴风雨的冲刷。我们仿佛被飓风所抛掷。我们无法理解外界仍旧像从前一样死气沉沉、寂静无声。我们感到自己像是处在大浪的浪尖上，脚下有某

种东西正在被淹没。而假如我们有朝一日能够再见面的话，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但是，谁知道会怎么样呢。别了，我的朋友！别了，朋友们！

*　　　　*　　　　*

岁月慢慢地流逝。这是一个迟钝而令人疲惫的年头，是我在埃克巴斯图兹营的最后一年，也是“群岛”上斯大林时代的最后一年。关进监狱的人中间只有少数几个被放回来了，因为实在找不到他们的任何罪状。大多数人，我多年来真正了解而热爱的许多人，被押送走了：有的送去重新判刑；有的在档案上添上一个永远抹不掉的记号送进了隔离所（尽管本人早已成为可爱的天使）；有的送去杰兹卡兹甘矿山劳动；甚至还押走一批所谓“心理不健全的”人，包括爱诙谐的基什金，医生们把沃洛佳·格尔舒尼也塞进了这一批。

押走那些人之后，躲在“储藏室”的眼线们又一个个爬出来了。起初他们还胆怯，还瞻前顾后，但不久就放肆起来。瓦洛吉卡·波诺马廖夫这个叛徒也回到工棚来了，他本是一个普通车工，现在竟当了负责收发囚犯邮包的杂役，也就是说，不幸的犯人家属千辛万苦收集到并且寄来的一点点十分宝贵的东西，现在竟被老契卡人员马克西缅科少校交给这个惯偷去负责分发了。

现在，行动人员又可以随便把什么人叫到自己办公室去问话了。这是一个十分沉闷的春天。那些头角比较突出的人如今都急忙弯下腰去，隐藏起来。我没有再担任班长职务（这时要当班长的人又多起来了），而是在铸造车间当一个帮工。这一年的劳动很累，这也是有原因的：劳改营管理局在摧垮我们的一切希望和请求之后，作为唯一的让步，决定允许我们实行经济核算制，即我们的劳动成果不再由古拉格群岛这个永远填不满的血盆大口完全吞噬掉，而且开始计价，其中百分之四十五算作我们的劳动所得

（其余的上缴国家）。这个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七十由劳改营收缴作为劳改营维持费，用来养活警卫和军犬，维修铁丝网和强管棚，供养行动特派员、监狱看管人员、书信检查人员、教育人员——总之，那些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活下去的所有人员。尽管如此，剩下来的百分之十—三十总还是能够记到囚犯个人名下的。每到月底，虽然不能把这些钱全部换成劳改营的内部流通券，但其中一部分（如果你在此期间没有犯任何错误、没有迟到和恶劣表现，没有惹长官生气的话）是可以换成内部流通券使用的。规定的制度是：你流的血汗越多，你的所得就越接近百分之三十，而如果没有干到足够的数量，那么你的劳动成果就会全归劳改营所有，自己分文也拿不到。

而大多数人（噢，这是我们历史上的大多数，而用剥夺的办法制造出来的大多数尤其如此！）却贪婪地、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主人的这一“让步”，于是便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放到劳动上去，只想挣到一点钱可以到小卖部去买点炼乳、人造黄油、劣等糖果，或者到“营业食堂”去再买一份晚餐吃。因为完成的劳动定额是按作业班计算的，所以连那些不愿为了一块人造黄油而牺牲自己健康的人也不得不为了集体而劳动。

给营区送影片来的次数也比以前多了。这里也像所有集中营、农村和偏僻山村的情况一样，根本不把观众放在眼里，从来不事先宣布影片名称。本来嘛，喂猪的人就从来不事先通知猪往槽子里倒什么饲料。反正这些囚犯总会在拉上窗帘之前一小时就争先恐后地挤到食堂去抢占座位的，根本不考虑放映的影片值不值得这样。（可是，这些人不就是冬季那么英勇地经受过绝食斗争考验的同一些囚犯吗！？）

“面包和马戏！”*……这是一种多么古老的办法啊！我们甚至

* 罗马皇帝为取得罗马市民的支持而采取的手段。——译者注

不好意思再来重复对它的评论了……

经过多年饥饿的人希望饱餐一顿，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我们在这里饱餐的时候，我们的同伴们，那些发起斗争的，那些在一月斗争的日子里曾在工棚中高喊“绝不投降！”的人，甚至一些与任何事都毫无关系的人，如今却在某地受到审判，有些人被枪毙，有些人加判刑期后押到完全与世隔绝的隔离区去了。有些人正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关进墙上划满十字的死囚牢去“受启发”；而某个毒蛇少校会走进死囚牢笑眯眯地对你说：“噢，你是帕宁！我记得你，记得你。我们就是审理你这个案件的！嗯！我们会替你办手续的！”

办手续！这个字眼可真不坏。可以办把你送往阴曹地府的手续，也可以办关禁闭一天的手续，连发给你一条旧裤子也得办手续。到底他们打算替你办什么手续？但是，牢门又呼地一声关上，那条毒蛇莫名其妙地微笑着走开了，留下你去胡思乱想吧，你为此可以整整一个月睡不着觉，好像用自己的脑袋去撞石墙，弄不明白……

这一切只是说起来很简单。

忽然，埃克巴斯图兹营又编组了一个二十来人的解送队。这个解送队有点奇怪：召集这些人去的时候并不像往常那样匆匆忙忙，没有采取进一步的严厉措施，没有隔离，很象是叫去释放他们的，可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满刑。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受过虐待的，没有一个蹲过禁闭或惩戒班；他们都是些模范囚犯，是当局满意的人，其中包括：大胆而狡猾的汽车修理班班长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格涅拉洛夫，平常总像是大大咧咧的机床工、作业班长别洛乌索夫，工艺工程师古利佳耶夫，道貌岸然、活像一位国务活动家的莫斯科设计师赖科夫，和蔼可亲的“自己人”、生就一张油光光的大饼脸的钳工叶尼卡·米留科夫，还有一名钳工格鲁吉亚人科基·科切拉瓦，他是一个很喜欢讲道理的人，尤其

善于在群众面前维护真理。

把他们押到哪儿去呢？从这些成员来看，不像是押去惩戒营。囚犯们都对这批人说："一定是把你们送到好地方去！以后你们就不受看管了！"可是这批人中却谁也没有露出笑容。他们只是无精打采地摇摇头，继续整理自己的东西，像是连自己的东西也想扔下不带似的。全都是一副懊恼而沮丧的样子。难道他们舍不得离开这个骚乱不安的埃克巴斯图兹？他们甚至在告别的时候也语无伦次，神情极不自然。

这批人被押走了。

并不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忘掉他们。但是，三个星期之后，有人传说：那批人又被押回来了！押回来？是的。全押回来了？是的。不过他们现在住在营部工棚里，都不愿意回到自己原来的工棚。

难道这些叛徒也要罢工?!埃克巴斯图兹营的三千人罢工事件还真缺少这么一个细节呢！噢，怪不得他们当初那么不愿意走！当他们在侦查人员办公室出卖我们的朋友并且像叛徒犹大一样签署供词时，他们原指望这一切都会永远是人不知鬼不晓的。本来嘛，我们国家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的：政治告密信被认为是不容置辩的文件，而告密人的名字则是永远不会暴露的。但是，在我们这次罢工中却出现了某种必要的因素，迫使劳改营主人不得不在卡拉干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正式审讯。（是不是必须在他们的上司面前为自己开脱？）因此，便在同一天把这些家伙带去作证了。这些人聚到一起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了一下眼光，便互相认出来了，而且终于明白了：他们都是被带去在法庭上作证的。其实，到法院去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所谓的，他们并不在乎。但是，他们了解古拉格群岛战后时期的一条规定：由于临时需要而被提审的犯人，事后必须被送回原劳改营。他们怕的是这一手。不错，当局曾经答应作为例外把他们留在卡拉干达监狱！甚至还发出了一纸命令。但

是，不行，这不合手续，卡拉干达监狱拒绝收留。

这样，他们辗转旅行了三个星期，从“泽克车厢”被赶进递解站，又从递解站赶上“泽克车厢”……押解兵对他们喊叫：“坐下！”搜他们，拿走他们的东西，把他们赶进浴室，给咸鱼干吃而不给水喝……总之，也像折磨那些不讨主人喜欢的普通犯人一样折磨他们。然后，把他们押上法庭。在法庭上他们又一次看到被他们出卖的人们，他们便把这些人的棺材上的钉子进一步牢牢钉死，给他们的死囚牢又加上几把锁，使他们漫长的刑期再回到原来的起点，从头开始……完成这一切之后，又把他们经过各递解站被送了回来，并且作为已经暴露的叛徒被抛回了原来的劳改营。

他们已经没有用处。告密者也像渡船工一样，过河以后就不需要了……

表面看来，劳改营不是已经被压服了吗？不是押走了上千人吗？难道还会有人妨碍眼线们到主人办公室去汇报吗？……可是，他们却不愿意离开营部，不愿回到原来的工棚！他们“罢工”了！只有科切拉瓦一个人壮着胆子继续装出从前那副“主持正义者”的样子回到了原来的工棚，并对大家说：

“谁知道为什么把我们押走！押着我们转了好几个地方，结果又押回来了……”

但是，他的胆量只支持了一夜。第二天就跑回营部找自己人去了。

啊？那就是说，过去的一切并没有白白过去！我们的同志们并没有白白倒下或被关进监狱。劳改营里的空气已经不能再恢复到原先那种令人窒息的状态了。虽然卑鄙的勾当又有所抬头，但它的基础很不稳固。人们现在公开地在工棚里谈论政治。没有一个派工员或班长再敢踢囚犯或者向他抡拳头了。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做把刀子是很容易的，把刀子插入肋下也很容易。

我们这个小岛开始震荡了，它游离了“群岛”……

不过，这只是在埃克巴斯图兹有所感受，在卡拉干达就未必能感觉到了。而在莫斯科则几乎肯定是感觉不到的。特种劳改营体制在一处、两处、接着又在第三处开始崩溃了，但是慈父和导师对此却一无所知。当然，人们也不会向他报告这些（何况他自己向来不善于放弃任何东西。所以，只要他座下的椅子不着起火来，他就绝不会放弃苦役营）。相反地，他还计划在一九五三年进行一次大逮捕呢。（不知是否为了准备新战争？）为此，他在一九五二年扩大了特种劳改营体制。例如，埃克巴斯图兹营原来是斯捷普劳改营的分部，后来又划归彼斯强劳改营，而在一九五二年却升格为一个新成立的额尔齐斯河畔大型特种劳改营（暂称为达里拉格）的总分部了。因此，除了原有的大量奴隶主之外，又有一大批寄生虫——劳改营管理处的成员——被派到埃克巴斯图兹来，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劳动也来养活这批人。

据说，不久就会押来大批新犯人干活了。

* * *

可是，“自由”这个传染病此时却也不胫而走。在这“群岛”上还能把它藏到哪里去呢？就像当初从杜波夫卡押来的囚犯把它带给我们一样，如今我们这里的人又把它带往别处。那一年春天哈萨克斯坦所有递解站的厕所墙上都出现了用指甲划出或用小刀刻出的口号：“向埃克巴斯图兹的战士们致敬！”

第一批解走的约四十名“骚乱骨干分子”和二月那一大批人中间有二百五十名“最凶恶”的人被送到肯吉尔（杰兹卡兹甘车站，肯吉尔村，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第三分部，也是斯捷普劳改营管理局所在地。大肚子上校切切夫就在这里）。其余的埃克巴斯图兹的惩戒犯被分别送进斯捷普营的第一分部和第二分部（矿山）。

为了恐吓肯吉尔营的八千名囚犯，当局向他们宣布：新来的

这批人都是匪徒。从车站押往肯吉尔监狱的路上是戴着手铐的。我们掀起的运动就是这样作为一个被锁住的神话来到了当时还处于劳动气氛中的肯吉尔，来把它唤醒。这里此时也像一年前的埃克巴斯图兹一样，仍旧是由告密和拳头统治着的。

我们这二百五十人在监狱里一直被关到四月。这时，肯吉尔营的首长费多托夫中校认为我们已经被吓住，决定把我们带去劳动。这个营里总共有统一供应的共产党最新型号的镀镍手铐一百二十五副，两个人戴一副恰好够用（肯吉尔营之所以接受二百五十人，可能就是由手铐的数目决定的）。

囚犯们的一只手同另一个人的手一起铐住了，还有一只手可以活动。也就是说，还能活下去！这支队伍里不少人在劳改营监狱里呆过，很有经验，也有些久经考验的逃跑者（滕诺也分在这一批里），他们都十分了解手铐的特点。于是他们便向同行列的人说明：只要有一只手能够活动，用一根针，甚至连针都不用，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手铐摘掉。

队伍来到劳动地点后，看守们为了不耽搁劳动时间，便同时在队伍的各个地方开始给囚犯摘手铐。这时那些巧手们便把自己的和旁边人的手铐摘下来藏在衣襟下面。“我们的手铐刚才已经被那位看守摘去了！”看守们根本没想到要在囚犯去劳动之前先数一数手铐。囚犯进入劳动场地时是从来不搜身的。

这样，第一天出工我们就从一百二十五副手铐中拿走了二十三副！进入劳动场地后，人们用石头或锤子把它砸碎。但是很快就想出了更好的办法：把手铐用防水油纸包起来，埋到当天正在修建的房屋墙壁或地基里（当天修的是肯吉尔文化宫对面的第二十住宅段），而且油纸包里还加上一张并不含蓄的附言：“子孙后代们！这些房子是由苏联奴隶们建造的！他们戴的就是这种手铐！”

看守们气急败坏，不住地咒骂“匪徒”，往回走的时候只好找一些生了锈的旧手铐来给人们戴上。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小心，进

生活区之前又被偷去了六副。第二天和第三天又接连丢失几副。据说每副手铐的价格是九十三卢布。

结果，肯吉尔营的主人不再让囚犯戴着手铐去工地了。

你只有斗争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利！

五月间，开始把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人逐渐由监狱分到普通营区去。

现在该使肯吉尔的囚犯们开开窍了。开始，只是向他们作了一个小小的表演：从前杂役们到小铺子里买东西向来是合法地不排队的，这次人们却把一个没有排队的家伙差一点掐死。这就足以传遍全营区了：要发生新鲜事了！有戏看了！这批新人可不像我们！（也不能说在此之前杰兹卡兹甘劳改营的囚犯完全没有触动眼线。不过，那还是个别现象，没有形成潮流。一九五一年，卢德尼克监狱就曾有人抢了看守的钥匙，打开早已看准的那间牢房，杀死了眼线科兹乌斯卡斯。）

如今肯吉尔营里也建立起两个秘密"中心"，乌克兰人的和"全俄"的。为进行"屠宰"准备了一些刀子和面具。于是，故事又从头开始了。

眼线沃伊尼洛维奇在牢房窗户的铁栅栏上"上吊"了。又有两个人——一个叫别洛科佩特的班长和一个在国内战争时期当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与杜托夫的军队对峙过的、思想正统的眼线利夫希茨——被杀死了。（利夫希茨在卢德尼克劳改营分部的文教科平平安安地当了好久图书管理员，但是他的坏名声传出来了。所以他到达肯吉尔的第一天便被杀死了。）还有一个匈牙利人警备队长在浴室附近被人用斧头砍死了。这时，曾经当过苏维埃爱沙尼亚共和国部长的萨乌埃尔第一个开辟了通向"储藏室"的道路——他逃进了监狱。

不过，劳改营主人也已经知道该怎么办。在这里，四个劳改营分部之间的界墙早已修好，如今他们想把每个工棚都用墙隔起

来，八千名囚犯在业余时间又开始砌墙了。又把每个工棚都隔成了四个互不相通的单元，每个小区，每个单元都分别锁门。按他们的理想来说，把整个世界分割成个体才好呢！

看守长，肯吉尔监狱的头子，是个职业拳击家。他拿囚犯当靶子进行拳击练习。他在监狱里还发明了一种方法：垫着胶合板用锤子打人，这样可以不留伤痕。（在内务部作实际工作的人都懂得：不殴打，不打死几个，是不可能改造人的；而且任何一个讲求实际的检察官大概也都会同意这种看法。但是，说不定会遇到一位理论家呀！为了防备万一会有理论家出来，所以才垫上胶合板以免留下伤痕。）有一个西部乌克兰人由于受刑不过而又不想出卖朋友，就上吊自杀了。其他的人表现得不如他。这样，两个中心就都被破坏了。

而且在“战斗员”中间也出现一些贪得无厌的坏蛋，他们不是想看使整个运动取得成功，而是总想自己从中捞一把。他们要求人们从伙房里给他们多拿些东西来，要求人们把收到的邮包分给他们。这些情况都给这里的运动带来了损害，给运动抹了黑。

对于选择了暴力道路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我想，当年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卡莫手下的强盗们把抢来的款项交给党组织财务处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口袋大概未必全是空的。也很难相信领导这伙人的柯巴（斯大林——译者注）会不给自己留下一点喝酒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整个苏维埃俄国都禁止饮酒，但那时他在克里姆林宫里不是毫不客气地一直保存着那个酒窖吗?!

运动似乎是被制止了。但是眼线们经过这第一次演习也老实多了。肯吉尔营的整个气氛变得清净多了。

种子已种下。但是它不会立即生长起来，而且也不会长成完全相同的样子。

* * *

对我们宣讲的是：个人不能创造历史，而在个人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但是，实际上不正是那么一个人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把我们像绵羊一样任意摆布，而我们却连咩地叫一声都不敢吗?!如今人们对我们说：当时谁都什么也不了解——处于队尾的人们不了解，先锋也不了解，只有老一辈的老干部们了解，可他们却宁可选择在角落里服毒、在家里开枪自杀或者领取养老金安静地苟活下去的道路，而不肯从讲台上向我们大声说出实话。

这样，求得解放的使命就落到我们这些娃娃们身上了。这样，在埃克巴斯图兹，我们五千人便把自己的肩膀放到这沉重的拱顶下面，拼命往上一顶，总算给它造成了一条小小的裂缝。尽管裂缝很小，从远处还看不见，尽管我们自己为此受的内伤很重，但毕竟出现了裂缝，而裂缝是会扩大为缺口的。

当然，除了我们，除了特种劳改营之外，也发生过骚乱，但是那些血腥的往事已经完全被冲淡、粉饰、洗刷掉了，以至于现在想举出劳改营骚乱的大致次数都不可能。我只是偶然地得知：一九五一年库页岛上的瓦赫卢舍沃劳改营当局曾把三名被抓获的逃跑者放在岗楼前而活活地用刺刀乱刀刺死，因此引起五百名囚犯进行五昼夜绝食，造成很大骚乱，逮捕了许多人。还听说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在奥泽尔拉格的岗楼前面朝囚犯队伍开枪造成死亡之后也发生过一场大骚乱。

显然，斯大林的劳改营体制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已经面临危机，尤其是特种劳改营。甚至那位“全能的人”在世的时候劳改营的居民们就已经开始扯断自己的锁链了。

很难设想，假如他健在的话，这一切将会怎样发展下去。但是，突然，（不是按照经济规律，也不是按照社会规律）那个矮小

的麻脸的个人的血管中慢慢流动着的衰老而肮脏的血液停止流动了。

根据“先进理论”的说法，这事其实是不应该引起任何变化的。而那些戴蓝滚边帽的人三月五日那天尽管躲在岗楼里痛哭流涕，但也并没有害怕这件事。至于穿黑棉袄的人们（那一天没有放他们到营区外面去劳动），虽然在得知广播哀乐并已挂出黑边旗后把三弦琴弹得叮咚响，却也没有敢抱多大幻想。尽管如此，好象地底下还是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开始震荡、开始移动了。

不错，一九五三年三月底实行的大赦（劳改营的人把它称为“伏罗希洛夫大赦”）的基本精神仍然是完全忠于死者的思想的，即：爱护盗贼，扼杀政治犯。这个大赦追求的是刑事罪犯的支持，它把盗贼像老鼠一样撒向全国，让和平居民去受害，宁肯让自由的和平居民在自家窗户上安上铁栅栏，宁肯让警察去把从前捕过的人再重新逮捕。但对于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则严格地按照过去的比例释放：肯吉尔第二劳改分点三千名政治犯中仅仅释放了……三名！

这样的大赦只能使苦役犯们确信：斯大林之死并未改变任何东西；对政治犯过去没有宽恕过，今后也不会宽恕；如果政治犯们想在地球上活下去，必须自己斗争！

因此，一九五三年很多劳改营都发生过骚乱。乱子闹得小一点的如卡尔拉格的第十二劳改点。大一些的如戈尔拉格的起义（诺里尔斯克）。如果多少有些材料，关于诺里尔斯克的起义完全可以单独写一章，可惜我一点材料也没有。

但是，暴君的死亡也并非毫无益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隐藏在某个地方的某种东西动起来了，动起来了。忽然，仿佛有一阵空洋铁桶翻滚似的铁皮的咚咚声，于是又一个个人头朝下倒栽下来了，而且是从阶梯的最上层一直滚进了大粪坑。

现在所有的人，不管是先锋还是队尾，甚至群岛上的我们这

些绝望的居民也都明白了：一个新时期开始了。

贝利亚的倒毙在群岛上特别震撼人心：他是古拉格群岛的最高保护人和总督啊！内务部的军官感到迷惑不解、窘困难堪、手足无措。在电台已经广播，无法把这恐怖消息塞回播音器里的时候，在不得不从斯捷普劳改营管理局的墙上摘掉那个"和蔼可亲的"保护人的像片时，斯捷普拉格的首长切切夫上校颤抖着嘴唇说："全完啦！"（但是，他错了。他还以为第二天他们都要受审判呢。）[①] 军官和看守们失去了信心，甚至不知所措，这一点囚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肯吉尔营第三劳改点的头头从来没有给囚犯看见过笑脸，现在忽然来到惩戒队的劳动工地上坐下来，请囚犯们吸烟了。（他需要观察、了解一下：这个混浊的人群中有没有什么火花在闪烁？他们可能造成什么危险？）"喂，怎么搞的？你们总局的第一把手原来是个人民敌人?!"囚犯们以嘲笑的口吻问他。"是啊，可不是嘛！"这位惩戒营的军官伤心地回答。"可他是斯大林的左右手啊！这么说，连斯大林也没看出来？"正在受惩戒的囚犯咧着嘴笑。"可不是嘛……"军官也和和气气地回答。"怎么样，小伙子们，也许快要释放你们了。等等看吧……"

贝利亚不仅自己完蛋了，他还给自己的忠诚的机关留下了一个"贝利亚分子"的恶名。从前，任何犯人，任何自由人都不敢对内务部任何军官的纯洁性表示哪怕一丝一毫的怀疑，否则就有生命危险。而现在，只要给其中的某个坏蛋扣上一顶"贝利亚分子"的帽子，此人就不能再受到什么保护了！

一九五三年六月，在列奇劳改营（沃尔库塔）有两件事情巧合了：正在群众由于贝利亚的倒台而情绪激昂的时候，从卡拉干

---

① 正像克柳切夫斯基所指出的，在解放贵族（1762年2月18日关于自由的沙皇上谕）之后第二天就解放了农民（1861年2月19日），只不过是九十九年之后的第二天！

达和泰谢特押来几批骚乱分子（大部分是西部乌克兰人）。在此之前沃尔库塔的囚犯们还是奴隶般驯顺的，所以当他们看到新来的犯人个个是那么不肯妥协和敢于斗争，心里感到惊奇。

就这样，我们曾经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才走过来的道路在沃尔库塔只一个月就走过了。七月二十二日，水泥厂、二号热电站建设工地、第七号矿井、第二十九号矿井、第六号矿井全部罢工了。这些单位彼此遥遥相望，工作停止、煤矿的卷扬机的大轮子停止转动的情况互相能够看见。他们没有重犯埃克巴斯图兹营的错误：没有宣布绝食。看守人员立即全部逃出了营区，但是，“首长，还得给饭吃呀”！当局不得不每天把粮食运到囚犯的生活区，从大门里塞进去。（我想，这些家伙是由于贝利亚完蛋才变得这么好说话的，否则早就采取“断绝粮草”的战术了。）罢工的营区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建立了“革命秩序”。伙房的炊事员立即停止偷窃，因而在口粮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伙食明显地改善了。第七号矿井挂出一面红旗，第二十九号矿井朝着附近的铁路方向挂出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大照片。是啊，他们有什么别的可挂呢？……要求什么呢？……要求拿掉身上的号码，取消窗上的铁栅栏和门上的锁（可是他们并没有自己撕下号码，没有自己拆掉栅栏）。他们还要求允许通信，会见亲友，重新审查案件。

只是第一天有人对罢工者进行过劝说。然后，整整一星期谁也没有来。但是，瞭望塔上架起了机枪，各罢工营区都被警卫部队团团围住。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日子必定有不少官员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来回奔走：在新情况下怎样作才正确？这可不容易判断。一星期以后，马斯连尼科夫将军、列奇特种劳改营长官杰列维扬科将军、总检察长鲁坚科等带着大批随从（近四十人）来巡视各个营区了。这群显赫人物把囚犯全部召集到劳改营操场上开会。囚犯席地而坐，将军们站着讲话，责备囚犯们不该怠工，“不象话！”同时也立即说明囚犯的“某些要求是有道理的。”（“身上的号码

可以摘掉!”窗上的铁栅栏?——“已经下令拆除!”了。)但是，应该立即复工:“国家需要煤!”这时，第七号矿井的囚犯队伍里不知是谁从后面喊了一声:“可我们需要自由!滚你的……!”只见囚犯们从地上站起来，纷纷离去了。最后操场上只留下将军那批人。①

人们马上撕下了身上的号码，开始拆卸窗上的铁栅栏。但是，队伍已经开始分裂，士气有所低落，有人在想:是不是该适可而止?反正争取不到更多的东西。这样，夜班已经有一部分人出工，第二天早晨全都出工了。矿井的机器又转动起来。大家互相一看:人家已复工，咱们也复工吧，所有工地全开始了工作。

只有第二十九号矿井位于山后，从那里看不见别的工地。军官们对他们宣布:别处都已复工了。可是这里的人不相信，也不出工。其实，只要把他们几个代表带去其他工地看看，问题是很好解决的。但这样对待囚犯未免过分客气，有伤体面吧?!而且将军们正渴望着流血呢，他们认为:不流血就算不得什么胜利，不流血不足以教训这些畜生!

八月一日，十一辆满载士兵的大卡车来到第二十九号矿井。囚犯们被召集到大门前的空场上。大批士兵排成密集队形集结在门外。“上工去!不然我们就要采取无情手段!”

并没有说明无情手段是什么。看看这些冲锋枪吧!沉默。一片寂静。人群中有些分子开始走动了。为什么要死呢?尤其是那些刑期不长的人们……那些刑期只剩下一年半载的人开始往前走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更坚决地抢到他们前面去，站在第一排挽起手来，面对着工贼们形成了一条封锁线。群众犹疑不决。一

① 也有人说某个地方曾经揭示出这样的口号:“给我们自由!给祖国煤炭!”可不是嘛，“给我们自由!”这已经等于造反了，所以一定得赶紧加上“给祖国煤炭!”以示悔过。

名军官企图冲破这条封锁线，人们用铁条打他。杰列维扬科将军往旁边倒退几步，下了命令："开枪！"朝人群开枪。

自动步枪三次排射，还夹杂着机枪点射。六十六人被当场击毙。（被打死的是些什么人？是站在前面的人；那些最大无畏的人总是最先倒下去。这是一条普遍规律，格言里也是这么说的。）其他囚犯四散逃跑，警卫队拿着棍棒和铁条追，边打边往营区外面赶。

从八月一日至三日连续三天在各个罢工的劳改点进行了大逮捕。不过，怎么办呢？失去了保护人的机关已经有点转动不灵了，侦查工作也无法进行。于是，只好又编成押解队把这些人押到别处去，即把这"传染病"送到别处去。群岛越来越显得狭窄了。

对于留下来的人全部实行惩戒制度。

在第二十九号矿井内，白天可以看到工棚房顶上有许多用板条钉的补丁，那是修补了士兵冲锋枪留下的弹洞：有些士兵是朝人群的头顶上射击的。那是一些不愿意当杀人凶手的无名士兵。

但是，朝着活靶子开枪的人也不少。

在赫鲁晓夫时期，有人在第二十九号矿井的矸子山附近的公墓上竖起了一个高大的十字架，像电线杆那么高。后来被人推倒了。但不久又有人把它重新竖立起来。

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矗立在那里。

第十二章

肯吉尔营四十天

不过，贝利亚之死对于特种劳改营来说也还有另一种涵义：它既使政治犯产生了希望，也迷惑了他们，使之失去了方向，减轻了苦役刑的重压感。希望萌芽了：仿佛即将发生变化。因而政治苦役犯就不再愿意为了惩罚眼线而自己去蹲劳改营监狱，也不再愿意举行罢工或骚动了。仇恨已被忘却。他们指望，不必骚乱和罢工一切也都会向好的方向变化的，只须等待一时就行了。

贝利亚之死还有另一层意义：那些从来就是苏军部队中最受尊敬、最可靠的佩带蓝色肩章（但没有空军肩章上的小鸟）的人们，现在像是突然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不仅在囚犯及其亲属眼里如此（这些人倒无所谓，随他们去！），难道政府不也是这么看的吗？

正是在那不祥的一九五三年取消了（“按照星章”）发给内务部部队军官的双份工资，这就是说，他们今后也只能领取一份工资了。尽管军龄补助、极北地区工作补助和各种奖金还都依旧照领，这对他们的钱袋也是个不轻的打击，而对他们的官运前程则是更大的打击——照这样子看，今后不需要我们啦？！

正因为贝利亚完蛋了，保卫部门才感到有必要尽快地用事实

证明它本身的忠诚和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怎样证明呢？

这时，那些迄今被保卫人员看成威胁的劳改营暴动便像救命星一般闪烁起来了。多发生一些暴动吧，越乱越好，那就需要采取对策，就不会对我们裁员和减薪了。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肯吉尔特种劳改营的押解人员几次无故向囚犯开枪。这类事件接连发生，不可能是没有预谋的。[1]

一个开灰浆搅拌机的姑娘丽达到前沿地带附近去晾一双袜子，警卫立即开枪打死了她。

还开枪打伤一个中国人老头。（肯吉尔的囚犯谁都不记得这个中国人的名字。他几乎完全不会说俄语。大家都记得他那蹒跚的步态，他嘴里常叼着烟斗，面孔有点怪模怪样。是警卫士兵叫他到跟前去的，士兵把一包马合烟扔给他，正好扔在前沿地带的边缘上，中国老头俯身去拾烟时，士兵朝他开了枪。）

还有另一次类似事件。卫兵从瞭望塔上扔下几发子弹，命令一个囚犯去拾起来。犯人去拾时，士兵开枪把他打死了。

后来还发生过用达姆弹朝着从选矿厂下工回营的囚犯队伍开枪的轰动事件，使十六人受重伤。（还有二十来人隐瞒了自己的轻伤，没敢去登记，怕受到处分。）

这一次囚犯们没有忍气吞声，埃克巴斯图兹的历史在这里重演了：肯吉尔第三劳改点三天没有出工（但还照样吃饭），要求惩办肇事者。

派来一个委员会，答应依法惩办肇事者，囚犯这才同意出工。（其实，审判时囚犯能够去旁听并亲自确认吗？！……）

但是，一九五四年二月间木材加工厂又有一个人被枪杀了。肯吉尔营的囚犯都记得这个“福音派教徒”（好像是叫亚历山大·瑟

---

① 显然，劳改营的领导也在其它一些地方（例如，在诺里尔斯克）采取了同样方法，以便促进事态的发展。

索耶夫)。这人刑期十年，已经服完九年零九个月了。他的工作是涂焊条，在前沿地带附近的一个小屋里干活。当时他是要到小屋外面去小解，被卫兵从瞭望塔上开枪打死了。岗楼里立即跑下来几个卫兵，企图把死者拖到前沿地带的边上去。造成他已越出界线的样子。别的囚犯忍无可忍，抄起十字镐、铁锹等把杀人凶手们从死者身边赶开了。(在这整个过程中，行动特派员别利亚耶夫大尉骑的马一直拴在木材加工厂营区旁边。这个人左脸上有块痣，外号叫“小黑痣”，为人非常残忍、暴虐，所以，安排这一类凶杀事件非常合乎他的胃口。)

木材加工厂所在的整个营区都骚动起来了。囚犯们打算用肩膀把死者抬回劳改点去。劳改营的军官不允许抬。“为什么打死他?”——囚犯们高声质问军官。但是，统治者的答案是现成的：“怨死者自己，是他首先朝瞭望塔扔石子来着。”(他们大概没有来得及看看死者的登记卡片！他们知不知道死者的刑期只剩了三个月，而且他是个福音派教徒？……)

返回生活区的路是阴森森的，人们提心吊胆。两边雪地里埋伏着许多严阵以待的机枪手。(肯吉尔人懂得，这些机枪手都已充分作好射击准备……)警卫队驻扎的村镇的屋顶上也布置了机枪手。

这件事又是发生在曾经一次造成十六名重伤人员的第三劳改点。虽然这次只打死一个人，但人们越来越感到生命没有保障、注定死亡、毫无出路。斯大林死去已经快一年了，可是他的鹰犬却丝毫不见收敛。而且，总的说来什么也没有改变。

天黑了，晚饭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单元的电灯突然熄灭了，这时不知是谁站在门口对屋里大声说：“弟兄们，咱们在劳动，在建设，可得到的报酬是吃枪子儿，这要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儿？明天我们不出工啦！”就这样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工棚一个工棚地传下去了。

给隔壁的第二劳改点隔墙扔过去一张纸条。在这方面已经有

些经验，过去也多次考虑过这种作法，所以那里也立即宣布了罢工。第二劳改点里关押的是各种民族的人，大部分人刑期十年，许多人即将满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采取了一致行动。

第二天早晨，关押男囚犯的第二和第三劳改点的人全没有出工。

罢工，但却不放弃公家发给的一份粗劣的口粮，这种作法越来越为更多的囚犯所理解，但统治者却越来越不理解了。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大批不带武器的看守和警卫士兵涌进罢工的劳改点，涌进工棚，两个人架一名囚犯，连推带拉地把囚犯赶出工棚去。（这种作法岂不是过于人道了吗？！对窃贼们倒可以这样照顾，但对人民敌人总不能这样呀！然而，在贝利亚被枪决之后没有一个将军或上校敢于命令机枪手向营区扫射了。）主人们的这种"劳动"是白费力气：被推出的囚犯或者上厕所去，或者在生活区内闲逛，就是不到派工地点去。

人们这样坚持了两天。

应该惩办那个枪杀福音派教徒的警卫，这难道不是十分简单的道理吗？然而在统治者眼里这道理既不简单，也不正确。倒是在罢工的第二天深夜，一个从卡拉干达来的、带着大批随员的、因而对自身安全确有把握的上校来到各个工棚叫人了。他粗鲁无礼地叫醒所有的人，口里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你们耍无赖耍到什么时候？"[1]他谁也不认识，却用手随便指指这个人说："你，出去！"再指指另一个人说："你，出去！""你也出去！"这位勇敢而坚定的长官就是这样把一些碰巧被点中的人送进了监狱，他认为这是对"耍无赖"的最合理的答复。一个叫维尔·罗森贝格的拉脱维

---

① 自从1953年6月柏林骚乱之后，官方语言中非常喜欢用"耍无赖"这个词。如果是比利时某地的普通职工在争取大幅度提高工资，那就是"人民群众的义愤"，而如果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想争取一块黑面包，这就叫作"耍无赖"了。

亚人看到这种毫无理性的迫害，便对上校说："那么，我也去！"上校却欣然同意："去吧！"他甚至没懂这是一种抗议形式。本来嘛，在他看来，这里有什么值得抗议的呢！?

当夜还宣布了伙食方面的民主制的结束：从第二天起，对不出工的人将只按受惩戒者的份额发给口粮。第二劳改点的人次日上午便出工了。第三劳改点上午仍然坚持罢工。于是对他们再次采取"推拉战术"，并且这次加强了力量：把当时在肯吉尔服役和到肯吉尔来协助工作以及随委员会一起来的军官们全动员来了。大批军官涌入指定的工棚，有的头上还戴着高级军官的无檐羊皮高帽，肩上的肩章闪闪发光。他们挤进屋里，在"小车厢"之间弯下腰来，不惜穿着自己那干干净净的裤子直接坐到囚犯们肮脏的、用刨花填起来的枕头上，一边说："喂，你往那边挪挪！看不见吗，我是中校！"边说边挤，不住地移动位置，一直把床上的囚犯挤到床间的通道上。这时看守们就抓住衣袖把人推到外面的派工地点去。而那些坚决不去的人则被送进监狱。(可惜肯吉尔营的两座监狱收容量有限，束缚了指挥部的手脚。那里只能收容五百人左右。)

军官们总算用这种不顾体面和特权的办法把罢工压下去了。他们被迫作出这种牺牲是因为那正是一个叫人捉摸不定的时期：既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可犯了错误又很危险！如果过分卖力气而向群众开枪，过后很可能被说成贝利亚的帮凶。但如果不卖力气，不能坚决地迫使囚犯上工，那也可能被说成贝利亚的帮凶。[①]*而且，内务部军官们这样大规模亲自出马镇压罢工乃是一件空前绝

---

① 例如，切切夫上校就没有经受住这种难题的考验。二月事件之后他去休假，此后便不知去向了。后来，我们发现他住在卡拉干达，靠领取特定养老金生活。我们也不知道他的上司　　奥泽尔拉格的首长叶夫斯季格涅耶夫上校什么时候离开该营的。这位"卓越的领导人……谦虚的同志"后来当上了布拉茨克水电站的副站长。(但在叶甫图申科的诗里可没有提到他的这段经历)

* 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曾写过关于布拉茨克水电站的叙事诗。——译者注

后的事，但是他们却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肩章对于维护神圣的秩序确有必要（人员不能裁减！），也证明了他们每个人的个人英勇品质。

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从前行之有效的其它办法。三四月间把几批囚犯转押到其它特种营去。（结果是使传染病又扩散了！）大约七十人（包括滕诺）被送进了特别严厉的监狱。发送犯人的公函上写的都是固定的“由头”：“对该犯已采取各种改造措施，收效甚微。鉴于该犯对他犯有腐蚀作用，不宜在劳改营羁押。”劳改营里公布了被送进特别严厉监狱的囚犯名单，“以儆效尤”。同时，作为劳改营的某种“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所谓经济核算制；而为了使这个办法能够取代囚犯所要求的自由和正义，便给一向缺乏物资的劳改营小卖部运来了各种食品，甚至（啊，这简直叫人不敢相信！）允许囚犯预支工资去购买这些食物。（古拉格当局竟然信任它的群岛上的居民并借债给他们！真是咄咄怪事！）

就这样，第二次在肯吉尔积聚起来的力量终于未趋成熟就被扼杀在襁褓中了。

但是，统治者却做过分了：他们又重新乞灵于手中的主要大棒——刑事犯，利用他们对付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可真是的！既然有这些社会亲近分子可用，何必弄脏自己的手和肩章呢?!）

五一节前夕，统治者把六百五十名惯犯和部分普通刑事犯（包括许多青少年犯）押进骚乱过的第三劳改点，掺杂到政治犯中间。也就是说，主子们自己放弃了“特种”劳改营的原则，承认不应该把清一色的政治犯押在一起而使他们认识自己，而必须掺沙子。事先主人们幸灾乐祸地警告犯第五十八条的犯人说：“很快就要来一批健康力量，往后你们不能乱说乱动！”同时号召那些新窃贼们：“你们要把这里的秩序整顿一下！”

统治者清楚地知道整顿秩序应该从何处着手。那就是让小偷们去偷，去靠别人养活自己，这样来制造一个互相猜疑、人心离

散的局面。而当这批窃贼、流氓得知附近还有个妇女劳改点时，更是丑态百出了，他们向主子们苦苦哀求："好首长！让咱们瞧瞧那些个娘儿们吧！"对此，首长们只是友好地会心微笑，他们也只有对偷儿流氓们才会这样笑。

可是，请看下去吧，看看人类情感和社会运动的发展进程有多么不可预料！统治者给肯吉尔营第三劳改点注入了这么大剂量的高效尸毒，指望这样能使劳改点变得驯服些。但事与愿违，其结果却是促成了古拉格群岛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暴乱！

*　　　*　　　*

古拉格群岛的各个岛屿不管被多少围墙围起来，不管它们多么分散，但它们还是由许多递解站联系在一起的，各岛仍然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体验着共同的感情。因此，关于特种劳改营里发生的"屠宰"眼线、绝食、罢工、骚乱等等，小偷们也不可能毫无了解。据说，到了一九五四年左右各个递解站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小偷们开始尊重政治苦役犯了。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从前是什么东西妨碍了我们获得小偷的"尊重"呢？整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们这些面对客观世界一筹莫展的所谓知识分子们所操心的只是自身的世界性价值，只是自己布口袋里的东西和还没有被人抢走的皮靴和长裤；而在对待这些盗贼的态度上我们活像滑稽剧中的人物：当盗贼们抢劫我们的邻居、抢劫那些和我们相同的"具有世界性价值的"知识分子时，我们便羞答答地转过脸去，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而当这些劣等人们转身抢劫我们自己时，我们自然也不会期望得到邻人的援助，只好心甘情愿地把所有东西统统送给这些败类，只要他们不咬掉我们的脑袋就行。的确，那时候我们的心全然不放在这方面，我们的情感根本没有准备应付这些事！我们绝未预料到自己会碰上这种残酷下流的敌人！我们为俄国历史的曲折而痛

苦。我们是准备献出生命的，但我们所准备的是在整个世界的注视下公开地、轰轰烈烈地献出生命，而且这一死还要能一下子解救全人类才行。也许我们的头脑本应该考虑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吧。也许从迈进头一个递解站的囚室时起，我们就应该有思想准备吧：我们应该准备同这些鼠人们进行一场令人厌恶的决斗。是戴蓝滚边帽的先生们把我们扔给这些鼠人咬死的。我们那时就该准备在斗殴中肋下挨上几刀，倒毙在阴冷潮湿的角落，躺在马桶溢出的黏液中。如果当时有了这种精神准备，也许我们受的损失会小得多，也许我们会更早地振作起来，站得更高，甚至说不定会同这些窃贼们携起手来共同把斯大林的劳改营砸个粉碎吧！话说回来，这些小偷到底为什么开始尊重我们了呢？……

事情是这样的：转押到肯吉尔营的这些流氓小偷原来对于政治苦役犯们的战斗精神已经略有所闻，而且已经有所戒备了。他们到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摸清环境并同劳改营长官黏结到一起，就有一些膀阔腰圆、坚定沉着的小伙子们来找他们的头目们谈天了。小伙子们坐下来，同流氓头目们聊聊生活，并且对他们说："我们是代表。关于特种劳改营进行的'屠宰'，大概你们也听说了。如果没听说过，我们这就可以讲给你们听：我们现在制造的刀子并不比你们的差。你们是六百人，我们有二千六百人。你们考虑一下，自己选择吧。如果你们要压我们，我们就把你们全宰了。"

这一步棋走得高明！早该走这一步！也就是说，掉转身来与刑事犯们针锋相对，把他们看作主要敌人！

当然，戴蓝箍帽的人们正盼着囚犯们打群架。但是，刑事犯们权衡的结果，认为他们一个人未必对付得了四个胆大无畏的政治犯。没有便宜可占！他们的庇护人毕竟都住在生活区之外，何况，这些庇护人果真靠得住吗？难道小偷们过去尊重过这些看守和军官吗？而年轻的政治犯们提议的联盟倒是一项过去没有尝试过的颇有意思的冒险，何况还可以打开一条道路——一条通向隔

壁妇女劳改区的道路呢。

于是，刑事犯回答说：

“不，我们也聪明起来啦！我们要和你们这些男子汉们一起干！”

这次代表会议并没有载入史册，会议参加者的名字也没有载入记录。真可惜。这些小伙子们实在聪明。

健康力量刚刚来到隔离工棚就庆祝了自己的“乔迁之喜”：他们拆掉床头柜和“小车厢”上的木棍，在水泥地上点起了篝火，让浓烟从窗户冒出去。为了表示反对夜间给工棚上锁，他们用锯末堵塞了锁眼。

头两个星期，小偷们简直像住进疗养院一样：他们来到工地上就去晒太阳，根本不劳动，劳改营当局自然是不会减发他们的口粮的，可是，尽管满心想帮助他们，却也无法给他们发工资，因为没有这笔款项可以开支。虽然如此，小偷们手里还是出现了内部流通券，他们也常去小卖部买东西。主子们高兴了，以为这些健康力量终于开始偷窃了。其实，这是消息不灵的首长自己想错了。这是政治犯自己募集了一些内部流通券资助小偷们的。（看样子这也构成协议的部分内容，否则小偷们会觉得没意思。）这就是他们的内部流通券的来源。这种情况是从未有过的，因此主子们连想也没想到！

大概是这种不寻常的新鲜游戏引起了刑事犯的，特别是其中青少年犯的极大兴趣吧，他们突然对从前认为是“法西斯分子”的人讲究起礼貌来了：不经允许从不走进政治犯的屋子；不经让座，绝不径直往床上坐。

十九世纪时，巴黎市曾经把刑事犯编成近卫军（看样子当时巴黎市刑事犯的数目确实惊人），称他们为“好动分子”。这个名称取得十分恰当。他们的确好动，一心要冲破因循守旧的日常生活的外

壳，绝不甘心被禁闭在这种生活中。双方达成的协议规定不许偷窃。拼命替公家劳动吗？这在他们眼里是不道德的。可是，总得找点营生干呀?！于是这些年轻人便只好这样来消遣了：他们从看守们头上摘去制帽，晚点名时窜到工棚屋顶上去表演骑术，越过高墙从第三劳改点进入第二劳改点，扰乱队伍报数，吹口哨，起哄，夜间恐吓瞭望塔上的哨兵……要不是中间隔着一个由武装人员守卫的总务科大院的话，他们早就跑到更远处的妇女劳改点去了。

有时候惩戒室的军官或者教育员或行动特派员来到刑事犯的工棚，同他们友善地聊聊天，可是年轻的盗窃犯们却常常伤害他们这种高雅感情：趁着聊天的时候偷走他们衣袋里的记事本、钱包、或者就从上层铺上突然把监狱"教父"的帽子转过来，帽檐朝后。这种现象是古拉格群岛上从未见过的！（整个局面也完全和从前不一样了。）其实，这些小偷向来就把古拉格的"教父"们看成傻瓜。"教父"们越是顽固地相信思想改造的成就，小偷们就越是看不起他们。当小偷们登上讲台面对扩音器介绍自己决心改造时，谈推着手推车开始新生活的感想时，内心里对"教父"的蔑视达到了极点。不过，从前他们没有必要同"教父"闹翻。而现在，同政治犯达成的协议恰好把解放出来的小偷们的活动能量引向了反对劳改营主子的斗争。

行政管理能力十分低劣、缺乏人类高尚情操的、古拉格群岛的主子，先是无理枪杀囚犯，然后又把流氓这种"燃料"注入了肯吉尔白热化的空气。这样，他们自己就为肯吉尔的爆炸创造了条件。

事件的发展带有不可避免性。政治犯不可能不向窃贼提出或者开战或者联合的建议。窃贼们也不可能拒绝联合。而联合一旦建立，它就不可能停滞不前，否则便会分裂，会打内战。

必须开始有所行动，不管干什么，总要开个头！开头的如果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他就会被绞死；如果是小偷，他只会被政

治指导员找去教训一通。因此，小偷们提议："我们来打头阵，你们支援！"

这里应该先把肯吉尔特种劳改营分部的区划交待一下。整个劳改营分部的隔离区是一大块长方形的地段，这个大营区内又用几堵纵向的高墙分割为几个小营区，次序是第一劳改点（关押女囚犯），总务科大院（关于这个大院的工业生产能力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接下去是第二劳改点、第三劳改点，然后便是劳改营的监狱，监狱包接新旧两座，里面不仅关押劳改营的犯人，也关押村镇上的自由居民。

第一个目标当然是夺取总务科大院，因为劳改营的几个粮食仓库都在这里。选定开始行动的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六日，这是个休息的"大礼拜"。首先，全体好动分子爬上各自工棚的屋顶，再分布到第二与第三劳改点之间的墙头上。然后，按照站在高处的头目的口令，大家一齐拿着木棒跳到第二劳改点的院子里，站好队伍，以列队队形沿营区正中的道路前进。这条路的尽头就是通向总务科大院的铁门。队伍在铁门前停住了。

这些公开行动占去了一些时间。这时看守人员已经发觉，并且组织了力量，接到了指示。瞧，有趣吧！看守们竟然朝着关押第五十八条囚犯的工棚跑去，并且向这些三十五年来一直被看作最坏的家伙并受到压迫和践踏的人们发出了号召："小伙子们！你们看！流氓小偷们去冲妇女营区啦！他们要去强奸咱们的老婆和女儿！你们快快去救援吧！把他们打回去！"但是，双方已达成协议了，因此他们只管动员，谁也不动。个别不了解情况的人刚要往外跑，便被别人制止了。政治犯们也明白：公猫看到肉饼时也有可能坚守不住协议条款。但是，看守们还是未能从第五十八条囚犯中找到一个帮忙的人。

至于看守们自已要怎样去保卫妇女不受这些宠儿侵犯，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们必须首先保卫的是总务科大院的粮食仓库。

大铁门被砸开了，大院里一排徒手士兵迎住了进攻者，站在后面指挥的是“小黑痣”别利亚耶夫大尉。他为什么星期日还在营区？也许是太积极，也许就是恰巧他值班。士兵们往外推挤“好动分子”，冲散了他们的队形。小偷们没有使用手里的木棒，开始向后面的第三劳改点撤退，往墙头上爬，而他们的后备军这时则从墙上用石头和土坯打退士兵，掩护退却。

不用说，事后没有逮捕任何一个小偷。劳改营当局把这一切只看作好动的年轻人的胡闹，也就让这个星期天平安地过去了。午饭照开。夜幕降临之后，在第二劳改点的食堂附近，就像夏季影院一样，开始放映影片《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

但是，影片里的勇敢的音乐家还没有为抗议对自由的迫害而从音乐学院辞职，劳改营区内的路灯就发出了清脆的破碎声——“好动分子”们用弹弓把路灯一个个全打碎了，营区院内顿时黑下来。许多“好动分子”在第二劳改点的黑院子里窜来窜去，土匪们响亮的口哨声刺破夜空。他们用大原木撞开总务科大院的大门，一拥而入，又用那里的钢轨在墙壁上凿通了一个通往女劳改点的缺口。(有些犯第五十八条的年轻人也同他们一起干。)

瞭望塔上打出了战斗用的照明弹。又是那个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大尉经过岗楼带领一排冲锋枪手从外面冲进总务科大院，并且(在古拉格历史上破天荒地!)朝着他们的社会亲近分子们开枪了！当场即有几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冲锋枪手后面是戴红肩章的士兵拿着刺刀在追赶，赶上负伤者便用刺刀猛刺！紧跟在士兵后面的是手持铁棒的看守们，他们根据讨伐工作的分工，沿用在埃克巴斯图兹、诺里尔斯克和沃尔库塔各地采取过的办法，赶上负伤者便用铁棒打死。(那天夜里第二劳改点的医院手术室里灯

---

* 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1844—1908)，俄国作曲家，在音乐理论方面有很大贡献。——译者注

光明亮，外科医生福斯特在动手术，他是西班牙人，也是囚犯。）

总务科完全被讨伐者占领了，大院内配备了几挺机枪。第二劳改点的人们（“好动分子”们演完了序幕，现在政治犯登场了）在总务科大门对面构筑起一条壁垒，把第二、第三劳改点之间的墙打开一道豁口，连成一片。看守和内务部的权力在这里已不复存在。

但是，那些已经冲进女囚劳改点并被截断在那里的人们后来怎么样了呢？事态的发展立即转变了刑事犯们过去对娘儿们所持的轻视态度。当总务科大院响起机枪声时，那些逃到妇女们这里来的人已经不再是贪欲的猎取者，而是命运与共的难友了。妇女们把他们全都隐藏起来。先是徒手士兵，接着又是武装士兵进来搜查、抓人，但妇女们不让搜查，同士兵们扭打。士兵们用拳头和枪托殴打妇女，把她们拖往监狱（妇女劳改点内部也颇有预见地设了一处单独的监狱），一发现男囚犯就开枪打死。

指挥部仍然感到讨伐队力量不足，迅速把驻扎在肯吉尔的一营戴黑肩章的建筑工程兵也调到妇女劳改点来了。但是工程兵却拒绝执行这不是士兵应该完成的任务！只好再把他们调回去。

不过，也正是在这里，在妇女营区内，讨伐者们才找到了可以在上司面前为自己辩护的主要政治借口。他们并不是傻瓜！不知他们在什么书上看到过，还是真的自己想出来的，反正第二天，星期一，他们把几名摄影师和两三个换上囚服的自己人，彪形大汉，带进了妇女营区。这几个冒充的败类一进来便胡乱拉扯女人，摄影师们立即抢镜头拍照。看吧，别利亚耶夫大尉就是为了保护软弱的妇女们不受这些坏蛋的蹂躏才不得不开枪的呀！

星期一早晨，壁垒和总务科大院被砸坏的铁门上空的紧张空气变得越来越浓。大院里还躺着几具没人收拾的尸体，机枪手们伏在机枪后面，枪口对准大门，严阵以待。在两个争得了解放的男营区内，人们忙着拆下床上的木棍做武器，用木板和床垫做盾

牌。囚犯们隔着壁垒向刽子手们喊叫，刽子手们也对着喊。局势很不稳定，事态必定要向前发展。壁垒内的囚犯甚至打算首先发起冲锋。几个消瘦得快死的人脱下衬衫，登上壁垒，指着自己瘦骨嶙峋的胸膛和根根肋骨，对着机枪手们喊："喂！冲这儿开枪吧！快冲你老子们开枪！早些打死我吧！"

突然，一个士兵拿着一张纸朝总务科大院里的军官跑去。军官马上下令把院里的尸体收拾掉，佩红肩章的士兵随即撤出了大院。

大约五分钟，沉默和不信任笼罩在壁垒上空。然后，几个囚犯小心翼翼地朝总务科大院望了望：里面空荡荡的，地上扔着一些死者丢掉的、缝着号码布的黑色便帽。

（事后我们得知，是哈萨克斯坦内务部长下令军队清理总务科院内尸体并立即撤离那里的。他刚刚从阿拉木图乘飞机来。尸体拉到草原上去埋掉了，以防将来有人提出进行验尸。）

响起了一片欢呼胜利的"乌拉！"声。人们涌进总务科大院，接着又涌进妇女营区。墙上的豁口加大了。女营区的监狱也打开了。几个劳改点连成了一片！主营区内部全都自由了，唯有第四劳改点监狱仍然是监狱。

所有瞭望塔上现在都是四人一组的佩红肩章的士兵在警戒。这些人就只好扮演受辱挨骂的角色了！囚犯们集拢起来面向瞭望塔大声喊叫（自然，妇女们叫得最凶）："你们比法西斯还坏！……你们是吸血鬼！……杀人犯！……"

当然，劳改犯中也能找到牧师，而且不止一个。停尸房里已经在为被打死或因伤致死的人们举行追悼仪式了。

这时充满八千名囚犯胸膛的该是一种什么感受呢?！这八千人，他们过去一直是，甚至刚才还是互相隔绝的奴隶，现在却团结起来争得了解放，尽管这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它仅限于这四面围墙中间的一块长方形地带，而且处在四人一组的红肩章武装士

兵的严密监视之下。记得在埃克巴斯图兹营的那一次吧，当时忍饥挨饿躺在反锁着的工棚里，就好像觉得自己已经接触到了自由！今天呢，这简直像是革命了！曾经遭到无情压抑的人间友谊，如今一下子迸发出来了！我们喜爱这些流氓小偷，他们也喜爱我们！（是啊，何必隐瞒呢，这是用鲜血凝结的友谊。况且，要知道，他们此时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来那套规范！）当然，我们也更喜爱这些妇女们，她们又像人类应有的那样同我们并肩站在一起了，她们是与我们共命运的姊妹！

食堂里贴出了大标语："拿起任何武器，向军队进攻！"某些最性急的人已经用黑字或彩色字在旧报纸上（这里没有别的纸张）匆忙地写出了自己的标语口号："哥儿们，狠揍契卡人员！""处死眼线！处死契卡的走狗！"在各个劳改点，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在举行群众大会，人们争相发言！发言人都提出各自的意见！你自己考虑吧（现在允许你思考了！），你赞成谁的主张？应该提出什么要求？我们想要什么？判处别利亚耶夫？当然！判处杀人凶手？对！还有呢？不再锁工棚！取消号码布！还有呢？……

还有……还有就是那个最可怕的问题了：我们为什么开始这个行动？我们想要什么？当然，我们想要自由，就是自由！但是谁会给我们自由呢？那些判我们罪的法院在莫斯科呀！当我们暂时还只是对于斯锁普劳改营当局不满，或者只对卡拉干达当局不满的时候，人们还会拿我们当个谈话的对象。但是，一旦我们说出对莫斯科不满……那就会把我们全都埋葬在这草原上了。

既然如此，我们想要什么？拆掉这些墙吗？向草原四散逃跑吗？……

自由的时刻到来了！沉重的枷锁已从肩上和手上脱落！不，反正义无返顾！只要能过上今天这样一天也值得！

星期一傍晚，当局派来的代表团来到了怒涛汹涌的劳改营。代表们都十分友善，根本不是虎视眈眈的，也没有带冲锋枪。本来

嘛，这还用说?!他们可不是两手沾满鲜血的贝利亚的帮凶!我们得知：从莫斯科飞来两位将军——劳改营总管理局的博奇科夫和副总检察长瓦维洛夫。(他们也在贝利亚手下干过。不过，何必翻老账呢?!)他们认为我们的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连我们自己都不胜惊讶：正当合理?这么说，我们不是暴乱分子啦?不，不，完全正当合理!)“对开枪杀人的人一定要追究法律责任!”“他们为什么毒打妇女?”“毒打妇女?”代表团员表示惊讶，“这不可能。”于是阿尼娅·米哈列维奇立即把一长排遭受毒打的妇女带到代表团跟前来。代表们深为震动，连连说：“我们一定查清，一定查清!”“衣冠禽兽!”柳芭·别尔沙德斯卡娅对将军叫喊。“不要再锁工棚!”又有人喊。“决定以后不锁了。”“拿掉号码!”“号码一定要拿掉。”一位我们从未见过面(以后也不会再见面)的将军十分肯定地回答说。

“把各营区之间的豁口保留下来，不要再堵死!我们需要彼此来往!”我们的人有些得寸进尺了。“好。你们可以来往!就让这些豁口保留下来吧。”将军也同意了。

那么，弟兄们，咱们还要求什么?咱们不是胜利了吗?!我们骚乱了一天，兴高采烈，热血沸腾，我们终于胜利了!虽然我们中间也有人不住地摇头说：欺骗，欺骗!可是我们相信了，相信了那些“基本上还是好的”领导!我们相信了，也是因为只有相信才是摆脱目前处境的最简便的出路……

受压迫者除了相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一次上当受骗了，下次还得相信。再次上当受骗了，以后还得相信。

这样，星期二，五月十八日，肯吉尔各个劳改点的囚犯容忍了自己同伴们的死伤，全部出工了。

这一天上午，在我们看来一切都会平安地过去了。但是，聚集到肯吉尔来的高级将领们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种结局等于他们的失败。他们怎能认真承认囚犯有理呢!怎能认真地惩办内务

部的军人呢？他们那低能的头脑能够吸取的唯一一条教训是：各营区之间的墙壁修造得还不够坚固！那里应该进一步划出一条火力封锁地带！

就在这同一天，性急热心的首长们就把那些已经几年、几十年不曾劳动过的人动员起来参加劳动了：军官和看守们系上围裙，会干活的人操起了镘刀和铺灰板，而那些还没有轮到值勤的士兵则被叫来推车、抬筐。留在营区的残废也要来搬砖、递土坯。傍晚前就把几个豁口全已堵死，还修好了打破的路灯，而且沿着营区内部的各道墙旁边都划出了一条不许靠近的禁区，两端派有哨兵看守，给他们的命令是：越过此线者格杀勿论！

傍晚，为国家贡献出一天劳动的囚犯队伍回到营区来的时候，看守们急忙赶他们去食堂吃饭，趁他们还来不及省悟就尽快把他们锁进工棚。按照将军们的作战部署，必须赢得今天这个晚上，这个对昨天的诺言过于明目张胆地背信弃义的第一个夜晚。同时，他们也指望我们会逐渐地习惯，逐渐就范。

但是，在夜幕即将降落的时候又听到了星期日曾经听到过的那种响亮的土匪口哨声，这是第二和第三营区在用口哨交换信息，就像在大规模流氓集会上那样。(这些哨声是刑事犯们对共同事业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看守们为这哨声所震动，没等尽完自己的职责就逃之夭夭了。只有一名军官——军需上尉梅德维若诺克——稍有疏忽，为了工作耽误了一会儿。结果他不得不当一夜俘虏。

营区再度属于囚犯。但现在囚犯们已经又被大墙隔开了。只要有人敢靠近内墙，瞭望塔上立即用机枪扫射。打倒了几个人，有些人受伤。路灯又全被弹弓打碎，但是岗楼上打起了照明弹。这时，被扣在第二劳改点的总务科军需官有用了：人们扯掉了他的一个肩章，把他绑在一张桌子上，推向禁区的前沿。他拼命地朝自己人哀号："别开枪，我在这儿！我是梅德维若诺克！我在这儿，

不要开枪！”

因犯们用长条桌子撞击铁丝网，撞击禁区刚刚埋下的柱子。但在机枪火力压制下既无法把墙打破，也无法爬上墙去。不行，必须挖地道。可是，按照规定，营区内除了几把消防铁锹之外没有铁锹。只好利用伙房的菜刀和汤盆。

五月十八日夜至十九日黎明之前，几道墙下全被地道打通了，几个营区和总务科大院又连成一片。这时瞭望塔上已停止射击。总务科大院里各种工具应有尽有。那些戴肩章的泥瓦匠们一整天完成的工作如今完全白费：在夜色掩护下囚犯们拆除了禁区障碍，打通了墙壁，大大展宽了豁口，免得它们再成为陷阱（后来甚至加宽到二十来米）。

这天夜里还打通了通往第四劳改点（监狱）的墙。监狱的看守人员有的逃入岗楼，有的跑上瞭望塔（卫兵给他们放下梯子来）。囚犯们捣毁了几个侦查室。这样，他们既解放了监狱，也解放了那些明天即将负起起义领导重任的人们：原红军上校团长卡皮通·库兹涅佐夫（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年纪已经不小，战后曾在驻德国部队任团长，因为他的团里有一个人逃往西方，他为此被判刑。他被关进劳改营监狱是因为他在托自由居民寄出的信里“对劳改营的现实进行了歪曲和诬蔑”）。还有一位原红军上尉格列布·斯鲁钦科夫（据某些人说，他曾被德国人俘虏，还是个弗拉索夫分子）。

“新”监狱里还关押着肯吉尔镇自由居民中的一些普通刑事犯。起初，他们以为是国内发生了全面革命，所以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意想不到的自由。但很快就了解到这革命原来只是局部性质的，于是便又安分守己地回到石头牢房里去，而且在整个起义期间，在没有警卫看管的情况下，一直老老实实呆在里面，只在吃饭时才到暴动囚犯们的食堂去。

暴动囚犯！可他们已经有三次竭力从自己身旁推开这种暴动

和这种自由了。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天赐之物，他们与其说渴望暴动与自由，毋宁说有些害怕它。但是，就像被无法抗拒的海潮所冲击一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冲向一场暴动。

他们该怎么办？相信诺言？那将是再度受骗，这一点已经由奴隶主们昨天以及从前的行径充分证实了。屈膝跪倒？可许多年来他们就是一直在下跪的呀，也并没有换来慈悲嘛！今天就去负荆请罪？可是今天所给予你的惩罚与经过一个月自由生活之后所给予你的惩罚将会是同样严酷的——奴隶主的法庭只知道机械地工作：既然判二十五年，那就一律判二十五年，毫无例外。

不是有人逃跑过吗！要知道，他们是为了过上哪怕仅仅一天的自由生活而逃跑的！这八千人也是一样，他们与其说是掀起了暴动，不如说是逃向了自由，尽管是短暂的自由！八千个人突然从奴隶变成了自由人，他们现在有可能生活了！久已习惯于冷酷无情的面孔变得温和了，露出了和善的微笑[①]，妇女们认出了男子汉，男人们也握住了妇女的手。那些从前只能经过巧妙安排的秘密渠道书信往来而从未见过面的人们，现在互相认识了！有些立陶宛姑娘过去是经过天主教教士隔着墙壁许婚的，现在她们看到了自己那符合宗教教规的丈夫，是神从天上把婚姻赐给她们了。各教派的信徒和有宗教信仰的人如今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集在一起祈祷而不受任何人阻挠了。分散在各营区的孤独的外国人如今互相找到自己的同胞，也在用本国语言谈论着这次奇怪的亚洲式革命。劳改营的全部储备粮食落到囚犯手中。没有人再赶你到派工地点去从事十一小时的劳动了。

囚犯们用自己的手撕掉了狗牌般的号码布，激动得彻夜不眠的劳改营迎来了五月十九日的黎明。路灯被打碎，电线杆倒在铁丝网上。现在，囚犯们可以顺着地沟自由地从一个营区到另一个

---

① 这是对于此次事件深感不满的马克耶夫所看到的。

营区去。许多人从储藏室取出自己从前在狱外穿的衣服穿上，个别小伙子戴起了高加索式的毛皮高帽或库班人的平顶小帽，低低地、俏皮地压在眉梢上。(很快就出现了绣花衬衣，亚洲人还穿起色彩鲜艳的长袍，缠起头巾。过去一片灰黑色的劳改营变得绚丽多彩。)

值日人员到各个工棚招呼人们到大食堂去选举“委员会”——与当局进行谈判和实行自治的委员会(它就是取了这样一个谦虚而谨慎的名称)。

选举这个委员会的时候，人们也许是只指望它能工作几个小时的，但是，命运注定它将在长达四十天的时间里在肯吉尔特种劳改营分部发挥政府的作用。

* * *

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两年前，那么，单单是由于害怕此事被那个人本人知道，斯捷普特种劳改营的主子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即下达那个有名的命令：“不必吝惜子弹！”于是便会从各个瞭望塔上一齐朝着整个营区的人群开枪。至于这会把八千人统统打死，还是只会打死四千，那是无所谓的，他们的心绝不会为此颤动一下，他们是那种从不发抖的人嘛！

但是，一九五四年当时的复杂形势迫使劳改营主子们犹豫不决。同一个瓦维洛夫和同一个博奇科夫如今在莫斯科已经感觉到某种新潮流的到来。这里已经枪杀过不少人，现在正为此寻找开脱的理由，以便使这已经干下的勾当具有某种合法外衣。这样，他们就难免犹豫不决，从而也就给了暴动者们时间，使他们可以开始独立的新生活。

最初几个小时，首先需要确定这次暴动的政治路线。这关系到暴动本身是否要继续下去。有些人怀着朴素的感情挂出了写在旧报纸上的口号：“哥儿们，狠揍契卡人员！”那么，暴动是否应

该跟着这类口号走呢？

刚刚走出监狱的卡皮通·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由于形势的压力，或者由于他的军人作风，或者是在朋友们的敦促和自己内心的召唤下，看来马上就站到了为数不多的、但在肯吉尔营里久经磨练的正统派分于一边，采取了他们的观点："要坚决制止这些胡言乱语（指挂出的口号），要坚决制止某些人想利用我们这次事件的企图，制止他们的反苏维埃的和反革命的情绪！"（这里引用的话是根据委员会的另一成员阿·弗·马克耶夫的谈话记录。谈话是小范围的，在彼得·阿科耶夫的储藏室里进行的。当时，正统派不住点头并对库兹涅佐夫说："就为了这些口号我们都得加判刑期！"）

当晚的最初几个小时库兹涅佐夫便开始到各个工棚去声嘶力竭地进行游说。但是，就在这最初时刻，以及在第二天早晨的食堂大会上和后来的许多场合，他都遇到了抵制。那些被践踏得再无法忍受、感到自己已经无可丢失的人们在倾诉他们的怨恨，尽情抒发极端情绪。但是这位上校却不厌其烦地、不知疲倦地重复自己的观点：

"反对苏维埃就意味着我们的灭亡。如果我们现在提出反对苏维埃的口号，我们会立即遭到镇压。他们正在找镇压的借口呢！这类口号会给他们提供开枪的充分理由。只有在合法斗争中我们才能得救。我们应该像苏维埃公民们所应当做的那样同莫斯科派来的代表们对话！"

然后他又大声喊着说："我们不能容许个别挑拨分子的这类行为！"（不过，当库兹涅佐夫发表这些演说的时候，人们正在"小车厢"里热烈地接吻，没怎么留心听他的话。）

这就好像一个人坐在火车上，火车朝着他不想去的方向奔驰。他决心从车上跳下来，但这时他必须朝着车行方向往下跳，而绝不能往他想去的方向跳。这是历史的惯性的表现。远非大家都愿

意这样，但库兹涅佐夫路线的合理性旋即为大家所理解，所接受。很快在全营区各处都挂出了大字巨幅标语，从瞭望塔上和岗楼上都能看清楚：

“苏联宪法万岁！”

“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万岁！”

“苏维埃政权万岁！”

“要求派中央委员来！要求复查我们的案件！”

“打倒杀人凶手贝利亚分子！”

“斯捷普拉格军官的夫人们！你们当杀人凶手的妻子不感到可耻吗？”

虽然绝大多数肯吉尔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远近各地和眼前发生的对上百万人的镇压、迫害完全是在这个宪法的阴暗光线下干出来的，完全是由这个政治局的成员们批准的，但是，肯吉尔人没有别的选择，他们还是得在标语上写这个宪法万岁和这个政治局万岁。现在，重读一遍挂出的标语之后，暴动的囚犯似乎感到自己脚下的地盘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坚实性，内心感到宽慰、踏实多了：我们的运动不是没有希望的。

刚刚进行过选举的大食堂上空高高升起了一面旗子，整个肯吉尔镇都能看见它。这面白地、黑边、中间有个红十字的旗帜后来挂了很长时间。根据国际海洋法规，这面旗表示：

“遇难！船上有妇女和儿童！”

总共十二人被选入委员会，以库兹涅佐夫为首。委员会立即讨论了分工，成立了下列各部：

宣传鼓动部（由立陶宛人克诺普库斯领导，他是因参加诺里尔斯克起义而被转押到这里来的）；

总务部；

伙食部；

内部安全部（由格列布·斯鲁钦科夫负责）；

军事部；

技术部（这个部大概得算劳改营政府中最奇特的一个部了）。

委任原少校马克耶夫担任与劳改营头头之间的联系。委员会中还包括一名小偷头目，他也负责一方面的工作。委员中也有妇女（人选是意料中的：白发苍苍的经济学家、党员沙赫诺夫斯卡娅，喀尔巴阡地区的老教师苏普伦，还有柳芭·别尔沙德斯卡娅）。

真正的主要起义鼓舞者是否也进入了这个委员会呢？显然没有。几个中心，特别是乌克兰人的中心，显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状态（俄罗斯人在整个劳改营中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只有乌克兰老游击队员米哈伊尔·凯列尔，这位从一九四一年起时而同德国人作战，时而同苏联人作战的人，这个曾在肯吉尔劳改营里当众砍死一名眼线的人，现在以那个司令部派来的沉默的观察员身分参加委员会的各次会议。

委员会办公处设在妇女劳改点的行动人员办公室，公开办公，只有“军事部”把自己的指挥所（即战地司令部）设在第二劳改点的浴室里。各部都积极展开了工作，最初几天显得特别繁忙，什么事情都需要从头考虑，安排。

首先要修筑防御工事（马克耶夫预料必然会有军队来镇压，所以他反对修筑任何防御工事。斯鲁钦科夫和克诺普库斯则坚持要修）。几道内墙的豁口扩大了，拆下来大量土坯，囚犯们便用土坯在所有的岗楼和营区出入口的对面修起了壁垒。因为目前岗楼全在警卫队的手里，任何一个哨兵在任何一分钟都可能为讨伐队敞开大门。总务科大院里有的是成卷成卷的铁蒺藜，人们便用铁蒺藜绕成布鲁诺蛇腹形铁丝网，布置在几个易受威胁的方向。也没有忘记在某些地方挂出些写着“小心！布雷区！”的小木牌。

这是技术部想出来的妙法之一。围绕着技术部的工作形成了某种极其神秘的气氛。这个部在总务科大院里开辟了几个秘密房间，入口处画着骷髅和交叉的肱骨，写着："高压十万伏！"的字样。这里只准许几个技术部的工作人员出入，所以别的囚犯都不知道技术部里干些什么。很快就传开了一个消息：技术部正在制造某种秘密化学武器。囚犯和主子们都知道劳改犯中有一些非常高明的工程技术人员，所以一种盲目的信念很轻易地就进入了大家的头脑：这些人什么都能干，甚至会发明一种连莫斯科都没有人知道的武器。总务科仓库里有各种化学试剂，要制造简单的地雷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所以人们对于写着"布雷区"字样的小牌子是认真看待的。

还制造了另外一种武器：把一些装满碎玻璃屑的小盒子放在每个工棚的入口处（可以用它往冲锋枪手的眼睛上打）。

原来的作业班编制不动，改称排，每个工棚编成一个中队，任命了中队长，归军事部领导。由米哈伊尔·凯列尔担任警卫队长。几个易受威胁的地方都派纠察队员值班，按固定时间交接班，夜间加强戒备。考虑到男子的心理特点——他们当着妇女的面不会逃跑，而且一般地说表现得比较勇敢——纠察队由男女囚犯混合编组。肯吉尔劳改营的许多妇女不仅嗓门高，而且很勇敢，尤其是占妇女大半数的乌克兰姑娘。

现在人们不再期待老爷发善心了。他们自己动手拆除了窗上的铁栅栏。最初两天主子们还没有想到切断营区的电源，所以总务科大院里的机床还可以开动，人们便把拆铁栅栏下来的铁条磨尖磨光，制作了大量镖枪头。这两天锻造车间的机床工一直不停地制造武器：刀子、长柄宽刃斧头和刑事犯们特别喜欢的马刀。（他们还喜欢在刀柄上挂两个用彩色皮革做的小铃铛！）有些人甚至拿起了古代用的链子锤。

纠察队员们扛起镖枪去值夜班。夜间派往男子区指定地段值

班的妇女排揣着梭镖雄赳赳地前进，随时准备迎着进攻者冲上去。（当时还天真地认为刽子手们会不好意思镇压妇女呢！）

如果不是有严峻而洁净的暴动气氛笼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它早已由于人们的嘲讽或淫欲而涣散瓦解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梭镖和马刀只不过是拿来玩耍的。但对于这些囚犯来说，过去的监狱和未来的监狱却不是开玩笑的。梭镖确实像玩具，但它总算是命运赐给我们维护自身自由的第一个机会呀。在革命早期的清教徒气氛中，妇女在壁垒上出现本身就是某种武器。而此时此地，这些男子和妇女的所作所为也都无愧于这种革命气氛，他（她）们庄重严肃地紧握着梭镖，矛头指向黑暗的天空。

如果说这些日子里也有人产生过低级的、淫欲的念头，那就只是那些呆在劳改营区之外的、佩带肩章的统治者们。他们的推测是：一星期听其自由活动而无人过问的囚犯，必将在营区内淫乱纵欲，为所欲为。主子们也正是这样向镇上的自由居民们描述的，说囚犯们就是为了淫乱目的才暴动的。（当然啰，过着酒足饭饱、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囚犯们除了淫欲之外还可能有什么不满足之处呢?!）[①]

劳改营当局的主要推测是：刑事犯必将开始强奸妇女，政治犯就会起来维护妇女，这样，必然会开始一场互相残杀。但是，内务部的心理学家们这次又错了。这也同样值得我们惊讶。一切都证明，小偷们这期间的所作所为也像人们一样，不过不是他们使用这个词的传统含义，而是我们所理解的人们。为了酬答他们的这种态度，政治犯和妇女们自己对待他们也特别友善，充满信任。至于在这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别的什么原因，那就不是我们所能了

---

① 暴动过去之后，统治者们竟然无耻地对妇女们进行了逐个检查。当他们发现许多人还是贞洁的处女时，感到十分惊讶：怎么回事？你又不是瞎子，那么多日子在一起相处，竟然……！

统治者只能用自己的水平来衡量这次事件。

解的了。也许小偷们仍然想着第一个星期天流血牺牲的同伴们吧。

如果要问肯吉尔暴动的力量来自何处，那么，应该说，来自团结一致。

小偷们并没有触动粮食仓库。对于了解他们本性的人来说，这一点同样令人惊讶。虽然仓库里的食品够用好多个月，但是罢工委员会商定：粮食及其他食品仍旧要按原标准发放。这是由于不敢吃得超过官方规定的伙食标准，怕将来追究浪费责任。奴性十足的恐惧感！好像在这许多饥饿的年代里国家没有欠下囚犯的债似的！相反，简直笑人：留在营区外面的劳改营首长们还必需从总务大院领供给，那有什么！——委员会根据他们的请求让波尔图什金上尉（此人不坏，在前方打过仗的）进入大院，他按自由人的供给标准，把食品，如干果之类，定期给首长们运出去。囚犯们一概放行。

劳改营的财务科按原标准发放食物，伙房领来做饭。不过，在新的革命气氛中，炊事员不再偷窃，不再有刑事犯的使者奉命到伙房来替别人领取伙食，也不再给那些杂役们多盛几勺了。因此，尽管供应量并未增加，伙食量却明显地比以前增加了！

这时期也有个别刑事犯卖一些东西给别人（这是他们从前在别处抢来的），但是现在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卖后立即又把东西强要回去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

甚至地方供销部门开办的小商亭也照旧在营区内营业，指挥部答应保障自由公民女收款员的人身安全。她在没有看守护送的情况下可以进出营区，在营区内由两名女青年护送到各个小商亭向售货员收缴货款——内部流通券。（但是，囚犯手里的内部流通券很快就用完了，而且统治者不允许继续向营区进货。）

统治者手里还剩下三样可向营区供应的东西——电、水、药品。众所周知，空气是不由他们支配的。至于药品，在整整四十天的时间里他们没有供给营区一片药，一滴碘酒。罢工开始两三

天后他们切断了电源，停止了供水。

技术部开始为光明而斗争。最初想出的办法是：在细电线上绑两个钩子，把它甩到劳改营墙外，挂住墙外的电线。这样偷了几天电，后来这些“触须”被切断了。这期间技术部实验过风力发电机，但又放弃了。后来又在总务科大院选了个从瞭望塔上和低飞的“U－2”型飞机上看不见的地方，组装起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利用……自来水管的水发电！把总务科大院里原有的一台发动机改装成了发电站。发出的电力只能供营区的电话网、指挥部照明和……无线电发报机使用！各工棚只好点燃松明……这个举世无双的“水力发电站”一直工作到暴动的最后一天。

暴动刚刚开始时，将军们还像主人一样到营区里来走走。而且，那个叫库兹涅佐夫的代表果然手段高明——第一次谈判时他就首先命令从停尸房把死尸抬出来，而后大声下命令：“脱帽！”囚犯们都把帽子摘下来了，于是将军们也不得不在自己造成的牺牲品面前脱下他们的军帽。但是，总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古拉格的将军博奇科夫手里。他赞同选出一个委员会（“总不能同时跟大家一起谈话呀！”），他要求谈判代表们发言时首先讲明自己的案情（于是库兹涅佐夫就滔滔不绝地、也许还是很乐意地讲述起自己的案情来）。博奇科夫还要求囚犯发言时一定要站起来。当有个代表刚说出一句：“囚犯们要求……”时，博奇科夫立即敏感地反驳说：“囚犯们只能请求，而不能要求！”这样，“囚犯们请求……”这种表达方式也就规定下来了。

对于囚犯们的请求，博奇科夫的回答是大讲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经济的空前高涨、中国革命的胜利成就。这种盲目自负的间接洗脑办法总是使我们变得意志薄弱、无话可说……他来到营区的目的是想解释他们开枪射击是正确的，（他们很快便要宣布，根本没有向营区开枪，那都是匪徒们的造谣。也根本没有殴打犯人！）而有的囚犯代表竟敢请求他违反“关于分别关押囚犯的指令”，这

简直使他大为惊奇。(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指令"就像某种永世长存、天经地义的法律一样。)

很快又有一些新的、更显要的将军们乘"道格拉斯"飞来了：这是多尔吉赫（似乎当时是劳改营总管理局的局长）和叶戈罗夫（苏联内务部副部长）。他们在食堂召开大会，将近两千名囚犯去参加了。又是库兹涅佐夫下令："注意！起立！立正！"他敬了礼，把将军们让到主席团就座，他自己则由于官级较低而站在一旁。(斯鲁钦科夫的表现则不同。当某个将军在讲话中提到人民的敌人时，斯鲁钦科夫立即以响亮的声音反问他："你们中间谁不是敌人？雅戈达是敌人！叶若夫是敌人！阿巴库莫夫是敌人！贝利亚是敌人！谁能保证现在的克鲁格格夫就不是敌人呢？")

马克耶夫在笔记里写道，他曾拟了一个协议草案，规定劳改营当局保证不把任何囚犯转押到别处去，不实行镇压，开始复查案件，囚犯们则同意立即复工。但是当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拿这个方案到各工棚去征求意见时，囚犯们却报之以奚落，称他们为"秃了头的共青团员"，"特派推销员"和"契卡的奴才"。他们在妇女劳改点看到的反对情绪尤为激烈。人们现在特别不能接受的是划分男区和女区。(马克耶夫也在盛怒之下冲着反对者叫喊："你小子刚刚在娘儿们那里得了一点便宜，就以为苏维埃政权完蛋了吗？告诉你，苏维埃政权会坚持照自己的意见办事的！")

一天天过去了。将军们通过瞭望塔上的士兵的眼睛，通过现在呆在瞭望塔上的看守们的眼睛（看守们认得囚犯，因此便让他们从那里观察并记住囚犯们在干些什么），甚至通过（也许是携带照像机的）飞行员的眼睛，一刻也没有停止对营区活动的观察。但是，将军们不得不遗憾地得出结论：营区内没有互相残杀，没有暴行和摧残，没有强奸，营区自己不会垮台，也找不到派兵进去"救援"的借口。

劳改营屹立不动。谈判的性质也就渐渐地改变了。戴金肩章

的人们组成各种小组不断地到营区来劝说、谈话。他们谁都可以来，但来人手里必须拿着小白旗。走过总务科的岗楼，即目前进入营区的主要入口之后，还必须在壁垒前面接受检查——要由一个穿黑棉袄的乌克兰姑娘拍拍将军们的衣袋，看看是否带着手枪或手榴弹之类。但是，另一方面，暴动者的指挥部则保证这些人的人身安全！……

将军们被领到可以去的地方（当然不能去总务科大院的秘密房间），允许他们同囚犯谈话，还替他们召集各劳改点的囚犯大会。开会时将军们仍然和从前一样闪着金色肩章坐在主席台上，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犯人们推举自己的代表讲话。但是，这个话有多么难讲啊！怎么讲呢？现在在这里讲话等于在书写自己的新判决书。更何况这些灰黑色的囚犯与天蓝色的将军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是大相径庭的，他们彼此所理解的真理过于悬殊，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启发这些养得脑满肠肥、身躯高大的生物，可以感动这些发光的冬瓜头。一个共产党员、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列宁格勒的老工人的讲话似乎使将军们十分气恼。老工人质问他们：既然军官们在总务科大院里可以随意取用东西，可以利用从选矿厂偷来的铅块强迫囚犯替他们制造铅砂去偷偷打猎，既然他们可以命令囚犯去替他们自己种菜园，而劳改营的长官洗澡时要人们替他铺好毯子，要乐队在外面为他奏乐，那么，请问，这还叫做什么共产主义?!

为了尽少听到这类糊涂人的叫喊，双方的座谈后来便采取了高级外交谈判的直接谈判形式。六月间某日，在妇女营区里把饭桌摆成一排，在长桌的一边就座的是戴金色肩章的将军们，身后站着经批准进入营区保卫他们的冲锋枪手。长桌的另一边就座的是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身后也站着保卫人员——他们手持马刀、梭镖和弹弓等，十分严肃。这些人后面则挤满了囚犯，他们是来

"听听双方的讨价还价"并"呐喊助威"的。（会议长桌上也不是没有"酒食"的——从总务科大院的温室里取来了鲜黄瓜，从伙房里拿来一些酸乳、克瓦斯。佩戴金肩章的人们竟也毫不客气地大嚼其黄瓜……）

起义者的要求，或曰请求，是早在起义的最初两天就通过了的，现在只须不断地重复它就行了，即：

——惩办枪杀福音会会员的凶手；

——惩办一切对星期天夜晚总务科大院的屠杀应负罪责的人；

——惩办殴打妇女的人；

——释放所有因罢工被非法关进秘密监狱的同志们；

——去掉号码布，拆除工棚窗上的铁栅栏，不要锁工棚；

——不要修复各劳改点之间的内墙；

——和自由工人一样实行八小时劳动制；

——提高劳动报酬（甚至没敢提出要与自由工人同工同酬）；

——允许与直系亲属自由通信，时而允许探视；

——立即开始复查案件。

尽管这里没有一项要求足以动摇国家制度的基础，也并没有违反宪法（而许多项目只不过是请求回到从前的状态），但是统治者们却不可能接受其中哪怕最不重要的一条，因为这些个只有脖颈后的一点头发修剪得很整齐的肥大的脑袋，这些个被军帽遮盖着的秃瓢，都早已不习惯承认自己的任何错误和罪过了。如果真理不是在上级机关的秘密指令中表现出来，而是从黎民百姓的口中说出来的，那么他们便绝不承认这是真理，而且还会对它感到厌恶。

但是，八千名囚犯在包围中长期岿然不动，这毕竟会使这些将军脸上无光：这既会损伤他们的声誉，也可能毁掉他们的前程。所以，他们还是答应了。他们应允说，所有这些要求几乎全可照

办，只是（为了装腔作势）提出一条：不把妇女劳改点单独隔开这一项很难办到，甚至也“不应该这样”。（好像过去二十年来普通劳改营里没有这样实行过似的！）不过，“可以考虑一些别的办法”，例如，规定一些固定的会面日之类。至于在营区组成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开枪杀人事件）的问题，将军们竟也当场同意了。（但是，斯鲁钦科夫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坚持不要提这一条：否则眼线们就会以向调查委员会提供证词为借口把营区里的一切全都“捅”出去。）复查案件？当然啰，案件是要复查的，但需要稍等些时候。目前刻不容缓的是要出工！出工！出工！

这一点囚犯们当然看得很清楚：这是要把囚犯们分成一队一队的，用武器迫使他们伏在地上，然后逮捕带头人。

于是代表们隔着桌子回答说：不行！人群中也有人喊：不行！斯捷普拉格管理处作得太过分了！我们对斯捷普拉格的领导信不过！我们对内务部信不过！

“甚至连内务部也不信任？”在座的副部长对这种叛逆感到震惊，不禁摸了摸额头，“是谁使你们这么仇恨内务部的？”

这不能理解吗？

“派党中央主席团成员来吧！我们要见党中央主席团成员！那我们就相信！”囚犯们喊道。

“可别后悔呀！说不定对你们会更加不利！”将军们威胁说。

这时库兹涅佐夫站起来讲话了。他昂首挺胸傲视着对方，轻松而有条理地警告说：

“假如你们想靠武器进入营区，请你们不要忘记这里有一半是曾经攻下过柏林的人。他们也能夺过你们的武器来！”

这就是卡皮通·库兹涅佐夫！将来撰写肯吉尔暴动史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向我们介绍这个人物的。他是怎样理解和度过自己的监禁生活的？他是怎样理解自己的被捕的？既然恰好在暴动期间莫斯科下令释放他（而且同时还给他恢复了名誉），那么他该是很

早就请求复查的了？他使暴动的劳改营保持着这么好的秩序单单是由于他作为职业军人的责任感吗？他是因为对这次运动有同感才出面领导它的吗？（我看并非如此。）还是由于深信自己有指挥能力而为了节制这个运动，为了把泛滥的洪水纳入堤岸之内（通过遏制斯鲁钦科夫而防止双方的相互残杀），为了把运动变为被制服了的驯顺的波涛而置于当局脚下才出面领导它的呢？（我看确是如此。）在代表会面时，在谈判中，或者通过次要人物，他都有可能把想要传达给讨伐者们的信息传达过去，并且有可能让他们说出他希望听到的话。例如，六月间他就曾经委派马尔科相这个机灵人物代表委员会到营区外面去谈判过。库兹涅佐夫是否利用过类似的机会？也许他没有。也许他的态度就是独立自主的，他的为人也许就是骄傲的。

有两名保镖，即两名乌克兰彪形大汉，腰间挎着马刀时刻跟着库兹涅佐夫，寸步不离。

他们这是为了保卫？还是为了报复？

（马克耶夫还断言，起义期间库兹涅佐夫还有一位临时夫人，她也是班杰拉分子。）

格列布·斯鲁钦科夫才三十岁。也就是说，他被德军俘虏时只有十九岁。现在他和库兹涅佐夫一样穿上了从储藏室取出的旧军装，极力表现出一副军人气概。他稍微有点跛脚，但这点被他那敏捷的动作掩盖了。

谈判时他态度鲜明、激烈。劳改营当局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过去的少年犯”（即在未满十八岁时被捕，现已满二十一、二岁的人）带到营外，单独释放。这大概未必是骗局，因为当时其它很多地方确实也在释放这种人或者已给他们减刑。可是斯鲁钦科夫却回答说：“你们问过从前的少年犯本人吗？他们愿不愿意把同伴们丢在这里面自己从一个营区转到另一个营区去？”（在暴动委员会会议上他坚持说：“这些少年犯是我们的可靠力量，不能放他

们走！”将军们想在暴乱中释放这些人的用意主要也在于他们是“一股可靠力量”。至于带出去之后会不会再把他们分别关进营区外面的禁闭室，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奉公守法的马克耶夫还是调查了愿意办理“释放手续”的原少年犯，结果，他证实：在符合释放条件的四百零九名原少年犯中，只有十三名愿意出去。这个证明出自竭力取悦当局而敌视这次起义的马克耶夫之口，是值得惊奇的：四百名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青年人，而且其中大部分还不是政治犯，不仅放弃了自由，而且也放弃了自身得救的机会，自觉自愿地留在这注定失败的暴动者中间了……

针对将军们发出的武力威胁，斯鲁钦科夫的回答是：“你们派兵来吧！你们多派些冲锋枪手来！我们会把玻璃屑撒进他们的眼睛，缴下他们的冲锋枪！把你们整个肯吉尔卫戍部队打个落花流水！把你们那些罗圈腿军官们一直赶到卡拉干达，踩着你们的脊背进入卡拉干达！那里都是我们的人！”①

另外一些人提供的关于斯鲁钦科夫的证词也是可以相信的。据说，他曾举起芬兰式短刀摇晃着说：“谁要逃跑，这刀就朝谁的胸膛扎！”他还在工棚里宣布：“谁不出去参加自卫，谁就准备吃我一刀！”这也是一切军人政权和军事状态发展的必然逻辑……

新生的劳改营政府，同古今一切政府一样，没有内部保安部门是无法生存的，此项工作也由斯鲁钦科夫领导（他的“军事部”设在妇女劳改点的行动人员办公室）。因为没有希望战胜外部力量，所以斯鲁钦科夫懂得：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死刑。在暴乱的日子他曾告诉劳改营的囚犯：统治者们曾经极秘密地向他提出过一项建议，要他在囚犯中挑起民族残杀（戴金肩章的人们对此寄托了很大希望），这样来给当局制造一个派兵进入营区的良好借口。主子们答应：如果斯鲁钦科夫能办到这一点，

① 也许这些威胁的话影响了长官们对镇压工具的选择。

事后就可以保全他一条命。但是斯鲁钦科夫断然拒绝了这笔交易。(主人还向其他人提过一些什么建议呢？别的人却守口如瓶！）不仅如此，当斯鲁钦科夫听到谣传说劳改营里将要对犹太人采取暴行时，他立即发出警告：对传播这种谣言的人要当众鞭笞。谣言立即被制止了。

斯鲁钦科夫不可避免地要同正统派分子发生冲突。这一冲突终于发生了。应该指出，这些年来所有苦役营的正统派分子不约而同地都在谴责“屠宰”眼线的行为，他们甚至不赞成囚犯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任何斗争。他们这样作固然有他们的低级算盘(不少正统派分子是劳改营“教父”的走狗)，但同时也还有一套“理论”根据：他们承认来自上面的，当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甚至大规模的镇压和消灭，把它看作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但是同样的行动，甚至是突然迸发的、个别的、分散的行动，只要它是从下面发动的，他们便把它看作匪徒的暴行，而且还要说是“班杰拉分子”式的（这些正统派分子中间从来没有人承认过乌克兰有权分立，因为在他们看来，承认这一点就等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了)。政治苦役犯们拒绝从事奴隶劳动，对铁栅栏和随意枪杀犯人感到愤慨。这都使劳改营内的那些驯顺的共产党员伤心、苦恼、心惊胆战。

肯吉尔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时正统派便倾巢而出了。(这里有根金、阿普费尔茨维格、塔拉拉耶夫斯基；显然还有阿科耶夫，其他几个人的姓名我们不清楚。此外还有一个长期装病的人，他长年躺在医院里，说他“脚底下总在旋转”，这类知识分子式的斗争方式他们倒是承认的。而在暴动委员会中他们的代表显然就是马克耶夫。）他们从斗争一开始就指责“本来就不该开始”，界墙上的豁口被堵死之后，他们又指责说不应该挖地道。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残余的班杰拉分子挑起来的。现在他们主张尽早地让步。(是啊，被打死的十六个人不是他们劳改点的人；至于替那个福音

派教徒鸣不平，简直可笑！）在马克耶夫的笔记里到处流露出他们这一派别的激怒情绪。他们觉得周围一切都十分愚蠢，所有的人也都愚不可耐；四面八方都有危险——当局会给他们加判刑期；班杰拉分子会让他们背上吃一刀。马克耶夫写道："他们想用铁器恐吓大家，让大家都毁灭。"他说肯吉尔营的暴动是"血腥的游戏"，是要弄"假王牌"，是班杰拉分子们的"外行文娱演出"，他还经常把这次事件称为"结婚典礼"。马克耶夫认为暴动领导者所追求的完全是淫佚放荡、逃避劳动和推迟应受的惩罚（他认为判给人们的惩罚自然是公正的）。

这种看法忠实地反映出正统派分子对五十年代劳改营里的自由运动的态度。不过，马克耶夫为人是相当谨慎的，他甚至还参加了暴动的领导班子。而另一个叫塔拉拉耶夫斯基的人则公开提出了这些指责，因而斯鲁钦科夫领导的内部安全部便以"进行敌视起义的煽动"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是的，就是这样。起义的、解放了监狱的囚犯们如今办起了自己的监狱。这是嘲笑，但这嘲笑也是古已有之的。不过，由于各种罪名（也有人给当局去通风报信）关进监狱的总共只有四个人，而且没有枪毙一个人（相反，这几个人后来倒是有了证据，可以在劳改营领导面前证明自己没有参加叛乱了）。

监狱，一般地说，在整个起义期间成了大家参观的场所，特别是三十年代修建的黑暗的旧监狱部分。那里有在屋顶只留着一个进出口而没有窗户的单身牢房，里面一张无腿"木床"，也就是把一块床板直接放在水泥地上供囚犯睡眠，床板上显然比牢房本身还要阴冷潮湿；"木床"旁边的水泥地上，像喂狗盆似的放着一个粗陶制的大碗。

委员会的宣传部组织囚犯们去参观这些旧监狱，特别让那些过去没住过这种监狱，今后也许不可能住的人们去。当将军们来到营区时，也领他们去参观。（但他们毫未对此感到惊讶！）宣传

部还请求将军们组织镇里的自由工人到这里参观，因为工地上一旦没有囚犯干活，那些人反正也是不会干活的。将军们甚至真的派了一些人来，当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些经过挑选的人，他们参观后一点也没有表示愤慨。

作为对等措施，将军们也建议宣传部组织一批囚犯去矿山（即去斯捷普拉格的第一、第二分部）参观，因为我们这里传说那里也暴动了。（这里顺便说一下，当时的奴隶和奴隶主双方由于各自的原因都避免使用"暴动"这个词和另一个更坏的词"起义"，而是使用一个羞答答的、不那么刺耳的、和平的名词"春歇"*。）囚犯们当真选了一些人乘车去参观了，他们看到那里的囚犯们确实在照常出工劳动。

人们对于罢工的蔓延扩大寄托着多少希望啊！而参观者带回来的却只有沮丧。

（带人们去参观这一招儿作得很及时！其实，矿山上的囚犯已经从自由工人那里听到些关于肯吉尔营暴动的谣传了，当然也有波动。六月间恰好有许多复查申请遭到拒绝。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孩子在禁区旁边被枪打伤了。于是矿山上也宣布了罢工，人们在劳改点之间的界墙上打开缺口，涌开了。瞭望塔上架起了机关枪。不知什么人挂出了一条反苏维埃的横幅标语，还提出了"自由或者死亡！"的口号。但是，这幅标语很快被拿掉，换上了一幅提出合理要求的标语，并且写明：一旦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就保证夺回罢工造成的损失。开来几辆卡车要从仓库取面粉，占领仓库的囚犯们没有给。罢工大约继续了一周。不过，我手头没有关于这次罢工的准确材料，这些都是听第三者说的，可能有所夸大。）

总之，有几个星期肯吉尔的"战争"变成了宣传战。营外的广播整日不停：在营周围装了几个扬声器，向营区轮流播送对全

---

* 音译为"撒班图伊"，是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庆祝春耕完毕的节日。——译者注

体囚犯的呼吁和消息（假消息），有时也放一两张老掉牙的、令人厌恶的、折磨你每一根神经的唱片：

姑娘在田野徘徊，我的爱就是她，
我早已爱上，她那美丽的辫发。

（不过，即使为了争得听听这旧唱片的一点点权利，也值得发动这场起义！要知道，甚至这种破烂唱片也不是播放给跪着的人们听的呀。）播放这些唱片也符合时代精神：它们起着广播干扰作用，干扰从劳改营里向外播放的、针对警卫战士们的广播。

营外的广播内容不外以下几种：诬蔑我们的整个运动，硬说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奸淫和抢劫（虽然劳改营的囚犯听了好笑，但这是让村镇上的自由居民听的！本来奴隶主们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作出任何更高尚些的解释！至于承认我们这些愚民百姓还能够追求正义和公理，这种思想高度简直是他们无法攀登的）；编造一些有关暴动委员会某个委员的"私人丑事"（他们甚至造谣说，某个头目有一次被押送渡过科雷马河时把船底凿了一个洞，致使驳船沉没，三百名囚犯溺死。广播还着重指出：淹死的都是些可怜的囚犯，而且几乎全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而没有淹死押送士兵。也不知道他本人怎么没淹死）；对库兹涅佐夫进行神经战——说本来已经批准要释放他，现在又撤回了；不停地号召：去劳动吧！出工吧！为什么祖国应该白白养活你们？你们不出工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指望用这些话感动那些注定永远在这里服苦役的人们吗？！）整列整列的运煤火车停在那里没人卸车！（囚犯们哈哈大笑："让它停着吧！你们会早些让步的！"不过，囚犯们也没有想起来：既然损失使他们那么痛心，为什么不动员戴金肩章的人去卸车？）

但是，暴动的技术部也没有示弱。他们在总务科大院找到两台电影放映机，利用那上面的放大器代替扬声器。当然，功率不

大。电源由秘密水电站供应！（起义的囚犯拥有电力和广播，这使统治者十分惊奇和不安。他们担心暴动者会组装一台发报机，会把起义消息发到国外去。劳改营内部也有人散布这类谣言。）

劳改营也有了自己的播音员（其中斯拉娃·亚里莫夫斯卡娅最有名）。播送最新消息、广播新闻（还有每天的墙报和漫画）。还有一个节目叫“鳄鱼的眼泪”，是嘲笑看守的：“他们从前残酷殴打妇女，如今却装出为妇女命运操心的样子。”还有专为卫兵播送的节目。此外，囚犯们还在夜晚走近瞭望塔，用话筒向卫兵们喊话。

但由于电台功率不够，无法对村镇上的自由居民广播；而这些人才是在肯吉尔能够找到的唯一可能同情我们的人，他们大部分也是被流放到这里来的。村镇当局不是通过广播，而是通过囚犯们办不到的某种方法，散布了大量谣言，把这些人的思想搞乱了：说什么现在控制着劳改营的是些嗜血成性的匪徒和淫荡的娼妓（这种说法特别对村镇里的妇女起了作用）；[①] 说劳改营里正在虐杀无辜的老实人，把他们扔进炉膛活活烧死（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当局竟不去干涉！……）。

相距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远，怎样才能让墙外的这些人听到我们的声音呢？必须告诉他们：“弟兄们！我们仅仅是要求公正！他们无缘无故杀害我们！待我们还不如狗！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可是，怎样去告诉他们呢？

技术部的人深知自己赛不过现代科学技术，因此只好使思想向后转，求助于几世纪前的技术。总务科大院里什么都有，这一

---

① 暴动过去后，又押着女囚经过村镇去劳动时，便有些已婚的俄罗斯妇女聚集到路旁大声辱骂女囚犯：“窑姐儿！破烂货！想男人啦！……”以及其它一些更有表现力的话。第二天女犯上工时又是如此。但这一次女犯们从营里随身带来些石块，她们用石头回敬侮辱者，押送的士兵只是在一旁发笑。

点已经谈到过。[1] 多年来，对于杰兹卡兹甘的军官们来说，这个地方既能代替首都时装店，又能代替各种日用品修造工厂。这时，囚犯们利用总务科大院里的烟卷纸，仿照法国蒙戈尔菲耶弟兄做气球的办法，制做了一个巨大的气球。气球上绑上一束传单，气球下面吊一个火盆，装上燃烧的木炭，它可以把热空气通过气球下部的开口送入气球，使气球上升。囚犯们兴高采烈地聚集在院子里（囚犯们高兴起来就像小孩子一样），观看这一奇特的航空装置冉冉上升，向墙外飞去！但是，呜呼！这天的风速超过气球上升的速度，气球刚飞过墙，下面的火盆就被墙外的电线挂住，失去热气流供应的气球落了下来，同传单一起烧毁了。

这次失败之后，他们又用烟充满气球。这种气球在顺风时飞得不错，可以使村镇居民看到挂在上面的大字标语：

> "救救遭受毒打的妇女和老人们！"
> "要求派党中央主席团委员来！"

警卫士兵们便用枪射击这些气球。

这时有几个车臣人囚犯向技术部建议制作风筝（他们是做风筝的能手）。很快便糊出了不少风筝，可以把它们放到很远的村镇上空去。风筝上绑有一个小小的机关，待到风筝飞到预定位置上空时，机关就可以打开，拴在上面的一束传单就落下去了。放风筝的人坐在工棚屋顶上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传单有时落在离营区不远的地方，于是看守们就跑去拾；如果离很远，就派出摩托兵或骑兵去拾。总之，尽量不让自由居民看到这独立的真理（传单的末尾一句话是请求每个读到它的人设法把它送到党中央去）。

士兵们也射击风筝，但风筝不像气球那么容易损坏。但对方

---

① 参看第三部，第二十二章。

很快就想出了比派出大批看守便宜得多的对应措施：他们也用风筝来捕捉并绕住我们的风筝。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风筝战！这是为了压制住真理的声音……

（为了说明肯吉尔事件的时代背景，我们不妨请读者回想一下这次暴动当时在自由的外界发生过一些什么事件。当时是：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正在开会；法国人皮埃尔·戈特获得斯大林和平奖金；另一名法国进步作家萨特来到莫斯科，以便投入我国社会的进步生活；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乌克兰同俄罗斯恢复统一的三百周年纪念。① 五月三十一日在红场上举行了盛大阅兵或游行。分别授予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列宁勋章。六月六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尤里·多尔戈鲁基*纪念碑揭幕式。全国工会代表大会自六月八日正式开幕〔但是，大会上当然只字未提肯吉尔的事〕。六月十日政府发行公债。六月二十日空军节，在土希诺举行了壮观的检阅。一九五四年的这两个月还有一件事比较突出，就是在所谓文艺战线上展开了强大进攻：苏尔科夫、科切托夫和叶尔米洛夫发表了气势汹汹的文章，摆出一副整人的架势。科切托夫甚至发问："这是什么时代？"可是，谁也没有对他说："这是劳改营起义的时代！"这一时期许多错误的戏剧和小说遭到了批判。而在危地马拉，帝国主义的美国受到了应得的回击。）

肯吉尔镇上也有流放来的车臣人，但卫兵们的那些风筝不大可能是车臣人做的。我们不能说车臣人曾经帮助过压迫者。他们十分清楚地理解肯吉尔暴动的意义，有一次还给营区送来一汽车面包，当然，马上被军队赶走了。

（就顺便说说这些车臣人吧。就哈萨克斯坦的情况而论，车臣

① 肯吉尔的乌克兰人却宣布这一天为哀悼日。

* 尤里·多尔戈鲁基（1090—1157），莫斯科城的奠基人。——译者注

人实在不受周围人的欢迎：他们粗鲁、凶猛、公开表示讨厌俄罗斯人。但是，只要肯吉尔人表现出一点点独立精神和勇敢气魄，就会立即争得车臣人的好感！所以，当我们感到人们不很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态度。）

这个时期，技术部正在制造那风传已久的“秘密”武器。其实它十分简单：只是把掺有钙和硫的化合物的火柴头填到一种铝制曲管里就行了。（这时，所有的火柴箱都搬进了挂有“电压十万伏！”牌子的小屋里；铝制曲管是从前生产饮牛装置时的下脚料，仓库里剩了很多。）把里面的火柴头药硫磺点着，把曲管扔出去，它就会发出雌—雌的响声爆炸开。

但是，选定什么时间、地点和方式使用这种武器进行打击，却由不得这些不走运的聪明人和设在浴室的战地司令部了。暴动开始后大约两个星期，在一个漆黑的、没有任何照明的夜晚，突然听到劳改营围墙的许多地方同时传来笨重沉闷的撞击声。不过这一次凿墙的不是逃跑者，也不是暴动者，而是警卫部队！劳改营里立即乱成一团，人们拿着梭镖和马刀来回跑，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囚犯们等待着军队来进攻，但是军队并没有发动攻击。

第二天天亮后才知道：营区围墙上除了原已打开的几个豁口之外，外部敌人又凿开了十来处豁口（缺口外面布置了机枪手，防备囚犯从豁口涌出去）①，这当然是准备向营区进攻。于是营区内展开了紧张的防御准备。指挥部决定：拆掉营区的内墙和土坯墙，在各个豁口的内线修起第二道围墙，特别要用土坯加强面对豁口的地方，防护机枪射击。

一切全反过来了！现在是警卫部队破坏墙，劳改犯们却在垒

---

① 据说，打开缺口的办法原是诺里尔斯克的经验。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当局曾在墙上打开些缺口把动摇分子引诱出去。并且通过豁口挑拨刑事犯闹事，然后便借口维持秩序通过豁口派进军队来。

墙！包括小偷们也在认真地垒墙，认为这并不违背他们的规矩。

还必须在每个豁口安排新的值班人员，并要指定某排负责某处。夜间，听到警报就要严格按规定奔向指定的防御地点。规定的警报信号是敲打一个从货车上拆下的缓冲器，还有那种特别响亮的口哨声。

囚犯们十分认真地准备手持梭镖迎着机关枪冲上去。那些原本没有这种决心的人起初有些担心，慢慢也习惯于这种想法了。

只要闯过这一关，平坦大路在眼前！

有一次，士兵们白天开始进攻了。有个豁口正对着斯捷普营管理处楼前的阳台。当时阳台上挤满了军官，闪着宽窄不同的各式肩章。他们拿着电影摄影机和照像机。端着冲锋枪的士兵朝缺口开过来了。但他们前进得并不快。他们只前进到一定距离，以便诱使营区发出警报。警报一响，各排囚犯便朝着指定的豁口跑去，挥舞着梭镖、拿着石头和土坯进入防御壁垒。这时，阳台上的电影摄影机和照像机便纷纷响起来（自然不会把冲锋枪手们拍进去的）。于是，劳改营军官、检察官、政治教导员以及所有在场的人，当然，全是党员，便朝着这群手持梭镖的狂热的原始人所表演的奇异荒诞的场面发出了得意的哄笑！这些酒足饭饱的、寡廉鲜耻的高级人物们正在阳台上戏弄嘲笑他们饥饿的、受骗的本国同胞。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1]

此后，时而还有看守人员偷偷跑到豁口近前，企图扔进一条带钩的绳套来像套野兽和雪人似的套走一两个“舌头”。

不过，他们的最大希望还是寄托在动摇分子的逃跑上。广播喇叭不停地叫：清醒清醒吧！从豁口跑出来吧！从这里出来我们不开枪！凡是跑过来的一律不追究暴动罪责！

---

① 这些照片现在一定还贴在当时的镇压报告上。也许有人忘了及时地、尽快地把它烧掉，也许能留到将来……

暴动委员会则通过自己的广播对此作出了回答："谁想逃命，就过去吧！从正面的岗楼过去也行！我们不阻拦任何人！"

有人确实也这么干了，那就是……暴动委员会的委员，前少校马克耶夫。他装作办什么事的样子走近正面的岗楼，过去了（他装作这样，并不是因为别人会阻拦他或可能朝他背后开一枪，而是因为在公然哄笑的同志们面前几乎不可能当叛徒！）[①]他伪装了整整三个星期，如今他可以任情发泄那渴望运动失败的感情和对起义的仇恨了，因为他马克耶夫可不需要起义者所要求的那种自由。如今他可以在主人面前立功赎罪，通过广播号召囚犯们及早投降并对所有主张坚持斗争的人进行攻击了。让我们看看他关于那次广播谈话的亲笔记述吧："只是某一个人决定了，说可以靠马刀和梭镖取得自由……他们想把那些不愿拿起武器的人置于枪林弹雨之中……领导已经答应对我们的案件进行复查了。将军们在同我们耐心地谈判，可是斯鲁钦科夫却把这种态度视为软弱。暴动委员会实际上成了猖狂匪徒们的护身符……你们应该进行不愧为政治犯的谈判，而不应该（!!）修筑什么毫无意义的防御工事！"

围墙豁口一直敞开着，整个暴动期间绝大部分时间是开着的。但是，几个星期中从豁口跑出去的总共不过十一、二个人。

为什么？难道人们当真相信会胜利？不。难道真的不为将要受到的惩罚苦恼？当然苦恼。难道真的不想为了自己的家庭保全住性命？想保全！当时说不定有成千的人在为这些问题所苦，在认真地暗自思考活命的可能性。至于那些从前的少年犯，他们更是有完全合法的理由出去的。但是，当时这一小块土地上的社会温度已经升高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使还不能对人们的灵魂进行完

① 甚至在事过十年之后，他仍然感到那是十分可耻的，所以不得不在他那显然是为辩解而写的回忆录中解释这件事，说什么他是偶然到岗楼外去看看的，谁知一出去就被人围住，绑起来了，……

全再熔铸，至少也足以使它的表面得到重新熔铸了。因此，那些过于低级的规律——“生命只有一次”，存在决定意识，贪生怕死会使人变得怯懦等等，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这块有限的土地上，就统统失去了作用。生存和理智的规律指给人们的路是：一起投降或者分散逃跑。可是，他们既没有投降，也没有逃跑！他们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精神高度，并从那高处向刽子手们宣称：

“随你们的便吧，该死的！你们要杀就杀吧！你们咬吧！”

这样，当局的一次计划周密的战役失败了。原来指望囚犯们会像老鼠一样从豁口四散逃走的，然后就可以对营里剩下的最顽固分子放手镇压。这一着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是由一些贪生怕死的人发明的。

囚犯们办的壁报上原来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妇女指着玻璃罩下面的手铐对孩子说：“他们就是用这种东西铐住你爸爸的！”现在这幅画旁边又贴出了一幅漫画，题为：“最后的投敌分子”，画的是一只黑猫正从豁口往外跑。

漫画总是在笑，但营里的囚犯却没有什么可以笑的事。暴动后的第二、第三、第四个星期过去了，已经进入第五周。按照古拉格的法律连一小时都不应该存在的情况，现在却令人不可置信地、甚至是使人感到难堪地长时期存在着：自五月下半月开始，现在整个六月快要过去了。起初，人们由于胜利、自由、会面和想出来的各种巧妙斗争方法而兴奋，甚至有些飘飘然了。后来又相信了谣传，说是矿山上也起义了，或许楚尔白奴拉、斯帕斯克，整个斯捷普营也会紧跟着起义的！说不定还有卡拉干达呢！整个古拉格群岛也许会爆炸，炸得粉碎呢！但是，矿山的囚犯没有起义，他们仍旧倒剪着两手、低垂着头、每天去劳动十二小时并且感染矽肺，他们根本不关心肯吉尔，甚至也不关心自己。

没有人支援肯吉尔这个孤岛。现在已经无法往草原上逃跑了：又调来一些部队，他们搭起帐篷住在草原上。整个劳改营区外面

又新加了一层铁丝网。原来指望老爷会来（当时指望马林科夫来），他会判明是非，一切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这只不过是一个玫瑰色的希望的小点。原指望会来一位大善人，他会两手一拍，哎呀一声：唉！看看他们在这里过的是什么生活！你们是怎么对待他们的?！要惩办杀人凶手！枪毙切切夫和别利亚耶夫！给其他的人降职降级！……但是，这个“希望之点”过于微小，它的玫瑰色过于好看了。

实际上将要到来的远不是什么慈悲、恩典。人们正在度过他们最后几天自由快活的日子，然后就要由内务部的斯捷普营分部任意摆布了。

什么时候都会有些人经受不住紧张状态。有些人内心已经被压垮，他们只是在为现实的镇压迟迟不来而苦恼。有些人已在暗自盘算：我任何事都没有牵连进去，如果今后小心从事，也许不会遭殃。也有个别的新婚夫妇（他们甚至是按照真正的教堂仪式结婚的，否则西部乌克兰姑娘是不会出嫁的呀。多亏古拉格的照顾，使得劳改营里现在有各种教派的神职人员可以帮助举行仪式），他们的痛苦和甜蜜极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是那些过着慢悠悠的生活的人所永远不可能理解的。这些新婚夫妇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而度过，只要昨夜镇压没有来临，他们便把今天的早晨看作天赐之福。

宗教信徒们则不住地祈祷，他们把肯吉尔营中的惶惶不安放到神的肩上，因此，他们一如既往是营区最平静的人。大食堂里按照时间表轮流进行各种教派的宗教祈祷仪式。犹太教派的人们坚持自己的教旨：不拿武器，不参加修筑壁垒，不参加站岗放哨。他们长时间地静坐，微低着头，一言不发。（分派给他们的工作是洗碗。）营里还出现了一位预言家，他在人们的床头煞有介事地画十字，预告世界末日的到来。恰巧这时来了一股寒流，气温骤然下降（哈萨克斯坦夏天偶尔也有寒流）。他召集起的一些老太婆穿

着单薄的衣服坐在冰冷的土地上，把颤抖的双手伸向空中。是啊，还能伸向什么人呢？……

有些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无可挽回地牵连进去，只有军队攻进之前这几天可以活了，但他们认为，那也得尽量坚持到底，该做的事还得做。因此，这些人还不算是最不幸的。（最不幸的是那些本来没有牵连进去，但却祈求末日早些来临的人。）

但是，当所有这些人聚在一起开会讨论投降还是坚持下去的时候，他们便又都回到那样一种社会温度中了，这种温度能使他们的个人意见完全熔化，甚至根本不复存在。也许是他们害怕别人的嘲笑甚于害怕即将到来的死亡吧。

“同志们！我们也有火力防御手段。敌人如果攻进来，他们的损失至少会有我们的一半！”仪表堂堂的库兹涅佐夫对大家这样说，仿佛他掌握着许多秘密，所有秘密都对囚犯有利似的。他还不止一次地说：

“即使我们死掉，我们的死也绝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这一点他说得完全正确。同所有的人一样，那种总的温度对他也起了作用。）

所以，当大家表决是否坚持下去的时候，大多数人赞成坚持。

这时，斯鲁钦科夫意味深长地威胁说：

“可当心点儿！谁要是留在我们队伍里而又想着投降，我们可要在投降前五分钟先处决他！”

有一天，营外的广播宣布了一项“劳改营总管理局命令”：鉴于斯捷普特种劳改营肯吉尔分部的囚犯拒绝劳动，鉴于该分部怠工，鉴于……鉴于……鉴于……兹命令解散肯吉尔分部并将其全体囚犯送往马加丹。（看来，古拉格当局还觉得我们这颗行星太小了。试问，那些没有闹事而早就被送去马加丹的人，他们是“鉴于”什么被送去的呢？）限令复工的最后日期是……

但是，这个“最后日期”也过去了。一切仍然照旧。

一切仍然照旧。只是八千人的这种显然不可能的、前所未有的、悬在空中似的生活所具有的全部离奇性和梦幻性却在按部就班的劳改营日常活动的背景上显得更加突出了：这里一日三餐照常开饭；按规定的日期洗澡；洗衣房照常洗衣服，内衣按规定时间换；理发室按期理发；缝纫组和修鞋组照旧收活。这里甚至成立了调解纠纷的调解法庭。甚至还……释放人！

是的。营外时而广播一些人的名单，招呼他们出去予以释放：有时这是某个国家的外国人，因为他们的政府已博得信任可以把自己人召集到一起了。有时则是（或者似乎是）服刑期满的人……说不定劳改营当局正是利用这种办法叫出一些人去当"舌头"的——这样就不必让看守用带钩的绳索套"舌头"了。暴动委员会也开会讨论营外广播的名单，但是因为无法核实，只好按名单全部放出去。

为什么这个时期拖得这么长？统治者们在等待什么？等待营里断粮？但他们理应知道粮食还能维持很久。是在考虑镇上居民的反应？这是根本无须担心的。是在制定镇压计划？那也可以快些呀。（不错，后来我们得知：这期间从古比雪夫附近调来一团"特种兵"，即讨伐团。要知道，并不是随便什么兵种都能够胜任讨伐工作的。）是在上面讨论镇压方案？那么是在哪一级讨论呢？哪一天哪一级作出了决定，这是我们无法知道的。

有几次，总务科大院的外大门突然打开了。也许是要检查防御者的准备程度吧？值班纠查队员立即发出警报，各排马上奔向指定地点。但是，却没有人向营区进攻。

营区防御体系的全部侦察工作是由坐在工棚屋顶上的观察哨担任的，从屋顶可以看到的一切便是进行预测和判断情况的全部根据。

六月中旬，镇上开来了许多拖拉机。拖拉机在营区附近工作或者像是在牵引什么，后来甚至夜里也不停止工作。这种夜间工

作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于是我们开始在各个豁口的里面挖大坑以防万一（其实，这些都被“U--2型”飞机拍了照片或者画了图形）。

拖拉机的这种不祥的吼叫声似乎使人们心中的暗影变得更浓了。

突然，所有的怀疑论者全丢脸了！悲观绝望的人们丢脸了！凡是说过不会有宽恕、因而也无须请求什么的人们全丢脸了！只有正统派可以庆祝胜利。六月二十二日统治者的广播宣布：接受囚犯们的全部要求！党中央主席团的一位成员已启程来肯吉尔！

原先那个玫瑰色希望的小点点如今变成了玫瑰色的太阳，变成玫瑰色的天空了！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达到目的！那就是说，我们国内还是有正义的！上面会对我们作些让步，我们也要有所让步。其实，带着号码生活也没有关系，窗上的铁栅栏也并不碍事，我们反正不想跳窗户跑嘛。又是在欺骗我们吗？可是并没有要求我们在这之前复工劳动呀！

就像用小棒一触切断了验电器的电荷，它那金属箔片便轻轻落下来一样，外部广播宣布的这条消息卸下了人们思想上最近一周来的沉重负担。

甚至那讨厌的拖拉机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喧闹了一阵之后也沉默下来了。

暴动开始后的第四十个夜晚的睡眠是十分宁静的。肯定明天那位主席团成员就会到达肯吉尔，说不定现在已经到了……[①]这是短暂的六月的夜晚，是那种总也睡不够的六月的夜晚，因而人们在黎明前睡得特别香，就像十三年前*的六月一样。

---

① 也许真的是有一个人来到肯吉尔了？也许就是他亲自下达的命令？……

*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1年6月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地突然大举侵略苏联的前夕。——译者注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破晓之前的天空中突然亮起一颗颗带降落伞的照明弹，四处的瞭望塔上也升起了照明弹。可是，各工棚屋顶上的观察哨却都一声不吭，原来他们已经被狙击兵的子弹消灭了。响起了隆隆的炮声。飞机在劳改营上空作超低空飞行。气氛十分恐怖。久负盛名的T—34型坦克早已在拖拉机轰鸣声掩蔽下进入阵地，这时一齐向各个豁口冲来。(其中一辆还是掉进坑里了。)有的坦克后面拖着已经钉好的叉形铁丝网支架，以便立即用铁丝网把营区分开。另一些坦克后面则跟着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突击队员。(在进攻开始之前，冲锋枪手和坦克手们都领了伏特加酒。不管是什么样的特种部队，要想让他们去镇压手无寸铁、正在睡眠的人们的话，最好还是先让他们喝得醉醺醺的。)跟随进攻部队前进的还有携带电台的通讯兵。照明弹使营区一带亮如白昼，将军们登上了射手的瞭望塔，从那里指挥战斗："夺取那个工棚！……库兹涅佐夫就在那儿！"(有一座瞭望塔被囚犯扔的爆破管炸中，烧起来了。)这一次将军们并不像往常那样躲在观察点后面，因为他们知道现在不会有中弹的危险。①

镇上的自由工人们则从远处，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观看这场镇压。

劳改营惊醒了，乱成一团。有些人留在工棚里，趴在地上不动，指望这样或许能保住性命，看不到抵抗有什么意义。另一些人则想把他们拖起来去抵抗。还有一些人冒着弹雨冲了出去，冲去战斗或者去寻求快死。

第三劳改点，也就是发起暴动的劳改点，顽强地进行抵抗

---

① 如果说他们也曾躲避的话，那只是避开了历史。这些机灵的指挥员们是谁呢？为什么祖国不鸣礼炮庆祝他们在肯吉尔取得的辉煌胜利？我们现在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几个名字，当时他们在那里不是最主要的，但也不是无关紧要的人物，我们只知道：斯捷普特种劳改营契卡行动处处长梁赞采夫上校，斯捷普特种劳改营政治处处长肖姆什金……请各位读者给予帮助！应该把这张名单继续写下去！

（这里大部分是刑期二十五年的人，班杰拉分子占很大比重）。他们……朝着冲锋枪手和看守们扔石头，也可能还朝坦克扔了些装着硫磺的铝管……竟然没人想到那些装着碎玻璃的小盒子。有一个工棚的人曾两次喊着"乌拉！"发起反攻……

坦克横冲直撞，一路上只管轧下去（坦克的履带从一个基辅妇女阿拉·普列斯曼的肚子上直轧过去）。坦克冲上工棚的台阶，一直轧过去（两名爱沙尼亚妇女英格丽德·基维和马赫拉普被轧死了）。[①] 坦克紧贴着工棚的墙边轧过去，把那些贴在墙上躲避坦克履带的人轧死。谢苗·拉克和自己心爱的姑娘拥抱在一起冲到坦克下面结束了他们的一生。坦克轧倒工棚的板墙，甚至在工棚里面还继续放空炮。据法依娜·爱泼斯坦回忆说：就像在梦中似的，工棚的一角突然倒塌了，只见一辆坦克在工棚里从活人们身上斜着轧过来。没有被压着的妇女们从床上跳起来，到处乱窜。坦克后面紧跟着一辆卡车，士兵们把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的妇女们捉住扔进车厢。

炮是空炮，但是自动步枪和刺刀却是实战用的。有的妇女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男人们，这些妇女同样被当场刺死！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这一天早晨亲手杀死了二十多个人。在战斗结束之后，有人看见他把刀子放入被击毙者手中，让摄影师赶紧拍下这个被击毙的匪徒的照片。暴动委员会委员，白发苍苍的苏普伦肺部被打伤牺牲了。有些人躲进了厕所，他们被机枪打死在那里。[②]

库兹涅佐夫在浴室，在他的指挥部里被抓住。强迫他跪在那里。斯鲁钦科夫被绑住双手抛向空中，摔到地上（刑事犯们常用的办法）。

---

① 喝得醉醺醺的劳改营女医生纳吉宾娜这时也坐在一辆坦克里。她当然不是为了救护，而是……想看一看。很有趣嘛！

② 喂！伯特兰·罗素和让-保罗·萨特的"战争罪行法庭"在哪儿呢？喂！喂！哲学家们！这是多么好的材料啊！你们为什么不开庭审判？

在此之后，射击停止了。士兵们开始喊话："快从工棚里出来！不再开枪啦！"的确没有再开枪，只不过是用枪托打。

每捉住一批俘虏，就从大墙豁口带出去，穿过外围的肯吉尔警卫部队包围圈送进草原，搜身之后迫使他们趴伏在地上，两只手伸到头上来。然后，内务部的飞行员和看守们便在这群伸着手伏在地上的人群中走来走去，认出他们早在空中和瞭望塔上就已经记住的人，把这些人揪出去。

（人们都在忙于这些事，所以谁都没有时间去翻翻当天的《真理报》。而这一天的《真理报》上是有专题报道的——题为：《祖国的一日》，内容是：冶金工人取得卓越成就；进一步扩大农业的机械化收割面积！我们祖国的这一天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历史学家们参考了这张报纸之后是不难综述的。）

好奇的军官们现在可以去看看总务科大院里的秘密了：用什么办法发的电？"秘密武器"是怎么回事？

胜利的将军们从瞭望塔上走下来，去用早餐。我不认识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但我敢断言：在这个六月的早晨，他们的食欲是不会差的，而且一定还喝了酒。喝几杯酒，热闹一下，这并不会丝毫损害他们头脑中井然有序的正统思想。至于他们内心里想些什么，那从外面是封得很严的。

据人们说，死伤人数是六百左右，而据我们几个月之后所看到的肯吉尔劳改营分部生产计划科的材料，则是七百多。[1]受伤的人挤满了劳改营医院，不得不往城市医院里运送。（对自由居民宣讲的是：士兵们放的都是空枪空炮，那是囚犯们自己互相残杀的结果。）

本想让那些活下来的囚犯去挖坑埋死人的，但是为了避免把

---

[1] 1905年1月9日被打死的人数是将近一百。1912年震撼俄国的勒拿河流域采金场的大屠杀造成的死亡是二百七十人，受伤者是二百五十人。

真相声张出去，还是把这项任务交给部队了。大约三百具尸体就埋在营区旁边，其余的埋到草原上了。

六月二十五日，囚犯们整天都在烈日下伏在草原上（这些日子天气一直炎热），而营区内部则在进行彻底大搜查，全部东西都要拆开看看，抖抖。傍晚给草原上送来了面包和水。军官们已经编好了名单。他们按名单叫人，答应的就划上个记号，说明活着，发给一份口粮，并立即把他们按名单分开。

暴动委员会的委员们及其他受到怀疑的人关进了劳改营监狱。监狱不再是参观场所了。一千多人被挑出来，有的送进秘密监狱，有的押往科雷马河沿岸。（像往常一样，这些名单是胡乱编制的，许多什么都没干的人也上了名单。）

是的，这种平息叛乱的景象会使那些厌恶本书这几章的人感到心情舒畅的。他们想：这回我们保险了！谁也不必再躲进“储藏室”去，对讨伐者的报应是永远不会到来的！

六月二十六日一整天强迫囚犯们拆除壁垒，堵住大墙豁口。

六月二十七日便带囚犯去劳动了。这时那等待已久的一列列货车才终于有人卸车了！

镇压肯吉尔的坦克又开到矿山去，在那里的囚犯们面前绕了一阵子，以表示：你们也应该得出应有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秋季对暴动的领导者们进行了审判。当然，是秘密审判，我们对此很少了解……据说，库兹涅佐夫在法庭上态度坦然，他极力证明在当时情况下他的所作所为无可指责，不可能想出比他更好的办法了。我们不知道对他怎么判决的。斯鲁钦科夫、米哈伊尔·凯列尔、克诺普库斯三人想必是处决了，我的意思是说，一般地说一定是会枪决的，不过，也许一九五五年这个年头本身帮助减缓了他们的判决？

在肯吉尔营又组织起了诚实认真的劳动生活。免不了要把不久前的暴乱者组织成突击作业班。全面地实行了经济核算制。售

货亭开始售货。又弄来一些旧影片放映。看守和军官们又开始到总务科大院里为自己的小家庭制做点什么了：做一根钓鱼用的绞竿，钉个小匣子，修修女式手提包的拉锁之类。暴动过的鞋匠和裁缝（大多是立陶宛人和西部乌克兰人）如今又在替军官们缝制轻软的高筒靴，替他们的妻子做衣服。照旧把犯人带到选矿场去替军官们剥下电缆上的铅皮，然后拿回营来铸成猎枪用的霰弹，军官们要去打羚羊嘛！

不过，这时笼罩整个古拉格群岛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也感染了肯吉尔。所以，没有重新往窗户上装铁栅栏，晚间工棚不再上锁了。开始实行“三分之二”提前假释的办法。甚至空前地对第五十八条囚犯采取了一个“撤消判决”的行动——释放了一批垂死的人。

墓地上的青草往往长得特别浓密，茁壮。

到了一九五六年便取消了那个营区。这时，留居当地的从前的流放犯才终于寻找到埋葬那些人的地方，并且把草原上采来的郁金香花奉献到这里。

> “暴乱不可能取得成功。
> 因为，它一旦胜利，人们就不再用这个名称……”
>
> （罗伯特·彭斯）

每当您在莫斯科走过多尔戈鲁基的纪念碑前时，请您想一想吧：这座纪念碑是在肯吉尔暴乱的日子里揭幕的。这样，它似乎就成了为肯吉尔建立的纪念碑。

第 六 部

流 放

连血骨都思念故乡。

（俄罗斯谚语）

第　一　章

自由初期的流放

人类在发明监狱之前想必已经发明了流放。古时把某人逐出部族也就是流放吧。人一旦脱离他久已习惯的环境和地点有多么不易生存，这一点看来很早就为人们所理解了。尽管此处不是千里冰封，而是芳草如茵的绿洲，你也总会觉得一切都不对头，都格格不入，难于安居，都像是临时应付，并非久远之计。

俄罗斯帝国在实行流放方面也并没有落后。早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期的一六四八年制定的《俄国法律大全》里，就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流放这一条。但实际上这个办法早在十六世纪末，还没有什么《法律大全》时，就已经实行了：流放过失宠的卡尔戈波尔人，乌格利奇人，杀害皇太子德米特里的见证人们。这时期辽阔的西伯利亚已经属于俄国，不愁没有供流放的地方。到一六四五年流放犯总人数已达一千五百人左右。到彼得大帝执政时已开始成百人成百人地分批流放。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伊丽莎白女皇废除了死刑，把它改为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是，这里却有人偷天换日，把流放看作不仅是强迫迁移到边远地区去自由居住，而是要服苦役。强迫劳动，这已经不能算是流放了。到

了一八二二年，沙皇亚历山大颁布关于流放的法令，使这一偷换固定下来。因此，十九世纪的流放犯数字中显然是包括苦役犯在内的。十九世纪初每年流放人数约在二千至六千之间。从一八二○年起对流浪者（我国叫作“寄生虫”）也实行流放，因而数字有时高达每年一万人。一八六三年选中了和大陆分开的荒凉的萨哈林（库页）岛，把这个岛也划归流放地区，流放的可能性进一步扩大了。整个十九世纪中判处流刑的人数总共为五十万，十九世纪末期共有流刑犯三十万人。[①]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关于流刑的法规又翻出了新花样。出现了一些较轻的形式：“驱逐到两省以外”以至“驱逐出境”。[②]（当时并不像十月革命后那样，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多么无情的惩罚。）另外，还实行过所谓“行政流放”作为司法流放的一种方便的补充措施。但是，那时流放的期限是明确规定的，甚至所谓“终身”流放实际上也不是终身的。契诃夫在《萨哈林》一书中说，经过十年的流放生活之后（如果流刑犯“行为端正”——这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标准，而据契诃夫证实，当时对这一标准的掌握是相当宽大的——的话，甚至可以在六年之后）流刑犯就可以转入农民状态，他就可以作为农民而迁到他原籍之外的任何地方去居住。

沙皇统治的最后一世纪的流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个人性质。这个特点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的，而我们现在却反倒觉得奇怪了。那时候不论根据司法判决还是通过行政命令判处的流刑都仅仅适用于被判罪者本人，而绝不适用于该人所属的集

① 此处数字均引自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的名著《俄国》一书的第十六卷（《西部西伯利亚》）。作者本人是著名的地理学家，他的几位弟兄也都是奋不顾身的坚强的自由战士，他们对于在俄国传播自由思想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在十月革命中他们家破人亡，一个兄弟在庄园里被枪决，这所坐落在拉诺瓦河上的舒适的庄园被焚毁，大片椴树和杨树林砍伐一光。

② 见Н·Ф·雅库博维奇：《在被遗弃者的世界里》。

团的任何其他成员。

随着岁月的推移，流放条件及其严酷程度也不断变化，一代一代的流刑犯给我们留下来的证明材料各不相同。流刑犯们在押解途中的处境很艰苦，但是，我们从П·Ф·雅库博维奇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书里都可以看到，解押政治犯时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费·柯恩还补充说，如果一批解犯中包括政治犯，押解士兵**甚至**对刑事犯的态度也很客气，因而刑事犯都很尊重政治犯。有几十年的时间西伯利亚居民对流刑犯是怀有敌意的：把最贫瘠的土地和费力多、挣钱少的工作留给他们，农民们不让女儿嫁给他们。流刑犯带着耻辱的烙印生活无着、饥寒交迫，因而便集众结伙，打家劫舍，这自然更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但是，这一切都同政治犯毫无关系。政治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增加。柯恩的书里说，亚库特人当时很欢迎政治犯，对政治犯寄予希望，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医生、教师和帮助自己在当局面前维护权益的法律顾问。处于流放状态的政治犯至少还有工作和治学的条件，所以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学者（有些人的学术生涯正是从流放后才开始的），其中包括地方志学家、人种志学家、语言学家、[1] 自然科学家，以及政治评论家和作家。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上没有看到政治犯，因而也没有给我们描写他们的生活[2]，但是像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的费·柯恩这样的人后来就曾在进步报纸《东方评论》编辑部工作，而在这里与他共事的就有民粹派、民意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克拉辛）。伊尔库茨克不是西伯利亚的普通城市，它是省

① 庯·博戈拉兹，В·И·约赫尔孙，Л·Я·施特恩贝格。

② 契诃夫由于自己在法律上太单纯，更主要的是按照当时的时代精神，他没有带上去萨哈林岛出差的任何公文和证件。虽然如此，当他心血来潮，想了解流刑苦役犯的生活时，人们还是给他提供了机会，甚至给他看了一些监狱文件！（和我们现在的情形比较一下看！你试试不带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介绍信去检查一下劳改营的情况看！）只是没有让他同政治犯会面。

会。按照有关流刑犯的指令，是根本不准政治犯到这里来的。可是，他们却在这里的银行和公司里工作，在学校教书，出席豪门的家庭招待会，同当地知名人士交往。而在鄂木斯克，流刑犯们竟把一些其他任何地方的书刊检查官都不会通过的文章发表在该市出版的杂志《草原地带》上。他们甚至把自己的报纸寄给兹拉托乌斯特矿场的罢工工人们。西伯利亚的另一城市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也是由于流刑犯才变成激进城市的。而在米努辛斯克市流刑犯竟然以马尔蒂扬诺夫博物馆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十分有威信的积极分子集团，毫不理会当局的限制。他们不仅畅通无阻地建立了全俄性的"安置收容网"，以帮助逃亡者（我们已经谈过那个时期多么容易逃亡），而且还指导米努辛斯克市公开的"维特"委员会的活动[①]，即使契诃夫确曾感叹地说过萨哈林岛上对刑事犯实行的制度是"以最庸俗的形式回到了农奴制"，那么，对于政治犯的流放也是无论如何不能这么说的，自古以来直到最后的沙皇俄国都没有这么干。及至二十世纪初期，俄国政府对政治犯实行的所谓"行政流放"已经完全有名无实，几乎不能称为惩罚了，那只是一种空洞的、"衰败老朽的办法"，"只能证明政府自己无能"（古奇科夫语）。因此，一九〇六年斯托雷平便采取措施完全取消了这种流放。

对拉季舍夫的流放算得了什么？他在乌斯特伊利姆斯克村里购置了一所二层木结构小楼；（顺便指出：他只用了十卢布！）同自己的小孩子和妻妹住在那里，妻妹这时已代替他的妻子。谁也没想强迫他去劳动，他完全自由地生活，并且可以在整个伊利姆斯克专区内自由活动。把普希金流放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算得了什么？这一点现在许多去那里参观过的人已经有所了解。其他许多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流放也大致如此：屠格涅夫去斯巴斯科

① 见费利克斯·柯恩：《五十年间》，第二卷"在流放地"。

耶—鲁托维诺沃*，阿克萨科夫（根据他自己的选择）去瓦尔瓦里诺。特鲁别茨科伊还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苦役营时就同妻子住在一起（还生了一个儿子），几年后他又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时，他们家在那里买了一所很大的宅院，有自家的车马、仆人，他还替孩子们雇佣法国人当家庭教师（当时的司法思想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认清"人民敌人"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的程度）。流放到诺夫哥罗德的赫尔岑，由于他在省里的地位，警察局长还得向他报告工作。

这种宽厚的流放政策不仅仅适用于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甚至到了二十世纪，还有许多革命党人和对社会不满的分子受过这种宽厚的流放，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所以他们根本不怕流放。已经从流放中逃跑过四次的斯大林，又第五次被流放到……沃洛格达去了。瓦季姆·波德别尔斯基由于发表激烈的反政府文章而被流放……是从唐波夫流放到左近的萨拉托夫！看，有多么残酷！何况在萨拉托夫当然不会有人强迫他劳动。[①]

但是，即使这样的、我们现在看来过分优待的、既不受饥寒、也没有生命威胁的流放，对当时的流放者来说却有时还是难以忍受的。许多革命者在回忆录中谈到他们离开监狱——离开那不愁没有面包吃的、温暖的、不受风吹雨打的、有充分时间钻研学问并进行党派争吵的监狱——面改为流放时有多么难过，因为到了流放地他们就不得不在人地两生的情况下自己考虑吃住问题了。至于那些不须自己张罗吃住的人，（据费·柯恩说）则更是苦恼，因为他们感到"可怕的无所事事……最可怕的是人们只好什么事也不做"。正因为如此，某些人才开始钻研科学，有些人想法去赚

---

* 屠格涅夫的母亲在这里有一座大庄园。——译者注

① 许多俄罗斯城市的大街是以这位革命者的名字命名的。但是，这位革命者看来是太没有劳动习惯了，以致在第一个义务星期六的劳动中手上就磨出了血泡，不久竟由于这血泡而………命呜呼了。

钱，做买卖，有些人则在绝望之余饮酒作乐，潦倒终生。

但是，怎么会无所事事呢？当地居民并没有为无所事事叫苦嘛！当地居民每天得忙到晚上才能稍微直一直腰呀！因此，确切点说，是因为这些流刑犯的活动土壤和久已习惯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断了根，丧失了与生活的联系。

记者尼古拉·纳杰日金只经过两年的流放生活就失去了追求自由的兴趣，甚至变成了沙皇宝座前的忠实奴仆。豪爽而放荡不羁的缅希科夫一七二七年被流放到别廖佐沃，他就在那里修了一座教堂，同当地居民在教堂里议论尘世的空虚，蓄起了胡须，穿起普通的长袍，不到两年便死去了。在我们看来，拉季舍夫那种自由自在的流放生活算什么负担，有什么难以忍受的呢？可是后来当他在俄国受到第二次流放威胁时，却吓得自杀了。而普希金住在他的原籍——那个人间天堂般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里，看来像是上帝安排的好日子，满可以过下去，可是他在一八二四年十月写给茹科夫斯基的信里却说："帮助我离开这里（指流放地——作者注）吧，哪怕去要塞监狱也行，去索洛维茨的修道院监狱也行！"而且这不是一句漂亮的空话，他写给省长的信里也曾请求把流放刑改为去要塞监狱。

现在我们了解索洛维茨，所以听到这话不免感到惊奇，心想：这位被迫害的诗人是在怎样激昂慷慨的情况下，在怎样的绝望中，决定抛弃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而宁肯请求去索洛维茨群岛的呢？……

这就是流放（即完全迁移出故地并捆住两脚强行安置在某处的流放）所具有的那种阴森森的力量。古代统治者早已认识到这种力量，奥维德*早已尝到过它的滋味了。

那是空虚，是惆怅，是毫无生活气息的生活。

---

* 奥维德，古罗马诗人，失宠后被流放。——译者注

*　　　　*　　　　*

光辉的革命应该是永远扫除各种迫害工具的。流放当然也应该列在这些压迫工具的清单上，或许该占第四五位吧。

可是，当革命还没有来得及长大，当它还刚刚用那小腿歪歪扭扭地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它就懂得没有流放不行了！也许有那么一年左右的时间俄国是没有流放的。就算有三年吧。然而，很快就开始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强制迁移”，也就是把一些不喜欢的人迁移出去。我们来听听一位后来成为元帅的人民英雄在谈到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情况时所说的实话吧：“已作出决定，要**大批地迁移**土匪（应读作“游击队”——作者注）户。建立了**一些庞大的集中营**，在迁移之前先把这些家庭关进去。”（**黑体**是我改用的——作者。）[①]

要把犯人押送到某个地方，路上就要警卫，并且要给他们饭吃，到达目的地后还要使他们分开住，又要警卫。比较起来，就地枪决方便得多。就是因为这点方便，才没有把系统的流放制自始至终贯彻到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不过，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六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就已经成立了常设机构“迁移事务委员会”，专门从事迁移“社会危险分子，反苏维埃党派的积极分子”，也就是说，迁移布尔什维克党之外的所有其他党派的人，期限是三年。[②] 可见，早在二十年代初期有关机关就已经在逐渐地、有步骤地执行关于流放的指令了。

的确，没有恢复对刑事犯的流放。因为这时已经发明了劳动改造营，可以收容这些人。但是政治犯的流放手续却比以往任何

---

① 见图哈切夫斯基：《同反革命暴乱作斗争》，《战争与革命》杂志，1926年第7—8期第10页。

②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法令汇编》，1992年第65期第844页。

时期都方便了：这时已经没有反对派的报纸，无人再发表流放的消息。不声不响地就能把事办了，而在左近的目睹者及流放者近亲好友的眼里，目前这种不凶狠、不急迫的三年流放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就地枪决相比，倒似乎是一种抒情诗般的教育措施了。

然而，没有人能够从这种笼络欺骗的防疫性流放中再回到故乡来，即或有人设法回来，也很快就被重新抓走了。人们一旦陷进去，就只好在这群岛上绕圈子，这圈子最后折断时，其最后一弧必然是伸到墓穴里去的。

天性敦厚的人们没有立即看清当局的意图。他们不懂得，只是因为政权还没有站稳脚跟，还无力把所有不中意的人全部立即消灭，所以才把这些注定遭殃的人们暂时不从生活中勾销，而只从人们的记忆中挖掉的。

流放之所以容易恢复，还因为革命前押送囚犯的驿站和道路这时还没有损坏，还能使用，西伯利亚、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那些流放地点也丝毫没有变化，当地人也不会对流放感到惊奇。（不过，考虑国家大事的人们并未就此止步，某个人还会用手指在占地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地图上一划，指向一点，于是，刚刚并入共和国联盟的广阔的哈萨克斯坦便将其辽阔土地提供给流放用了。何况在西伯利亚也还有许多更加荒僻的地方可用呢！）

但是，流放的传统里也传下来某些不方便的东西，这就是流刑犯的依赖心理：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养活他们。沙皇政府没敢强迫流刑犯去增加国民收入。而当时那些职业革命家们则认为劳动会降低他们的身分。在亚库特地区，当时分给流刑犯每人十五俄亩*土地。（相当于今天的集体农庄庄员土地的六十五倍！）流放的革命家并不急忙奔去耕种这些土地，倒是当地的亚库特人狠狠抓住土地不放，他们付给革命家“顶地钱”，即租钱，用实物或者

---

* 一俄亩相当于1.09公顷，相当于中国的16.35市亩。——译者注

马匹换取土地。这样，两手空空来到流放地的革命家立即就变成亚库特人的债主了（费·柯恩）。此外，沙皇政府还发给自己政治上的敌人生活费：每月十二卢布的伙食费和每年二十二卢布的被服费。据列佩申斯基[1]说，列宁流放在舒申斯克时也曾领取（他并没有拒绝呀！）每月十二卢布的伙食费。列佩申斯基本人的伙食费是每月十六卢布，因为他不是普通流刑犯，而是被流放的官员。现在费·柯恩对我们说，这些钱在当时是非常少的。但我们知道当时西伯利亚的物价只相当于俄罗斯中部地区物价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因此，公家发给流刑犯的生活费是绰绰有余的。例如，这笔生活费就保证了列宁在整整三年期间毫无困难地从事革命理论的研究，根本无须操心生活问题。马尔托夫在他的书中说，他每月交给房东房租和包伙费五卢布，余钱留下来买书和积蓄起来准备逃跑。无政府主义者А·П·乌拉诺夫斯基说，只是到了流放地（在图鲁汉斯克边区，他是和斯大林在一起的）他才生平第一次有了余钱，他把这些钱寄给一位在路上结识的自由人姑娘。也是在这里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可可粉的味道。他们在流放地可以吃到鹿肉，打鹿很容易。买一所很不错的小房只需十二卢布。（一个月的伙食费！）没有一个政治犯感到过缺钱花。所有的行政流放犯都领生活费。他们的衣着也都不坏（他们从流放地回来时都穿得很好）。

的确，终身移民流刑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犯”们，是不能领取生活费现款的。但是国库无偿地发给他们皮大衣、全部服装和鞋。契诃夫确认，萨哈林岛上所有的移民流刑犯到流放地后的头两三年（妇女们则是在整个刑期中）都可以从国家领取实物以便维持生活，包括每天四十“所洛特尼克”（即二百克）的肉食，而烤好的面包是每天三俄磅，即约一千二百克，相当于我们

---

[1] 列佩申斯基：《转变》。

沃尔库塔矿山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完成定额百分之一百五十时所领到的口粮。(不错，契诃夫认为那面包烤得不熟，而且面粉很粗。但是，我们劳改营里的也并不好些呀！）每年还发给他们一件皮短大衣，一件农民穿的粗呢上衣和几双鞋。还采取一些其他办法：沙皇国家为了使移民流刑犯能够维持生产，有意地用高价购买他们的产品。(因此，契诃夫得出的结论是：不是俄国从萨哈林岛这个移民区受益，而是俄国在养活这个移民区。)

是啊，我们苏维埃式的政治流放当然不能建立在这种极不健全的基础上。一九二八年举行的第二次全俄行政工作者大会认为当时的流放制度不够令人满意，并决议"以移民区形式在边远的、与世隔绝的地区组织流放，实行不定期判决制度"(即无期判决制度)[①]，自一九二九年开始就朝着把强迫劳动与流放制度结合起来的方向发展了[②]。

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苏维埃式的流放当然也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实行。但是当初正是那些社会主义者久已习惯于在流放中吃免费伙食了！因此，苏维埃政权也没敢立即改变这个传统，只好暂时继续发给政治流刑犯生活费。不过，当然不是发给所有的人，不给反革命分子，而只给政治犯，而且对政治犯也是区别对待的。例如，一九二七年在奇姆肯特地区给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每月发六卢布，而给托洛茨基分子每月发三十卢布。(总是自己人嘛，同是布尔什维克嘛！）不过这已经不是沙皇时期的卢布了，这时租一间最小的房间每月也要付十卢布，每天二十戈比的伙食费是相当艰苦的。越往后越严厉。到一九三三年时，给政治犯的生活贴补是每月六卢布二十五戈比。而在那一年，我自己记得很清楚，买一公斤半生不熟的议价黑面包

①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号4042，目录号38，卷号8，第34—35页。
②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号393，目录号84，卷号4，第97页。

（配给卡之外的）就要花三卢布。所以，那些社会主义者们到了这步田地也就无法再去向人们讲授语文或撰写理论文章，只好为生存而“折腰”了。可是，只要谁找到了工作，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便立即取消发给他们的那一点点补贴。

即使流放者愿意劳动，他也并不容易挣到钱！要知道，二十年代末期正是我国失业严重的时期，履历表上没有污点的人和工会会员有得到工作的优先权，流刑犯无法凭自己的教育程度或工作经验同他们竞争。此外，警备司令部也是压在流放者身上的一块石头：不经它批准，任何机关不敢雇佣流放者。（甚至从前的流刑犯也很少有希望找到较好的工作；公民证上的图章妨碍着他。）

据帕·斯-夫回忆，一九三四年喀山有一批知识分子流刑犯为生活所迫同意受雇当铺路工，去铺设石路。而警备司令部却斥责他们：“为什么要搞这种示威？！”但又不帮助他们找别的工作。因此，格里戈里·勃便向行动人员问道：“你们最近准备进行什么审判不？要有的话，我们愿意去当雇佣的证人！”

只好去从桌上打扫别人的残羹剩饭了。

看，俄国的政治流刑犯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哪里还有时间争论和写什么反对“信条”的文章呢！“怎样消磨这毫无意义的无所事事的时间？”对不起，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这种“苦恼”；他们不得不考虑的是：怎样才能不致饿死，不致堕落为告密者。

在我们这个终于从多少世纪的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国家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政治流刑犯那种高洁不屈、倜傥不羁的态度便像被戳破的气球一样跌落在地了。曾使从前的政权望而生畏的政治流刑犯的力量原来是虚幻的假象！形成并且维持那种力量的是，也仅仅是，国内社会舆论，而社会舆论一旦被有组织的舆论所代替，政治流刑犯和他们的抗议、权利等等就统统会在愚昧迟钝的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和冷酷无情的秘

密指令的专横肆虐下被打个落花流水。(顺便提一句，在起草第一批这类秘密法令的问题上也有内务部长捷尔任斯基的一份功劳。)如今，流刑犯的任何一个沙哑的呼叫声，甚至关于他自己的一个字，都不可能再到达自由的外界了。如果一个被流放的工人写信给他原来工作的工厂，而收到信的工人（例如，列宁格勒的瓦西里·基里洛维奇·叶戈申）在工厂里宣读了这封信，那么这个工人也就会立即被流放。流刑犯不仅没有钱财和生活资料，而且丧失了一切权利：对于这些人，格别乌比他们还是自由人的时候更容易拘留、逮捕、押送到任何地方去，现在没有任何顾忌，就像不是对待人，而是对待胶皮玩具娃娃一样。[①]要想摧毁这些人的生活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例如，在奇姆肯特就曾突然宣布：在**一昼夜内**取消这个流放点！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一昼夜内交待完工作，拆毁住房，处理掉全部家什，整理好随身带的东西并走上指定的旅程。他们的队伍比囚犯队伍强不了多少！明天的流放生活并不比今天的囚犯生活更有希望和信心！

但也不单是由于社会的沉默和格别乌的压迫。那些被流放者自己，那些没有党的假想党员们自己又怎么样呢？我这里不是指立宪民主党人，这时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立宪民主党人了，他们已被消灭光。可是，在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三〇年时期作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或孟什维克又意味着什么呢？当时国内已经没有任何符合这一名称的社会活动家集团。二十年代初曾要求所有社会党人放弃他们党派的信仰，大部分人同意这样做，脱离了自己的党派，声明忠于自己信仰的人只是很少数。(虽然在做历史的回顾时，我们觉得这类信仰已经没有多大意思，因为所有的社会主义党派实

---

① 西方的某些社会主义者只是到了1967年才感觉到"同苏联在一起当社会主义者是可耻的"。其实，他们本可以在四十到四十五年之前就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早在那个时候苏联的共产主义者就已经把苏联的社会主义者连根消灭掉了。但是，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当时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

际上只是为布尔什维克得势帮了忙。自从革命胜利那一天起，在整个动荡沸腾的十年中，这些所谓的党派没有重新讨论过自己的纲领，甚至假如这些党派突然复活，它们大概也不会知道该怎么理解当前事件，该提出什么建议。所有报刊谈到这些党派时早已习惯于使用过去时态了，它们的一些幸存的党员如今完全生活在家庭中，从事专业劳动，关于自己的"党"连想也不再想了。但是，格别乌的档案记载却是抹不掉的。于是，突然根据某个夜间信号又把这些分散在各处的驯顺的家兔一个个揪出来，经过监狱，押送到……譬如说，布哈拉地区去。

伊·瓦·斯托利亚罗夫就是这样在一九三〇年来到这里的，他在这里见到了从祖国各地揪出来的、衰老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些脱离了习惯生活的老朽，如今只好在这里开始争论他们的问题、估计政治形势提出各种建议、进行猜想：假如当初……的话，假如……的话，那么历史就会怎样发展……

于是，这些人便自然而然地拼凑成了某种东西，但它已经不是政党，而是……一只将要被击沉的靶船。

在流放地人数较多的是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党人和亚美尼亚的达施纳克党人，那是共产党夺取了他们的共和国以后被大批流放到远地的。人们回忆说，属于社会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生气蓬勃的青少年组织"加舍梅尔"和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人农业公社的合法组织"盖哈鲁茨"是二十年代的一个活跃的、有战斗力的党派。一九二六年他们的中央全体被捕，一九二七年把还不到十五六岁的男孩和女孩们从克里米亚抓去流放。他们被送到图尔特库里及其它管理严格的地方。这才真正是一个党——团结，顽强，深信自己的正义。但是他们争取实现的不是共同的目标，而是他们单独的目标：要作为一个民族生活，要在自己的巴勒斯坦生活。自愿放弃了祖国的共产党对别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然

是不能容忍的。①

在各个流放地，社会党员们仍在寻找自己人，他们的各种派别在形成并且积极地活动，建立着互助基金会（但有严格的派别界限——自己人只帮助自己人）。从容易找工作的地方，例如奇姆肯特，给“北方的”没有工作的同党以及蹲隔离所的人寄来救济金。为获得“政治犯地位”而斗争的思想表现得十分活跃。（社会党人在整个苏维埃时期都未能懂得，不捍卫全体囚犯的权利，而只捍卫自己的和自己人的权利——这是多么丢脸。）在某些地方他们还实行过合伙做饭，看孩子，因此自然会有一些集会，互相家访之类的活动。他们在流放地共同庆祝“五一”（示威性地不纪念十一月七号）。

在苏维埃年代形成的各党派之间的不友好的关系大大地削弱了流放者的力量，自二十年代中期起，流放地出现了大批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除了自己之外，不承认任何人是政治犯，党派间的关系变得特别尖锐了。

在流放地“政治犯”们仍有机会放弃原来的观点并通过这条路子得到释放，但是在各个派别的眼睛底下，这类事情在这里毕竟很少见。不过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是被解除了流放（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名字被遗忘了）——这样一来，行动科的鹰眼对留下的人盯得更凶狠了。一九三七年就把他们全部关进了监狱。

二十和三十年代生活在流放地的，并不单是社会党人，——

---

① 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种要求光复祖先的土地、确立祖先的信仰、结束三千年的流离失散的生活而聚集到一起去的愿望是很自然的、高尚的，它至少应该受到欧洲各族人民的同情和帮助。当然，用克里米亚来代替巴勒斯坦不能说是纯正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可是，斯大林竟向这个地中海沿岸的民族建议，让他们选择靠近泰加森林的比罗比詹作为他们的第二巴勒斯坦，这也未免是有意嘲笑了吧？非常善于长期隐瞒自己意图的斯大林，在他向这些犹太人发出这种亲切的“邀请”时是否已经在初步考虑他计划在1953年进行的大规模流放了呢？

而且社会党人完全不占主要地位（一年比一年明显）。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的有妨碍确立新制度的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有国内战争中没消灭干净的旧人员。甚至还有“因为跳狐步舞”而被抓的男孩子[1]。有行招魂术者。有搞通灵术者。有神职人员——他们最初还有权在流放地做弥撒。还有普通的信徒，普通的基督徒*（好几百年前俄罗斯人曾把这个词稍加改变，用以称呼农人）。以及普通的农民。

所有这些人仍在那个行动科的监视下，全部分化瓦解了，麻木不仁了。他们彼此一年比一年更疏远，免得内务委员部怀疑他们有“组织”，以成立新“组织”为理由抓人。（等待他们许多人的正是这个命运。）这样一来，在国家流放的大圈子里，他们又陷进了自愿流放（即孤独状态）的小圈子（斯大林要的就是这个）。

当地居民对流放者的疏远也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当地人对流放者有任何亲近的表示，都会招致迫害，犯禁的人要被流放到其它地方，年轻的要被开除出共青团。

由于全国的冷漠态度而灰心失望的苏联流放者甚至丧失了逃跑的意志。对沙俄时代的流放者来说，逃亡像是一种有趣的体育锻炼：斯大林五次逃亡，诺金六次逃亡。那时他们即使被捉住，也不会为此吃子弹，不会去服苦役，而只不过是在一次有趣的旅行之后重新被送回原流放地。可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僵硬而庞大的格别乌却对流放者实行了党派内部连坐制度：一个人逃跑，与他同党派的所有人都要负责！由于空气稀薄得喘不过气，压迫太难忍受，致使那些不久前还是骄傲而威武不屈的社会主义者竟也不得不接受这连坐制度！现在他们自己，以自己的党的决议的

---

① 1926年，西伯利亚，据维特科夫斯基证实。

* 俄文“农民”（крестьянин）一词就是从“领过洗的人”，“基督徒”（христианин）一词转化来的。——译者注

方式，禁止自己逃跑！

其实，逃又逃到**哪里去**？到**谁那里**去？……

老于世故的、善于寻找理论根据的机灵人很快就想出了一种理论：现在不是逃跑的时候，应该等待。而且，总的来说，现在也不是进行斗争的时候，也应该等待。尼·亚·曼德尔施塔姆就曾证实，三十年代初期流放到切尔登地区的社会党人完全放弃了任何抵抗，甚至感到灭亡不可避免。他们唯一较现实的希望是：加判新刑期时最好不要重新逮捕，最好就让他们在当地签字，这样总还可以把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一点点家当保留下来。他们在道德方面给自己提出的唯一任务是：在死亡之前保持人的尊严。

在苦役营中我们由被压碎的个体突然开始联合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以后，回想以前那个分崩离析的过程，觉得很悲哀。但是我们这几十年，社会生活是朝着扩大和充实（吸气）的方向走的，而那个时代它正走向压迫和紧缩（呼气）。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不该责备那个时代的。

另外，流放也分成各种等级，这更使流放者离心离德，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当局规定了不同的更换身份证的期限（有些人要每月更换一次，而且手续非常繁杂）。每个人都怕落到更坏的一级去，因而尽量奉公守法。

直到三十年代初期还保留着一种最宽大的惩罚方式：不是判处流放到某地，而是判“**减号**”（“排除”），即不限定受惩罚者必须到某地去居住，而是“**减去**”，即排除若干城市，除这几个城市之外他可以任意选择居住地。一旦选定之后，他同样必须在这个自选的地方住满三年期限。受到这种惩处的人无须到格别乌机关去登记，但也无权离开该地区。在那失业的年代职业介绍所不给受“减号”惩处的人介绍工作。如果他自己竟然设法找到了工作，也会对该单位施加压力，迫使解雇他！

"减号"判决好比大头针：用它暂时把害虫钉在那里，它就会老老实实地在那里等待。直至轮到他正式被捕为止。

当时人们还信任这个先进的制度，认为这个制度不会实行流放，而且也不需要实行流放！还相信会有大赦，特别指望在光辉的十月革命节十周年前夕有大赦！……

大赦终于盼来了。大赦却像是当头一棒。对流刑犯（而且不是所有的人）只减免四分之一刑期（即三年刑期只减免九个月）。但是，因为整个大牌阵早已布置好了——三年流放之后紧接着要蹲三年政治隔离所，然后又是三年流放——所以，这九个月的减免丝毫没有使生活变得美好些。

何况这期间还可能重新审判、重新判刑。无政府主义者德米特里·维涅季克托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去三年，而在快满刑的时候（一九三七年）他又被捕了，"确凿无误"的罪状是：他"散布了有关公债的谣言"(关于公债可能有什么谣言呢?反正每年五月，就像花一定会开一样，必定会发行新公债。）和"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是啊，被流放的人应该感恩戴德、庆幸自己的遭遇才对！）既然他犯下了这么卑鄙的罪行，还能怎么办?！判处枪决，七十二小时内执行，不准上诉！（关于他身后留下的一个女儿加丽娜，我们在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

我国人民争得了自由，而自由初期的流放就是这个样子。完全摆脱流放的道路就是这样的。

流放，它实际上是一个羊圈，暂时关在这里的羊都是预定要宰杀的。在苏维埃政权最初一些年代被流放的人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一般居民，而是等待着被召到**那个世界**去的人。（"历史反革命"或普通农民当中有一些聪明人早在二十年代就看清了将来的事。因此这些人在服满第一次三年流放期后仍旧谨慎地留在原地了，例如，留在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并不到别处去。这样做的人中间有些人避免了再次被捕入狱。）

请看，从舒申斯克村的和平流放，从有可可粉的图鲁汉斯克的和平流放生活，发展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流放变成了什么样子！

奥维德的悲伤在我们国内就是由这些东西加以补充的。

第　二　章

农　瘟

这一章里谈一件小事。讲讲一千五百万农奴，谈谈一千五百万人的生命。

当然，这是些没学问的人。不会拉提琴。不知道谁是梅耶霍德*或者研究原子物理是多么有趣。

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死亡和失踪人数不到两百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数字为两千万（这是赫鲁晓夫的说法，照斯大林的说法仅仅是七百万。约瑟夫是不是没有好好照管自己的资本?）。可写了多少颂歌啊！树了多少方尖碑，为哀悼牺牲者鸣了多少枪啊！多少部长篇小说和长诗啊！——四分之一世纪内浸透了苏联文学的不全是这一潭鲜血吗。

但是却没有一本书写那场不声不响的、翻脸不认人的瘟疫，它啃掉了我国一千五百万庄稼汉，——这还是往最少里说，而且只

* Bc・Э・梅耶霍德（1874—1940），苏联著名演员，对先锋派艺术影响极大。死于清洗中。——译者注

算到一九三二年！[1] ——不是挨着个儿啃，而是专挑最好的，专挑俄国人民的脊梁骨。还有在随之而来的人为的布尔什维克大饥荒中饿死的六百万人呢，关于他们，我们的祖国以及和我们接壤的欧洲也一声没吭。在丰饶的波尔塔瓦平原，村里，路上，庄稼地里，到处躺着没人收的尸体。车站旁边的小树林根本迈不进脚——腐烂的尸体臭气熏天，其中也有婴儿。那些爬到了医院门口死的，死因全写为“蛋白缺乏性浮肿”。库班的情形恐怕更要吓人。在白俄罗斯，许多地方收尸要靠外来的小队，本地已经没有能干这个的人了。

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晓，事后又削刮得十分干净，把任何一个低声耳语都压制下去了。所以，今天尽管还有许多人主动向我讲述劳改营的情况，而我不得不拒绝他们，“弟兄们，我不需要啦。这类素材我已经有一大堆了，书里放不下了！”可是，关于流放农民的情况却没有人送什么材料来。我真希望谁能在什么地方对我们讲讲这些事！

是的，我确信，描写这个题材所需要的不只是本书的一章，也不只是个别作家的一本书。可是，我却连写一章的材料也搜集不起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下决心写这一章。我把这一章当作一个记号，一个标志，看作最初几块小石头，让它暂且标志出这个地方。我期望着将来总会有一天在这里重建起救世主耶稣的新殿堂。

这一切都是从什么引起的呢？是从农民是**小资产阶级**这一教

[1] 如果按照斯大林在第一届集体农庄突击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莫斯科，1951 年，第 13 卷，第 246 页）判断，这个数字是缩小了的。他说每 100 个农户中有 4—5 户富农和 8—10 户富裕农民。两者合起来，应消灭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百分之 12—15。1929 年农户总数约为 2600 万，当时一个农民家庭平均在 5 人以上，而富裕农民的家庭则超过 6 人。

条引起的吗？（可是，按他们那些人的说法，谁又不是"小资产阶级"呢？根据他们那精确得出奇的公式来看，除了工业工人——这里还不能包括熟练工人——和管理企业的要人们之外，其余一切人，实际上是全体老百姓，不论农民、职员、演员、飞行员，还是教授、大学生、医生，统统都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是由于最上层的强盗式的如意算盘（抢劫一些人，吓住另一些人）所引起的呢？

我们从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柯罗连科临死之前，高尔基还没有移居国外的时候）写给高尔基的最后几封信中可以看到：对农民的这种强盗般的突然袭击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了，其进行方式同一九三〇年的方式几乎完全一样。（现在公之于众的这方面的材料，一年比一年多。）

无奈他们当时勇气有余，力不从心，这才不得不住手。他们是暂时后退了。

但是，他们并未放弃这个念头。整个二十年代他们一直在使用这张王牌，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污辱和谴责："富农！富农！富农！"这样，就在城市居民的思想意识中牢固地灌输进了一种信念：同"富农"是不共戴天的！

据我们判断，这场灭绝性的农民瘟疫开始准备的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当时联共（布）中央根据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安德烈耶夫的报告决定禁止富裕农民（"富农"）加入集体农庄——这样就把他们划分出来，准备消灭了。这项决定于一九二九年七月被正式批准——这时杀人名单已经编好，没收和强制迁出已经动手。一九三〇年伊始，在联共（布）中央一月五日关于加速实现集体化的决议中对已在进行的（已经排练完毕、安排停当的）事情做了公开宣布（党有"充分根据能够在实际工作中从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这一阶级的政策"）。

继党中央决议之后，一向只有唯命是从能力的中央执行委员

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也不敢拖延，旋即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以立法形式把党的意志变作法律了。它们授权州和区的执委会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展开反对富农的斗争，直至采取（也只能如此）完全没收富农财产并将他们从个别区和边区迁出的办法。”

说到最后一句话，屠夫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只说了从哪里迁出，但没说迁到哪里。傻头傻脑的人可能理解为——迁到三十俄里以外，挨边的什么地方……

另外，“先进理论”似乎并没有提到“富农的应声虫”（“二富农”）这个词。但是，根据刈草机的工作面的宽度来看，不把二富农挂带进去是不行的。关于“二富农”这个词的意义和代价我们已经分析过了。既然已经宣布“要征集包装材料”，少先队员们正在挨户收集农民的麻袋，交给极端贫穷的国家，而你却不愿意交出来，心痛自己那一点点好东西，（这在商店里买不到呀！）那么，你不就是二富农吗？！那就该流放你！

于是，“二富农”这个头衔就在整个苏维埃俄国，在尚未从内战的流血激荡中冷静下来的苏维埃俄国到处流行起来！那个人只说了几个字，未加任何解释，但其含义似乎已经非常清楚。于是，一切都简单化了，丝毫也不必多加思索。于是，内战时期的一条野蛮法律又恢复了，那就是：让他们十个人给我们一个人偿命！让他们一百个人给我们一个人偿命！（据我所知，这并不是俄罗斯人的法律；俄国历史上难道有过这种事吗？）只要有一个积极分子（多半是个二流子，碎嘴子；所有的人都马上能回忆起来，带头没收富农财产的是些小偷和酒鬼）在农民进行防卫时被打死，就要消灭几百个最勤劳，最会过日子，最灵巧的庄稼人，即那些曾维持着俄罗斯民族的稳定性的人们。

“你在说什么？没有的话！”我听到有人对我们这样喊叫。“那些剥皮鬼呢？那些欺压乡亲们的家伙呢？他们干的是：我借给你钱，你扒下你的皮来还我！难道他们不是这么干的吗？”

对。是这样。被消灭的人里面确实有一小部分是剥皮鬼（全是吗?）。这里，我们也要问一下：剥皮鬼是有血缘遗传性的吗？这是他们那唯利是图的本性造成的，还是一切财富（以及一切权力！）所具有的对人的腐蚀性所造成的？啊！假如真能够这么简单地就能使人类“净化”，或者使阶级“净化”的话，那该有多好！可是，既然你们已经用密齿的铁篦子从农民阶级中把那些没有心肝的“剥皮鬼”都净化出去了，甚至为此不惜使一千五百万人丧生，那么，请问，今天的农村已经集体农庄化了，可那些凶恶的、吃得满面红光、肥头大肚、管理着农村（还有区委）的横行霸道的人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这些无情地欺压孤独老人和所有弱小者的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你们在“剥夺富农”的时候怎么忘记了把这些人的贪婪根子也拔掉呢？再想想看吧，这些人难道不都是从那时的积极分子中爬上来的吗？……

那个靠抢劫银行长大的人既不可能把农民看成兄弟，也不可能把他们看成主人。他只会发出一声强盗的呼啸。而随着这呼啸的号令，几百万勤劳的人便会被强行拉进原始森林和冻土地带，可他们都是满手老茧的庄稼人呀，正是他们为了取得土地才帮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他们是在取得土地之后才在自己的土地上迅速富裕起来的（“耕者有其田”嘛！）。

既然你们把库班地区的哥萨克村镇（例如乌鲁平镇）整镇整镇地“横扫”掉，把男女老幼一概赶走（迁来了一些复员士兵），你们怎么还能腼着腮帮谈论什么剥皮鬼呢？由此可见你们的所谓“阶级原则”是什么货色了。对不对？（这里还要顺便说一句，在内战年代正是库班人几乎没有给予白军任何支持；是他们首先摧毁了邓尼金的后方，主动设法同红军达成协议的。可是，怎么突然间就发生了“库班的怠工”呢?）古拉格群岛中有名的繁荣的农业中心地——道林卡村是怎么产生的？那里原来的居民（日耳曼人）全部在一九二九年被当作“富农”没收财产后赶走了。那个

村里到底是谁剥削了谁？

"剥夺富农"的原则是什么，调查一下孩子们的遭遇就更清楚了。以麻司列诺村的舒尔卡·德米特里耶夫为例吧（沃尔霍夫附近的谢里申移民营）。一九二五年他父亲费多尔死时他才十三岁，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其他都是女孩。父亲死后谁来"当家"呢？他这个唯一的男孩担起了这个责任，女孩们和妈妈都服从他。从此他就作为一个有家业的男子汉在外面和其他成年人打交道。他维持着父亲的家业，干得很好，到一九二九年时他家的粮仓都是满满的了。看，他也就成了富农！全家都得赶走！……

阿达莫娃-斯利奥兹贝格遇到过一个小姑娘，叫莫佳。据她讲，这个莫佳的经历也是十分动人的。莫佳是一九三六年被关进监狱的，罪状是"擅自逃跑"，因为她从乌拉尔地区的流放地私自逃回了位于塔鲁萨附近的故乡斯维特洛维多沃村。她步行了两千公里！为此应该授予体育奖章才对！莫佳是一九二九年在小学念书时同父母一起被流放的，从那以后她永远地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流放前在学校时，老师曾亲切地把莫佳叫做"小爱迪生"，因为这个女孩不仅各门功课全优，而且很有些发明头脑，她在小河上为学校安装了一台小发电机，还有一些别的发明。在流放地度过七年之后，她很想回到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母校，哪怕只看上一眼也好。于是她步行逃回家乡。为此，"小爱迪生"被抓进监狱，又送进劳改营。

十九世纪有过这类遭遇的孩子吗？请读者举出哪怕一个例子来！

农村中任何一个开磨坊的人都没有逃脱被"剥夺"的命运。可是，开磨坊和铁匠炉的人难道不是俄罗斯农村中最好的技术人员吗？就以梁赞州奔科夫地方的普罗科普·伊万诺维奇·拉克秋金为例吧。他刚刚被"剥夺"不久，本村人就因为过度地使用磨盘而引起火灾，把整个磨坊烧掉了。拉克秋金战后受到赦免，回到故乡。他看到村里直到这时还没有一座磨坊，感到十分难过。他

请求政府批准后，自己铸造了磨盘，又在原地（一定得在原地！）盖起了一座磨坊。他根本不是为了自己谋利，而是为了集体农庄，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充实和点缀他的故乡。

再举一个农村铁匠的例子，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富农吧。我们甚至可以像干部科的人们那样从他父亲开始说起。他父亲戈尔杰伊·瓦西里耶维奇在世时一直在华沙要塞服兵役，共二十五年。可是，结果只积了少得可怜的一点钱。这个服役二十五年的老兵在家乡没有分到土地。他服役期间娶了个士兵的女儿，退役之后便到妻子的老家克拉斯年斯克县的巴尔苏卡村去落了户。农村的人把他灌得迷迷糊糊，他便把自己的钱拿出一半来替全村人还清了拖欠的税款，用另一半租了地主的一间磨坊干起来。很快他就把剩下的钱全部赔进去了。后来他常年给人家放牛或当更夫度日。他有六个女儿，全嫁给了贫农，唯一的儿子叫特里丰（他们姓特瓦尔多夫斯基）。他把儿子送到一个小杂货店去学徒，可是特里丰从那里逃跑了，跑回巴尔苏卡村，到莫尔察诺夫开的铁匠坊里去学打铁，言明条件是：头一年干活不挣工钱，然后再当四年学徒工。满徒出师之后，特里丰在札戈里耶村盖了间小房，成了家。他们生了七个孩子（其中亚历山大后来成了诗人）。靠打铁当然发不了财。他的大儿子康斯坦丁帮助父亲干活，他们起早贪黑地冶炼锻打，每天可打出五把出色的夹钢斧。可是罗斯拉弗尔那些拥有锻压机和雇工的铁匠压低了斧子的价钱。他们直到一九二九年还只是一间乡村打铁坊，有一匹马，有时有一头奶牛和一个小牛犊，有时就把奶牛和牛犊都卖掉了。房前种着八棵苹果树。他也就这样成了“剥皮鬼”。农民土地银行开始按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卖抵押的地产了，这时特里丰·特瓦尔多夫斯基就买下了十一俄亩满是野草和灌木丛的荒地。他自己辛辛苦苦开垦它，直到发生农瘟那一年才开出五俄亩，其余的一直还荒废着。剥夺富农时，特里丰也上了名单。（全村规定要划十五户富农，总得凑够这个数呀！）

夸大了他的铁匠坊收入，要他交一大笔税。他未能按时交出，于是：收拾东西走人吧，你这个可恶的富农！

是的，在满街的木头房子中间如果你家的房是砖房，或者在一排平房中间你家是两层楼，你当然就是富农：你这个坏蛋，赶紧收拾东西，六十分钟以内滚蛋！俄国农村里不应该有砖房！不应该有两层楼房！应该回到洞穴里去！做饭生火不应该有烟囱！这就是我们的伟大改造宏图，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但是，主要秘密并不在这里。有的人生活得比这还好，但由于及时加入了集体农庄，也仍旧留在自己家里，没有被流放。而那些硬是不写加入集体农庄申请书的贫农倒是被流放了。

很重要，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要剥夺什么富农，而是要把农民强行赶进集体农庄。除非把农民吓得要死，就不可能把革命给予农民的土地再收回来，不可能再把这些人作为农奴束缚在这块土地上。

农村的粮食已经被搜光过好多次，凶恶的武装积极分子们这时又来了。在院子里用刺刀扎地面，在屋子里用榔头敲墙。有时候拆开墙——里面有麦子流出来。他们用刀划开枕头，这更多是为了吓唬人。房主的小丫头在就要被人抢走的口袋上扎个洞，让它漏出一点小麦，——“贼丫头！”——女积极分子朝她喊，用皮靴把她踢开，把女孩衣襟里的麦子洒掉。也不许她一粒一粒地拣起来。

这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是一次针对农民的战争。这确实是“伟大的转折”，但却没有说清是转折了什么？是转折了俄罗斯的脊椎骨！

* * *

不，我们这样对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不够公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确实描写过剥夺富农的行动。只不

过把它描写得十分平稳顺利，而且对它寄予莫大的同情和好感，似乎那是在围猎一群吃人的豺狼。

不过，有些情景是没有描写的，比如，长长的农村街道，路旁的门窗全都钉死了，你从街上走过去，便可以看见：母亲把婴儿放在腿上，母子双双死在门前台阶上；或者在板墙根下蹲着一个老头，伸着手向你讨一块面包，你走过去了。而当你返回来的时候，他却已经倒毙在那里了。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里也看不到这样的情景：村苏维埃主席带着一个女教员（作为搜查见证人）走进一家农舍，农舍里的板床上躺着一对老夫妇。（这个老头儿原先开茶馆，那还用说，不是恶霸是什么？谁会走在半路上想喝热茶！）村苏维埃主席举着那千式手枪叫喊："快给我下来！你这只唐波夫狼！"老太婆吓得哭起来，主席为了增加点恐怖气氛，朝天棚放了一枪（那响声在农家小屋里听起来是震耳欲聋的）。两个老人被赶走，全死在路上了。

当然更看不到他们描写下面这种剥夺富农的手段了：在顿河的哥萨克村里，忽然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去"开会"。会场早已用机关枪包围起来了，把"开会"的人全部抓起来，强制押到别处去！押走男人后再迁移那些妇女就一点也不费事了。

描写给我们看的，甚至拍成电影给我们看的，是剥皮鬼们隐藏起来的整囤整仓的粮食。可是我们却看不到人们是怎样强迫哭号着的妇女丢下了她辛苦积攒下的一点点东西，她的命根子——家畜、房子和锅碗瓢勺，（如果你家里有人能"保存住自己"，而且他有神通的话，后来他就能够争取到莫斯科替自己家"恢复"中农成份。可是，当他再回到农村时，却已无法找到他那"中农"的家当了：早已被那些积极分子和他们的老婆们抄光了。）

也不让我们看到人们随身带的那些小小的包袱。要知道，被赶走的人们上路时，是每家只许带一个很小的包袱乘坐公家的马

车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家大难临头的那天，他家里既没有油，也没有烤好的面包，还是邻居送来一些路上吃的东西救了他们，可这个邻居库兹玛有很多孩子，也不富裕呀！——这一切都不会让我们知道的。

来得及逃跑的人，便跑到城市去躲避这场瘟疫，有人还骑走一匹马。但是，那年月把马卖给谁呢：自从农民瘟疫开始以来，农村用的马已经成为富农的可靠标志。因此，马主人只好把马拴在马市的柱子上，最后依依不舍地拍拍它，趁着没被人发觉时迅速悄悄离去。

一般认为那场瘟疫发生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但它造成的尸臭却久久笼罩在俄罗斯农村上空。一九三二年，在库班地区的农村，刚刚脱粒完的粮食全部直接从脱粒机旁上缴给国家，颗粒不留，农民只好边收割，边脱粒，边吃。脱粒工作完了，粮食也没有了。甚至没有一粒可以按劳动日分配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制止那些痛哭号叫的女人？这里还剩下谁是没有被剥夺彻底的富农呢？还能强制迁移谁呢？（读者如果想知道清除了“富农”之后的早期集体农庄的情况，可以看看斯克里普尼科娃提供的证明：一九三〇年她亲眼看到几个农村妇女从索洛维茨监狱用小邮包把黑面包干寄给家乡的人！！）

再看看季莫费·帕夫洛维奇·奥夫钦尼科夫的经历吧。他一八八六年生于米赫涅夫斯克乡的基什金诺村（离列宁高尔克村不远，就沿着那条大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参加过国内战争。打完了仗，他回到政府分给他的土地上，成了家。他为人聪明、有文化，见过世面，有一双巧手。他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兽医知识，对附近各村的事情很热心。几年辛勤劳动的结果，他盖了一所不错的住房，辟了个小园子，把一匹小马喂养成了一匹高头骏马。不料，新经济政策使他头脑发昏了，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像相信土地一样相信这新经济政策。他和另一个农民合伙开

了个作坊，制造廉价香肠。(我们的农村到现在已经四十年没看见过香肠了。如今，人们是会搔着后脑勺这样说的：其实，村里开个制香肠的作坊有什么不好?！)他们两人自己干活，一个工人也没有雇佣，而且制成的香肠是由合作社经销的。他们干了两年(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政府便开始用重捐税扼杀他们了，大大夸大了对他们的收人的估算(收人额是由财务稽核员估算的，再加上那些除了当积极分子之外什么也不会干的害红眼病的懒汉们在财政局吹了不少冷风，所以给他们估得很高)，合伙人被迫关闭了作坊。一九二九年，季莫费第一批主动加入了集体农庄，把一头母牛、一匹好马和全部农具都交给农庄了。他在集体农庄的土地上全力以赴地劳动，还替农庄饲养大了两头牛。农庄垮台了，许多人从农庄逃走，可是这时已经有五个孩子的季莫费往哪里去呢？而在财政局人们的眼里他还是个财主呢（“他帮别人给牲口治病不是也有收入吗！”)。所以，即使加入了农庄之后，还是不断地向他索取高额税款。他无法支付，就从他家里拿走东西。他家有三只羊。有一次，他的十一岁的小儿子把羊赶出去，逃脱了财产登记，可是不久羊还是被人牵走了。后来又来登记财产，在这可怜的家里确实一无所有了，可是财政局那些无耻之徒竟然把栽在木桶里的三棵小橡皮树也登记进去了。这时季莫费忍无可忍，便当着他们的面就用斧子把三棵橡皮树劈了。这是干什么?！第一，他毁坏了已经不属于他而属于国家的财产；第二，他抡动斧头煽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第三，他的行为诋毁了集体农庄制度！

而基什金诺村集体农庄这时已经摇摇欲坠了，谁也不愿意再去干活，谁也不再相信它，已经有将近一半人逃走了。因此，这正是需要杀一儆百的时候。于是：这个恶性不改的“耐泼曼”*季莫费·奥夫钦尼科夫，他钻进集体农庄原来就是为了把农庄搞垮

---

* 即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私人业主。——译者注

的！现在根据村苏维埃主席肖科洛夫的决定，没收他家的一切财产！这是一九三二年，这时大规模强制迁移已经结束，所以没有流放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包括一个吃奶的婴儿），只没收了他家的房子，把一家人抛到街头。（他妻子带着六个孩子历尽千辛万苦，在一年之后来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找到了娘家父亲。奥夫钦尼科夫一家人都是活到八十岁左右的，只有季莫费一个人在这种生活折磨下五十三岁就离开了人间。）①

甚至到了一九三五年还有类似的事：复活节那天，喝得醉醺醺的集体农庄主席在被剥夺光了的农村街道上转来转去，向个体户要钱买酒。不给？"我们要剥夺你的财产！""流放你！"而且真的会流放的！你是个体户嘛！这就是"伟大的转折"。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也绝不描写那充满苦难的流放的旅程，不描写农民在路上是怎么走的。似乎把他们装上车，送走了，故事也就到此结束，可以画上三个"米星号"结束这一章了。

被流放的人如果能在天气暖和的季节坐上大车，那就是十分幸运了。往往则是带着婴儿，带着几岁、十几岁的孩子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坐雪橇走的。一九三一年二月间，新西伯利亚州科契涅沃村的人们在曾经看到由武装士兵押送的大车队连续不断地从村里经过——从冰雪的荒原中来，又走向冰雪的荒原中去了。那些人只有经过押解人员批准才可以进入农家暖和几分钟，而且出来后要追上车队，不能耽误车队的行程。（这些格别乌的押解人员如

---

① 此事虽与本章无关，但它可以帮助读者理解那个时代。后来，季莫费便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一家内部的香肠作坊去工作了。这个作坊也是只有两个师傅，但不同之处是另有一位经理。季莫费自己的作坊是因"有害于劳动人民"而关闭的，但这个作坊是内部的，不让劳动人民知道。他们制作一些名贵品种的香肠满足这个北方边区的统治者们的"个人需要"。季莫费也曾不止一次地被派去给州委书记阿乌斯特林的家里送香肠（此人住在李卜克内西大街和琼巴罗夫—鲁钦斯基大街的拐角处，是一所用高高的围墙圈起的小院），他也给州内务人民委员部首长舍伊隆同志的家里送过香肠。

今不是仍然活在世上，领着养老金吗！他们总该记得这一切吧！也可能忘掉了……）这些车队进入纳雷姆沼泽地之后，就全部留在这无底洞似的吃人地带了。当然，小孩子们早在到达沼泽地之前就冻死了。

原来的意图就是这样的——就是要这些农民的种子同成年人一起灭绝。自从传说中的吃人魔王消失之后，只有“先进学说”能够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把男女老幼一下子统统消灭掉。希特勒算什么！希特勒在这方面还不过是他的小学生。希特勒幸运的是这时已发明了窒息汽车，所以他才出了名。可是，对于我国的杀人方法好像谁都不感兴趣似的。

庄稼人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命运。因此，如果他们幸运地坐上了移民列车，而列车又幸运地经过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就把那些幼小的、但已经会爬的孩子从车窗抱出去，放在车站站台上：孩子，你自己到人世间去找活路吧！讨饭去吧！免得同你爹娘一起死掉！

（在饥饿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间，阿尔汉格尔地区曾实行对穷人的孩子免费供给小学早餐的办法，发给他们服装配给票证。但是，这些东西是绝不发给那些特殊（强制）移民的可怜的孩子的。）

有一列从顿河地区开出的移民列车，里面全是哥萨克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全在“开会”时被抓走了。）车里有个妇女临产了。可是，每天只发给她们一杯冷水，三百克面包，这还不保证天天都有呢。接生婆？连想都别想！母亲自然不会有奶，婴儿饿死了。埋到哪里？两名押运兵走进了她们的车厢，在火车运行途中打开车门把小尸体扔了出去。

（这列火车开到了宏伟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建设工地。她们的男人们也被送来了。要住？你们自己挖地屋吧！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起，我们的歌功颂德派诗人们就开始关心起来了，就开始在

作品里反映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家乘大车只乘到叶尔尼亚。幸而已经是四月的天气了。在叶尔尼亚把他们装进运货列车，车厢反锁着。车厢里连个大小便用的桶也没有，地板上也没有留一个小洞。因此，康斯坦丁·特里丰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得不冒着受罚或按逃跑罪判刑的危险，趁着火车的轰鸣声用菜刀在地板上挖出一个小洞来。一路上的食物供应是：头三天中只有一次在一个大车站上送进来几桶菜汤。不错，他们总共在路上才走了十天（到乌拉尔北部的利亚利车站）。可这里的四月还是冬天呢。迎接列车的是几百辆雪橇．人们乘雪橇顺着冰封的河流进入林区。有一间二十名放排工人住的工棚。可是当晚运来的这批人足有五百多。警备队长彼尔姆人索罗金，共青团员，在雪地里边走边命令人们往地里打木桩子："就住在这里！要修街道！在这里盖房子！"后来的帕尔察村的基础就是这样奠定的。

在严冬的夜里，在原始森林中，硬对入们说："就住在这里！"这种残酷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难道这是人干的事吗？白天运送他们，却安排他们晚上到达目的地！可是，几十万几十万的群众，包括老人、妇女和孩子，就是这样被送来抛弃在这森林地带的。在科拉半岛（阿帕奇那），人们在冰雪覆盖的简陋工棚中度过了北极地区的整个黑暗的冬天。话又说回来，把伏尔加河沿岸的日耳曼族人用火车运到干旱无水的卡拉干达草原地带，一九三一年的夏天（不要弄错，不是一九四一年，是一九三一年夏天！）叫他们在那里进行挖掘、建设，每天按口粮分给一点水喝。这种作法又比上面所讲的仁慈多少呢？而且卡拉干达也会有冬季到来的。（到一九三二年春季孩子和老人们就全部患痢疾和营养不良死光了。）在卡拉干达，也和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一样，盖起了许多类似菜窖的、狭长低矮的土房让人们集体住。在白海运河工地则把人们安置在空出来的劳改营工棚里。流放的人到达离希姆基不远的伏

尔加运河工地时，这里刚刚完成水文地质勘测工作，还没有劳改营，只是把人们抛到大地上，就叫他们用十字镐刨地，用小车运土。（报纸却报道说："给运河工地送去了机器。"）面包是没有的。住的土房要在下工之后各自挖建。（现在，那里有游艇载着莫斯科来的游客们游览。须知在水底、在地下、在混凝土中间埋着多少白骨啊！）

一九二九年，在"瘟疫"发生之前，阿尔汉格尔斯克市的所有教堂全封闭了。教堂是早已打算关闭的，这时恰好有了实际需要：安置流放来的"富农"。庞大的流放者洪流经过阿尔汉格尔斯克，一时这座城市似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大转运站。教堂里搭起了多层床铺，只是没有东西可以取暖。运犯人的货车一列接一列把流放者卸在站台上，衣衫破旧、愁眉苦脸的乡下人在路旁的犬吠声中走向教堂里的板铺。（一个姓施的孩子记得一个农民脖子上套着一副马脖套。那是因为这个人在强迫他离家时一时想不起该拿什么最需要的东西，匆匆套上它就走了。还有一个人抱着一台带喇叭的留声机。电影摄影师们！你们该把这些镜头拍下来才对！……）一座教堂里搭起了八层板铺。由于板铺没有固定在墙壁上，它夜里塌下来，压死许多户人家。哭叫声连天，惊动了警卫部队。

人们就是这样度过了这个瘟疫的冬天。不能洗澡。皮肤溃烂。斑疹伤寒流行，很多人死去。但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居民却接到严格命令：绝对不许帮助"特种移民"（当时称这些被流放的庄稼人为"特种移民"）！濒死的种田人在街上徘徊，谁也不敢让他走进家去，给他一点吃的或者从家里端给他一碗茶：谁要帮助，谁就会被当地民警抓去，失掉公民证。饥饿的人在大街上蹒跚地走着，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倒了，人们走过去一看：死了。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许人们去收尸。（街上有密探在监视，注意谁对这些人发善心。）在这同时，阿尔汉格尔斯克近郊栽种蔬菜和饲

养家畜的村子也在整村整村地被流放，(不禁又要发问：既然全村流放，那么这些村子里究竟谁剥削了谁?)因此，城里人也都心惊胆战，唯恐轮到自己。人们甚至不敢在尸体旁边停下来看看。(有一具就躺在格别乌机关大门旁边，也没有人收尸。)

掩埋工作由城市公用事业单位有组织地进行。当然谈不到棺材，只是在沃洛格达大街尽头的公墓旁边，在野地里挖个大坑，扔进去了事。当然没有立任何标记。

这是对待那些生产小麦的人，而且是在流放的中途。过了塔拉基村还有个更大的农民集中营。那里有一些人被挑选出来装运木材。不料其中竟有一个人狡猾地在运往国外的原木上刻写了一封致外国人的信(看，让农民识字有什么好处！)。此事被发现后，就不再让这些人装运木材了。他们被赶到更远的地方去，赶到奥涅加湖，皮涅加河，德维纳河的上游去了。

我们在劳改营里常常开玩笑说:“反正不会流放到比太阳更远的地方去。”可是，那些农民确实被流放到十分遥远的地方去了，那里很久之后才出现第一间点着松明的房子。

流放农民与俄国历史上的流放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一切流放不同之处，是不把农民流放到某个遥远的，但有人居住的居民点去，而是赶到野兽出没的地方，使他们回到原始人状态。不，比原始人的处境还要坏：我们的祖先在原始时期也是选择靠近水源的地方居住的。人类自古一直是这样选择居住地的。可是，契卡人员替特种移民选择（被流放的农民自己当然无权选择！）的地点则是满是石头的山坡（例如，在皮涅加河旁比河而高一百米的山坡上。那里根本挖不出水来，地上什么也不长)。相距三、四公里处就有一块适于耕作的河湾草地，可是，不行，命令规定：不许在河湾居住！他们得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去刈草，干草要用船运回来……有时甚至**禁止种粮食作物**。(农业经营的内容也要由契卡人员规定！）我们这些城里人往往不大理解牲畜对农民生活的

重要性。农民没有牲畜简直无法过活。可是，这些流放来的人却注定今后许多年再也听不到马的嘶叫、牛的哞鸣和绵羊的咩咩声了，再也别想备鞍、挤奶和饲养牲畜。

西伯利亚楚雷姆河畔有一个库班哥萨克人的特种移民村，这个村子被铁丝网围住，四周修起了岗楼，像集中营一样。我们已经写到过，许多地方就是这样把流放村变成了劳改营。

为了使这些可恶的劳动者尽快死光，使我们的国家里不再有他们，也不再有粮食，看来是尽了一切可能的。许多这类村庄确实死光了。如今只有偶然的过路人走过这些村庄的遗址时一点点地把遗留下来的棚房拆掉，引火取暖，一边踢开落在脚下的骷髅。

无论什么样的成吉思汗也没有像“党”领导下的我国那光荣的“机关”那样消灭过这么多农民。

让我们再来看看瓦修甘惨案吧。一九三〇年冬天，约有一万户人家（按那时期的每户平均人口计算，该有六、七万人）步行经过托木斯克被继续向前驱赶：先是顺托米河而下，又向鄂毕河下游走，然后又奔向瓦修甘河上游，走的全是只有冬季才能通行的路。（这支队伍走过之后，沿路的村民们曾被动员出来收拾遗弃的成年人和小孩的尸体。）然后这些移民被遗弃在瓦修甘河和塔拉河的上游的鬃岗（即沼泽地带中比较坚实而高出的地方）上，从此便无人过问了。既没有给他们留下粮食，也没有留下劳动工具。天气转暖，冻土融化，这里就成了孤岛。只有两条用原木在沼地里铺出的小路通向外界：一条通向托博尔斯克，一条通向鄂毕河。而两条路上都有机枪岗哨严阵以待，不放一个人走出这座地狱。大批的人死亡。人们在绝望之中跑到岗哨前，苦苦哀求，可是他们立即被机枪打死。后来，冰消河开之后，托木斯克的综合合作组织（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才派了船队载看面粉和盐去，但是这些船未能到达瓦修甘。（船队的领队，综合合作组织的代表姓斯丹尼斯拉沃夫，这个情况就是他说的。）

这批人全死光了。

据说，后来确实追查过这一事件的责任者，甚至还枪毙了一个人。我个人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但是，即使确实枪毙了一个人，这个比例不也是可以接受的吗！这是我国内战时期熟悉的比例：杀我们一个人，要你们一千人抵命！而这次则是：杀你们六万人，我们一个人抵命！

不这样就建立不起**新社会**！

*　　　*　　　*

不管怎么样，被流放的人中间还是有人活下来了。按他们所处的条件看，简直叫人无法相信，然而，他们活下来了。

帕尔察村农民的一天的生活是由科米的泽梁族人工长们的棍棒开始的。这些庄稼人生来就是自己开始每天的生活的，但如今却被别人用棒子赶去伐木或放木排。常常几个月不给人们晒晒衣服和鞋袜的时间，克扣他们的面粉定量，提高生产定额，还规定只有在完成定额后才能在晚上盖自己的住房。衣服全破了，人们用麻袋当裙子或者把它改成裤子。

是的，如果移民们全已死光，那就不会有许多今天的城市了，即便是伊加尔卡。伊加尔卡是一九二九年开始建设的。谁建设起来的？难道是北极林业托拉斯吗？不是被剥夺了财产的农民吗？人们在零下五十度的严寒中住在帐篷里，可是在一九三〇年就已经向国家提供了第一批出口木材！

被剥夺财产的农民住在自己的特种移民村，就像囚犯住在加强管制的劳改营一样。虽然村子周围没有划定不准靠近的禁区，但是每个村里通常都驻有一名步兵，他在这里掌握着生杀大权：他有权独自无条件地处死任何敢于违抗命令的人。

他们属于很强壮的人种，竟然有人能从那种村庄里逃出来。库边斯克附近的加丽娜·奥西波夫娜·里亚博孔从沃洛格达州这样

一座移民村里带出了一小股庄稼人（她走在前面，唱着歌，好像是去摘草莓）。她来到在哈尔科夫市给人当女仆的表姐那里。她的主人问一个大首长要不要一个好保姆。那家给她办了证件，要下了，而且对她很满意，她日子过得很开心。但是一九三七年那家人家被捕了，加丽娜忍不住要穿着铬鞣皮靴戴着丝绸头巾回到自己村子里去显摆显摆。她当然被抓起来，第二次流放。但她竟第二次逃跑了。

这些特种移民村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它们同古拉格群岛的血肉关系，很容易利用连通器的法则来解释：每当沃尔库塔劳改营感到劳动力不足时，就从移民村调来些特种移民（甚至无须重新判刑或改换名称！）到劳改营劳动。而他们也就在劳改营里老老实实地生活，到营区去劳动，吃囚犯们吃的烂菜汤。只是他们吃饭要从自己的工资中付款。(除买饭票外，还要付工棚费、保卫捐。)可是这些移民却没有一点想不通的表现。

这些与家属失去联系的特种农民就这样从一个村庄被转送到另一村庄，像囚犯从一个劳改点被转押到另一劳改点一样。

我国的立法常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摇摆。一九三一年七月三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决议，准许在五年之后可以给那些“一直从事（当然是在管制的移民区里！）社会有益劳动并对苏维埃政权表现出忠顺态度（当然是指曾对村里的士兵、警备队长和行动人员有所帮助）的被剥夺的富农恢复公民权。”但是，这个十分荒唐的决议显然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且，这五年期满时正是古拉格群岛越来越变得严酷无情的时候。

何况这些年代也不允许这个制度稍有削弱：基洛夫刚刚被暗杀，接着是一九三七——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欧洲又开始战争，一九四一年苏联本国进入战争状态。倒是应该办另外一件事，这事也确实是办了：从一九三七年起又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对许多倒霉的“富农分子”及其子女判了罪，把他们从特种移民村押进

了劳改营。

不错，战争年代，当前线缺少勇猛的俄罗斯人力时，又想起了这些富农分子：他们作为俄罗斯人的良心应该高于其富农本性嘛！于是到处向这些人提出建议，要他们从特种移民村和劳改营直接奔赴前线，保卫神圣的祖国。

人们也真的奔去了……

也不是全愿意去。例如H·赫-夫就没有去。我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丘林就是以这个人前半生经历为原型的，但我当时却没有勇气采用他后半生的经历。劳改营内许多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员那时争先恐后地报名去"保卫祖国"，都遭到拒绝，可是劳改营当局却主动要这个赫-夫去。不料赫-夫对劳改营登记分配处断然地说："是你们的祖国，就请你们去保卫吧！无产者是没有祖国的！！"

这话似乎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理论，况且劳改营里的囚犯确实比无产者还要贫苦、低微和无权呀！可是劳改营管理处根本没有这样去理解他，而是宣布：判处H·赫-夫枪决！H·赫-夫作为死囚在岗楼下面蹲了两个星期，根本没想请求赦免，因为他恨透了这些人。后来还是管理处自己给他改判为……加判十年劳改。

有时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把被剥夺的富农们带进了冻土地带或者泰加森林，放开以后就把他们忘在那儿了：带到那儿去本来就是要他们死的，干嘛要记住？那地方又荒凉又偏远，所以连一个当兵的也不留给他们。这个被英明领导撒手不管了的，没有马，没有犁，没有渔具，没有猎枪的勤劳而顽强的部族，也许只靠几把斧头，几把铁锹，在比石器时代略好的条件下，为了生存而开始了毫无希望的斗争。但与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背道而驰，这些村落不但活下来了，而且巩固了，富了。

布罗夫就是在这样一个村子里长大的。这个村庄位于鄂毕河的一条不能通航的小支流上游，布罗夫是小时候跟随大人来到这

里的。他说，还在战争之前就曾有一艘小艇经过他们村子附近，发现了他们这个村子。原来那是区首长坐的小艇。他问明了这些人从何处来，是些什么人，什么时候来的。区首长对于这里人们的富裕和美好生活感到惊奇，这是同他那个区的集体农庄不能相比的。首长回去了。过了几天便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带着冲锋枪手来了。于是又像闹"瘟疫"那年一样，命令他们在一小时内扔掉积攒起来的一切，扔掉温暖的乡村，只带一个小小的包袱上路。他们又被押送到更遥远的冻土带去。

通过这个故事难道还不理解"富农"和"剥夺富农财产"的实质吗？

假如能让这样的人民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谁又能奈何得了他们呢！！！

是旧教徒，是永远受迫害、被流放的旧教徒们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看清了"首长们"的凶恶实质。一九五〇年，有一架飞机在波德卡缅纳亚—通古斯卡上空练习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国的空军学校的训练大大完善了，因此这位尽心尽力的飞行员从飞机上看到了二十年来没有人看到过的东西：在泰加原始森林中间似乎有一个小小的居民点。他拍了照片，报告了上级。尽管十分偏僻遥远，但对于内务部来说没有办不到的事，半年之后他们进入了这个地方。原来这里住着一些从雅鲁耶沃迁来的旧教徒。当人们盼望已久的那个伟大瘟疫——农业集体化到来时，这些人便全村一起逃离了这种"幸福"，逃到原始森林里来了。人们住在这里，从不出去，只是偶尔让村长一人到雅鲁耶沃去购买盐、渔具、猎具上的金属部件和工具上的铁片，其余物品一概自给自足。他们没有钱，村长可能是带着贵重毛皮之类进城的。办完事情之后，他就像一个受到通缉的犯人一样躲躲闪闪地离开市场。雅鲁耶沃的旧教徒们就是这样赢得了二十年的生活——二十年与野兽为伍的、但却是自由的人间生活，避免了集体农庄的二十年的沮丧苦

闷。他们全穿土布衣服，自制皮靴，一个个身体显得特别强壮。

现在他们作为农业集体化战线上的可恶逃兵全被逮捕了，而且"依法"判了刑。您猜猜是依据哪一条法律条文？和世界资产阶级有联系？破坏活动？不，根据第五十八条第10分条的"反苏鼓动"（！？！？）和第五十八条第11分条的"反苏组织"。（其中许多人后来被押解到斯捷普拉格的杰兹卡兹甘分部，因此这个消息才透露出来。）

一九四六年还曾把另一批旧教徒放在木排上沿叶尼塞河流放走。这些人是那些英勇的苏军战士们从某个偏僻的寺院里赶出来的。（这时已经使用上迫击炮，已经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但是，那些坚强不屈的俘虏们在斯大林时代，也和在彼得大帝时代一样，从木筏上跳进汹涌的叶尼塞河的洪流，而我们的冲锋枪手则随即把他们枪杀在水里。

苏军战士们！可要不断地加强战斗准备呀！

不，这个注定要灭亡的人种并没有死绝！在流放地他们又有孩子降生并且世袭地依附于自己的特种移民村。（您可记得"儿子不为父亲负责"那句话？）外面的姑娘嫁给特种移民，就算加入了农奴阶层，就失去了公民权。外面人娶这类人做媳妇，自己就变成了流放者。女儿从外面来看爸爸，就被写进特种移民名册，以纠正以前漏划的错误。因转入劳改营而造成的人口损失，靠这些来源得到补充。

卡拉干达一带的特种移民是非常显眼的，人数很多。他们的先人曾被永远固定在乌拉尔和阿尔泰的工厂，现在他们是被永远固定在卡拉干达矿井里。他们该劳动多长时间，该付给他们多少钱，矿井的主人在这些问题上根本无须客气。据说这些特种移民反而很羡慕从事农业劳动的劳改犯。

五十年代之前，有些地方则是直到斯大林死之前，不发给特种移民身份证。在伊加尔地区只是从战争开始之后才实行北极地

区的工资补贴办法。

现在，这些经过二十年瘟疫般的流放生活后从警备队监督下解放出来的、取得了“值得自豪的”我国身份证的人们，是怎样的人呢？他们的内心和外表是怎样的呢？瞧吧！都是我国的标准公民？是的。他们也同那些在工人村、在工会会议上、在苏军部队中培养出来的标准公民完全一样！他们也同样把没有用完的体力和勇气全部倾注在摔打多米诺骨牌上（当然不是旧教徒），同样朝着电视屏上闪过的每一个镜头频频点头称赞，而在必要时也以同样的愤怒谴责南非共和国，或者同样为了帮助古巴而把自己仅有的几文小钱捐献出来。

所以，我们怎能不在那位“伟大的屠夫”面前低垂下自己惭愧的头呢?!怎能不为他设下的智力谜语所折服、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呢！？既然如此，他不是作对了吗？他这个深知人心的人搅起了这一场可怕的血腥的大旋涡，并且年复一年地不停地翻动它，结果不是表明他作对了吗？！

他作对了，道义上他是正确的：并没有人责怪他嘛！老百姓说，他在世时“比赫鲁晓夫的时候”要好一些，因为每逢四月一日“愚人节”时香烟总要减价一戈比，小百货不是还减价十戈比吗？直到他死前，对他的颂诗和赞歌不绝于耳，而且直到今天也还不允许我们揭穿他呀：你想揭穿？那么不仅是任何一个书刊检查员会使你立即停笔，而且站在商店里或坐在火车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急急忙忙堵住你这张胡言乱语的嘴。

是的，因为我们一向习惯于尊重那些大恶棍，我们一向就崇拜那些大刽子手嘛！

他做对了，尤其是从国家角度看，他是正确的：是他用这鲜血焊接成了驯服柔顺的集体农庄。至于说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农村会贫困到一无所有，而人民群众会在道德上蜕化堕落，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要知道，我们的火箭可将要飞向宇宙空间，进步的，

文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可将要在我们这强大的国家面前俯首听命啊！

第 三 章

流放地日趋茂密

像流放农民那样凶残的流放，把人们赶到荒山僻野公然置于死地，这样的事从前没有过，以后也没有再发生。但是，我国的流放地却通过其它方式并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一年比一年更加“茂密”：流放的人数越来越多，流放地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流放制度越来越严酷无情。

大致可以划分以下几个时期。二十年代的流放似乎是设置劳改营之前的过渡阶段，或者叫预备阶段；那个时期很少有人最后以流放了事，几乎所有的人后来都被扫进了劳改营。

从三十年代末起，不知是否由于流放人数太多的缘故，流放这种行之有效的限制与隔离形式开始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了。战争年代和战后，流放同劳改营并列，规模日益扩大，地位日益巩固。流放有优越性：不需要投资修建工棚和营区，不需要警卫开支，而且它可以一次处理大批人，尤其是妇女儿童。（各个较大的递解站里都备有经常性的母子牢房，关押带孩子的妇女，这些牢房从来

没有空过。)[1] 流放还可以保证在短期间内可靠而永远地清洗宗主国本土的任何一个重要地区。这样，流放制度的地位就巩固下来了；而且从一九四八年起它开始发挥新的全国性作用，即作为垃圾场和储存池的作用：可以把古拉格群岛处理下来的残渣废料扔到这里，让这些东西永远不会再登上宗主国的本土。一九四八年春，对劳改营下达了一项指令：犯第五十八条的罪犯刑满之后，除少数例外，一律“释放”到流放地去。也就是说，不能轻率地把这些人释放到不属于他们的“宗主国”里去，而应当把每个人从劳改营的岗楼下押送到流放移民村的警备队部去，从一个笼子移进另一个笼子。由于流放地区是有严格划定的，所以这些地区总起来又似乎构成了苏联（“宗主国”）与古拉格群岛之间的某个单独的（虽然层次互相交错）国家。与其说流放地是洗净罪恶的“炼狱”，毋宁说它是一个沾染罪恶的污秽池，从这里只能进入古拉格群岛，而绝不能进入“宗主国”本土。

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流放地补充了大批人员，那是从解放了的德军占领区押来的。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又从西面的几个共和国押来许多人。这些流放者的洪流加在一起（甚至不必包括流放的农民在内）远远超过五十万这个数字的几倍，甚至几十倍！须知，曾被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的沙皇俄国在整个十九世纪中流放的人数总共是大约五十万人。

那么，究竟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我国公民因为什么罪行遭到流放（或曰“强制迁移”）呢？（“流放”与“强制迁移”之间的区别尽管不是一直被遵守，至少是时常提及的，这大概是因为

---

[1] 如果丈夫同样被流放，那便会把他送往另外的地方。指令规定：犯人家庭成员必须送往不同地点。例如，基什尼奥夫市的律师伊·赫·戈尔尼克以犹太复国主义罪名被判流放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州，他的家属则被流放到萨列哈尔德。

这种区别可以给某些人带来行政上的乐趣吧。米·伊·布罗多夫斯基因信仰宗教受到迫害，他对于未经法院判决就流放他感到震惊。可是，伊万诺夫中校却郑重其事地对他解释说："正因为这不是流放，而是强制迁移，所以无须经过法院。我们并不认为您是罪犯，所以并没有剥夺您的选举权呀！"也就是说，没有剥夺他的公民自由权利中这最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嘛！……）

可以举出几条最常见的可判处流放的罪状：

1）属于有罪的民族（详情请看下一章）；

2）已在劳改营服满刑期；

3）居住在有罪的环境中（诸如：叛逆的列宁格勒、西部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之类游击队运动活跃的地区等）。

此外，本书开始时提到的各种人的水流中也有些支流溢出来，没有流入劳改营，而是进入了流放地。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断地被抛到流放地来。是些什么人？一般说来，是劳改犯人的家属。但他们的家属也并非全被流放，流放的也不仅仅是他们的家属。要想说明流体的流动问题，就要有流体力学方面的各种知识，否则只好放弃这个想法而单纯地去观看那毫无意义地汹涌翻滚的波涛。在这个问题上也一样：我们没有可能透彻地研究和描写各式各样的动机和原因，来说明为什么在不同的年代把各种不同的人忽而送进劳改营，忽而又流放。我们只能观察，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由各种移民混成的五色缤纷的图画，这里有从满洲来的移民；有孤零零的外国公民（这些人即使在流放中也不能同周围的流放者结婚，这是苏联法律所不允许的，因为对方即使也是流刑犯，但还是苏联人嘛！）；有高加索人（但谁也不记得遇见过格鲁吉亚人）；也有中亚地区的人——这些人虽然当了俘虏，却没有被判十年劳改，而只判六年强制迁移；甚至还有一些当过俘虏的西伯利亚人被送回老家来，这些人在故乡西伯利亚可以像自由人一样生活，不必到警备队部报到登记，他们只是无权离开家乡到外地去。

我们不可能知道流放的全部类型和情况，因为我们的消息只是来自一些偶然的谈话或信件。假如没有A·M·阿勒-夫的来信，读者恐怕就不会知道下面这个故事了。一九四三年，维亚特卡地区的某村里突然接到一份通知：该村的农庄庄员科茹林，一个正在前线作战的普通步兵，似乎是已被送入惩戒营，或者就是已经被枪毙了。于是，执行人员（读者已经对这个词有所了解：它是刽子手的雅号）马上来到科茹林妻子的住处（她有六个孩子，最大的十岁，最小的六个月。还有两个大姑子也住在一起，都是年近五十的老处女。），立即把她一家九口赶出家门，装上雪橇，只允许带一点点东西，在严寒中赶到六十公里外的维亚特卡省基洛夫市去了。只有天知道，这九个人怎么会没有冻死在路上。在基洛夫市的递解监狱里关了他们一个半月，后来又押到乌赫塔附近的窑场。两个大姑子每天只有到泔水池里捞东西吃，后因神经错乱倒毙街头。母亲带着几个孩子靠周围当地人们的帮助（是无思想性的、非爱国主义的、甚至很可能是反苏维埃的人们的帮助）总算没有饿死。后来几个孩子长大了，都到军队服役，而且成了所谓“政治思想和战斗训练全优的优秀战士”。一九六〇年母亲回到了家乡，可她家的房子早已无影无踪，连一根木头、一块炉砖也没找到。

把这样一个情节编进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花环中去有什么不好呢？不，他们不要。因为这没有典型性。

那么，对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残废者的流放又应该编进什么花环里去呢？这应该算哪一类流放呢？关于这种流放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确实很少有人知道）。可是，请读者回忆一下，战争末期在我们的集市茶馆旁和电车里曾有多少并不年老的残废人在游荡啊！后来，不知不觉间，这些人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也曾形成一个洪流，也是在一个运动中被流放到北方的某个小岛上去了，因为他们不该为了祖国的荣誉而在战争中使自己的样子变得那么难

看。这也是为了使我们这个民族——在各种田径赛和球类比赛中都取得辉煌胜利的民族——显得更加健美嘛！这些在战争中不走运的英雄们现在生活在某个无名小岛上，当然，无权和广阔的外界大陆通信（但毕竟还有极少数的信件送出来了，所以我们才知道），他们自己的生活自然是比较“简朴”的，因为他们凭自己的劳动所得是不可能富裕的。

这些人似乎今天仍旧在那里度过自己的余年。

处于苏联和古拉格群岛之间的这个巨大的污秽地，这个流放的王国，既包括大小城镇，也包括偏僻的乡村和荒野。流刑犯都尽量争取到城市里去，人们坚信城市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更好过些，尤其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那里的生活也比较像人的生活。

卡拉干达市可说是流放王国的首府，至少是它的一颗明珠。我是一九五五年，在大规模流放结束之前，看到这个城市的。（警备司令部批准我这个流放者到卡拉干达去些日子，因为我准备到那里去结婚，未婚妻也是被流放的。）当时，它还是个饥饿的城市，一进它的大门，离工棚般低矮的火车站不远，就有一所颇有象征性的砖房：它的墙壁用许多木头柱子戳住，以免倒塌。有轨电车当时并不开到车站旁边，（因为地底下到处是坑道，怕塌下去。）新市区中心的一面石墙上刻着大字：“煤炭就是（工业的）粮食！”这里的商店里确实每天卖黑面包，流放到城市就有这点优越性。这里还可以找到当壮工的工作，还有比当壮工更好的工作。至于其它食品，货架上通常是空空的。也有集市货摊，但价钱之高使人不敢问津。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三，至少三分之二，是没有居民证的、在警备司令部备了案的人。走在街上常会遇见从前劳改营里的囚犯同我打招呼，特别是从埃克巴斯图兹营出来的人。这里的流放者的生活又怎样呢？他们在工作上受欺压，工资是被压低了的，因为人们在走过逮捕—监狱—劳改营这段灾难的历程之后，并

不是都可能表现出自己应有的知识水平的，要论资历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有时就像不能同白人同工同酬的黑人一样。不高兴吗？你可以不干！居住条件非常糟糕：流放者大都租赁人家的没有隔墙的走廊角落、黑暗的小板棚或旧仓库住。房租很贵，因为是私人房。一些在劳改营里被糟踏得不像样子的、装着假牙的中年妇女日夜梦想着能有一件"出门穿的"线呢短上衣或一双"出门穿的"鞋。

卡拉干达市面积很大，人们住得往往离工作地点很远。有轨电车从市中心到城郊工厂区要咯吱咯吱响上一小时。有一次，我坐在电车里，对面是一位疲惫不堪的妇女，穿着一条脏裙子和一双破凉鞋，抱着一个婴儿，孩子的包布也很脏。她不住的打瞌睡，孩子便从她无力的双手滑落到腿上，眼看要掉下去。旁边的人对她喊："孩子掉了！"她急忙睁开眼抓住孩子，但没过几分钟又瞌睡了。她在抽水站上夜班，今天白天是在城里跑了一天想买双鞋，可是没有买到。

卡拉干达的流放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据我所知，江布尔市比卡拉干达好得多，它位于哈萨克斯坦富饶的南方地带，物价很便宜。可是城市越小，越不容易找到工作。

还有叶尼塞斯克市。一九四八年，格·斯·米特罗维奇等一批人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递解站被送到这里。负责押送的中尉对囚犯们提出的问题给了很肯定的回答。"会有工作吗？""会有！""有住处吗？""会有！"

押解士兵把囚犯交给警备司令部，自己轻松地回去了。而流放者却不得不钻到河边翻过来的小船底下或集市的敞棚下去睡觉。他们无法买到面包，因为面包按户口卡片配售，新来的人没有住处，落不了户；而要找到住处，则需要先付租金。米特罗维奇这时已成残废，他原先是个畜牧专家，所以他请求警备司令部

按他的专业替他安排工作。警备司令问明情况后立即想出了一个主意，他马上挂电话给区地政局：

“喂，给我送瓶好酒来吧，我给你们分配去一个畜牧专家！”

在这里，“对怠工者要按第五十八条第14分条论处，重新送回劳改营！”这一条对任何流放者都不能成为威胁，谁也不怕。一九五二年叶尼塞斯克发生了一件事：定期登记的日子到了，绝望的流放者们来登记时一致要求警备司令重新逮捕并把他们送回劳改营。这些成年人们在这里靠劳动养活不了自己！警备司令把他们驱散了：“内务部不是你们的职业介绍所！”[①]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距坎斯克二百五十公里的塔谢耶沃更加荒凉。流放到这里的是日耳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以及刑满的囚犯。这里不是新开辟的，也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地点，它距离曾以制作镣铐闻名的罕达拉村不远。但有一点是新的：整个镇子全是土房，屋里全是土地。一九四九年押来一批第二次被判刑的人。火车是傍晚到达的。下车后把他们领到一所小学校里。晚间，一个委员会到学校来接收“劳动力”，有内务部区分局局长、林业公司代表和几个集体农庄主席在场。可是，站在委员会面前的都是在劳改营经过十年折磨的老弱病残，多数是妇女。噢，英明的政府就是把这些人从危险的城市送到这严酷的地区来开发原始森林的呀！来人一致拒绝接收这种“劳动力”。内务部只得强行分配。把一些最不中用的、干瘦得快死的人留给那个没有派代表来参加分配的盐厂（其实那个代表是来迟了）。盐厂位于乌索尔加河上的特洛伊茨克村（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流放地，早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就曾把一些旧教徒流放到这里）。到了二十世纪中叶

① 警备司令没有必要了解苏维埃国家的法律，囚犯们则没有办法了解这些法律。可是，要知道，苏联刑法典第35条明明规定：“应该给流放者分配土地或者向他们提供有报酬的工作。”

这里的制盐技术水平仍然是：马拉水车把卤水提到铁盘上，然后熬盐。烧柴从森林里取。新来的老太婆们就是去干这种活的。有一位知名的造船专家也被分配在这一批里，倒是给他安排了一个接近他的专业的工作：把盐打包装箱。

有一个叫科尼亚泽夫的六十岁的船工，科洛姆纳人，他已经不能工作，只好乞讨度日。遇到好人便让他在屋里睡一夜，通常是睡在大街上。残废收容所不收他，医院也不留他。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他爬到党的，即工人阶级政党的区委会的台阶上，冻死在那里了。

把释放的囚犯从劳改营押送到泰加森林流放地时，囚犯确实不明白这种“释放”有什么意义。而且是怎样押送来的呢？是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坐着敞篷卡车，穿着释放时发的旧衣服和破旧的布鞋。押送士兵们则穿着短皮大衣和毡靴。在劳改营时，还有升了火的工棚可住，而这里住的却是伐木工的土房，入冬以来就没有升过火。劳改营里有嗡嗡叫的油锯，这里也有。两处都是只有使用这种油锯才能挣到你的一份夹生面包。

因此，一九五三年，当林业公司副经理列博维奇来到叶尼塞河沿岸苏和布吉姆区的库泽耶沃时，新来的流放者们犯了一个错误。当健康、英俊、穿得干干净净的副经理到来时，流放者望着他那皮面大衣和养得又白又胖的面孔，一面行礼、一面说：

“您好！首长公民！”*

而副经理却不以为然的摇着头说：

“不，不！为什么叫我‘公民’呢？咱们现在都是同志，你们已经不是囚犯了！”

副经理把流放者召集到唯一的一间土屋里，在瑟瑟抖动的小

---

* 劳改营的囚犯对劳改营长官和看守等只能称呼“公民”，无权称呼“同志”。——译者注

油灯的微弱光线下开始训话。他的话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在人们棺材上的钉子：

“你们在这里不要抱临时态度，要作长久打算。你们确实是得永远住在这里。所以，你们应该尽快地投入工作！有家属的可以把家属接来，没有的应该在你们中间找人结婚，不要等待了。安排生活吧！生儿育女吧！也可以申请贷款盖房子，买奶牛。同志们，要投入工作，要开始劳动！国家需要我们提供木材！”

这位同志坐小汽车走了。

这里允许结婚，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优待。而据雷特茨回忆说，在科雷马河沿岸的荒僻的村落，例如在雅戈特诺耶村，虽然也有未被放回大陆的妇女，可是内务部不许人们结婚，因为结婚便需要给他们分配单独的住房。

但是，有时也可以说不允许结婚倒是一种照顾。因为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间北哈萨克斯坦某些地方的警备司令们是强迫流放者结婚的。他们为了把新来的人拴住，便向流放者提出条件：限令两周内结婚，否则就送往更偏僻的地区或草原地带！

有趣的是，许多流放地也使用“一般劳动”这个劳改营用词。因为这里的劳动和劳改营的劳动没有任何不同：同样疲惫不堪、有害健康、无法躲避、不干不行。不错，流放者如今已经是自由人了，劳动时间可以比劳改犯短些，但是到矿山或林场去的路上要花两小时，回来又要两小时，加起来也就等于劳改营的劳动时间标准了。

老工人别列佐夫斯基二十年代曾是工会运动的领袖，从一九三八年起被判十年流放，而在一九四九年又加判十年劳改营。我亲眼看见他领到劳改营的一份口粮时有多么高兴、多么感动。当时他亲吻着面包对我说：进了劳改营就好了，这里规定给面包吃，可在流放地你拿着钱到铺子里去，眼看着货架上放着大圆面包，可售货员硬是瞪着眼对你说：没有面包！同时却把面包秤给当地人。

买烧柴也是这样。

一位彼得堡的老工人齐维尔科也谈到了类似情况。(到处都是冷冰冰的人！)他说，经过流放生活之后，他(一九五一年)进了特种苦役营倒觉得自己像个人了：这里只要干完你十二小时的活，就可以回到生活区去。在流放地则不然，任何一个自由人都有权支配你去无偿地替他干活(齐维尔科当时是会计)，不管是晚上，还是星期天，叫你去替他个人做什么，你都得去。流放者是不敢拒绝的，否则第二天就会丢掉工作。

甚至那些当上"杂役"的流放者们日子也并不轻松。米特罗维奇后来被调到江布尔州的科克切列克去，让他在区农业科里专管畜牧。(他在那里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给他和另一位同志分配的住处是一间驴棚，没有窗户，里面全是驴粪。他们扫开驴粪，铺了些蒿草，就睡下了。)米特罗维奇在新工作岗位上决心诚实认真地工作。但他却立即触怒了一位自由人党员领导。区里的一位领导用两头小牛偷换了集体农庄的两头怀了初胎的母牛，并要求米特罗维奇把这两头两岁口的牛登记成四岁。米特罗维奇认真一检查，又发现农庄庄员放牧和饲养的好几群牲畜并不属于集体农庄，原来这些畜群是区委第一书记、区执委会主席、财政局长和警察局长私人的。(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就是这样机敏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告诉米特罗维奇："这些你不必登记！"但他却都登记入账了。不仅如此，他还敢于抗议区执委会主席擅自取走一张羔羊皮的行为，表现了一个流放囚犯罕见的、维护苏维埃法制的精神。但是，他为此被解雇了。(这还仅仅是他们之间的战争的开始。)

无论如何，区中心城市不能算是最坏的流放地。流放地的苦难最为深重的是那些连个自由村庄的影子都没有的、沾不到一点文明边的地方。

这个齐维尔科自一九三七年以后曾住在哈萨克斯坦州西部的

"新生活"农庄，他谈到了那里的情况。在成批流放者到来之前，农业机器站政治部就已经教育当地居民提高警惕了：近几天就要押来一批托洛茨基分子，反革命分子！当地居民吓得连盐也不敢借一点给流放者，生怕和人民敌人发生瓜葛！战争期间流放者没有粮食供应卡片。齐维尔科在农庄的铁匠坊里干了八个月才挣到了一普特*黍子。这些原粮还得自己用锯开的哈萨克石碑做成的磨盘磨成粉。人们向内务部的机关提出要求：要么把我们再关进监狱，要么就允许我们到区中心去！（有人会问：当地居民怎么能生活呢？他们是有办法的……他们也习惯了……再说，他们总有只羊或有头牛，有蒙古包，有些家具，这些都用得上。）

如果是在集体农庄，到处都一样：不发给流放者公家的服装，也不按劳改营标准发给口粮。集体农庄是最可怕的流放地，它们好像在进行某种比赛：比比到底哪里的生活更苦，是劳改营还是集体农庄？

也发生过卖人的情况。化学家C·A·利普希茨就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递解站被卖掉的一个。买主要买一个木匠，递解站回答说：如果同意搭配一名法学家和一名化学家（即利普希茨），我们就分配给你一名木匠，另外还要捎带几个有病的老年妇女。成交了。随后就用敞篷卡车在零下二十五度的算是比较轻微的严寒中把他们几个人送到一个只有三十来户的偏僻农村。法学家和化学家在这里能干什么呢？先领预付工资吧：一口袋土豆，还有些洋葱和面粉（这还算不错！），现款要到明年才给，你能挣到才有。眼前的活计是把被雪压住的大麻弄出来。睡的地方只铺些干草，想找条麻袋把草装起来做成垫子？没有！人们十分不满："不干了！我们要离开你们农庄！""不，那可不行！我们为你们每个人付给监狱管理部门一百二十卢布呢！"（这是一九五二年的事。）

---

* 俄国重量单位，相当16.38公斤。——译者注

啊，真想再回到劳改营去！……

如果读者认为国营农场对流放者会比集体农庄好得多，那就大错特错了。以苏和布吉姆区的敏杰拉村为例吧。村里只有几间工棚（当然，没有带铁丝网的隔离区），很像个解除看管的劳改营。虽然是国营农场，但这里的农工从来没见过现钱，也不用现钱，只是记下一些数字来：每人每天挣 得九卢布（斯大林时期的旧币）。另外还记下要扣除该人的饭钱多少、棉衣钱多少、住工棚钱多少……东扣西扣之后，最后一结账：流放者不仅分文不剩，还欠国营农场的债！亚·斯托季克记得这个国营农场里曾有两个流放者因为看不到出头之日上吊了。

（这位幻想家亚历山大·斯托季克因为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里学习英语曾有过一段不幸的遭遇①。可是他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他来到流放地，看了看环境，忽然想到要行使苏联宪法保证给予每个公民的……受教育权了！于是，他给领导打了一份报告，申请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学习**！国营农场场长〔原先当过区委书记〕对于这一无耻的、也许是流放王国历史上空前的申请，不仅干脆驳回，而且还对他郑重宣布："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允许你斯托季克去学习！"可是，事有凑巧，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递解站到各区流放者中间来招募木工了。斯托季克虽不是木工，但也报了名，并且被录用了。他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同醉鬼和小偷们住在一起，自己却在业余为投考医学院准备功课。他竟然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公开考试！在政治审查委员会开会之前没有人关心他的履历表。只是在政审委员会口试时斯托季克才讲了自己的简历："我参过军，上过前线，打过仗……以后从前线回来了……"斯托季克感到喉咙干渴，说不出话来。"回来以后呢？""回来以后我……被……抓进监狱……"他终于挤出了这几个字。

---

① 见本书第五部第5章。

委员会立即变得声色俱厉了。但是斯托季克仍不甘心："可我已经服满了刑期呀！我是释放出来的！我的考试成绩很好呀！"一切枉然。而这已经是贝利亚垮台那一年的事了！）

越往边远地区去越坏，越偏僻的地方越没有任何人权可言。A·Ф·马克耶夫在前面提到的关于肯吉尔劳改营的回忆录中就讲过"图尔盖的奴隶"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波利亚科夫的遭遇。这个人在两次进劳改营之间曾被流放到图尔盖沙漠去，那里的一切权利全掌握在一个哈萨克人集体农庄主席手里，甚至我们亲爹一样的警备部队也从未派人到那里去过。波利亚科夫住在小羊圈里，和羊在一起，地上铺着干草。他的"工作"是替农庄主席的四位太太当奴隶，替她们每个人干活，甚至要倒尿盆。波利亚科夫怎么办呢？从流放地跑出来去控诉吗？他不但没有条件离开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而且即使离开了，这将构成逃跑罪，又得判二十年苦役。这农庄里连一个俄罗斯人也没有。过了几个月才偶然有一个俄罗斯人税务员来征税。波利亚科夫讲的情况使税务员感到震惊，他同意替他把书面申诉转递区委。不料这个书面申诉被认为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恶意诬蔑"，波利亚科夫为此第二次被判处劳改，所以五十年代他才得以幸福地在肯吉尔劳改营服刑。他在劳改营里觉得自己像是已被释放似的……

我们还不知道"图尔盖的奴隶"在流放者中间能不能算是命运最坏的呢。

有人说，同劳改营相比，流放的优越性在于生活的稳定性，有家庭气息。（不管好坏，你总可以住在这里，一直住下去，不会随时把你押到别处去了。）但这也并不尽然。警备队往往莫名其妙地，不容分说地命令人们迁走，虽然不是押送走。或者突然宣布关闭某个流放地点或整个地区。各地区的流放者都记得在不同的年代有过这类事，尤其是战争年代。（警惕性嘛！）有一次，突然命令泰帕克区的所有流放者在十二小时内整理好行装，迁到杰姆贝亭

地区去！于是你那点可怜的破烂家什，已经习惯的暂时栖身处就得扔掉，统统抛掉！开步走！勇敢地赤足前进！只要不死掉，你再去积攒吧！……

表面上看，生活像是轻松多了：不必再排队出工，可以各走各的路；不必到派工地点去集合；遇到人不必再脱帽；夜间房门不从外面反锁上了。但是，流放生活也有自己的制度。虽然各地宽严程度不同，但直到一九五三年普遍开始缓和之前到处都可以感觉到确实存在某种制度。

例如，许多地方的流放者都无权向任何苏维埃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案，他们只能向警备队提出，由它决定这一控诉应由自己解决还是应该提交其它机关。

警备队的任何军官召唤时，流放者必须放下一切工作和事务立即报到。因此，了解生活的人都懂得，流放者不敢拒绝执行军官们交办的（完全为了其个人利益的）私事。

警备队军官们的权利和地位并不比劳改营的军官们差。恰恰相反，这些军官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事；这里没有设防的隔离区，不必巡逻放哨，不用去抓逃犯，不必每天押着囚犯去劳动，也无须照管这群人的衣食。只要每月登记两次，"依法"给犯有新罪行的人写个材料就够了。这些军官有权有势、懒惰成性、吃得肥肥的（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少尉每月工资达二千卢布），因而他们大部分都十分凶狠。

很少听到过苏联的流放地发生过真正的*逃跑*。因为即使逃跑成功，所换来的公民自由的好处也并不多：流放地当地的*自由人*的权利和流放犯差不多是同样的。沙皇时代从流放地逃跑后可以轻易地逃往国外，现在不行了。对逃跑的惩罚很严。逃跑由特别庭处理。一九三七年以前对逃跑者特别庭最多判处五年劳改，一九三七年之后判到十年。战后实行一条新法律，它虽未在任何地方公布，但却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一直在执行，即："从流放地逃

跑者判处二十年苦役！”无比的严酷！

至于什么算逃跑？什么不算？——这是由各该地区的警备司令部随意解释的。流放者无权逾越的界线也由它来划定，它规定去砍柴或去采蘑菇可以走出多远。例如，哈卡斯自治州的奥尔忠尼启则采矿村就规定：离村往上走（上山），算是“违反制度”，只判五年劳改，而如果离村往下走（走向铁路）则算“逃跑”，要判二十年苦役。有一次，一群亚美尼亚人流放者对矿山领导人的蛮横态度忍无可忍，要到区中心去控告他；当然，他们离村时没有取得警备队同意。为了这次“逃跑”，他们每人只被判六年劳改。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老年人无法理解和顺应我们这吃人的制度，往往凭着自己单纯的想法作出决定，离开指定地点。而这也就被看作“逃跑”。

有一个八十多岁的希腊妇女在战争末期从辛菲罗波尔市被流放到乌拉尔山区。战争结束后，她听说儿子回到了辛菲罗波尔，她也就很自然地跑回了辛菲罗波尔去偷偷同儿子一起生活。一九四九年，在她已经八十七（！）岁时，当局发现了她，把她抓走，又判她二十年苦役（87＋20＝？），押送到奥捷尔特种劳改营去了。人们还知道江布尔州的另一个希腊老太婆的事。开始从库班地区强制迁移希腊人时，这个老年妇女同她的两个女儿一起被流放。她还有个小女儿因为丈夫是俄罗斯人得以留在库班了。老太婆在流放地呆了多年之后，想在自己死前回库班去跟小女儿见上一面，住一阵子。“逃跑”！结果她又被判二十年苦役！在我们科克切列克曾有一位生理学家，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博戈斯洛夫斯基。一九五五年对他适用了所谓“阿登纳”大赦，* 但并不是全部适用，仍旧要流放他。其实他是不该流放的，他便到处申诉。但是，问题拖了很久没有解决。这期间，住在彼尔姆的他的老母亲眼睛快

* 1955年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访苏后苏联实行的一次大赦。——译者注

要瞎了。由于战争和儿子被俘，母亲已有十四年没看见儿子了，很想在眼睛完全失明之前见他一面。因此，博戈斯洛夫斯基就冒着苦役刑的危险，决定去看望母亲一次，计划来回共用一星期。他想了个办法：借口要到沙漠地带的放牧区去出差，却乘上了开往新西伯利亚市的火车。他居住地的人们没有注意到他不在，但是新西伯利亚市的出租汽车司机“警惕性”很高，看他可疑，便向行动人员告密了。行动人员走过来检查他的证件，他没有，只好坦白。当然又把他押回了科克切列克的监狱土屋，开始对他进一步立案侦讯。这时突然接到有关单位发来的公函：证明他本来是不该流放的。刚一释放，他立即奔回去看母亲。可是，已经晚了。

在这里，假如我们忽略了不眠不休的契卡行动处在每个流放地点的高度警惕性，不谈谈他们经常把流放者找去谈话、收买他们中间某些人、收集告密材料、利用这些材料给人们重新判刑等等，那么，我们就不能充分地描绘出苏维埃流放地的景象，就会使它减色。是的，到一定时间总要重新判刑的，因为流放者的单调、呆板、僵化的生活到时候总要改变成劳改营的有生气的、熙熙攘攘的生活呀。第二次麻烦，审判和新的刑期，这是许多流放者生活的自然结局。

像彼得·维克斯涅那样作是否对呢？他在一九二二年从当时的拉脱维亚的反动资产阶级军队开了小差，跑到自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来，在这里，一九三四年，他由于还同留在拉脱维亚的亲属保持通信而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他的亲属在拉脱维亚却并未受到任何迫害）。但是，维克斯涅没有气馁。他这个流放的火车司机在阿亚古兹机务段不知疲倦地工作，成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甚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机务段里还挂出了“向维克斯涅同志学习！”的横幅标语，可是第二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维克斯涅“同志”就第二次被抓入劳改营，而且命运注定他再也没能从那里出来。

流放地也同劳改营一样，判处第二次刑期是家常便饭。这也是为了向上级证明契卡行动人员是经常保持着警惕性的。流放地也和其它地方一样采取了加强措施，以帮助囚犯们尽快认识自己的命运和地位，更好地服从管制。（一九三七年，齐维尔科在乌拉尔斯克总共蹲了三十二天禁闭室，就被打掉了六颗牙！）但是，也有过一些特殊时期。例如，一九四八年就向各流放地普遍撒开了很密的拉网，把所有流放犯一网打尽，又统统抛进劳改营。（沃尔库塔地区就是一例，因为“沃尔库塔将成为一个工业生产中心，斯大林同志指示要清理这个地方”。）有些地区则只把男流放者送进劳改营。

即使有人未被第二次判刑，“流放的结束”也是遥遥无期的。例如，在科雷马河沿岸一带，“释放”本来就只意味着离开劳改营的岗楼监视转入地方警备队的监督。流放实际上没有尽头，因为反正无法离开这个地区。假如真的允许谁短期离开科雷马来到“大陆”上，那他也会埋怨自己命苦的：因为他在“大陆”上呆不多久就会带着新刑期回到古拉格群岛去。

流放地的天空本来就昏暗无光，而契卡行动处的努力使它变得更加阴森了。契卡行动人员锐利的目光、暗探们的小汇报、为了给孩子们挣得一块面包而不得不担负的、毫无乐趣的沉重劳动，这一切使得流放者经常生活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孤独中，他们完全被分割开了。在这里，人们之间不可能有监狱和劳改营里还可以进行的那种长时间的谈心，也听不到人们关于既往生活的回忆。

因此，要搜集有关流放生活的材料是十分困难的。

我国的流放地也没有留下多少照片。流放地即便有照像师，也只拍文件上用的照片，供给干部科和特别科用。给一群流放者拍照？几个人合拍？这是想干什么？怎么回事？必须立即报告保安部门：看，反苏维埃的地下黑组织！可以按照片一个个全抓起来。

他们倒是有一回很谦恭地照了一张像（甚至出现在西方的出版物上）：身体瑟缩在苏维埃的破衣烂衫里，暗淡无神，垂头丧气，曾几何时，都是一些桀骜不驯的人物——大名鼎鼎的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伊兹梅洛维奇，马约罗夫，卡霍夫斯卡娅——他们往昔的桀骜不驯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们不秘密地奔往首都了？不刺杀人民的压迫者了？不扔炸弹了？

我国的流放地可没有给我们留下那样的集体照片。读者还记得吧，不是有一张几个人合拍的、表情相当愉快的照片吗？那上面左起第三人是乌里扬诺夫（列宁），右起第二人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他们都吃得饱饱的，穿得干干净净，不知道贫困，不从事劳动，有胡子的还把胡子修得整整齐齐，戴皮帽的戴的是上等毛皮帽。

孩子们，看！那时候可真是暗无天日呀！……

第　四　章

放逐各族人民

历史学家也许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但是，就我们一般人的平均记忆能力之所及，确实想不起十九世纪、十八世纪、十七世纪有过大批地强迫整个民族迁移的事例。历史上确曾有对殖民地的征服，大洋中的岛屿上、非洲、亚洲、高加索都发生过胜利者征服土著民族、并掌握政权的事实。但是，古代殖民者的简单头脑却没有想到应该把土著民族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驱逐出去，使他们离开祖辈居住的家园。或许只有往美洲种植场运送黑人奴隶的事与此略有相似之处，算得上是个先例吧？但是，那也并不是某个国家的政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进行的：那只是个别的基督教徒——奴隶贩子干的：因为他们突然发现有利可图，胸中燃起了贪欲的烈火，纷纷奔到非洲，各自为自己捕捉、诱骗、购买单个的或几十个黑人运走。

只有当文明人类的希望——二十世纪到来的时候，也只有到了民族问题在“唯一正确的理论”基础上得到最高度发展的时候，那个解决民族问题的最权威的专家才能得到特许，才能够采取在四十八小时内，二十四小时内、甚至在一个半小时内彻底、干净

地把整个民族一个个强行迁移出去的办法。

自然，他本人在思想上也并不是立即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因此，他有一次甚至脱口说出了这样的话："在苏联，有人会因为他的民族成份而成为迫害的对象，这样的事情是不曾有过而且不可能有的。"[①] 在二十年代，所有这些民族的语言都曾受到鼓励，那时人们还不断地对克里米亚人唠叨说：克里米亚是鞑靼人的，是你们鞑靼人的！当时甚至还可以使用阿拉伯字母，街上的招牌、题词都是用鞑靼语写的。

可是，忽然，这一切原来……都错了！……

"伟大舵手"甚至在推行过强制迁移农民的伟大运动之后，都没有立即想到这个方法原来是可以轻易地应用在民族方面的。堪称他的兄弟的希特勒，在根除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方面倒是有些经验，但那是后来的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事，斯大林老爷子考虑这个问题可比他早得多。

除了那场农瘟之外，直到强制迁移整个整个的民族之前，我们苏维埃国家的流放事业虽说也曾拥有几十万人之多，但毕竟无法同劳改营相提并论，它还没有那么光荣和雄伟，以至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从前也有过移民流刑犯（经法院判决的），有过行政流刑犯（不经法院判决的），但那两者都限于有数可计的个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姓名、出生年月、所犯的法律条文及罪状；材料上都附有半身的正面和侧面照片。只有英明而耐心的、能够一丝不苟地干各种脏活儿的机关才能够把一粒粒的砂子穿成串，由那些被摧垮的家庭造成一个个流放区整体。

但自从开始强制迁移特种移民以来，我国的流放事业迅速发展和提高了！前面两个术语都是沙皇时代留下来的，而特种移民

① 《斯大林全集》，莫斯科版，第13卷，第258页（中文版，第13卷，第231页）。

这个词可算是我们苏维埃政权自己亲生的了。我们不是有许多最喜欢、最心爱的词是用这个"特"字开头的吗（特别科、特殊任务、特殊关系、特种供应、特别护理……）？在"伟大的转折"的那一年，特种移民这个词是用来表示"被剥夺的富农"的，因为这个词更恰当、更灵活，所以无法挑它的毛病；当时被"剥夺"的不全是富农，所以使用"特种移民"这个词来概括就无懈可击了！

于是"伟大的慈父"便下了命令：对于强制迁移的民族也使用这个词！

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发现这一点的。进行第一次试验时他还相当谨慎：一九三七年，他悄悄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几万名可疑的朝鲜人（从风烛残年的老人到咿呀学话的小儿）全部从远东地区强行迁移到哈萨克斯坦。（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哈勒欣河，怎么能对这些黄皮肤、细眼睛的朝鲜人放心呢！）迁移得十分匆忙，以致这些朝鲜人不得不在没有窗户（一下子哪里去弄那么多玻璃！）的土坯房里度过第一个冬天；迁移得那么秘密，以致除了左近的哈萨克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些移民的事，全国没有一个人向外吐露过此事，没有一个外国记者为此写过一个字的报道。（看，还是把新闻宣传机构控制在无产阶级手里好嘛！）

他很满意！他记住了。一九四〇年就在革命的摇篮——列宁格勒近郊又一次采用了这个办法。但是这次不是在夜晚，也不是用端着刺刀的士兵赶走强制迁移者，而是叫作"隆重欢送"到（刚刚被我国争取到手的）卡累利芬兰共和国去。正中午，会场上红旗招展，鼓乐齐鸣，这是在隆重欢送列宁格勒近郊的芬兰人和爱沙尼亚人去开发新的家乡的土地。火车把人们带入偏僻地区后，情况就变了。（维·阿·姆曾谈到一批六百名强制迁移者的命运。）在这里，没收了所有人的身份证，武装士兵把人们包围起来，把他们装进（运囚犯的）所谓"红色运牛车"。后来又装上驳船。到

达目的地——卡累利阿内地的码头后，便把他们分别送去"加强集体农庄的力量"了。这些被"隆重欢迎"来的、完全自由的公民只好服从分配。只有二十六个人，其中包括给我提供这份材料的人，拒绝到农庄去，而且坚决不交出身份证！这时苏维埃政权——卡累利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代表来了，他警告说："这样下去要死人的！"人们反问他："你还想拿几挺机关枪扫射吗？"这些人真不懂事。何必用几挺？！对付包围圈里的二十六个人，一挺就足够了。（没有人会为这二十六个芬兰人写诗的！）但是，一种令人不可理解的懦弱、迟钝和优柔寡断妨碍了政权代表采取这一合理措施。他企图把二十六个人离间开。行动人员想一个一个地叫人去谈话，可是二十六个人一起去了。他们这种没有理智的勇敢精神终于占了上风：当局保留了他们的身份证，撤掉了包围。这二十六个人总算没有落到农庄庄员或流放者的地步。不过，这是偶然的，是例外，大批的人还是乖乖地交出了身份证。

这一切都还是试验。只是到了一九四一年七月才有机会大规模地应用这一办法：这时必须把伏尔加河沿岸日耳曼人的自治的、当然是叛逆的共和国连同其首府恩格斯市及马克思施塔德市完全铲除，并远远地抛到东方去，而且要在几昼夜之内完成这项工作。这时才初次使用了纯粹的、富有活力的、强制迁移整个民族的办法。这个办法看来既简便，又有效，它只须符合一个标准——属于该"民族"就行了，无须过去那套繁琐手续，每个人立案、审讯、判决等等。在苏联其他地区抓日耳曼族人（个个都要抓），那就不需要地方内务人员有什么高等文化水平来搞清谁是敌人谁不是了。只要姓氏是日耳曼族的，抓就没错。

体制已经试验过，调整好了。从现在起它就可以铁面无私地抓走任何一个指定的、规定的、命中注定的叛逆民族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干得干净利落：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巴

尔卡尔人、加尔梅克人、库尔德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最后还有居住在高加索的希腊人，无一幸免。尤其使这个体制显得富有活力的，是"各族人民的慈父"作出的决定并不通过繁琐的法院判决形式向人民宣布，而是通过现代摩托化步兵的战斗行动宣布：武装师团夜间开进指定民族的居住地区，占据各个重要地点。犯罪的民族早晨醒来便发现它的各个村庄都已处在机枪和冲锋枪包围圈内了。他们听到命令：限十二小时，每人只带自己两手可以携带的东西！（但是，十二小时还太多，摩托化部队的摩托车还得停下来等待。所以在克里米亚则只规定二小时，甚至缩短为一小时半。）所有的人立即像囚犯一样被装上卡车，屈膝蹲坐在车厢里。（老太太、带着婴儿的妇女，一律坐下！这是命令！）卡车在士兵押送下开往火车站，把人们塞进运牲口的列车直送目的地。或许在中途人们还不得不像纤夫一样自己用纤绳拉着木筏逆流而上，步行一百五十到二百公里，直到进入科洛格里夫上游的原始森林。只有一些不能行动的老年人可以躺在木筏上。

或许从空中、从高山上看起来这是一幅十分雄伟壮观的图画吧：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刚刚解放了的克里米亚半岛，一九四四年四月）上同时响起摩托车的哒哒声，几百辆长蛇一般的卡车队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爬行。这正是果树开花的季节，正是鞑靼妇女从温室取出葱秧往菜园里移栽的季节，还刚刚开始种植烟草（就此结束吧！注定了此后许多年克里米亚地区不会再有人种烟草。）运送人的卡车队并不直接开进被特种部队包围着的村子，车只开到村口，人们到村口来上车。上级命令是给一个半小时收拾东西，但是执行军官却把时间缩短到四十分钟，这样既可以更快地完成任务，保证全员提前到达集合地点，同时又可以使特种部队撤出后留在村里的善后小队的收获更丰富些。有些特别穷的村子，比如毕犹克湖附近的奥津巴沙村，就只好放一把火烧光了事。卡车队把鞑靼人运到火车站。在囚犯列车里人们却要等待几昼夜

才开车，满耳是叫苦声和充满哀怨的离别歌声。[①]

整个民族整个民族地放逐，其优越性在于形式整齐划一！无须照顾什么“个别情况”！没有任何例外！不接受任何个人的抗议！大家都驯服地走了，因为你、我、他，都一样。大家全都得走。不仅是男女老幼都被放逐，而且未出生的孩子也被放逐，因为强制迁移的命令也包括胎儿。还有那些尚未胚胎的孩子也一起被放逐了，因为他们注定要在这项命令的掌握下诞生。这与那陈腐的、讨厌的刑法第三十五条条文根本不同。(那里还曾规定什么“流放不适用于不满十六岁的人”！)现在，这些人从降生之日起，只要把脑袋一伸到人世间，他们就成了特种移民，就已被终身流放了。当他们年满十六岁时，表明他们已经成年的标志是他们从此也要到警备司令部去登记。

人们留下的一切——敞开房门的、还保留着人体热气的住宅，翻弄得乱七八糟的箱箱柜柜，十代人甚至二十代人积蓄起来的全部家私，如今也全部以整齐划一的形式落到惩罚机关的行动人员手里：有些东西要归国家，有些就被属于幸运民族的邻居们私分掉，不可能有人再为他的奶牛、家具、器皿等被拿走而提出抗议。

尤其使这种整齐划一显得加倍庄重而高尚的，是有关的秘密命令对于这些恶劣民族中的共产党员也并未稍加宽恕。也就是说，无须检查党证，又少了一层麻烦！而且还要责成共产党员们到达新流放地后加倍努力工作。这样就一切都好了！[②]

---

①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塔夫利达省的行政当局和地主们曾经发起一个运动，请求沙皇将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全部迁往土耳其，但遭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拒绝。1943年希特勒德国的驻克里米亚总督也曾向希特勒提出过同样请求，希特勒也拒绝了。

② 当然，“伟大舵手”没能预见所有的细节和曲折。1929年鞑靼王公和其他高层人物就已经被驱逐出克里米亚了。当时的做法比对俄罗斯贵族宽大得多：没有逮捕，只叫他们自己迁到中亚地区去。这些人到了中亚，生活在亲近的穆斯林居民当中，很快就安居了，富裕了。但不料十五年之后鞑靼劳动群众也通通被“篦”到这里来了。老相识他乡相逢，可是劳动者如今成了祖国的叛徒和被放逐者，而从前的王公这时在苏维埃政权机关里已经牢牢地站稳了脚跟，许多人还入了党。

整齐划一中的唯一美中不足，是异族通婚的家庭。（难怪我们这社会主义国家从来就反对异族通婚！）强制迁移日耳曼族和后来强制迁移希腊人的时候，没有赶走异族通婚的夫妇。但这种做法带来不少麻烦，并且在看来已经清洗消毒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些病灶。（不是有些年老的希腊妇女偷偷回到女儿这里来死嘛？！）

把这些民族强行迁移到哪里去呢？可以放逐的地区很多。例如，哈萨克斯坦，放逐到这里的民族人数加上一般流刑犯大约超过共和国总人口的一半，所以，这个共和国满可以称之为“哈泽克斯坦”*了。分配特种移民的当局也没有忘记中亚、西伯利亚（许多加尔梅克人死在叶尼塞河流域）、乌拉尔北部和苏联欧洲部分的北部地区。

强制迁移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民算不算放逐整个民族呢？从表面上看，它不够条件，因为那并不是男女老幼一概迁走，似乎作为一个民族还是留在故土了。（因为那里距离欧洲太近，否则是可以无所顾忌的！）似乎是留下来了，但却已被“间苗”间到了无法再稀的程度。

其实，净化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作早已开始了。一九四〇年，我们的军队刚刚进入这个地区，兴高采烈的当地人民还没有来得及表决加入苏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净化了。净化首先是从军官开始的。必须认识到，对于这些年轻的国家来说，它们的第一代（也是最后一代）本民族的军官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他们代表着民族的严肃性、责任感和精力。当他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曾在纳尔瓦城下学习过如何以自己尚未强健的胸膛去捍卫尚未强健的祖国**。如今镰刀一挥，就割掉了他们浓缩的经验和旺盛的精

---

* “泽克”— 俄文“ЗЭК”的译音，意为囚犯。这里只将“哈萨克斯坦”的俄文写法改变两个发音近似的字母便成了“哈泽克斯坦”（囚犯之国）。—— 译者注

** 指1939年苏芬战争时芬兰军队保卫当时芬兰国界的战斗。——译者注

力。这是为了进行全民投票所作的一项最重要的准备。是的，这是一张很"灵"的"验方"，在联盟本土上不是也试验过同样作法吗？就是要把那些将来可能领导反抗的人，以及可能用自己的思想演讲、著述唤起人们反抗的人统统悄悄地、尽早地消灭干净。这样，表面上那个民族还生活在原来的地方，实际上民族已经不存在了。一颗死牙最初从外表看来和好牙没有多大区别。

但一九四〇年并未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采取强制迁移的办法，当时用的是集中营，而对某些人则是在石筑监狱的院内予以枪决。一九四一年撤退的时候，尽可能地把一些富人和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像贵重战利品似地带走了，然后却把他们像粪土一样弃置到古拉格群岛僵硬的土地上。（他们全是在夜间被抓走的，每户只许带一百公斤的行李。上车时户主就与全家人分开，然后被消灭在监狱中。）整个战争期间我国一直（通过列宁格勒电台的广播）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进行威胁，说将要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报复。一九四四年苏军回到这里时实现了这些威胁：把大批的人抓进监狱。不过，这毕竟还不能算流放整个民族。

对波罗的海沿岸各族人民的大规模强制迁移是从一九四八年开始进行的（首先从刚强的立陶宛人开始），一九四九年便三个民族一起放逐，一九五一年又进一步放逐立陶宛人。在这些年代也强制迁移了西部乌克兰人，最后一次强制迁移也是在一九五一年。

"大元帅"是否准备在一九五三年还要放逐谁？是犹太人吗？除犹太人外还有什么民族？他的这一设想我们现在永远无法知道了。不过，据我个人猜想，斯大林是渴望着要把整个芬兰的居民流放到接近中国的沙漠地带去的，但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七年（由于雷诺发动政变失败）均没有能实现这个愿望。他还很可能已经在乌拉尔以东选好了地方，要把塞尔维亚人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希腊人强制迁移去。

假如这位"先进学说的第四号柱石"再多活十年，欧亚大陆

的民族分布图就将变得无法辨认，将会发生一场反方向的民族的大迁移。

有多少民族被流放，将来就会写出多少部史诗，它会叙述人们别离故土的悲哀，也会谈到在西伯利亚遭到的大规模消灭。这些民族所经历的一切，只能由他们自己写出痛切的回忆，我无意在此越俎代庖，更无意跑得太远。

但是，为了使读者知道这些民族被赶去的地方也就是读者所访问过的那个流放王国，同一个古拉格群岛上的污秽池，我们还是来看看强制迁移波罗的海沿岸人民时的某些情况吧。

在放逐波罗的海沿岸人民这个问题上，不仅没有强奸民意，而且完全是执行了"人民的最高意志"。三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各自作出了自由的决议（爱沙尼亚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决议要求把某些类型的本国同胞强行迁移到遥远的异乡西伯利亚去，而且是**永久性**迁移，永远不许他们再回到祖国来（这就清楚地表明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国家的政府有多大独立性，也可以看出那些不争气的、不中用的本国同胞是多么激怒了政府）。要流放哪些类型的家庭呢？1. 罪犯的家属（只把家长弄到集中营去累死还不够，还必须把这些家庭的全部种子都根绝掉）；2. 富裕农民（这一措施大大加速了波罗的海沿岸已经时机成熟的农业集体化）和他们的全部家属（在里加大学读书的学生是在他们的父母从农村被抓走的当天夜晚从学校宿舍被抓走的）；3. 由于某种原因逃脱了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四四年的铁篦子的、漏网的头面人物和要人；4. 一般对现政权抱有敌意而未能及时逃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家庭，或者与当地积极分子有私仇的家庭。

为了避免损害我们共同的**大祖国**的声誉，也为了不给西方的敌人以可乘之机，这项决议未在报上发表，也未在各共和国内部公布，而且在强制迁移的当时也没有向被迁移者宣布。只是在到

达目的地之后，在西伯利亚的警备队内才对他们宣布。

放逐的组织工作效率，这个时期比以前放逐朝鲜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时已大有提高，已经总结并且掌握了宝贵经验，这时已不需要按天计算，甚至不必按小时计算，而是可以按分计算了。实践经验表明：从夜间的第一次敲门声开始，到全家人的最后一只鞋后跟迈出家门槛，走入黑暗的夜幕，登上卡车止，只要二十到三十分钟就足够了。在这几十分钟时间内，被叫醒的家庭能够作到：穿好衣服，弄明白自己是要被永远放逐，在放弃一切财产要求的文件上签字，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叫到一起，收拾几个小包袱，然后根据命令走出家门。(不必担心留下来的财产会发生混乱。押解人员一走，财务局的代表便会立即来清点物资，填写没收物品清单，全部财产将由委托商店根据清单出售，售款上缴国库。我们无权指摘他们清点财物时曾往自己腰包里装点什么或者从“小道”运走点什么。其实，他们大可不必这样做，因为人民政权的任何成员只要在委托商店再要一张发票，就可以用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合法”地把他需要的任何东西拿回家去。)

在这二十到三十分钟的时间里人们能够想到些什么？怎样选择和决定最需要的东西？有一个中尉奉命强制迁移一户人家（这家里有个七十五岁的老奶奶，母亲五十岁，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和一个二十岁的儿子)。他向这家人建议说：“一定要把缝纫机带上！”谁能想到：后来这一家人就靠了这台缝纫机才得以活命。[①]

不过，这种快速强制迁移的办法有时也对受害者有利：它像是一阵旋风，过后就不见了。最好的箅帚也会漏掉一些东西的。有

---

① 这些奉命执行强制迁移任务的官兵们当时对自己的行动是怎样理解的呢？强制迁移玛丽亚·苏姆贝格时执行任务的是一个来自西伯利亚楚雷姆河沿岸的士兵。他执行那次任务后不久，就复员回到家乡了。有一次，他在家乡遇见了苏姆贝格，咧着嘴笑嘻嘻地对她说：“大娘，您还记得我吗？……”

的妇女恰巧那儿夜没在家里住，旋风过后又回到本村来了。她便到财务局去请求打开家门上的封条，财务局也居然就给她打开了：随你去住吧，再发布命令时再说！

运牲口的列车车厢并不大，运马时定额是八匹马，运士兵时定员三十二人，运囚犯要装四十人，而运塔林地方的特种移民时则装五十人。仓促间没有对车厢进行必要的改装，人们请求在车厢的底板上打个洞，以备大小便用，但这也没有及时批下来。只放一个普通水桶当马桶。它很快就满了，溢出来弄脏人们的随身行李。从上车的最初一分钟起，这些双足哺乳动物就被迫忘掉男人与女人的区别。最初一天半，他们被锁在车厢里，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婴儿饿死了。（这一切我们早已在本书中看到过，在两章之前，对吗？二十年之前如此……此时仍然如此……）火车在尤列密斯特车站上停了很久，车厢外面不断有人奔跑，敲打着车厢板呼叫姓名，妄想给车里的熟人送点吃的或其他物品。但是，这些人马上就被驱散了。锁在车里的人却在挨饿。等待着这些衣着单薄的人们的是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

中途才开始分发面包。在几个车站上给了菜汤喝。所有列车都是开往远方的：新西伯利亚州，伊尔库茨克州，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只是巴拉宾斯克一处就运来五十二个车厢的爱沙尼亚人。用了十四昼夜才到达阿钦斯克。

是什么东西在这绝望的路途中支持这些人活下来的？那不是信仰，而是仇恨所带来的希望："这些家伙快完蛋了！今年就会发生战争。秋天我们就能返回故乡。"

无论在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任何一个过着和平生活的人，对于关在铁笼子里的这些人的这种想法都不可能同情，不可能理解，也许还不能原谅。前面我已提到，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也曾这样相信过、盼望过。那些年代这个制度之不公正、二十五年刑期以及重返古拉格群岛的命运已经使忍耐达到最

高点，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爆炸性的、武装警卫也无能为力的最高点。（一般地说，如果一个制度是不讲道德的，那么它属下的臣民也就可以对它不承担任何义务了。）需要把人们的生活糟踏到什么程度才会使牢房、囚车和运牛车里的千百万人把绝灭性的原子战争看成是唯一出路而祈祷它发生啊？！……

但是，没有人哭。谁也没有哭。仇恨能够烧干人的眼泪。

爱沙尼亚人在路上也考虑另外一件事：西伯利亚人将怎样迎接他们？一九四〇年时期西伯利亚人对放逐来的波罗的海沿岸人是进行掠夺的——勒索他们，一件皮大衣只换给半水桶土豆。（当时我国的衣着褴褛的人们确实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来的人看成资产阶级分子了……）

这一次，一九四九年，事先对西伯利亚人进行了宣传：运来的都是些坏透了的富农分子！但是，从火车上下来的“富农”却个个衣衫破旧，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身体检查时俄罗斯护士们意外地发现这些妇女都很干瘪瘦弱，她们抱的小孩连一块干净尿布都没有。爱沙尼亚人被分配到人烟稀少的集体农庄去，当地的西伯利亚农庄妇女背着领导给这些特种移民送来她们仅有的东西：半公升牛奶、一块菜饼或者一块黑面饼。

这时候，爱沙尼亚的妇女们才流下了眼泪。

但是，当地除了农妇之外，当然，还有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他们却真相信运来的都是法西斯余孽，而且这些坏蛋还不愿意劳动，不愿意为把他们从资产阶级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出点力气，真是忘恩负义！（“应该把你们统统淹死！”团员积极分子对放逐者这样喊叫。）团员积极分子也就成了这些人的看守，监督他们劳动。积极分子早已预先接到命令：一听见枪响就立即组织对这些人的围捕。

在阿钦斯克车站上发生过一次有趣的“差错”。比利留斯地区的领导为了给本区楚雷姆河沿岸几个农庄增加人力，贿赂了押解

人员，买了十车皮特种移民，共五百人，并且迅速地把这些人转运到了距阿钦斯克一百五十公里外的楚雷姆地区。可是，按计划这些人是要运到哈卡斯自治州的萨拉林斯克矿务局的。矿务局在等待补充人员，可人已经被卸在集体农庄里了。这些农庄前一年每个劳动日的收入平均只有二百克粮食。入春以来这里的粮食、土豆全已吃光，各村一片饿牛的叫声，奶牛像野牛一样冲向半腐烂的干草。因此，农庄只能给新来的人每人预支一公斤面粉作为一星期的粮食。这并不是对放逐者的歧视和克扣，这点预支已经十分合理了，它几乎等于未来一周的全部工资！刚离开故乡的爱沙尼亚人不禁大吃一惊……（不错，农庄附近的波利诺耶村里就有几座大粮仓，仓里的存粮年年增加，一直没有安排外运。但这批粮食已属于国家，不是农庄财产。周围的农民在饿死，却不肯从那粮仓里拿点粮食分给大家吃，因为那是国家的。农庄主席巴什科夫自作主张从仓库里给那些尚未饿死的社员每个人分了五公斤粮，他为此被判处劳改。粮食属于国家，缺粮只是这个集体农庄的事嘛！所以此事也不必在本书议论了。）

强制迁移来的爱沙尼亚人在楚雷姆农庄里挣扎了大约三个月，怀着迷惘不解的心情学习掌握一条新的生活规律：要么去偷，要么饿死！他们以为会永久呆在这里了。突然，一道命令，又把他们全部召集起来赶到哈卡斯的萨拉林斯克区去（矿务局的主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补充人员）。哈卡斯本地人很少，各村几乎全是流放来的人，每村都有个警卫部。到处是金矿，到处在钻探，矽肺在蔓延。（这一广大地区与其叫哈卡斯自治州或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莫如叫哈卡斯金矿局或叶尼塞工程局更贴切；这些地方与其说受边区苏维埃和党区委的领导，毋宁说受内务部部队将军管辖。区委书记们也得听命于区警备司令。）

但是，送到金矿场的人还不算是最悲惨的。真正悲惨的是那些被强行编入“淘金劳动合作组”的人。淘金工人！听起来多么

诱人！像是在闪着金光、散发着金粉。但是，当今世界的任何概念一到我国就都十分容易地被歪曲了。当局知道这些特种移民不敢反抗，所以就把他们赶进这种“合作组”，让他们去开采那些政府由于无利可图而放弃的矿场。那里已经没有安全设备，经常像下雨似地流着水，劳动艰苦，挣钱很少。只因为国家舍不得放弃这一点点金子，才叫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去把它舔干净的。“劳动合作组”属矿务局“淘金科”领导。矿务局只知道下达计划指标，要求完成计划，根本不想想自己还负有其他责任。这些“合作组”的人确有“自由”，但那不是不受国家约束的自由，而是不受国法保障的自由：他们没有带工资的休假日，星期日也不一定休息（像囚犯一样），也许会宣布一个“斯达汉诺夫运动月”，那就一个星期日也没有了。从国家得到的恩惠是：不出工就被判刑。人民法院每两月派来一次巡回法庭，每次都判处许多人百分之二十五的强制劳动。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这些“淘金工人”每月可以挣到三四个“金卢布”（相当于斯大林时期的一百五十到二百卢布，仅为最低生活费的四分之一）。

在柯皮耶沃附近的采金场劳动的流放者不领现金工资，而领内部流通券。可不是嘛，要全苏联通用的纸币有什么用？反正这些人不能到别处去，在矿场的小卖部凭内部流通券就可以买到（滞销的）东西嘛！

本书已对囚犯和农奴作过详尽比较。可以回想一下，俄国历史上处境最坏的并不是农奴，而是隶属于工厂的工人。这些只能在矿场小卖部使用的内部流通券令人联想到沙皇时代阿尔泰地区的砂金矿和工厂。十八、十九世纪那里的人们常常故意犯罪，以便脱离所隶属的矿场而去服苦役，可以**生活得比较轻松些**。直到十九世纪末期阿尔泰地区采金矿的“工人们还没有权利拒绝星期天劳动”！拒绝就会被罚款（和强迫劳动比较一下看！），厂矿办的小卖部专卖劣质商品，抬高价格，克扣分量。“是这些小铺子，

而不是那经营不善的金矿，构成金矿主的主要收入来源。”（谢苗诺夫-天山斯基，《俄国》，第十六卷。）这里的“金矿主”一词今天完全可以读作“金矿托拉斯”。

怎么搞的？古拉格群岛上的一切怎么这样千篇一律，毫无特色？……

一九五二年的一天，身材弱小的妇女赫·斯没去上工。因为天气太冷而她又没有毡靴。为此，木材加工合作社的领导却派她在没有毡靴的情况下去当三个月的伐木工！还是这位妇女，她在怀孕期间请求派一点轻劳动，不要再叫她去搬运木材。给她的答复是：“你不愿意干可以辞职！”蹩脚医生又把她的产期算错一个月，到了临产前两三天才让她休息。在那里，在内务部统治一切的泰加森林，同谁去讲理呢？

但这还不等于生活已真正绝望。那些被送到集体农庄的特种移民才是真正尝到了生活绝望的滋味。现在有些人争论说（倒也并非奇谈怪论）：“一般地说，集体农庄总比劳改营好过些吧？”我们则要反问一句：“如果把劳改营和集体农庄结合起来，那也好过吗？”其实，特种移民的处境正是这二者的结合。表现农庄特点的是，他们在这里不领固定口粮，只在播种时期能领七百克面包，麦子是发了霉的，烤出的面包是土黄色的，吃起来牙碜（大概是不久前清扫仓底的麦子）。表现劳改营特点的是，这里也可以把人关进羁押室：生产队长向管理处告状，管理处给警备队一个电话，就把人关起来。至于这些人领到的工资，真是可怜得很：玛丽亚·苏姆贝格在农庄劳动的头一年平均每个劳动日可分得二十克粮食（一只小鸟在路边啄食的粮食也比这多！）和十五个斯大林时期的戈比（折合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个半戈比）。她用全年收入买了……一个小铝盆。

那么，这些人靠什么活命呢？靠波罗的海沿岸寄来的邮包。因为毕竟没有把整个民族都强制迁移来。

那么谁给加尔梅克人寄邮包呢？谁给从克里米亚赶来的鞑靼人寄呢？

请您到这些人的坟上去问问他们自己吧！

不知道是根据他们的故乡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长会议的同一项决议，还是根据西伯利亚的原则性，总之，在一九五三年，“我们的慈父”去世之前，对波罗的海沿岸来的特种移民还有一条特别规定：除了使用十字镐、铁锹和锯的重体力劳动之外，不许安排他们作任何其他工作！“你们必须在这里学会做人！”如果用人单位把谁的工作安排得稍高了一点，警备队便会出面干涉，并且亲自把那个人拉下来当一般工人。矿务局的疗养院旁边有个果园，连果园的地都不允许特种移民去翻耕，否则就会是“对在那里休养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侮辱”。警备队长甚至不准玛丽亚·苏姆贝格担任饲养牛犊的工作：“把你强制迁移到这里不是让你来休养的！割草去！”农庄主席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她留下来。(她为农庄救活了好几头患波状热的牛犊。她很喜欢西伯利亚的牲口，觉得比爱沙尼亚的牲口更驯良，而这里的从未受过抚爱的奶牛则亲热地舔她的手。)

有一次（在楚雷姆河）需要紧急往驳船上装粮食。于是就让特种移民连续劳动三十六小时，不给任何报酬和鼓励。在这一昼夜半的时间里只有两次给二十分钟吃饭的时间和一次三小时的休息。“你们不干，就把你们赶到北边更远的地方去！”一个老工人被麻袋压倒了，共青团员监工用脚踢他起来。

每星期要到警备队报到一次。距离队有好几公里远？老太太八十岁了？那就弄匹马把她驮来吧！每次报到时都要警告每个人：要逃跑就判你二十年苦役！

行动特派员的办公室就在附近。有时也会把你叫去问话。也许用较好的工作诱惑你，也许就威胁——把你的独生女儿单独流放到北极圈以北去！

他们什么事情作不出呢？……他们的手什么时候在什么事情上受过良心的制止呢？……

他们会给你派任务：监视某人，或者收集可以把某人关进监狱的材料。

警备队的任何一个中士一走进特种移民的家门，移民全家，包括老年妇女，都必须立即起立，未经允许不得坐下。

这么看来，读者会不会认为这些特种移民都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

不，那可不是，不是！他们享有完全的公民权！也并没有收回他们的身份证。他们完全有权参加普遍、平等、秘密、直接的选举。每逢这崇高而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有权勾掉选票上除自己要选的人之外的几个候选人名字，他们享有这一神圣权利。也并不禁止他们签名购买公债，（可以回想一下共产党员季亚科夫在劳改营中的苦恼！）自由的集体农庄庄员们骂骂咧咧地勉强签名购买五十卢布公债，而爱沙尼亚人则被勒索到四百卢布："你们都有钱啊！谁不签名买公债，我们今后就不替他收转邮包！还要把他流放到更北的地方去！"

而且，真会流放去的，为什么不流放呢？……

啊，真烦死人！老是这些同样的事！可真是的，我们开始写这第六部的时候原是打算要讲某些新东西的呀！不是要讲劳改营，而是要讲流放。而且这一章我们也是要讲点新东西的呀：不是讲行政流放，而是讲特种移民。

可是，讲来讲去，结果还是讲了些同样的事。

现在还需要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许多别处的、另一类型的流放地区呢？另外一些地方的？另外一些年代的？另外一些民族的？需要吗？

那么谈哪些呢？……

*　　　　*　　　　*

不同民族的移民村互相交错着，人们可以隔村遥遥相望。但是，不同的民族仍然表现出了各自的特点、生活方式、兴趣和倾向。

所有被强制迁移的民族中，日耳曼人表现了突出的勤劳。他们比谁都更彻底地抛弃了过去的故乡生活。(其实，他们在伏尔加河或马内奇河沿岸的故乡算个什么吗？)像当年在沙皇叶卡捷琳娜赏赐的肥沃多产的份地上劳动一样，他们今天要在斯大林赐予的这严峻的、贫瘠不毛的土地上扎根。他们全力以赴开发这流放区，把它看作自己最后居住的地方。他们安排生活时毫不指望第一次大赦，也没指望沙皇的恩典，而是一开始就作了永久打算。一九四一年流放来的时候，日耳曼人名副其实一无所有，但是这些勤奋而不知疲倦的人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在流放地同样开始了讲求方式方法的合理劳动。地球上有哪个荒原是日耳曼人所不能变成繁荣兴旺地区的呢？难怪俄国人从前有句老话："日耳曼人就像柳树，随便插在哪里，就在哪里把根扎住。"不论是矿山、农业机械站，还是国营农场，领导者都对日耳曼人赞不绝口，他们再找不到更好的工人了。到五十年代初期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强制迁移者中间，甚至同当地居民相比，已经成为最殷实的人家了。他们的住宅最宽敞洁净，他们养的猪最肥，奶牛产奶最多。他们的女孩子都是最受人爱慕的，这不仅因为她们父母富有，而且因为在劳改营地区横遭败坏的习俗中她们都守身如玉，品行端庄。

希腊人也十分热情地投入了新的劳动。不错，他们并未放弃有朝一日迁回库班去的幻想，但在流放地也没有吝惜自己的汗水。他们的住宅不像日耳曼人那么宽绰，但在种菜和养牛方面迅速赶上了后者。哈萨克斯坦集市上希腊人卖的奶渣、黄油、蔬菜都是

上等的。

朝鲜人在哈萨克斯坦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当然，他们迁来的时间也早。到五十年代初期他们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解放：不必按期到警备队去报到，可以自由地从这个州去另一个州，只是不能越出哈萨克共和国的范围。他们的成就不在住房和小院方面(在这些方面他们的生活无宁说是不很舒适的，甚至是原始的，后来的年轻人才开始转向欧洲生活方式)。朝鲜人善于学习，他们很快就填满了哈萨克斯坦的各所学校（从战争年代开始就不在这方面歧视他们了），他们已成为哈萨克共和国知识阶层的中坚。

其他民族则各自隐瞒着返回故土的幻想，在生活上和思想上各有不同的发展。但总的说来都已屈服于这个制度，并未给大权在握的警备队制造多少麻烦。

加尔梅克人没有站住脚，渐渐地在悲伤中死绝了。(我没有看到他们。)

但是，有一个民族却丝毫未受到奴性心理的影响，况且不是个别人，不是几个反叛分子，而是整个民族都没有驯服。这就是车臣人。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车臣人是怎样对待从劳改营逃跑出来的囚犯的。看到了整个杰兹卡兹甘的流放居民中只有车臣人曾勇敢地企图支持肯吉尔营的起义。

但是，依我看，在所有特种移民中，唯有车臣人在心理上表明了自己是囚犯。自从人们背信弃义地把他们赶出故乡那一天起，他们就对一切都再也不相信了。他们盖起一些叫“萨克利亚”的平顶小房，低矮、黑暗、破破烂烂，像是一脚就可以踢倒似的。他们的“家当”也如此：只考虑当天、当月、当年，什么都不积蓄，不贮备，没有任何长远打算。他们只知道吃、喝。年轻人稍微讲究一点衣着。一年年过去了，他们还是和刚迁来时同样一无所有。任何一个车臣人都没有在任何地方企图向领导讨好过，他们在领

导面前总是骄傲的，甚至是公开抱有敌意的。他们鄙视普及教育的法律和国家学校所教的知识，更不让女孩子去上学，怕在那里被败坏。男孩子也不是全上学的。他们不让妇女到集体农庄去干活，自己也不愿意在农庄土地上出力。他们大多数人设法当汽车司机：保养机器不丢脸，况且他们那种高级骑手的性格和爱好也可以在汽车的奔驰中得到某种满足。当司机还可以满足他们偷窃的愿望。不过，他们也采取直接行动满足这最后一种愿望。是车臣人把“被偷了”“被偷光了”这类概念带给了和平的、朴实的、沉睡的哈萨克斯坦的。他们会把成群的家畜赶走，把全家的东西偷光，有时则干脆强抢。当地居民和那些轻易在领导面前屈服的特种移民们，在车臣人眼里是和领导人属于同一类的。车臣人只尊重敢于反抗的人。

说也奇怪，大家都惧怕车臣人。谁也不能妨碍他们这样生活。甚至控制这个国家已经三十年之久的苏维埃政权也奈何不了他们，无法强迫他们尊重苏维埃国家的法律。

怎么会这样？这里有一个故事也许能说明其原因所在。我在科克切列克中学任教的时候，九年级有个叫阿布杜尔·胡达耶夫的车臣男孩子。他毫不给人好感，他也不企图给人好感，好像怕自己堕落到使人高兴的样子似的。他总是有意地表现得冷漠、十分骄傲和残酷。但谁也不能不承认他头脑清晰、思路有条理。上数学和物理课时他从来不停留在同班同学的水平上，总是深入思考，不断探讨真理，提出一些很深刻的问题来。他也和其他特种移民孩子一样，在学校免不了要承担一些所谓“社会工作”——最初是少先队组织找他，然后是共青团和学生会：办墙报、交流学习经验、座谈会。总之，他要付出车臣人十分不愿付出的精神学费。

阿布杜尔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家族中只剩下一个哥哥，其他人全没有活下来。阿布杜尔的哥哥是个到处闯荡的刑事犯，已经

不止一次为偷窃和杀人蹲过劳改营，但他几次都赶上大赦或折算刑期而被提前释放出来。有一次，阿布杜尔的哥哥来到科克切列克，接连两天饮酒作乐，饮酒时和一个当地的车臣人口角起来，那人逃走，他拔出刀子就追。恰巧路上有个不相干的车臣老太太看见了。她想劝阻他，张开两臂挡住了他的去路。如果他遵守车臣人的规矩，他这时就该在老妇人面前放下刀，不再去追。但与其说他是个车臣人，不如说已经是个十足的强盗了——只见他手起刀落，砍死了老妇人。这时他那醉醺醺的头脑才忽然想到：按车臣人的规矩他将会有何下场。于是他立即跑到民警机关去自首了。民警机关当然是很高兴地把他关进了监狱。

他倒是躲到监狱去了。但他还有母亲、弟弟、和另一个同宗的车臣人老头胡达耶夫，论辈数该是阿布杜尔的叔父。杀人的事很快传遍了科克切列克的车臣人居住区。这时胡达耶夫家族剩下来的这三个人立即聚集到阿布杜尔家里，准备了一些食物和水，把门窗全部钉死，像躲进堡垒一样躲藏起来。按习俗，被害的老妇人那一家族的车臣人必须杀死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一个人以报仇；胡达耶夫家族中的人鲜血不流，受害者家族中的人就没有资格在世上作人。

阿布杜尔·胡达耶夫一家被团团围住了。阿布杜尔当然不能上学去。全校、全市都知道了这件事。都知道我们学校有个高年级学生，共青团员，优秀生阿布杜尔现在每一分钟都有被刀捅死的危险；也许就是现在，当同学们听到铃声在教室就座的时候，或许就在文学课老师讲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时候，明晃晃的刀子正捅进他的胸膛。大家都知道这件事，都惦念着他，课间休息时都在谈论他，但是，最后，大家都低着头往下看。不论是学校的党组织，共青团，还是教务处长、校长、区教育局，谁都没有去拯救阿布杜尔·胡达耶夫，甚至谁都没敢走近像惊扰的蜂房般乱哄哄的车臣人居住区里的胡达耶夫家。是啊，假如仅仅是这些人

没有去，那还情有可原！问题是：从前在我们眼里一直显得那么威严可怖的党的区委会、区苏维埃执委会、同警备司令部和民警机关一起隐藏在土墙里边的内务部派出机关等等，也都在血的复仇者的急促的呼吸面前望而却步了。原来，古老的、野蛮人的法律刚刚呼出了一口气，一切苏维埃政权就在这科克切列克荡然无存了。看来，这个政权的手也并没有从州中心江布尔市伸出多远，因为整整三天中既没有看见从江布尔市有一架飞机载着军队来，也没有接到任何态度坚定的指示；只是下令以现有力量加强监狱的警卫工作。

这样，车臣人和我们所有的人便都看清楚了：在这个地球上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什么是幻影？

还是车臣族的几位老人表现出了真正的明智！他们到内务部机关去了一次，请求把胡达耶夫家的大儿子交给他们惩处。内务部机关小心地婉言拒绝了。老头们第二次到内务部机关去，请求举行公审并当场处决胡达耶夫的大儿子。如能作到这一点，他们答应给胡达耶夫一家解围，不对他家的其他人进行血的复仇。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合情合理的妥协方案了。但是，公审？这怎么行？！事先答应当众处决？这怎么行？！胡达耶夫又不是政治犯，他是一个盗贼，他是社会亲近分子呀！对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的权利可以践踏，但不能践踏一个多次杀人犯的权利！请示了州领导，上面果然拒绝了。“那么，一小时之后胡达耶夫的弟弟就会被杀死！”车臣族的老人们解释说。对此，内务部的官员们只是耸耸肩膀：这与我们没有关系！是啊，还没有犯下的罪行，他们是不能去审理的！

不过，二十世纪的气息总算起到了一点作用。但不是对内务部人员，而是对那些已变得冷酷无情的车臣族老人起了作用。他们还是没有命令复仇者下手！他们往阿拉木图发了一封紧急电报。又有几位在整个民族中最受尊重的老年人从阿拉木图匆匆赶

来了。召开了元老会议。对胡达耶夫的大儿子进行了诅咒并且宣判了他的死刑，决定：不论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只要他遇到车臣人的刀子，那把刀就应该把他处死。然后，把胡达耶夫家族的三个人叫出来，对他们宣布说："你们可以随便走动，没有人会触动你们了。"

于是，阿布杜尔拿起书本上学来了。学校的党组织委员和团组织委员带着伪善的微笑欢迎他。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和课堂上，人们继续向他歌颂共产主义觉悟，似乎那令人难堪的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过。阿布杜尔那消瘦的、变黑了的脸上毫无表情。他又一次深深地懂得了世界上什么是最强的力量：那就是**血族复仇**。

我们欧洲人只知道在书本上读，在学校里讲一些崇高的话语，以表明自己蔑视这条野蛮的法律，蔑视这毫无意义的残酷屠杀。但是，看来这类屠杀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不会使这些山地民族根绝，反而会使这些民族坚强。并不需要很多人为这条血的复仇的法律而牺牲，但这条法律却可以对周围的一切人产生威慑力量！记住这条法律的山地民族中会有哪一个人敢于**随随便便地**侮辱另一个人呢，就像我们常常由于酒醉，由于道德败坏，或者简直就是为了好玩而随便彼此互相侮辱那样？还有哪一个非车臣人敢于同车臣人纠缠，敢于说他是盗贼，说他粗野，或者敢于指摘他买东西不排队就往前钻呢？要知道，对你这些话的回答可能不是一句话，不是一句骂，而是捅向你肋下的一把刀子！就算你自己也拿出刀来（可是你身边不会带着刀子，文明人嘛！），你也不会还他一刀：否则你的全家就可能死于刀下！车臣人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地上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他们傲视一切，不论是"国家的主人"还是非主人，都得恭恭敬敬地给他们让开路。血的复仇发出的光芒形成一个恐怖"场"，它也就用这种"场"力维护并加强着这个小小的山地民族。

"要使别人骇怕，就要狠打自己人！"山民的祖先在那久远的

古代不可能想出比这更好的约束人的规范了。

可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向他们提出了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第五章

刑满之后

八年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期间，我没有听到任何曾被流放的人讲过一句流放地的好话。但是，关于流放生活的幻想却早在最初关进侦查监狱和递解监狱的时候就产生了。那时，牢房的六面石壁紧紧地挤压着你，使你透不过气，只有关于流放的幻想静悄悄地闪着颤抖的微光，它像海市蜃楼，使得阴暗潮湿的床板上的囚犯那消瘦的胸膛不禁阵阵起伏：

"啊，流放！如果能判流放就好了！"

我自己不仅没有摆脱这种通常的想法，而且，可以说，我的流放幻想还特别强烈。在新耶路撒冷的粘土采掘场时，我一听到邻村的鸡叫就幻想流放。我从卡卢加关卡的屋顶望着属于别人的庞大的首都，内心也曾祷告：让我远远地离开这里，把我流放到远处去吧！我甚至天真地向最高苏维埃提出过申请，请求把我的八年劳改改为终身流放，哪怕去最遥远偏僻的地方也行，大象*对此的回答是根本不理睬。（我当时绝没有想到终身流放早已注定，

---

* 庞然大物，指最高苏维埃。——译者注

不过它不是把劳改改为流放，而是在劳改之后流放。）

一九五二年，埃克巴斯图兹关押着三千人的“俄罗斯人”劳改点“释放”了十个人。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被领出劳改营大门！——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可理解的现象。埃克巴斯图兹营建立三年来还没有释放过一个人呢。何况这些人中间谁的刑期也没有满。这么说，是那些在战争初期判刑十年而幸存下来的少数军人得以释放了。

我们急切地盼望着他们从狱外来信。有几个人间接或直接写信来了。我们得知：他们离开劳改营后几乎全被流放了，虽然原判决书上根本没有提流放。但是谁也没有对此感到奇怪！监狱当局和我们都很清楚：问题并不在于法律条文，不在于判处的刑期，不在于写在纸上的手续。问题的实质是：政权是强者，它有权对我们这些一旦被划为“敌人”的人践踏、镇压、扼杀、直至我们死亡。不论是政权当局还是我们，都觉得只有这才是唯一正常的秩序，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安于这样了。

斯大林时期的最后几年，人们担心的不是流放者的命运，而是那些虚假的获释者的命运，是那些表面上住在劳改营外、没有警卫看守、已经离开内务部的灰色羽翼保护的人的命运。不知为什么，政权当局认为流放是一种补充惩罚手段，其实，流放不过是囚犯久已习惯的那种不负责任的生存的继续，是他赖以继续顽强地活下去的宿命论基础。流放可以使我们免除自己选择居住地点之苦，免于苦思冥想和再犯错误。流放你去的地方就是对你最适当、最好的地方。整个苏联国土上只有在这唯一的地方人们才不会责怪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只有在这里我们才有无可争议的最后权利占有三平方俄尺*的土地睡觉。而像我这样从劳改营出来后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亲人等待的孤独者，似乎也只有在流

* 不足三平方米。——译者注

放地才可能遇到自己的贴心人。

在我们国家，逮捕时是刻不容缓的，但释放时就决不会着急了。如果某个不幸的希腊民主主义者或土耳其社会党人在监狱里比规定时间多关了一天，那么恐怕全世界的报纸都要为此喊叫起来吧。而我感到十分高兴的却是：服满刑期之后只在劳改营里多留了几天就把我……释放了吗？不，把我押解上了流放的旅程。然后，又押解了一个月，这已经不是刑期，而是我自己的自由时间了。

虽然是在武装士兵押解下离开劳改营，我们还是遵守监狱里的最后的迷信信条：无论如何绝不能回头望一眼这最后的监狱，（据说回头一望，你将来就还得回到这里！）并且要正确地处理自己在监狱里使用过的小饭勺。（但是，怎样才算正确？有人说，应该带走它，否则就得再回来取；也有人说，应该把它扔给监狱，否则监狱就会追着你要。我用的小勺是我亲自在铸造车间铸的，所以我把它带走了。）

又一次经过巴夫洛达、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的递解站。虽然我们已算是刑满释放的人，但还是要对我们搜身，没收不许带的东西，赶进狭窄拥挤的牢房，塞进黑乌鸦囚车或“泽克”车厢，和刑事犯关在一起。警卫部队的军犬照样向我们狂吠，冲锋枪手照样喊叫：“不许回头！”

不过，在鄂木斯克递解监狱我们遇到一位好心的看守。他在吩咐别的事情时顺便向我们五个从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人问道：“是什么神保佑了你们？”“怎么回事？要把我们往哪儿送？”我们几个人立即兴奋起来。我们明白：去的地方可能不错。“往南方呗！”看守见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些奇怪。

确实如此。从新西伯利亚把我们送往南方了。火车朝着温暖地带开去！那里有大米、葡萄、苹果。怎么回事？难道贝利亚同

志没能在偌大一个苏联给我们找到块更坏的地方？难道真的会有这种流放？（我已经在暗自盘算将来写一组关于流放的诗，题为《美好的流放之歌》。）

在江布尔市火车站上把我们从“泽克”车厢卸下来，看管仍然十分严厉。上卡车时仍是通过警卫士兵形成的一条走廊，还是叫我们直接坐在车斗里，仿佛已经服满刑期后我们还会企图逃跑似的。夜深了，一弯新月以它微弱的光辉照着卡车走过的黑暗林荫路，这是一条真正的杨树林荫路！这就算流放！我们不是到了克里米亚吧？刚刚二月底，我们那里的额尔齐斯河还被坚冰封着，可这里已是春风拂面了。

把我们送到监狱。监狱接收时没有搜身，没让进浴室。可诅咒的四壁也不显得那么阴森了！我们拿着自己的口袋、提包等进入牢房。早晨，管钥匙的打开牢门，无精打采地说：“出来！把各自的东西全拿上！”

魔爪逐渐松开了……

红色的、春天的早晨在院子里迎接了我们。朝霞温暖着狱墙。大院当中停着一辆卡车等待我们，车上已有两个犯人，他们和我们并成一批。应该深深地吸几口气，向四周看看，享受一下这不可多得的美景！但是，怎么能错过这结识新交的机会呢？两个新犯人中有个年纪很大的人，瘦瘦的脸，一头白发，一对不住流泪的灰色眼睛。他直挺挺地坐在自己那堆揉乱的衣物上，严肃认真，象个接见外国使节的沙皇。乍一看，他像是聋子或外国人，不大可能同我们找到共同语言。我刚一跨进车斗，就决定同他搭话。于是他用漂亮的俄语作了自我介绍，声音坚定而有力：

“我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瓦西里耶夫。”

一瞬间，我们之间迸发出一个会心的火花！是不是朋友，内心往往会立即感觉到。这个人是朋友。在监狱里，想了解人就要分秒必争。谁知道下一分钟会不会使你们分手？可我们现在不是

在监狱呀！也一样！……于是，我战胜汽车马达的闹声，尽量地“采访”他，因而没有注意到卡车什么时候离开监狱的水泥地驶上了大街的石路，忘了不能回头看最后的监狱的戒律。（有多少个“最后的”监狱啊!?）竟也没有张望一眼我们短暂的自由旅程。卡车很快开进了内务部州分局的宽敞的后院。又向我们发出了禁令：不许离开这里到大街上去！

看模样，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足有九十岁，他的眼睛已经昏然无光，脸十分消瘦，头发完全白了。其实他是七十三岁。原来他就是俄国工程界早期的一位杰出水利工程大师和水文地理学家！这位瓦西里耶夫曾是“俄国工程师协会”的著名重要成员。（“俄国工程师协会”是怎么回事？我第一次听说它。这是俄国工程技术界一个阵容强大的社会团体。可是到了苏维埃时期，这一切就全都被消灭了。）瓦西里耶夫直到现在还坚定地以这段经历为荣，他得意地回忆道：“我们当时就是不肯看风使舵，就是不承认干手杖上能长出甜美的枣子来。”

当然，他们的协会为此被解散了。

我们被送到一个叫谢米列奇耶的地方。这个广大地区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遍布了瓦西里耶夫的足迹和他的马蹄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瓦西里耶夫就完成了楚伊谷地引水工程、纳里扬河水电站工程和通过楚伊里山的隧道工程的技术计算工作。战前他就已经自己着手实现这一宏伟计划了。他在一九一二年从国外购进六台“电力挖掘机”，在这里展开了工作。（这六台机器都经过了革命的洗礼，并且在三十年代在奇尔奇克工程工地上被当作苏联挖掘机械的新产品而使用。）现在，这位瓦西里耶夫由于“破坏活动”坐过十五年监狱，又在上乌拉尔斯克的政治隔离营度过最近三年之后，请求给他恩典——允许他在这里，在谢米列奇耶，度过他的流放期，直至死亡，因为他一生的事业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假如不是贝利亚本人记得二十年代有过一个叫瓦西里耶夫

的工程师曾经计划过合理分配外高加索几个共和国的水利资源的话，肯定连这一点恩典也不会给他的。）

所以，瓦西里耶夫今天在卡车里坐在自己行李袋上时的神情才会像斯芬克斯那样深沉而令人难以理解。今天不仅是他获得自由的第一天，也是他回到自己青春时代、回到激励感召过他的土地上来的第一天。不，人生并不是那么短促的，如果你能在生活的道路上立下几块里程碑的话！

不久前，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女儿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张贴着《劳动报》的报栏前停了下来。勇敢的记者不惜笔墨（这笔墨是有很高报酬的）绘影绘声地描写了他的楚伊谷地之行，他指出：布尔什维克建设者们修建的引水工程使这个地区焕发了青春。他描述了纳里扬河阶梯式水电站工程的宏伟、水利工程技术的长足发展、农庄庄员今天的幸福生活。最后，（不知谁向他提供的材料？）他突然用这样几句话结束了全篇文章："但是，如今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改造大自然的工程都是实现了一位天才的俄国工程师瓦西里耶夫当年的设想。可惜这位工程师在官僚统治的俄国没有得到承认[①]。更遗憾的是这位满怀豪情的青年工程师未能活到他的美好愿望胜利实现的今天！"这宝贵的几行字在瓦西里耶夫女儿眼里变得模糊不清、连成了一片。她从报栏里扯下报纸，把它贴在自己的胸前，在民警的警笛声中匆匆走开了。

当年那位"满怀豪情的青年工程师"并没有死，他这时正蹲在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营的阴暗潮湿的牢房里。风湿病（或是别的什么骨科疾病）损害了这位老人的脊椎，使他直不起腰来。幸运的是，当时牢房里不只他一个人，还有个瑞典囚犯。那个瑞典难友用按摩法治好了他的腰脊病。

① 其实，瓦西里耶夫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就已经是土地改良局的实际领导人了。

苏联监狱里很少有瑞典人。记得我住的牢房里也住过一个瑞典人，叫阿尔维德……

“是阿尔维德·安德逊吗?”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立即高兴地问道。(他的讲话和动作都很敏捷。)

真巧！原来替他治好腰痛的正是这个阿尔维德！啊，人生的路多么狭窄，多么狭窄啊！这又引起了我们对群岛的回忆。三年前阿尔维德原来是从那里被送到上乌拉尔斯克的政治隔离营去的。看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亿万富翁的父亲似乎并没有出面保护这位可爱的先生。[1]

这时候我们开始单个地被传到州警备司令部去问话(它就设在州国家保安部机关的院子里)。那里有一名上校、一名少校和许多尉官，他们管理着整个江布尔州的全部流放者。上校当然不会亲自问我们话，少校也只是像浏览报纸标题似的看看我们的面孔。给我们办手续的是些尉官，他们都会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劳改营的经验一再提醒我：留神！这短短的几分钟可要决定你的命运！机不可失！应该要求、坚持、抗议！要聚精会神地应付，要随机应变。快点把理由想好，说明你为什么应该留在州中心或者应该到最近的、最好的地方去。(这样要求的理由是存在的，

---

① 斯德哥尔摩有一个帕维尔·维谢洛夫，他曾多次替苏联捕捉过瑞典公民。他分析过艾利克·阿尔维德·安德逊的自述，也知道瑞典并没有一个姓安德逊的亿万富翁，对艾利克的身份作出如下推测：从相貌和自称的姓名来看，此人像是挪威人，自称瑞典人可能有某种原因。1940年逃到国外的挪威人中不少人在英军中服务；远比瑞典人多，瑞典人在英军中只有个别人。阿尔维德可能与英国某个罗伯逊家族有亲属关系，但他编造自己是罗伯逊将军的亲戚，大概是为了在苏联国家安全部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很可能作为英国或挪威某个代表团成员来到莫斯科，不会是瑞典代表团(这类瑞典代表团好像没去过)。他在代表团里不过是个三等角色。苏联国家安全部发现他以后可能要他当间谍，他不干，就判了他二十年徒刑。艾利克的父亲也许是商人，但不会是大老板。艾利克在这方面也夸大其词，甚至说他父亲认识葛罗米柯(因此国家安全部的人带他去让葛罗米柯看过)，这是想要苏联安全部对赎买他的可能性产生兴趣，也是想通过这个让西方知道他被捕的消息。

只是我当时还不知道：由于在劳改营医务所动的手术不彻底，这时我的肿瘤已经转移一年多了。）

不，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了……我已经不是服刑初期的我。似乎有某种最高雅的、清静悠闲的心情降临到我身上，我自己也乐于处于这种状态。我高兴的不是有机会运用在劳改营学到的取巧经验，我现在不屑于想出一个摇尾乞怜的借口。人是不可能知道自己将来会怎样的。你处在最好的地方也可能遭到最大的灾祸，而在最坏的地方说不定会有最大的幸福找到你头上来。而且我这时正在关心地询问老工程师瓦西里耶夫的经历，根本没有来得及打听哪个州哪个区最好，哪里不好。

弗·亚·瓦西里耶夫的档案里大概有句什么起保护作用的批示，所以军官们允许他自己步行到市内去，亲自到州水利建设局询问一下可否在那里找到工作。而对我们这些人，则一概指定必须去科克切列克区。这是本州北部沙漠地带的一角，接近哈萨克斯坦中部的寸草不生的别特巴克达尔沙漠的边缘。哼，去找你的葡萄园吧！……

军官们把每个人的姓名规规矩矩地填入粗糙的褐色纸张印制的表格，填上日期，递到我们面前——签字吧！

我不是在什么地方遇到过类似的场面吗？对，那是向我宣布特别庭判决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如此：我的全部任务就是拿起钢笔签个名字。差别只是：那时候的纸张是莫斯科生产的很光滑的纸。钢笔和墨水则同样都很糟糕。

那么，“今天”对我“宣布”的又是什么呢？是宣布：我，某某人，自即日起永远地流放到某某地区，置于国家保安部的地区部门的公开监督之下；如果擅自离开本区范围，则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交付审判，可判处二十年苦役刑。

是啊，有什么说的，完全“合法”嘛！丝毫不奇怪。我们都心甘情愿地签了字。

几年之后，我得到了一本《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刑法典》。我十分满意地看到它的第三十五条是：判处流放的期限为三年**至十年**；而作为监禁刑的附加刑时，流放期不得超过**五年**。（这曾是苏联法律工作者的骄傲：他们从一九二二年的刑法典开始就已经在苏联的立法中取消了无限期褫夺公权以及一般的无限期镇压措施，只有最可怕的一项例外，即无限期地驱逐出苏联国境。而且据说这一点是“苏联立法与资产阶级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性区别”。见：《从监狱到教育机构》一书。）法律固然是这样的，但为了节约内务部工作人员的劳动，还是写**永久**流放比较简单，这就无须再关心什么时候满刑并且再找借口重新延期了。

另外，刑法典第三十五条还规定：流放只能**由法院**以特别判决的形式判处。好吧，就算是由特别庭判处也行啊！可是，这里实际上连特别庭也不是，而是值班中尉大笔一挥，我们就被“判”终身流放了。

这时我的脑海里忽然来了诗兴，浮现出几句讽刺诗，虽然稍嫌长些：

铁匠的大锤忽地抡起，
把我脆弱的命运砸成烂泥。
要我签名，我只好挥笔：
接受国家保安部公开监督，
永久流放，我都同意！
有阿尔卑斯山、玄武岩、银河系。
有多少星辰闪烁，向人间示意。
我岂敢同它们的永久性相比，
有幸当一名永久的流囚，我已满意。
可你这保安部能不能永久呢？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从城里回来了。我把这几行歪诗读给他听。我们两人都笑起来，像孩子，像囚犯，像无罪的人们一样笑起来了。弗·亚·瓦西里耶夫的笑声清脆爽朗，很像К·И·斯特拉霍维奇的笑声，而且他们的性格也很相像：两人都深深进入了精神生活，因而肉体的痛苦便再也无法破坏他们的内心平衡。

其实，目前瓦西里耶夫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原来他不是流放到这里的，当然，是"弄错了"。只有伏龙芝市的机关才有权派他到原来工作过的楚伊谷地去工作。本地的水利工程处只负责修建灌溉渠道。水利工程处处长，一个稍有点文化但却十分自傲的哈萨克人，赏赐给这位楚伊引水工程创始人的荣誉是：让他在办公室门外稍候，等处长向区委电话请示之后方才同意接受这位创始人为"见习水利技术员"，就像安排一个刚从中专毕业的小姑娘一样。安排到伏龙芝市去吗？不行！那是另一个共和国。

怎样才能用一句话来描写俄国的全部历史呢？那就是：它是个把一切希望和才华统统扼杀的国家。

但是，这位白发老人总还是感到了几分欣慰。他想：不少科学家了解他，也许将来还会把他调到别处去。他也在表格上签了字，承认自己是永久流放到此地的，如果擅自离开，甘愿被判苦役，坐牢到九十三岁！我帮他把东西拿到大门口，即拿到我一步也不能越过的界限。他就要走出去，去找个善良的人家设法租下一席安身之地了。他甚至示威性地说，有可能的话，就把老伴从莫斯科接到这里来。孩子们？……孩子们不会来的，他们认为不应该放弃莫斯科的住房。还有别的亲属吗？有一个兄弟。但是，这个兄弟的命运是十分不佳的：他是个历史学家，可却没有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竟离开了祖国。现在这个可怜的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拜占庭史。我们又笑起来了，我们一起替他的兄弟感到遗憾。我们拥抱告别了。就这样，我眼前又闪过去一个杰出的人，他永远地离开了我。

我们这些剩下来的人不知为什么仍旧天天被关在小屋里，晚间我们挤在粗糙的地板上睡觉，勉强可以伸伸腿，直直腰。这同我八年前开始服刑时住的拘押室完全一样。我们已被释放，可是晚上仍被锁在屋里；告诉我们：如果愿意，可以拿个马桶到屋里来。与监狱不同的只是这些日子再不免费供给伙食了，我们必须拿出自己的钱交给他们到市场去买回东西吃。

过了三个昼夜，总算盼来了真正的押送人员，带卡宾枪的。他们命令我们在领取路费和伙食费的单据上签字。路费立即被押送人员收去。(说是去买火车票，其实，他们一吓唬查票员，就可以免费乘车了，路费落入他们自已腰包，算是“外快”。)我们排成两行，拿着各自的东西走向火车站。我们又走过那条杨树林荫路。鸟儿在歌唱，一片春天的气息。可是才三月二日呀！我们都还穿着棉衣，很热，但都为来到南方而高兴。不说别人，至少在囚犯心目中寒冷是最难熬的。

慢慢爬行的火车又把我们往回头路上拖了整整一天，然后我们在楚站下车，步行了大约十公里。随身带的东西和皮包使我们都出了一身透汗。我们跌跌撞撞地走着，但还是拖着自己的东西。要知道，从劳改营里拿出来的每一块破布都会对我们这可怜的躯体有用！我身上穿着两件棉衣（一件是清点物资时捞到的），还有我那件饱经灾患的军大衣，它在前线和劳改营的地上已经磨得不像样子，但现在我怎么忍心扔掉这件满是灰尘的褐色军大衣呢？

天黑下来了，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那就是说，今夜又得住在监狱里，住在新特洛伊茨科耶村的监狱。我们早已是自由人，可还老是住监狱，监狱。牢房、硬地板、窥视孔、放风、倒剪手、凉水……一切照旧，只是不发给口粮了：我们是自由人嘛！

早晨开来一辆卡车，昨天的押送人员也来了，他们当然没在营房里过夜。我们还得往草原深处走六十公里。卡车在洼地抛了锚，大家不得不跳下车（从前当囚犯的时候没有权力下车），从泥

泞中往外推它。我们都用力推，为的是早些走过这景致多少有些变化的路程，尽快到达那永久流放地。押送人员则在周围站成半圆形，“保护”着我们。

草原迅速从车旁掠过。放眼望去，两旁是望不见边际的灰色野草，它又粗又硬，牲口都不能吃。很少看到哈萨克人村庄，它们孤零零的，周围只有几棵树。终于在地平线上出现了几棵杨树树梢（哈萨克语“科克切列克”，就是“绿色的杨树”的意思）。

到了！卡车在车臣人和哈萨克人的土坯房中间穿过，扬起满街尘土，招来一群怒气冲冲的狗。拖着小小的四轮车的温顺的小驴急忙闪到一旁。一家院子里的骆驼慢慢地回过头来，隔墙向我们投来轻蔑的一瞥。也有居民，但我们的眼睛只看到妇女，这些不寻常的、被遗忘的妇女。看，那个黝黑的女人站在门口手搭凉棚注视着我们的汽车；看，那里还有三个穿红花连衣裙的正朝这边走来。她们都不是俄罗斯人。“没关系，会找到未婚妻的！”——当过远洋轮船长的四十岁的维·伊·瓦西连科对着我的耳朵喊道。他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时就一直是很顺利的，他管理洗衣房。现在他得到了自由，更可以施展本领，寻找自己的轮船了。

汽车经过区百货商店、茶馆、诊疗所、邮局、区执委、木板墙围起来的区党委会的瓦房和区文化馆的草房，停在国家保安部和内务部州分局的大门前。我们满身是土，从车上跳下来，走进房前的小花园。大家也顾不得这是在中央大街上，就脱下上衣开始洗脸擦身子。

内务部州分局机关的对面有一所平房，很高，显得有些奇怪：四根多利斯式的圆柱庄严地支撑着房前的假柱廊，柱脚下还有两层光滑的石阶。但是，往房顶上一看——草屋顶却已经发黑了。禁不住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这是一所学校！十年制中学！但是，讨厌的心脏啊，你慢些跳吧，你先别出声：这学校与你没有关系！

一个卷发的、穿得干干净净的少女穿过中央大街朝那座令人

羡慕的学校大门走去。她的短上衣紧紧裹住纤细的腰身，看去象一只黄蜂。她的步态是那么轻盈，甚至令人怀疑她的脚是否踏着地面。她是教员！很年轻，不像是大学毕业的。也许，她是七年制中学毕业后又读了师专？我真羡慕她！她与我这个壮工之间的鸿沟有多么深啊！我和她属于不同的阶层，我永远也不敢去挽起她的胳臂走……

这时候已有人在替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办手续了。我们依次被叫进安静的办公室。是谁问话？当然是“教父”，是行动特派员！流放地也有行动特派员，他就是这里的首脑人物！

第一次见面非常重要：因为今后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捉迷藏不是玩一次，一个月，而是要**永久**玩下去的。现在，我跨过他的门坎，我们彼此仔细地审视着对方。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哈萨克人，他用寡言和表面上的礼貌把自己包住，我则用一副傻头傻脑的面孔把自己藏起来。我们双方都明白：我们之间将要进行的、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对话，诸如，“请你把这张表填一下”，“我该用什么笔写呢？”之类，实际上也就是一场决斗。这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表现出：我连这点小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我平常就是这样的，大大咧咧，没什么心眼儿。而你这个青铜怪物则应该记住：“对这个人不必特别监视，他会安分守己地过日子的，看来这些年的劳改营生活对他有所帮助。”

我应该填写什么？当然，是一张调查表，还有自传。新档案就要从这调查表开始建立，卷宗已经准备好，就放在桌上。今后关于我的告密信和官员们对我的鉴定、评语等将会源源不断补充到这个卷宗里来。等材料积累到大致够立一个新案时，便会从上级来一道命令：立即逮捕（这所房子后面就是监狱的土坯房），再给我判上十年刑。

我把最初的一张纸呈上去。行动特派员看了一遍，把它装进活页文件夹。

“对不起，您能不能告诉我区教育局在哪儿?”我突然像是心不在焉地、客气地问道。

他也很客气地告诉了我，并没有惊奇地扬起眉毛。由此，我得出结论：我可以去找工作，州的保安部门不会反对的。(自然，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囚犯，我不会傻到直接去问他：“我可以在教育系统找工作吗?”)

“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到那里去，不由人押送?”

他耸了耸肩膀：

“一般地说，今天，你们还得在这……最好不出这个大门。不过，要是为了工作问题，也可以去一趟。”

现在是我**自己走**在大街上了！是否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自己走**”这个伟大字眼呢？我**自己走**！我的身旁和身后都没有人端着冲锋枪了！我回头看看，确实没有！我高兴的话，可以靠右边的路走，顺着学校的院墙走，院墙内有一口肥猪正在用嘴拱地；高兴的话，也可以沿着左边的路走，那边区教育局的院墙外面正有几只鸡在寻找食物。

我走向区教育局。走过了大约二百米的路程。我那一直弯着的腰有点直起来了。走路的姿势也不那么拘谨了。通过这二百米，我从一个公民等级进入了上一个等级。

我穿着从前在前线穿的旧毛料制服上衣，下面是一条很旧的斜纹布裤子，脚上还是劳改营发的猪皮皮鞋，勉强把包脚布的两个角塞进去。我就这样走进了区教育局。

里面坐着两个胖子，哈萨克人，座位旁边摆着两个小牌，表明两人都是区教育局的视察员。

“我想在学校找个工作。”我对他们说，觉得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强，甚至感到很轻松，好像我是在问他们盛水的玻璃瓶放在哪里似的。

他们有些紧张。毕竟不是常有新教员到这草原上的土房里来

找工作的。虽然这科克切列克区的面积比整个比利时还大，但这里具有七年级文化水平的人却屈指可数，他们彼此全都认识。

“您是什么学校毕业？”他们用相当纯正的俄语问我。

“大学物理数学系。”

他们甚至吓了一跳。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接着便用急促的哈萨克语谈起来。

“那么……您是从哪儿来的？”

好像还不清楚，还必须我自己对他们解释似的。哪个傻瓜会跑到这种地方来找工作呢，何况现在是三月？

“我是一小时前被流放到这里的。”

两人立即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面孔，先后钻进局长办公室去。他们走了，我这时才发现旁边的打字员在注视着我。她是一位五十来岁的俄罗斯妇女。眼神一闪，像一个火花，我立即感到我们是同乡：她也是从古拉格群岛来的！哪儿的人？为什么？从哪一年起？这位娜杰日达·尼古拉耶夫娜·格列科娃出身于新切尔卡斯克的哥萨克家庭，一九三七年被捕，她这个普通打字员在内务部机关的各种手段的“帮助”下，不得不相信自己是某个臆想的恐怖组织的成员。于是，十年劳改。而后是再次判刑。然后是永久流放。

她不住地用眼睛瞟着局长办公室虚掩着的门，压低声音简短扼要地向我介绍了学校的情况：有两个十年制学校，还有几个七年制学校；区里非常缺数学教员，这里没有一个教员受过高等教育；至于物理教员，这里从来没有看见过。办公室的铃声。打字员虽然很胖，却霍地站起来，迅速向门口跑去——这也是她的职务呀！她很快转身回来，用“官腔”高声叫我进去。

正面桌上铺着红色台布。两个胖视察员舒适地坐在旁边的长沙发上，局长坐在斯大林画像下的大安乐椅上。局长是个哈萨克女人，小巧玲珑，挺讨人喜欢。她的举止和派头像是猫与蛇的结合。画像上的斯大林不怀善意地向我微笑着。

让我在门口坐下了，离得远远地，像个受审的人。我们开始了无聊而冗长的谈话。每次同我用俄语谈上一两句，他们自己就得用哈萨克语谈上十分钟，这时我只好傻瓜似地呆在一旁。他们详细询问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教过书，担心我已经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法忘掉了。接着便吞吞吐吐地说：现在没有空缺，区里各学校的数学和物理教员都满员，真遗憾，连半个教员的工资经费都不好筹措，而教育我们的青年一代可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工作，等等。最后，终于归到主题：问我是为什么坐牢的？我的具体罪状是什么？没有等我回答，那个猫蛇已经提前把眼睛眯缝起来，似乎我所犯罪行的血红闪光已经刺痛了她那党员的眼睛。我把目光从她的头上移向上面撒旦那张凶恶的脸，就是这个撒旦毁掉了我整个生活的。在他的像片前而我怎样谈我和他的关系呢？

我只好吓一吓这些教育家了。在这种情况下囚犯们是会用这一招儿的。我回答说：你们所问的问题属于国家机密，我无权在这里讲。我想知道的事很简单：这里要不要我这个教员？

他们又用哈萨克语长时间地讨论起来。谁有胆量把个国家罪犯雇到学校来？不过，他们找到了出路：他们叫我写份自传，填张表格，一式两份。这是早已习惯的！纸上什么都可以写。我不是一小时前才填过吗？我填了表格，又回到州保安机关的大院。

我怀着莫大的兴趣在大院里绕了一圈，看了看他们自己设立的监狱。我看到，他们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在围墙上挖了个小洞作为给犯人转递物品的“窗口”。其实，围墙很矮，完全可以从墙上把篮子送过来。可是，如果没有“送饭口”，还算什么国家保安部？我在院子里漫步，觉得这里呼吸起来比在那发了霉的区教育局反倒更轻松些。从区教育局的角度看来，保安部显得高深莫测，它能使教育视察员闻声丧胆。现在，我就在这里，这个部是我最亲爱的部呀。这里有三名警备司令部的官员（其中有两名校官），他们奉命公开监视我们。我们就是他们的谋生手段。这里没有什么

闷葫芦要猜，彼此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

几个警备司令部的官员倒还和气。他们允许我们夜间不睡在上锁的屋子里，可以睡在院里的干草上。

露宿！我们已经忘记这意味着什么了！……多少年来一直是上锁、一直是铁栅栏，看到的是四壁和顶棚。怎么能睡得着！我在院里，在监狱旁边的院里，沐浴着柔和的月光踱来踱去。已经卸下的马车、水井、饮牲口槽、一小垛干草、马棚顶下面的马影——这一切显得那么和平、古老，看不到一点保安部的残酷印记。刚到三月三日，可是入夜后却毫无凉意，几乎和白天一样，微风吹得人暖烘烘的。草原上的科克切列克村上空时而响彻叫驴的吼声，声音时起时伏，充满激情，它向母驴表明自己的爱和充沛的精力，大概母驴的叫声中也表达着同样的感情吧。我是不善于辨别声音的。听，这种低沉有力的声音是不是骆驼在叫？假如这时我能放声高呼，我也会对着月亮怒吼的：我要在这里呼吸！我要在这里活动！

我会通不过那几张表格的屏障？不可能！在这充满号角般叫声的夜晚，我感到自己高于那些胆小如鼠的官吏。我要去教书！要重新感到自己是人！要大踏步走进教室，以热情的目光环视孩子们的面孔！我的手指一伸向黑板上的图——全教室的人立即屏住呼吸、鸦雀无声！图上加了一条线，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全班学生如释重负地吁一口气。

我不能睡。我来回走，在月光下不停地走。驴子在歌唱，骆驼在歌唱。我的整个身体也在歌唱：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最后，我躺到敞棚下的干草上，和其他难友并排躺着。离我们两步远的牲口槽旁，几匹马站在那里整夜地嚼着干草。我感到，对于我们这半自由的第一个夜晚来说，普天下再也找不到比这嚼草声更亲切的声音了。

嚼吧，没有恶意的生物！嚼吧，驯良的马！吃草吧……

第二天便允许我们去租赁私人住房。我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找到一间鸡窝似的小屋：它只有一扇不太透光的窗户，很低，甚至在当中屋顶最高的地方我也不能完全直起腰来。虽然我在监狱里幻想流放时说过："我只需一间低矮的土房"，但连头也抬不起来还是未免不大愉快。不过，总算是间独立的屋子了。地是土地，把劳改营的棉衣铺在地上就成为我的"床铺"。这时，幸而有一位流放的工程师，鲍曼专科学校的教师亚历山大·克利缅季耶维奇·兹达纽克维奇帮了大忙，他借给我两只木箱，我把衣服铺在上面就可以睡得很舒服。我自己还没有煤油灯（什么也没有！每一件需要的东西都得自己买，仿佛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过，我并不因为没有灯而难过。这些年来，在牢房、禁闭室、工棚，一直都是在刺眼的公家的灯光下睡觉的，今天躺在黑暗中我倒感到十分安适。看，黑暗也能成为自由的一部分！我在黑暗和寂静中躺在两只木箱上，细细玩味着这黑暗中的宁静！（很可能会从广场上的扩音器中传来广播声音，但是科克切列克广场上的扩音器不知为什么已经三天不响了。）

我还能有什么更多的希望呢？……

但是，三月六日的早晨超出了我所渴求的一切愿望！我的女房东，从诺夫哥罗德被放逐来的恰多娃老大娘，跑过来小心翼翼地对我耳语道：

"你去听听广播！他们对我说了，可我真不敢重复。"

确实，广播又开始了。我向中央广场走去。广场上，在装着扩音喇叭的柱子周围，阴沉沉的天空下已经集聚了大约二百人，这对于科克切列克村来说已经是很多了。人群中有不少哈萨克人。许多老年人从秃头上脱下华丽的棕黄色小帽，拿在手里，样子都十分悲伤。年轻人们则冷淡得多。有两三个拖拉机手没有摘帽子。我当然也没摘帽子。我还没有听清楚广播员的声音（他的戏剧性表

演使他的声音显得特别伤心），但我已经有些明白了。

这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早在大学时代就祈求盼望的时刻！是古拉格群岛上全体囚犯（除正统派分子外）所祈求盼望的时刻！亚洲的独裁者死掉了！这个恶棍"蹬腿儿"了！啊！这时刻在我们那里，在特种劳改营，会发出什么样的公开欢呼啊！可是，现在站在我旁边的是中学女教员，俄罗斯族的女孩子，她们却在失声痛哭："我们往后可怎么活呀？……"她们失去了生身的慈父……我真想向整个广场，向她们大声喊叫："放心吧，你们会照样活下去！不会再枪毙你们的父亲了！不会再把你们的未婚夫抓去坐牢了！你们自己也不会再作为反革命家属被捕了！"

真想在这扩音器前面大声叫喊，跳一回野人的狂舞！但是，遗憾啊，历史长河的水流是缓慢的。因此，在我的脸上，在这张已经训练得能够应付一切场面的脸上，立即出现了一副谨慎的悲哀表情。目前还需要暂时装假。还应该像从前一样装成一个竭尽愚忠的百姓。

不管怎样，这总算以最好的方式庆祝了我这流放生活的开始！

刚刚过去十天，共同执政的"七诸侯"* 在明争暗斗、互相戒备中就完全撤消了国家安全部！这么看来，我原先的怀疑是正确的喽：国家安全部是否能**永久**呢？[①]

那么，这个世界上除了不公正、不平等和奴役之外，究竟还有什么能是永久的呢？……

---

* 十七世纪初，俄国沙皇瓦西里被推翻后，1610—1612年间曾由七个人共同执政，这里是指斯大林逝世后实行集体领导的苏共中央七名主要领导人。——译者注

① 不错，半年之后，为了代替国家安全部，又还给我们一个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仍旧是原班人马。

第　六　章

流刑犯的幸福生活

1. 自行车钉子〔螺丝〕*	半公斤
2. 皮鞋	5（双）
3. 送风器	2（个）
4. 波利［玻璃］杯	10（个）
5. 木欠〔铅〕笔盒	1（个）
6. 地球义〔仪〕	1（个）
7. 火柴	50包
8. 扁福〔蝙蝠〕牌油灯	2个〔盏〕
9. 牙高〔膏〕	8（筒）
10. 甜饼干	34公斤
11. 伏特加酒	156瓶（每瓶半公升）

这是一张艾达拉村百货商店全部商品的盘存单，是为了对商

* 方括号内的字是译者加的，原文故意用了错别字以示商业人员的文化水平。——译者注

品进行重新定价编制的。科克切列克区消费合作社的商品检查员和商品计价员开列了这张清单，而我现在正摇计算器计算商品的价格：有的商品要降价百分之七点五，有的要降百分之一点五。价格既然已经如此大幅度降低了，学生用的木铅笔盒和地球仪就可望在新学年开始之前卖出去，大螺丝也一定能在自行车上找到各自的位置。只是滞销的大批甜饼干（大概还是战前生产的）最后很可能不得不列入"呆滞品"一类。至于伏特加酒，就是再涨点价也会在"五一"之前卖光的。

四月一日，按斯大林的步调，照例要宣布商品减价，使劳动人民受益数百万卢布（全部受益额都已事先算出并公布了）。但这对我却成了一个打击。

我来到流放地已经一个月，在劳改营实行"经济核算制"时期当铸造工挣到的一点工资全吃光了。（获得自由之后还要靠在劳改营挣的钱维持生活！）我不断到区教育局去询问：什么时候录用我？但是那个蛇局长不接见我，两个胖视察员和我说话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拖到月底，他们终于把州教育局的批示拿给我看：科克切列克区各学校数学教员编制已满，无法安排工作。

在这期间我写了一个剧本（关于一九四五年的反间谍机关）。如今早晚没有人搜身，没有必要像从前那样经常要把写下的东西销毁了。我除了写作外没有任何事作。经过长时期劳改营生活之后，我倒宁愿这样。一天，我到"饭馆"去花两个卢布喝了一碗热汤。这也就是给当地监狱囚犯吃的稀汤，我看到同时把这汤舀到桶里送到监狱去。黑面包可以在商店随便买。土豆我已经买下一些，甚至还买到一点猪油。我自己借了一匹小驴从小树丛里驮回些干盐木*枝，可以升起一个炉灶了。我的幸福生活可以说十分圆满。我想：不雇佣我也不要紧，眼下只要过得去，就先写剧本；

---

* 中亚沙漠地带的一种无叶植物，可当柴烧。——译者注

哪里去找这么自由自在的生活！

一天，我走在街上。突然，一个警备司令部的军官用一个手指头示意我走过去。他把我一直带到区消费合作社，径直走进主任办公室，对一位胖得像水桶似的哈萨克族主任认真地说：

“他是学数学的。”

多么奇怪！谁也没有问我为什么坐牢，没有叫我填写什么自传和表格！主任的秘书（这位被流放的希腊族姑娘长得像电影明星一般漂亮）立即用一个手指头在打字机上敲出一纸委任状：委任我为经济计划工作人员，月薪四百五十卢布。当天，也同样轻而易举地，没有研究什么表格，区消费合作社又安排了两名尚未找到职业的流放者；曾任远航货轮船长的瓦西连科和另一个我还不了解的人（他叫格里戈里·萨莫伊洛维奇·姆-泽，性格很内向，从不多说话）。这些日子瓦西连科正醉心于他的“加深楚河河道，使汽艇通航”的计划（楚河每到夏天水很浅，牛也能走过去），他正请求警备司令部批准去勘察过河道。他在海运学校时的同学、共同驾驶过“同志号”机帆船的曼恩现在已当了船长，这时正忙于装备“鄂毕号”探险船去南极洲。而瓦西连科现在却被强行雇佣去当区消费合作社的仓库管理员了。

其实，并不是雇我们去当经济计划人员、仓库管理员或什么会计人员的。我们三人都被调去突击一项紧急工作：对商品重新定价。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夜间到四月一日早晨区消费合作社从来都忙得不可开交，从来都缺少人手。人手怎么可能够用呢？在这一夜之间，既要盘存商品，又要发现偷盗商品的售货员（虽然并不是为了把他们送交法院），还要给所有商品重新定价，因为第二天早晨就应该按照对劳动人民十分有利的新价格售货了。不过，这个区的广大沙漠地带连一公里铁路和公路都没有，所以这些对劳动人民十分有利的价钱在五月一日之前是无论如何也兑现不了的：整整一个月各村的商店都不营业，要一直等到区消费社把所

有货物清单计算好、批下价格，并且把它用骆驼送到各村为止。但是区中心的商店总不能在五一节前一直不营业呀！

我们三人来到时，区消费合作社已经有十五个人在做这项工作。有编制内的人，也有临时找来的。各办公桌上堆满了劣等纸张开列的长长的货单，屋里只听见老会计人员熟练的打算盘声，时而听到一两句骂人话。我们立即被安置在这里工作。我很快就不耐烦在纸上笔算了，我请求给我一台计算器。可是，区消费社没有计算器，也没有人会用它。但是，有个人想起在区统计局的柜子里有一架带数字的小机器，那里也没人会用它。经过电话联系，去人把它取来了。我噼噼啪啪地工作起来，迅速地在表格里填满数字。主要会计人员们不住地斜眼看我，心想：这个家伙会不会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

我这里一边摇着计算器，一边想：囚犯可真容易得意忘形，或者，要用文学语言表达的话，人的欲望增长得多么迅速啊！现在，我已经开始对许多事不满意了：我在自己的小屋里好好地写剧本，被他们打断了，我不满意；学校里没有录用我，我不满意；把我硬拖到这里来叫我（……干什么？挖掘冰冻的土地吗？光着脚在冰冷的水里和泥做土坯吗？不，不，是叫我）坐在干干净净的办公桌旁摇计算机的手柄并把数字填进表格，我也不满意。是啊，假如开始服刑时就叫我作这项舒服的工作，而且要整个服刑期间每天无偿地工作十二小时，那我也会千恩万谢、为它欢呼的！现在人们为此每月付给我四百五十卢布，我甚至可以每天买一磅牛乳了，可我却轻蔑地把脸一扭，心想：工资是不是太少点？

区消费社的重新定价工作整忙了一星期（首先需要精细地确定每种商品应属于哪一类降价商品，然后再确定对该商品应该适用销往边远农村的商品相应提价的哪一项规定提价）。这项工作不结束，所有商店全不能营业。因此，那位终日无所事事的、胖得像水桶似的主任便把我们大家召集到他那庄严而豪华的办公室里

宣布说：

“这么办吧。我们知道，医学界得出的最新结论是：人根本不需要睡眠八小时，四小时就足够了！所以，我现在命令你们：都要早晨七点开始工作，夜里两点结束。午饭和晚饭时间可以各休息一小时。”

听到他的这段训词，我们中间似乎没有一个人觉得可笑，只是觉得可怕。大家都蜷缩着沉默不语，最后也只能鼓起勇气来讨论一下……晚饭的一小时鼓在什么时间最合适。

是的，流放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人们早就告诉过我，流放者的命运就是由这一类的命令决定的。在座的都是流放者，都担心自己失掉工作；一旦被解雇，在科克切列克将长期找不到工作。况且，归根结底，这又不是替主任个人干，而是替国家干嘛，工作需要嘛！这样，在他们看来那医学界的最新结论也就完全可以忍受了。

啊，真想站起来嘲笑这个自鸣得意的野猪一番！哪怕只是痛快一时也好！但是，那就会被说成十足的“反苏维埃煽动”，说你是在号召破坏一项极重要的工作！要知道，你一生中已多次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中学生、大学生、公民、士兵、囚犯、流放者，——不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总是在领导掌握之中的，你总是必须鞠躬、沉默。

假如他说的是工作到晚上十点，我也许就老老实实坐到十点了。可是他的命令却等于宣布精神死刑：他等于叫我在自由的流放地停止写作！不，见你的鬼去吧！连同你那商品减价一起见鬼去！劳改营的经验给我暗示了出路：口头不必说反对，只须默默不执行。我同大家一起温顺地倾听了主任的命令。可是，一到下午五点，我便离开办公桌回家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才又来到办公室。别的同事这时早已在那里计算，至少是装出一种在计算的姿势。他们像看野人似的看了看我。姆-泽虽然心里赞同我的作法，但他自己却不敢，他偷偷告诉我：昨晚主任在我的空办公

桌前面大发雷霆，说一定要把我再赶到一百公里外的沙漠去。

说老实话，我确实有些害怕：当然，内务部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说不定真会赶走。那时你就别想再看到这区中心市镇了！但是，我很幸运：我登上古拉格群岛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即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如今来到流放地，又碰上斯大林之死。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某种新鲜气息已经慢慢飘到我们这个边远地区，飘进了区警备司令部。

一个新时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这就是群岛历史上最宽大的三年时期。

主任没有把我叫去，他自己也没有来找我。这一天，我在那些不断打瞌睡、不断计算错误的同事中间以清晰的头脑进行工作，并且决定今天仍旧干到下午五点，准时离开办公室。反正会有个什么结果的，不管是什么，就让它快来吧。

在我的一生中，我已多次认识到：人可以牺牲许多东西，但不应牺牲核心的东西。我决定不牺牲早在特种劳改营的行列中就已开始构思的剧本。我胜利了。整整一个星期，晚上大家都在工作，只有我的办公桌空着。大家也习以为常了。主任在走廊遇到我时把脸扭过去。

但是，命运注定我无须整顿“哈泽克斯坦”的农村合作社工作了。有一天，一个哈萨克人（中学教务主任）忽然来到区消费合作社。此人在我来之前是科克切列克唯一的大学毕业生，而且以此自豪。但是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他的嫉妒。他到底是想在第一届学生毕业之前充实教学力量，还是有意要往区教育局那位蛇局长的汤里撒点胡椒粉，我不得而知，反正，他跑来对我说：“快去把你的毕业证书拿来！”我像孩子一般急忙跑回去取来了。他装进衣袋，立即驱车去江布尔市参加职工代表大会。三天之后，他又来找我，把州教育局的一份委令的抄件放在我面前。这文件是由同一个无耻之徒签署的，一个月前他曾确认科克切列克区“各

学校数学教员编制已满"，现在，四月，他委任我为数学教员兼物理教员，而且把我派到三周后即将进行结业考试的两个毕业班去！(教务主任是冒着危险的。倒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在政治上冒着危险，而是他担心这些年的劳改营生活会不会使我把数学忘掉。考试几何和三角那天，他没有叫我当着学生的面打开试卷，而是把我领到校长办公室，把几个数学教员都请来，叫我当场解答试题，他站在我的身后。我的答卷与标准答卷的答案完全一致，这使他和所有教员高兴得像过节一样。要在这里成为笛卡尔是多么容易啊！后来我才知道，每年七年级数学统考时，区里常常接到各村教员打来的电话：题出得不对吧？得出的答案不一样呀？……因为那些教员自己也只是七年制毕业嘛……)

我可以走进教室，拿起粉笔了。内心的幸福不可名状。这一天我才获得真正的释放，获得真正的公民权！至于流放地的其它条件，现在对我都无所谓了。

在埃克巴斯图兹的时候，囚犯的队伍时常从那里的中学旁边走过。我当时望着活跃在校园里的孩子们，望着女教师朴素大方的服装，把那里看作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叮叮的铃声震得我心痛。那些年的暗无天日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实在把我折磨苦了。当时我觉得，哪怕在这贫瘠不毛的埃克巴斯图兹当一名流放者，能够按照这铃声拿着教室日志走进教室，像要揭示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似地以神秘的面孔开始讲课，那就会是使我心醉的最大幸福了。(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向往，一方面，当然，是由于我当教师的天赋，但大概也有另外的原因，即未得到满足的自我评价和长年无人需要的才干与奴隶般的低下地位之间的鲜明对比。)

但是，由于这些年来我只顾注视古拉格群岛和国家的生活，却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在战争年代和战后这些年，我们的学校已经死亡了，它早已不复存在，剩下来的只有膨胀起来的校舍和空荡荡的铃声。首都的学校，偏僻山村的学校全已经死亡。当

精神死亡像毒气一样蔓延全国的时候，首先受害窒息的，除了孩子们、除了学校之外，还能是谁呢？

不过，我也只是在几年之后，当我从流放的国度回到俄罗斯这个宗主国本土时，才认识到这一事实。在科克切列克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当时黑暗势力的整个发展趋势尽管是在走向死亡，但流放者的孩子们还活着，还没有窒息！

这是些特殊的孩子。他们是在整个成长时期始终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地位的。学校的教务会议和其他夸夸其谈的会议上，一提及这些孩子，总是说（对孩子们本人也同样说）：他们是在苏维埃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而生活的，他们在行动上受到的某些限制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同别的孩子没有其他差别……但是，每个孩子自己却亲身体验到他们身上套着枷锁，他们从刚刚记事的幼年起就感受到它了。整个丰富多采的、充满生活乐趣的（像画报上和电影里所反映的那种）生活世界完全没有他们的份儿，甚至参军也很少有他们的份儿。得到警备司令部的批准后到城市去参加考试，被学校录取，顺利地读完大学——这一切都十分渺茫，希望很小。所以，这些孩子关于这个无所不包的广大世界所能了解的一切，只限于在这中学里取得的知识。许多年来这所学校就是流放者家庭的孩子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受教育场所。另外，沙漠地带的人生活贫苦，但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这倒可以避免把精力分散在各种娱乐上，这些娱乐对于二十世纪的、从伦敦直到阿拉木图的青年起着多大的腐蚀作用啊！宗主国本土上的孩子们已经不习惯学习了，他们失去了学习兴趣，把学习看作一种不得不尽的义务，因为在成年之前总要找个地方呆着。但是，这些流放者的孩子则不然。如果好好教育他们，他们是把学习看成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的，学习对他们就是一切。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好像这样才可以使他们脱离二等公民的地位，同那些一等公民的孩子们平起平坐。他们的自尊心只有在认真学习

中才能得到满足。

(不，不只是学习。还有学校里一些凭选举担当的职务和青年团的职务。还有从十六岁以后可以参加的普选。这些可怜的孩子渴望着平等，哪怕是平等的假象也好！不少孩子以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感到自豪，认真地在小组会上作政治时事讲话。有一个年轻的日耳曼族姑娘，维克托丽娅·努斯，她考进了两年制的师范专科学校。我勉励她说：不必以自己的流放者家庭出身为耻辱，应该以它为骄傲。可是完全出乎意外，她像看一个疯人似地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急于参加共青团，那就强拉他们进去：上面已经同意你入团了，可你却不入，为什么？科克切列克有几个日耳曼族小姑娘是秘密教派的信徒，她们就是被迫加入共青团的，不加入的话，她们全家会被赶到更远的沙漠里去。啊，你们这些诱惑青年的人！真该给你们脖子上挂个大磨盘，把你们沉到河里……)

我这里讲的全是科克切列克中学"俄罗斯人班"的情况。(其实，这些班几乎全不是纯粹的俄罗斯人班，而是日耳曼人、希腊人、朝鲜人、少数库尔德人和车臣人、本世纪初期迁移到这里的乌克兰人的后裔，哈萨克人"负责干部"的子女等占多数，这些"负责干部"的家庭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俄语。)哈萨克人一般居民的孩子则组成"哈萨克人班"，这些班的学生十分腼腆怯生，大部分(没有被官气沾染坏的家庭的)孩子都很直爽、诚恳、有传统的善恶观念。他们在没有被妄自尊大的虚伪教育损害之前大多如此。这些班里是用哈萨克语讲课，但那种授课几乎等于无知的扩大再生产，因为第一代教员就是勉勉强强拿到毕业证书的，而这些一知半解的人却又摆出一副大学问家的面孔到处去误人子弟。一些哈萨克女孩子们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也能混到一个"及格"团从中学和师范学校毕业。因此，当这些处于原始愚昧状态的孩子们接触到真正的教学时，他们的全部身心便会被吸引住，他

们不仅认真地听，专注地看，而且嘴里也在不住地重复着老师讲的话。

面对孩子们这种学习热情，我在科克切列克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而且在这三年中（很可能以后还有许多年）我只为此一点就感到很幸福。分给我的课时不够用来改正过去教学中的错误和弥补漏教的课程，于是我就给学生规定课外补习时间，组织学习小组，带领他们实习，组织天文学观测……学生们极热情地参加这些活动，比看电影还积极。我还担任班主任工作，而且给我的班全是哈萨克学生，这个班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的一切喜悦都局限于教室的四壁之内和上下课的铃声之间。在教员休息室、校长办公室和区教育局，则到处使人感到那种全国普遍的通常的沉闷。对我来说，还要加上流放地位所造成的特殊的难堪。我来之前，教员中间就有日耳曼人和受到"行政流放"的人。这些人都受歧视。人们一有机会就提醒我们：允许我们进入教师行列是当局的莫大恩惠；搞得不好，随时可能失去这种宽大待遇。流放来的教员最怕（当然，别的教员也处于依附地位，也怕）给区首长的孩子们判的分数不高而得罪领导。他们还怕全班的平均分数不高而惹恼校长。所以大家都抬高分数，这就更促进了整个哈萨克斯坦的无知的扩大再生产。此外，流放者教员（和哈萨克人单身教员）还要"纳贡"和"捐款"：每月要从他们工资中扣除二十五卢布，谁也不知道作什么用。校长（别尔杰诺夫）可能突然宣布他的小女儿过生日，那么每个教员就得各出五十卢布送礼；此外，校长或区教育局长时而会把这位或那位教员请到办公室去，提出要向他"借"三五百卢布。（不过，这倒是本地区的风俗，或曰"制度的共同特点"。学生们在毕业晚会前也要每人交出一只羊或半只羊，这样就保证能拿到毕业证书，完全文盲也无妨。毕业晚会照例变成本地区党的积极分子们狂饮作乐的酒宴。）另外，区一级的领导人都是某地函授学校的学员，他

们的所有考卷全要由学校的教员们负责代答。(考卷是按老爷派头通过教导主任交下来的，因此，奴隶教员们连拜见自己为之代答的函授生的“殊荣”都得不到。)

我对这一切全采取僵硬的不妥协态度。这是因为我立即看出自己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不知道是由于这种态度，还是因为时代正在变得不那么严峻，或是这两者一起帮助了我，总之，我没有把脖子伸进这个枷锁去。只有分数判得公平，学生们才会努力学习，所以我判学生考卷时从不考虑谁爸爸是区委书记。我也不“纳贡”，不“借”给领导钱（区教育局的蛇局长就无耻地向我“张过嘴”！）。每年五月，贫穷的国家便要用公债形式搜刮掉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这已经够受了。(劳改犯人被剥夺了购买公债的权利。现在我自由了，流放确实把购买公债的权利还给了我。)不过，我的“原则性”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旁边有一位生物和化学教员格奥尔吉·斯捷潘诺维奇·米特罗维奇。他是塞尔维亚人，在科雷马坐过十年牢，现在年纪大了，有病。他是一直坚持为科克切列克地区的公正而斗争的。他被区地政局解雇后到中学来当教员，因而又把这斗争带进了学校。在科克切列克，无法无天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种现象由于无知、野蛮人的自作聪明和各种宗族和裙带关系而变得更加复杂。这里的不法行为互相牵连着，不为局外人所知，也无法插手进去。但是，米特罗维奇却同它进行忘我的、奋不顾身的斗争（当然，他是经常引用列宁的话作为根据的）。他在教务会议上揭露，在全区教员大会上揭露，他给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僚子弟、校外考生判不及格，不让某些学生凭着“赠送的羊”拿到毕业证书。他不止一次地向州领导控诉，往阿拉木图寄信，给赫鲁晓夫本人打电报（他竟征集到七十名家长签名作为自己的后盾，到别的区去发电报。因为在本区内这种电报当然是发不出去的。）他要求上面派人来，派视察员来检查。视察员来了，可是也一起反对他。于是他又写信上

告。学校召开特别教务会议“整”他，指责他对孩子们进行“反苏宣传”（这离逮捕法办只有一发之隔了！），而且严肃地指责他“过于粗暴地对待了”几只吃掉少先队员们种的菜的羊。开除过他几次，又几次给他恢复了工作。他又要求补偿他被迫没有工作期间的工资。把他调往其它学校，他不去，又开除他……他战斗得很带劲！如果再有我同他在一起，那我们便能好好折腾他们一阵子！

但是，我一点也没有帮他的忙。我保持沉默。我设法避开关键性的表决（总不能投票反对他吧），我去参加学生的小组活动或去辅导。对那些党员校外考生，我也不妨碍他们取得及格分数，我想：你们自己属于掌权阶层，去欺骗你们自己的政权吧！我以这种态度掩护自己的任务：我在写作，不停地写作。我保重自己，为的是进行另一场战斗，将来的战斗。而且，这个问题也还可以提得更广泛些：米特罗维奇的斗争是正确的吗？需要吗？

他的全部战斗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他无法把这一团又粘又乱的东西理好。何况，即使他完全胜利了，那也不可能使整个制度、整个体系有所改变。最多只是在一小块有限的土地上闪现出一个洗净了的洁净的斑点，而它很快又会被大片灰黑色盖住。他可能取得的全部胜利补偿不了他可能遭到的报复——第二次被捕。（只是由于赫鲁晓夫时代的到来才使米特罗维奇免于再次被捕。）他的战斗是没有希望的，但他那拼出一死也要反对人间不平的精神却很富于人性。可以说他的斗争是注定失败的，但却不能说这斗争是无益的。假如我们不都那么“聪明”，假如我们大家不是无休止地诉说：“没有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的国家也许会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尽管米特罗维奇不是普通公民，而是个流放者，但他那双眼睛的闪光却也使得区政权当局望而生畏。

虽然他使人们惧怕，但是到了那个光辉的“节日”，到了选举亲爱的人民政权机关的日子，我们三个人——不屈不挠的公正战

上米特罗维奇，我，还有另一个不露声色的、平时最谦让、最妥协的格里戈里·萨莫伊洛维奇·姆-泽——就全都一样了。我们三人同样强忍着厌恶的痛苦心情同别人一起走去参加那嘲弄人的选举。（既然如此，他的斗争还有什么价值呢?）差不多全体流放者都能获准去参加选举，这种选举是那么不值钱，甚至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也会突然在选民名单上发现自己的名字。人们会催促他们，赶他们尽快去投票。我们科克切列克从来没有固定的投票处，投票箱设在距中心区很远的一个挂上帷幕的棚子里，路也没有，很不好走。所谓选举，就是要尽快地把选票拿到投票箱处，把它投进去。如果谁在中途放慢了脚步，想仔细看看候选人的名字，这就会显得奇怪了：难道党组织还不知道应该选谁？名单有什么可看的?！投票之后，大家都有合法的权利去喝上一杯（选举之前照例要提前发工资或者预支部分工资），人们穿上最好的衣服，所有的人（包括流放者）在街上相遇时都郑重地互相行礼，互相祝贺一个什么“节日”……

啊！我又一次感到还是劳改营好，那里就没有这类选举！

有一次，科克切列克选举了一位“人民法官”，哈萨克人，自然是“全体一致选出”的。大家照例祝贺了选举日。过了几个月，另一个区转来了该法官犯下的刑事案件的材料：他原先是那个区“一致选出”的法官。他在那个区犯了案，这才查明他在我们区的短短几个月中也已经接受了许多贿赂。虽然遗憾，也只好撤掉他，再指定科克切列克进行部分选举。候选人又是一个外区来的哈萨克人，谁也不认识。于是，星期天大家又穿上最好的衣服，从大清早就开始投票。全体一致！又摆出幸福的面孔在街上互致节日祝贺，眼神里看不到一丝幽默……真是在祝贺节日！

在苦役营里，我们总还敢于公开嘲笑这一切拙劣的表演，可是在流放地却不敢向谁透露这种感情。现在是作为自由人生活，而人们从这“自由”中得到的第一件最坏的东西就是：不敢暴露思

想。我只同姆-泽等极少数人谈论过这一类话题。

姆-泽是从杰兹卡兹甘押送来的。来时他一文不名——他的钱在路上全被扣留了。但警备司令部根本不管这些，还是取消了他在监狱时得到的伙食供应，把他赶到科克切列克街头了事：要偷就去偷，要饿死就饿死吧！那些日子我曾借给他十几个卢布，为此他对我始终感激不尽，总提起这件事，说我救了他。这也是他性格上的一个特点：总记住人们的恩惠。但他也记仇。（例如，他就记胡达耶夫的仇。胡达耶夫曾恶毒地、完全无理地残酷殴打过姆-泽的儿子。这个胡达耶夫原来就是险些成为血腥复仇牺牲品的那个车臣青年。看，人世的生活有多么错综复杂！）

姆-泽一无专长，又是流放者，不可能在科克切列克找到较好的工作。他能找到的最好工作是在中学当一名实验员。他很珍惜这份差事。工作本身要求他为大家服务，满足大家的要求，对谁都要和和气气，无须表示自己的意见。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不暴露自己，用殷勤客气的外衣把自己包住，使人无法看透他。甚至有些最简单的事实，例如，他为什么到了五十岁还没有专长，谁也不知道。我不知不觉地同他接近起来。我们从没有闹过意见，常常互相帮助，而且对许多事都有同样的、劳改营里养成的自然反映和表达方法。这样，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我终于了解到他隐藏已久的经历和内心变化。这些都是很值得借鉴的。

战争开始前，姆-泽是某地区的党区委书记。战争期间他被任命为某师团的译电处处长。他一直担任高级职务，是个“重要人物”，没有尝过什么人间疾苦。但是，一九四二年发生了一件事：由于译电处的某种过错，使得该师的某团未能及时收到后撤命令。这个错误必须立即改正。可是又发现姆-泽手下的人全都不知哪里去了，也许就是全牺牲了。于是将军便命令姆-泽亲自到前线的那个团去传达撤退命令，拯救他们。这时该团已处于敌人不断紧缩的包围圈中。姆-泽立即骑马出发了。他十分悲观，担心性命难保。

一路上越走越危险，他决定不再前进。在原地还不知能否活下来呢！他是自觉地停下来的，也就是说，他抛弃了那个团，出卖了它。他从马上跳下来，抱住一棵大树（或许是藏到树后躲避炮弹），这时，他……向耶和华发誓：只要他能保住性命，他将作一个虔诚的信徒，将完全遵守宗教教规。结果他平安无事。那个团被歼灭或者是被俘了。姆-泽活了下来，按照第五十八条，他被判十年劳改，刑满之后他又流放到科克切列克。他确实在十分虔诚地还愿！他的内心和头脑里一点点党员的影子都没有了。妻子只有用欺骗的办法才能使他吃一点禁食的无鳞鱼。每到星期六他虽然不敢不去上班，但在班上则尽量什么也不作，回家后则严守一切教规并作祈祷，当然，在苏维埃政权下不可避免地是秘密地作的。

当然，这段经历他几乎未对任何别人说过。

在我看来，这段经历很不简单。简单的只有一点，也是我们这里最不能同意的一点，即：我们的生活的最坚强、最根深蒂固的支柱是宗教意识，而不是党的意识形态。

应该怎么评判他呢？按照一切法规——刑法、军法、人格的规范、爱国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规范来看，此人都死有余辜，应该受到蔑视；姑且不说他当时对于自古以来他们犹太民族最凶恶的敌人缺乏应有的仇恨吧，他至少是为了自己活命而葬送了整个一团人呀！

可是，姆-泽还是能够根据某种更高的法则高声为自己辩护说：你们进行的这一切战争难道不都是因为最高政治家们的愚蠢才发生的吗?！难道希特勒之所以会侵入俄国不是由于愚蠢，不是由于他本人的愚蠢，由于斯大林和张伯伦的愚蠢而造成的吗?！可是现在你们却要派我去死?！难道是你们使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吗？

人们（甚至就是那个团里的人！）会反驳我：如果他这样看，

那就该早在兵役局给他穿上漂亮军服的时候声明这一点，而不该到了抱住大树的时候才说！是的，从逻辑上我并不想替他辩护，从逻辑上我也应该蔑视他，恨他，应该在同他握手之后感到厌恶才对。

但是，我却一点也没有这类感觉！这是否因为我不是那个团的人，没有体验到当时的境况？还是因为我想到了那个团的命运实际上还取决于其他上百种因素呢？或者因为我从未看到姆-泽趾高气扬的样子，只看到了他陷于绝境的样子呢？我们每天见面都诚挚地热烈地握手，我一次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体面的。

一个人在一生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形！他可能变成对自己和对别人来说都是完全另外一个人！而我们却往往根据命令，根据法律，根据一时心血来潮，或者由于自己的盲目，而心甘情愿地、高兴地拿起石头朝着那个完全不同的人的其中一个打去。

但是，假如你手中的石头掉下来呢？……假如你自己陷入深重的灾难中呢？那时，你就会产生某种新的观点了——对罪行，对罪人，对他人和对自己，都会产生某种新的观点。

在这本厚厚的书里我讲了许多宽恕的话。人们以惊奇而愤怒的口吻反驳我：还有个界限没有？总不能对什么人都宽恕吧！

我回答说：并不是什么人都宽恕。我只宽恕倒下的人。只要那个偶像还高踞在统治者台上，额上显出一道无上威严的皱纹，还在冷酷无情地、随心所欲地糟踏我们的生活，那你就给我挑选更重些的石头吧，不，让我们十个人一起抬起一根大原木来朝他撞去！

但是，当这个偶像一旦滚落下来，一旦倒在地上，当这大地的撞击能使悔悟的犁耙在他脸上耕出第一道犁沟时，那就放下你举起的石头吧！

因为他自己正在回到人类中来。

不该剥夺神指给他的这条道路！

*　　　　*　　　　*

除了上述种种之外，总的说来，我们科克切列克作为一个流放地，也同整个南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地区一样，还算是比较优越的。这是流放到有人居住的村庄，这里有水，土地也不是最坏的（如果是楚河流域，库尔代地区，土地还很肥沃呢）。许多人能够被分配到城市里（留在江布尔、奇姆肯特、塔拉斯，甚至留在阿拉木图和伏龙芝），而且这些人的无权地位同其他公民比较起来并不很突出。这些城市的物价便宜，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尤其在那些工业市镇。因为当地居民对工业、手工业和脑力劳动向来不感兴趣。即使那些落到农村的人，也不全被无情地赶进集体农庄。科克切列克村共有四千人口，大部分是流放者，但只有哈萨克人参加集体农庄劳动，其他人大都在农业机械站或别的什么地方找到个职位，工资虽说不高，但都可以分到四分之一公顷水浇菜地，可以养牛羊，喂猪。有一批西部乌克兰人是经过五年劳改营之后作为行政流放被送到这里的，他们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们给当地的建筑公司做土坯，劳动相当艰苦。但他们认为，尽管这个地区气候干旱，土地是粘土，浇水不足庄稼会枯死，但这里没有集体农庄，生活比在可爱的乌克兰沃土上的集体农庄里要好过得多。因此，当他们接到释放命令时，竟一致决定永远留在这里。

科克切列克的行动人员很懒惰，这可以说是哈萨克人的普遍懒惰性格中唯一对我们有利的一点。我们中间也有告密者，但我们却感觉不到这些人的明显威胁。

行动人员和告密者的无所作为，制度变得温和起来，这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时代的到来。时代的这种力量，经过多级传动装置的撞击和摇晃之后虽然大大减弱了，但毕竟还是传到了科克切列克。

起初，是用“伏罗希洛夫大赦”进行欺骗。（虽然大赦是由共

同执政的“七诸侯”发布的；但在古拉格群岛上我们把它称为“伏罗希洛夫大赦”。)虽然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就曾戏弄过政治犯，但那次教训不够深刻，早已被人遗忘了。流放地也同劳改营里一样经常开着“小道消息”之花。现在又有人在暗地传说要大赦了。盲目信仰的力量是惊人的！就拿H·H·格列科娃来说吧。她经过十五年的折磨，两次被判刑，可她这时竟在她小土坯房的墙上挂起了一张伏罗希洛夫的照片，而且相信它会带来奇迹。说来也怪，奇迹果然发生了！政府就是以伏罗希洛夫的名义和签字*又嘲弄了我们一次。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的确，在一个为悲痛所震惊的国家里，为悲痛所震惊的统治者们**为什么恰恰必须在一九五三年三月把罪犯们释放出来呢？这件事表面上不可能作出合理解释。难道只因为感觉到日子不好过了吗？安葬斯大林之后，他们就开始收买人心了。提出的理由是：“由于我国已经根除了犯罪现象”！(既然如此，监狱里关的是些什么人？那岂不无人可赦了?!）但是，他们照旧站在斯大林的水平上，仍然奴隶般地沿着同一条思路思考，所以他们只对流氓和土匪实行大赦，对第五十八条犯人的赦免则只限于“五年刑期以下的人，包括五年刑期的在内”。不了解情况的人会根据正派国家的作风推断，会认为规定“五年刑期以下”就会使四分之三的政治犯回家了。实际上，我们的难友中被判这种“幼儿园刑期”的人最多不过百分之一二。(可是这样却放出了大批小偷，使他们像蝗虫一般扑向老百姓。只是许久之后民警机关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那些大赦出狱的土匪重新抓回来。)

我们科克切列克对大赦的反映也很有趣。这里恰好有一些人

---

* 大赦令由最高苏维埃颁布，当时克·叶·伏罗希洛夫是最高苏维埃主席。——译者注

** 指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给苏联全国和领导层造成的震动。——译者注

是已经服满五年“幼儿园刑期”的，但满刑后没有释放，而是未经法院判决就强行流放到这里来了。他们中间有乌克兰人，也有诺夫哥罗德人，大都是孤独的妇女和老人，他们最老实，也最不幸。他们听到大赦的消息很兴奋，以为终于可以回家乡去了。但是，两个月后却接到一纸冷冰冰的解释：这批人的（补充的、未经法院判决的）流放不是为期五年，而是永久性的，所有流放之前的原五年刑期已不起作用，这些人不在大赦之例……有一位叫东尼娅·卡扎丘克的妇女，她本来是个自由人。她从乌克兰到这里来看望被流放的丈夫时，当局为了“整齐划一”起见把她也填写成了流放移民。听到大赦消息后她向警备司令部提出了请求。但人们“合理地”驳回了：你从未被判过五年刑，和你丈夫不一样，你的流放没有期限，所以大赦不涉及你。

这样的话，什么德拉古、梭伦、查士丁尼连同他们的法典*就都得统统见鬼去了！……

这样，谁也没有从大赦中得到什么。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特别是贝利亚完蛋之后，真正的缓和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来到了我们这流放的国度。判五年刑期的人被释放回家。流放者的子女可以到附近的大学去上学了。在工作单位无人再指着鼻子说“你是流刑犯！”。一切都有所缓和。有的流放者甚至得到了职务上的升迁。

警备司令部里有些办公桌空了出来。“这位警备部军官哪去了？”“他吗？他不在这里工作了。”警备司令部的编制在压缩，人员大大减少！态度比从前和气了。神圣的汇报制度如今也不那么神圣了。“今天上午没来按时汇报？行啊，下次再说吧！”忽而给

---

* 古希腊的德拉古法典制定于公元前621年，以极端严酷著称，梭伦于公元前594年任雅典执政官后改订了它，制定了新法律。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于公元527年即位后，对罗马历代皇帝的诏令和元老院决议加以汇集审订，整理成为一个法律汇编（529年），后被称为《查士丁尼法典》。——译者注

这个民族，忽而又给那个民族恢复了部分权利。流放者可以在本区范围内自由旅行，申请去其他州的手续简化了许多。人们越来越多地传说："快要放回家乡了。回家乡！"确实，那些因当过俘虏而被流放的土库曼人回家乡去了。接着又放回了库尔德人。有些人开始变卖房产，房价大大跌落。

还放回去一些"行政流放"的老人，这是因为有人在莫斯科替他们奔走，现在他们恢复了名誉。波动遍及各个角落，所有流放者心里都热乎乎地：莫非我们也要动一动？莫非我们也……？

可笑！好像这个制度真会发善心似的。不能相信！劳改营教给我们的就是：不能相信！我个人更是没有必要相信，因为在那里，在宗主国本土，我一个近亲好友也没有，而在这里，在流放地，我几乎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也许这只是由于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生活吧。

不错，流放的第一年我被病魔折磨得很厉害，疾病像是监狱看守的盟友，一心要扼杀我。整整一年，科克切列克的所有医生都不能确诊我的病。我勉强支持着上课，睡眠时间很少，食量很小。从前在劳改营写下来保存在记忆里的和到流放地后写的东西，我都必须尽快写成文字并埋在地下。（启程去塔什干的那个夜晚，一九五三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我记得十分清楚：我感到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全部文学活动就要结束了。真嫌太短，太少！）

可是，病好了。这才开始了我长达两年的真正美好的流放生活。只在一点上有些苦闷，感到美中不足，便是我没能结婚：这期间我未能找到一个能够把这孤独之身托付给她、把我的全部写作和秘密宝藏托付给她的妇女。尽管如此，这整个期间我的情绪高昂、饱满，我是幸福的，没有感到不自由。学校里分上下午两部上课，我愿意教多少节课就教多少节，我在教课中找到了幸福。我的课从不使学生感到厌倦乏味。每天我还可以抽出些时间来写作，而且在这段时间里精神从来不紧张：刚一坐下，笔下的字就

自然地一行一行写出来。每到星期天，只要不赶我去替集体农庄刨萝卜，我就一直写作，全天时间都用在这上面！我还同时开始写小说（十年之后被查封了*）。我还有许多素材，够我写很长时间的。至于出版，反正得在我死后。

我手头有了些钱，便首先买了一所单独的僻静的小土房，定做了一个坚面的写字台。晚上仍睡在那两只空木箱上。我还买了一架能收短波的收音机，夜间把窗帘拉起来，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透过瀑布般的干扰声捕捉那微弱的、禁止我们收听的西方广播，倾听着渴望听到的消息。听不清的地方就只好按它的思路自己补充了。

几十年的谎言把我们害得好苦，如今哪怕是支离破碎的真相的一些小小片断也都是我们所渴望得到的！不然的话，便不值得花费这许多时间了；西方在患幼稚病，它已经无力继续以其智慧和坚定精神丰富我们这些群岛上成长起来的人们了。

我的小土房位于村镇的最东头。篱笆外面就是灌溉渠道，草原。每天早晨可以看到地平线上的日出。草原上只要有点微风，就足够人敞开胸膛尽情呼吸了。黄昏和夜晚，不管是明月当空还是漆黑，我都同样在草原上散步，忘情地呼吸草原的空气。土房周围一百米之内没有其他住宅。

我已经安于这种生活。就算不是“永久”吧，至少也准备在这里住上二十年（我不相信完全的自由会在二十年内到来。我是有些估计错了）。我似乎已不想再到别处去（尽管一看见俄罗斯中部的地图就抑制不住心潮起伏）。对我来说，整个世界并不是外在的世界，不是那个吸引人的世界，而是我亲自经历的那个世界，它就在我的体内。我的全部任务就是要描写那个世界。

我感到自己很有信心。

---

* 指长篇小说《第一圈》的手稿。——译者注

当年拉季舍夫的好友库图佐夫在写给被流放的拉季舍夫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朋友，我对你说这些话是很痛苦的，但我还是要说……你的处境也有它有利的一面。你现在远离一切小人，同一切令人目眩的事物隔绝，这样，你就能够更好地……在你自己的世界里漫游了；你可以冷静地观察自己，从而也就可以对于那些以前往往是透过虚荣和世俗的帷幕看待的事物作出偏执观念较少的判断。这样，或许很多东西将会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你眼前。"

正是这样。我十分珍视这种得到净化的观点，因而我也完全自觉地珍视我的流放。

可是，流放本身却越来越不稳定，它已开始动荡。警备司令部现在简直变得可以说和蔼可亲了。它的人员进一步减少，对逃跑者现在规定只判五年劳改，实际上五年也不一定判。对一个又一个的民族宣布今后不必定期向警备司令部汇报，随后又批准他们返回故乡。喜悦和希望扰乱了我们流放地的宁静。

突然，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一九五五年九月又来了一个"阿登纳大赦"。在这之前，阿登纳访问莫斯科时曾征得赫鲁晓夫同意释放所有的在押德国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便下令释放他们。可这时忽然发现有点荒唐：德国人倒是全释放了，而给他们帮过忙的俄国人却仍在服长达二十年的刑期。但是，这些人大都是在德国人占领时期当过伪警察和村长的，还有弗拉索夫分子，公开宣布赦免他们又似乎不妥。怎么办？最简单的还是按照我国宣传工作的一般原则办事：微末小事大叫大喊，重要事件一笔带过。于是，十月革命后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政治大赦就在一个不是节日的、"什么也不是"的普通日子——九月九日宣布了，只在《消息报》一份报纸*上发表，而且不登在第一版上，也没有发表任何

* 《消息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机关报。《真理报》是苏共中央机关报。——译者注

评论和文章。

噢，怎能叫人不激动呢？我看到了“关于赦免曾同德国人合作的人员”的消息！怎么会这样？那么我呢？这与我无关？因为我本来一直在苏联红军中服役？算啦，见你们的鬼去！这样我就更心安理得了。这时我的朋友列·季·科佩列夫从莫斯科写信来说，他凭着这项赦免令在莫斯科警察局争得了临时落户的权利。但是，很快警察局又把他传去了：“你是在同我们搞什么鬼名堂？你并没有同德国人合作过呀！”“是没有。”“那就是说，你一直在苏军中服役？”“是的。”“那么，二十四小时之内你滚出莫斯科去！”当然，我的朋友还是没有走，可是，他写道：“晚上十点之后就有些提心吊胆，一听见大门铃响就担心是来赶我走的。”

我可是很高兴：我这里有多好！把手稿藏起来（我每天睡觉之前都把它藏起来）就可以像天使般睡觉了，高枕无忧！

呆在这洁净的沙漠地带，我想象着首都那熙熙攘攘、纷乱嘈杂、追求虚荣的生活。那里一点也不吸引我。

可是莫斯科朋友们的来信却极力敦促：“你怎么想的？为什么还呆在那里？……应该要求复查你的案件！现在正在复查！”

我为了什么呢？……在这里，我可以整小时地观察蚂蚁的生活：它们在我的房基土坯上钻出一个洞来，排着队把自己的货物——一颗葵花子皮搬运进洞储备过冬。它们并没有班长、看守和劳改营的长官管理。忽然，一天早晨，虽然房前扔着不少瓜子皮，可是蚂蚁却不出来了，原来是它们预先就知道今天要下雨。尽管晴朗的天空和阳光没有一点下雨的迹象，但它们却老早就知道了。雨后，虽然天空还布满阴云，可它们却出来劳动了：它们确切地知道今天不会下雨。

在这里，在这寂静的流放生活中，我仿佛确切看到了普希金生活的真实道路：他的第一件幸福是被流放到南方来，第二件，也是最大的幸福是流放到原籍米哈依洛夫斯科耶村。他本应该在那

里一直住下去，哪里也不去就好了！不知是什么命运把他又拉到彼得堡去？又是什么劫数推动他结婚的呢？……

但是，凡夫俗子的心很难始终听从理智的声音。一块小木片很难不漂向整个水流流去的方向。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关于赫鲁晓夫的报告我们很长时间毫无所知。(到了给科克切列克的人们传达它的时候，也还是对我们这些流放者保密的。我们是从英国B·B·C·电台得知的。）但是，只须普通公开报纸上刊登的米高扬的一句话，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他说，这次代表大会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列宁式的代表大会”。我立即明白：我的敌人斯大林倒了，这就意味着我正在起来。

于是，我写了复查申请书。

春天，便开始取消对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全体囚犯的、刑满之后的流放刑了。

这时，我才拖着病弱的身躯离开清澈的流放地，进入了混浊的世界。

当一个原来的囚徒从伏尔加河东回到了河西，当他乘着火车整日在俄罗斯中部一片片小树林间穿行，这时他会有什么感触?这就不是本章所要写的内容了。

同年夏天，我在莫斯科打电话询问检察机关对我的申诉有无答复。接电话的人叫我挂另一个电话，然后我听到了侦查员的声音：他用友好的憨厚语气请我到卢宾卡的机关去谈一下。我来到库兹涅茨桥大街著名的传达室，人们叫我在这里等一等。我猜测这时已经有某人的眼睛在注视着我，在研究我的面部表情了。我内心感到紧张，但却作出一副和善的、疲惫的表情，似乎无心地看着一个正在接待室玩耍的、并不很好玩的小孩。我的猜测是正确的！穿着便服的新侦查员正站在一旁注视着我！当他已经确信我不是一个凶猛的敌人时，这才走到我跟前来，十分愉快地把我

领进了庞大的卢宾卡大楼。一路走着，他已经在不住叹息了：看他们（是谁??）把您的生活糟踏成了什么样子，妻离子散！可是，白天也开着电灯的、闷热的卢宾卡大楼走廊还是老样子，还是当初我被押着走过时的样子，那时我是剃光了头、腹内空空、几夜没有睡眠，衣服上的钮扣被扯掉、两手倒剪着的。“办理您的案件的那个侦查员叫叶泽波夫，我知道他。您怎么遇到这么个野兽呢？现在他已经被撤职了。”（他现在大概正坐在隔壁的侦查室里，也正在同样骂我面前这位新侦查员……）“我原先是在海军的反间谍组织‘死灭尔施’工作的，我们那里*可没有这么搞！”（从你们那里出过一个叫留明的人！你们那里还有过一个叫列夫申的侦查员，有过一个叫利宾的！）但是，我天真地对他不住地点头：那当然喽！他甚至还提到我在一九四四年说过的关于斯大林的俏皮话，并且说：“您的话很中肯！”他全清楚，他全赞成，只有一点使他感到不安，他说：“您在《第一号决议》里写着：‘所有这些任务，没有组织是不可能完成的。’您莫非是想建立一个组织吗？”

“不—是！”我事先已经周密地想过这个问题。“‘组织’不是指人们的集合体，而是指以国家的方式实行的一系列措施。”

“哎呀，哎呀，是这个意思！”侦查员高兴地表示同意。

这一关过了。

他称赞我描写前线生活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原来也都是作为罪证归入档案的。他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反苏维埃的东西！您想要的话，都可以拿回去，还可以去试试能否发表。”但是，我却用一种病人的、几乎是垂危病人的声音谢绝了他的建议：“哪里的话！我早把写作忘掉了。如果还能活几年，我想研究点物理。”（物理学是我们时代最时髦的嘛！这种游戏现在很时兴，今后我就

---

* 后来另一个囚犯来信告诉我：1950年前叶泽波夫是上校处长。1978年我从国家安全部的一本小册子里得知，他已经光荣退休，正在颐养天年。——译者注

要同你们做这种游戏了!)

挨了打的不必哭，未挨打的应该哭！监狱总应该教会我们一点什么吧。至少总该教会我们在"契卡格勃"的面前应该保持什么态度吧。

第 七 章

出狱后的囚犯

本书有过一章《逮捕》，是否还需要写一章《释放》呢？

要知道，那些一旦遭受逮捕的人（我指的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中间能够尝到这“释放”滋味的恐怕连五分之一也没有，如果能有八分之一就算很好了。

谁不知道“释放！”是怎么回事？全世界的文学作品里，电影里，描写过多少释放的场面啊：阴森森的牢门打开了，外面阳光明媚，人群的欢呼，亲人们的拥抱。

但是，古拉格群岛的阴沉天空下的“释放”却令人憎恨。因为出狱之后你头上的天空只会变得更加阴沉。“释放”是不慌不忙的（当局现在何必着急?），它就像写花体字时拖着一条长尾巴一样时间拖得很长，这就是它与闪电般的“逮捕”*唯一不同之处。除此之外，释放就和逮捕完全相同了。它只是从一种惩罚过渡到另

---

* 俄语“释放”（освобождение）一词由十二个字母组成，六个音节；“逮捕”（арест）只有五个字母，两个音节，故说“闪电般的”。同时这也是指释放手续总是拖拖拉拉，而逮捕人时往往是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译者注

一种惩罚，它同样刺痛你的胸膛，摧毁你整个生活安排，打乱你对一切事物的概念，而同时却又不给予你任何希望。

如果把逮捕比作严寒对液体的突然袭击，那么，就可以说，释放是两次严寒之间的轻微的融化。

它是两次逮捕之间的状态。

这是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只要有了"释放"，日后必定在某个地方发生新的"逮捕"。

处于两次逮捕的中间状态——这就是赫鲁晓夫之前四十年间的"释放"。

它也像是抛到群岛的两个小岛之间的救生圈：在从这个劳改营进入另一个劳改营营区之间，你先抓住它在水里挣扎一阵子吧！……

最初的钟声到最后的钟声之间叫做"刑期"，从一个劳改营营区转到另一个劳改营营区的中间一段路叫做"释放"。

马雅可夫斯基使劲号召别人羡慕苏联的护照，* 可是你手里的那张浑浊的橄榄色的身份证被身份证法第三十九条的黑墨水涂抹得一塌糊涂。拿着它，哪个城镇都不会给你上户口，任何一份好工作都不会要你干。在劳改营里还有人管饭，在这儿可就没有了。

同时，你却获得了很不可靠的所谓"来往自由"……

这些不幸的人不应该叫作被释放的人。不，实际上他们是被剥夺了流放地的人。这些人一旦失去恩赐给他的不可逃避的流放地，便不会再强迫自己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原始森林或哈萨克斯坦沙漠地带去生活在为数众多的自己人——坐过牢的人中间了。不，这些人希望到备受虐待的、稠密的狱外自由人中间去。可

---

* 马雅可夫斯基诗作《苏联护照》的最后几行是："看吧，羡慕吧，我是苏联的公民。"护照和国内使用的身份证在俄文里是一个词。——译者注

是，那里的人们却远远地避开他们，他们将在那里成为带有标记的人、再次逮捕的候补人。

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斯托利亚罗娃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从卡尔特种劳改营获释。她不能马上离开，因为还没有领到身份证。但她没有买粮食的卡片，没有住处，能找到的工作只有伐木砍柴。劳改营的朋友们捐助给她的几个卢布很快就吃光了，她只好又回到劳改营里来。她对警卫人员撒谎说是回来取东西的（这里的老规矩是宗法式的，只要头头答应就行了），于是她回到了原来的工棚！她高兴极了！女伴们围拢过来，从厨房里要来一点烂菜汤，（啊，真好吃！）有说有笑，大家听她讲述她在外面怎样无依无靠，衣食无着：不，不，还是劳改营里日子好过些。晚点名的时间到了。多一个人！……值班看守羞辱了她一番，最后还是允许她住一夜，但到第二天（5月1日）早晨就必须"滚出去"！

斯托利亚罗娃在劳改营时一直积极劳动，不知疲倦。（她是年轻时从巴黎回苏联来的，很快就被抓进监狱。所以现在她很想早些出去看看祖国的景象！）由于"她劳动积极"，当局以优越条件释放了她：没有限定她必须到什么地方去居住。那些必须到指定地点去居住的人总还能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因为民警局无权把他们赶到别处去。但是持有"完全释放"证明的斯托利亚罗娃却成了一只人人追打的丧家犬。各处的民警局都不同意她落户。到了莫斯科，她在一些过去很要好的熟人家里也只受到茶点招待，谁也不开口要留她住下，她只好到火车站去过夜。（候车室里糟糕的不仅是夜间常有民警来赶人，而且黎明前清扫时还要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此外，大概每个被释放的囚犯都记得自己在大火车站候车室所体验过的恐惧心情：一看到民警走过来，心里就一抖：民警的目光多么严厉！民警当然会感觉到此人原先是个囚犯，他马上会问你："你的证件呢？"如果他把你的释放证没收掉，那就全

完了，你又成了囚犯。我们这里是不存在所谓权利的，也不存在法律，而且“人”也不存在，只有证件！所以他现在把你的释放证一拿走，你就完了。这是我们的切身体验。）后来，斯托利亚罗娃打算到卢加市的手套工厂去当一名工人，该厂生产的手套幸好不是给工人阶级使用的，而是给德国人战俘用的。这总可以吧？但是，工厂厂长不但没有录用她，反而当众把她奚落了一番：“噢，你想钻进我们的组织！我们懂得你们这一套！我们读过舍伊宁的小说！”*（啊，你这个胖子舍伊宁！你噎死才好呢！）

这是恶性循环：没有户口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就不给报户口。没有工作也就领不到粮食卡片。按规定，内务部有责任安置释放后的囚犯，但是坐过牢的人不知道这条规定，即使知道，也不敢根据这条去麻烦内务部，因为谁也怕再被关起来……

真是：人身获自由，终日泪交流。

我在罗斯托夫大学读书时，有一位很古怪的教授，叫 H·A·特里福诺夫，他总是缩着脖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十分胆小，人们千万别在走廊里招呼他。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坐过牢。在走廊里喊他一声，对他来说就像是行动人员的叫喊。

战后，罗斯托夫医学院有一位被释放回来的医生，他坚信自己不可避免地会再遭逮捕，不想等待下去，自杀了。体验过劳改营生活的人，了解这种生活的人，选择这条道路不足为奇。走这条路的痛苦并不更大些。

那些过早地获得释放的人是不幸的！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一九四六年获释后并没有去什么大城市，而是回到了自己故乡的农村。他从前的老朋友，同班同学们，在街上都尽量避开他，不愿意停下来同他打声招呼，（这些青年人不久前在前线作战时还都是

---

* 列夫·罗曼诺维奇·舍伊宁（1906—1967），曾任检察长，自1950年开始写反间谍题材的小说。——译者注

九畏的战士呢！）实在躲不开时，就勉强应付两句，急急忙忙离去。任何人都没有问过他这些年是怎样度过的。（虽然大家关于古拉格群岛的情况似乎知道得并不比关于中非的情况更多，但却没有人问及。我们的自由社会如此训练有素，这一点我们的子孙们将来能够理解吗？）不过，终于有一位大学时期的老朋友邀请他了，请他晚上，天黑之后，到家里去喝杯茶。真是难得的友情！暖人心房啊！正是这种不明显的温暖才是融冰化雪所需要的，才是他鲍里索夫所需要的呢！他去了。闲谈中，阿维尼尔·鲍里索夫请他的朋友把相簿拿来看看，共同回忆一下过去。朋友拿出来了。这位朋友自己竟完全忘掉了自己曾……他惊奇地看到阿维尼尔突然站起来，不等茶炊里的茶煮好就匆匆离去了。是啊，阿维尼尔在相簿上看到：所有照片上自己的脸都被墨水抹黑了。鲍里索夫此时此地该作何感想呢？！①

阿维尼尔·鲍里索夫的地位后来又有所升迁，他当了幼儿园的主任。这个幼儿园里收容的孩子中有一些阵亡战士的孤儿。当这些孩子听到另一些有钱干部的子女给主任起了个外号叫“管监狱的”，他们哭得十分伤心。（我们这里没有人会向孩子们解释：那些富有家庭的子女们的家长倒很可能是“管监狱的”，而阿维尼尔则是“坐监狱的”。如果是上一世纪的俄罗斯人民，就绝不会如此缺乏对祖国语言的语感了！*）

又例如，阿·卡尔捷尔虽然也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但在一九四三年由于肺结核病不能劳动而被劳改营除名了。他拿着一张

---

① 五年之后，这位朋友把这事都推到妻子身上：那是她抹的。又过了十年（1961年），那位朋友的妻子自己找到了在工会区委会工作的阿维尼尔，请求发给她去索奇疗养地的疗养证。他签发给她了。这时她却喋喋不休地谈起他们之间从前的友谊来。

* 这两个俄文词只有一个字母不同，тюремщик 是狱吏、看守、管理监狱的人，тюремник 则是囚徒、犯人、被关进监狱的人。起绰号的孩子本想说第二个词，却说成了第一个，竟也无人发觉。—— 译者注

"黑籍"公民证，在任何城市都不能落户口，到处找不到工作，疾病注定他将慢慢地死去，谁也不要他。这时，突然来了征兵委员会。急需兵员。很急。卡尔捷尔患的是开放性肺结核，可他却宣称自己很健康，心想：要完蛋就痛痛快快作为一个平等的人完蛋吧！他入伍了。他几乎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只是后来在野战医院里"第三处"的眼睛才注意到他，他们发现了这个在战场上奋不顾身的战士……是"人民的敌人"：一九四九年已经决定名单，要重新逮捕他，多亏军事委员会里有几个好人救了他。

在斯大林时代，最好的释放就是走出劳改营大门之后立即留在原地参加劳动。当地的生产单位大都了解这些人，容易找到工作。而内务部的人在街上遇见时也认为这是他们已经检查过的，一般也不再找麻烦。

但是，并不尽然。一九三八年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从巴姆劳改营被释放后自愿留在原地，当了一名自由雇佣的工程师。行动科科长罗森布利特就对他说：

"你被释放了。但是你要记住，你总是走在钢丝上的。稍有差错，你就会再成为囚犯。为此甚至无须再经过审判。所以，你小心点儿！别以为你是什么自由公民了！"

这些留在劳改营附近的聪明囚犯把监狱看作自由的另一种形式而自愿选择了它。在某些荒凉边远地区，诸如内罗布和纳雷姆等地，至今还有几十万这样的人。即使再去坐牢，他们也不会觉得很难过，反正就在旁边嘛！

在科雷马一带则根本无须选择，因为这里全体群众都是被束缚在这里的——囚犯被释放的同时就得签署自愿的保证：今后继续留在原地劳动。（科雷马的人要取得进入"宗主国大陆"的批准书比得到释放还难。）例如，娜·维·苏罗夫采娃不幸满刑了。昨天她还在劳改营附设的儿童保育院劳动，那里暖和，可以吃饱。今

犬既已获得释放，那就得去地里劳动，因为没有别的工作。昨天她还肯定有一张床可睡，有一份口粮可领，今天则不然：口粮不发了，住处没有了，她不得不睡在一所半倒塌的破房的朽烂地板上。(这是在科雷马呀！)幸亏儿童保育院的朋友们帮了忙：她们很长时间一直把自己节省下的口粮偷偷送给她这个自由人吃。苏罗夫采娃在谈到自己获释时的新感受时，说这是“自由状态的压迫”。后来，她才慢慢地能够自主了，甚至成了……“房产主”！在这张照片（照片5）上我们看到她傲然站立在自己的小房旁边。可是这种“房子”恐怕不是所有的狗都乐意钻进去的。

读者不要以为只是在边远的科雷马才这样。请看看沃尔库塔的典型工棚“临时民房”吧（照片6），这里面住的自由人还算是过得不错的，当然，他们从前都是囚犯。

由此可见米·彼·雅库博维奇的释放形式还不能算是最坏的：把他“释放”到残废收容所（“吉洪诺夫之家”）去了，他在那里要继续受监督，仍旧无权到外地去。

鲁德科夫斯基释放后到处找不到工作。(他说：“我受的苦可不比在劳改营里少。”)因此只好到库斯塔奈地区去垦荒（“在那儿什么人都遇见过！”)。И·В·施维德在诺里尔斯克不管风雪多大都得去编组列车。耳朵聋了。后来便去当司炉，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他去找社会救济机关要求救济，但他没有工作证件，人们只是耸耸肩膀说：“你提出证人来吧！”证人？我们的证人是海象……И·С·卡尔普尼奇在科雷马干了二十年，受尽折磨，得了病。当他快到六十岁被释放时，却由于不够“雇佣劳动二十五年以上”的工龄条件而得不到养老金。一个人在劳改营里呆的时间越久，他的病就越多，他的“工龄”就越短，得到养老金的希望也就越小。

要知道，我们国家里没有像英国的那种“刑满释放者救济协

会”之类组织，这类旁门左道的机构在我国连想想都可怕。[1]

人们给我写信说：“在劳改营里的日子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来之后是他的第二天。”

算了吧！难道不是从那个时候起就升起了自由的太阳吗？不是向那些不幸的人们伸出了双手，告诉他们：“这一切永远不会重演了！”吗？甚至在党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似乎还流下了眼泪呀？！

茹科夫从科弗罗夫市写信来说：“我不是站起来了，而是跪着直起点身子来了。”但是“我们身上始终挂着劳改犯的标签，只要有精简之类的事，我们当然首当其冲”。Л·Г·吉洪诺夫写道：“给我恢复了名誉，现在我在研究所工作，可是总像还继续过着劳改营生活似的。踩在我们头上握有权力的还是当过劳改营头头的那些人。”Г·Ф·波波夫说：“不管口头说过些什么，也不管纸上写了些什么，但只要同事们一听说我劳改过，就无意似地把脸扭过去了。”

不，魔鬼确实仍然是强有力的！我的祖国至今仍然是这样的：要想把这个国家朝着暴政的方向推一丈远，最多只需蹙蹙眉头，咳嗽一声就能作到；但要想把她往自由的方向哪怕只拉一寸，那也需要套上一百头黄牛，还得用棒子拼命打每一头，边打边喊：“看！往那儿拉！看！往那儿拉！”

那么，恢复名誉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呢？一位姓契的老太婆忽然收到一个语气粗暴的通知：“明天上午十点之前到民警局来！”别的什么也没说！她的女儿头一天晚上拿着这通知跑去问：“这是

---

[1] 现在，普通刑事犯的遭遇也是这样。А·И·布尔拉克被释放后到阿纳笈夫区委去请求工作，他得到的答复是：“我们这里不是干部处”；检察机关则对他说：“这类事情不归我们管”；市苏维埃告诉他：“你先等一等吧！”他整整五个月没有工作（1964年）。Н·К·叶戈罗夫（1965年）来到新沃罗西斯克市后立即被迫作出书面保证：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本市。他在市执委会把劳改营发给他的奖状拿出来给大家看，上面写着：“因工作出色，特予奖励。”人们只是嗤之以鼻。市委书记则干脆把他赶了出来。后来，他又带着贿赂去了，才算在新沃罗西斯克市落了户。

怎么回事?我真担心妈妈的老命。我该让她作些什么思想准备呢?”“不必担心！是件高兴的事，是要给她的亡夫平反了！”(也许是件心酸的事呢？这是那些“恩赐者”根本不会想到的。)

我国发善心的方式尚且如此，我国发狠心的方式就自不待言了！

平反的雪崩来势凶猛！但它也没能砸开那帮一贯正确的人们的花岗石脑门！因为雪崩塌下来的方向，不是朝着只需皱皱眉头的那边，而是朝着需要套上一百头黄牛的那边。

“平反工作搞得太轻率！”党的官员们直言不讳地说，“平反过头的人太多了！”

沃尔德马尔·扎林（顿河罗斯托夫市）蹲了十五年，出来以后，八年老老实实，啥也不说。一九六〇年才敢把劳改营里的糟糕情况向同事们聊了聊。因此就对他立案侦查，一个克格勃少校对扎林说：“别以为平反就是没罪了，只不过是罪行不大而已。但有些东西是永远抹不掉的！”

在里加市，也是一九六〇年，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基被一些配合得很好的“同事”集体连续“整”了三个月，因为他隐瞒了他父亲在……一九三七年被枪毙的事！

正因为这样，科莫戈尔才不明白：“今天到底谁是正确的，谁有罪？当那些丑恶的面孔又突然大谈平等友爱时，我们该往哪里躲呢?”

马尔克洛夫恢复名誉以后在劳动合作组织里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被选为工艺合作劳动组合保险理事会主任，简单说，相当于劳动组合工会地方委员会主席。但是这个劳动组合的主席却从来不敢让这个民选干部单独呆在他的办公室里，哪怕一分钟！兼管干部工作的支部书记巴耶夫，为了保险起见，把马尔克洛夫负责的工会地方委员会的公文函件都攥在自己手里。“是不是有一份关于工会地方委员会改选的文件送到您这里了?”马尔克

洛夫问道。“噢，好像一个来月前送来过一份这类东西。”巴耶夫回答。“我现在需要用它！”“嗯，给你看看吧，不过，你得快点，马上就下班了！”“可这份公文是发给我的呀！好吧，我明天早上就还给你！”“那怎么行?！那怎么行！这是文件！”——请设身处地替这个马尔克洛夫想想，假如您处在巴耶夫这样一副嘴脸之下，而您的工资收入和户口又全取决于这个巴耶夫的话，您会以怎样的心情呼吸这自由世纪的空气呢?！

一位姓杰耶娃的女教师被解雇了，因为她“道德堕落”：她丧失了一个教师的尊严，竟然嫁给一个……刑满释放回来的犯人（她在劳改营里教书时教过这个人）！

这一切都不是发生在斯大林时代，而是在赫鲁晓夫时代。

过去的一切留下的唯一实物的东西就是证件。一张不大的纸片，大约十二公分宽，十八公分长。对仍然活着的人来说，它是恢复名誉的证件。对已经死去的人来说，它是死亡通知书。死亡时间——无法查证；死亡地点栏——画了一个大“Z”号表示不详；至于死亡诊断，你哪怕翻一百页这类证明文件，都是那个现成的答案①，有的还附有（当然是杜撰的）见证人的姓名。

那些真正的见证人却都沉默不语。

我们也沉默不语。

那么，后代子孙将到何处去了解呢？全都隐蔽起来、钉死、粉饰得干干净净了。

维尔博夫斯基抱怨说：“甚至青年人也向被恢复名誉的人投以怀疑和轻蔑的目光。”

---

① 年轻的契-娜曾请求一位样子单纯的年轻女办事员把卷宗里的四十份登记表全部让她看看。于是，她看到，四十张登记表上的死亡原因栏全是同一个笔迹填写的同一个原因——肝脏病！……有的表格上则写着这样的通知内容：“你的丈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马利亚夫科-维索茨基）是在开始侦查审讯前死去的。因此，不存在给他恢复名誉的问题。”

自然，并不是所有青年人都这样。大部分青年对这些事根本不关心。我们是否恢复了名誉？现有的一千二百万坐牢的人是否还呆在监狱里？大部分青年认为这些都与他们完全无关。只要他们自己目前有自由，有磁带录音机和蓬乱发式的姑娘陪着就行了。

鱼类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斗争，鱼儿只知道努力从网眼里钻出去。

*　　　*　　　*

同一种疾病发生在不同人身上便会有不同的病程。释放也如此。如果从近处观察，大家对释放的感受是十分不同的。

从身体方面看也是这样。有些人把过多的“应力”用在设法度过劳改期上。他们把全部精力集中起来像铁人一样度过了劳改期：他们整整十年吃不到身体所需要的东西，整日从事艰苦劳动，穿着单薄的衣服在严寒中砸石头也从不感冒。但是，一旦服满刑期，外来的非人的压力有些松弛了，内部紧张也松弛下来。这时出现的“压力差”就会把这种人毁掉。大力士丘尔别涅夫在伐木场整整干了七年，一次伤风都没得过。获释之后他却得上了好几种病。Г·А·索罗金“恢复名誉之后精神和心理越来越不健全。在劳改营时同伴们一直是很羡慕他的健全心理状态的。他后来得了好几种病：神经官能病，精神病……”伊戈尔·卡米诺夫说：“出狱之后我的身体虚弱多了，一点力气也没有，总觉得比在劳改营里还累。”

早就有这样一句话：“困苦时刻强忍受，时来运转吃酒肉。”有些人释放后不到一年就满口的牙全掉了。有的人很快变成了老头子。也有的则是刚刚到家，便像一枝燃尽的蜡烛似地死掉了。

但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是获释之后精神才振奋起来，只有这时才焕发出青春活力，挺起了腰板（例如，我本人现在看来比我流放期的第一张照片上还显得年轻）。你会突然发现：外界真是

好过呀！那里的，古拉格群岛上的地心引力完全不同。在那里自己的两腿好似大象的腿一般沉重，可是到了外界腿轻快得像麻雀一样。自由人觉得无法解决的一切困苦情况，在我们面前都可以迎刃而解，因为我们有一把富有朝气的尺子："从前比这困难多呢！"从前比这困难得多，那就是说现在很容易解决。我们总是不倦地重复这句话：从前比这困难得多呢！从前比这困难得多呢！

但是，画出一个人的今后命运的几笔决定性勾画，还是在于他获释当时的精神状态的转折。这个转折的表现形式是千差万别的。你只有走出劳改营岗楼大门时，才会感觉到你在离开这苦役营故乡。精神上你是在这里重新诞生的，你内心最隐秘、最珍贵的一部分将永远留在这里，尽管你的两腿正在把你拖向那个没有声音、没有反响的狱外世界。

人的性格会在劳改营里表现出来，但它同样也会在释放时表现出来！我们前面提到过薇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科尔涅耶娃。现在我们来看看她一九五一年是怎样离开特种劳改营的吧。她说："两扇五米高的大门在我的身后关上了。我哭了。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怎么竟会在这走出外界的一刹那哭起来。我哭什么？……有一种感觉，好像是我把自己的心从最宝贵的、最亲爱的东西上、从难友们身上扯开了似的。大门关上了。一切全完了。我再也看不到这些人，再也不会得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了。我好像是在走入来世似的……"

是走入来世！……释放就是死亡的另一种形式。难道我们获得了自由吗？我们是死了，是进入了某种阴间的、完全不同的、有些虚幻的生活。我们将在那个世界小心翼翼地触摸各种事物，力图重新认识它。

可是，原来想象的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释放并不是这样的。它在我们脑海里的形象是按普希金的方式描绘的："弟兄们会把利剑

送到你们手上。"* 但是，极少有哪一代囚徒享受过这样的幸福。

我们这是偷来的释放，不是真正的释放。凡有这种感觉的人全都急急忙忙带着这偷来的一点点自由逃到孤独的生活中去。维·维·波斯佩洛夫说："还在劳改营的时候，我们，我和我的好朋友们，就几乎都是这样想的：一旦上帝让我们活着离开这里，获得自由，我们决不住在城市，也不住在村镇。我们要住到密林深处去，当个护林员或森林巡查员，甚至当个牧人，远远地离开人们，离开政治，离开这浮华世界的一切。"阿维尼尔·鲍里索夫获释之后，最初一个时期总是躲避人，想法跑到大自然中间去。他说："我真想抱住每一棵小白桦，抱住每一棵杨树亲吻。我听到哗哗的落叶声像是在听音乐（我是秋天被释放的），我眼里充满泪水。我一天只能挣到五百克面包，但这无所谓，只要能几小时几小时地倾听这寂静，只要可以看书，我就心满意足了。狱外世界的任何工作都似乎很轻松，很简单；一昼夜就像一小时似的飞过去，对生的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幸福，那么每个囚犯获释后的第一年就肯定会遇到它！"

这样的人往往很长时期不想拥有任何东西：他们懂得，财产是很容易失掉的，就像烧毁一样。他们几乎是带点迷信地避免使用新东西，他们把旧衣服一直穿到破，把旧家具一直用到不能再用。我的一位朋友家里连个可以坐坐靠靠的东西也没有。他们自己却笑着说："看，我们就这么过日子，从一个营区到了这个'营区'。"（他刚买了一套新家具，人也就死了。）

列·科佩列夫一九五五年回到莫斯科后，他发现："同那些一帆风顺的人很难相处！所以我经常见面的都是多少有些失意的老朋友。"

的确，作为人来说，只有那些放弃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才有生

* 指普希金的诗《致西伯利亚的囚徒》。——译者注

趣，而那些继续追求这些东西的人大都是枯燥无味的。

但是，人是不同的。有些人对被释放到外界来的感受完全与众不同（尤其是在“契卡格勃”似乎闭上眼睛的那个时期）。许多人想：万岁！我自由了！如今只有一个信条：绝不要再进去！现在可以弥补一下过去失掉的东西了！

有人要在职位上弥补，有人要在（学术、军阶等）称号上弥补，有人要在挣钱方面和储蓄存折上弥补。（在我们国内，人们在谈到钱这个问题时总要使用一种不屑一提的语气，其实背地里还是在数着钞票的……）也有人要在孩子上弥补。还有的……（如瓦连京·M·）在监狱时就对大家发誓说：他出狱之后要好好地在姑娘方面弥补一下。而且M也确实照这么办了：一连几年他白天工作，晚上，包括平常日子的晚上，则和姑娘们鬼混，而且总是换新的；他每天只睡四、五小时。所以他很快就瘦得不像样子，衰老了。有些人则要在饮食上弥补，在家具和衣着上弥补。（自己的衣扣怎样被扯掉，最好的东西怎样在浴室脱衣间被没收，这些他全忘记了。）购买物品也成了某些人的一种最愉快的活动。

可是，怎么能责怪这些人呢？失去的东西确实太多了！从生活中被割掉的东西确实太多了！

既然对狱外生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也就必然有两种不同的对待过去的态度。

是的，你经历过那些可怕的年代。可你并不是凶残可怕的杀人犯，不是心毒手狠的骗子手！那么你为什么要极力忘掉监狱和劳改营生活呢？它没有什么使你可耻的。认为它丰富了你的生活体验不是更合适吗？以它自豪不是更正确吗？

可是，竟有多少人在极力忘掉这一切呀！（而且他们从前既不是意志薄弱之辈，也不是愚昧鄙陋的人啊。真想不到！）他们想尽快地忘掉！忘得干干净净！彻底忘掉这一切，就像根本没有发生那回事一样！

Ю·Г·文德尔施坦说："一般地说，总是不愿回忆它。这也可说是某种保护性反应吧。"普伦曼说："说老实话，我不愿意见到从前劳改营里的熟人，免得勾起关于过去的回忆。"C·A·列索维克说："从劳改营回来那天起，我就努力不回忆过去。您知道吗，我几乎作到了这一点！（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问世之前。）"C·A·邦达林这个人我早就了解，一九四五年我在卢宾卡监狱住的那间牢房在我之前就是他住的；我向他提起同牢房的其他人，还提到我从前不认识的、同他住过同一牢房的人。而他却回答说："可我倒是在努力忘掉所有同我一起坐过牢的人！"（既然如此，我当然无须再回答他的问话了。）

我能理解原先劳改营中那些正统派分子为什么极力躲避劳改营时期的熟人：他们已厌倦于一个人冲着一百人狂吠了，那时期的回忆对他们来说过于沉重。况且，一般地说，现在接触我们这些不纯正的、思想觉悟差的人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再说，假如不忘掉过去，不原谅过去，不回到原有状态的话，他们还算什么思想忠诚分子呢？正是为了这个，他们才一年四次呈文叩请，苦苦哀求的呀："恢复我吧！让我回来吧！我过去好好干，今后还要继续好好干！"[1] 他们想恢复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恢复党证。还有资历卡片、党龄、功绩。

> 宣告无罪，恢复名誉，
> 头上的党证发出暖人的气息。

而劳改营的经历对这些人来说则像是某种有毒的脏东西，必

---

① 1956年他们就是抱着这种想法涌出来的。就像发了霉的旧衣箱似的，他们带来一股三十年代的陈旧气息，他们想造成逮捕他们的那个时期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重新干下去。

须尽快摆脱它。他们想：即使把劳改营的经验好好抖一抖，洗涤、清理一番，难道能够找出一点点贵金属来吗？

列宁格勒的老布尔什维克瓦西里耶夫就是一例。他蹲过两个十年（每次都连带五年剥夺政治权力）。现在他领到了共和国级的个人特定养老金。所以，他便说："我现在生活完全有保障。我要歌颂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妙极了！似乎只有《圣经》里的约伯才这样歌颂过上帝：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溃疡、瘟疫、饥饿、死亡、屈辱！歌颂你！光荣归于你！）不过，这个瓦西里耶夫也并不是游手好闲的，他可不是个单纯的消费者，他说："我现在是反寄生虫斗争委员会成员。"也就是说还在拼着把老骨头干着当前主要的破坏法制的行为。看吧，这就是"思想纯正者"的面貌。

我也可以理解从前的告密者——眼线们为什么不希望回忆和见面：他们担心受到指责、受到揭露。

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呢？这是因为奴性太深？是害怕再次进去而自愿作出的保证？娜斯坚卡·维当年可不是平平常常地走进监狱的，她是带着拒捕时的枪伤进去的，可如今她用两只拳头紧压着太阳穴对我说："要忘掉它，像一场梦一样，忘掉，忘掉劳改营里经历的那些幻觉。"古典语文学家阿·德，按照他的工作性质，是要对各种古代历史场景作出理性的评量的，可是为什么他也命令自己"忘掉一切"？这样他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能够领悟到什么？

叶夫根尼娅·Д·曾在一九二一年被逮捕关进卢宾卡监狱，当时她还没有结婚。一九六五年她向我讲了这段经历，讲完后却补充说："我婚前婚后对我死去的丈夫一直没讲过这件事。忘了……"忘了？对一个同她生活了一辈子的最亲近的人忘了讲？照这么说，把我们关在监狱里的时间还是不够长！！

或许我不应该这么严厉地评判？或许这就是人性的平均数？老百姓中间有些谚语也是这么说的：

过上半天甜日子，已往的苦楚全不知。

事情容易记不清，好了疮疤忘了疼。

好了疮疤忘了疼！——原来这就是人啊！……

我的朋友尼古拉·维特凯维奇是我的同案犯，我们两人以孩子般的直言不讳致使自己身陷囹圄。在他看来，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可诅咒的，是愚人的可耻失败。因此，他一头钻进了科学，钻到这个最保险的事业里，想靠它有所成就。一九五九年，当帕斯捷尔纳克*还在世，但已被猎犬所包围的时候，我同他谈到过帕斯捷尔纳克的事。他大不以为然地摆摆手说："不要再翻这些老皇历了！你还是听我讲讲我在教研室怎样进行斗争的吧！"（他为了取得职务上的升迁经常在同一些什么人进行斗争。）是啊，军事法庭当时判了他十年劳改，其实，也许只须一次鞭打就足够了吧？……

格里戈里·姆-泽也被释放了。释放，撤销原判，恢复名誉，把党证交还给他。（要知道，人们根本没有问他在这期间是否信仰了耶和华或者穆罕默德？人们不管他从前的思想是否已经荡然无存。很简单："这是你的党证，拿去吧！"）于是姆-泽从哈萨克斯坦又回到原来的某地。[①]他经过我们城市时，我特地赶到火车站去同他会面。他如今在想些什么呢？嗯，他会不会现在又希望回到军队的"秘密科"、"特别科"，或者"专门科"去？我同他谈话时，他好像总是心不在焉。从那之后他一直没给我来过信，一行字也没有写来……

又例如，Φ·雷茨。他现在当了房管所的主任，又是民兵。他谈

---

* 鲍利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苏俄诗人，作家。《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曾拒绝接受瑞典科学院1958年决定授予他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译者注

① 见第三部，第十九章。

起自己今天的生活来津津有味。他虽然没有忘掉过去，(在科雷马度过的十八个年头怎么能轻易忘掉呢?)但是一提起科雷马，谈话就索然无味了，似乎他在怀疑：这一切果真发生过吗?这怎么可能?他身上已经没有过去的痕迹，现在他一切顺利，他对一切都满意。

就像盗贼“洗手不干”一样，那些政治犯的仿造品们也把过去忘掉。对于这些已经“洗手”的人们来说，这个世界又变得很舒适了，似乎没有荆棘，没有压迫。他们觉得从前似乎大家都在坐牢，现在他们却觉得似乎谁也不在坐牢。原先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所具有的那种欢乐愉快的气氛又回到他们身上，这些节日对他们来说已不再是让我们站在严寒中、对我们进行特别侮辱性的搜身、把我们严严地关进劳改营监狱的那些日子了。本来嘛！何必抱那么高的希望呢?！既然一家之主今天白天在工作岗位上受到了上司夸奖，那么晚上一家人吃饭时不就应该有些节日气氛吗，不就可以庆贺一番吗！

这些从前的受难者只是在家里还偶尔喃喃地埋怨几句，只在家里他有时还记得过去，这是为了使家里的人更抚爱他，更珍视他。一出家门，他就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

不过，我们也不该太不近人情。要知道，经历过许多使人厌恶的失意之后回到原来的“自我”中去，恢复自己从前的（虽然不是很好的）特点和习惯，这本是一般人的常情！我们的禀性，我们的遗传基因的稳定性，也就表现在这里。大概人不如此也就不成其为人了吧。我们前面引用过塔拉斯·谢甫琴柯的彷徨的诗句[①]。就是这同一位谢甫琴柯十年之后万分高兴地写道：“我的内心形象丝毫没有改变。我衷心感激万能的造物主，他没有让那可怖的试验铁爪触及我的信仰。”

但是，人们究竟怎样才**能忘掉**呢?到哪里去学会这忘却的本

---

① 见第三部，第十九章。

领呢？……

M·И·加里尼娜给我写信说："不，我什么也忘不了。生活怎么也安排不好，虽然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在工作上我可能作出些成绩，日常生活也能处理，可是总觉得心里不舒畅、别扭，而且觉得疲劳。我希望您在描写那些被释放的人时，总不至于说他们完全忘了过去，生活得很幸福吧？"

拉伊莎·拉祖季娜来信说："不让我回忆不好的东西？那么要是没有什么好的可回忆呢？……"

塔玛拉·普雷特科娃写道："我坐了十二年牢。我出狱后已经生活了十一年（！）了，可我至今还是不明白到底为什么活着？哪儿才有正义？"

欧洲谈论平等精神已经两个世纪了。可是在我们这里人们还是多么互不相同啊！生活的犁铧在我们彼此心灵上耕出的犁沟真是太不一样了！有的人十一年什么也忘不掉，另一些人一夜之间忘得干干净净。

伊万·多布里亚克说："一切都过去了，可又不是一切。给我恢复了名誉，可我总是不能平静。很少有一个星期能够安安静静地睡觉，总是梦见劳改营。我自己流着眼泪从梦中惊醒，坐起来，或者把别人吓得赶快叫醒我。"

安斯·伯恩施坦获释十一年之后还一直梦见劳改营。我也大约有五年的时间老是梦见自己是囚犯，从来没有梦见自己是自由人。即使今天，有时候还梦见我是囚犯（我在梦里一点也没感到奇怪，一切行动还是按照老经验）。列·科佩列夫获释十四年后得了病，马上就说开关于监狱的胡话了。[①] Л·科佩列夫获释后第十

---

① 在西方，我收到弗兰克·迪克勒寄自巴西的一封信，他说在那里，在获释三十年以后，他仍然常作劳改营的恶梦，仍然在请求第三处（行动处）的长官放他离开北极。

四年得了病，病中的谵妄都是关于劳改营监狱的。

我们的舌头总像是说不出“船舱”和“病房”这些词，总想说成“牢房”。

沙维林说：“我至今一看到狼狗还是心惊胆战的。”

丘尔佩涅夫如今一走进树林就不能平静地呼吸，也不能欣赏自然风光，他说：“我一看，这片松树林不错：枝杈很少，伐倒之后无须再烧掉砍下的枝杈，能够出一批很好的方材……”

米尔采沃村里几乎一半居民是在劳改营呆过的（虽然大多是犯的盗窃罪）。如果你释放后住进了这个村，怎么能忘掉过去呢？你来到梁赞火车站，看见车站的围墙上有三根柱子是损坏的，可是从来也没有修过，好像就应该这样。这是因为囚犯列车通常正是停在这里的，运囚犯的“乌鸦车”也一直开到这儿，车屁股对着缺口，囚犯们一下火车就被轰着往这个墙洞里钻。（这样方便，无须押着囚犯走过嘈杂的月台）。全苏无知普及协会*给你开出一张出差证（一九五七年），原来是叫你去第二劳改区，即附设在监狱的妇女劳改区去作报告的。你走过岗楼，一顶熟悉的军帽从小窗口里盯着你。你同教育科的一位代表一起穿过监狱大院，衣裳破旧的女囚犯首先讨好地赶着向你们两人打招呼。你坐在政治处主任办公室稍事休息，陪同者为了不使你寂寞而同你聊天。你会想象到，就在这个时候正在从囚室往外赶女犯们，在小伙房里正在夺下囚犯伙夫手里的锅：喂，快去听报告！快点！快！囚犯们挤满礼堂。礼堂里发出一股潮湿味。走廊也潮湿，牢房里可能更潮。整个报告中不幸的妇女们一直咳嗽：那是老年人的、闷声闷气的、连续的咳嗽，是那裂人心肠的短促的干咳。她们的穿戴与其说像妇女，不如说是对妇女的讽刺，年轻人们也都像老太婆一样粗壮拙笨，个个疲惫不堪，盼望着报告尽快结束。你感到耻辱，

---

* 作者在故意讽刺，实际上指“全苏政治及科学知识普及协会”。——译者注

恨不得化作一阵烟雾散掉。恨不得不讲这些"科学技术的成就"，而对她们高喊："妇女们！这一切你们要忍到哪一天算完呀？！……"你的眼睛立即发现几个穿得不错的、甚至穿着毛线衣的鲜明形象。显然她们是当杂役的。好了，你可以把目光停在她们身上，不去听那咳嗽声，可以顺利地宣读讲稿了。这几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你……是在听吗？不，她们明明不是在听你讲话，她们不需要关于宇宙的知识。因为她们很少看到男人，所以在那里仔细端详你呢……这时，你会设想：假如现在把你的身份证拿走，你就得留在这里了。这几堵墙，距离你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无轨电车站只有几米远的这几堵墙，就将把你同整个外界隔开，它们就不再是墙，而变成许多难熬的岁月了……不，不，你马上要离开这里！花四十戈比就可以乘电车到家，吃一顿美味的晚饭。但你总忘不掉：这些妇女仍将留在这里，仍将这样咳嗽下去，成年地咳嗽下去。

每逢我被捕的纪念日，我都要过一个"囚犯日"——早晨切下六百五十克面包，放两小块糖，倒上一杯热水。午饭我要求给我煮一份烂菜汤加一小勺稀饭。于是，我很快便回到原来的境地：天快黑的时候我把面包渣拾进嘴里，把盘子舔干净。往日的景象历历在目，往日的感受刺得我的心隐隐作痛！

我把自己身上那几块号码布也带出了劳改营，至今保存着。是啊，只我一个人这样吗？不，在这一家，在那一家，到处人们都把它像保存的圣物一样拿出来给我看。

有一天，我走在新斯洛博德大街上。布蒂尔卡监狱！"探监室"。我走进去。里面挤满了妇女，夹杂着个别男人。有人在递交东西，有人在谈话。噢，外界给我们送的东西原来就是通过这里送进去的。真有趣！我若无其事地走过去看"探视规则"。可是这时一个大嘴脸的中士盯了我一眼，走过来问道："公民，你有什么事？"他大概看出我不像来探监的，怕我搞什么名堂。这么说，我身上大概总是带着一种囚犯气味吧？

要是去凭吊死者呢？去凭吊那些自己人，也就是你也应该被刺刀扎死同他们躺在一起的那些人呢？A·Я·奥列涅夫虽已衰老，但他还是在一九六五年去凭吊了一次。他背起背包，拿上手杖来到了从前卫生营的所在地，从那里进了山，当时死人就埋在这里（离凯尔基村不远）。山上到处是白骨和头颅骨。当地居民把这个小岗子叫做白骨山。

加利娅·B·住在遥远的北方城市，那里是半年黑夜，半年白天。整个世界上她没有一个亲人，她的所谓"家"只是一个嘈杂龌龊的角落。她想休息时便拿着书到饭馆去，要一杯酒，慢慢喝着，看看书，抽支烟，"悲痛地思念俄罗斯"。她最喜爱的朋友是乐队队员和看门的人。她说："许多从那里回来的人都隐瞒着过去那段经历。可是我却以自己那段经历自豪。"

虽然没有固定地点，但过去的囚犯们每年总要在某个地方举行一次难友集会。他们在一起饮酒、回忆。B·П·戈利岑谈到这类集会时说："说来也怪，回忆过去时并不总是些阴暗的、痛苦的场面，许多东西回忆起来倒使人觉得心里暖洋洋的呢！"

这也是人的一种本质！而且并不是最坏的本质。

B·Л·金兹伯格（金兹堡）高兴地回忆说："我在劳改营时号码前面的编号字母是'Ы'，而我获释之后身份证号码前面的编号字母是'ЗК'（泽克），有意思吧！"*

看到这样的来信心里确实感到温暖。是的，是真的，在许多来信中，从前的囚犯的来信总使人读后感受不同！多么不寻常的生命力啊！如果目的明确，它将产生多大的推动力啊！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是你收到一封不是无病呻吟的，而是真正充满乐观主

---

* 俄文"Ы"字母是很难单独发音的，没有用它开头的俄语单词。"泽克"即囚犯之意。这里是两个独立的字母偶然编在一起的，但其发音与"泽克"相同，故可作为一种解释，犹如中文的"口人字××号"可曲解为"囚字××号"。——译者注

义的来信，那它肯定是从前的囚犯寄来的。这些人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已习惯，因而不论面对什么，都不会灰心丧气。

我为自己属于这一强有力的种族而感到自豪！我们原本不是一个种族，是别人使我们成为同一种族的！别人把我们焊到一起了。如果我们处在昏暗和涣散的、人人自危、互相警惕的狱外世界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如此坚固地焊接到一起。那些正统派分子和眼线们一到狱外就自动离去了。我们无须约定互相支持，我们也无须互相考验。我们一见面，看看眼神，说一两句话，就清楚了。难道还需要解释什么吗？我们是会互相援救的。我们到处都有朋友。我们的人有几百万！

监狱给了我们一把衡量人和事的新标尺，它从我们眼前去掉了那层经常障住未经风霜的人们的眼睛的世俗油污。这时我们得出了多么出人意料的结论啊！

娜·斯托利亚罗娃是一九三四年从巴黎自愿要求回国的。她落进了这个捕兽器，它夺去了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但是，斯托利亚罗娃不仅不悔恨自己回国，不痛苦，她反而说："当时我不顾周围一切人的劝告，不听自己理智的声音，而毅然回到了俄国。看来我是做对了！我当时根本不了解俄国，但我的内心已经猜到她是什么样子了。"

И·С·卡尔普尼奇-布拉文在国内战争时期曾任旅长。他过去是一帆风顺的，他脾气急躁、易怒。那时候，特别科科长把名单拿给他，他看都不看一眼就用钝铅笔签字批准枪决，而且他不是在名单上部签字，而是在名单末尾签，不用大写字母，而只用小写字母、不带缩写点地写上两个字母："BM"（这意味着：对名单上所有的人全部处死！）* 后来，他戴上了菱形章，再往后则是

* BM 是当时非公开使用的一种缩写字，指 Высшая Мера (Наказания)"最高措施"，即极刑，死刑。下一句的"菱形章"是指有菱形花的将军肩章。——译者注

在科雷马的劳改营蹲了二十年零半年。如今，他住在大森林中的一个孤零零的村子里，浇菜，养鸡，有时做点儿木工活。他并不申请恢复名誉，一提到伏罗希洛夫他就骂娘，他每天听广播，看报，并且对于每一篇电台广播稿和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愤怒的回答。但是，又过了若干年，这位山村的哲学家却意味深长地从某本书上抄下了这样一句格言：

“对人类单有爱还不够，对人们首先应该善于容忍。”而在临死之前，他又写下了他自己的两句话：

“我过去总是用自己的尺度评判一切。但现在我已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不再用自己的尺度评判了。”

这使人感到震惊。这不是很神秘吗？是不是托尔斯泰老人还魂了？

B·П·塔尔诺夫斯基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是他在刑满之后自愿留在科雷马了。他在写诗，但并不把这些诗寄给任何人。他沉思着，写道：

> 注定我呆在这天涯地边，
> 是上帝判定我沉默无言，
> 因为我曾看到恶人该隐*，
> 却未能把他的头颈斩断。[1]

遗憾的是：我们全都渐渐地死去，不能完成任何值得敬仰的事业。

---

* 该隐是《圣经》中的人物，曾因嫉妒而杀死自己的兄弟。——译者注

[1] 这里应该公道地补充一句：后来塔尔诺夫斯基离开了科雷马，结婚了，但很不幸福。他失去了内心的高度和谐，不知如何脱身。

*　　　*　　　*

此外，回到自由的狱外之后囚犯们还要和许多人见面。父子相会，夫妻相会。而这些会面也常常并不称心如意。十年，十五年未同我们在一起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不可能同我们感情融洽：有时彼此简直形同路人，甚至像是敌人。忠贞地等待丈夫的妇女中受到应得的报偿的只是极少数：因为这么长时间彼此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人的一切全改变了，只剩下姓名没变。他和她的生活经历过于不同，他们已经不可能情投意合了。

这些事还是留给人们去写电影剧本或小说吧，本书无法全包括进来。

但是，这里也不妨援引一个事例。让我们来听听玛丽娅·卡达茨卡娅的叙述吧。

"头十年期间我的丈夫总共给我写了六百封信。后十年期间只写了一封，而且这封信写得叫人看了不想再活下去。经过十九年之后，当他第一次得到休假时，他并没有到我和儿子这里来，而是到亲戚那里去了。只是过路途中决定在我和儿子这里呆四天。我和儿子去车站接他，不料车站宣布那列火车当天不能到达了。我彻夜未能成眠。天亮时刚刚躺下休息，听到了叩门声。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找玛丽娅·维涅季克托芙娜！'我打开门。走进来一个上了年纪的胖男子，穿着外套，戴着呢帽。他什么也没说，径直走进屋里。我因为刚有些睡意，好像也忘记了自己正在等待丈夫。我们两人呆呆地站着。他问：'你没有认出我来？''没有。'我心里还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大概是个什么亲戚吧。我亲戚很多，也都多年不见了。这时，我看到他那紧闭的嘴唇，想起自己正在等丈夫——一下子就昏过去了。这时儿子回来了，他正在生病。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在这唯一的一间屋子里整整坐了四天，没有走出去一步。他和儿子两人很拘束，而我同丈夫也几乎没有谈什

么，只是一般的谈几句。他讲了他个人的生活，根本没有问及我和儿子这些年没有他是怎么活过来的。他又回西伯利亚去了，临别时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告诉他：我的丈夫早已死在阿尔卑斯山里了（战时他在意大利，是同盟国军队解放他的）。”

也有另一种比较愉快的会面。

可能你会遇见原先的看守或劳改营长官。突然，你会发现在切别尔津旅游基地担任体育指导的斯拉瓦是原先的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看守。或者米沙·巴克斯特突然在列宁格勒糕点商店里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那人也注意到他了。原来那是劳改营分部的长官古萨克大尉，现在换上了便服。“喂，你等等，你等等！你在我的什么地方蹲过吧？……噢，我想起来了，因为不好好劳动，我们还没收过你的邮包！”（是啊，他全记得！但是，他们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似乎他们就该永远骑在我们头上，目前只不过是短暂的间歇而已！）

还可能遇见（别尔斯基就遇见了）部队指挥员鲁迪科上校。是他当初为了避免麻烦，才匆匆忙忙下令逮捕你的。他现在穿着便服，戴着高贵的礼帽，俨然一个学者，一个受尊重的人！

也可能遇到你原来的侦查员，就是在侦讯中打过你，把你关进臭虫房的那个。他现在领取着优厚的养老金。例如赫瓦特，审讯并杀死伟大的瓦维洛夫的人，他现在就住在高尔基大街*。上帝呀，再别让我们遇见这种人吧！因为这只会打击我们的心灵，而他们倒是无动于衷的。

还有可能遇到你的告密者，就是那个送你进监狱的人。他现在也飞黄腾达了。天火雷电并没有惩罚他！那些回到故乡的囚犯

---

* 尼·伊·瓦维洛夫是苏联著名遗传学家，曾任遗传研究所所长。1940年被捕入狱，后死于狱中。高尔基大街是莫斯科的主要街道之一，这里的住宅在莫斯科被公认为第一流的。——译者注

必然会遇到告密陷害自己的人。有些心直口快的人愤愤不平地出主意说："喂，你上法院去告他！单单为了让他在公众面前现现原形也好嘛！"（也确实如此而已，不可能有更大的指望。现在大家都懂得这一点了……）但是已经恢复名誉的人只好回答说："唉，算了吧……唉，行啦……"

因为对这种案件的审判是朝着那个需要套上一百头牛拉的方向的。

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不耐烦地摆摆手说："让生活去惩罚他们吧！"

也只能这样。

作曲家赫某对肖斯塔科维奇说："这位勒女士是我们协会的会员，当初就是她把我送进监狱的。"肖斯塔科维奇激动地说："你写份控诉材料，我们把她从音乐家协会开除出去！"（想得可好！）赫某却连忙摆手说："噢，不！谢谢吧！当初揪着我这把胡子在地上拖来拖去。我可不想再来一次！"

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报复？格·波列夫诉苦说："原先把我关进监狱的那个坏蛋，在我被释放之后差一点儿又把我关进去！幸亏我及时地抛掉了家庭，离乡出走了，不然，说不定真就把我关进去了！"

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做法！这就是苏维埃式的做法！

什么叫做恶梦？什么叫做海市蜃楼？这一切究竟是过去？还是现在？……

一九五五年，埃夫罗伊姆逊来找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把一大本控告李森科的刑事控诉状递交给这位副总检察长。但萨林对他说："我们无权受理这个案件，请你去找党中央。"

苏联的检察长们从什么时候起变得无权受理案件了呢？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不早三十年变得无权受理呢？

洛佐夫斯基和谢廖金两人现在都很阔绰，就是他二人作伪证

把丘尔佩涅夫送进蒙古地牢的。丘尔佩涅夫获释后，约了一位共同在军队服役过的熟人，一起到莫斯科市苏维埃大楼中的生活服务部办公室去找谢廖金。那位共同的朋友对谢廖金说："让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位是和咱们在哈勒欣河一起战斗过的，记得他吧？""不，不记得。""他是丘尔佩涅夫。你不记得这个人？""不，不记得。战争把大家都冲散了。""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人后来的遭遇？""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真是个坏蛋，下流坯！"

也只能说这些！他们告到谢廖金所属的党的区委员会，两人听到的回答则是："这不可能！谢廖金的工作一直是很认真负责的。"

他会认真负责地工作！……

一切事情照旧，一切人也都照旧。雷声轰隆过一阵子，并没有落下几个雨点。

一切都照旧。以至于研究北方民族语言的专家 Ю·А·克雷诺维奇[①] 释放后又回到同一个研究所的同一个研究室，还同那些当年把他关进去的、仇恨他的人在一起工作。他还是要每天来上班，脱下外衣，同这些人坐在一起讨论。

这就好比把奥斯威辛死亡营的牺牲者和过去的警卫队长们放在一起开个杂货铺一样。

文学界也有大告密者。Я·埃尔斯贝格和列秀切夫斯基之流害死了多少人啊？！谁都了解这两个人，可谁也不敢碰他们。曾经策划过把他们赶出作家协会。白费力！更不必说撤销他们的职务了。根本谈不到开除出党。

一九二六年制定我国刑法典时，就认为用诽谤杀人要比用刀

---

① 提到克雷诺维奇，人们很中肯地说：从前的民意党人是由于自由流放到边远地方才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而克雷诺维奇则不然，他甚至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也一直是语言学家，他在科雷马甚至还曾企图研究犹加吉尔人的语言。

杀人的罪责轻得多，应该宽恕，所以对这种罪的量刑只相当于用刀杀人的五分之一。(是的，哪能设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会有人利用“诽谤”这种资产阶级手段呢！）其中第九十五条规定：对于有意诬告，提供伪证，并有：①对严重罪行的指控；②抱有私利目的；③伪造罪证行为的人，处以……两年以下的徒刑。也许就只判六个月。

起草这一条文的人要么是白痴，要么就是非常有远见的。

我认为他们是很有远见的。

从那时起，每次大赦（一九四五年的斯大林大赦，一九五三年的“伏罗希洛夫”大赦）都没有忘记把这一条包括进去。他们当然关心自己那些积极分子们嘛！

另外，不是还有个“时效”问题吗！如果说别人（根据第五十八条）诬告了你，那就不论“时效”了。而如果你诬告了别人，那么可以应用“时效”这一条，我们要保护自己人呀。

安娜·切博塔尔-特卡奇一家的案件是由彻头彻尾的假证词制造的。一九四四年，安娜本人，她的父亲和她的两个哥哥同时被捕，罪状是什么“杀害未婚妻”，而且是“政治性”杀害。三个男人全在狱中被折磨死了(都没有招供)，安娜在狱中被关了十年。而那个被“杀害”的未婚妻竟是安然无恙。安娜出狱后要求复审并恢复名誉，又花了整整十年。甚至到了一九六四年，检察长对她的答复仍是：“你被判罪是正确的。复审没有根据。”后来终于给安娜恢复了名誉。这时，不知疲倦的斯克里普尼科娃替安娜写了一份控诉状，要求追究伪证者的法律责任。苏联检察长格·捷列霍夫[1] 对此诉状的答复是：鉴于**时效**，此案无法追诉……

二十年代曾经把一些在四十年前根据沙皇法庭的判决处决过民意党人的无知庄稼汉搜索出来，揪到法院，判处枪决。那些庄

[1] 就是担任审理加兰斯科夫-金兹伯格（金兹堡）案件的人。

稼人不是自己人，对他们不必讲“时效”。今天的告密者是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嘛！

囚犯们获释后来到的自由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多少众所周知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没有受到审判，没有受到惩罚呀！历史上难道能找到这种先例吗？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东西可期待呢？从这种恶臭中能生长出什么东西来呢？

古拉格群岛这个恶毒的主意结出了多么丰硕的果实啊！

第 七 部

斯大林死后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的事。”

《新约·启示录》

第九章第二十一节

第　一　章

事到如今，左右为难

当然，将来人们是会谈起我们的。我们对此并没有丧失希望。因为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其真相迟早总会为人们所知。但是，原来设想此事绝不会很快发生，总要等到我们这些人大部分去世之后，而且将是在环境完全改观的时候。我把自己看作古拉格群岛史的编纂者，一直在写啊，写。可是，对于生前能看到它问世，我并没有抱多大希望。

历史的进程经常以其意外转变使我们吃惊，就连最有洞察力的人也不例外。我们未能预见到这一切将会怎样发生。并没有觉察到有什么迫不得已的理由。可是，竟然一切都突然颤动起来，开始有所进展了。于是，刹那间，通向这个社会的深渊的门扉仿佛微微开了一道小缝儿，而且有两三只真理的小鸟居然趁着那门扉还没有重新长久地关闭之前得以飞了出来。

我有多少前辈未能写到底，写出的东西未能保存下来啊！他们未能坚持到最后，未能攀登到上面来！而这种幸福却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得以在铁门扉重新关闭之前，从它的缝隙里把极少的一点真相第一次传递到外面去。

立刻，这点真相，好似由反物质所包围的物质一样，爆炸了！

它爆炸了，随之发生的是读者来信的激流滚滚而来，尽管这也是意料中的事。然而，接着便是报刊文章的激流冲过来了，但那激流是透过咬牙切齿声、压抑着憎恨和满心不快冲过来的，这样一些满篇赞扬俗套的官样文章委实令人厌恶。

当从前蹲过监狱的人们听到所有报纸一齐发出的这片叫好声，得知有一本关于劳改营的小说*问世并受到报界吹捧时，他们一致断定："这又是杜撰！难为他们想得出还要借这个题目来造谣！"的确，要说我们那些通常言过其实的报纸会突然热心地赞扬起真理来，这确实无论如何也很难设想！有些人则对我的那本小说干脆连看也不看一眼。

可是，当他们一旦开始读它的时候，却不约而同地迸发出一片呻吟声——那是喜悦的呻吟，也是痛苦的呻吟。于是，信件又像雪片一般飞来了。

这些来信我都保存着。我国同胞们是极少有机会说出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的，以前的囚犯尤其如此。要知道，他们曾经多少次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信念，曾经受过多少次欺骗啊！但是，这一次他们相信了：一个真理的纪元终于开始，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地说话，可以大胆地写作了！

但是，当然，他们又一次受骗了。这已是第多少次了啊！……

"真理取得了胜利，但是迟了！"他们这样写道。

实际上甚至比这还要迟，因为它根本没有取得胜利……

自然，确实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他们不肯在信尾署名

* 指本书作者于1962年底发表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小说发表后初期受到党政领导人及文艺界、新闻界的普遍赞扬。——译者注

（“余生无几，我还要自己保重呢！”），或者就在报纸上吹捧得最厉害的时候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很奇怪，沃尔科伏依*怎么会同意你发表这部小说的？我很不放心，你现在是否又被关进了加强管制工棚？请速回信。……”或者就干脆问道：“怎么搞的？怎么还没有把你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关起来？”

就是这样。是他们的捕兽夹子卡住了，一时没有发动起来。那么，沃尔科伏依之流该怎么办呢？只好也抄起笔来，也写信，或者就给报纸寄反驳文章。他们中间有些人还确实有点文采呢！

从这第二种来信的洪流中，我们懂得了应该怎样称呼这些人，也就是知道了这些人自己是怎样称呼自己的。过去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曾把他们叫做什么“劳改营的统治者”、“劳改营主人”或“劳改营首长”。不，他们叫“实际工作者”！噢，这个词可太漂亮，太妙了！要说是“契卡工作人员”吧，也不大贴切，于是他们自己找到了“实际工作者”这个词。

这伙“实际工作者”在信里写道：

“伊万·杰尼索维奇天生是个善于拍马的人！”

（B·B·奥列伊尼克，于阿克纠宾斯克市）

“舒霍夫***这个人既不使人同情，也不叫人尊敬！”

（Ю·马特维耶夫，于莫斯科）

---

* 沃尔科伏依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人物，是个中尉，在劳改营中担任生活管理员，为人凶残。这里是指沃尔科伏依所体现的苏联克格勃系统的势力。——译者注

** 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初次发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苏联《新世界》杂志的主编，曾为发表这部小说多方奔走。——译者注

*** 舒霍夫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对舒霍夫判刑完全正确……把囚犯放出劳改营外，他们有什么事可干?”

(В·И·西林，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

“对这些灵魂卑鄙的侏儒判刑太轻了!我丝毫也不可怜……这些卫国战争中的败类!”

(Е·А·伊格纳托维奇，于基莫夫斯克市)

“舒霍夫是个害人的老手，是一只狡猾残酷的胡狼。他活着就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皮!”

(В·Д·乌斯宾斯基，于莫斯科)[1]

“作者不去描写那些最忠诚的人们在一九三七年是怎样死去的，却选择了一九四一年的劳改营来描写。可那时被关进劳改营的大都是些只顾自己的家伙。[2] 一九三七年的时候就没有像舒霍夫这类人。[3] 当时那些人是在忧伤中默默死去的，他们当时想的是：这是谁的需要?”[4]

(П·А·潘科夫，于克拉马托尔斯克市)

提到劳改营的内部制度时，这一类人在信中说：

“为什么要给不劳动的人那么多饭吃?他们的精力反正用

① 这位领养老金的乌斯宾斯基是否就是把自己的父亲(牧师)杀死之后，踩着他的尸体在劳改营里爬上高位的那个乌斯宾斯基呢?

② 是的，是些普通的非党群众嘛，战俘嘛!

③ 不，有的是!比你们这些人还多!

④ 看，多么理智而深沉的思想!不过，顺便告诉你：他们当时也并不是那样默默死去的，而是在不断表示悔过和苦苦求饶声中死去的。

不完……我看，对待犯人们还是过于宽大了。”

（C·H·戈洛温，于阿克摩林斯克市）

“至于伙食标准，不应忘记他们不是在疗养院。他们只应通过诚实的劳动来赎罪。这部小说侮辱了内务部的士兵、军士和军官们。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这个人民被写成了什么样子……？——被写成了一群‘鹦鹉’、‘糊涂虫’、‘笨蛋’。”

（巴祖诺夫上士，于奥伊米亚肯市。五十五岁，在劳改营服兵役到老）

“劳改营里滥用职权的行为比其他任何苏维埃机关（!!）都少。我敢肯定，现在劳改营里的制度比从前严厉多了！

警卫人员并不知道是什么人、为什么事在坐牢。”

（卡拉哈诺夫，于莫斯科近郊）[①]

“我们这些执行法纪的人也是人，也希望自己有一番作为：我们也并不是总向那些倒下去的人开枪的，而且我们自己也冒着危险呀。”

（格里戈里·特罗菲莫维奇·热列兹尼亚克）[②]

“这部小说里的一整天充满了囚犯们的恶劣行为，根本看不到行政当局的作用……要知道，劳改营里管制囚犯的制度严格并不是由于个人迷信的结果，那是在执行法院的判决嘛！”

① 我们吗？——“我们只是在执行命令。”“我们不知道。”

② 这位热列兹尼亚克还记得我本人呢。他说我“这个人是跟一批戴镣铐的犯人一起押来的，性格乖僻，好斗。后来他被押往杰兹卡兹甘，并同库兹涅佐夫一起领导过囚犯暴动……”

（A·H·格里戈里耶夫）

“照索尔仁尼琴的描写看，似乎劳改营内整个工作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党的领导。可是，要知道，那时也和现在一样，劳改营里也是有党的组织的，是党组织在凭着良心安排整个工作的。”

（而实际工作者们则）“只是按照规章、指示、命令的要求执行任务而已。而且，就是这些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人们现在还在那里工作（!!）[①]，或许人员还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十。这些人工作出色，多次受到表扬，他们一直被列为优秀工作者。”

“此书引起了内务部全体人员的极端愤怒……这部作品中所包含的仇恨之深，简直使人惊讶……它有意煽动人们反对内务部的情绪！为什么我国有关机关竟允许对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如此横加侮辱？……这太卑鄙了！”

（安娜·菲利波芙娜·扎哈罗娃，于伊尔库茨克州。本人自一九五〇年在内务部工作，一九五六年入党。）

请读者听听吧！听听吧！“这太卑鄙了！”她从内心发出了这种号叫。在她看来，把群岛上的人折磨了四十五年则是不卑鄙的。而现在发表了一部小说就卑鄙了！

“我们从未看到过这么卑鄙龌龊的东西……而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和我有同感的人非常多，我们的名字是

①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证词。

一群。”[1]

简单地说吧：

“所有图书馆和阅览室均应立即全部撤掉索尔仁尼琴的这部小说！”

（A·库兹明、于奥廖尔）

这一点确实照此办理了。不过是逐渐地进行的。

“本来就不应该印刷出版这本书，应该把材料作为罪证送交克格勃机关！”

（匿名[2]，十月革命同龄人）

事情也确实大致是这样发展下去的，算是被这位“同龄人”猜中了。

还有另一位匿名者来信，不过这次是一位诗人：

“俄罗斯，你可听见，
我们的良心
洁白无瑕！”

又是这“该死的匿名者”！让我们知道一下也好呀，你究竟是一个亲自开枪打死过人的，还是下过命令送人去死的？或者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正统派分子？哼，匿名！一个洁白无瑕的匿名者！……

---

[1] 是的，是“一群”，不过你们在仓促间忘记了找出福音书来查对一下引文，那“群”原来是鬼群呀！……

[2] 这个人为了防备万一，还是没敢说出自己的真名。在将来嘛，鬼知道风向还会转向哪一方？……

最后，也有人提出了广泛的哲学见解：

“历史是从来都不需要‘过去’的（!!），而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现在尤其不需要它。”

（A·库兹明）

“历史不需要过去”?! 请看这些正统分子们竟说出了什么话！那么，历史需要什么呢？它需要未来，是不是？怪不得这一类的人正在编写历史呢！……

如今，面对着他们所有的人，面对着这个无知的整体，该怎样进行辩驳呢？现在该怎样向他们解释呢？……

要知道，真理似乎永远是羞怯的，在过于强大的无耻谎言的压力下，真理往往就沉默不语了。

由于国内长时期不能自由交流消息，在社会上整批整批的人们之间，几百万人与几百万人之间已经造成了一道互不了解的鸿沟。

我们简直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人民了，因为我们大家确实在使用不同的语言讲话。

*　　　　*　　　　*

无论如何，总算实现了突破！那堵谎言之墙看来曾是建造得绝对坚固可靠，永远不会倒塌的，可是，现在它竟也裂开了一道缝，让消息冲出去了。直到昨天我们国内还是没有什么劳改营，不存在什么古拉格群岛的，而今天，全国人民和整个世界都看到：有劳改营！而且是法西斯式的！

怎么办？？经营了多年的、善于颠倒是非的老手们！老牌吹捧家们！难道你们居然会忍受这一切？你们居然退缩？你们竟会屈从、示弱？……

不，当然不会！这些善于歪曲事实的老手们自己一马当先冲

向了这道裂缝！他们似乎多年来就在等待着这裂缝的出现，准备着用他们那长着灰色翅膀的躯体去填塞它，并且快乐地——正是快乐地！——扑扇着翅膀把这道裂缝遮住，唯恐惊讶的观众透过它看到古拉格群岛本身。

他们一瞬间想到的，下意识地发出的第一声喊叫就是：这一切绝不会重演！光荣归于党！这一切绝不会重演！

好一些聪明人啊！不愧为填塞漏洞的专家！因为，既然说了“这一切绝不会重演！”，那么这本身也就自然意味着：今天没有这一切！既然将来绝不会再有，今天当然也就不存在啰！

他们在裂缝处那么巧妙地扑扇着翅膀，以至于刚刚进入视野的古拉格群岛的影子立即变成了海市蜃楼——它并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嗯，也许过去存在过那么一阵子，但……但那是由于个人迷信嘛！（这个“个人迷信”可委实方便得很呢！只要一提这个词，就似乎已经把某个什么问题解释清楚了。）那么，什么才是真正存在的、始终存在的、能够填满裂缝的、今后也将永远存在的东西呢？那就只有“光荣归于党！”了。（最初的“光荣归于党”似乎是针对“这一切绝不会重演！”说的；而后来，几乎忽然变成了似乎也是因为古拉格群岛本身的存在才“光荣归于党”的。这二者慢慢混成一片，使人分辨不清了。人们还没有拿到刊载那部小说的杂志，就已经听见到处是一片：“光荣归于党！”的喊声了。人们还没有读到怎样用短皮鞭抽人的地方，已经从四面八方响起一片“光荣归于党！”的声音了。）

这些聪慧的撒谎天使，这些谎言之墙的捍卫者，就是用这样巧妙的应急措施度过了第一关。

但是，裂缝总还是留下来了。所以，这些舞动翅膀的人自然也不会就此罢休。

于是他们采取了第二手——偷换！就像魔术师几乎不用方巾遮盖就立即

把母鸡换成橙子一样，他们偷换了整个群岛，使群众看到的已不是小说里描写的古拉格群岛，而是比它要美好得多的完全另外一个群岛了。起初，他们的这些作法还相当谨慎（他们误以为小说的作者是天子身边的人了），因此搞偷换的同时仍不忘对这本小说连连吹捧。比方说发表一些群岛“目击者”的叙述啊，有关劳改营中的共产党员的记事啊，这些党员固然“……并不交党费，但却常在夜间秘密召开党的会议（?），讨论政治新闻……他们因为小声吟唱《国际歌》而被眼线们告密，蹲禁闭，吃尽苦头……班杰拉分子和弗拉索夫分子们对真正的共产党员横加侮辱，伙同（!）劳改营当局共同残害这些人……但是，这一切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里都没有得到反映。看来，在这种可怕生活中还有某些东西是作者所未能观察到的。”[1]

尽管书评作者并没有在劳改营呆过，但他却“观察到”了！看，这手段难道还不够巧妙吗？劳改营里的一切原来……不是苏维埃政权搞的！不是党搞的！（照这么说，法院大概也不是苏维埃的吧。）原来是弗拉索夫分子和班杰拉分子伙同劳改营当局在劳改营横行霸道！（可我们相信了扎哈罗娃的话，以为劳改营头头们是持有党证的人，而且一直是有党证的呢！）

也不是所有这些人都能在莫斯科报纸上发表这类文章的！例如，我们梁赞州的作家头子H·顺季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苏联新闻社，也是为西方提出了对古拉格群岛的新看法，但是这个谈话没有被引用（会不会苏联新闻社也曾是伙同的？……）。

“应该诅咒国际帝国主义，是它的阴谋促使制造了这些劳改营！”

够聪明的！这个提法可真妙！但是，它没有行得通……

那就是说，一般说来劳改营本来就是某种外国货色，是异族的东西，不是我们的国货：或者是贝利亚分子搞的，或者是弗拉索夫分子搞的，要么就是德国鬼子搞的，反正，天知道！而我们的人则只是被关在里面受折磨。而且所谓“我们的人”也并不是所有我们的人，要报道所有我们的人恐怕动用起全部报纸还不够，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人”只指共产党员们！

读者已经同我们一起阅历了古拉格群岛的各种生活细节，难道您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小声唱《国际歌》的地点和时间吗？从伐木场收工回来，跌跌撞

---

[1] 见1962年12月8日《莫斯科真理报》。

撞地走在路上，大概不会唱歌吧？如果你是整天呆在"储藏室"里的，那又自当别论了……

再说，党员们夜间开会讨论些什么？（话又说回来，要是你们都住在"储藏室"或者在卫生室当辅助人员（杂役）的话，那当然就可以在白天开会，为什么偏要等到夜间呢？……）人们在会上表示对中央的不信任吗？那你们简直是发疯了！表示怀疑贝利亚吗？这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是政治局委员！不信任国家安全机构？不行，它是捷尔任斯基亲手建立的！怀疑我们的苏维埃法院？这就等于不相信党，提一声都使人不寒而栗。（要知道，错误仅仅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因此，你选择朋友还必须谨慎些，他们都是正确地被判刑的嘛！）

一个普通汽车司机A·P·扎戈鲁伊科没有相信这些翅膀的扑扇声，他写信给我说：

"并非所有人都像伊万·杰尼索维奇那样吧？那么，其他人怎样呢？他们并不服服帖帖吗？或许劳改营里还有共产党员们领导的什么'抵抗支队'吗？那他们抵抗谁呢？反对党和政府吗？"

那简直荒谬绝伦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抵抗支队"?!……可是，如果没有，开会讨论什么？讨论交不交党费的问题？可是党组织并没有来收呀！讨论政治新闻？那为什么必须开会呢？两个信得过的人（那可得好好想想，究竟谁信得过！）凑到一起，一交头接耳不就足够了吗？剩下就只有一件事要在劳改营里开会了：讨论我们的人如何才能占据并且把持住所有的杂役职位，而把那些不是我们的人，不是共产党员的，统统踢开，随他们去烧死在伐木场的冰"炉膛"里吧，随他们憋死在铜矿的毒气室里好了！

此外，实在想不出那些共产党员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事。

由此可见，早在一九六二年，当小说单行本还没有送到读者手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决定了日后逐渐偷换古拉格群岛的总路线。而当他们渐渐得知作者并不是天子身边的人，而且完全没有后台时，当他们得知甚至作者本人也不过是个幻影时，那些善于颠倒是非的老手便肆无忌惮了。

他们回过头来又看了看那部小说，这才犹如大梦初醒：哎，我们原先害什么怕呢?! 我们干什么要奴性十足地吹捧它呢？"他（索尔仁尼琴）描写的人物是很不成功的……他没有勇气去窥视人物的灵魂。"他们又分析了一下主人公，也发现：这个人物原来是个"典型的非英雄！"舒霍夫这个人物是

"孤独的"、是"远离人民的"，是个只为填饱肚皮而生活的卑微小人，而且他并未进行斗争！最使大家愤怒的正是这一点：对呀，为什么舒霍夫不进行斗争?!请问，是让他去推翻劳改营制度呢?还是希望他拿起枪来到什么地方去?对这一点他们却又不予回答，只是指责：他为什么不斗争?!（这时我已经写好了关于肯吉尔暴动的剧本，但是我没敢打开我的稿卷发表它……）

他们自己没有向我们显示出哪怕一"尔格"*的斗争精神，现在却以"吨公里"这样的单位来要求我们了！

事情总是这样的：战事过后勇士多。

"说实话，舒霍夫的兴趣十分低级。而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最可怕的悲剧在于把一些真正先进的苏联人，把我们国土上的精华，我们时代的真正的英雄们关到铁丝网里去了。"这些人"也并不反对偶尔多'搞到'一份烂菜汤吃……不过他们并不是卑躬屈节地去取得它的。"[1]（那么，是怎样取得的呢？这倒很有趣，怎么搞到的?）

"索尔仁尼琴把重点放在描写折磨人的艰苦环境上面，离开了严峻的生活的现实。"而生活的现实，据说，就在于那些"经过斗争的烈火考验的"、"列宁的党培育出来的"人们……怎么样了呢？斗争了吗？不，没有……他们"一直深信无法无天的黑暗时代终将过去！"

"有些作者所描写的饥饿的痛苦是令人信服的。但是，谁能否认思想上的痛苦甚于饥饿百倍呢？"[2]（尤其是在你没有尝过饥饿痛苦的情况下！）

而他们的所谓"思想上的痛苦"，就是他们在思考：将会发生什么事？怎样发生？什么时候宽恕我们？什么时候召唤我们重返领导岗位？

整个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不就只是讨论了一个给什么人树碑立传的问题吗？是给死去的共产党员们立碑！那么，死去的普普通通的伊万们呢？给他们也立碑吗？不，连提都没有提到他们一句，他们的死一点也不可惜嘛。（《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所以成为一颗炸弹，就在于它给他们塞进去一个普普通通的伊万。）

---

* "尔格"——物理学中的功的微小单位，一尔格等于一达因的力作用于物体，使它朝力的方向移动一厘米的功。——译者注

① 见1964年8月27日《哈萨克斯坦真理报》。

② 见1964年9月27日《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工人报》。

他们在大墙裂缝前飞舞，并不知疲倦地扑扇翅膀已经快二年了。善于编织神话蛛网骗人的人在这期间就编织好了这种蛛网。例如，《消息报》(1964年4月25日)就担负起了教导我们如何斗争的工作：原来我们应该从劳改营里逃跑！(可惜我们那些逃亡者们不知道该文章的作者И·叶尔莫洛维奇的住址。否则不是可以跑到他家去躲一躲吗？……不过，总的说来，这个主意是有害的：如果逃跑成功，不是有损于内务部的声誉吗！）好吧，就逃跑吧，可是，以后怎么办呢？

《消息报》编造说，一九四四年春天有个名叫阿列克谢的人（不知为什么又不肯说出此人的姓氏）似乎从雷宾斯克劳改营里逃到前线去了。在前线，他被一位负责政治工作的少校（"使劲摇着头驱散了自己的疑虑"）很高兴地录用了，让他在部队服役（这位少校的姓氏也不清楚），而且不是录用他去干点什么普普通通的工作，而是把他派到团的侦察部队去，而且放他去执行侦察任务！(好，就请上过前线的人说说看，难道那个少校不怕丢掉他的肩章？不珍惜自己的党证？要说是一九四一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这样的冒险也许还有可能，可是到了一九四四年，正在建立起严格的汇报制度，而部队里已有除奸组织"死灭尔施"的时候，这位少校敢这样作吗？）而且这个阿列克谢居然获得了一枚红旗勋章！(请问，呈报授勋的文件怎么填的？）战后阿列克谢才"急忙转入了后备队"。

第二个例子甚至是有名有姓的了：德国共产党人克萨维尔·施瓦尔茨缪勒，一九三三年从希特勒德国逃来苏联，一九四一年因为他是德国人而被捕（这些倒像是真的）。好了，下面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在劳改营里进行斗争了！正式的通知书上写着：此人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死于奇斯托波尔（进劳改营不久就死了，特别是对外国人来说这倒很像是真实的），于一九五六年给死者恢复了名誉。那么，他到底在哪儿进行了斗争呢？是这么回事：据传说，一九六二年有人（一个老太婆呗！）在里加市好像是看见过他。那就是说，他没死，而是逃跑了。于是人们急忙去查阅劳改营的死亡者登记卡片（一张胡乱撕下来的纸）。谁想到：那上面竟没有死者的照片！哪会有这种事？这就是说，很清楚：他是逃跑了，而且后来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斗争！那么他怎样斗争的呢？不知道。对谁斗争呢？不知道。那他现在为什么还不肯公开自己的身份呢？还是不知道。

编造这类童话给我们听的，竟是堂堂权威的政府机关报！

他们是想用这类童话的蛛网遮住已经显露出来的古拉格群岛的影子，不让我们看到它！

在同一份《消息报》上还刊登过另一个童话：就在不久前，有一个人得知给他死去的父亲恢复了名誉。那么，此人，这个做儿子的，此刻的主要感受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父亲当年无辜被残害致死而感到愤怒吗？不是。相反，他"感到高兴"：感到"轻松"：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无愧于党"时，他"该有多么幸福啊！"

人们大编其谎言的蛛网，各显其能。这种蛛网一层盖一层，一套连一套，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个世界给遮住了，使群岛变得模糊不清了。

当他们加紧在裂缝旁边扑扇翅膀、编织这一切的时候，在里面，在大墙的后面，正在搭起脚手架，一些长于此道的"泥瓦匠"正在爬上去：有资格加入这个泥瓦匠行列的还必须多少能称得上是个作家，还得是亲自受过点苦难的，自己在劳改营里呆过的才行；不然的话，连傻瓜也不会相信他们写的东西。爬上去的有：鲍里斯·季亚科夫，格奥尔吉·谢列斯特，加丽娜·谢列布里亚科娃，阿尔丹-谢苗诺夫。

他们那股热情就不必说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急于上去填塞这道裂缝，在还没有搭起脚手架的情况下他们就自己跳起来，把灰浆抛向裂缝，可惜够不着……

谢列布里亚科娃最卖力气，她搬来一整块石板去堵它，石板很大，看来堵住裂缝还有余呢——她写了一本小说，描写审讯共产党人时的惨状：怎样挖他们的眼睛，怎样用脚踩他们。但是，她热心过度了，人们对她说：你这块石板不合适，不对路，它只能造成新的裂缝。

那么格·谢列斯特呢？这位前全俄肃反委员会部队的旅长早就把自己的小说《天然矿》推荐给《消息报》了。但是，当时这类题材还没有开禁。他算什么人?!现在呢，在裂缝出现之前十二天，当人们已经看清将会在什么地方出现裂缝时，《消息报》便把谢列斯特的这贴膏药赶紧贴在那里了。但是膏药没有贴住，裂缝还是发生了，就像没有贴过膏药一样。

墙上裂缝处还在冒烟。于是季亚科夫又匆匆跑来，抛出自己的《杂役札记》拼命往缝里塞。不料拉克申*的评论文章又像砖头一般打在他的头上：季

---

* 此人当时任《新世界》杂志编委，曾支持索尔仁尼琴。——译者注

亚科夫被揭露了，原来他在劳改营时一向是只顾自己温饱，不管他人死活的。

不行，这样可不行。必须想个根本对策才好。他们这才认真地开始搭脚手架。

为此花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这期间就暂时靠报刊上的文章勉强招架着，蝙蝠们继续不断地扑扇着翅膀。一旦搭好了脚手架，装好了吊车，弥补裂缝的工作就全面铺开了：一九六四年七月发表了季亚科夫的小说《遭遇》和阿尔丹-谢苗诺夫的《断崖上的浮雕》，九月又发表了《科雷马纪实》。同年，在马加丹州还出版了维亚特金的小说《两次诞生的人》。

这就行了。裂缝算是堵塞住了。并且在堵塞处的正面画上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图画：棕榈树，海枣树，躺在海滨穿着游泳衣的岛上居民。这是古拉格群岛吗？倒也有点像群岛。那么，是不是被人偷换了？是的，是被偷换了……

对于所有这些书，我在前面谈到那些正统派分子时（第三部，第十一章）已经提到了。而如果我与他们之间的分歧仅仅止于对文学作品的评价，那我就根本没有必要再评论这些东西。可是，既然他们编造的谎言涉及古拉格群岛，那我就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他们在什么地方进行了伪装布景，尽管花费很大力气读完本书的读者很可能自己也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

他们的第一项，也是主要的一项谎言是：在他们的古拉格群岛上**没有关押着普通平民，没有我们的普普通通的伊万们**。不管这些作者是单独地还是共同想出了这一点，但他们的谎言十分一致，即把群岛上的囚犯分为两大类：1）诚实的共产党员（其中又把"热情的非党共产主义者"单独分开）；2）白匪—弗拉索夫分子-伪警察—班杰拉分子（大杂烩）。

但是，实际上，上述各种人加在一起至多不过占劳改营囚犯总数的百分之十至十五，其他的百分之八十五却在他们笔下不见了，失踪了。而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则是普通的农民、知识分子和工人，是整个犯了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人及其他无数不幸的所谓"扰乱社会治安犯"（即偷了一团线或用衣襟包了一些麦穗回家的人）们。这些人之所以在作家们笔下"失踪"，是因为这些作家抱着一片赤诚而没有看到自己苦难的人民！在他们看来，这些芸芸众生既然从伐木场下工回来时没有小声哼唱《国际歌》，那么这些人实际上等于不存在。谢列斯特在他的小说里隐约提到某些教派的女信徒（甚至没有提男信徒，因为他在男囚劳改营里没有见过信徒！），或者还在什么地方提到了某个

微不足道的破坏分子（即被当作破坏分子的人），还有一个小小的普通犯，如此而已。被放逐到边远地区的多少民族在他们笔下也不见了。其实，按季亚科夫蹲劳改营的时期来说，他至少应该看到过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强制迁移去的人吧？不，没看到！（他们还恨不得把西部乌克兰人也都藏起来，但因为西部乌克兰人过于活跃，他们没做到。）

群岛土著居民的整个光谱在他们笔下全模糊了，只剩了两条边线！因为这是描画图式所必需的，没有边线就画不出图式来了。

在阿尔丹-谢苗诺夫所描写的囚犯队里唯一出卖灵魂的家伙是什么人呢？是小说人物中唯一的农民杰维亚特金。在谢列斯特的《天然矿》中谁是头脑简单的傻瓜？又是那里唯一的农民戈卢博夫。看！这就是他们对待普通群众的态度！

他们的第二项谎言是：要么根本**没有劳改营的劳动**，要么那里的劳动就是既不可怕，又不累人、不伤人的轻松工作。他们书里的主人公通常都是不参加真正劳动的看守帮手（杂役），这些人整天呆在储藏室，坐在会计室的办公桌旁，或者就在卫生所里混日子。（谢列布里亚科娃的小说里描写了十二个囚犯，都住在医院的一间“称作共产主义室的”病房里。试问，是谁把这些人集中到一起去的？为什么住在这间病房里的全是共产党员？难道不是互相凭着关系拉到那里去休养的吗？……）而实际上，劳改营里最主要的“吸血鬼”就是那每天十至十二小时的沉重劳动。这劳动也就是充满古拉格群岛上每日全部生活的全部内容。

他们的第三项谎言是说**饥饿**并没有吞噬劳改营的囚犯，并没有每天夺走十来个患糙皮病和营养不良症的人的生命。那里没有人在泔水池里捞东西吃，没有人需要考虑：*该想个什么办法活过今天*。（季亚科夫毫不在意地说：“劳动改造营里的制度还算是比较宽大的。”那么，请你本人也去在这宽大的制度下蹲一个时期试试看！）

他们这三条谎言足以彻底歪曲古拉格群岛的生活现实，使真实性荡然无存，真正的三维空间完全消失了。这样，作者们就可以按照他们总的世界观发挥各自的想象力，像搭积木、绘画、绣花、编织一样，随心所欲地写作了：在一个臆造的世界里是什么都能办到的。如今便可以用许多篇幅去描述主人公的崇高思想（独断专行何时结束？何时才能把我们召回领导岗位？），描写他们对党的事业如何忠诚，如何坚信党一定会逐渐纠正这一切错误。也可以描述囚

犯们认购公债时的欢乐情绪。(应该认购公债,而不要留着钱去小卖部买东西吃!)他们就可以把经常沉默无声的监狱描写成充满谈笑声的地方,(卢宾卡监狱的理发师竟会急于打听季亚科夫是不是共产党员……简直胡说!)也可以在囚犯点名时插进一些从来没有提问过的问题,("是党员吗? ……担任过什么职务? ……")可以编造一些不会使人发笑,而只能引起呕吐的所谓"笑话"(季亚科夫编造说):囚犯竟去向自由民的党委书记告状,说有一个自由民诬蔑了他这个囚犯,这位党员!(试问:哪个驴耳朵听得进这类话?……)或者,阿尔丹-谢苗诺夫就编造说:一个走在被押解的队伍中的囚犯(基洛夫的老战友,高傲的被得拉科夫)竟敢迫使整个囚犯队伍在途中转向列宁纪念碑并脱帽致敬,连押解的士兵也不得不摘下帽子!!(请问,这时士兵们用哪只手端着冲锋枪呢?)……

而在维亚特金的笔下,一群来自科雷马的小偷竟也在派工地点自动脱帽悼念列宁。纯系胡诌!(即使真有其事,这也不会给列宁带来多少光彩。)

谢列斯特的《天然矿》则更是一篇彻头彻尾的笑话。究竟要不要把找到的天然矿交给劳改营当局?要考虑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有不顾一切的勇气:要知道,弄不好会被枪毙的!(甚至提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会被枪毙!)好了,人们交出了天然矿,而将军则反而下令对该作业班进行搜查。可想而知,如果不交出去会怎样?作者自己不是也提到隔壁的"拉脱维亚人班"吗,那个班在劳动地点和工棚里都受到搜查。所以,这里根本不存在要不要交出天然矿支援祖国的问题。问题是:为了这块天然矿值得不值得四个人去冒生命危险?小说的整个情节都是为了表现他们的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而臆想出来的。(当然,不被押解的工人们就不同了。而在阿尔丹-谢苗诺夫的小说里,偷天然矿的人既有民警少校,也有石油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副委员!)

但是,谢列斯特还是没有看准风向:他在描写劳改营的统治者时过于粗俗,甚至是流露了憎恨,这是正统派分子所绝对不能允许的。而阿尔丹-谢苗诺夫在谈到那个有名的恶棍、砂金矿矿长时,是这样说的:"他是个精明的组织者!"根据阿尔丹-谢苗诺夫的道德观来看,只要遇到一个好头头,在劳改

营里就能够愉快地劳动和轻松自由地生活了。[1] 维亚特金的调子也一样。他描写的那个科雷马的刽子手，"远北建设总局"局长卡尔普·帕夫洛夫，对于自己制造的惨祸要么就是"不知道"，要么就是"不明白"，或者就已经开始悔悟了。

为了尽量不露破绽，这些作者也不得不在自己画的布景上多少添上几笔真实的细节。于是，阿尔丹-谢苗诺夫描写押解士兵把囚犯采到的金子攫为己有，谁不给就收拾谁，全然不把制度和法律放在眼里；大部囚犯在零下五十三度的严寒中工作；小偷们在劳改营里享清福；青霉素等药品被头头们扣下来。而季亚科夫则描写了押送士兵的粗暴；他写道，有一次，在泰谢特火车站上，因为没有来得及摘下囚犯身上的号码，其他乘客得知后便纷纷把食物和香烟扔给囚犯们，而押运的士兵则把这些东西抢走；他还描述了节日前的严格搜查。

但是，作者们完全是为了取得读者信任才花费这些笔墨的。

至于他们的主要目的，评论家们已经说得很清楚：

"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警卫人员几乎全是野兽。而季亚科夫的小说则表明，警卫人员中也有不少人在痛苦地进行着思索。"（不过，什么也没有"思索"出来。）

"季亚科夫把生活中的无情的真实保留下来了……对这位作家来说，劳改营里的无法无天只是一种……背景（!），主要的是他表明了苏维埃人在肆虐的暴政面前没有低头……季亚科夫也看到了一些诚实的契卡人员，他们在建立功勋，是的，正是在建立功勋！"

（这"功勋"就是把共产党员们安置在好位置上。同时，作家也在囚犯——共产党员科诺科京身上看到了这种"功勋"，这个人"尽管受到无理判决和凌辱……失掉了自由……但仍继续从事他的药剂师的工作！"他的功勋就在于：不给人以借口把他赶出卫生所，不去干一般劳动。）[2]

---

① 给人的印像是：阿尔丹-谢苗诺夫很了解那些自由自在的劳改营统治者的生活，看到过他们的住处；但他对于囚犯们的生活则所知甚少。所以，他常常有一些荒唐可笑的叙述：浸礼教派信徒们"游手好闲"；押解队的一个鞑靼人士兵给了鞑靼人囚犯一点吃的，因此别的囚犯就断定那个鞑靼囚犯是个眼线！其实，人们绝不会作出这样的判断，因为囚犯们都知道押送士兵是临时派来的，士兵无须豢养眼线。

② M·恰尔内：《共产党员毕竟是共产党员》，1964年9月15日《文学报》。

季亚科夫的小说怎样结尾的呢?请听:"一切令人沉痛的东西都已成为过去,"(他是无须怀念死者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又都回来了。""什么也没有被剥夺。"

阿尔丹-谢苗诺夫则说:"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我们并不感到委屈。"光荣归于党!正是党消灭了劳改营嘛!(可说是诗一般的结尾了!)

不,难道党把劳改营消灭了吗?……没有留下点什么吗?再说,这些劳改营到底是谁建立的?……对此他们就绝口不谈了。

在贝利亚时期究竟存在不存在苏维埃政权?怎么出现了这种事?掌权的是人民,而人民竟然容许对人民实行这样暴虐的统治?

这些作者是无须考虑自己那份口粮的,他们也不必劳动,而只是专门在那里思索着深奥问题。那就请你们回答一下吧!

但他们不吭声,一片沉寂……

这就行了。裂缝上的窟窿已经堵塞住了,涂上了颜色(戈尔巴托夫将军还给它涂上了一层颜色)。这样就可以说墙上根本没有出现过窟窿。至于古拉格群岛本身,即使它出现过,那也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微不足道的、不值得注意的。

还需要别的吗?为了预防万一,还可以由新闻记者们再来修饰一下。于是,尽心尽力的(除了文学之外什么也不放过的)《文学报》便委派米哈伊尔·别列斯京斯基到叶尔采沃车站去了。原来这个人也是有过坐牢体验的。可是他为群岛上的新统治者所深深感动了!他说:"简直无法想象今天管理着劳动改造机关和监禁场所的人们!他们同沃尔科伕依毫无共同之处[①]……现在管理着这些地方的是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严厉,但是心地善良,为人公正。当然,不能把他们想象成无翼的天使……(这种看法显然还是存在的……——作者注)铁丝网和岗楼,很遗憾,目前还是需要的。但是军官们高兴地介绍说:'"人员"补充是越来越少了。"[②](他们高兴什么呢?是因为担心工作维持不到退休年龄而不得不调换岗位吗?)

现在剩下的古拉格群岛只是很小的,袖珍式的。但它是十分需要的。何况连它也像冰块那样正在融化掉呢。

---

① 这使我们想起A·扎哈罗娃的话: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人现在还在那里工作。

② 1964年9月5日《文学报》。

堵塞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看来还有一些热心的人拿着瓦刀、排笔，提着满满的灰浆桶往脚手架上爬来。

于是，只好对这些人喊叫：

"去！回去！根本不许再提起这件事！要干净、彻底地忘掉它！没有过什么古拉格群岛！无论好的坏的，都根本没有存在过！绝对不许再提它！忘掉！"

总之，他们最初的对策是忙忙乱乱地扑扇翅膀。

第二步是彻底牢固地修补裂缝。

第三步对策是忘却。

外界了解古拉格群岛的权利又回到原先的、一九五三年的状态，即毫无所知。

现在，任何一个文学工作者又可以放心大胆地描写改造刑事犯的"佳话"了。或者，又可以去拍摄军犬拼命地向人扑去，把他撕裂的影片了，

一切都应该做得像大墙上根本没有出现过裂缝那样。

而被诸如此类的忽左忽右的摇摆弄得晕头转向的、疲惫的青年们，也就只好对这一切都把手一摆，置之不理，心里说：大概也不曾有过什么"个人迷信"吧，不曾有过什么恶梦般的恐怖吧，也许这些全都照例是一派胡扯?!于是，他们就跳舞去了。

俗话说得好：打你时，你就拼命叫；打完之后，再叫也没人相信了。

* * *

赫鲁晓夫抹着眼泪批准出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时候，他坚信：那里讲的全是斯大林时期的事，在**他赫鲁晓夫的政权**下没有这些东西。

同样，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为该书得到最高当局批准而奔走的时候，他也是真诚地相信：书中讲的全是过去的事，这一切都永远地过去了。

是的，对于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所接触的整个首都舆论界当时确实是这样看待生活的：现在解冻的时期来到了，看，现在不再抓人了，已经开过两次净化性的党代表大会，

许多一直杳如黄鹤的人们也回家来了，而且人数很可观！粉红色的、美丽的、恢复声誉的烟雾把整个古拉格群岛笼罩住，使它完全隐入迷雾中了。

但是，我呢 我自己呢?！我不是也受到了这种影响吗！而对我来说这就是不能原谅的了！要知道，我当时并不是要欺骗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呀！我也曾真诚地相信我拿给他的小说里讲的……全是过去！莫非我的舌头忘掉了烂菜汤的滋味？可我确曾发誓永不忘记它的呀！难道我还没有彻底认清那些养狗人的本性？可我在决心成为古拉格群岛史编纂者的时候，是自信已经认识到古拉格群岛是我们这个国家本身的产物并为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呀！“事情容易记不清，好了疮疤忘了疼”？我可是确曾坚信自己绝不会受这条规律支配的呀！

但是，我竟然忘了疼！竟然落入了陷阱！竟然信以为真了……我也相信了宗主国的慈善。相信往后自己的新生活会是顺遂的。加之当时从那里回来的一些朋友们的谈话，都说确实缓和了，似乎是制度放松了！说是正在不断释放人！营区一个个关闭了！内务部也在精减人员……

不！我们都是尘芥！我们是受尘芥规律支配的。任何分量的痛苦都不足以使我们学会永远感受到共同的痛苦。而只要我们一天不超脱这种尘芥状态，地球上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变得公正，不管采取民主制度的形式，还是独裁制度的形式。

正因为这样，我收到那第三类来信，即**现在的**囚犯们寄来的信件时，就难免感到有些意外了，尽管这种来信才是最最理所当然的，才是本来应该首先期待的。

这是些用秃铅笔头写在揉皱了的纸片上的信，信封则是随手抓到的一张什么纸作成的，信封上的字往往是外界的自由人代写

的，也就是说，信是从“小道”投递出来的。今天的古拉格群岛通过这些信向我提出了它的反驳意见，甚至表达了它对我的愤怒。

这些信件也同样汇成了一片共同的喊声。不过，这个声音是在问：“那么我们呢！！??”

要知道，报刊上围绕我的那部小说掀起的一片鼓噪，是千方百计地适应狱外世界和国外的需要的，其总的调子是：“曾经发生过这类事，但这一切永远不会重演了。”

正因为这样，囚犯们便叫喊起来了：我们今天还被关在里面呀！条件还和原先一样，怎么能说不会重演了呢?!

各地的囚犯来信异口同声地说：“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时候起到现在，什么都没有改变！”

“囚犯读了您的小说，感到痛苦和委屈，因为现在一切仍旧是老样子。”

“既然斯大林时期颁布的判处二十五年徒刑的各种法律依然有效，那么到底什么东西改变了呢?”

“既然我们今天又在无辜坐牢，那么现在又是在搞谁的‘个人迷信’呢?”

“我们被藏在黑色烟雾中，谁也看不见我们。”

“为什么沃尔科伏依这类人至今仍然逍遥法外?……他们还在担任着我们的教育员呢！”

“从微末的看守到劳改营管理局的长官，全都同劳改营的存在有切身利害关系。看守人员为了罗织罪名、编造决定，便到处吹毛求疵，行动人员任意涂改囚犯们的案情材料……我们这些被判刑二十五年的人们就像是奶油甜面包，喂肥了那些生来就该教训我们的、少廉寡耻的德行家们。当初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在殖民者眼里也都不完全是人，我们现在不是一样吗？要想动员社会舆论起来反对我们，那是十分容易的，只须写上一篇《铁窗里面的

人》之类的文章[1]就足够了……第二天人们就会集会游行，要求把我们扔进炉里烧死。”

对。的确是这样。

“您采取的立场正是起了他们的后卫部队的作用！”——瓦尼亚·阿列克谢耶夫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更是有如晴天霹雳。

所有这些来信都使我这个自命不凡的人认识到自己愧对所有的人：确实怪我这十年来丧失了对古拉格群岛的痛切感。

对于他们，对于这些今天的囚犯来说，我的那本小说如果没有下文，如果我不继续把**他们的情况**也说说，那本书就不成其为书，那里所写的真实也就不成其为真实了。必须把它说出来。说出来是为了求得改变！如果只是说说，不谈实质问题，不能使人有所作为，那么这种话有什么用？那不是无异于僻乡黑夜里远方的犬吠声吗？

（我愿意把我这种议论献给我们那些现代派，告诉他们：我国人民向来是习惯于这样理解文学作品的，而且他们不会很快丢掉这种习惯。何况，难道应该丢掉它吗？）

于是，我清醒过来了。透过恢复名誉这层粉红色的芳香云雾，我又辨认出了庞大的、怪石嶙峋的古拉格群岛的真面目，看清了

---

[1] 1960年8月27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了卡秀科夫与蒙吕斯卡娅合写的文章《铁窗里面的人》。这篇由政府授意写的文章结束了古拉格群岛上那短暂（1955-1960）的温和时期。这两位作者认为：劳改营里的条件像是“慈善机关”，人们在那里“忘记了自己是在受惩罚”，“囚犯们不愿意考虑自己的义务”，“劳改营行政当局的权力还没有囚犯们的权力大”（？）作者们企图使人相信劳改营已经变成了某种“膳宿公寓”。（不知为什么那里换洗衣服、理发、使用探视室都不收费！）使两位作者分外愤慨的，是劳改营里竟然也实行起每周劳动四十小时的制度来，甚至还听说什么“劳动不是囚犯们应尽的义务。”（？？）因此，作者们呼吁：“应该建立起严酷的、艰苦的条件”，以使使犯罪的人害怕监狱（繁重的劳动，睡在没有草垫子的硬板床上，禁止穿便服，“关闭掉一切卖糖果的小卖部之类！”等等），还呼请取消提前释放的办法。（而“如果囚犯在劳改营里有违犯制度的行为，那就延长他的刑期！”）他们还呼吁：即使“在囚犯服刑期满之后，也不应该对他们发善心。”

它那布满岗楼的灰色轮廓。

我们的社会状况酷似一个物理场。这个场的所有力线都从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这些力线都十分稳定，它们像是深深嵌进去了、变成了化石，根本不可能使它们松动，不可能敲下或弄弯它们。任何进入这个场的电荷或物质都立即被轻易地吸向暴政那一端，简直不可能到达自由的一端，除非套上一万头公牛来拉。

今天，我那本小说早已被公开宣布为有害读物，认定它的出版是犯了错误（“这是唯意志论在文学中造成的恶果”），它已成为社会上所有图书馆的禁书了。今天，在古拉格群岛上只要提一提伊万·杰尼索维奇或我的名字，就被看作大逆不道。但是，当初呢?!当初，赫鲁晓夫曾经紧握着我的手在一片掌声中把我介绍给那三百名以苏联文艺界精华自诩的人物；在莫斯科曾使我成为“头号新闻人物”，新闻记者们不辞劳苦地等在我的旅馆房间门外；当初曾公开宣布：党和政府“肯定这样的作品”；最高法院的军事法庭引为自豪的是它替我恢复了名誉，(现在大概又后悔莫及了!)而那些上校军法官们曾在军事法庭上宣布：劳改营里的人们应该读读这本书！就在当时，那种没有声音、没有形象、没有名称的场力便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作用，它顶住了——于是，我的书便停止不动了!!早在那时它就停住了！只有极个别的劳改营合法地得到了这本书，通过劳改营文教科的图书馆允许人们借阅它。接着这本书便从图书馆藏书中被查禁。如果从外面，从社会上寄给某人的印刷品邮件里包括这本书，它立即被没收。于是，自由工人们便非法地偷偷把它带进劳改营，每本向囚犯们索价五卢布，听说甚至高达二十卢布（这是赫鲁晓夫时期的卢布！这是索取囚犯们的钱！但是，凡领教过劳改营周围社会的无耻作风的人，都不会感到奇怪）。囚犯们带着它提心吊胆，就像带着自制的刀子一样，

躲过搜查，进入劳改营，白天藏起来，夜间偷偷阅读。在北乌拉尔的某个劳改营里，人们为了能够长久地阅读，给这本书包了一层金属书皮。

既然那个无声的、但却为大家所接受的禁令已经深入到劳改营周围的地区，对于囚犯们就更不必说了！北方铁路线上的维斯车站有一个自由人妇女玛丽娅·阿列耶娃给《文学报》写了一篇书评，赞扬这部小说。不知是她把信投进信筒了，还是她粗心大意地把信放在桌上被别人看见了，总之，在她写好评论五个小时之后，党组织的书记В·Г·希什金就把她叫去，指责她进行政治挑拨，（多么会找词儿！）当场便把她逮捕了。[1]

在蒂拉斯波的第二劳改区有个囚犯叫涅多夫，是雕塑家。他是个杂役，闲时在屋里用蜡泥塑造了一个囚犯的塑像（照片7）。不料被区段的长官索洛江金大尉发现了："你在给囚犯塑像？谁允许你干的？这是反革命行为！"他说着便抓起塑像的腿，一扯两半，扔在地上，"这都是因为你读了什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缘故！"（幸而他并没有再用脚去踩那塑像。他走后，涅多夫把两半塑像藏了起来。）索洛江金向上汇报了这件事，劳改营长官巴卡耶夫立即传唤涅多夫。不过，涅多夫已经利用这段时间及时地在文教科找到了几张报纸，记住了那上面的几句话。"我们要审判你！你这是唆使人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巴卡耶夫长官对涅多夫吼叫。（看来他们懂得一个囚犯的形象意味着什么！）"请允许我说句话，长官公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说……还有，伊利乔夫同志也说过……""看你说话的样子，像是要同我们平起平坐?!"但巴卡耶夫也只好叹一口气。涅多夫在经过半年之后才敢把那两半塑像拿出来，粘到一起，用巴比脱合金铸好，终于通过一个自由工人把它送出了营区。

---

① 此事结局如何，不得而知。

开始在整个第二劳改区搜查《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了。生活区进行了全面大搜查。没有找到。有一次涅多夫想捉弄他们一下：一天晚上，他拿着一本捷维凯良写的《花岗石岂能熔化》* 偷偷看，装作故意不让屋里的人们看见的样子，并且当着眼线的面故意请伙伴们把自己挡住，而他坐的位置恰好从窗外可以看到。不一会儿就有人去汇报了。突然三名看守冲了进来。（第四个看守在窗外监视着，看他把书递给谁！）这下子可找到了！把书拿到看守办公室去，锁进了保险柜。看守奇日克带着一大串钥匙，两手叉腰说："涅多夫，查到了你的书！哼！等着去监狱吧！"但是，第二天早晨值班军官一看："哎！笨蛋！……去还给他！"

囚犯们就是这样阅读"党和政府肯定的作品"的！

*　　　*　　　*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苏联政府曾发表声明，声明中有这样的话："那些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的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逃脱正义的惩罚……企图灭绝整个整个民族的法西斯杀人犯的暴行是无与伦比的。"

当时发表这个声明，是为了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施加压力，因为西德正准备批准适用二十年的"时效"期限。

可他们就是不想**审判自己**，尽管他们自己也曾"企图灭绝整个整个民族"。

我国发表了许多文章，大谈惩罚在逃的西德战犯之重要。有的文章探讨对纳粹分子曾进行过怎样的思想训练，才能使他们觉得大规模屠杀是自然的、符合道德的？有人简直成了写这类文章的专家。如今立法者寻求辩护说，判决不是他们执行的，而执行者说，法不是他们立的。

---

* 此书已在我国出版，中译名为《我的生活道路》。——译者注

这声音多么熟悉啊！……刚才还看到我们那些实际工作者们的来信上说："把囚犯关进劳改营……是在执行法庭的判决嘛！……警卫人员并不知道哪个囚犯为了什么事坐牢。"

不，如果你们是人的话，你们就应该设法知道才对！正因为你们对于自己所看守的人们既没有用一般公民的眼光，也没有用人的眼光去看待，所以才把你们称为恶棍的！难道纳粹分子不也是在执行命令吗？难道纳粹分子不是也曾相信自己是在拯救他们的雅利安种族吗？

自然，我国的侦查员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他们确实也没有犹豫，而是立即）反问：那么囚犯们自己为什么要招供？我们严刑拷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应该坚贞不屈嘛！为什么告密的人会提供假情况？我们是把这些告密看作证人证词，作为依据的呀！

这些人也有过很短一段时间感到不安。前面我们曾谈到B·H·伊利英（前国家安全部的中将），他在说起斯托尔布诺夫斯基（审讯戈尔巴托夫将军的侦查员，将军提到过他）时说："哎呀呀，真糟糕！他现在的日子可真不好过，虽说他拿的养老金不少。"正因为这样，A·Φ·扎哈罗娃才不得不写文章的，她害怕的是，这样下去将会对所有的人开刀了。于是她写了一篇文章，极力为曾经被季亚科夫"抹了黑"的利霍舍尔斯托夫（！）大尉辩护。她激动地说："他现在也还有大尉军籍，担任着党组织的书记（！），在农业移民区工作。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当有人写这类东西攻击他时，他的工作会遇到多大困难！据传说，要开始审查利霍舍尔斯托夫，甚至要追究（！）[①] 他的责任。请问：这是为什么？假如这仅仅是'传说'还倒好，可是并不排除他们真下手的可能性呀。这就会在内务部的工作人员中间造成真正的混乱！难道因为他执行了上级的所有指示就对他进行审查吗？是要求他现在去替那些下

---

① 她绝不使用"审判"这个词，她的舌头已经无法说出这个词了。

达过指示的人负责吗？这太妙了！让小兵当替罪羊！”

但是，这惶惶不安的状况很快就过去了。不，谁也不必负责。不必审查任何人。

也许，个别机关的人员编制有所削减。但是，暂时忍耐一下嘛！将来会扩充的！暂时可以先让那些还没有退休资格或者需要工作到退休年龄的国家安全人员去当作家、当记者、当编辑、当反宗教宣讲员和思想工作人员嘛！有些人还可以去当当厂长、经理。改头换面之后，他们仍旧是要领导我们的。这样更可靠些。（至于愿意退休的人，就让他去享清福好了。例如，退役中校胡尔坚科就是这样。中校！这个官可不小！大概总指挥过一个团吧？不，他是一九三八年从一名普通监狱看守起家的，只靠拿着强迫灌食的软管折磨囚犯便升到了中校！）

而在各个档案部门里，则正不慌不忙地翻阅并且销毁一切多余的文件：被处决的囚犯名单、送惩戒隔离室和加强管制棚的批示、劳改营里的侦查材料、眼线的告密信、关于“实际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的多余材料等等。还有卫生所和会计室也都得进行清理，那里也有多余的文件、材料、不应留下的痕迹……

……我们将会来默默参加筵席。
在世时我们不配来到你们这里。
今天，我们已死去，并不言语，
但，死去的我们仍使你们恐惧！

（维克托丽娅·格，科雷马女囚）

照这样看来，真的，怎么总是怨小兵们，怨小兵们呢！？那么，运动指挥部呢？比看守、警卫士兵、实际工作人员更高些的人们呢？那些只须用手指指点点的人呢？那些只从讲台上发出几句指示的人呢？……

让我再问一次：你们是怎么说的？——“那些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的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正义的惩罚……企图灭绝整个整个民族的……无与伦比的……”

嘘！嘘！不许作声！正因为这样，才在一九六五年八月的思想工作会议（一个关于如何指导我们思想的秘密会议）的讲台上宣布：“现在是时候了，‘人民的敌人’这个既有用而又正确的概念应该恢复起来了！”

第 二 章

统治者易人，群岛依然在

应该说特种劳改营是斯大林晚期思想的一个得意之作。经过教育改造方面和惩罚方面的多方探索，才终于产生了这个成熟的杰作。这是一个色彩单调的、被无情的折磨肢解的、编了囚犯号码的组织；心理上它早已经脱离祖国这个母体；它只有入口而没有出口；它吞进来的只是敌人，送出去的只是它生产的财富和尸体。如果那位"高瞻远瞩的建筑师"看到自己这一伟大体制如今竟也遭到破产，他这位设计人所感受的痛苦该会有多么深啊，我们甚至难以想象。其实，他生前这个体制就早已经开始颤动了，有些地方冒出火花，到处出现裂痕。但是，看来，他并不了解这些，因为人们出于谨慎而不敢向他报告。特种劳改营这个体制起初是惰性十足的，它呆滞少动，趋于保持安定；但是，它的内部温度却在迅速升高，几年之间就达到了火山熔岩的状态。假如那位"泰斗"再多活一年半载，就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对他隐瞒这些小爆炸了，那么，这就必然会给他那老迈衰竭的思想又增加一项沉重负担，他不得不作出新抉择：要么放弃这个得意的主意而重新把各种劳改营打乱混编起来，或者相反，有步骤地把所有按字母表

排号的千千万万囚犯统统枪杀，从而使这个主意能够功德圆满。

但是，这位“大思想家”在人们的失声痛哭声中死得稍微早了些。（照片8）并且，他死去不久，就用他那正在变得僵硬的手一把拉住自己那个老搭档——当时还是红光满面、精力充沛、意志坚定、掌管着最广泛、最错综复杂、最棘手的内部事务的部长贝利亚，并把他咕咚一声拉倒在地，拖带走了。

古拉格群岛的这位总管大人的倒毙，又灾难性地加速了“特种劳改营”体制的崩溃。（这是一个多么严重而不可挽回的历史错误啊！怎么可以把掌管着最隐秘事务的部长的五脏六腑都翻弄出来呢？怎么可以往蔚蓝色肩章上涂抹沥青呢?!）

二十世纪劳改营思想中最伟大的发明——号码布被匆匆撕下来，被扔掉和忘却了！只这一点就使特种劳改营失掉了它的严格划一性、何况又拆下了工棚窗户上的铁格子，拿掉了门上的锁呢！这样，特种劳改营就完全丧失了它区别于普通劳改营的、可爱的监狱特点。（拆掉铁格子这件事可能办得过于匆忙些。但按当时那种情况，实在是不敢怠慢，必须同过去的作法决裂嘛！）不管多么可惜，埃克巴斯图兹的石砌监狱——加强管制工棚（它当年曾经顶住了暴乱者的围攻呀！）如今也已正式完全拆除了……[①]既然要时间把特种劳改营的人纷纷释放出去，还要它干什么？是的，突然间把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全释放出去了，不管他们犯了多么肮脏的罪行，也不管判了十五年还是二十五年。这种作法自然在囚犯眼里把判决书的分量大大降低了。通信方面的限制过去曾使特种劳改营的囚犯感到自己犹如被活活埋葬，现在，这限制也取消了，甚至还允许接见家属。接见！连提起它都可怕：接见呀！……（就连发生过暴乱的肯吉尔营如今也建起了一些小小的接见室。）不可遏止的自由主义湮没了不久前的特种劳

① 这样也就使我们失去了在那里建立博物馆的可能性。

改营，甚至允许囚犯们留长发了（致使伙房里开始丢失铝盘子：囚犯们偷铝盘去改制成梳子）。现在囚犯们可以不用特种劳改营里的内部流通券，不立个人帐户，可以直接持有全国通用的货币，可以和外界的自由人一样用现钱买东西了。

他们未经深思熟虑就草率地摧毁了自己过去赖以生存的、苦心营造了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体制。

那么，怙恶不悛的囚犯们是否由于这种宽宏大量的政策而多少有所收敛呢？没有！恰恰相反！他们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堕落和忘恩负义，竟然学会了使用一个根本不准确的、使人难堪的、毫无意义的词——“贝利亚分子”。现在，只要稍有不称心的事，罪犯们动不动就用这个词辱骂那些诚挚善良的警卫战士、苦口婆心的生活管理员和对他们关心备至的劳改营首长。这种称呼不仅伤害这些“实际工作者”，使他们寒心，而且在贝利亚倒台不久时甚至还包含着危险性呢：说不定会有什么人利用它来作为谴责你的根据。

因此，肯吉尔劳改点的一位首长（这时肯吉尔已经清除了暴乱者，补充进了一些从埃克巴斯图兹来的囚犯）有一次不得不在讲台上说出这样的话：“小伙子们！”（在一九五四——一九五六年这一短短的时期内，他们曾认为同囚犯打招呼时称呼“小伙子们”是可以的。）你们常常使用‘贝利亚分子’这个词。这使管理人员和警卫人员觉得很委屈。我想请求你们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对于他的这个请求，当时发言的小个子B·Γ·弗拉索夫却回答说：“这才叫了几个月，你们就觉得委屈了，可是十八年来我们从你们警卫人员那里除了‘法西斯分子’这个叫法之外，就没有听到过别的。我们不委屈吗？”少校马上答应：今后禁止再叫“法西斯分子”。这也算是等价交换吧。

经过这一切后果不佳的破坏性改革，可以说，特种劳改营的“断代史”在一九五四年已告结束，此后它和普通劳改营就没有什

么区别了。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期间，秩序混乱的整个古拉格群岛上出现了一个优待时期，这是一个空前的宽大时期；如果不包括二十年代中期的普通关押所，也许这就是古拉格群岛历史上最自由的时期了。

为了使自由主义在劳改营里得到无限制的发展，一道道命令，一个个视察员竞相大卖力气。不再迫使妇女参加伐木劳动了，现在认识到伐木劳动对妇女来说是过重的（虽然过去持续三十年的经验证明它一点也不过重）。对服满三分之二刑期的人恢复了提前假释的办法。所有劳改营现在都发现钱，于是囚犯们涌向小卖部。这些小卖部竟也没有任何合理的限制。其实，总的看管制度已经放松，限制买东西能起什么作用呢，囚犯们可以用这些现钱到市镇商店里去买东西嘛。所有工棚里都装上收音机，订了报纸，办起了墙报，每个劳动大队指定了宣传鼓动员。此外，还时常请宣讲员同志（上校们！）到劳改营来给囚犯们作各种报告（甚至还讲了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如何歪曲历史的问题），但是军官们要召集大家到礼堂去听报告却不那么简单：现在不能拿棒子赶了，必须用说服或其它施加影响的间接办法才行。而且，勉强召集来的囚犯也不认真听台上的话，而是在下面嗡嗡地谈论自己的事。现在允许囚犯认购公债，但是，除了那些正统派分子之外谁也没有兴趣。因此，教育员们不得不把每个人的手硬拉到认购签字单上，以便从他们那里挤出哪怕十卢布来也好（这是赫鲁晓夫时期的卢布）。每逢星期天还组织男女营区的文娱联合演出。人们倒是很乐意看这种演出，有人甚至为此买来领带系上。

同时，古拉格群岛体制的精华中的许多东西又恢复起来了，又重新强调建设大运河时期赖以支持的忘我精神和首创精神了。组织起了“积极分子会议”，它下面还设有教育生产、文娱活动、生活管理等各组，很像工厂的基层工会委员会的样子；它的主要任

务是：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性而斗争。重建了“同志审判会”，其职权是：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批评、处罚，请求领导对其加强管制，直至建议当局对该犯不适用有关“三分之二刑期”的规定。

这些措施过去都曾经是劳改营当局手中的有效工具，不过那是在没有见过特种劳改营的“屠宰”和没有经过骚乱训练的劳改营里。现在这里不同了。很简单：第一任“积极分子会议”主席被“屠宰”了（在肯吉尔），第二任遭到毒打。于是，谁也不敢再去参加积极分子会议。（原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这时就在积极分子会议里，工作得很自觉，很有原则性，但经常受到刀子的威胁，十分谨慎，而且还要时而参加班杰拉分子们的会议去听取对自己行为的批评。）

自由主义的无情打击使劳改营体制越来越软弱无力。建立了所谓“轻管制劳改点”，（在肯吉尔也建立了这样的点！）这里的隔离区实际上只是睡睡觉的地方，因为去劳动时不再有人押送，行走路线和出发时间都由自己掌握（大家都尽量早些走，晚些回来）。每逢星期天，上下午各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离营到城里去走走，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享受不到这种散步的权利。

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这么松散。仍然有一些惩罚性的劳改点。例如，布拉茨克市郊的安德焦巴的“全苏惩戒营”就是其中之一，原在奥泽尔拉格的两手沾满鲜血的米申大尉就在这里。一九五五年夏季这里关押着大约四百名受惩戒的囚犯（包括滕诺）。但是，即使在这里，隔离区内的主人也不再是看守人员，而是囚犯了。

请读者设身处地替劳改营的统治者想想：在这种条件下还能够工作吗？还能够指望取得什么成绩？

一九六二年，我去西伯利亚时遇到一个旅伴，他是内务部的军官。他关于一九五四年前一段时期的劳改营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完全的放纵！谁不愿意劳动就不去。囚犯们甚至自己出钱买

了电视机！”[①] 他对这一个短暂时期的印象是极不愉快的。

因为如果教育员背后没有皮鞭，没有强管棚，没有饥饿等级制，反而作为一个请求者站在囚犯面前，那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是，这一切似乎还嫌不够！古拉格群岛还受到了所谓“营区外拘禁”这个攻城大槌的撞击。按照这个办法，囚犯可以完全住到营区外面去，可以自己购置房子，也可以安家，工资像自由工人一样全部发给本人（不再扣除什么营区费、警卫费、劳改营行政管理费等等）。这些囚犯和劳改营的关系只限于每隔两周来报到一次。

这已经是到头了！……是世界的末日，或者是古拉格群岛的末日，或者就是两者的末日！而司法机关竟把这种“营区外拘禁”当作共产主义制度的最人道的、最新的发明来加以称赞！[②]

看来，经过这些打击之后只有解散劳改营这一条路了。那就得毁掉伟大的古拉格群岛，毁掉几十万“实际工作者”及其妻室、儿女和家畜，使他们多年服务的工龄、职称和勤恳而无可指责的工作统统变得一钱不值！

连这个过程似乎也已经开始了：有一些称为“最高苏维埃委员会”的，或者简称为“卸包袱委员会”的人们陆续来到劳改营。这些人一来便“踢开”劳改营的领导，在营本部的工棚里直接召开会议，签发释放证，而且签发得那么随便和不负责任，就像当年签发逮捕证一样。

“实际工作者”的各个阶层都面临着覆亡的威胁。必须设法应付这种局面！应该进行斗争呀！

---

① 如果他们不劳动，他们哪里有钱买电视机？既然说是在北方，而且是1954年，哪里来的电视机？不过，我并没有打断他的话，倒想听听他到底还讲些什么。

② 此外，在实行“折算刑期”和“提前假释”的同时，还有契诃夫在《萨哈林岛》里早已描写过的恩典：允许属于“有悔改表现”级别的苦役犯建造住房和结婚。

*　　　　*　　　　*

在苏联，任何重大社会事件都只可能有两种命运：或者以沉默将其扼杀，或者加以捏造歪曲。我不知道国内有哪一次重大事件曾经逃脱了这两种命运。

对于古拉格群岛的整个存在，也是如此。大部分时间是绝口不谈它的，如果有时提到它，那就是谎话连篇。关于建造大运河时期和一九五六年的“卸包袱委员会”，也都是这样。

关于这些“委员会”，尽管没有报纸上的喧嚣和客观需要，我们自己还是在感动之余把它夸大了。是呀，怎么能不感动呢？要知道，许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连辩护律师都对我们进行攻击了，而现在却是检察长在为我们辩护！我们多么渴望过自由的生活呀，我们觉得在狱外已经开始了某种新的生活，我们从劳改营内的变化中已经看到这一点。就在这个时候，派来一个神奇的、拥有全权的委员会，它把人们一个个叫去，谈话不到十分钟就立即交给他一张火车票和身份证（某些人还拿到了在莫斯科落户的证明）！面对这种情景，从我们这极端虚弱的囚犯的胸膛中，从我们经常伤风的嘶哑的喉咙中，除了赞颂之外，还能够发出什么别的声音呢？

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抑制住自己那颗为了把破衣烂衫急忙塞进旅行袋而猛烈跳动的心，站得稍微高一点的话，就会很自然地想到：难道斯大林的暴行就应该这样来结束吗？难道这个委员会的代表们不是应该站到队伍前面去，摘下帽子，对大家讲下面这样一段话吗？

“弟兄们！最高苏维埃派我们来向你们道歉，请你们原谅。你们没有犯任何罪过，竟然几年、几十年地被关在这里受折磨，而我们却在挂着枝型水晶大吊灯的豪华大厅里开会，一次也没有想到你们。我们驯顺地批准了那个‘吃人魔王’的每一项灭绝人性

的命令，我们是他的杀人罪行的同谋者。如果可以的话，请各位接受我们这过迟的忏悔吧！现在，大门敞开着。你们自由了！我们派飞机来了，就停在那边儿，飞机上备有药品、食物和冬衣供你们使用。飞机上也有医生。”

虽然这两种情形同为释放。但释放的作法不同，它的意义也就迥然不同了。现在的“卸包袱委员会”干的不过是一个细心的清洁工的工作，它是在顺着斯大林呕吐出来的脏东西进行认真的打扫，如此而已。这里并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生活的道德基础。

现在，让我来引用一下A·斯克里普尼科娃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我是完全赞同她这种见解的。囚犯们一个一个（又是互相隔绝的！）被叫到委员会办公室去。人们提出几个关于他的案件的问题。这些问题提得很客气，是善意的，但总的倾向是要使囚犯（可不是最高苏维埃，而是那不幸的囚犯！）必须承认自己有罪。他应该保持沉默，应该低头，应该处于被宽恕者的地位，而不是宽恕者的地位！这也就是：人们现在企图以自由为诱饵从囚犯口中得到过去用非刑拷问未能逼出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这很重要：使囚犯回到外界时必须谨小慎微；同时，还可以把委员会的记录提交给历史，用以说明：坐牢的人基本上都是有罪的，而被某些人所着力描绘的那些残暴的、无法无天的事情则根本没有发生过。此外，也许还打了一个小小的财政方面的算盘——既然不是恢复名誉，就无须发给平反补偿款。[①] 这样来解释释放囚犯的行动，就既不会毁掉劳改营体制本身，也不会妨碍向劳改营补充新囚犯（这种补充甚至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也从未中断过），还可以不承担必须释放这些人的任何义务。

---

① 这里顺便提一下。1955年初曾经提出过一个方案，要给所有的人补发在押期间的全部工资。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在东欧各地就是这样补发的。但是，这里的人数和关押期间与那里大不相同！估算的结果大吃一惊：“这样我们会使国家破产！”于是便改为只发给二个月工资的补偿了。

那些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自尊心而拒绝在委员会面前承认自己有过错误的人呢？这些人便被继续关押在劳改营里。这类人的数目也并不很小。(一九五六年在杜布罗夫特种劳改营就把那些不肯认罪悔过的妇女集合起来，转押到克麦罗沃州的劳改营去了。)

斯克里普尼科娃还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西部乌克兰人妇女当初只因她丈夫是班杰拉分子便被判劳改十年。现在委员会要求她承认自己是因为丈夫是土匪而坐牢的。"不，我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我们就释放你！""不，我不能这么说。他绝不是土匪，他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好吧，既然你不愿意，你就在这里呆着吧！"(当时那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索洛维约夫。)过了几天，她丈夫从北方来看望她。她丈夫原被判刑二十五年，在北方劳改，这次他轻易地承认了自己是土匪，因而就被赦免了。见面时，他不但没有称赞妻子这种坚定性，反而气冲冲地责怪她："你就该说我是魔鬼！说我长着尾巴，还看见过我的蹄子嘛！现在你叫我自己怎么管这个家和孩子们?!"

我还要指出：斯克里普尼科娃拒绝承认自己有罪，所以她又在劳改营蹲了三年。

这样，甚至连自由时代来到这古拉格群岛时也是穿着检察官的法衣的。

然而，"实际工作者"们的惊慌失措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间古拉格群岛天空的星辰排列确实与从前大不相同，这预示着群岛的不祥年代的来临，说不定就是它存在的最后年代！

那些握有最高权力而又完全了解国内情况的人，在这几年间还能不能回头看一下，惊醒一下，哭一鼻子？要知道他们还背着一个血淋淋的包袱呢，它在滴血，把整个脊背染得血迹斑斑的。政治犯放了，可是成百万的普通刑事犯又是谁制造的？难道不是生

产关系造成的吗？不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吗？不是我们自身制造的吗？……不是你们制造的吗？……

还是把你们那开发宇宙的计划拿去喂狗吧！不要再为什么苏加诺的海军舰队和恩克鲁玛的近卫部队操心了！[*]还不如安静地坐下来，搔搔后脑勺想一想：自己的国家该怎么办？为什么我国的、天下最好的法律竟会遭到我们本国千百万公民的反对？是什么东西使得这些人硬是去钻进那意味着死亡的枷锁？又为什么那枷锁越是难以忍受，钻的人越多？怎样才能使这支水流枯竭呢？是不是我们的法律不应该这样？（这里就难免要想到那使人意志消沉的学校、荒芜的农村，以及其它许多毫无阶级含义、而只能认为是不公正的事情了。）还有那些已经遭殃的人们，我们怎样才能使他们获得重生？不能用廉价的"伏罗希洛夫大赦"一挥了之，要诚心诚意地对每个人的案件和具体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那么，这古拉格群岛应该不应该结束？莫非它应该永存？四十年来它一直在我们的躯体上腐烂发臭，够了吧？

不，原来不行！还不够！要动动脑筋吧，可太懒了。而灵魂中对这些一点反应也没有。那就让这群岛再存在它四十年吧！我们呢？我们要去处理建设阿斯旺高水坝[**]的问题了，还得管管阿拉伯人的重新统一问题呢！

在尼基塔·赫鲁晓夫长达十年的统治时期，我们久已习惯的那些物理法则突然间失去了作用，一些物体令人奇怪地朝着场力和重力所指的相反方向运动起来。当历史学家们研究这一段历史时，他们不能不为之震惊的是：在一个短时期内，竟有那么多的可能性和机会集中在赫鲁晓夫一人之手，而他竟把这些可能性和

---

[*] 苏加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任总统，1965年10月1日被推翻。
恩克鲁玛，加纳共和国首任总统，1966年2月被推翻。——译者注

[**]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尼罗河上的高水坝，位于原阿斯旺水坝的上游，1960年由苏联援助动工兴建，1971年建成。——译者注

机会当成了玩具，利用它们时像在开玩笑，像在作游戏，随后便漫不经心地全抛弃了。在我国历史上，斯大林之后第一个被赋予最高权力的是赫鲁晓夫（尽管最高权力这时已经有所削弱，但仍然是十分强大的），而他在行使这种权力时却酷似克雷洛夫寓言中那只小熊米什卡，只知道在林中旷地上无目的地、无益处地滚动着圆木玩耍。赫鲁晓夫本来有可能以三倍甚至五倍的坚定性去筹划怎样解放这个国家，但他却把这件事像游戏一样放弃了。他没有认识到他所肩负的任务之重大，他放弃了这个事业，却转身去搞征服宇宙、种植玉米、在古巴设置导弹、为柏林问题发出最后通牒、迫害教会、把党的州委分为工业州委和农业州委，甚至去同抽象派艺术作斗争了。

他这个人从来没有把任何事情做到底过，而对于自由事业尤其如此！需要唆使他去迫害知识分子吗？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需要用他那两只曾经拆毁斯大林劳改营的手再把劳改营巩固起来吗？这也极其轻易地做到了！而且，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呀？

一九五六年，就在召开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一年，已经公布了关于劳改营的第一批限制性条令！这些限制到了赫鲁晓夫进一步独揽全部大权的一九五七年又有所发展了。

尽管这样，“实际工作者”阶层并未感到满足。他们一旦嗅到自己已占上风的气味，便开始反攻了。他们宣称：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劳改营制度是苏维埃政权的顶梁柱，可是这根顶梁柱正在倾倒！

当然，主要影响是在背地里施加的——在某处的宴会桌上，在飞机客舱里，或是在郊外别墅划船的时候。不过，这些活动有时也以公开形式表露出来。例如，有时是以Б·Н·萨姆索诺夫代表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言（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的形式出现。据他说，囚犯的生活太好了，他们对伙食很满意（！）（他们本应该经常感到不满意才对！……）对待囚犯的态度太和气了。（而在这

个一直没有承认自己从前的罪过的国会里，当然不可能有人去教训萨姆索诺夫。）有时则是以《铁窗里面的人》这类报刊文章的形式出现（一九六〇年）。

赫鲁晓夫向这股压力屈服了。他对任何事都没有深入了解，没有想一想这五年来犯罪率并没有增加这个事实（即使增加了，也该在国家制度中寻找原因），没有把自己的新措施同自己对共产主义胜利进军的信念联系起来看看，没有细致地研究事态的详情，也没有亲眼看一看。这位"一生都在旅途上度过"的沙皇轻易而匆忙地在那张领钉子的单据上签了字，人们便立即用这些钉子迅速地按照原有形状把断头台重新牢固地钉起来了。

而这一切正是发生在那个一九六一年。尼基塔就是在这一年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把自由之车一下子拉到天空去。正是在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一九六一年颁布了关于在劳改营中可以处以死刑的命令，它规定：对于"采取恐怖行为伤害已经改造好的囚犯（也就是眼线）和伤害看守人员（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人"均可处以死刑。而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一九六一年六月）批准了四种形式的劳改营制度——这已经不是斯大林的劳改营，而是赫鲁晓夫的劳改营了。

当尼基塔·赫鲁晓夫傲然登上代表大会讲坛对斯大林的监狱暴政展开新的一轮攻击时，他其实是刚刚才纵容人们去加强了自己那套毫不逊色的劳改营制度。可是，他却真诚地相信这两者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是协调得体的！……

今天的劳改营就是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巩固起来的劳改营。从那时起，六年来它一直是这个样子。

这些劳改营有别于斯大林劳改营的，不是它的制度，而是里面的囚犯构成：这里没有千百万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人。但是，这里仍然关押着千百万人，而且很多人仍然是不公正的司法的束手无策的牺牲品，这些人被扫进劳改营仅仅是因为必须使这个制度

能够存在和维持下去。

统治者换了人，但古拉格群岛依然存在。

它之所以依然存在，是因为**这个**国家制度离开它就不能存在。消除了古拉格群岛，这个国家本身也将**不复存在**。

*　　　*　　　*

没有一部历史是没有结尾的。任何历史总要在某个地方断开。我们根据自己微薄的力量和很不充分的一点材料，考察了古拉格群岛的历史——从它诞生时的血红色排枪齐射，一直看到了恢复名誉的粉红色烟雾的出现。现在，就让我们结束这段历史吧，以赫鲁晓夫使劳改营严酷起来和公布新刑法典之前的宽宏大量的、涣散的光辉时期来结束这部历史吧。将来一定还会出现别的历史书，它们的作者，很不幸，会比我们更加了解赫鲁晓夫时期的和赫鲁晓夫之后的劳改营。

而且这种书已经出现了，这就是C·卡拉万斯基[1]和阿纳托利·马尔琴科[2]的著作。将来一定还会浮现出更多这类著述，因为俄国不久就将进入一个公开性的时代！

例如马尔琴科的书，它甚至使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劳改犯触目惊心，充满恐怖。它描述了现在的监狱生活，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更加“新型”的监狱，那是我们这些过去的见证人所无法设想的。我们看到，监狱的第二只犄角（参看第一部第十二章）长得更高，它更深地刺入了囚犯的咽喉。马尔琴科对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的两座建筑物——沙皇时代建的和苏维埃时代建的——进行了比较，从而通过实物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跟俄国历史上的沙皇时期无法比：沙俄的监狱又干又暖，苏联的监狱又潮又冷（牢房里耳朵

---

① 斯·卡拉万斯基：《请求书》，私下出版物，1966年出版。

② 阿·马尔琴科：《我的供词》，私下出版物，1967年出版。

冻僵，呢上衣永远不能脱）。沙俄的窗户被苏联的砖堵得只剩原来大小的四分之一——别忘了窗外还安着“笼口”。

但是，马尔琴科只描写了一处杜布洛夫劳改营。那是关押来自全国的政治犯的。而我手头却收到很多各地来的关于普通刑事犯劳改营情况的材料。这些来信使我感到自己还欠了他们一笔债，因而不能沉默。而且，一般地说，我是欠了普通刑事犯们的债的，因为在这么厚的一部书里提到他们的地方实在太少了。

因此，下面就我所了解，扼要介绍一下现在的劳改营情况。

介绍什么“劳改营”？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劳改营——这是赫鲁晓夫年代的主要创新！我们早已放弃了斯大林时期那种极端可怕的遗产！小猪已经改名叫鲫鱼了！现在我们这里没有劳改营，而是有……移民区（宗主国对移民区）。群岛土著民理应住在移民区，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所以，现在已经没有所谓“古拉格”，而只是有“古依特克”*了。（不过，记忆力好的读者可能记得从前也这么叫过。都是“古已有之！”的。）如果再考虑到现在我国政府机构中已经没有内务部，而只有社会治安部[1]，我们就必须承认，现在已经为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不能再为此喋喋不休了。

这样，从一九六一年夏季起实行了四种劳改移民区制度：普通的、加强的、严管制的、特种的。（从一九二二年以来我们没有“特种”是过不了日子的……）对犯人采用其中哪一种制度，则由

---

* 劳动改造移民区总管理局的缩写词译音。“移民区”与“殖民地”是同一字，故作者与“宗主国”相联系。——译者注

[1] 有趣的是，这个机关的活动尽管不断受到公开赞扬，但它还是不断在进行着某种内部探索，因而它不能长久地披着同一个名称的外衣。总像有某种东西使它感到难堪，使它不得不经常设法把自己用另一个翻新了的外衣掩盖起来。我们就是这样又有了一个“MOOП”“社会治安部”。看起来它是个新的。听起来不也有些新鲜感吗？但是，心术不良的语言总是要欺骗人，最终把你出卖掉：这个“部”的名称里还是有“OXPAHA”（保卫）这个词，那不就是“OXPAHKA”（暗探局）的意思吗？名称的命运就是这样，真叫人没办法逃脱。

审理该案的法院"根据罪行性质和严重程度以及（似乎还有）罪犯的个人表现"决定。但是为了简化手续，各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都开列了刑法典条文清单，指明犯哪一条应送往哪个地点。这是对后来的新犯人。那么，群岛上原来的"土著民"呢？那些在代表大会前的"赫鲁晓夫改革"时期处于"营区外拘禁"的、解除看管的和呆在"轻管制劳改点"的囚犯呢？这些人则由地方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清单（也许还参照当地行动人员的意见），根据具体情节，分别送进各该相应制度的劳改区。[1]

右转舵九十度！左转舵九十度！——这种左右摇摆对坐在甲板上的人可能是轻松愉快的，但是对于呆在沉寂无声的阴暗底舱中的人来说，他的胸腔会有何种感受呢？仅仅在三四年前还对人们说：你们安家立业吧！生儿育女吧！好好生活吧！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的阳光现在温暖着你们！从那时以后，这几年来你什么坏事也没作，可是，突然，你听到狗叫声，看到脸色阴沉的押解士兵把你包围起来，宣布你的"案件"，于是，你的家属只好留在那尚未建成的家园里，而你则被赶进某地新围起的铁丝网区内。"首长公民！我……一直是奉公守法的呀？……首长，我一直积极劳动呀？……"什么奉公守法，积极劳动，统统滚你妈的蛋！……

地球上会有哪一个，哪一个稍有点责任感的行政当局能够这样急转弯和这样跳跃？也许正在诞生中的非洲国家是这样？……

一九六一年进行改革是为了什么？当时怎么想的？是真挚的吗？还是故弄玄虚？（故弄玄虚地说："这样可以达到更好地改造的目的。"）依我看，当时的想法是：剥夺囚犯在物质生活和人身自由方面的独立性，因为这种独立性是"实际工作者"所无法忍受的；他们要做到：只须自己动动小手指，就使囚犯的肚皮直接

---

① 在这些情况下怎样确定犯人的个人表现，即他改正和认罪的程度呢？其实是根本不考虑这些的：我们又不是电子计算机，不可能把什么都考虑进去！

有所感受，也就是说，使囚犯处于一种完全受控制的从属地位。为此，就必须消灭大批人无人看守的现象（这种现象对垦荒区的人们来说是很自然的），把人们全都赶进营区铁丝网，使基本食物的供给感到不足，切断囚犯们的辅助收入来源，不许搞临时工作挣钱，不许从外界接受邮包。

邮包在劳改犯人眼里不仅仅意味着邮来食物，它还能掀起某种精神上的浪花，使他心里喜滋滋的。用你颤抖的双手接过邮包时，你就感觉到自己还没有被遗忘，不是孤独的，人们还在惦念着你！我们在特种劳改营时接受邮包的数量是不受限制的（只是每件重量不得超过八公斤，这是邮局规定的一般限制）。虽然远不是大家都能收到邮包，而且也不是经常按期收到，但这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提高劳改营的总的生活水平，不会发生那种殊死的斗争。如今，对邮包的分量进一步加以限制——每个不得超过五公斤。而且规定严格限额——根据四种劳改区制度，每年允许接受邮包的次数分别限制为六个、四个、三个和两个！也就是说，最优越的普通制度劳改区里的人也只能最多每两个月接受一次五公斤重的邮包，这个重量还包括包装物在内。寄来的还可能是衣物之类。也就是说，他们每个月能够从外部得到的各种食物最多不超过两公斤！而关在特种制度劳改区的人则每月不超过六百克……

即使这点东西，如果真能交给你就不错了！……实际上这一点可怜的邮包也只是允许那些已服满一半以上刑期的人接受，而且还得在这期间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行动人员、教导人员、看守和看守喂养的小猪都得喜欢你才行）！还要经常百分之百地完成劳动定额！还必须经常参加移民区的“社会文化活动”（也就是参加马尔琴科所描写的那种枯燥无味的音乐晚会，参加强人所难的竞赛——在这些“竞赛”中人们往往由于虚弱而晕倒。或者，更糟的，还要去帮助看守人员干活）。

这邮包也够你呛的了！为了拿到这个由你的亲人包装的小小

木箱，人们要求你付出自己的灵魂呀！

我的读者，请您清醒一下！历史我们早已讲完了，我们已经结束历史部分了。这里讲的是现在，是今天，是在我们的食品商店里（就算是只在首都吧）塞满食品的时候，是在你真心实意地回答外国人说“我国人民现在吃得很饱”的时候。是今天人们还在这样用饥饿改造我们那些不慎落水的同胞们（其实他们大部分是没有任何过错的，您现在总算相信我国司法机关的强大威力了吧！）。这些同胞们做梦也还只是梦见面包！

（我还要指出：劳改营统治者的胡作非为没有止境，肆无忌惮！天真的亲属们有时用印刷品邮件或医药用品邮件寄一些书、报或药品来。这些也被当作食品包裹看待！据各地来信反映，这种情况很多！劳改营头头的作法活像装有“电眼”的机器人，他只看到：又寄来一件东西！既然它算“一件”，那么随后寄来的邮包就只能“退还原寄”了。）

亲属探望时监视十分严密，严防利用探视机会交给囚犯任何食物。看守们以发现这类情况为荣，互相炫耀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为此，在探视前竟然对于远道来探视的自由人妇女进行侮辱性的周身搜查！（是呀，宪法并没有禁止这样做嘛！你不喜欢？那你就不必会面，回去好了！）

对于现款的来路更是堵得严而又严，绝不许寄现款到移民区来：不管亲属们汇来多少钱，全部替囚犯“存”起来，“直到刑满释放”的日子为止（也就是说，国家无息地向囚犯借用十年或二十年）。而且不管囚犯自己劳动挣到多少钱，他也看不到这些钱。

“经济核算”的做法是：给囚犯的劳动报酬相当于同样劳动的自由人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为什么呢？难道囚犯生产的产品有特殊味道？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西方，这就该叫做剥削和歧视了）。这工资的一半要由移民区当局扣除（用来维修营区铁丝网，养活“实际工作者”们和狼狗）。再由剩余部分中扣除伙食和服装费

（可以想象一下鱼头烂菜汤在劳改营里会值多少钱）。如果还有余，这才记入囚犯的个人帐户，要一直存到"刑满之日"。按照四种不同的制度，囚犯可以在劳改营小卖部里花费自己这部分钱的最多限额分别定为：十卢布、七卢布、五卢布和三卢布（但是梁赞州的卡里卡托克的囚犯却来信抱怨说，东扣西扣之后连五卢布也剩不下，不能去小卖部买什么）。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上也说：一个叫伊琳娜·帕皮娜的列宁格勒姑娘什么都干——挖树根、运石头、卸火车、上山砍柴，落得满手血泡，但她每月才可以挣到……十卢布！（要知道，那还是一九六〇年三月，是"优待"时期，而且当时还在使用斯大林时期通货膨胀时的卢布呢。）

其次是劳改营小卖部本身实行的"管理制度"。这个制度把当局的限制和商人的冷酷盘剥二者聚于一身了。由于实行这殖民地制度（"移民区"〔Колония〕也就是"殖民地"的意思。语言学家们，这可怎么办呢？既然现在群岛的正式名称不叫劳改营，而叫Колония，也就是殖民地，那我也就只好叫它殖民地了），由于这殖民地的制度本身就是颠倒黑白的，所以，本来是为照顾人而设的小卖部也变成了惩戒人的机构，变成了给囚犯以打击的地方。我从西伯利亚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各移民区收到的所有信件，几乎无不谈到利用小卖部处罚人的情况！稍有差错就罚人不许去小卖部买东西。早晨起床晚了三分钟？罚你三个月不许进小卖部！（囚犯们把这叫做"打击肚皮"）晚点名之前没有及时把信写完？罚你一个月不许去买东西！有时则只因为"说话不当"就罚你。乌斯特维姆斯克的严管制劳改区的人们写信说："每天总有几个人受到不许进小卖部的处罚，罚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平均每四人中就有一人犯纪律。如果会计处这个月忘记把你算进名单，你也就一个月别想去买东西。"（没有立即关进禁闭室就不错。这样，过去的劳动总算不会白费。）

在老囚犯看来，这些大都不足为奇。对处于无权地位的人来

说，这是家常便饭。

还有人写信说："如果劳动有成绩，每个月可以多得两个卢布。但是，要想得到这两个卢布，你必须在生产上作出真正的英雄业绩。"

请读者看看，我国多么珍视劳动：由于在生产上有突出成绩，每月奖赏竟达两个卢布之多！

人们来信中还谈起诺里尔斯克的一件往事。不错，是一九五七年，那也是舒适的喘息时期。事情是这样的：不知道哪些囚犯把经费支配人沃罗宁养的狗宰掉吃了。为了这件事全体囚犯被罚"取消工资"七个月！

非常真切，非常像群岛上发生的事情。

或许，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又会反驳我：这不过是一个笑话，怎么能以它为例呢？你自己说的，四个人中间才有一个违反纪律的，那就是说，只要能模范地遵守纪律，哪怕在严管制劳改区里也还能保证每月给你三个卢布嘛，这差不多够买一公斤黄油啦！

说得倒好！大概这位历史学家"吉星高照"（再加上他写过几篇观点"正确"的文章），所以他才没有进劳改营呆呆吧。小卖部里要有面包、廉价糖果和人造黄油就算好事了。实际上，面包每月只来两、三次，糖果的价钱很贵。根本看不到什么黄油、砂糖！就算售货员积极肯干，愿意进货（他是不会的），"领导"也会向他示意嘛！所以，小卖部的货单上只有：牙粉、牙膏、牙刷、肥皂、信封（信封还不是到处都有。至于信纸，则哪里也没有，因为囚犯们可以用信纸写申诉书呀！）和高价香烟。亲爱的读者，请不要忘记，这里不像狱外的小卖部那样每天清早开门，你可以今天买二十戈比的东西，明天再买二十戈比的。这里不同！这里的小卖部每月只营业两天，你要在门外先排三小时队。一进去（早在走廊里就有人催促你了）你就得赶紧把你所有的卢布全都买上东西，因为这些卢布并不在你自己手里，所以，帐上存有你多少

卢布，你就得全买上东西：买十包香烟吧，买四筒牙膏吧！

可怜的囚犯剩下的就只有那份口粮了，即移民区给每个人规定的供应定额（要知道，这移民区位于北极圈内呀！）：面包七百克，糖十三克，油脂十九克，肉五十克，鱼八十五克（而且这只是数字而已，领到的肉和鱼质量极差，一般都要立即扔掉一半）。这是数字，在囚犯的饭碗里不可能有，也从来没有过。乌斯特聂拉移民区的囚犯提到他们的菜汤时说："那是泔水，恐怕集体农庄的牲口都不一定要吃它。"诺里尔斯克的犯人来信说："直到现在我们这里还主要是吃糠和碎麦子。"另外还有一种所谓惩戒伙食：每日四百克面包，只许吃一次热菜汤。

不错，在北方对于那些"从事特别艰苦的劳动"的人还另外给一点伙食补助。但是，我们既然已对群岛有所了解，就不难想象列入这个清单的是什么样的劳动了（并非所有艰苦劳动都能列为"特别艰苦的劳动"），我们也知道这"补助伙食"多么糟踏人……以囚犯皮丘金为例，他"还能干活的时候，每个季度可以淘出四十公斤沙金，每天可以扛运七八百根枕木。可是，在劳改的第十三个年头他成了残废，于是给他的伙食标准就改为压缩标准了"。写信人问道：难道他因伤致残之后胃便立即缩小了吗？

我们也要问问：仅仅一个皮丘金就用他淘得的每月四十公斤沙金供养了多少名外交官呀?!大概我们的驻尼泊尔大使馆是完全靠他养活的吧，苏联驻尼泊尔使馆的伙食标准也随之压缩了吗？

各地来信都说：普遍饥饿，吃不饱。伊尔库茨克州来信说："许多人患胃溃疡，患肺结核。"梁赞州来信说："年轻人患胃溃疡，患肺结核。""患肺病的人很多。"

原先，特种劳改营里有时还准许煮点或煎点自己的东西吃，这里则一律禁止。何况囚犯也没有什么可煮的东西。

为了便于控制这些人而采用的正是这种古老的手段——饥饿。

此外，囚犯们还得劳动。劳动定额提高了：据说，这是因为经过改革后（人体肌肉的）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不错，是八小时劳动日。还是原先那些班组，还是由囚犯驱赶囚犯去劳动。在卡里卡托克说服一些二等残废人去参加劳动，条件是答应对他们适用关于“三分之二刑期”的规定。于是那些缺胳臂少腿的人也都争着去干三等残废干的活，三等残废则去干一般劳动。

但是如果活计不够他们全体干呢，但是如果劳动日太短呢，但是如果星期天可惜还没占用呢，如果“劳动魔术师”不肯给我们改造这些渣滓呢？——那我们手里还有一个魔术师——制度！

奥伊米亚康和诺里尔斯克两处的特种的和严管制的“移民区”的囚犯来信说：所有私人衣物，如绒线衫、棉背心、棉帽，更不必说皮大衣了，统统被拿走（这是在一九六三年啊！是十月时代的第四十六个年头啊！），而且“不发给任何棉内衣，也不允许穿任何暖和衣服。违反了就会关禁闭”（列绍蒂，克拉斯特种劳改营）。“除贴身衬衣外全部衣物都被拿走。每人发布制服、棉上衣、呢衣各一件和一顶斯大林式无毛棉帽。这是在奥伊米亚康地区的邱迪吉尔卡，那里最低气温达摄氏零下五十一度！”

的确，怎么能忘掉呢？除了饥饿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有效地控制人？当然是寒冷。寒冷。

教育效果特别好的是所谓特别制度，又称“独院”。用劳改营的新词说，这是“特危累和少校们”呆的地方（“特危累”即“特别危险的累犯”，这顶帽子由地方法院给戴）。[1] 首先这里实行的是穿条纹粗布衣服。囚犯们戴“房式帽”，上衣和裤子都是用印着白蓝两色宽条纹的、做床垫用的粗布做的。这是我国的监狱思

---

[1] 从前还有一个简称我一直没有机会提到它，那就是“алжир”（奥尔日尔）“叛妻营”，它的全称是“关押祖国叛徒们的妻子的特种劳改营”（当时有过这种专门劳改营）。

想家和“新社会”的法学家苦思冥想出来的绝招，是他们在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三分之二、“十月”胜利四十多年之后、在即将跨入共产主义大门的时候想出来的！他们认为应该让自己的罪犯们披上小丑般的外衣才对。(从各地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种条纹布衣服给今天的二十五年刑期的劳改犯带来的痛苦和伤害甚至比其它办法更大。)

属于特别制度的还有：工棚的窗户全有铁格子，工棚全部上锁。老工棚的木头开始朽了，新建了能容纳很多人的砖石结构的加强管制棚（尽管现在劳改营里除了喝“契菲尔”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违章事件，没有胡闹、斗殴，甚至打牌的也没有了)。出入营区必须排队，而且上身要笔挺，否则既不让出去，也不让进来。如果吃得脑满肠肥的看守发现队伍里有人吸烟，就会立即冲过来，一脚把人踢翻在地，夺下香烟，拖进禁闭室。如果今天没有带出去劳动，那你也休想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你应该像看展览品一样看着你的床，直到晚上睡觉前不能靠近它一步。一九六三年六月，下达了一道拔草命令，要求把营区周围的草全拔光，免得囚犯躺在地上休息。个别还留下草的地方，则树起小木牌：“不许躺卧！”(伊尔库茨克州)

啊！这一切都多么熟悉！我们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些？我们不久前还听到有人谈论这类劳改营？这不就是贝利亚时期的特种劳改营吗？特种，特别……

再看看索利卡姆斯克的特别制度吧，人们写道：“只要稍微有点闹声，冲锋枪筒会立即从送饭口伸进来。”

当然，到处都是为了一点小错误就会关进惩戒隔离室的。例如，派一个人去单独往汽车上装水泥板（每块一百二十八公斤），他搬不动，拒绝了。为此关他七天惩戒隔离室！

一九六四年，莫尔多维亚的一个年轻囚犯得知，似乎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在日内瓦签署过一项国际协议，禁止在监禁地点强迫

囚犯劳动。于是他不再去劳动了。这一心血来潮的举动使他蹲了六个月的惩戒隔离室。

"这一切全都是种族灭绝罪！"——卡拉万斯基这样写道。

可是，要是英国工党的左派分子对此有另外的叫法呢？（哎呀！不要老跟工党左派过不去嘛！要知道，如果连他们也对我们不满意的话，我们的威信不就全完了吗！……）

但是，怎么总是说这些沉闷不快的事情呢？为了做得公道，我们让一位年轻的"实际工作者"来评论一下这个制度吧。这个人是一九六二年从塔夫达的内务部干部学校毕业的。他说："从前（一九六一年以前），召开报告会时要派十名看守去维持秩序，还管不好。现在呢，连苍蝇飞的声音都能听见。囚犯们互相监督。他们都怕被转为另一种更严的制度。现在工作好做多了，尤其是颁布了那项（关于枪决的）命令之后。已经对几个人适用过了。可不像从前那样：囚犯拿着刀子跑到岗楼来对你说'把我抓起来吧，我把那个坏蛋给宰了！'……那时候真是没法做工作。"

当然，空气干净多了。移民区学校的一位女教员也证实了这一点。她写道："谁敢在政治讨论课上偷偷地笑，就会丢掉提前假释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你属于积极分子，那你再闹厉害点也没事，你只须注意别人不扔烟头、迅速脱帽之类的行为就行了，你自己可以干轻活，拿到一个好鉴定，将来办户口时也会照顾你的。"

还有所谓"集体委员会"和"维持内部秩序小组"。（马尔琴科把这种小组叫作："母狗出去散步小组"，每个字的字头都一样。）这些组织很像民团，成员都佩带红袖章，任务是监督囚犯违反制度的行为，帮助看守！而且这种委员会有权建议给予惩罚！凡是有条件适用"三分之二刑期"和"二分之一刑期"的人都必须帮助"维持内部秩序小组"的工作，否则"提前假释"就不会有你的份。而那些必须服满刑期的人则不去，因为他们不需要。И·А·阿列克谢耶夫写道："比较起来，群众大都宁愿选择缓慢的死刑，

也不想参加这类委员会和小组。”

这不就是某种净化了的气氛吗？是吧？看，劳改营里居然也有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会培养人们多么高尚的品质啊（培养人们奴颜婢膝、告密陷害、把邻人推下火坑）！而这就是那个金光闪闪的、通向改造的天堂的梯子！但是，这梯子又是多么滑啊！

例如，蒂拉斯波的第二劳改区的奥卢霍夫（共产党员，曾任商店经理，因贪污坐牢）就来信抱怨：他在模范生产者代表会议上发了言，揭发了一些人，并“号召那些误入歧途的祖国儿女认真参加劳动，改造自己”，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当他走下讲台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却有一个囚犯走过来对他说：“假如十年前你这块臭肉讲出刚才这番话，我会当众在讲台上就把你宰掉。现在不行了，法律妨碍我，保护着你这条母狗！宰了你，我也会被枪毙的。”

读者会感到，一切事物都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会感到对立的统一和矛盾的互相转化吧？一方面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则依靠关于枪决的命令，不是吗？（还有，读者注意到这个人说的时间了吧？“假如在十年前……”，这就说明，十年前的囚犯今天仍旧关在原地。一个时代过去了，它已不复存在，可是这个囚犯却仍旧关在原地……）

同一个奥卢霍夫还叙述了关于囚犯伊萨耶夫的事。伊萨耶夫原先是一位少校，现在在莫尔达维亚的第四劳改区，他对“劳改区内违反纪律的囚犯向来是不妥协的，他敢于在‘集体委员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些囚犯”，这也就等于反对对这些囚犯适用提前假释的优待办法，或者等于要求惩罚他们。可是，怎么样呢？“第二天夜里他的牛犊皮大皮靴丢了一只。他只好穿皮鞋，但又过了一天，皮鞋又丢了一只。”看，在我们这个时代，被追得走投无路的阶级敌人竟然采取这种不体面的斗争方式了！……

当然，社会生活是很敏感的，好像双刃的宝剑，它需要认真

对待、善于引导。否则就会发生一些对囚犯起腐蚀作用的情况。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的事情就是一例。经过是这样的：领导决定晚上八点召开第一次劳改营全体大会。人们到齐了，但直到十点还只听见台前的乐队奏乐，大会迟迟不开，虽然军官们早已在主席台上就座。于是，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请乐队“暂停”一下，请求领导回答：大会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回答是：不开了。这时阿列克谢耶夫说：那么，我们囚犯可要自己开会了，我们的讨论题目是：《生命和时间》。台下的囚犯们也闹闹哄哄表示支持。军官们纷纷从台上下去了。阿列克谢耶夫拿着笔记本走上讲台，开始讲话，首先谈个人迷信问题。这时几名军官冲来，把主席台拆掉，把电灯泡拧下来，并且不断用力推开那些拥到台前的囚犯。军官们奉命逮捕阿列克谢耶夫，但阿列克谢耶夫却对他们发出呼吁：“看守们，公民们！你们可都是共青团员呀！你们都听到了，我刚才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你们想打击什么人？难道想打击列宁思想的良心吗？”就算是列宁思想的良心，也要逮捕！但是，一批高加索人囚犯把阿列克谢耶夫藏到自己工棚里，这天晚上他总算没被抓住。后来他还是蹲了禁闭室。关禁闭之后，又把他的发言认定为“反苏宣传”。“集体委员会”要求劳改营当局把进行反苏宣传的阿列克谢耶夫关进隔离室。当局根据这一要求向人民法院提出指控，结果阿列克谢耶夫被加判三年严格监禁。

为了正确地指导人们的思想，现在移民区里规定每周上政治课，这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课由担任各大队（每大队二百至二百五十人）队长的军官讲授，每次围绕一定的专题，例如：我国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我国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古巴的成就，殖民非洲的觉醒，等等。据说，移民区的囚犯都非常关心这些问题，他们了解这些问题之后便会更好地遵守移民区的各项制度，更卖力地劳动。（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确理解。例如，有人就从伊尔库茨克写信来说：“在饥饿的劳改营里却向我们讲什么我国

的产品极大丰富。我们这里在劳动中只看见十字镐、铁锹、抬筐、背篓，但人们却向我们宣讲什么到处都在实现机械化。”）

在上面提到的全营大会之前，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还干过这样一件怪事：他在政治课上举手请求发言，然后站起来对讲课人说，“您是内务部的军官，我们这些人是囚犯。咱们都是在个人迷信时期犯了罪的。因此，我们和您同是人民的敌人。如今咱们都应该以自己的忘我劳动向苏联人民请罪。所以，我很严肃地建议您，少校公民，要坚决地走共产主义的路！”这件事被认为是他“有不健康的反苏情绪”，后来写进了他的档案。

这位阿列克谢耶夫从乌斯特维姆劳改营寄来一封内容广泛的长信。信纸已经揉搓软了，字迹也不清楚，我花了六个小时才看完它。这里真是无所不包！值得注意的是他发出的这种一般性议论：“什么人现在蹲在劳改移民区，蹲在这奴隶的贫民窟里？这是被社会排挤出来的、人民中间最勇敢而不妥协的那个阶层……是官僚集团把这一部分勇敢的青年推下生活深渊的，因为它看到：如果这部分青年用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武装起来的话，那将对官僚集团十分危险。”“囚犯是被排挤出来的无产阶级的孩子，是劳改营的财产。”

另一个工具便是**广播**，如果能正确使用，它也能起很重要的作用。（不是音乐和爱情歌曲，而是教育性节目！）广播也和其它一切一样，按制度不同区别对待：对特种制度移民区播音二－三小时，对普通移民区则整日播送。[1]

此外还有**学校**！（那还用说！我们是要把囚犯改造好送回社会去的呀！）只不过“一切都是形式主义的。是为了遮人耳目……人们是在棍棒驱赶下去学校的，学习兴趣被加强管制棚打消了”，而

[1] 如果是这样，恐怕人们会宁愿跑到特种制度移民区去穿起条纹布囚服来！……

且年轻的人们因为自己的衣着破旧“不好意思让自由人女教师看见自己这副样子”。

是的，对于囚犯来说，看到一个活女人这是件重大的事情啊！

不用说，只有根据战后斯大林和贝利亚实行的**男女分别**关押原则，才能对犯人进行正确的教育和改造，尤其对成年犯人，对刑期长达几十年的人更是如此。这个办法在古拉格群岛已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了。尽管整个人类世界都承认男女两性间的互相作用是推动改良和发展的因素，但这个原则是古拉格群岛所绝不能接受的，因为那样一来劳改犯的生活就会“像是住疗养院”了。而且，我们越是接近已经照亮半边天的共产主义光辉，就越得坚决地把男女罪犯分开，只有通过这种隔绝才能使他（她）们好好受点苦楚，从而得到改造。[①]

在我们这个不是没有公开性的、不是人民无权的时代，通过劳改移民区进行改造的这一整套制度也还受到社会的监督。是的，我们有**监察委员会**。读者还没有忘掉它吧，它并没有被取消。

监察委员会是由“地方组织的代表”组成的。但实际上，在荒僻地区，在自由居民的村镇上，除了行政领导的夫人们之外谁能参加这类委员会呢？它不过是只会重复丈夫意见的娘儿们委员会而已。

但是，这个办法在某些大城市却有时会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区党委委派女共产党员加丽娜·彼得罗夫娜·菲利波娃参加敖德萨监狱的监察委员会。她极力推辞：“我可不愿意和罪犯打交道！”可是，党有党纪呀，她不得不参加。参加之后，她

① 治安部长季库诺夫（我很快就要谈到我同他的会见）亲自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个人单独接见（即允许在一间关闭的屋子里同囚犯单独会面三天）中，来探视儿子的母亲充当了他的妻子。这情节可算是有点“古风”了吧！要知道，那里还有过女儿让亲父亲吃奶的事呢！但是，当这位部长先生为这些野蛮人的卑鄙肮脏行为大皱眉头的时候，他却一点也没有想到那个二十五年看不见女人的独身男人会有什么感受。

被这项工作完全吸引住了！她在监狱里看到了各种人，而且他们中间有多少无辜受害者啊！有多少人已经彻底悔改了呀！于是，她想出了一个办法：不要监狱当局参加，她要同囚犯个别谈话（这自然使监狱当局十分不快）。有些囚犯起初一连几个月都像仇人似的看着她，但后来终于改变了态度。她从此便常去监狱，一个星期去两次、三次、四次。在监狱里一直呆到晚点名，有时甚至假日也不休息。这时，那些派她来的人们当然就不很高兴了。她向上级机关反映刑期二十五年的犯人的情况（刑法典上已经没有这么长的刑期了，但是人们却还在服刑），请求给刑满释放的人安排工作，反映永久流放的情况。上级机关或者对她的报告感到不可理解，（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监禁场所管理局的局长，一位将军，一九六三年曾极力使她相信，苏联国内根本不存在判二十五年刑的人。而且，最可笑的是，这位局长原来是“不知道”！）或者对她谈的情况完全了解，然而坚决反对她的意见。接着便在乌克兰共和国政府系统和按党的系统开始对她进行迫害和诬陷了。她所在的那个委员会也因为不断提意见而被解散。

是的，不能允许人们妨碍古拉格群岛的统治者们！不能允许人们妨碍实际工作者！读者大概记得吧：“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人们现在还在那里工作，或许人员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十”，这不是我们刚刚从他们本人那里了解到的吗！？

但是，他们在思想上是否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现在是否对自己看管的人们多少有了些怜悯之心？是的，所有报纸和杂志都一再强调现在他们确实有怜悯之心了。我并没有专门去寻找，但我们已在《文学报》上看到（第一章）叶尔采沃村的今天的劳改营主人对犯人是多么关心备至了。另外，《文学报》还请移民区的首长发表了谈话：（1964 年 3 月 3 日）

“要批评（在劳改移民区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那是很容易的，但要对他们进行帮助就困难得多。而要选择合适的人选——积极

热情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文化素养的（还一定得有文化素养！）、对这项工作有兴趣而且在这方面有才干的人选，那就更加困难……应该为这些人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们的薪金很微薄，每天工作十分繁重，这是我深深了解的……”

我们要能在这里结束本章该多好，就认定是这样好了！那就可以生活得更平静，可以献身艺术，还可以更安全地献身于科学。但是，这些可诅咒的来信，这些揉皱了的、磨破了的、通过非法的“小道”从劳改营里寄出来的信件却不允许我结束它。那么，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在信中提到那些每天担负着繁重工作、把全部身心都献给囚犯的人时，是怎么说的呢？请看：

伊·恩写道：“你把心里的话全都掏给教育员，可是，你会觉得你的话像是碰在他的灰色军大衣上反弹回来。这时，你恨不得想问他：‘对不起，您家那头奶牛近来挺好吧？’因为这位教育员在牛棚里花在奶牛身上的时间要比他用于教育对象的时间多得多。”（寄自古拉斯特种劳改营，列绍蒂。）

列-恩写道：“还是原先那些蠢货当看守。劳改营头头是个典型的沃尔科伏依式的人物。绝不能跟看守们顶嘴，否则立即关禁闭。”

科-恩写道：“队长们跟我们说话，全用劳改营里那一套词儿。开口就是‘臭肉！’‘母狗！’‘畜牲！’……”（叶尔佐夫站。真凑巧！）

科-伊写道：“我们这里的劳改营领导可以说是沃尔科伏依的亲兄弟。不错，他倒不用鞭子抽人，他是用拳头打，看人时那两只眼活像只饿狼……大队长是原先的行动人员，他豢养着一个‘坏事报告人’，每告密一件事，就奖给那人一点麻醉品……那些过去打人、折磨人、枪杀人的家伙如今只不过是从一个劳改营调到了另一个劳改营，职务稍微有所变动而已。”（寄自伊尔库茨克州）

Н·Г·帕-夫来信说：“移民区的头子仅直接助手就有六名。所有生产建设单位都在赶走白吃饭的人，于是这些家伙就跑到移

民区来了……原先劳改营里的那些蠢货……至今也还在继续工作。他们在混日子，混工龄，等待达到退休年龄。有的到年龄也不退休。他们一点也没有消瘦。囚犯在他们眼里过去不是人，现在也还不是人。”

В·Н·德-维的信中说：“我们诺里尔斯克第288号信箱这里没有一个‘新面孔’，全是原先的贝利亚分子。有人退休了，但接替的还是这些人（就是一九五六年被赶走的那些人）……他们的工龄按两倍算，工资标准定得很高，休假期间很长，伙食很好。他们干一年算两年，所以其中有的人打算到三十五岁就退休！……”

帕-恩写道：“我们这个分部有十二三个壮小伙子，穿着几乎到脚面的熟皮大衣，戴着皮帽，脚上是军队发的长筒毡靴。这些人为什么不到矿山或垦荒地去劳动，去发挥力量呢？为什么不把这里的职位让给年岁较大的人？不，哪怕套上绳索，由顺伏尔加河而下的轮船来拖他们，也拖不走！大概只有这批寄生虫才会向上级报告说囚犯们不易改造。因为犯人一少，他们就会被裁减了。”

可见，囚犯仍和从前一样在统治者的菜园子里替主人种土豆，浇地，替他们饲养家畜，做家具。

看到这里，一些缺乏准备的读者可能会困惑不解地叫起来：那么，到底谁说得对？到底该相信谁？

当然应该相信报纸上的报道喽！读者，你相信报纸吧！永远相信我国的报纸吧！

* * *

内务部人员构成一种力量。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绝不会退让。既然一九五六年能顶住，今后更会站稳脚跟的，会站稳的！

这不仅指劳改机关。也不仅是治安部。我们已经看到那些报刊，那些苏维埃代表们是多么乐于支持他们。

因为他们是顶梁柱，是许多东西赖以生存的支柱。

而且，他们不仅有力量。他们还有理论论据。同他们争论并不那么容易。

我试了试。

其实，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打算。我不过是被这些来信所驱使而已，今天的囚犯的这些来信是我全然没有预料到的。今天的群岛居民怀着莫大希望请求我：替他们把话说出来！维护他们的权利！使那些人变得有点人性！

可是，我向谁去说？要知道，人家连听都不要听……假如有自由的报刊，我会把这一切都发表出去，一旦发表，就会促进大家来讨论！

可是眼下（一九六四年一月）我却只是作为一个不公开的、犹豫不决、忐忑不安的乞求者在各机关的走廊里转来转去，在传达室的小窗口前躬身等待，承受着值班军人的不耐烦的和怀疑的目光。一个政论作家要想让公事繁忙的政府大员们把耳朵腾出哪怕半小时来听听他的话，那他得争取到多大的社会荣誉和照顾才能办到啊！

但是，这还不是主要困难。我的主要困难，就像当年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队长会上一样，是：向他们讲些什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讲话？

把我在这本书里写的那些真实思想全讲出来，既危险又完全无用。那仅仅会是一个社会听不到的人在一间寂静的办公室里发昏而已，那些迫切盼望着的人不会知道，实际问题丝毫也解决不了。

那么，我该怎么讲？我只要一通过他们那大理石的、镜子般明亮光洁的办公大楼前厅，一走上那柔软舒适的地毯，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些起码的绊羁——这是些用生丝制成的绳子，它们好像穿透我的舌头、耳朵和眼睑，紧紧地缝在我的两肩上，缝在我背

部的皮上和肚皮上。我不得不接受的起码的绊羁就是：

1. 我得承认：过去、现在和将来光荣都归于党！（这也就是说，总的惩治政策不可能是不正确的。我不得怀疑整个古拉格群岛存在的必要性。我也不能强调“大部分坐牢的人是无辜的”。）

2. 我得承认：将要同我谈话的那些高官显贵是忠于其事业的，是关怀囚犯的。我不能指责他们口是心非、冷漠无情、不了解情况。（他们既然全心全意为事业工作，怎么能不了解自己的事业呢！）

反过来，我本人干预此事的动机倒值得怀疑：我算什么人？既然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为什么要干预？我是否抱有某些肮脏的自私目的？……即使没有我，党也全看在眼里嘛，会全部正确处理的，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干预？……

为了使自己多少显得理直气壮些，我选择了我被提名为列宁奖金获奖候选人的这个身份。于是，我就像棋盘中的“小卒”一样，一步步向前“拱”去，心里想：说不定过了“河”能当“车”使呢？

于是，我来到苏联最高苏维埃。来到法案委员会。原来这个委员会正在制定新劳改法典，这项工作已进行不止一年了。新法典将是群岛未来生活的规范，它将代替一九三三年那部确实存在过又从未存在过的、又好像是从来没有成文的法典。这个委员会同意接见我，想让我这个在古拉格群岛成长起来的人了解一下他们的智慧，并把我的一些幼稚想法提供给他们作点缀。

接见我的共有八个人。其中四人年纪之轻使我惊讶：这些孩子们如果能念完大学就算不错了，看样子不像是读完大学的。他们已升上权力宝座，升得太快了！看，他们在这座大理石的、镶木地板的官殿里显得多么悠然自得！而我呢，单单被允许进入这里就要经过各级极其审慎的考虑。委员会的主席伊万·安德烈耶

维奇·巴布欣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十足的好好先生。似乎如果事情取决于他的话，他明天就会把古拉格群岛解散掉。但是，他的任务却是：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默默坐在一旁。其中讲话最多的是两个小老头——活像格里鲍耶陀夫笔下的奥察柯夫*时代，征服克里米亚时代的小老头。他们是那种一旦学会点什么就永远僵化在脑子里的典型人物。我敢保证他们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之后连报纸也没有浏览过；对他们来说，不论发生过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他们的观点！其中一人穿蓝色上衣，我总觉得那像是叶卡捷林娜女皇时期的浅蓝色宫廷制服，我甚至看出了那胸前拧下叶卡捷林娜银星章之后留下的痕迹。这两个老头从我一迈进房门时就对我和我的来访流露了十分的反感。不过，他们还是决定表示出应有的耐心。

当你心里有许多话要说时，往往倒不容易开口。何况这时我还被许多丝绳束缚住，仿佛稍一动作就牵扯得很痛。

但是，我的主旨演说还是准备好了的，而且，看来不会被任何丝绳牵扯住。我首先对他们谈到：有人认为（我不能说他们认为）现在劳改营有变成"疗养院"的危险，似乎如果劳改营没有饥饿和寒冷，就太享福了。我不知道此话从何说起？我请求他们，尽管缺乏亲身体验，也不妨设想一下监禁本身给人造成的痛苦和惩罚：一个人不能住在他自己家里，同他在一起的是他不希望一起住的人，他不能同自己所希望的人（家属、朋友）们在一起；他看不到子女的成长；不能自由走动，一般也不能从事自己喜爱的专业劳动；他经常感到别人——具有不同生活经验、观点和习惯的其他犯人对自己的压力甚至仇视；他受不到起柔化作用的异性的影响（就不必谈生理问题了）；甚至医疗条件也坏得同狱外无法相比。这哪里能同什么黑海海滨的疗养院相比呢？为什么那么害

* 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土耳其要塞，1788年被俄军攻下。——译者注

怕监狱会变成“疗养院”？

不，这个想法根本不能打动他们。他们稳坐如山，毫不为之所动。

那么，就谈得广泛些吧。我们的目的不是使囚犯改造后重返社会吗？那么为什么要让他们经常生活在严酷的环境之中？为什么现在的制度仍要百般凌辱犯人、经常在肉体上折磨他们？使他们变成残废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了。于是他们向我解释我的错误：首先，是我对今天的犯人构成不够了解，是凭老印象看问题，落后于生活（这确是我的弱点，我的确没有看见现在坐牢的人们）。而对于那些被隔离的累犯来说，我刚才列举的事根本算不上剥夺权利，目前的制度只能使他们觉悟起来（丝绳把我拉痛了！是的，在这一范围内他们有发言权，他们了解现在是什么人在坐牢）。使他们重返社会？……是的，这当然不成问题。老头子们象留声机似地说着，但我从那声音里听见的却是：不，当然不能，让他们老死在移民区吧，这样咱们大家都会太平些。

那么，现在的管理制度呢？其中一位检察长回答了，就是那个穿蓝色制服、胸前有星章痕迹的老头儿，他头上的白发已经很稀了，脸型有点像苏沃洛夫将军。他回答说：

“实行严格管理制度以来，我们已经收到一些效果：杀人事件从每年两千起（在这间屋子里是可以谈这类数字的）已降低到目前的几十起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数字，我悄悄把它记了下来。看来，这就是我这次访问的最大收获。

什么人在坐牢？当然，要想谈论制度是否得当的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坐牢的是些什么人。弄清这一点需要几十名心理学家和法学家，得让他们去现场调查，自由地同囚犯谈话，然后才有可能展开讨论。而我那些“劳改营通信员们”的来信恰恰不写这些

事，他们不写自己和其他犯人是为什么坐牢的。[1]一九六四年——囚犯的亲属们还在孤单中吞咽着泪水。莫斯科的自由人还不知道劳改营的详情（《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描写的是“过去”），他们还是胆怯的，四分五裂的，还不存在任何社会运动。还是以前的，斯大林时代的死寂。

一般性讨论已经结束，我们过渡到专题讨论。其实，不用我说，委员会也都清楚，而且一切都已决定。他们并不需要我，只不过出于好奇，想见一见我而已。

邮政包裹？只能限制在五公斤之内，而且要按现行办法分成几等，区别对待。我提议每一等的限额至少要提高一倍，按邮局规定每个邮包的重量限制可在八公斤之内。我说：“他们在挨饿！用饥饿能够改造人吗?!”

“怎么会挨饿?!”委员会对此一致表示愤慨。“我们亲自去过，我们看到那里吃剩下的面包成汽车地往外拉!”（是拉去给看守们喂猪吗？……）

我该怎么办？我应该对他们大声说：“你们说谎！这不可能！”可是，通过肩膀缝在后臀的丝绳紧紧拉住我的舌头。我不能违反原定的条件：应该承认他们了解情况，是诚心实意的，是关怀囚犯的。把囚犯们给我的信拿给他们看吗？这些信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堆废纸，何况把那些揉搓得不成样子的纸片摆到这铺着红色天鹅绒的会议桌上来，也显得可笑，不成体统。而且也绝对不能拿给他们看，他们会记下姓名，这些小伙子们就会遭殃了！

“但是，让他们多收到几次邮包，这对国家并没有什么损害

---

① 的确，怎么能想象会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累犯**呢！例如，塔夫达劳改移民区关押着一个八十七岁的囚犯，他曾是沙皇的军官，大概也是个白匪吧。到一九六二年他已经是在服**第二个二十年**刑期的第十八个年头。他的大胡子又宽又密，现在在劳改营生产手套的车间当检查员。请问：为了他在青年时期的某种信仰便让他坐四十年牢，是不是太多些？而类似的，但又各自不同的情况有多少啊！

呀！”

“您知道是什么人利用这些邮包吗？”委员们反驳说，“基本上是有钱的家庭。（“有钱的”这个词这里可以使用，因为谈论现实的国家性问题时需要它。）是那些在坐牢之前偷足了的、隐藏了财产的人们。因此，允许增加接受邮包的次数，就会相对地使劳动者家庭处于不利地位！”

这样，我又被绳子拴住了，它简直勒进了我的肉里！是呀，这又是一条不能违反的条件：劳动阶层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成天坐在这里就是为了劳动阶层的利益嘛！

我发现自己实在不够机敏。我不知道该怎样反驳他们。对他们说：“不，你们没有说服我？”他们才不理呢，我算什么，难道我是他们的上司？！

“那么，小卖部呢？”我又从另一方面逼过去！“我们为什么不实行社会主义付酬原则？自己劳动挣的钱，让他自己拿去花好啦！”

“还应该积累一些基金供释放时使用！”他们又反驳我，“否则犯人在刑满释放时不名一文，就得靠国家养活。”

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条绳也拉紧了，我的舌头还是不能动弹。我怎么能提出要慷国家之慨而给犯人提高劳动报酬呢？！

“那么，总该保证所有的星期天都能休息吧！”

“这一点早已经布置下去了。正是这样执行的。”

“可是，在营区内部还有几十种方法可以侵占囚犯星期日的休息。那就请你们特别强调一下，不准侵犯星期天的休息吧。”

“法典里不能规定得那么细腻。”

工作日是八小时制。我有气无力地说了几句关于七小时工作日的话，但自己也觉得过分了：现在已经不是十二小时劳动，也不是十小时了。还想怎么样？！

“通信，这是使囚犯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保持联系的一条渠道。（看，我也学会摆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了！）请不要限制通信吧。”

但是，这一点他们不想重新讨论。限额已经规定出来，而且不像从前那么严格……他们还把接见次数规定表拿给我看，其中还包括为期三天的“单独接见”，而我们那时期则是多年不许接见的。所以，也过得去。我甚至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的规定是比较宽大的；差一点儿没称赞他们。

我疲倦了。到处都被牵制住，一动也不能动。我在这里毫无益处，我该走了。

从这间节日般辉煌的、宽敞的办公室看，根据这些软椅里的委员们滔滔不绝的谈话看，劳改营根本不是什么可怕的地方，它甚至是很通情达理的。看，成卡车成卡车地往外拉剩面包……总不该把这些可怕的人全放回社会上来吧？这时，我想起了那些刑事犯贼头们的嘴脸……我已经十年不在牢房了，怎么知道现在坐牢的是些什么人？我的弟兄们，政治犯们，似乎已被释放。强制迁移的那些民族也回去了……

另一个讨厌的老头想听听我对于绝食的看法：如果喂的是比烂菜汤更富有营养的东西，我总不能不赞成通过软管强制给绝食者灌食吧？[①]

我只好厚着脸皮对他们说：囚犯不仅有权使用绝食这唯一手段维护自己的主张，而且有……饿死的权利。

我的论据使他们惊讶不已。可是我这里一切都是被拉住的：我不能对他们谈绝食与国内社会舆论的关系。

我离开那里时感到疲倦，而且像是被击溃了：我甚至有点动摇，他们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将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最高苏维埃将会全体一致给予批准。

---

① 只是从马尔琴科的书里我们才得知他们采用的一种新手段：通过软管灌开水，烫坏犯人们的食道。

苏联社会治安部部长瓦季姆·斯捷潘诺维奇·季库诺夫。真是异想天开！我这个微不足道的"Щ字232号"政治苦役犯竟要去见内务部长，并且教给他该怎样管理古拉格吗?!

要想接近部长办公室，先要见一些上校。他们一个个养得肥头大耳、细皮嫩肉的，但动作都十分敏捷。进入主任秘书的办公室后就再没有往前去的路了。这个房间里没有别的门。可是有一个巨大的玻璃柜，玻璃里面挂着绉纱帷幔。柜子之大足能装进两个骑马的人。原来这就是进入部长办公室的门斗。办公室很大，坐下两百人也宽宽绰绰。

部长本人胖得有些病态，下颚很宽，整个脸是上小下大，成个梯形。全部谈话过程中他一直严肃而冷淡地打着官腔，对我的话毫无兴趣，只是出于职责不得不听。

我首先摆出一大段关于"疗养院"的议论。接着谈到上面那些一般性问题："我们"（我和他们）面前究竟有没有改造囚犯的共同任务?（我对"改造"的看法已在第四部里谈过）为什么要有一九六一年的转变？为什么要建立四种劳改区？我向他重复着本章前面提到的那些枯燥的问题：关于伙食、邮包、衣服、劳动安排、关于违法乱纪、关于"实际工作者"的面目。（至于我收到的信件，这次连带都没敢带来：怕他当场没收掉。我只是摘抄下其中一些话，而且不提写信人。）我向他谈了足有四十分钟，或许有一小时，相当长，而他居然会耐心地听完，这倒使我有点惊奇。

他有时也打断我，为的是立即表示同意或者否定我的意见。他并不对我一概否定。我原来把他设想成一堵骄傲的墙，但这人却温和得多。他对许多问题都表示同意！他同意应该多发些零用钱，好去小卖部买东西，邮包限额应该放宽，不必像法案委员会那样对包裹内容作具体规定。（但是，这些都不取决于他呀！不是由他这位部长决定的。由新劳改法典规定！）他也同意让囚犯可以煮点或烧点自己的东西吃。（可是东西哪里来呢?）通信和邮寄书报可

以不受限制。(这可要给劳改营的书报检查人员增加负担。)他也反对阿拉克切耶夫*式的过分暴虐的措施，例如，经常站队之类。(但是，领导机关去干涉这类具体事情是不策略的：破坏纪律容易，要重整纪律可就难了。)他同意营区里的草不必拔掉。(可是，杜布洛夫特种营的囚犯竟然在机械制造厂旁边开辟了私人菜地，机床工们休息时就去侍弄自己的菜地，每人有二三平方米，种些西红柿和黄瓜之类。部长已经下令立即全部刨掉它，而且他言下颇有些洋洋自得之意！我对他说："人和土地的联系有助于道德教育！"他却反驳说："犯人私有菜地会培养私有制的本能！")当部长听到又把"营区外拘禁"的人们抓回劳改营时，他甚至为之震惊。这太可怕了！(我没好意思问他：你当时担任什么职务？你是怎样反对这种作法的？)不仅如此，这位部长还承认：现在对囚犯的看管比"伊万·杰尼索维奇"那时候严厉得多！

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可以说服他的呢！我们简直没有什么可谈了。(一个不担任职务的人的建议，部长认为是不必记下来的！)

我该提出什么建议？把群岛解散，改为无警戒监禁吗？说都说不出口，十足的乌托邦！何况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不取决于个别人，它总是在许多机关中串来串去，而不取决于其中任何一个个人的。

部长则相反，他信心十足地坚持说：条纹布囚服对那些累犯来说是需要的。("您如果知道这是些什么人，就不会反对给他们穿条纹布囚服了！")而听到我对看守人员和警卫人员的指责时，他觉得很委屈，他说："这是你弄错了，要么就是你的感受与众不同，这或许是你的个人经历所造成的。"他极力使我相信现在谁也不愿意去当看守，赶都赶不去，因为现在没有优待了。(我真想对他高

---

* 19世纪俄国陆军大臣，实行暴虐的军警统制。——译者注

兴地叫起来："不愿意去，这是一种健康的、人民大众的心理呀！"但是耳朵、舌头和眼皮全被预防性的丝绳牵扯住，动不得。而且，我忽略了一点：不愿意去的只是上等兵和军士，军官们还是在争先恐后往那里钻。）他说，不得不依靠预备役人员去当看守。相反，部长向我说明，是囚犯越来越放肆了．现在看守同囚犯谈话时很有礼貌，规规矩矩。

既然微不足道的囚犯们的来信和部长的谈话如此大有径庭，我们应该相信谁呢？很明显：囚犯们在扯谎。

而且这位部长讲话时还说这是他亲眼所见。他是部长，当然有机会去劳改营看看，我就没有机会。我想不想去看看？去克柳科沃，去杜布洛夫劳改营？（一听他主动提出这两处，我就知道这是波将金式的、安排布置好专供参观的地方。再说，我以什么身份去？是部长派来的监察员吗？那我在囚犯面前连头也抬不起来……我当然不同意去看……）

部长反过来指责囚犯们不够通情达理，对给予他们的关怀毫无反响。他来到马路尼托哥尔斯克劳改移民区问他们："你们对目前的生活有什么意见？"他们当着特种劳改点领导的面就齐声说："没有意见！"而他们自己永远是不满的。

而且部长从下列各种表现上看到了"劳改区改造工作的卓越成效"：

——受到劳改点首长表扬的机床工脸上流露出自豪的神情；

——劳改区的囚犯得知他们的产品（煮水器）是供应英雄的古巴的，都为此感到自豪；

——劳改营的"维持内部秩序小组"（即"母狗出去散步小组"）按期报告工作并进行改选；

——杜布洛夫劳改营里有很多（公家的）鲜花。

部长现在主要关心的是：使每个劳改区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地。部长认为，只要各项有意义的工作都开展起来，囚犯也就

不会再逃跑了。[①]（至于我对他的反驳，指出“人对自由的渴望”等，他甚至无法理解。）

我又一次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部长办公室，深信这一切是不会有尽头的。我认识到自己丝毫未能推动什么，人们将依旧照章办理。我离去时心情十分沉重——不同的人对事物的理解是多么互不相同啊！除非让囚犯亲身高踞于这间办公室的宝座，否则他不可能理解部长的心理；而部长，只要他自己没有落入铁丝网里，他辛辛苦苦开出来的一小块菜地没有被卫兵们践踏掉，只要人们没有强迫他丢掉自由去学习开机床，他也不可能理解囚犯。

犯罪原因研究所。我在这里的谈话倒很有意思。同我座谈的是两名知识分子副所长和几位研究室主任。这些人都很活跃，各有独立的见解，他们也互相争论。座谈会之后，一名副所长B·H·库德里亚夫采夫送我出来，在走廊里他责怪我：“不对，您还是没有把各种观点都考虑进去，托尔斯泰就会考虑的……”接着，他突然对我要了个欺骗手法：“来，咱们顺便去看看我们所长吧，就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卡尔佩茨。”

原来没计划访问所长。我们什么都谈过了，还有什么必要？也好，去打个招呼。哪能不去呢！人家要跟你寒暄两句是抬举你了！这些副所长们、副主任们竟然是在这样一个领导手下工作，这里的整个研究工作是由这样一个人主持的，真叫人没法相信。（我还不知道主要的呢：这位卡尔佩茨还是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呢！）

卡尔佩茨见我进屋，便带着敌意和轻蔑的表情站起来（整个五分钟的谈话好像就是这样站着进行的）——倒像是我再三求见，

① 不过，我们从马尔琴科的书中获知：现在对逃跑者确实是不再抓回来了，只不过是就地处决。

好不容易才如愿以偿似的。也行啊。他脸上透着踌躇满志；坚强；厌恶（这是对我的）。胸前拧着一枚像勋章一样的大徽章，也不可惜那身高级西服。图案是一把直立的剑，刺穿了底下的什么东西，文字是：内务部。（这是一枚很重要的徽章。它表示佩戴者特别早就有了“干净的手，火热的心，冰冷的头脑”。）

“你们刚才谈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他蹙着眉头问道。

我根本不需要同他谈，但我还是出于礼貌简单地重复了几句。

“噢，”这位民主法律工作者似乎刚一听就全明白了，“自由化吗？放纵囚犯？！”

我曾经带着各种问题走访过大理石造的办公室，穿过大玻璃镜的门斗，徒劳无益地寻找答案，而现在，他的几句话就使我意外地豁然开朗，完全回答了我所有问题：

提高囚犯的生活水平？不行！因为这会使劳改营附近的自由居民的生活得不如囚犯，这是不能允许的。

允许囚犯接受更多的邮包？不行！这会对看守人中产生有害影响，因为看守人员也吃不到首都生产的食品。

批评并教育看守人员？不行！我们是依靠这些人来维持的！现在谁都不愿意去干这种工作，可我们又不能给他们很多钱，优惠条件已经取消了。

我们剥夺了囚犯按社会主义原则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不，是他们自绝于社会主义社会的！

“但是，我们不是想让他们重返社会生活吗？！……”

“让他们回来？？？……”佩带利剑徽章的人感到很惊奇。“劳改营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的。劳改营是惩罚！”

是惩罚！——这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惩罚！！

惩——罚——！！！

一把垂直的利剑，它刺杀，它穿透，休想把它移开！

是惩罚！！

古拉格群岛过去存在过，这群岛今天依然存在，这群岛今后还要存在！

不然的话，把那“先进学说”的失算——人们并没有按照它设想的样子成长——的责任推到什么人身上去呢？

第三章

今天的法律

读者已经通过全书看到，在我国，从斯大林时期的最早年代起，从来没有过政治犯。所有从你们面前驱赶过去的那成百万群众，那几百万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人，统统是一般刑事犯。

更何况能言善辩的、总是那么快活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某处的讲台上不是笑容可掬地一再声明：政治犯？没有！！**我国可没有政治犯**！

是啊，悲伤痛苦是容易忘却的，那座山是可以绕过去的，人身上的伤口是容易愈合的。因此，我们几乎信以为真了！甚至有些老囚犯也信以为真了。明明白白是把几百万囚犯释放了嘛！那么，政治犯已经没有了，应该是这样吧？要知道，我们已经回来，亲人们也回到了我们身边，朋友和熟人也回来了呀。我们城市知识界的圈子也像是扩大和充实了，团结起来了。睡过一夜醒来看看，家里并没有什么人被抓走、朋友们打电话来，也都在各自家里嘛！倒也不是已经完全相信，但总难免这样想：现在基本上没有政治犯坐牢了。即使还有几百名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至今（一九六八年）还没有被放回他们本国，尽管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

诅咒还没有解除，但看样子也不会拖很久了……从外表上看，总是（斯大林时期也曾是）一切都光洁清净，什么也看不见。

而尼基塔马不停蹄地到处演说："不论我们党内，还是我们国内，今后永远不会有这种现象和这类事情！"（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新切尔卡斯克事件之前。）

新切尔卡斯克！它可以说是俄国的一个注定会发生最大不幸的城市。好像内战时期给它造成的伤痕还不够似的，它又一次钻到屠刀下面去了。

新切尔卡斯克！整个城市，整个城市的暴动被彻底干净地镇压下去，被完完全全地隐藏起来了！赫鲁晓夫时代也一如既往，使一切消息都消失在一片漆黑中，使人们全都闭目塞听。因此，不仅国外关于新切尔卡斯克事件一无所知，西方电台没有向我们作出解释，甚至那口头传闻的地火也被完全踏灭在该市的周边上，没有蔓延开来。所以国内大部分同胞甚至连这个事件本身也没有听说过。这就是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的新切尔卡斯克事件。

那么，就让我们根据搜集到的一些材料在这里对它作些介绍吧。

如果我说这个事件是俄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关键性事件，我想我并没有夸大它。除开三十年代初期伊凡诺沃市纺织工人的大规模的（但是和平结束的）罢工之外，新切尔卡斯克爆发的事件要算是四十年来（喀琅施塔得，唐波夫省，西西伯利亚之后）的第一次真正的人民起义，它是一次未经任何人组织的、没有人领导的、并非有意制造的起义，它是人们心灵的呼声，它表示：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星期五，在全苏联宣布了赫鲁晓夫的又一个得意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决议：提高肉和黄油的价格。而根据另一项与提价毫无关系的经济计划，恰好从这天开始要在庞大的新切尔卡斯克电气机车制造厂（简称：新电机车厂）实行一

项新的、降低计件工资定额的规定（降低幅度达百分之三十）。这一天大清早，两个车间（锻造车间和冶炼车间）的工人们，尽管平时很听话，惯于忍受，尾巴夹得紧紧的，这时在物价和工资两面夹攻的逼迫下，也实在没法勉强自己干活了。大家情绪激动，哇啦哇啦地议论起来，渐渐变成了一个自发的群众大会。在西方这本是习以为常的事，可是在我国却是非同寻常的。工程师们和总工程师都来劝说工人们干活，但无效。这时厂长库罗奇金来了。工人们问他："我们今后靠什么生活？"而这个喂饱肚子的混蛋却回答说："从前吃肉馅包子，今后就将就着吃果酱包好啦！"这句话激起了众怒，要不是他和他的侍从们跑得快，恐怕他早就被工人们撕碎了。（假如他不是这样回答的话，说不定事情也就平息下去了。）

到了中午，罢工已经蔓延到整个庞大的新电机车厂全厂。（工人们还派了联络员到其它厂去，其它厂有些动摇，但最后还是没有支持。）从罗斯托夫到莫斯科的铁路线就在离工厂不远处经过。不知是想使莫斯科尽快知道这件事，还是打算阻止利用铁路运送军队和坦克来，总之，许多妇女跑到铁路线上坐下来，阻止火车通过。同时有些男人便拆下了铁轨，构起了鹿砦。罢工的规模异乎寻常了，在整个俄国工人运动史上也并不多见。工厂的建筑物上挂出了大字标语："打倒赫鲁晓夫！""把赫鲁晓夫做成腊肠！"

在这同一时间里，武装部队和民警部队开始向工厂所在地区集结（工厂和附近的工人新村距新切尔卡斯克市区三、四公里，位于图兹洛夫河的另一岸）。坦克从市区开到了图兹洛夫河畔，占据了通往市区的大桥。从当天傍晚到次日早晨桥上禁止通行，市区停止一切交通。工人新村里这一夜也不平静：当夜大约有三十名所谓"带头闹事"的工人被逮捕，关进了市区的民警局大楼。

从六月二日凌晨起，市区的其它工厂（但远不是全部）也开

始罢工。新电机车厂里自动召开了全厂大会，决定进城游行，要求释放昨晚被捕的工人。游行队伍（顺便说一下，起初只有大约三百人。人们害怕嘛！）包括妇女和孩子们，举着列宁的画像、和平的标语牌从坦克旁边走过桥去，没有遭到禁止。队伍继续沿着上坡路向市区进发。这时便渐渐有些爱看热闹的人、其它工厂的工人和一些孩子们加进来，游行队伍迅速壮大了。进入市区后，人们便在这里或那里拦住过路的卡车，跳上去发表街头演讲。整个城市沸腾起来了。游行队伍沿看新切尔卡斯克市的主要街道莫斯科大街向前行进，一部分游行工人去冲击市民警分局的大门，企图闯进去，他们以为被捕的工人关在这里。民警局大门紧闭，民警从墙内用手枪向工人射击。莫斯科大街的尽头有一座列宁纪念像①。纪念像坐落在一个街心公园里，绕过公园的两条小马路通向苏共新切尔卡斯克市委大楼。（沙皇俄国时代这里原是哥萨克长官的官邸。白俄将军卡列金*就是在这里自杀的。）所有街道都挤满了人，而这里，市委大楼前的广场和街心公园，尤其拥挤。许多孩子为了能看得清楚，爬到街心公园的树上去了。

可是，党的市委大楼里这时已空无一人：全市的当权者都及时地逃到罗斯托夫市去了②。市委大楼内部：玻璃被打碎，文件乱扔在地上，就像内战时期撤退一样。二十来个工人穿过大楼内部，出现在宽大的阳台上，向集拢在广场上的群众发表一些杂乱无章

---

① 这里原来有座（俄国军事家）哥萨克统领普拉托夫的纪念像，是著名雕塑家克洛特的作品，它被拆除并送去回炉，后来在原地修建了列宁纪念像。

* 沙俄将军，十月革命后曾率领顿河一带白军暴动。——译者注

② 罗斯托夫州委第一书记是巴索夫。将来他的名字会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普利耶夫的名字一起作为在这里进行大规模屠杀的罪犯而并列。事件开始时这个巴索夫到新切尔卡斯克市来过，但现在已逃之夭夭（据说，他慌张逃跑时是从二层楼阳台跳下去的）。他已回到罗斯托夫。新切尔卡斯克事件刚一过去，他就作为某个代表团的成员到英雄的古巴去了。

的讲话。

这时已是上午十一点。市内已经完全看不到民警，军队却越来越多。（这的确很形象：刚有点风吹草动，民政当局就躲到军队身后去了。）武装士兵占领了邮局、电台和银行。这时整个新切尔卡斯克已被军队完全封锁，任何人一概不许出入。（为了执行这项任务，还动员了罗斯托夫几个军官学校的学员，其中一部分人留守罗斯托夫，担任巡逻。）几辆坦克从游行队伍走过的同一条路沿着莫斯科大街朝市委大楼轰轰隆隆开过来。有些男孩子抓到坦克上面，堵住它的瞭望孔。坦克开始空弹射击，街道两旁的窗户和橱窗响起一片玻璃破碎声。孩子们吓得跳下坦克跑了。坦克继续向前开。

那么，这个城市的大学生呢？新切尔卡斯克是个大学城啊！大学生哪里去了？……工业大学、其他大学和一些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从清早便被锁在宿舍和学校建筑物里，不许出来。校长们真机灵！不过，我们还是要说：那些大学生的公民责任感也并不很强。大概他们自己也乐得有这样一个托词吧。当代西方国家那些造反的大学生（或者是从前我们俄国的大学生）大概不会是一道门锁能够阻拦得住的。

市委大楼里似乎有人开始扭打了。在阳台上讲话的工人一个一个被揪进楼里。阳台上出现了军人，越来越多。（斯捷普劳改营管理局的军官们不也是这样从阳台上观看肯吉尔暴乱的吗？）一队冲锋枪手开始从大楼前面的小广场上逼迫群众后退，把人们逼向街心公园的铁栅栏。（不同的目击者异口同声地说：这些士兵是少数民族士兵，是从军区的另一端刚刚调来的高加索人，用他们把刚才守卫在这里的当地卫戍部队替换下去了。但是，原先守卫在这里的那队士兵是否也接到过开枪命令呢？是否开枪命令未被执行？是否接到这项命令的大尉没有下令开枪，而是自己在队前开

枪自杀了[①]？关于这些情况，目击者的说法互不一致。有一位军官自杀，这个事实是大家都证实的。但是人们讲的细节不够清楚，而且谁也说不出这位有良心的英雄的确切姓名。）人们被士兵们逼迫着向后退，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灾祸。这时，不知是谁下了命令[②]，总之，是这些士兵举起冲锋枪来，朝着群众头顶上射出了第一排齐射。

也许普利耶夫将军并没有打算立即向群众开枪，但是事件却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开始发展了：朝着群众头顶上射出的第一排枪弹飞向街心公园的树冠，打中了爬到树上看热闹的孩子们，死伤的孩子纷纷从树上落下来。这时，自然，群众发出了愤怒的吼声。而士兵们，不知是按照命令还是看见鲜血之后失去了理智，或者就是由于害怕，便朝着吼叫的群众开始了密集射击，而且使用的是爆炸子弹[③]。（读者还记得肯吉尔发生过的事吧？在岗楼旁边死伤十六人的那次？）人们仓皇逃命，挤在街心公园两旁的小马路上。但是士兵们却朝着逃跑者的后背继续射击。直到街心公园外面的广场上，列宁纪念像附近，原先的普拉托夫大街直到莫斯科大街一带完全没有人了，才停止射击。（一位目击者说：当时的印象是到处都躺着死尸。当然，其中许多人是受伤的。各种材料都相当一致地证实：当场被打死的有七十至八十人。[④]）接着，士兵们开始寻找并征用汽车和公共汽车，把死伤的人们抬上去，运进用高

---

① 坚持后一种说法的人们说，拒绝向群众开枪的士兵后来全被流放到亚库特地区去了。

② 当时站在下令者身旁的人当然会知道，但那些人或者后来被打死，或者被逮捕了。

③ 单是被爆炸子弹（达姆弹）打死的就有四十七人。这是得到证实的数字。这可是普利耶夫将军心里有数的。

④ 这个数字比冬宫前面的死伤数字稍微小些。但是，要知道，从那年以后整个愤怒的俄国每年必定要纪念那个1月9日呀！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开始纪念这个6月2日呢？

围墙围住的部队医院。(在随后的一两天内，公共汽车的座位上仍然留着斑斑血迹。)

这次也同在肯吉尔那次一样，用电影摄影机把街上的暴乱者拍摄下来了。

射击停止了。恐怖过去了。又有一些群众向广场拥过来，于是士兵们便又对他们开了枪。

这是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之间的事。

一个细心的见证人当日下午两点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市委前面的广场上停着八辆不同型号的坦克。每辆前面有一队士兵。广场上几乎空荡荡的，只有几小撮人，大都是年轻人，他们在那里对着士兵们喊叫些什么。广场的沥青地面上的低洼处聚着一摊摊血。我并不夸大，在那以前我真没有想到过血还会积聚那么多。街心公园的长凳上沾满了鲜血，那里的沙土小路上也血迹斑斑，下部刷成白色的树干有的也被血染红了。整个广场上布满了坦克履带压出的痕迹。一面红旗斜靠在市委大楼正面的墙上，这是示威者拿的大旗，旗杆上面还挂着一顶灰色鸭舌帽，帽上也溅上了鲜血。而市委大楼的正面依然挂着那幅已挂了很久的红色横幅大标语：'党和人民是一体！'"

年轻人们朝士兵这边走近了一些，数说着羞辱他们，诅咒他们："你们怎么会干出这种事!?""你们向谁开枪啊?!""你们是对人民开枪！"士兵们则辩护说："不是我们！我们是刚刚调来，刚刚换防的。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看！我国的杀人犯们干得多么麻利（可是人们却说只是些什么"笨手笨脚的官僚"）：他们已经及时地把那一队士兵调走，调来了另一批不了解情况的俄罗斯人士兵了。看来，普利耶夫将军对自己的专业确实内行（照片 9)。

渐渐地，到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广场上又重新集结了许多人。(新切尔卡斯克人真是勇敢！本市广播电台不住地重复一句

话："公民们，不要受挑拨者的影响！回家去吧！"广场上站着拿冲锋枪的士兵。地上的血迹还没有冲刷掉。可是，人们却又集拢过来了。）愤怒的喊叫声。不仅如此，又形成了一个自发的群众大会。这时人民已经知道有苏共中央的六名高级成员乘飞机来到了新切尔卡斯克，（哼，很可能在第一次射击之前就到了吧？）其中当然包括米高扬（处理布达佩斯之类问题的专家）、弗罗尔·科兹洛夫、苏斯洛夫（其余几个人的名字，人们说的不准确）。他们住在骑兵军官进修学校（从前是士官武备学堂）大楼里，就像住进了一座要塞。新电机车厂派了一个青年工人代表团去向他们说明事件经过。人群里喊着："让米高扬到这里来！让他亲眼看看这些鲜血！"不，米高扬是不会来的。大约下午六点，倒有一架直升巡逻机在广场上低空盘旋，进行观察。然后飞走了。

进人骑兵军官进修学校大楼的工人代表很快就出来了。一切都已协商好：士兵的警戒哨放工人代表进去，然后由军官们陪同他们登上市委大楼的阳台。广场上立刻静下来，鸦雀无声。代表们向群众传达说：已经见过各位中央委员，向他们说明了这个"血腥的星期六"的全部经过，当科兹洛夫听说孩子们随着第一排枪声纷纷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他都哭了。（有谁了解这位弗罗尔·科兹洛夫吗？谁了解这个列宁格勒的党内蠢贼的头子、最残酷的斯大林分子吗？说他哭了？！……）代表们还说：中央委员们答应一定要查清这个事件，严惩肇事者。（是啊，在特种劳改营也是这样答应我们的！）现在呢，大家尽快散开，回家去吧！不要在市内制造混乱！

但是，群众并没有散开！傍晚时，人聚得更多了。看，这些无所畏惧的新切尔卡斯克人！（有人传说，政治局的这个工作组在当天晚上曾作出决议，要把全市居民一个不留地强制迁移到外地去！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整个民族都迁移了，一个市的居民算得了什么！当年强制迁移各民族时呆在斯大林身旁的不也就是这个

米高扬吗？）

晚上快九点钟的时候，曾试图用坦克把市委大楼前面的群众驱走。但是，坦克手们刚要发动马达，人们就紧紧地把坦克围起来，关闭了顶盖，堵死了瞭望孔。坦克沉寂了。冲锋枪手们站在一旁，并不想帮坦克手的忙。

又过了一小时，几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从广场的另一面开过来，上面配备着冲锋枪手掩护。（本来嘛，我们是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的！我们不是把德国法西斯都打败了吗！）坦克和装甲车高速前进（两旁便道上的青年人们对它们吹口哨。大学生们这时已经放出来了），终于把莫斯科大街和普拉托夫大街的行车道清理出来了。

一直到半夜时分冲锋枪手才开始对空打曳光弹，群众才慢慢散去。

（人民怒潮的力量啊！你能够多么迅速地改变一个国家的状况呀！昨天夜里，宵禁还显得那么威严可怖，不容冒犯；而今天此时却是全城的人都在街上游逛，吹着口哨。莫非这就是隐藏在半个世纪的外壳下面的东西吗？——如此迥然不同的人民，迥然不同的空气？）

六月三日，新切尔卡斯克广播电台播送了米高扬和科兹洛夫两人的讲话。科兹洛夫并没有哭。他们也没有再许诺要查明当权者中的肇事者。他们在讲话中只提到：这次事件是由敌人挑动起来的，而敌人一定会受到严厉惩治。（是呀，广场上的群众早已散开了嘛！）米高扬还说，苏联军队根本不许装备达姆弹，所以那些达姆弹肯定是敌人使用的。

（但是，这些敌人是谁？……他们是用什么降落伞空降来的呢？他们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哪怕揪出一个来叫我们看看也好嘛！哎，我们已经太习惯于受人愚弄了。只要对我们说一声“是敌人”，我们

就似乎全都明白了……就像中世纪时人们提到魔鬼一样……)[①]

市区商店里的商品顿时丰富了：出现了黄油、灌肠以及其它许多本市商店里好久没有看到过的、只有在首都的商店才能买到的商品。

所有受伤的人从此便不知下落，谁也没有再回来。相反地，死伤者的家属（他们总要寻找自己家的人吧！这就暴露了自己……）全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了。其他许多有牵连的人、被记住的人、被拍入照片的人也都遭到同样命运。对被捕的游行参加者进行了一连串的秘密审判。也有两次审判是“公开的”（旁听证只发给各企业党的干部和市委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其中一次公审是审判九名男子（全判枪决！）和两名妇女（各判十五年徒刑）。

市委成员原班人马未动。

这个“血腥的”星期六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六该市电台广播说：“电气机车制造厂的工人同志们保证要提前完成七年计划！”

……如果当初的沙皇不是那么软弱无能，他在一月九日那天本来也可以想到在彼得堡逮捕一些举着神幡的工人，并且给他们贴上匪徒的标签的。那就可以宣布：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革命运动”。

例如，在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前一年，一九六一年，亚历山德罗夫市的民警把一名被拘留的人殴打致死，后来又禁止人们抬

---

① 1968年，居然有这么一位新切尔卡斯克市的女教师(!)以权威发言人的口吻在火车车厢里对这次事件作了如下介绍：“军队根本没有开枪。只是偶尔朝天放两枪以示警告。都是那些破坏分子开的枪，他们还使用达姆弹呢！从哪儿来的？破坏分子什么都有！他们不但向军队开枪，还向工人开枪……可工人们却失去了理智，朝军队扑过去，他们殴打士兵们。士兵们有什么过错？后来米高扬沿街巡视了一遍，还走进一些住户家里去，问寒问暖，看看人们是怎么生活的。有些家庭妇女还请米高扬吃草莓呢……”

眼下能写进历史的也只能是这一类的话。

着死者棺材经过民警派出所门前送往墓地。因此，群众忍无可忍，一把火烧掉了这个派出所。马上开始了大逮捕。(穆罗姆市也发生过类似情况，时间相隔不久。）那么，今天该怎样审理这些被捕的人呢？在斯大林时期，一个裁缝往报纸上插了一根针，因为他插得不是地方，以致按刑法第五十八条被判了刑。现在判罪的手段比那时高明多了：捣毁并烧掉派出所也可以不算政治事件，可以说成是“一般土匪行为”。上面下达的指示就是这么写的：“群众性的风潮”不算政治行动。(请问：那还有什么能算是“政治”行动呢？)

这样，我们国内就再也没有“政治犯”了。

可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另外还有一股从未枯竭过的水流，它一直在流着，这些“罪犯”从未受到过“能够起死回生、复活万物的阳光雨露”的滋润……这股不竭的水流不管是在“破坏了列宁主义准则的时期”，还是在“恢复并遵守了列宁主义准则的时期”，几十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而在赫鲁晓夫当政之后变得更加壮阔了。

这是那些宗教信徒。反抗新一轮封闭教堂的恶浪的人。被赶出修道院的修士。顽固的教派分子，特别是拒绝服兵役的，对这些人可就别见怪了，这是直接帮助帝国主义，按照我们这个温和时期的作法，头一次就只给你五年吧！

不过，这些人当然更不能说是政治犯了。他们是“宗教犯”，对他们应该进行教育。我们这里的教育方法是：单单因信仰而被开除工职，派一些共青团员去砸他们家的玻璃，用行政命令迫使信徒们去听反宗教的讲演，用汽焊把教堂的大门切下来或者用钢索套住教堂的圆屋顶，然后用拖拉机把它拉倒，用水龙带驱散作祈祷的老太婆们。(法国共产主义者们，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对话”吗？)

正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对波察耶夫市的修道士们所宣布的那样："假如我们真按苏维埃的法律办事，那就得等待很长时期才能到达共产主义！"

因此，只在万不得已时，当"教育"措施不能奏效时，才必须借助于**法律**。

不过，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大大显示一下我国今天的法律确实像钻石般光辉灿烂，高贵无比：我们今天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搞秘密审判了，也不搞缺席审判，甚至不搞半公开的（即只允许一部分人旁听的）审判。

现在我手头有一份审判记录。时间是一九六四年一月，地点是顿巴斯的尼基托夫卡市，被告是五名浸礼派教徒。

审判经过是这样的：先把那些从外地远道来参加旁听的浸礼派教徒们关进监狱，关押三天，借口是必须弄清他们的身份（审判结束之前不放出来，同时也是要恐吓他们）。把向受审者扔鲜花的人（自由公民！）关押十天禁闭。另一个记录了审判过程的浸礼派教徒也被拘留十天，并且没收了他的记录（幸而保存下了另一份）。其他旁听者进入审判庭之前，先把一些经过挑选的共青团员从旁门放进去，让他们占据前排座位。审判过程中旁听席上不时有人叫喊："给他们身上浇上汽油，烧死他们！"法官们并不制止这一类正义呼声。法庭的拿手好戏是利用有仇的邻居的证词和受到恫吓的未成年人的证词：法庭让一个九岁的小姑娘和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出庭作证。（只要应付过目前这场审判就行，至于这两个孩子心灵上会受到什么影响，今后会怎样，那就不管了。）小女孩的笔记本上写着《圣经》里的话，这就是"物证"。

受审者之一姓巴兹别伊，是个矿工，家里有九个孩子。就因为他是浸礼派教徒，矿山工会委员会从来不给予他任何补助。现在，人们对他的小女孩尼娜，一个刚刚读八年级的学生，采取威

胁、收买（矿山工会委员会给予她五十卢布）和许愿（答应将来安排她上大学）的办法，迫使她在预审中捏造了一些关于她父亲的异想天开的证词：说父亲曾企图用变了质的甜汽水毒害她，还说在信教的人躲藏到森林里去集体祈祷（因为在村里祈祷要受迫害）的时候，她看到森林里有一个"无线电发报设备，一棵很高的树上缠着电线"。在这之后，尼娜为自己的捏造感到十分痛苦，她得了头痛病．当局便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关在狂躁型精神病患者病房里。尽管如此，开庭时还是把她带出医院，希望她还能在法庭上作证。但是她却完全推翻了："那都是侦查员亲口告诉我的，是他叫我这么说的！"没关系！无耻的侦查员什么都能够应付：他判定尼娜在法庭上的作证"无效"，而在预审时的作证则是有效的。（这是我国法院经常使用的得意手法：在支持公诉的证词不能成立时，他们就无视当庭审判，而把原先假造的预审证词拿来作根据。他们会公然在法庭上说："哎，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原先的证词里明明写着……你在侦查时也说过……怎么能推翻呢……这是要判罪的呀！"）

审判员们根本不想听任何实质问题和事实真相。这些浸礼派教徒之所以受到迫害，就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一个由国家特派的无神论者来当他们的传教士，而要求推选自己的传教士。（按照浸礼教的教规，任何一个教徒都可以当传教士。）对于这个问题，党的州委已经明确指示了：要给这些人判刑，把他们的子女从他们身边夺走。这个指示是必须照办的，尽管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刚刚（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才用左手签署了"反对在教育方面实行歧视"的国际公约。[①] 那里面就有一条规定："父母应该有可能保证

---

① 可不是嘛，我们是为了支持美国黑人才签署这个公约的。不然的话，我们要它干什么：？

依照自已的信仰对孩子进行宗教方面和道德方面的教育。”但是，这一点正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允许的！任何人只要想在法庭上讲一讲实质性问题从而把案情真相进一步讲清楚，他的话必然会被审判员打断，转移话题，扰乱他的辩论水平，就是：“既然我们已经计划好要建设共产主义，那么还会有什么世界末日的到来呢？”

下面让我从一位年轻姑娘叶尼娅·赫洛波尼娜在法庭上作的最后陈述中引用几句吧。“这些年来，我宁愿不去看电影，不去跳舞，而阅读《圣经》和作祈祷。现在，你们却只是因为这个就判我徒刑，剥夺我的自由。当然，作为一个自由人而生活确实是幸福的，但是，作为一个无罪的人而生活则更幸福。列宁说过：只有在土耳其和俄国还保存着诸如宗教迫害之类的可耻现象。我没有去过土耳其，所以不知道那里怎样，而在俄国呢，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法庭没有允许她继续讲下去。

法庭判决是：二名判五年劳改，二名判四年劳改，多子女的巴兹别伊被判三年劳改。被告们高兴地接受了判决，立即又作祈祷。于是，“工作单位的代表们”高喊：“判得太轻了！还得加重！”（得浇上煤油烧……）

一些有耐心的浸礼派教徒经过调查和统计，成立了一个“囚犯亲属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发行一种手抄的《会报》，报道对信徒的各种迫害。从这份《会报》上，我们看到：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六月之间有一百九十七名浸礼派教徒被判刑，[①] 其中有十五名妇女。（一百九十七人全部有名有姓。委员会还调查了靠这些被判刑者赡养的、如今衣食无着的人口数字，是四百四十二名，其中学龄前的子女三百四十一名。）这些人大部分被判五年流

---

① 顺便提一下，一百年前曾发生过审判民粹主义者的“一百九十三人案件”，当时它引起了多大的轰动！后来甚至写进了教科书。

放，但也有些人被判五年严管劳改，(就差没有送到穿条纹布囚服的特种营去了!）然后再加判三至五年流放。哈尔科夫州奥尔尚地方的Б·М·兹多罗维茨由于信教被判七年严管劳改。七十六岁的Ю·В·阿连德也因信奉宗教被判刑。洛佐沃伊全家（父亲、母亲、儿子）一起被关进监狱。住在哈尔科夫州兹米耶夫区索科洛沃村的叶夫根尼·姆·西罗欣是卫国战争时双目失明的一等残废军人，他因为“用基督教思想教育自己的孩子”而被判三年劳改，他的三个孩子（柳芭、娜佳和拉娅）则根据法院判决必须离开他。

对浸礼派教徒М·И·布罗多夫斯基进行审判（尼古拉耶夫市，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时，甚至公然利用显系伪造的证据。被告抗议说：“这么干未免太丧良心了吧!”法官则直率地告诉他：“法律就是要把你们这些人揉坏、压碎、消灭掉!”

这就是法律！这还是“遵循了列宁准则的”那些年代的，不是所谓“不经过法院的迫害”!

不久前，人们看到了从劳改营里传递到外界的С·卡拉万斯基的令人心惊胆寒的作品《请求书》。这位作者原被判刑二十五年，他服完了十六年（一九四四——一九六〇）就被释放了（显然是根据关于“三分之二”的规定)。他结了婚。后来……到大学去了吗？不！一九六五年突然有人来到他家宣布：收拾东西跟我们走吧，你还有九年刑期没有服完![①]

除了我们国家，世界上别处哪里会有这样法律?!给人们套上二十五年刑的铁枷锁，要到七十年代才能满刑！可是，突然，颁布了新的法典（一九六一年)，规定刑期不得超过十五年。那么，大概法学系一年级的学生也会懂得，原来的二十五年刑期当然该

① 这还不是全部——共产党的吞食机在高效运转着！1969年他为从弗拉基米尔监狱向外传递信息还将得到新的十年徒刑。

取消了吧！不，我们国家可不取消。在我们这里，你哑着嗓子叫也罢，拿头碰墙也罢——反正不取消。对不起，请你继续服刑！

这类人并不算少。那些没有赶上赫鲁晓夫的“释放流行病”的囚犯，和我们同一个作业班的人，同牢房的人，在递解站邂逅的人，现今仍有不少被遗忘在劳改营里。我们过着恢复原状的生活，却忘记了他们仍然是被抛弃的，仍在忧郁地、呆痴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那一小块被践踏的土地上，生活在岗楼和铁丝网之间。报纸上的照片换了人，讲台上讲话换了腔调，人们反对了一阵子个人迷信，然后便不再反对了。而被判刑二十五年的人们，受过斯大林洗礼的人们，依然在坐牢……

卡拉万斯基的书里还谈到另外一些人的同样令人震惊的监狱生涯。

啊，酷爱自由的西方“左派”思想家们！啊，英国工党的左派分子们！啊，美国、德国、法国的进步大学生们！对你们来说，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对你们来说，我这整本书一钱不值。只有当你们自己被人喝令“把两手背过去！”时，只有到你们自己也蹒跚在我们的古拉格群岛上时，你们才会恍然大悟。

*　　　*　　　*

不过，现在政治犯人数确实少多了，不能同斯大林时期相比：已经不是按百万计算，也不是按十万计算了。

这是不是因为法律改善了？

不是。只因为航船（暂时）改变了前进方向。现在同样时而发生司法“瘟疫”，有了这些瘟疫就可以大大减轻司法工作者的脑力劳动了。甚至报纸也时而对那些善于读报的人们暗示一点东西：如果报纸上近来关于“流氓行为”的文章多了，你就该明白：“机关”正在根据“流氓”这一罪状大规模抓人；报道“盗窃国家财

产”的消息了，那就是说：正在抓“贪污犯”。

现在的囚犯们从“移民区”写来的信都是灰心失意的，他们说：

“想找公理和正义是徒劳的。报上写的是一码事，实际生活可是另一码事。”

（维·伊·德.）

“我实在不愿意继续当一个被社会和人民遗弃的人。但是，到哪里去讲理呢？人们更相信侦查员的话，不会相信我。可是，侦查员，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子，她懂得什么？她能够理解什么呢？难道她能够想象到人们是怎样摆布别人的命运的吗？”

（维·克.）

“他们不对案件进行复查，因为一开展复查，他们自己就得被精简掉。”

（列-恩）

“现在只不过是把斯大林时期那一套侦查和审判的手法从政治领域搬到刑事案件领域来了，如此而已。”

（格·斯.）

把这些苦闷的囚犯们的话总结一下，我们就会明白：

1. 不可能复审案件（否则，整个审判员阶层就要垮掉）。

2. 从前是根据第五十八条乱抓人，今天是根据刑事犯条文同样在乱抓人。（否则，他们靠什么吃饭？怎么处置古拉格群岛？）

换言之：如果一个公民想把另一个他不喜欢的公民除掉（当然，不是直接把刀子插进他的胸膛，而是合法地除掉）的话，他

该怎样进行才能万无一失呢？从前，他只 须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0分条写一封告密信就行了。现在呢？他得先去找工作人员（找侦查人员、民警局的人、法院的人。反正这样的公民就一定会有这样一些朋友）去商量一下：打听清楚今年什么罪名最时兴？看看现在网是撒在哪一条法律条文上的？问问在哪一方面必须完成司法工作的定额？然后，他就可以在这一方面下手了，不必动刀子。

例如，强奸罪这一条就热闹了好一阵子，尼基塔不知怎么头脑一热，要求这种罪判刑不能少于十二年。于是各地成千把铁榔头齐举，一概往十二年上"铆"，铁匠们不至于闲着没事干了 。可是这种罪是很微妙的，涉及隐私的，您琢磨一下，它跟五十八条第十分条有点相似：那是俩人之间的事，这也是俩人之间的事；那种事没法查证，这种事也没法查证，两者都是避开见证人的，——面法院需要的正是这个。

例如，列宁格勒的"斯梅洛夫案件"就是一例。两名妇女被叫到民警局去了。"你们同男人们一起参加小型晚会了吧？""参加了。""发生了性关系吗？"（关于这一点，民警已经掌握确切的告密信，事实已被确认）"发……发生过。""那么，二者必居其一：一是你们自愿发生性行为的，另一种是并非自愿。如果是自愿的，民警局就把你们看作暗娼，你们就得交出列宁格勒市的居民证，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列宁格勒！如果不是自愿的，那你们就得写一份被人强奸的控告！"妇女们，当然，无论如何不想离开列宁格勒。那么，好了，两个男子就按强奸罪各判十二年！

再看看米沙·亚·波塔波夫的案件吧。他是我在学校教书时的一位同事。问题全是邻居吵架引起的：一是因为邻居要扩大占用面积未能得逞，二是因为波塔波夫的妻子，共产党员，告发了两个邻居非法骗取养老金的事。于是邻居就开始报复了！一九六二年夏天，波塔波夫生活得好好的，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事。突

然，他被侦查员瓦休拉传去问话，就一去不复返了。(读者，您学习学习吧！在我国这样一个法治国家里，这类事也完全可能在任何一天发生在您身上，真的！）尤其使侦查工作容易进行的是：波塔波夫过去已经根据第五十八条坐过九年牢（再加上四十年代他曾经拒绝提供伪证控告他的同案人，这就更使侦查员恼火)。侦查员瓦休拉直率地对波塔波夫说："我在想象中送你去重新坐牢的次数，比我头上的发丝还要多！遗憾的是，现在废除了从前的法律。"波塔波夫的妻子跑来搭救丈夫，而侦查员瓦休拉竟对她说："我真想唾你的脸！你算个什么党员！高兴的话，我连你也送去坐牢！"〔苏联副总检察长尼·若金著文（《消息报》，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称："某些文章和报道似乎力图贬低侦查员的劳动，摘掉他头上的罗曼蒂克的光环。其用意何在？"〕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开庭审理米沙·波塔波夫案。指控他以到他家看电视为诱饵，强奸同院十四岁茨冈少女娜佳，奸污五岁幼女奥丽娅。侦查笔录以一个从未见过性行为的六岁男孩沃瓦具名，内行而详细地描述了"米沙叔叔"和娜佳的这种行为。

这一切似乎都是沃瓦透过窗户看到的，而他的身材根本够不着窗户，玻璃上结了冰，里面还有小松树和窗帘遮住。(请问：对于那些向少年儿童口授这类的话，从而真正糟蹋孩子心灵的人，该判什么罪？)"被强奸的"娜佳已经怀孕六个月，但却一直没有告发，现在，当侦查员瓦休拉叔叔需要的时候，她就告发了。我们学校的许多教员要求参加旁听，但不允许他们进去，不过这些人却反倒因此得以在法院走廊里看到了父母们怎样教给那些"作证"的孩子，怕他们在法庭上说错话！教员们为此事给法院写了一封联名信，但这信引起的"后果"仅仅是区党委把签名的人一个个叫去，指责他们不信任苏维埃法院，并且威胁要取消他们当教员的资格。(那还用说？应该把这类抗议扼杀在萌芽阶段。如果

社会舆论随便发表起对法院的意见来，司法人员就别想过太平日子了。）不久，宣布了判决：十二年严管劳改。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了解外省情况的人们会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去反对呢?！没有任何办法。我们都束手无策。甚至自己也可能失掉工作。只好让无辜的人去受苦！法院总是有理的，党的区委总是有理的。（它们是互相有联系的，有电话嘛！）

本来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过去一直都是这样的。

但是，事有凑巧。正在这个时候发表了我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描写了一个人很久以前遭到的无端灾祸。这时，区委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那只总能镇住老鼠的猫了。于是我决心干预这件事。我写信给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更主要的是我使《消息报》的记者奥·柴可夫斯卡娅也来干预了这件事。这样，就开始了我们长达三年的斗争。

愚蠢麻木的侦查和司法的臃肿躯体之所以能够存活，全靠着它是不会有错的。这个躯体之所以有力，之所以信心十足，是因为它对自己的决定从不复查，任何一个法官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判决并坚信不会有人来纠正他。为此，他们之间订有一条秘密默契：不管上诉状递交到哪里，哪怕递到“超莫斯科”去，都要统统转回原审理机关处理。而且任何司法人员（审判员和检察长等），即使发现他们有滥用职权、感情用事、挟嫌报复、判断错误或处理不当等情节，也都一概不受指责，不受惩罚。我们要庇护他们！保护他们！成为他们的挡风墙！正是因为能这样作，我们的名字才叫“法律”！

既然已经开始侦查，结果却不起诉，这怎么行?！那不等于侦查工作放了空炮吗？既然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案件，结果却不判刑，这怎么行?！这不等于愚弄了人民审判员吗?！法院不是白忙了吗?！州法院对地方人民法院的案件进行再审？这意味着什么？这等于

在本系统内部增加废品率！而且还会使自己的同事们感到不快。何必呢?！举例说吧，由于告密而一旦开始的侦查工作，必然要以有罪判决而结束，而这判决则应该是不可能受到复审的。这样，大家也就不会互相扯后腿。不要使区委为难，他们怎么说，你就照办好了；这样，他们也不会使你为难。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当代法院里不需要有磁带录音机，也不必有速记员，只有慢条斯理地写字的女书记员，她只会用两个世纪前小学生写字的速度在笔录纸上慢吞吞地写下一点什么。这个审判笔录并不当庭宣读，审判员审阅和批准之前谁也不能看到它。只有审判员批准的东西才能构成法庭材料，才被承认是在法庭上发生过的。至于我们旁听者在法庭上亲耳听见的，那都是云烟，早已消散，不，它从未存在过！

在审判员的视野中始终有一张漆黑发亮的真理的面孔，它就是合议室里的电话机。这个传达上帝旨意的神坛是从来不会坑害人的，所以，只管照它所说的去做好啦！

可是我们呢，我们居然争取到了上诉的权利，这真是空前的事。从此便开始了一个重新侦查的漫长过程，它一直拖了两年。那些不幸的孩子长大了一点，他们想从自己过去作的伪证中解脱出来，把这一切都忘掉。但是，不行，父母们和新侦查员又对他们进行训练了：你们该这样说，不然的话，你妈妈会吃苦头的；如果不判米沙叔叔有罪，就得判你妈妈有罪了。

我们终于来到梁赞州法院的法庭上。律师像往常一样毫无权利。审判员可以驳回他的任何抗议，而这种驳回是不受任何监督的。照旧是利用仇人邻居的证词作根据，还是无耻地利用未成年人的证词。（请与巴兹别伊的案件比较一下看。）刚一开庭，审判员不是对证人说：“你把事实经过说一说。”也不是要求他们：“你

把真实情况说说。”而是要求证人：“你讲讲你在最初侦查时是怎么说的！”而对于被告方面的证人的发言，审判员竟公然打断他们，扰乱他们的思路，并且进而实行威胁：“预审侦查时你在证词里说的可是……现在你有什么权利不承认它呢？”

女审判员阿夫杰耶娃不断地对几位陪审员施加压力，就像一头母狮对待羔羊。（顺便说一句，现在到哪儿去找白发苍苍的老法官啊！如今我国法院里的审判员的职位几乎全被一些善于看风使舵的狡猾女人占据了。）她的头发像马鬃一样，说话像个男人，语气坚定、强硬，她自己可能也为她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和谈话的重要意义所陶醉了吧。只要审讯进程稍不如意，她就大发脾气，甩尾巴，脸涨得通红，打断不中用的证人的话，威胁我的教员同事们。她说：“你们怎么能怀疑苏联的法院呢？”“你们怎么能设想是别人唆使孩子们那么说的呢？那就是说，你们自己一定也在教给孩子们撒谎吧？”“集体给法院写联名信是谁策划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集体行动”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非法的！是谁？是谁？是谁？）检察长克里沃娃（都是谁给她们选择了这些贴切合适的姓氏呢？*）而对这样气势汹汹的审判员却一声不吭，毫无作为。

审判过程表明，一切指控都站不住脚。男孩子沃瓦不可能从窗外看到什么；奥丽娅也把证词全推翻了，根本没有人糟蹋她；在可能进行犯罪活动的那些日子里，波塔波夫的妻子一直卧病在家，躺在她家唯一的一间屋子里，丈夫总不能当着妻子的面强奸邻家的吉卜赛姑娘吧；这个吉卜赛姑娘在这之前曾偷过波塔波夫家的东西；吉卜赛姑娘平时经常夜不归宿，尽管她只有十四岁，可在这之前就常在外面跟男人们鬼混。但是，苏维埃的侦查员是不犯

---

* 克里沃娃（Кривова）这个姓氏与 Кривой 一词字根相同，Кривой 有歪曲、偏向、独眼龙等含义。——译者注

错误的！苏联的法院也不可能犯错误！判决——十年劳改！亲爱的司法人员们，快庆祝胜利吧！侦查员同志们，不要动摇！继续这么干下去！

这一切都是在《消息报》记者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还是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法院已经出面干预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那些无人替他们出面干预的人该怎么样呢？……

后来，又经过将近一年的是非真伪的辩论和斗争，最高法院才终于作出裁决：波塔波夫无罪，恢复名誉，予以释放！（他已经坐了三年牢……）那些教唆孩子们淫秽行为的人怎么样了呢？一点也没怎么样。没关系，失败了就失败了嘛！那么，雄狮般的阿夫杰耶娃审判员总该有个污点，有些难堪吧？不，她仍旧是人民选举的崇高司法代表。那么，斯大林式的摧残者瓦休拉呢？他仍在原处，仍任原职，连他那长指甲都没有修剪一下。

坚守阵地吧，繁荣昌盛吧，司法阶层！是我们为你而存在，不是你为我们！就让司法制度成为你脚下的一块毛茸茸的地毯吧。只要你觉得舒服就好！老早就宣布过，在迈入无阶级社会的时候，司法审判也将是无冲突的（为了反映出社会秩序内部的无冲突性）：在这样的审判中，法院人员、检察员，辩护人，甚至被告人自己，都将结为一体，奔向共同的目标。

司法工作这种可靠的稳定性使民警机关的日子也好过多了：它使民警可以毫无顾忌地实行“挂车”或者“犯罪口袋”的办法。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地方民警玩忽职守，动作迟缓、有时还是因为胆小怕事，犯罪事件接二连三地破不了案。但在表报里可一定要写成业已侦破（即已结案）！这就得等一个方便的机会了。碰巧有一个好捏鼓的，揍蒙了的，傻头傻脑的家伙进了局子。所有这些没破的案子都能往他脖子上套。这些全都是这个不法之徒一年之内作的案！让他挨一顿“练”，再饿上两天，什么罪都能“认”，

签字画押，数罪并罚，长期徒刑—— 本区的污点也就洗刷干净了（在埃里温附近的阿尔塔沙特，出了一件杀人案。一九五三年胡乱抓了一个人，安排了假证人，经过拳打脚踢，判了二十五年。可是一九六二年找到了真正的凶手……）

由于一切罪行都未能逃出法网，社会生活大大地健康化了，民警局的侦查员们拿到了奖金。

洗刷本区的污点还可以采用相反的方法：要做得好像根本没有刑事犯罪。年老的前犯人伊万·叶米利扬诺维奇·布雷克辛，六十五岁，蹲过十年牢（是我在马尔非诺"沙拉什卡"时的朋友），一九七八年七月在"旅游者"消夏村黄昏街头无人时遭到两个年轻流氓的毒打和抢劫。他在公共汽车站躺了两个小时，没人管。后来被拉到附近德德奈沃的一家内科医院。萨维利耶娃医生根本治不了—— 但也不送他去外科医院；尽管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年龄，她也不把伤者的情况通知医疗系统，甚至也不报告民警。被殴打者浑身血肿，脑出血，牙齿打掉，眼角出血，不但没有得到治疗，甚至没人护理（卫生员喝醉了），整整三天三夜，躺在一张漆布上，后背泡在尿里。他的家人在这个村里并沿着萨维约洛夫公路东奔西跑地找了他三天三夜，—— 可是医生哪里没有报告呀。最后终于找到了，靠自己——不是靠医院——想办法从莫斯科叫了一辆复苏急救车，拉到一位神经外科大夫那里，大夫做了颅骨手术，但未能制止内出血。患者受了九天痛苦之后去世了。

当地的伊克山民警局收到了法医鉴定，但并不忙着立案侦察，更没有到医院检查血衣寻找线索。原因是捷捷奈沃人人都知道这些本地的流氓，可是谁都怕他们。上面说过的那个女医生萨维利耶娃协助高级侦查员格拉西莫娃（在询问死者的妻子时她的办公室里放着流行音乐），搞了两个多月，侦查结论是：因受害者发生卒中，至使倒地时跌伤。这样一来，没什么人可抓，犯罪没有发

生，本区是干净的。

愿你在天国安息，伊万·叶米利扬诺维奇！

有一年，上面号召要抓捕、审判、驱逐寄生虫，打从这年以后，社会可就更健康了，法制可就更加强了。这项法令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过去的极富弹性的第五十八条第十分条：罪状也可以随便说，用不着物证，而且你也没法反驳。（对诗人伊·布罗德斯基适用了这一条，不是搞得很成功吗。）

“寄生虫”这个字眼他们一拿到手里就做了巧妙的曲解。正是因为寄生虫们——拿着高工资的游手好闲者-坐上了法官的席位，对那些下班以后卖命挣点外快的贫苦劳动者和能工巧匠们的判决书才源源而来。瞧他们扑向所谓“寄生虫”时的那个狠劲！那是饱汉子对饿汉子自古就有的狠心。阿朱别伊*手下的两个丧尽天良的记者（《消息报》，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竟然无耻地声称：“把寄生虫驱逐出莫斯科的距离还不够远哪！还允许他们接受亲属的包裹和汇款哪！对他们管制得还不够严哪！”“没有强迫他们从日出到日落地劳动啊”，就是这么写的：“从日出到日落”，一字不差。那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日出，是哪家的宪法需要这样的农奴劳役制?!

我们列举了使群岛经常保持满员的几条重要的水流（同时还有永远不会减少的“官盗”）。

那些整天在街上转悠的，坐在指挥部里的，打掉被截住的人们的牙齿的“人民纠察队员”也不白耽误工夫。这些民警局指定的乌什库尼克**或者冲锋队员是宪法里没有也不对法律负责的。

古拉格群岛的补充人员是源源不绝的。虽然我国社会早已是

---

* 阿朱别伊是赫鲁晓夫的女婿，当时担任《消息报》主编。——译者注

** 14世纪诺夫哥罗德的贵族和商人装备的武装民团成员，乘乌什库船从事抢劫和经商，故称“乌什库尼克”。——译者注

无阶级社会，尽管半边天已经被共产主义霞光映红，但是，我们却不知为什么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事实了：犯罪现象不仅没有消灭，而且不见减少。岂止如此呢，近些年来甚至不再向我们许诺要消灭犯罪现象了。三十年代确实许诺过：快了，快了，再过几年就行了！现在呢，不再许诺了。

我国的“法律”是强大而旋转变化自如的。它不同于地球上一切称为“法律”的东西。

思想糊涂的古罗马人想出过一条原则，说什么“法律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可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却有回溯效力！古老的反动谚语说什么“法律是不能往回写的”。可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就可以往回写！如果说（最高苏维埃）刚刚颁布了一道新时兴的法令，而“法律”当局很想把它适用于那些在此之前被捕的人们的话，那有什么呢，满可以适用嘛！对于买卖外币的人和贪污受贿的人就是这样办的：地方当局，例如基辅市，把名单送到莫斯科来请求在名单上标出记号，应该对哪些人适用回溯效力（需要延长刑期或需要凑足“吃九克”的人数*）。莫斯科也就标出了。回溯效力适用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国的“法律”能够预见到将来。按常理说，在开庭审判之前谁也不可能知道审判将怎样进行以及会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可是，不，你看，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制》杂志就在法院开庭审判之前把审判经过和判决全都登出来了。杂志社怎么猜中的？那你去问他们自己吧……

苏联总检察署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法制》一九六二年一月份第一期。这期杂志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付印的。可是

---

* 一颗子弹的重量为九克，“吃九克”即吃一颗子弹。指判处枪决的人数。——译者注

在该期第七三—七四页上却登载着格里戈里耶夫（格鲁兹德）的一篇题为《法西斯刽子手》的文章。文章报道了在塔尔图市举行的对爱沙尼亚战犯进行的公审过程。记者描述了询问证人的情况、摆在审判席上的物证、对被告人的审讯（“杀人犯厚颜无耻地回答说……”）、旁听席上的反应和检察长的发言。最后，他报道说，对被告宣判了死刑。事实上**这一切都正是这样**发生的，只不过是发生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见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真理报》），而这时杂志**早已印好并且出售**了。（这是因为开庭时间推迟了，没有及时通知杂志编辑部撤稿。这位记者为此被判处强迫劳动一年。）

而且我国的“法律”也不知道有一种所谓“伪证罪”。它根本不认为作伪证是犯罪，我们中间有一支庞大的、专作伪证者的大军，这些人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进入应该受到尊敬的老年期，在金色的黄昏中消闲纳福。整个世界上，整个人类历史中，只有我国对伪证者关怀备至！

我国的“法律”也从来不惩处杀人犯审判员和杀人犯检察长。他们都受到尊敬并担任着原来的职务，而且还要工作很久，然后才光荣而尊贵地去度过晚年。

还不能不允许我国“法律”有所摇摆和发生急剧的转变，因为这些都是人们激动的脑海中时隐时现的创造性思维所固有的特点。一忽儿法律转向一个极端：这一年必须大大降低犯罪率！要少逮捕人！少判罪！被判刑人可以“交保释放”！随后，它又转向另一极端：坏人还没有被全部抓起来！不能搞“交保释放”这一套！应该更严格地管理！判刑太宽！处决那些坏蛋！

但是，尽管遭到风暴的多次袭击，我国这只“法律”航船依然在庄重、威严而平稳地航行着。最高法院的法官和高级的检察长们是富有经验的，这些风浪打击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区区小事。他们召开几次全体会议，发出自己的指示，于是，每一个新的、极

其荒唐的方向性转变就都会被解释成是群众早已盼望的、是我国整个历史发展已经准备好条件而势在必行的、是那“唯一正确的学说”所早已预言过的。

我们的“法律”航船时刻准备着应付各种摇摆和转折。如果明天一声令下，说必须再把意识形态不对头的人抓几百万关起来，必须再次流放整个民族（原先被流放过的民族或者别的民族），或者必须流放整个发生暴动的城市，或者必须再给囚犯们挂上四块号码布，即使如此，这只航船的巨大船体也几乎不会颤动一下，它的船艄也绝不会倾斜。

这样，就只剩下诗人杰尔查文*的诗句了，不过，对于这句话也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真正有所理解，即：

“不公正的法律甚于抢劫。”

剩下来的也就是这一点。只有这一点保留下来了，仍然像斯大林在世时一样，仍然像本书所描写的所有年代一样。《基础》、《法令》、《法律条文》颁布了许多，印刷了许多，有的互相一致，有的互相矛盾。但是，我国整个国家生活并不是依靠这些东西运转的，也不是依据它们逮捕人的，更不是遵照它们进行审判和专家鉴定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有百分之十五吗？），只有在侦查和审讯的对象既不涉及国家利益，也不关系指导思想，而且不影响某官员的个人利益和安静生活的情况下，司法人员才享有按照问题实质认真进行裁决的优惠条件，无须往什么地方挂电话，无须请什么人作指示。在其余所有情况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都无疑会触及某些人的重要个人利

* 杰尔查文，加弗里拉·罗曼诺维奇（1743－1816），俄国诗人、政治家。——译者注

益——集体农庄主席的、村苏维埃主席的、车间主任的、工厂厂长的、房管所主任的、区段民警的、派出所所长或特派员的、主任医师的、主任经济师的、局长和司长们的、特别科科长和干部科长们的、区委书记和州委书记们以及再上级、再上级的什么人的个人利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电话便从一个安静的办公室打到另一个办公室，谈话的声音不高、慢条斯理、语气和善，人们会向你提出建议，纠正你，引导你——告诉你应该怎样处理这个看来是小人物的案件，因为这个小人物身上有小人物所无法知道也无法理解的、比他高得多的人们的利益和想法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可是，那些轻信报纸的一般读者对此一无所知，他来到法庭上，抑制不住为真理而剧烈跳动的心，面对着审判员们一张张睡眼惺忪的面孔热情地、激动地陈述着自己准备好的合理而周密的论据，他根本不会想到案件的判决书早已写好，而且没有上诉机关，**没有**时间和途径让你去纠正这险恶的、自私的判决，纠正这利剑般穿透你胸膛的不公正判决。

你所面对的只是一堵墙。这堵墙上的砖是用谎言的灰浆粘结在一起的。

我们起初把这一章题为《今天的法律》。但是，确切地说，应该把它题为《**没有法律**》！

依然是那同样诡谲的隐秘性和暗无天日的不公正充满着我国的空气，笼罩在城市上空，它比城市烟筒冒出的黑烟还要浓。

一个用钢箍紧紧箍在一起的巨大国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二个半世纪了，有的只是钢箍，但是**没有**法律。

后　记

本书原不应由我独自撰写。最好是由熟悉情况的人分别撰写各有关章节，然后在编辑委员会上互相补充，共同修改定稿。

但是，能够这样作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我也曾向某些人提议，由他们撰写个别章节，他们没有答应，而只代之以口头叙述，或者把书面材料交给我，供我选用。我还向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提议过共同编写全书，他也推辞了。

按理，应该设一间办公室。应该在报纸上，或者通过电台，发表广告（"请踊跃响应！"），能够有公开的私人信函往来，就像写布列斯特要塞的情况时那样。

但是，我不仅没有可能这样铺开工作，反而不得不把自己的构思、信件、材料等等全部隐藏起来，分散到各处，对一切都严守秘密。甚至在写这本书时我还不得不装作正在从事别的工作。

我多少次提笔写它，又多少次搁笔了。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到底需不需要由我独自来写这样一本书？我的力量能坚持到什么程度？但是，当我看到在已经搜集的材料之外又有许多囚犯从全国各地纷纷写信给我的时候，我明白了：既然此事注定要由我来作，那我就有义务去完成它。

必须说明：这一整本书，包括它的每一部，一次也没有同时放在同一张书桌上过！在《群岛》的撰写工作最繁忙的时候，一九六五年九月，我的文件柜遭到摧毁，我的一部小说*被没收了。

* 指长篇小说《第一圈》的原稿。——译者注

这时，我只得把已经脱稿的《群岛》的各部以及为其它部分准备好的材料分散到各地去。从此全书就再也没有集中到一起，因为我怕冒险，何况书里面提到许多人的真实姓名。后来，我总是抄下一张备忘单，写明应该在什么地方核实什么材料，到什么地方去删掉什么，然后带着这张清单从一处辗转到另一处进行工作。是啊，这种惶惶不安的状态和文字加工不足的情况也正是我国的受迫害的文学所具有的确切特征。只好请读者接受这样一本书了。

我停止了本书的写作并不是我认为本书已经完成，而只是因为我自己再没有更多的精力写它了。

我不仅请求读者宽恕这一点，而且我要大声呼吁：时机一到，一旦有可能，就请幸存的朋友们，熟悉情况的朋友们集会到一起，写出有关此书的评论和注释来；需要的话，就修改它，需要增加的地方就请增加（当然不能堆砌，类似之处可不必重复）。到那时，本书才可以说是完成了。愿上帝保佑你们！

即使是现在这样一本书，我能够安全完稿也使我十分惊奇。我曾经想过多少次：不会让我写完它的。

我结束本书的时间正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具有双重纪念意义的年头（这两个周年纪念也算是互相有联系的），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和发明铁丝网（一八六七年）一百周年。

这第二个周年纪念想必不会为人们所留意……

1958.4.27—1967.2.22

于梁赞市一隐居地

写在后记之后

当时我很匆忙，因为预计我写给作家代表大会的那封信引起的爆炸即使不把我毁掉，至少也将使我失掉写作自由和接触自己手稿的可能性。没想到，信不但没有使我被捕，反而使我的地位像磐石般稳固了。这时我才认识到：我有责任，也有可能把本书写完，修改完。

现在，已有少数朋友看过它的原稿。他们帮助我发现了一些重大缺点。我未敢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征求对本书的意见，即使将来会出现这种可能性，那对我来说恐怕也已经晚了。

在这一年中，我作了可能作到的一切，总算把它完成了。请读者不要责备我写得不全面吧，因为补充是没有止境的。而每个稍微接触过一些事实或进行过思索的人都可能增添一点什么，有时甚至会增添某些珍贵的东西。但是，容量是有它自身的规律的。当容量已达到极限时，即使再挤进几个小粒也会引起整个岩石的崩裂。

至于我描写得不够成功之处，有些地方可能重复或显得松散或不当，只好请读者谅解了。要知道，即使是这一年，也并不是安静地度过的，而最后几个月的情况更是像大地和书桌都在燃烧似的。甚至在进行这最后的编辑加工时，我还是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全书手稿合在一起，没有在同一张书桌上放过全书。

有些人帮助了我。没有他们，本书不可能完成，不可能传阅，不可能保存下来。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我可以信任纸张而把他们的名字全写在纸上的时候。他们自己理解这一点。我向他们致敬。

伊斯特圣诞岛
1968年5月

又过了十年

今天，在被放逐的日子里，我终于能安安静静地对此书做一次加工了，虽然已经是在全世界的人读过它以后。又有二十来位当过囚犯的见证人给我提供了更正和补充的材料。

在西方这边，我有了以前不能相比的利用各种出版物和新的插图的机会。但是这本书不能再把这些全收进去了。它是在苏联的黑暗中依靠囚徒们记忆的震动和火花写成的，它应当留在它生长的基础上。

佛蒙特
1979

附录

人名索引

据本书英、日译本附录编写。仅供参考

（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

A

阿拜·库南巴耶夫（Абай. Кунанбаев，1845—1904）

哈萨克人道主义爱国诗人，启蒙家，思想家。对哈萨克文学语言的形成和文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

阿克萨科夫（Аксаков.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1823—1886）

政论作家，诗人，思想家。斯拉夫派首领之一。晚年曾主办《罗斯报》。1878年因发表有关斯拉夫问题的演说而被驱逐出莫斯科。

阿拉克切夫（Аракчеев. Алексей Андреевич，1769—1834）

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专权佞臣，陆军大臣，陆军部长；“军人屯垦”的组织者。屯垦兵在严格纪律下从事劳动。他的名字已成为专横和反动的代词。

阿兰尼（Arany. Janos，1817—1882）

匈牙利爱国诗人；曾积极参加1848—1849年革命。革命诗人裴多菲的朋友。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1629—1676）

1645—1676年俄国沙皇。在位期间发生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1667年将乌克兰归并于俄国。

埃尔斯贝格（Эльсберг. Яков Ефимович，1901—）

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自1920年开始文学活动。曾任加米涅夫秘书，著有赫尔岑、高尔基等人的研究专论。被指控曾在肃反年代参与迫害作家，因而险遭作协开除。后以“和党一起犯了错误”为自己辩解，勉强保住作家地位。

奥尔明斯基（Ольминский. 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1863—1933）

职业革命家和文学家。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老布尔什维克。曾任俄共党史委员会主席，中央党史局主任等，1898—1903年流放亚库特。

B

班杰拉（Бандера. Стефан，1909—1959）

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力量的首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企图与德军合作，但德军认为他不可靠并有独立倾向而将他逮捕。大战结束后至1947年在乌克兰进行反苏武装活动。后在慕尼黑被暗杀。

贝利亚（Берия. 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1899—1953）

苏联党的工作者。1934年后连任中央委员。镇压托洛茨基派后，任内务人民委员，深得斯大林信任，任内务部长、部长会议副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等要职。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四个月后贝利亚被处决。

彼得留拉（Петлюра. Симон Васильевич，1877—1926）

乌克兰民族主义首领；1917—1918年率领乌克兰反布尔什维克武装。1919年与波兰结成同盟，1920年又攻入乌克兰，后逃亡。在巴黎流亡期间被刺死。

波德别尔斯基（Подбельский. Вадим Николаевич，1887—1920）

职业革命家，老布尔什维克，1908 年曾被流放。1918 年任邮电人民委员。

别尔佳耶夫（Бердя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74—1948）

哲学家，宗教思想家。1922 年流亡国外。

布列施科-布列施科夫斯基（Брешко-Брешк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1874—1943）

俄国流亡作家。大量低级庸俗小说的作者。

布尔采夫（Бурцев. Владимир Львович，1862—1936）

俄国评论家，出版业者，民粹派。1885 年流放西伯利亚。二十世纪初流亡国外。1905 年回到俄国，1907 年再次流亡。曾出版专载革命回忆录的杂志《往事》，以及《未来报》，1911—1914 年在巴黎出版《共同事业报》等。

布尔加科夫（Булгаков. 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1891—1940）

俄国作家，剧作家。1905 年后加入立宪民主党，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

D

达里（Даль.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1801—1872）

俄国作家，语言学家，人种志学家。著有《现代大俄罗斯语详解辞典》（1863—1866）。编有《俄罗斯民间谚语》（1862 年。收入谚语三万余条）。达里的辞典是索尔仁尼琴最常用的工具书。

邓尼金（Деникин. 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1872—1947）

沙俄将军。1918 年底借美、英、法干涉军在南俄各港口登陆，他率领的白军反对布尔什维克，曾得逞一时。后失败，逃亡国外。

多罗舍维奇（Дорошевич. Влас Михайлович，1864—1922）

俄国激进派记者。十九世纪末游历萨哈林岛；以描述该地监狱状况的文章闻名。

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1821—1881）

俄国作家。1849 年因参加反对专制农奴制度、争取俄国解放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而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

杜托夫（Дут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1864—1921）

沙俄军队上校。1917 年 9—12 月率领奥连堡哥萨克暴动，高尔察克的伙伴之一。

E. F

恩克鲁玛（Нкрумах Куаме，1909—1972）

加纳政治家。曾留学美国和英国，致力于加纳独立运动。1957 年加纳独立后首任首相，后任大总统。1962 年政变被推翻，流亡国外。

弗拉索夫（Власов. 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1900—1946）

1919 年参加红军，1930 年入党，二次大战中任苏军中将，1942 年在为列宁格勒解围的战役中被德军俘虏；后组织并率领俄罗斯人反苏武装。战后被苏联处决。

伏尼契（Войнич. Этель Лилиан，1864—1960）

英国女作家。曾长住美国，小说《牛虻》（1897）的作者。

G

格尔舒尼（Гершуни. Владимир Львович，1930—）

格里高利·安德烈耶维奇·格尔舒尼（社会革命党创始人，1870—1908）的侄子。1949 年因参加反斯大林的青年组织被判十年劳改。1969 年又被转押入精神病院。

戈尔巴托夫（Горбат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1891—1973）

苏军将领；1939 年被判处十五年徒刑，遣送至科雷马。1941 年获释。1943—1958 年任军长、军区司令员等职。曾发表符合官方政策的劳改营回忆录。

戈特（Cot Pierre，1895—）

法国政治家。自 1950 年起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3 年获斯大林和平奖金。

古米廖夫 (Гумилев. Николай Степанович, 1886—1921)

高峰派诗人，阿赫马托娃·安娜的前夫。被控参与反革命阴谋遭处决。

古奇科夫 (Гуч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62—1936)

俄国实业家，1905 年曾建立大资产阶级反革命组织"十月十七日同盟"。1917 年 2 月革命后企图保存君主制，曾任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后逃亡国外。

H. J

哈尔图林 (Халтурин. Степ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6—1882)

俄国革命者，工人。1878 年组织"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后加人民粹派，从事恐怖活动。1880 年 2 月曾在冬宫掷炸弹企图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季亚科夫 (Дьяков. Борис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902—)

苏联作家。曾发表有关劳改营生活的回忆录。

基里洛夫 (Кириллов. Владимир Тимофеевич, 1890—1943)

水兵，曾参加 1905 年革命，遭流放。后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有代表性的诗人，1937 年在肃反中被捕死亡。死后恢复名誉。

季米特里皇子 (Димитрий Царевич, 1582—1591)

伊万四世的儿子，死于乌格利奇小城。其死因是在癫痫症发作时被刺还是被谋杀，至今说法不一。

加兰斯科夫 (Галансков. Юр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1939—1972)

持不同政见的诗人。地下刊物编辑，因编纂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审判案件材料的《白皮书》而以"反苏活动"罪名被捕，死于狱中。

金兹堡（伯格）（Гинзбург. 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1937—）

持不同政见者。因编纂有关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审判案件的《白皮书》与加兰斯科夫一起受审，被判刑五年。1977年又因与索尔仁尼琴一起组织"俄罗斯援助政治犯社会基金会"被判刑八年。1979年同其他四名持不同政见者一起被驱逐到西方，换回两名苏联间谍。

K

卡拉万斯基（Караванский. Святослав，1920—）

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在劳改营及监狱度过二十五年以上。

卡利亚耶夫（Каляев. Иван Платонович，1877—1905）

社会革命党人。恐怖主义者。1904年参与谋刺内务部长普列夫。1905年2月4日掷炸弹炸死莫斯科总督罗曼诺夫大公；同年被处死刑。

卡列金（Каледин. 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1861—1918）

沙俄将军。1917年底至1918年2月率领顿河地区反革命暴动。

卡莫（Камо. Тер-Петросян，Семён Аршакович，1882—1922）

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1905—1907年革命时期，为外高加索战斗大队的积极组织者。曾数次与斯大林共同策划对银行的抢劫（"没收"）行动。四次被判死刑。1918—1920年在高加索与外国干涉军作战，1922年死于车祸。

卡尔波夫（Карпов. Евтихий Павлович，1857—1926）

俄国戏剧家。曾因参加民粹派活动被流放。

卡尔品科-卡雷（Карпенко-Карый，笔名，真名为Тобилевич. Иван Карпович，1845—1907）

乌克兰剧作家，演员，导演，他的戏剧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为乌克兰现实主义戏剧创始人之一。

卡尔萨维娜（Карсавина. Тамара Платоновна，1885—1978）

1909—1929 年为佳吉列夫俄国芭蕾舞团领衔女演员。十月革命后定居伦敦。教授芭蕾。

卡萨特金（Касаткин. 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1880—1938）

作家，风景画家，社会民主党员。十月革命后致力于孤儿保育事业。三十年代从事出版工作。死于肃反运动中。

考涅楚克（Корнейчук. Александр Евдокимович，1905—1972）

苏维埃乌克兰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苏共中央委员，乌克兰共和国科学院院士，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

克日扎诺夫斯基（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 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1872—1959）

俄国动力工程师，科学院院士。1917 年前是列宁革命活动中的战友之一，十月革命后成为苏联电气化和动力建设主要负责人。1921—1930 年领导国家计委，1929—1939 年为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897—1900 年曾流放西伯利亚。

克拉夫琴科（Кравченко. Виктор Андреевич，1905—1966）

苏联高级官员，1944 年叛逃美国。1946 年发表《我选择了自由》一书，在冷战时代曾引起世界性轰动。

克拉斯诺夫（Краснов.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1869—1947）

沙俄将军。1917 年 10 月曾指挥军队镇压彼得格勒的革命力量，1918 年指挥顿河白色哥萨克叛乱。后逃亡国外。1944—1945 年率领哥萨克部队帮助希特勒德军对苏作战。战后被英方引渡给苏联，被苏最高法院判处死刑。

克拉辛（Красин. 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1870—1926）

苏联外交官。最早的布尔什维克之一。1924 年出任首任驻法大使。

克雷连科（Крыленко.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1885—1938）

十月革命后（1918 至 1931 年）任苏联总检察长。后任司法人

民委员。1938年肃反中被枪决。斯大林死后恢复名誉。

克鲁普斯卡娅 （Крупская. 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1869—1939）

最老的共产党员之一，列宁夫人，教育家和教育理论家。

克洛特（Клодт. Петр Карлович, 1805—1867）

俄国大雕刻家。列宁格勒市的克雷洛夫纪念像和安尼奇科夫桥上的马像的作者。

科切托夫（Кочетов. Всеволод Анисимович, 1912—1973）

苏联作家，作协理事。《十月》杂志主编。以批判态度描写“解冻”时期，引起“解冻”派的不满。

科恩（Кон. Феликс Яковлевич, 1864—1941）

波兰革命者，1884—1904年曾在西伯利亚东部服苦役。后成为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苏共，1919—1922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2年以后任共产国际执委、书记等职。

科佩列夫（Копелев. Лев Зиновьевич, 1912—）

德国文学研究者。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时期的难友。1977年被苏联作协开除。写有回忆录等。

科托希欣（Котошихин. Григорий Карпович, 1630—1667）

莫斯科罗斯外交署文书。1666年逃至瑞典。著有《关于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统治时期的俄国》,是研究十七世纪俄国历史、文学、语言学的重要资料。

科兹洛夫（Козлов. Фрол Романович, 1908—1965）

列宁格勒大清洗后任该市市委书记（1949—1952），后为州委书记；1957—1964年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

柯罗连科（Короленко. 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1853—1921）

俄国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主张民主，反对专制，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曾被流放西伯利亚。反对暴力革命。

库罗奇金（Курочкин. Васил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 1831—1875）

俄罗斯讽刺诗人，革命民主派讽刺杂志《火星》（1859—1873）创办人。

库图佐夫（Кутузов.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1749—1797）

俄国作家。亚·尼·拉季舍夫的密友。

L

拉夫罗夫（Лавров.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1823—1900）

社会学家，政论家。他的著作《历史书札》（1868—1869）成为民粹派运动的哲学基础。

拉季舍夫（Радищ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1749—1802）

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作家，哲学家，启蒙学者。因揭露农奴制罪恶的作品《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02 年自杀。十二月党人和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上的先驱者。

列秀切夫斯基（Лесюч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1908—1978）

苏联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长。苏共二十大后被指控曾于三十年代肃反运动中迫害作家。后发表声明，以“受欺骗”为自己辩护。

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1844—1908）

俄罗斯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教育家。民主主义者。

李森科（Лысенко. Трофим Денисович，1898—1976）

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所谓“李森科学说”在 1940 年以后实质上统治苏联生物学界及其它许多有关学科。

鲁坚科（Руденко. Роман Андреевич，1907—1981）

苏联法学家。1945—1946 年在审判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担任苏联方面的首席检察官，公诉人。1953 年起任苏联总检

察长。1961 年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

M

马尔琴科 (Марченко. Анатолий Тихонович, 1938—)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著有《我的供词》一书，记述自己 1960—66 年的劳改营生活，在西方出版。1968 年又被捕，判四年劳改。

马斯连尼科夫 (Масленнико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900—1954)

苏军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任集团军司令。从第二次大战前起一直兼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部的职务。

马林科夫 (Маленков. Георгий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1902—)

苏联党的活动家。斯大林逝世后任部长会议主席、党的总书记。不久即辞职，后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5 年因"反党集团"案被赫鲁晓夫撤职。

麦克唐纳 (Macdonald. James Ramsay, 1866—1937)

英国政治家，1924 年和 1929—1935 年任首相，英国工党创建人和领袖。他任期内英国同苏联建交。

曼德尔施塔姆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Надежда Яковлевна, 1899—)

1938 年死于递解监狱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在国外发表若干回忆作品，为了解斯大林时代苏联知识分子状况提供了重要材料。

梅耶霍德 (Мейерхольд. Всеволод Эмильевич, 1874—约 1942)

苏联戏剧家。对世界进步戏剧界颇有影响。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消失。

缅希科夫 (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Данилович, 1673—1729)

俄国政治家，军事家。深受彼得大帝宠信。彼得一世死后，失宠，1727 年被流放西伯利亚。

米高扬 (Микоян. 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ич, 1895—1978)

苏联党的活动家。斯大林时代自 1935 年起即任苏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是斯大林的得力助手。斯大林逝世后，作为赫鲁晓夫的左右手继续活跃于政治舞台。勃列日涅夫时代退休。曾发表回忆录。

米哈伊洛夫斯基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

实证主义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政治家。民粹派思想家。

莫克罗乌索夫 （Мокроусов. Борис Андреевич, 1909—1968）

苏联作曲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N

纳杰日金 （Надеждин.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04—1856）

文学批评家，记者，民族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出版杂志《望远镜》，因刊载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而被查封。1836—1838年被流放。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Павлович, 1796—1855）

1825—1855年俄国沙皇。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极端仇视自由主义。迫害进步的俄罗斯文化。

尼古拉二世 （Николай II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68—1918）

1894—1917年俄国末代沙皇，1917年二月革命被推翻。1918年全家被枪决。

诺根 （Ногин. 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1878—1924）

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屡遭逮捕和流放。1917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贸易和工业人民委员。

P

帕尔乌斯 〔Парвус （Helphand）. Александр Израилович, 1867—1924〕

1905年革命时彼得堡苏维埃的积极成员。被判处三年流放，

逃亡国外。在国外积聚大笔财产，曾资助布尔什维克事业。1917年曾建议德国等待俄国出现无政府状态。十月革命后希望回国，遭列宁拒绝。晚年在德国度过。

帕宁（Панин. Дмит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1911—）

工程师，索尔仁尼琴劳改营时期的难友。著有回忆录。现居法国。

帕斯捷尔纳克（Пастернак. 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1890—1960）

苏联诗人，作家。《日瓦戈医生》的作者。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当局压力下拒绝受奖。小说在苏联未能出版。

裴多菲（Petöfi. Sandor，1823—1849）

匈牙利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他领导的人民起义奠定了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的基础，他在这次革命中牺牲于谢格什瓦尔会战。

皮萨列夫（Писарев. 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1840—1868）

俄国文学批评家，革命民主派，激烈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受德国自然唯物主义影响。由于号召推翻专制，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坐牢四年。

普拉托诺夫（Платонов. Матвей Иванович，1751—1818）

俄国军事家，顿河哥萨克统领。1812年俄国抗击拿破仑的战争中的英雄。葬于新切尔卡斯克。

普列夫（Плев. Вячеслав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1846—1904）

俄国反动政客。1902—1904年任内务部长兼宪兵司令，残酷镇压革命志士。1904年7月被社会革命党人萨佐诺夫刺杀。

Q.R

契诃夫（Чехов. 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1860—1904）

俄国作家，剧作家。1890年曾只身穿过西伯利亚赴萨哈林岛考察，1895年出版《萨哈林岛》一书，记述该地服刑场所状况。

茹科夫斯基 (Жук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1783—1852)

俄国诗人，亚历山大二世教师，抗法战争时期发表许多爱国主义诗篇。曾屡次帮助普希金免遭政治迫害。

S

萨佐诺夫 (Сазонов. Игорь С, 1879—1910)

社会革命党人。曾刺杀沙俄内务部长普列夫。

沙拉莫夫 (Шаломов. Варлам Тихонович, 1907—)

作家；在科雷马劳改十七年；《科雷马故事集》（巴黎，1969）、《罪恶世界特写记》的作者。

舍伊宁 (Шейнин. Лев Романович, 1906—1967)

苏联作家。曾任检察长，历次清洗运动中担任侦查员。发表《军事秘密》等侦探小说；在《侦查员札记》(1938) 中描写了自己的工作。

施特恩贝格 (Штернберг. Лев Яковлевич, 1861—1927)

俄国民族学家，1889—1897 曾被流放萨哈林岛，即从事当地民俗学的研究。后在科学院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

斯科罗帕德斯基 (Скоропадский. 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1873—1945)

沙俄将军。1918 年 4 月至 12 月在德军支持下就任“乌克兰盖特曼”。后流亡国外。

斯皮里多诺娃 (Спиридонова. 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1884—1941)

俄国革命者。生于唐波夫省，1906 年因行刺镇压农民起义的警察官员而入狱。1917 年后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领袖。

斯特拉霍维奇 (Страхович. Константин Иванович)

科学家，空气动力学专家。为索尔仁尼琴编写《古拉格群岛》提供资料者之一。

斯塔罗谢尔斯基 (Старосель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60—1916)

俄国农学家，官吏。曾任格鲁吉亚库泰伊斯省长，并利用其职权支持革命运动。1906年被处流刑。1908年亡命巴黎，参加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工作。著有《格鲁吉亚革命运动史》等。

索洛维约夫 (Соловь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6—1879)

革命者。1879年行刺亚历山大二世未遂，被处绞刑。

苏沃林 (Суворин. Алексей Сергеевич, 1834—1912)

记者，政论家，出版家，剧场经理。

苏加诺 (Сукарно Ахмед, 1901—1970)

印度尼西亚政治家，曾领导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运动。1945年印尼独立后任大总统，1966年被推翻。

苏尔科夫 (Сурков.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99—)

苏联诗人，最高苏维埃代表，作协理事会书记。

T

唐-鲍戈拉兹 (Тан-Богораз. Владимир Германович, 1865—1936)

参与民意党恐怖活动，十九世纪末被流放科雷马。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民间文学家。北部西伯利亚问题专家。

特瓦尔多夫斯基 (Твардо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Трифонович, 1910—1971)

诗人，记者。1956—1970年任《新世界》杂志主编。1961年曾支持发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后一直支持索尔仁尼琴立场。

捷维凯良 (Тевекелян. Варктес Арутюнович, 1902—1969)

苏共党员；曾任纺织厂经理；作家。他的小说《花岗石岂能熔化》(1962)歌颂契卡工作人员。

阿·托尔斯泰 (Толстой.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82—1945)

苏联作家。十月革命后1918—1923年曾流亡国外。回国后写了《彼得大帝》等作品。

托洛茨基（Троцкий Леон，真名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Бронштейн，1879—1940）

俄国革命家，生于犹太小地主家庭。曾因参加1905年革命被流放。1917年2月革命后回国。参加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任外交部长、第一任国防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等。列宁逝世后被免职，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放逐到土耳其。后在墨西哥被暗杀。除政治书籍外，尚著有《文学与革命》等。

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1818—1883）

俄国作家。因在《猎人日记》中表露了强烈的反农奴制思想，沙皇政府曾借口他的一篇悼念果戈理逝世（1852）的文章而责令他回故乡居家反省一个月。

图哈切夫斯基（Тухаче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1893—1937）

苏联将军。曾代理红军总参谋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代理陆海军人民委员等。1937年肃反中被处决。斯大林逝世后恢复名誉。

W

瓦维洛夫（Вавил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1887—1943）

苏联遗传学家。1930—1940年任遗传研究所所长。1940年被捕，死于狱中。

维辛斯基（Вышинский. Андрей Януарьевич，1883—1954）

苏联法律学家，外交官。原系孟什维克，1920年转为布尔什维克。1933—1935年任苏联副检察长，1935—1939年任苏联检察长，曾主持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审判。著有国家与法权问题著作多种，构成肃反期间审判工作的理论支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长。

维特（Витте. 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1849—1915）

俄国政治家，外交官。1905—1906年任内阁总理。日俄战争

后代表俄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

X

肖斯塔科维奇(Шостакович. Дмит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1906—1975)

苏联作曲家。晚年因签名谴责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受到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对。

谢列布里亚科娃 (Серебрякова. Галина Иосифовна, 1905—1980)

苏联作家,著有马克思传记小说及劳改营生活回忆等。

谢列斯特 (Шелест. 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ич, 1903—1965)

苏联作家。二十年代即从事写作。但三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后期之间未见发表作品,"解冻"后又继续发表作品。

谢马什科 (Семашко.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74—1949)

1893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05 年流亡国外。1917 年二月革命后回国;1918—1930 年任保健人民委员。医学教授,院士。

谢苗诺夫-天山斯基 (Семенов-Тян-Шанский. 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
1827—1914)

探险家,地理学家。1856—1857 年曾到天山和伊塞克湖一带探险,给后来的中亚探险队奠定了基础。俄国地理学会副主席,曾组织俄罗斯和中亚地区探险考察。

Y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Ⅰ, 1777—1825)

1801—1825 年俄国沙皇。将格鲁吉亚、芬兰、比萨比亚并于俄罗斯。晚年宠信阿拉克切夫,实行严酷统治。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Ⅱ, 1818—1881)

1855—1881 年俄国沙皇。1861 年实行"农民改革"解放农奴。曾吞并中亚和远东广大地区。被民意党人刺死。

亚历山大三世 (Александр Ⅲ, 1845—1894)

1881—1894年俄国沙皇。曾实行某些资产阶级式的改革。

雅戈达 (Ягода, Генрих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91—1938)

1934—1936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1938年被处决。

雅库博维奇 (Якубович, Петр Филиппович, 1860—1911)

俄国诗人，民意党人。曾服苦役。著有描写苦役生活的随笔《在被遗弃者的世界里》。

伊利乔夫 (Ильичев, Леонид Федорович, 1906—)

斯大林时期曾任《消息报》主编。1961—1966年在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

伊萨科夫斯基 (Исако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900—1973)

苏联诗人。

伊万四世 (Иван Ⅳ,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озный, 1530—1584)

1533年起为全罗斯大公，1547年起为俄国沙皇。实行一系列改革，巩固了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家，扩大了疆土。以"伊万雷帝"闻名。

叶尔马克 (Ермак, Тимофеевич, ? —1585)

哥萨克首领，1581—1582年曾率军队远征西部西伯利亚。

叶尔米洛夫 (Ермилов,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904—1965)

苏联文艺批评家。著有《论契诃夫》、《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曾是官方观点的代表，但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后，曾在《真理报》上撰文称赞该书。

叶甫图申科 (Евтушенко, 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933—)

苏联诗人。作为"解冻"时期兴起的所谓第四代诗人，颇有影响。

叶卡捷琳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Ⅱ, 1729—1796)

1762—1796年俄国女皇。原系德国公主。1762年宫廷政变推翻她丈夫彼得三世而即位。加强农奴制度，扩大地主权利，后引

起1773—75年的普加乔夫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Елиз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1709—1761）

彼得大帝之女，1741—1761年俄国女皇。曾保护贵族集团和地主权利，加紧压迫农奴。

尤登尼奇（Юденич.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1862—1933）

沙俄将军，1918—1920年苏联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曾在苏联西北部率领白军反对苏维埃政权。

尤利·多尔戈鲁基（Юрий Долгорукий，约1090—1157）

罗斯托夫-苏兹达利公，1155年起为基辅大公。被认为是莫斯科城的奠基人。

约赫尔孙〔Иохельсон（Иокельсон），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1855—1943〕

民意党恐怖运动积极参加者。1888年被流放科雷马。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1922年移居美国。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古拉格群岛　　（下册）
作者＝
页数＝６７７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